

# 远征欧陆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目 录

进军令.....	1
第一章 战争的前奏.....	1
第二章 全球战争.....	18
第三章 马歇尔领导的作战处.....	35
第四章 进攻的基地.....	55
第五章 制订“火炬”行动计划.....	83
第六章 进攻非洲.....	108
第七章 阿尔及尔的冬季.....	131
第八章 突尼斯战役.....	154
第九章 “赫斯基”行动.....	181
第十章 西西里和萨勒诺.....	196
第十一章 开罗会议.....	217
第十二章 意大利.....	226
第十三章 制订“霸王”行动计划.....	247
第十四章 进攻欧陆开始日和攻占阵地.....	282
第十五章 突破.....	297
第十六章 乘胜追击和供应之战.....	321
第十七章 德国边境的秋季战斗.....	356
第十八章 希特勒的孤注一掷.....	378
第十九章 越过来因河.....	404

第二十章	突击和包围 .....	427
第二十一章	占领德国 .....	445
第二十二章	胜利的余波 .....	469
第二十三章	作战探讨 .....	491
第二十四章	俄国 .....	501
致谢	.....	525
附录		
一、盟军最后攻势战斗序列 .....		526
二、盟军最后攻势地、空协同作战队形 .....		528—529
三、德国的地面部队 .....		529
军事代号说明 .....		531

## 地 图

通向澳大利亚的生命线 .....	22
远洋海运航线 .....	48
轴心国占领下的地中海区 .....	56—57
轰炸轴心国工业 .....	71
盟军地中海区战役 .....	104—105
北非登陆 .....	115
11月份向突尼斯城的猛进 .....	133
卡塞林反击战 .....	163
在突尼斯的春季攻势 .....	173
突尼斯城战役的最后阶段 .....	176
进攻西西里 .....	198
西西里战役的最后阶段 .....	200
进攻意大利 .....	208
意大利战役 .....	231
“霸王”行动预测 .....	232—233
“霸王”行动总战略 .....	254
空中封锁 .....	260
欧洲要塞 .....	264—265
进攻欧陆开始日的突击 .....	284
进攻瑟堡 .....	288
滩头阵地的扩张 .....	292
突破和利用战机 .....	304

法莱斯包围战 .....	309
布列塔尼扫荡战 .....	312
“铁砧—龙骑兵”行动 .....	328
解放法国 .....	328—329
计划与实行 .....	344
“市场—花园”行动 .....	346
些耳德河口 .....	361
科耳马尔据点 .....	367
来因河壁障 .....	371
阿登冒险 .....	374
阿登战役霍奇斯第一集团军的前线 .....	379
阿登战役德军开始猛攻 .....	385
阿登战役德军最大限度突入 .....	390
阿登战役盟军进攻 .....	401
消灭来因河西岸的德军 .....	411
雷马根桥头堡 .....	418
萨尔河—来因河三角地带 .....	421
来因河壁障被突破 .....	433
包围和攻占鲁尔 .....	446
德国投降时的军事态势 .....	460
占领德国 .....	464—465
四强最初占领区 .....	473

# 第一章

## 战争的前奏

1945年5月7日，约德尔陆军元帅在兰斯的盟军统帅部签署了德国投降书。次日午夜，自1939年9月1日起一直在欧洲激烈进行的这场冲突即告结束。

在这两个日期间的岁月里，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丧失了生命。来因河以西的整个欧洲，除一小部分外，被占领军统治了四年多，自由制度和自由言论销声匿迹。经济遭到破坏，工业被摧毁。就拿德国本身来说，它多年来貌似无敌，而今在其国土上却到处呈现出一片覆灭和凄凉的景象，桥梁倒塌，城市变为废墟，巨大的工业生产力实际上已经瘫痪。大不列颠为了进行战争，已把本国的经济和财政弄得疲惫枯竭；这个国家几乎动员了全部力量，所有适龄的人，不论男女，不是参加部队，就是为战争从事某种生产。伏尔加河以西的俄国工业几乎全被毁坏。

美国也不能幸免，到太平洋的对日战胜日时，有三十二万二千一百八十八名年轻人在战斗中失踪或在服役期间死亡，将近七十七万人受伤。这个国家不仅在维持本国的陆、海、空三军方面，而且还在为自己的盟国供应装备和武器使之有力地抗击共同敌人方面，已经倾注了无限的资源。每一个盟国都按其财富的多少为共同事业作出了贡献，而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其贡献更为突出。我们的这个国家，从战争开始到终结，已经完成了最伟大的改

革,使它在军事上从几乎是极为衰弱的状态一跃而拥有了惊人的力量和效能。

当我们开始为我们脆弱不堪的防御担惊受怕时,欧洲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1939年,我国为加强军事机构着手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这项工作,对一个甘居落后的大国来说,可说是从接近于零的地位开始的。

这年夏季,德军对着波兰国境集结了六十个步兵师、十四个机械化和摩托化师、三个山地作战师、四千多架飞机以及数千辆坦克和装甲车。波兰当时能动员起来反抗德军的兵力不到德军各兵种全部力量的三分之一。在德军强有力的突击下,波军是注定要迅速崩溃的。波军对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来说,虽然是个一击就垮的牺牲品,但其兵员和装备在数量上仍远远超过美军。

在1939年7月1日,美军的兵力——包括空军部队、地面部队和后勤部队——不到十三万人。在三个已编成的步兵师和六个部分编成的步兵师中,没有一个师达到战斗编制额;两个骑兵师还不到其兵力的一半;而且,还没有一个装甲师,分散的坦克部队的兵员总数也还不到一千五百人;全部空军约有一千一百七十五架计划用于战斗的飞机,以及一万七千名地勤人员、维修人员和飞行人员。在海外驻防的部队,从北极圈到赤道,从巴拿马到八千哩外的科里吉多岛,共有四万五千三百名士兵。

1939年的夏、秋,经过批准,把国内和海外的现役陆军扩充了两次,达到二十二万七千人。但是,在此后的八个月内,当德国已经残酷地打败了波兰,并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征服西欧时,美军人数仍原封未动。

美国人民仍然认为,距离是把我和欧、亚两洲的任何冲突隔离开来的适当绝缘体。只有相当少的人懂得,美国的繁荣和人身

的安全与我们对岸的自由世界的生存有着直接关系。由此可见，当时想到备战的美国人，只是武装部队中的少数几个职业军人和那些认为美国现在完全不可能脱离任何重大冲突而孤立存在的有远见的政治家。

1940年春，德国占领丹麦和挪威，进而发动闪电战，从来因河开始横扫法国直捣比斯开湾；英国损失惨重地从敦刻尔克撤退，这种种形势使美国愈来愈感到不安。到7月中旬，正规军被批准的人数增加到三十七万五千名。8月底，国会通过了国民警卫队动员令；六个星期后，选募制兵役生效。到1941年夏，由正规兵、国民警卫队员和民兵组成的美国陆军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这个国家在和平时期从来没有征集过如此庞大的兵力。虽然如此，但对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这不过是个暂时的权宜之计而已。

通过国民警卫队和选募制兵役而进入陆军的一百万人不准到西半球以外的任何地方去服役，在国内的服役期也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因此，在1941年夏，当德国人冲进俄国，它的盟国日本也在明目张胆地为征服西太平洋作准备时，陆军只能稍许加强海外的驻防部队。

在离袭击珍珠港不到四个月时，国会以众议院的一票之多数通过了选募制兵役延期法案，容许将陆军的各组成部分调往海外，并延长服役期。国会的这一行动要大大归功于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个人干预，因为这位久负众望的人所发出的紧急警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即使连他也不能完全克服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加强防御力量的看法。服役方面的种种限制（例如年满二十八岁者可以免服兵役），反映了人们继续认为不会发生燃眉之急的危险。

由此可见，在南、北美洲以外的世界处于战火纷飞和轴心国肆无忌惮地把军事统治推向全球的两年内，美国各军种的规模、效能



和经费的每一次扩大,都是美国人民苟安心理相应减退的结果。但在珍珠港事件把这个争执问题变为争取生存的斗争以前,他们还是犹豫不决,不能完全放弃妥协而采取果断行动。

此后,美国在三年半的时间内形成了作战体制,这个体制在打败德国方面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虽然与此同时,我们的国家几乎是单独地在与日本帝国进行着决战。

美国的革命性变革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它所以能完成这一变革,是因为它有坚定的盟国,还因为我们远离战斗的现场。一开始,谁也不能预见战斗的结局。对于要求我们个人做些什么,要求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我们之中很少人抱有一致的意见;但是每个人都逐步地开始认识并且去完成他份内的工作。

在三年内,美国摆脱了惊人的危急处境而一跃成为具有举世无双的战斗力的国家,这是迫使约德尔在1945年5月7日来到我们统帅部投降的两个奇迹中的一个。另一个奇迹是在同一时期内,联合作战的指挥几乎发展到了完美无缺的程度。历史证明,在进行战争时搞联盟是件愚蠢的事。结盟国家战败的记录是如此之多,所犯下的不可原谅的错误是这样普遍,以致长期以来,职业军人一直低估了实现有效的联合行动的可能性,除非结盟国家拥有大量可用的资源,足以象洪水般地倾注于战场来保证胜利。当军事学院的学员们逐渐了解到拿破仑经常是对结盟国家作战时,甚至他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领袖的名声也受到了损害;因为他们认为,他面临的对手有着分歧的意见以及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

首先,盟国的任务是要靠唯一权威的决策来使用两个大国的资源。

这种事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航海图来导航。在过去,当几个国家有效地配合以对付共同敌人时,经常是由一个最强大的成

员做联盟的领导。而现在，则必须通过自愿的让步以建立有效的团结。这部真实的战争史，特别是地中海战区的“火炬”行动史和欧洲西北部战区的“霸王”行动史，就是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团结的实例。我们有过分歧，但这是代表着坚强而有自尊心的人民的一些果断人物的分歧，如果把这些分歧与朝着争取西方彻底胜利而并肩前进的盟国所创造的奇迹相比，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在1939年战争开始时，我在菲律宾担任麦克阿瑟将军的高级军事助理，并且即将完成为期四年的任务。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正在负责建立和训练一支独立的菲律宾陆军。

在马尼拉的一些俱乐部中，外国领事馆人员之间发生过争吵和拳斗。引起这些事件的原因是，绝大部分人认为，希特勒是个最坏的恶棍，而一小撮骚乱分子则认为他是一位英雄。这些冲突加强了当地人对战争的注意。至于裕仁天皇，即使被提到，次数也不多，因为当时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纳粹独裁者下一步的行动上。

侵略波兰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我们还听到了大不列颠首相的广播演说。我和我的朋友霍华德·史密斯上校听到英、德两国又一次宣战。这是一个严重的时刻，对我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我确信，美国不久会认识到，它不可能保持中立了。

我肯定美国将被卷入战争的漩涡，但对进入战争的方式，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我原来设想，在我们参加欧战以前，日本不会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此外，我对时间也作了错误的估计。我认为，为了保卫自己，在战争爆发后一年之内，我们会被迫对轴心国作战。

从1931年以来，陆军中的一些高级军官常常对我表示他们的看法，认为全世界正在直接走向另一场全球战争。我同意这种看法。日、德、意三国独裁制度的每一个行动，都显示它们决心不顾

一切地要掠夺它们所需要的任何领土，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这种野心早就迫使民主国家反对它们，这一点看来也是清楚的。然而，许多高级军官却认为，希特勒把英、法推向战争，这终究是估计错误。

他们的理由是，法国陆军和英国海军联合起来会打得他投降；他们不但轻视一些专家对法国军事效能的传说表示怀疑的报告，而且也不去研究德国参谋总部的记录，这些记录说明德国人只有在经过深思熟虑并断定有速胜把握时才进行打击。

我拜访了菲律宾总统，告诉他我要回国去参加紧张的备战工作，因为我当时确信这一工作将会在美国开始。奎松总统极力挽留，但我去意已定。我要求准许我在年底前离开这个群岛。

12月，我带着我的妻子和儿子约翰离开了马尼拉。麦克阿瑟将军在码头上给我们送行。从此以后，一直到战后我以参谋长身份访问他在东京的司令部以前，我始终没有见过他。在那次访问期间，我们谈论了世界前途的阴暗，但是我们的预测转向欧洲，而不是亚洲。

我们回国时经过日本，在那里的一些沿海城市逛了几天。那时有一批美国陆军军官在日本随便游览，所以一个中校的短期访问也很平常。但是却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刚刚办完入境手续，就在一个显然完全是偶然的场合中，碰到了一位在美国大学留过学的日本人，他自称是邮政总局副局长。他说他从朋友那里知道我在菲律宾的工作性质，他没有提出什么具体问题，但对于我对菲律宾人民的印象颇感兴趣。在我们逗留期间，他充当我们的向导。他帮我们买东西，主动替我们讲价钱，还带我们到适当的地方去观赏景色，而且尽力想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善于与人相处和乐于助人的人。他谈话的重点是认为美、日两国之间需要友好的

了解；他还自称非常钦佩和喜爱我们的国家。他似乎有无限的时间为我们服务，因此我认为，他之所以老是接待来访的美国人并和他们交谈，可能是怀念他的学生时代。然而在数星期后，我曾向在我前后路过日本的人提起他，我发现谁也没有碰到过此人或任何其他官员。

1940年1月初，我回到美国，被调到华盛顿州刘伊斯堡的第十五步兵队担任军队工作。在过去八年中，我一直在脱离实际的环境中坐办公室搞参谋工作，从事于军事计划的制订和答辩，而现在我每天又要与士兵和武器这两种基本军事要素打交道了。

正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已发生战争，并且美国愈来愈可能卷入这场战争的时候，再没有一个职业军人能寻求到比我更好的职务了。第十五步兵队的大部分人员是在1938年回国前随部队在中国呆过的老兵，还有最近应征入伍的志愿兵；军官全部是老于行伍的军人。

战争一旦爆发，如果敌人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这样的部队就会成为美国防御的堡垒，也将是我们进行回击的先锋。只要给以时间来扩充我们的军事力量，这些部队将会提供建立几百个营的干部，还可以从这些干部中抽调教官，把成千上万的新兵变为受过训练的士兵。不论在哪一方面，官兵们都有显示自己专业才能的无限机会。

然而在1940年初，美军仍反映着美国人民的态度，这和现在的情况以及一个世纪以前的情况一样。大批的官兵缺乏任何紧迫感。大多数部队把体育运动、娱乐和游艺表演看得比严格的训练还重要。有些军官，在长期的和平年代里，养成了埋头于例行公事的积习，而回避了人们纷纷议论的新思想和种种伤脑筋的问题。另一些军官多年来原级未动，因为资历是晋升的唯一根据，于是放弃

了一切进取的希望。可能有许多军官，也还可能有许多士兵，都觉得步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1939年7月1日，陆军中各编成单位的步兵人数规定为五万六千名，到1940年1月31日，就核减到四万九千名。对一个不能预见他将在欧洲或太平洋起作用的普通步兵来说，如果从表面看，这种核减也许早已被合理地解释为他很快就要从军事舞台上消失的一种迹象。

武器和装备的情况也几乎无助于提高步兵的士气。春郊步枪<sup>①</sup>早已过时，对现代的坦克和飞机没有可靠的防御；部队携带的是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木制模型，而且只能从蓝图上学习我们的某些新式武器。各种装备都很缺乏，而在使用的装备中，大部分是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国民军生产的。

此外，在三十年代，军事拨款还把训练限制到基层部队的基础上。连轻武器射击训练用的弹药，也只能偶尔地分到一些。陆军注意的是武器装备的漂亮耀目，回军营的队形和阅兵式的阵容，因为美国人民憎恨战争，不愿让自己保持一种应有的军人姿态。

因此，军事教程和理论就不能辅以实际应用；官兵们都没有那种只有从战场经验和武器的实用中才能产生的自信力。尽管这样，陆军部显然已经行动起来，正尽快地为应付不可避免战争高潮作准备，它在马歇尔将军的坚定领导下，为克服几乎不可想象的困难而进行艰苦的准备工作。但是障碍却很多。

最严重的是心理上的障碍，如悠然自得的心理依然存在。甚至1940年5月法国的沦陷也不能唤醒我们——我说的“我们”是指许多职业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去充分认识形势的危险性。有

---

<sup>①</sup> 美国1903年式的步枪。——译者注

一位担任一个美国师的师长、而且阅历很深、地位很高的将军，在法国停战的那一天打赌说，英国再也支持不到六个星期。他下的赌注，和他在以第二天的晴雨赌输赢时所下的赌金数一样多。他从来没有去想过英国当时是横亘在我们和最严重的危机之间的唯一交战国。他的言论代表了大部分士兵和平民的观点。幸亏还有许多持不同态度的人，他们埋头苦干，完成了原来估计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尽管国会的关心日益加深，但全国还是没有决心承认世界局势的严重性，因而也就未能使训练按照实战要求进行。我们只能以安抚的方式来训练，只有这样，才能把士兵和他们家庭的不满减到最低限度。许多高级军官有这样的担心：报纸会发表文章，光是反对把士兵暴露于严酷的天气中，或者反对因长时间的演习而把士兵们弄得疲劳不堪，却不去说明只有这样训练才能在子弹一旦飞来时收到实效。上级下达的紧急指令和“善作杞忧之人”应时提出的警告，都未能消除人们对局势漠不关心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乃是产生于苟且偷安、盲目乐观和一厢情愿的想法的。

把国民警卫队纳入陆军的措施大大增加了陆军的数量，特别是在步兵和防空部队方面。国民警卫队虽然人员不足额，装备差，训练不够，但其建制是完整的；只要补充新兵，增加装备，提供时间，并予以适当的训练，他们就会成为有战斗力的部队。

军事前景中的愉快时刻逐渐来临了。1940年秋，国会拨了一笔为野战训练所迫切需要的款项。这次野战训练成了陆军的当务之急，训练是在我们最精明的将领之一莱斯利·麦克奈尔少将（后被提升为中将）监督下进行的。驻在刘伊斯堡的第十五步兵队作为第三步兵师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开到华盛顿州的边远地区和旧金山以南的芒特雷半岛进行疏开野外实兵对抗演习。参加行军，制订

后勤计划,研究战术问题和进行必要的参谋工作,给正规军和生力军的官兵提供了最好的课程。其中的一项课程就是摩托化行军,行程是从刘伊斯堡到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芒特雷以南的乔龙大牧场,全程一千一百哩。我们假想了各种战术条件,并在行军中检验了我们的指挥程序、通讯系统和行动纪律。

我在第三师任职期间,和马克·克拉克少校重温了在军校学生时期的友谊。他和我在这次野外演习的许多阶段一起工作时都十分愉快。我对他的计划、训练和组织能力一直十分钦佩。他的这些卓越才干我还没有在别的军官身上发现过。但是,为了适应全国纷纷成立新的司令部的迫切需要,他不久被调到华盛顿当了麦克奈尔将军的助手;11月,我再次被免去直接指挥的责任而担任了第三师的参谋长。在这个岗位上我只呆了四个月,此后又被调到刚在刘伊斯堡成立不久的第九军担任参谋长。这一任命给了我第一次紧急晋升;1941年3月,我成了一名临时上校。

第九军军长是凯尼恩·乔伊斯少将。我在他的幕僚中认识了一批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人,其中三人,在以后的整个战争年代中我尽力使他们和我保持密切关系,而且得到了一些成功。这些人当时的军阶虽然较低,但在战争时期都崭露头角,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升为中将,威西亚德·怀曼升为少将,詹姆斯·柯蒂斯升为上校。这些人坚决地——甚至迫切地——支持一切容许在训练中增加真实感和彻底性的措施,但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1941年春,所有的驻地和军营全为建立美国陆军的事务而行动起来,通过选募制兵役把全国军事战线的各个组成部分——已经扩充了数十万人的正规军、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并入了美国陆军。在刘伊斯堡,我们部队的扩充过程是从1940年9月16日开始的,当时第四十一步兵师的先遣队已经开到这个地点。不久

整个师和国民警卫队中的一些部队就驻扎在那里。

到第二年春，整个西海岸区几乎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变动状态中：成批成批的人被分配到部队，还要从部队抽调干部去筹建新的编制。官兵们有的前往各种专业训练所受训，有的则从那里归队。有着现代化生活设备——如医院、供水系统以及动力发电厂——的帐篷和营房形成了一座座的城市，它们一夜之间就从原来的空地上涌现出来了。

我们的目标是造就一批身体强健的士兵，他们既要受过军事上和技术上的专业训练，又能适应纪律约束和部队的合作精神，而且还要以一个士兵最大限度的尊严来对待他的任务；但由于公众不愿意支持真正的战斗训练，我们不能期望培养出大批在感情上和专业上对作战有所准备的坚强战士。

但是即使我们的这一有限的目标，也消耗了官兵们所能发挥的全部精力。就拿参谋人员来说，在这些日子里，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要制订计划、下达命令和进行视察，又要协调已被命令要做的事和能够做到的事，还要给缺人少车——这是经常使我们大伤脑筋的问题——的单位调拨人员和车辆。他们始终在努力促使我们的地区赶上全国陆军阔步前进的步伐。

1941年6月，我被任命在沃尔特·克鲁格中将指挥的第三集团军中担任参谋长，司令部设在圣安东尼奥。在那里，我能接触到美国整个陆军中的一些问题。地面部队分属四个战术集团军，各集团军的兵力不等；但它们都以正规军为核心，另外配备以国民警卫队。所有部队的缺额都由选募制兵役征集的后备队官兵补充。因此，在山姆休斯顿堡我的办公桌上，就能见到一些关于我们的各个师和野外部队在训练、士气和战斗力方面的报告，这些报告精确地反映了整个美国的战备进展情况。



情况比一年前有所好转。这时美国陆军的官兵总数接近一百五十万人。然而,还存在着严重缺点。车辆、现代化坦克和防空设备还远远不够。几乎没有空中支援部队。此外,服役期一年的国民警卫队和通过选募制兵役征募的士兵在两个月以后就将期满退役,这个问题使我们经常忧虑。我们在6月份就担心,从9月份起退役的人数将会超过补充进来的名额。

但是甚至连我们陆军力量的迅速增长和轴心国军力的最近表现,都未能使一些正规军的军官受到震动而改变其死守陈腐信条和常规的态度。他们的这种盲目性再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辩解理由了。在非战斗成分方面,我们碰到了另一种困难。许多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的军官已经年老。他们在战前曾为维持一支国民治安力量奋斗过,而且他们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所作出的努力眼下正在产生效果,可是他们自己的体力已不能满足战斗梯队中的战斗任务的要求了。

克鲁格将军是陆军中的一位高级将领。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他从一个列兵升为下士,后又升为中士;他以一个顽强的军人而驰名全军。在四十多年的服役期间,他总是紧跟每一个军事变化。在军官中,比他更透彻地理解另一次战争对陆军的要求的人并不多,而比他更健壮或更有生气的军官也很少。他严格鞭策自己,但无须督促别人,因为这些人很快就会拿他作榜样。

这时,克鲁格的第三集团军奉命到路易西安纳集结,准备进行一次大规模演习;这次演习以本·利尔中将的第二集团军为假想敌人。在现役官兵名册中,我们还没有一个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指挥过相当于一个师的部队。演习象巨大的实验室的试验一样,将检验计划、士兵、武器和装备的价值。这年9月,克鲁格将军集结了二十七万多名士兵,这是美国为一次单纯的战术行动而集结

的空前庞大的部队。同时，从第二集团军军营另外又调来了十三万人。

那次大规模演习的收获是无法估计的。它使部队熟悉了大规模的协同行动，加速了消灭不利因素的过程，使老资格的军官们特别注意到某些年轻人已有能力执行参谋和指挥工作中最困难的任务；此外，还使一些负责将领有了在战场上指挥大部队的才能。我们取得了在广大范围内供应部队的实际经验。这次，美军通过公路把粮食、燃料和弹药从补给站和仓库运往不断移动的前线，在和平时期，还从来没有过与此相当的尝试。可见，事先的计划是全面的和周密的；凡事只要付出代价，就会有所收获，这次演习就是如此。

麦克奈尔将军是一位指挥和评价演习的专家。他对被召集来评论这次演习的参谋人员说：“这次演习的突出特点是后勤供应发挥了重要效能。单就这个问题牵涉面之广，就足以证明人们对部队是否将能取得充分供应的忧虑是正当的。战斗指挥官和后勤人员取得的这些成就，应受到最高的表扬。”三年以后，美国卡车运载着部队和物资从法国疾驶而过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强大的供应效能，早在1941年9月路易西安纳的公路上就已预料到了。

在第三集团军中直接负责供应效率的军官是勒鲁瓦·卢茨中校。他在这方面所表现的优秀才能，使他早在战争结束前就成了一位三星中将。

这次演习也暴露出陆军的许多缺点。麦克奈尔认为，产生这些缺点的根源是纪律。他说：“毫无疑问，这次演习中的许多缺点，因缺乏纪律而一再出现。我们的部队是最能遵守纪律的。如果他们缺乏纪律，那是领导的过错。一个司令官如果不能发扬应有的纪律，就必须调走他。”

在这段时期内,我第一次受到新闻摄影的大量介绍。自从布雷迪<sup>①</sup>时代起,新闻摄影已成了美国军事场面的重要特征。然而在1941年秋,镁光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一种相当新鲜的玩意儿,而且对那些摄影记者来说,我还是个陌生人。在波耳克营的一次检阅中,克鲁格将军、英国军事观察员戈尔丁少校和我被拍了一批照片。在说明中,他们两位都被介绍对了,但把我说成是“D·D·艾尔森比因中校”——总算把我姓名的字首搞对了。

这次演习给了我不少经验教训,使我在以后的年月里受益非浅。我们在路易西安纳对用于联络和观察的小型飞机作了广泛的试验。它表现出的价值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所以后来我在陆军部副部长约翰·麦克洛伊的领导下,成功地说服陆军部,把这种飞机列入每个师的正规装备。这种飞机使我们的重炮和远程炮能准确而迅速地进行调整,而这样的调整过去只能由轻炮在目标视野范围内做到;它还能使战地指挥官掌握战况——如地形、运动路线、部队和炮火的集中——,其清楚程度,几乎完全象十八世纪彼此敌对的指挥官在马背上或山丘上看到对阵部队的全貌一样。

这次演习后,我被提升为临时准将。

10月和11月同演习前的几个月一样忙。一开始先在基层部队一级采取措施以纠正在路易西安纳演习中暴露出来的缺点;这个纠偏运动给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立即处置的机会。在正规军和国民警卫队中,必须解除某些军官的指挥职务;因这一措施而产生的争吵和谣言,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加以制止,以免挫伤军官和部队的士气。

12月初,在华盛顿和日本大使的谈判虽然快要达到戏剧性的

---

<sup>①</sup> 马修·布雷迪 (Mathew Brady, 1823?—1896),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摄影师。——译者注

高潮，但公民们紧张情绪的逐渐缓和在陆军内部也有了反映。似乎日本人是在虚张声势，战争至少暂时不会在太平洋发生。在俄国前线，德国人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塞瓦斯托波尔被迫停止前进。12月4日，我看到一份日报的社论，说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并没有和美国作战的愿望。几天后，有一位专栏作家的文章说，华盛顿有一种强烈的看法，认为太平洋的危机已被推迟了，虽然在一星期以前，华盛顿还有一些人以十比一的条件打赌，认为战争迫在眉睫。

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一直忙于演习及其善后事宜，这些劳累的参谋工作使我精疲力竭。12月7日下午，在得克萨斯州的山姆休斯顿堡我上床休息时，命令无论如何不要打扰我。我在梦中得到了两个星期的假期，在此期间，我将和我的妻子去西点军校和刚入学的儿子约翰一起欢度圣诞节。但是，即使做着这样的美梦——还有我下的严格命令——，我还是被我的副官大胆地叫醒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我们已经投入战争。

在珍珠港遭到袭击的一小时内，陆军部开始接二连三地 向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下达命令。其中有的命令要求马上调防空部队去西海岸，因为在那里，吓傻了的公民不时在空中发现虚幻的轰炸机；有的命令要求制订反破坏的措施；有的命令要求严密保护工厂；有的命令要求在南部边境侦察巡逻以防间谍偷入国境；有的命令要求保证墨西哥湾沿岸各港的安全；还有一些命令要求紧急抽调大批部队到西部去应付日本人打算发动的任何进攻。克鲁格将军的司令部也必须尽快地制定训令并予以复核，然后下达至成百个营地。这是一个紧张活动的时期。

紧急调动是当时的主要动向。正规的行政程序被置诸一边；指挥系统在各种会议上得到了简化，各级领导在这些会上直接获

得简明扼要的训令；过去调动部队时要拟定详细的命令，这些命令甚至具体到最后一小部分装备应怎样随军携带，怎样包装和作标记，而现在，这种缓慢的、按部就班的工作方法都被抛弃了。一个简单的电话就可以调动一支步兵部队越过这个大陆；也用不着文件来说明是根据什么权力调动部队和装备的。枪炮的运载，有平板货车就用平板货车，有低边敞车就用低边敞车，如果手头两者都没有，就使用卡车。运送士兵的工具具有豪华的卧车、军用卧车和现代化的客车，甚至停放在车场上已达三十年左右的一些陈旧不堪的客车，也被用来紧急运送部队。

我为调动部队的事忙了五天。12月12日一清早，华盛顿陆军部与我们的直通电话响了。我接了电话，有人问：“你是艾克吗？”

“是的。”

“参谋长要你马上乘飞机到这里来，告诉你的头头，正式调令马上就到。”“参谋长”是马歇尔将军，打电话的是沃尔特·史密斯上校，他后来在整个欧洲战役中成了我的亲密朋友和参谋长。

这个通知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想奔赴战场的每一次狂热的努力都失败了，其原因对我来说都不成其为理由，除非归结为这句话：“陆军部的命令。”我希望在任何一次新的战争中能和部队在一起。我认为，把我调到曾经在那里服役整整八年的这个城市，实际上将意味着要我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打电话给我的妻子，叫她整理行装，在几小时内，我启程飞往陆军部。

我当时猜想，我被调到华盛顿的原因，大概是出于我最近对菲律宾的巡视。日本人在袭击珍珠港后的几小时内，曾对菲律宾进行了一次空袭，使我们原来力量就不足的空军实际上丧失了作战能力。那里是官方和公众注意力的集中之处，因此马歇尔将军无

疑地需要这样一个人做他的参谋,这个人既相当了解这一群岛当时的情况,又熟悉美国陆军的菲律宾科和菲律宾自治政府的防御部队——它的发展计划因战争而中断了。

菲律宾自治政府的防御部队早在1935年就开始建立,当时新当选的奎松总统要求麦克阿瑟将军筹建一支能保卫这个群岛的军事力量;到1946年7月4日,自治政府改为独立的共和国时,美国部队将从该国撤出,此后武装防御将成为菲律宾的一项职能。麦克阿瑟将军同意了这一要求,成立了一个由美国军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我被任命为该代表团的高级助理。

1935年,我们根据一项普遍军训规划,准备在以后的十年期间,每年培养出将近三万名受过五个半月基本训练的士兵。一开始,我们将只建立以排为规模的单位,但在四、五年内我们希望建立起几个团,而到1946年,就会有三十万名受过最低基本训练的士兵,那时我们将能建立三十个师。

在这个过渡时期,美国陆军的菲律宾科一方面与自治政府的防御部队紧密合作,为它提供军官、教官、武器和装备,另一方面,也为本身的防务作计划,以便在菲律宾独立前爆发战争时有所准备。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计划把驻在吕宋本岛的部队撤至科里吉多岛对面的巴丹半岛,使这两个地区形成一个几乎难以攻陷的、而且在支援部队到达前能守得住的阵地。1938年,我目睹了这项计划所规定的一次演习,在我离开该群岛不久,又进行过一次更大规模的演习。

1941年12月12日,我飞赴华盛顿时,对菲律宾战斗的进展情况并不清楚。我们在山姆休斯顿堡收到的报告都是片断而又含糊的。毫无疑问,日本人还不敢绕过该群岛。但是他们的突击方向和突击重点,在我抵达陆军部时依然是个谜。

## 第二章

# 全球战争

有许多尖酸刻薄的讽刺诗从各方面把战争时期的华盛顿描写得一团混乱。从传统上说，政府，包括陆军部和海军部在内，与全国一样，对战争及其包含的一切问题是一贯没有准备的。这一危急事件唤起了绝大多数人的责任感，大批合同承包商和好心的志愿人员蜂拥而至，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混乱。然而，这时陆军部的工作效率，比之战争爆发前，已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水平。我在那里曾工作数月，就我个人的观察，可以证明下面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即这些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马歇尔将军的远见和决心。当然，他也得到支持。他得到了总统以及我们许多最能干的国会领袖和政府要员的支持。在1940至1941年，马歇尔将军本来完全可以随波逐流，听其自然地期待着按照常规以结束他一生光荣的军事生涯，因为他在军界已经赢得了显赫的声誉。但与此相反，好多个月以来，他却有意识地走着一条艰难道路，不顾自己和任何人的安危得失，决心要陆军为应付他几乎时刻在想的这场冲突作好妥善准备。

12月14日是个星期日，我一清早就去向马歇尔将军报到。我和他这次谈话的时间超过了两分钟，在我生平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和他第四次见面。参谋长没有和我寒暄，他抓紧时间简要地叙述了西太平洋上海军和陆军的总形势。

海军通知他，太平洋舰队在几个月内无力参加大的军事行动。

在袭击珍珠港时，虽然海军的航空母舰因当时不在那里而未受损失，但支援它们的军舰很少，以致大大限制了它们的军事行动。此外，对于日本人是否会对夏威夷甚至美国大陆迅速发动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当时还没有把握；而且海军认为，这些航空母舰应当留作侦察和防御之用，只有发生某种重大紧急事件，才许调作别用。海军部也没有告诉马歇尔将军，他们预计大致何时能把舰队修复并能在太平洋地区发动进攻。

夏威夷的驻防部队十分薄弱，以致陆军部和海军部一致同意，必须尽快地加强那里的空军力量和地面力量，并把这项工作置于太平洋地区其他工作的首位。

当日本人进攻时，美国在菲律宾的陆、空军总数为三万人，其中包括菲律宾侦察部队，该部队虽然并入了美国陆军，但其士兵和某些军官却是菲律宾土著。

美军为科里吉多岛及其一些小的支援要塞提供了驻防部队。其他美国部队被编入菲律宾师，该师由菲律宾侦察部队和第三十一步兵团组成。国民警卫队的部队——包括三个野战炮兵团、一个高射炮兵团、一个步兵团、两个坦克营以及后勤部队——新近作为援军调到这里。

空军力量在1941年也有所增强，当日本人进攻时，在菲律宾驻有三十五架B-17型新式轰炸机。此外，还有二百二十架战斗机型的飞机，但并不是都有战斗准备的。马歇尔将军虽然知道这支空军分遣队在日本开始进攻时就受到攻击，并遭到严重损失，但他没有收到有关这次战况的报告。

我们知道有些必需的供应物资数量不足，但就食品和普通弹药来说，只要给驻防部队以时间，把它们集中到有最大用处的地点，困难还不致太大。



12月10日，正位于马尼拉外边的卡维特海军船坞遭到日本轰炸机的袭击，损失惨重。这里有一支中等的机动舰队，它主要由若干潜艇小分队组成，但也包括部署在马尼拉及其附近海域的亚细亚舰队，其最大军舰是停泊在伊罗伊罗的重巡洋舰“休斯顿”号。

要抵抗一个强大而持久的进攻，象这样一些兵力是不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日本人想尽快占领菲律宾，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该怎么办。

马歇尔将军大约用了二十分钟向我说明这一切，接着突然问道：“我们行动的总方针应该是什么？”

我想了片刻，镇静地回答他：“让我考虑几个小时。”

他说：“好”，于是我退了出来。

意味深长和富有特征的是，马歇尔将军当时甚至对这个问题的下面这一最重要因素都没有暗示一下，即菲律宾会战对美国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人民的心理影响。显然，他认为，如果有人愚蠢到对这一点都不加考虑，那他就不配戴准将级的金星。

我带着问题回到办公室，那时我被分配在陆军部的“作战计划处”工作，处长是我的老友伦纳德·杰罗准将。很明显，如果我要在陆军部对马歇尔将军有所帮助，就一定要取得他的信任。因此，我的第一个答复的逻辑必须是无可指责的，而且还必须迅速及时。这时我蓦地回忆起一件往事，它帮了我的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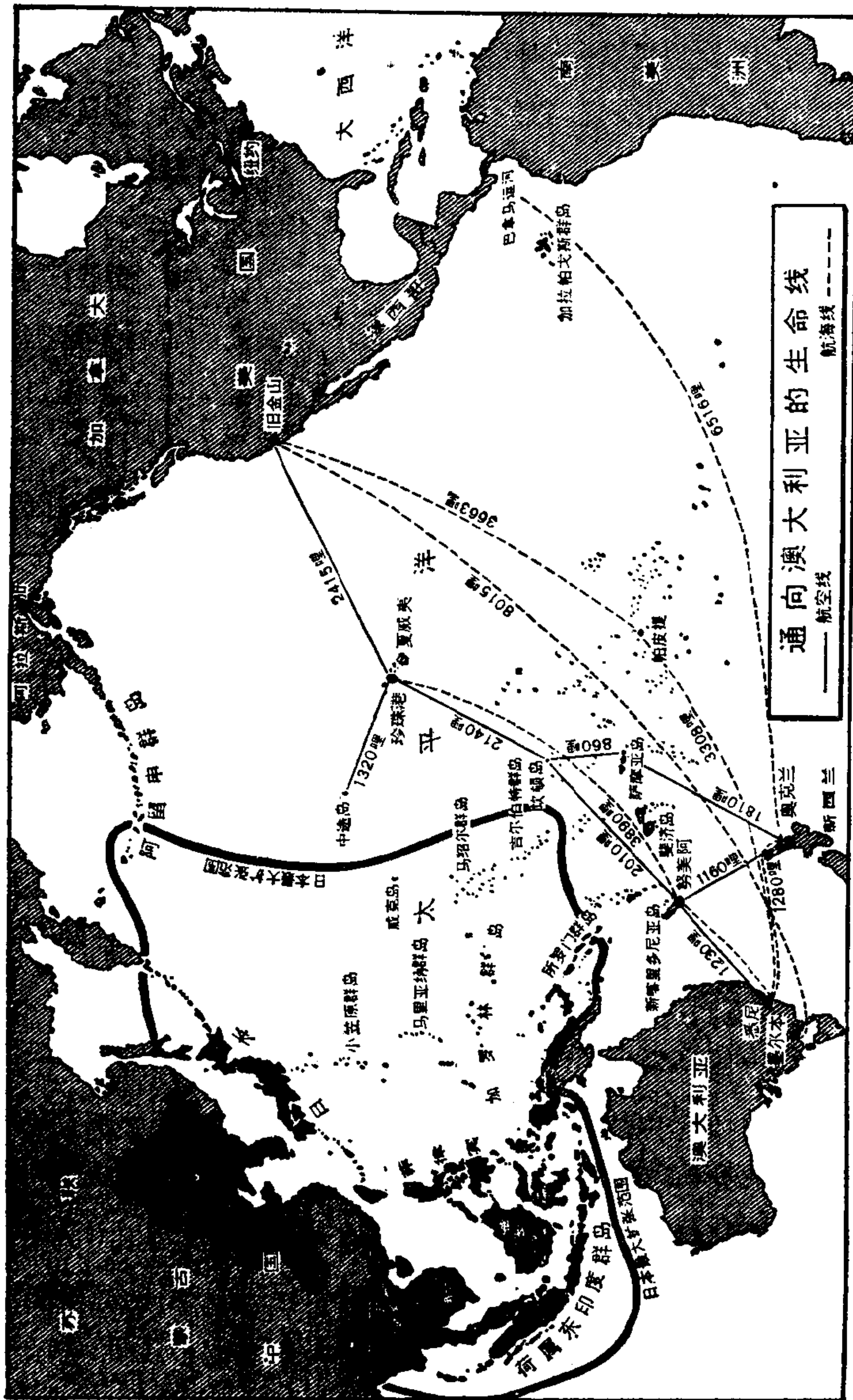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三年中，我曾在当代最有成就的军人之一福克斯·康纳少将手下工作过。他和我谈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是盟国的指挥及其困难和问题。此外，也谈论过马歇尔将军。康纳将军一再告诉我：“我们躲不过另一场大战。我们将和盟国联合作战。必须制订出单一指挥制度。我们决不接受曾经迫使福煦将军去工作的那个‘对等’概念。我们一定要坚持个人单一责任制。在

指挥战役时,领导人必须学会克服民族主义的观点。有一个人能做到这点,这就是马歇尔,他堪称为一个天才。”

这个回忆使我决定,我的答复应该简短而有重点,并且应以我真正相信的理论为根据。演说、似乎有理的论证或是冠冕堂皇的概括,都不能打动这位被康纳将军称为天才的人。

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所包含的意义几乎是无限的,而我解答这个问题的能力却和一个与我年龄相仿、工作勤奋的普通军官所具备的能力大致一样。当然,我学过陆军学院系统的军事课程。1928年我从陆军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在陆军部副部长办公室任特别助理,我在那里的职责迅速扩大到为陆军参谋长处理机要工作的范围。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必须调查全世界的军事情况,还必须具体研究以下问题,诸如陆军的动员和编制、空军和海军在战争中的作用、机械化的趋势以及军事生活的各种成分对国家工业能力的严重依赖,等等。最后一个问题对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坚决认为,大规模的摩托化和机械化以及空军力量空前的发展,是将来克敌制胜的军事力量的特征。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不少论文和报告。因为我有这个信念,所以我知道,对战争的任何正规的准备,都要涉及到迅速动员工业的健全计划。几年来我从事的这项工作,使我看到了一个几乎崭新的世界。在此期间,我和许多人接触和工作过,我在军事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对他们的意见都非常尊重。在这些人中,伯纳德·巴鲁克先生是一位杰出的人物,我在过去和现在对他深为钦佩。至今我仍相信,巴鲁克先生关于全面固定价格的建议和他的组织计划如果在1941年12月能完全地和迅速地付诸实施,我国就会节省数十亿美元,可能还会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生命。



[按原图译制]

正是为了这些任务，我在1935年去菲律宾的。六年后的今天，我重返陆军部，但是现在国家在进行战争，菲律宾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这样，我就开始集中精力考虑马歇尔将军所提出的问题。当时，我国海军在西太平洋上的形势，正如参谋长所概括的那样，是完全令人沮丧的。舰队不能远离安全基地采取任何进攻行动，也不敢用水面舰艇冒险进入菲律宾领海。夏威夷和西海岸的地面部队司令官和空军司令官吵吵闹闹，要求加强防御力量，还有一些市长、市参议员和国会议员也歇斯底里似地在大吵大闹；但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把当时全国拥有的船只、部队和马上可以使用的高射炮部队全部调拨出去，也还是远远不够。

很清楚，当时菲律宾本身不能直接得到陆军和海军的增援，这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只有当我国海军今后恢复到能在菲律宾战区安全活动的时候，才有调动大量增援部队去这一群岛的希望。但在当时，还无法估计何时能做到这一点。

在海军进行修复期间，为了延长防御时间，我们当时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利用潜艇和偷越封锁线的船只运送迫切需要的物资；此外，在保持必要的航线畅通的情况下，可以空运一些物资。澳大利亚离菲律宾最近，也是我们能够指望建立和保持的一个基地。因此，应当沿着横亘在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之间的那些岛屿开辟一条必要的空中航线。

既然我们把澳大利亚当作基地，就必须取得一条通往该地的航线。这就是说，我们要立刻采取行动去保护夏威夷、斐济群岛、新西兰和新喀里多尼亚岛；此外，我们还必须保证澳大利亚本身的安全。

荷属东印度群岛在某些方面是全世界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

区,它看来可能免遭日本的侵略,但希望很小,因为日本人不久就会迫切需要那里的石油,以便继续发动他们的进攻。如果那里遭到侵略,我们的短程战斗机就不能飞进菲律宾,而要进行成功的防御,战斗机又是不可缺少的。

尽管我们有着种种困难和风险,存在着对各种有价值物资的激烈竞争,但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管对战争怎样没有准备,也不能冷酷无情地把菲律宾守卫部队和好几千名美国军民置于这个群岛而不顾。我们必须为这个不幸的群岛做极少可能做得到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在空中支援和运送急需物资方面,虽然这样所取得的结果只是推迟一下灾难的来临而已。同时,我们还必须绝对保卫通过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群岛和夏威夷的这条空中生命线。

我带着这些忧郁的结论去见参谋长。我说:“将军,对菲律宾的大规模支援还需要等一段较长的时间,在此以前,如果敌人用大量部队来侵占该群岛,驻防部队在微小的援助下是不能坚持到底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帮助这个群岛。中国、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人民将会看着我们。他们会原谅失败,但不会宽恕遗弃。他们的信任和友谊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的基地必须是澳大利亚,我们必须马上扩充这个基地,还要取得我们通向那里的交通线。在最后一点上,我们只能胜利不许失败。我们必须冒巨大风险,而且还要不惜一切代价。”

他只回答了一句话:“我同意你的意见。”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他对我提出问题只是为了核对已作出的答案。他又补充说:“你尽力去解救他们。”于是我根据这一指示进行我的工作。我的同僚布罗杭·萨默维尔准将(后被提升为上将)那时在陆军部负责供应和采购工作。每天不管有多少其他急务,我们总要会面,尽量希望对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找到一些新的处理办法。马歇尔将军

对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非常关心，常常提出一些估计会有帮助、特别是有益于鼓励士气的措施。他给在菲律宾服役的每一个部队颁发了奖状，及时授予麦克阿瑟将军最高的军衔和勋章，并对我们所能想出的每一项意见和计划都给予大力支持。

在我的一本偶尔保存下来的记事本上，我发现 在1942年1月1日所记下的这几句话：“我至今还是坚决认为，远东局势是严重的，在空军和陆军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以前，任何枝节问题都不应予以考虑。然而与此相反，我们却正在采取‘磁性’行动和‘体育家’行动，等等。”三天以后，我又写道：“我们终于运送了一些物资去澳大利亚。空中计划包括运送四个大队的歼击机、两个大队的重轰炸机、两个大队的中型轰炸机和一个大队的轻轰炸机。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船只，并且现在我们就需要！真使人生气。还有一批外行在进行制订战略计划的工作。我应设法回战场去。”我那时所以感到非常焦急，大概是因为我知道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实行这项“空中计划”。

12月22日，在彭萨科拉护航舰队到达布里斯班时，我们开始建立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基地。这一行动开始得这样快，主要是因为这场灾难的结果。在袭击珍珠港的那天，我们有一批运送部队、飞机和物资的军舰正在驶向菲律宾的途中。海军经过研究，认为它们应被召回美国或在夏威夷隐蔽起来，因为当时谁也不能断定日本人不会对它们布置一个拦截网；因此那些离港才几天的军舰确实都返航了。但陆军部坚持要由五艘军舰组成的一个护航舰队以最快的速度驶往澳大利亚。在这五艘军舰中，“霍尔布鲁克”号和“共和国”号载着五千名士兵，“梅格斯”号、“霍尔斯特德”号和“布罗姆芳坦”号装着各种物资和装备。这就是这个巨大军事基地的开端。这个基地终于成了麦克阿瑟将军解放菲律宾的起飞台。

在整整一个冬天，我们把增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至澳大利亚基地和通向这个基地的一些用作踏脚石的岛屿。到2月21日，我们在海外的官兵总数超过了二十四万五千名，其中绝大部分集结在太平洋，这时，在太平洋的总兵力为十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七名，但不包括驻守在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二万九千五百六十六名官兵。在加勒比海的驻防部队为七万九千零九十五名。在欧洲战区，当时只有三千七百八十五名官兵，但有两个师正在途中。东部防区的海外驻防部队共有一万五千八百七十六名官兵，其中绝大部分驻在冰岛。

美军当时虽然只在菲律宾作战，但是在世界各大陆和各海洋，几乎到处都对陆军部的计划参谋人员至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阿拉斯加，我们等于敞着大门等着挨打，并且敌人显然有可能顺利地占领阿拉斯加的一个机场，这样敌机就可以从那里起飞，用单程攻击的方式轰炸我们的许多重要城市。我们需要巴西海岸，以便在南美洲大陆肩部取得一个反潜艇的基地。这个地区还能提供战斗机藉以飞越大西洋的踏脚石，所以它的重要性更大了。地中海封闭后，到中东战区最短的路线要飞越中非，因此，我们必须开辟一条横越这块不发达大陆的空中航线。

当然，俄国那时是我们的盟国；这里有着另外一个问题，即决定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对它进行有效的帮助，以便使它能成功地抗击我们的共同敌人。另一个地区是拥有巨大石油资源的中东，其安全对美国也有重要意义。中东可以提供一条向俄国运送物资的路线，因此这里的问题是及早建立从波斯湾向北通往俄国的交通线。如果我们要保持通往澳大利亚基地的交通线的安全，就必须派兵驻守太平洋上的十几个岛屿。缅甸是对我们有巨大利益的另一个地区，因为对中国的最后一条供应线经过这里。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必须阻止日本，不能让它得到澳大利亚和印度，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于我们赢得战争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我们所有的人都不顾疲倦地在寻求援助菲律宾防御部队的方式和方法。

为解决诸如在国内的重要地点部署包括防空力量在内的各种部队的问题，分配和布置我们当时拥有的武器的问题，在南美洲、非洲和全世界建立基地、特别是建立空军基地的问题，改组我国陆军部的问题，把计划提纲发展为实际作战指令的问题，我们每天需要工作十八个小时。

在这个工作繁重而紧张的时刻，幸亏我的弟弟米尔顿和他的妻子海伦正好住在华盛顿郊外的福尔斯教堂区。在我来到陆军部的最初几个星期，他们坚决要我住在他们家里，直到我妻子把我们在圣安东尼奥的东西收拾好，并在华盛顿重新建立我们的家庭为止。我弟弟已在政府中从事与战争有关的工作，而且办公时间的紧张程度并不亚于我。我一般总要深夜才回到他家，但不管多么晚，他们总准备好一份晚餐和一壶咖啡等着我。我记不得在华盛顿工作期间曾在白天看到过他们的房子。

萨默维尔将军和我经常想寻求一线希望去支援菲律宾的驻防部队。我们的一切努力最后证明都是毫无价值的，而且经过多月的冥思苦想，我还是没有想出什么新办法。报纸上和一些热心而又知识浅薄的职业军人经常提出的一个建议是，用航空母舰把战斗机运送到飞往该群岛的航程范围内的某些地点，然后从那里飞到陆地基地去和日本侵略者作战。但一开始碰到的困难就使这个建议破了产。

海军部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当时他们的航空母舰没有一艘能够取得必要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支援，所以即使时间十分短暂，



也不能冒险把它们派到飞往菲律宾的航程范围内的地点去活动。经过对这一建议的充分审查以后，还发现了几乎同样重要的其他困难，但仅就这一困难就可明显地说明，进一步考虑这个建议完全是徒劳的。

好几个月以后，我听到这样一种毫无根据的议论，说什么当菲律宾为其生存而进行绝望战斗的时刻，美国轰炸机却源源不断地飞往大不列颠，并且把这一群岛所急需的物资留下来准备用于北非战役。这种说法一点也不符合事实。

我们在1942年5月才把一个轻轰炸机中队调到英国，到6月份，那里才有美国的重轰炸机部队。同年7月以前，非洲战役甚至还只是一个未经批准的计划。这些日期都在巴丹和科里吉多投降以后。事情的困难之处在于日本取得了菲律宾周围的制海权，在我们的力量发展到突破日本的包围以前，无法提供实际的援助。

早在1941年12月，我们就决定试行一种偷越封锁线进入菲律宾的体系。我们派遣一些军官去澳大利亚，在那里不惜高价地雇用一批为把物资运入这一群岛所需要的人员和船只，以便把这些物资偷送给被围的驻防部队。

被派到澳大利亚去负责这一特殊任务的人是前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上校，不久他就晋升为准将。一天中午，他向作战处报到，表示愿为政府效劳。这时我们正在物色一个精力旺盛、敢作敢为和善于鼓动从澳大利亚出发进行偷越封锁线尝试的人，所以立刻接受了他的提议。

我问他：“你什么时候能够就任？”

他回答：“现在。”

我通知他：“今晚12时到这里来，准备延长战地服役期。”

他虽然脸色略有改变，但连眼也没有眨一下就回答说：“这样

我就有时间去见见律师，并改动一下我的遗嘱。”

我们立刻推荐他为准将。杰罗和我知道在他到达澳大利亚以前，这个推荐会得到批准，于是我们每人从制服上摘下一颗金星，别在这位前部长的肩上，高高兴兴地把他送出我们的办公室。当晚1时，他就乘飞机前往澳大利亚。

海军为了运送少量特别急需的物资，还提供了潜艇。菲律宾驻防部队老是缺乏适合高射炮和火炮用的信管，我们利用这种方法成功地把少量信管运送给他们。

我们开始在澳大利亚集结了五十二架俯冲轰炸机，希望这些飞机能够经过中继岛屿的机场飞往菲律宾。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我们对阿拉斯加以南的太平洋中许多受威胁的地点继续输送了少量的地面部队。这些地点是夏威夷、斐济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汤加、塔布、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许多较小的岛屿。

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已被削弱到多么危急的程度。我在某个晚上偶然知道，海军为了在新赫布里底群岛中被认为是要地的埃法特岛部署一支人数很少的驻防部队，竟指示把航空母舰的水兵暂时抽调出去防守该岛。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仅有的几艘航空母舰，每一艘都贵如黄金。我在几分钟内就急忙决定，让驻在一个重要地区的一营陆军去接受这个任务，于是这个营就进驻该岛，而我们所有的人必须处理的就是这类问题。这件事虽不重要，但使我痛切地认识到，我们和海军若断若续的联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奎松先生当时和麦克阿瑟将军都在科里吉多岛，他在2月初打电报给罗斯福总统，恳求他寻找一条让菲律宾中立化并使交战双方答应撤出各自军队的途径。从当时我们在那里的绝望处境来看，该群岛的中立化会立刻带来军事上的好处，当然还会防止驻防

部队和居民遭受巨大的牺牲和苦难。然而如果把把这个建议公开提出,不仅日本人会以轻蔑的姿态欢迎它,而且这样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软弱,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不幸的反响。我们之中从来没有人认为这个建议意味着奎松总统的背叛。我们认为他是坚贞不屈的,他只不过提出了一项供考虑的计划而已。这项计划,在处于绝望中的奎松总统看来,似乎是一个可能拯救他的祖国的办法。但是接受这个建议就会使人大为震惊,因此这一想法立刻被总统和参谋长所拒绝。

陆军部计划人员的主要职责,是在对德、日战争中为陆军拟订作战计划,我们的敌人在地理上虽远处两地,但都是富强的帝国。我们必须进攻才能赢得胜利。

12月下旬,丘吉尔首相率领英国三军参谋长到达华盛顿。他们是海军参谋长达德利·庞德海军上将、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陆军上将和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空军上将。当时原作战计划处还存在,处长是杰罗将军,同英方人员的绝大部分参谋联络工作是由他和另外一些参谋人员进行的。

这次会议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系统,以便美、英双方参谋长能藉以作为一个整体而有效地进行工作。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安排的要点是,英国三军参谋长各指定一名驻华盛顿的代表,以便和美国参谋人员保持密切的联系。英国任命约翰·迪尔为代表团团长,他在1944年逝世以前对这一工作一直干得很出色。会议的第二个目的是批准过去所达成的协议,其内容是关于应把两国的主要力量首先集中于哪个地区的问题。参谋长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过去的结论,即把欧洲敌人当作我们首先攻击的对象。当然,还讨论了其他许多重要问题,但是,在我这个处于会议边缘的人看来,这两点是最大的成就。

首先攻击欧洲轴心国成员的理由可以简要归结如下：

欧洲轴心国是两个被分割的敌人中唯一能同时受俄、英、美三大盟国攻击的对象。美国又是盟国中唯一能自由选择首先攻击某一敌国的国家。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地立刻去抗击日本，就会使盟国力量分散，另外两个盟国就会有战败的危险，或者最多只能与这个强大的欧洲堡垒作胜负难决的斗争。如果美国单独对日本作战，那么在太平洋取得胜利后，也势必是与已经筋疲力尽或者严重削弱了的盟国一起去征服希特勒帝国。其次，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理由，即当时不知道俄国对于德国国防军的不断攻击究竟能抵抗多长时间。对日本作战的任何努力都不可能帮助俄国进行持久的战争。除运输物资给这个国家外，能援助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参加欧洲战争。最后，打败欧洲轴心国会把英国部队解放出来使之和日本作战。

就我所知，在我们试图和日本展开一场全面战争以前，把我们力量的重点放在抗击欧洲敌人方面的这个计划的明智性，从来没有被任何真正的战略家怀疑过。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一目的作为一个原则来说明是十分容易的，而要发展成一个实现这个思想的行得通的计划，并且要为两国军事参谋人员所通过，那就确实很困难。

陆军部的参谋部门在1942年1、2月间，开始逐步地拟订进攻欧洲的各项基本计划。和往常一样，时间始终是这个问题的重要因素。然而到处都用拖延来搪塞我们！只是哭诉没有准备，这是于事无补的。军事问题除冷酷的现实外，对什么也不会让步，这是它的特点；军事上的事情必须弄得简单扼要，处理的办法也必须清楚明确。到处需要人员和物资。日本的侵略当时还没有达到高潮，因此，我们在美国能动手干的每一件事都必须对西南太平洋要有所

帮助,以防止战争蔓延泛滥。除了要确保通向澳大利亚的空中和海上交通线外,我们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印度这个要塞,否则日、德部队就会通过波斯湾会师。防止这场灾难,成了我们的英国伙伴所考虑的首要问题。

让日、德两个工业帝国放手掠夺荷属东印度群岛丰富的橡胶、石油和其他财富,这种阴暗的前景是不能设想的。当然,中东必须被守住;如果中东沦陷,德国潜艇就能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那时印度能否被营救就值得怀疑了。此外,中东的石油是一个巨大的竞争对象。

从1941年冬末到1942年,德国在大西洋的潜艇战几乎取得了最大的效果。我们每月都要损失二十多艘船只,其中包括宝贵的油船。最典型的是1942年3月,那时我们在大西洋和北冰洋地区损失了八十八艘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总吨数为五十万七千五百零二吨。1942年5月,又有一百二十艘盟国和中立国船只在这两个水域被击沉,美国在这月也损失了四十艘商船,这是战争年代里我们在一个月内损失的最高数字。甚至我们到南美洲的重要海上航线也一度发生了危险。船只的需要量很大,然而我们却缺乏各种类型的军舰、货船和运兵船。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个经验,即单有空中力量不能赢得胜利,但是没有空中优势也不可能赢得伟大的胜利。结果是既需要大量飞机,也需要其他各种物资,诸如船只、大炮、坦克、步枪、弹药、粮食、军服、重型建筑材料以及小至蜜蜡大至战舰的物资。正是这些物资才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战斗力。

我们虽然物资匮乏,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供分配,但我们仍须尽最大努力以阻止敌人的进攻。在制订争取胜利的计划时,必须从长远看,将来有一天,飞机、战斗舰队、船只、登陆艇以及作战

队伍会容许我们转入进攻,并且能坚持进攻。这是未来的事,而这个未来又几乎象幻想一样靠不住,所以为进攻欧洲而设想的计划只能是略具雏形。

未来的计划不能优先于目前的需要。为了极力设法解救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新加坡,阿奇博尔德·韦维尔上将在1941年12月下旬从印度调至爪哇,成了第一个盟军总司令。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会议煞费苦心地为他的机构拟订了一个指令,希望在他们的一致努力下能够出现一个奇迹。但韦维尔一直没有机会去实现这个奇迹。

然而华盛顿的这项工作本身毕竟是个有价值的经验。我们第一次承担了为一位最高司令官拟订规章的具体任务,这个规章必须保证他在战场上的权力,但又要保障每一个有关国家的基本利益。我们认为,仔细研究申诉权以及作战机构和勤务机构的职权范围是必要的。如果遇到重大分歧,采取什么处理办法也是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当时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盟军司令部的性质。

假如哪个缔约国由于支持了最高司令官的决定而面临灾难的话,任何有关建立盟军司令部的书面协议都不能排除民族主义的考虑。每一个战地指挥官对他本国的部下和他自己的军队有直接惩处的权力;如果发生拒不执行或违抗命令的情况,指挥官有权采取他认为适当的措施——包括军事法庭的审判——来惩办当事人。但这种权力不能由一个国家施加于另一个国家的个人。只有信任和信心才能牢固地建立盟军总司令的权力,使他用不着因缺乏这种合法权力而发愁。

这类体制的成败,归根到底在于人;所有的政治家和陆、海、空三军的将领们——甚至平民和士兵——都必须加强对单一指挥概念的信任,加强对实施单一指挥的机构和领导的信赖。任何有约

束性的规定、法律和习惯，都不能到处搬用，而只有大大加强互相信任的意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真理对于和平也同样适用。

在战争发生后的第一个冬天，从东印度地区不断传来愈来愈坏的消息，海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远离友好国家的基地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我们能调动的每一艘运兵船和货船都匆忙地被调到西南太平洋去了。我们的船只就是这样的少！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可供调用的快速船只，但在运送没有重装备的士兵时，未作周密的安排。这种船只主要靠速度防范潜艇。英国给了我们几艘在海上使用的最快最大的客轮，其中之一就是“玛丽皇后”号。

一天，我们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把它从美国的一个东部港口派往澳大利亚，船上载有一万四千名美国士兵。如果有一艘潜艇能与它的距离近得足以使攻击取得成功的话，这种情况只有在最倒霉时才会发生。我们还认为，即使有一枚鱼雷击中它，它仍能有足够的余速摆脱当时德国拥有的任何类型的潜艇。然而，这种可能性并不能保证它一定到达目的地。

在途中，“玛丽皇后”号必须在巴西港口补充燃料。我们截获了一个在里约热内卢的意大利人发给他政府的电报，这份电报报告了“玛丽皇后”号出现的地点，以及它离开后在海上实际航行的方向，这使我们非常恐惧。以后的一个星期，我们是在担惊受怕的心情中度过的，唯恐轴心国可能在它经过的大西洋南部航线上布置一个潜艇网，使它几乎不可能完全避开这些潜艇。我不记得马歇尔将军当时是否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们当时尽量不让他知道这类事情。拿上床时还迫使我们担忧的事去麻烦他是没有用处的。他自己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

## 第三章

### 马歇尔领导的作战处

为了提高作战效率，参谋长早在1942年1月就宣布了改组陆军部的决定。他预见到根据和平时期法律建立的这个陆军部，是经受不住长期而艰苦的战争压力的，所以他在一年前就指定威廉·哈里森上校调查陆军部组织上的缺点，并寻求补救办法。虽然这个调查在初冬就已完成，而且改进的计划也初步被采纳，但因珍珠港的袭击而推迟了实施。现在实际改组的任务落到了约瑟夫·麦克纳尼少将的肩上。他具有分析问题的头脑和执行任务的果断精神，这些品质对铲除根深蒂固的官僚制度以及加速和简化工作程序是绝对必要的。

同时，很明显，我们必须在陆军部一级的某个机构内建立一个办事处，以便专门搜集和集中全部战略情报，提供给马歇尔将军参考，并在马歇尔将军作出决定后再通过它来贯彻执行。换句话说，这个机构就是参谋长的个人指挥所。陆军部参谋本部作战处的建立，满足了这个需要；它代替了作战计划处。2月16日，我已在作战计划处继杰罗将军担任处长。3月9日，我又被任命为作战处的第一任处长。几乎与此同时，我又临时被提升为少将级军官。

我记得我那时很忙，以致没有时间为这次提升向马歇尔将军表示感谢。如果在战前，这一军阶就是一个职业军人的军事生涯的顶点。



在陆军部内部，情报部门存在的严重缺点妨碍了一切建设性计划的制订。这个过错，一部分来自陆军内部，一部分来自陆军外部。美国公众向来对一切具有间谍色彩的事物表示憎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来没有提供过经费来满足情报系统——一个广泛搜集情况的机构——的基本需要。

在这方面，我们的一个软弱的措施是在许多外国首都保持武官，并且因为公家经费不能用来满足这种职务的特殊开支，所以经常被派去担任这个职务的只是那些有独立财源的军官。他们通常都是一些被人尊敬的社会名流，其中只有很少人懂得情报工作的要领。因此，所得收获几乎是完全否定的；同时，由于任命陆军部情报处负责人的主要条件一向是看他担任武官时间的长短，而不是看他的才能，这就使上述情况难以得到改善。

在我们参谋本部系统内，情报处的处境就象是一个后娘养的孩子，而且在许多地方被歧视得很厉害。例如，由于陆军部内的将级军官人数受到和平时期法律的限制，部内的几个主要的处不得不由上校来负责。情报处几乎没有例外，它的负责人也是一位上校。事情本身倒不严重，因为任命一位很有才能的上校担任这个职务远比任命一位平庸无能的将军有利，但是这种做法清楚地说明，陆军不重视情报机构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军事学校也有反映，那里尽管有战地侦察和情报方面的专门训练，但是这项工作所涉及的更广泛的方面几乎完全被忽视了。我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合理地分析那些确实能引起陆军部注意的情报。这种缺点在已成为情报研究和分析的真正核心的工业方面，表现得更为严重。

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天，这个长期积累下来的重大缺陷成了严重的障碍。起初，情报处甚至不能为它自己的机构制订一项明确的计划，对于它认为可以决定敌人意图和能力的重要情报，

也不能进行分类。处长除了以谦虚的口吻向计划和作战参谋部门询问一下能为我们作些什么以外,就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是多么迫切希望弄到每一点似乎可靠的情报。约翰·拉泰上校在战争初期曾任驻罗马尼亚武官,后来回到了华盛顿。上校是一位精力非常充沛的军官,也是一位比较优秀的武官。当罗马尼亚于1940年11月参加轴心国以后,他曾被拘禁,后来,通过一个中立国港口被转送回国。

作战处知道他回来,就立刻去访问他,希望得到他能提供的情报。他坚决相信德国军事力量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而且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在美国实际参战前,俄国和英国肯定会被打败。他相信德国当时还有四万架后备作战飞机,并准备了受过训练的空勤和地勤人员,随时可以投入战斗。他认为德国人所以没有立刻使用这些飞机和人员,是为了将来支援对英国的入侵。他还相信德国尚有大量后备师迄今没有投入战斗,这些师足以在对英伦三岛发动一次进攻时取得成功。

在作战处内,我们不相信拉泰关于四万架作战飞机的情报。德国陆军那时刚在莫斯科前线受挫,因此我们认为,一支拥有这样强大威力的武器的军队不会只因为未来的使用计划而把它扣住不用,特别是在使用它便能保证摧毁和占领象莫斯科这样重要的目标时。当然,如果德国人确实拥有这样一支惊人的后备力量,那么用两栖登陆进攻欧洲大陆的任何企图都肯定会失败,这是很明显的。

然而,战后我们所收到的情报才证实,拉泰关于后备师的情报和推论是有合理根据的。战后从德国得到的报告表明,1941年夏,希特勒计划只使用六十个师作为被征服了的俄国的占领军。他计划在当时没有战斗任务的大量的师中使用一部分进驻中东。

很清楚，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德军的地面部队完全能胜任各种任务。

没有人比马歇尔将军更为痛切地认识到情报处的缺点了。为了谋求改进，他在1942年5月5日任命乔治·斯特朗少将为情报处处长，他是一个思想敏锐、精力充沛和坚决果断的高级军官。

当时已不存在缺乏经费的问题，参谋长尽了最大的力量去弥补这个多年来的疏忽，但不论是花多少钱，或是采取什么紧急措施，也不能在全世界迅速建立监视人员和情报人员的主要基地。然而，斯特朗将军在威廉·多诺万将军领导的战略服务处的配合下，逐渐开始建立一个情报系统，这个系统后来成了一个广泛而有效的组织。在战争初期，幸亏英国能根据过去战争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敌人的很多重要情报。

陆军部的工作性质使我们与美军其他军种以及盟国驻华盛顿的代表经常保持着接触。这显然是由于必须协调生产和作战行动，了解各个战区之间的相互关系——至少要了解这些战区对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的要求。参谋长还经常和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以及后来的欧内斯特·金氏海军上将会晤。

参谋长有许多助手，其中的主要成员是萨默维尔中将（后升为上将）、亨利·阿诺德、麦克纳尼将军及参谋长领导下的计划和作战参谋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几乎每天和海军部中身份相等的人员会晤，努力争取按照受训部队名额和美国工业产量，使双方的需要达到平衡。这样，陆军部的工作必然会产生一幅全球战争的完整图景。

马歇尔将军长期以来一直认真地注意指派适当的人选担任海外指挥和改组后陆军部的要职。在挑选过程中，他不时发出明确的指示，认为有几种人不配担任高级职务。其中最不够条件的是

那些为了个人名利而钻营升官的人。如果有人施加压力,以支持陆军中的某个人,只要参谋长发现,就会马上被顶回去。一天,我在他办公室,他正和一个人通电话,显然,对方在要求他提升陆军部中的一个朋友。他的答复是:“这个人如果是你的朋友,你对他最好的帮助就是不要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

另一件使他恼火的事是“推卸责任”,特别是把责任推诿给他。他常常指出,他能给成千的人安排具体工作,但其中绝大部分人不能放在负责岗位上,因为他们都必须让他作出每一个决定。他坚决主张,他的主要助手应该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按照自己得出的结论去思考和行动,这一原则在我们军事学校一再被强调,但在和平时期却很少得到贯彻。

此外,他也轻视那些“事必躬亲”的人。他认为那些埋头于琐碎小事的人,没有能力处理战争中更重大的问题。马歇尔将军讨厌的另一类人是性格粗暴的人,因为他们往往把坚定有力和蛮不讲理混为一谈。他还避免与好出风头的人打交道。此外,对于那些爱闹别扭的人,对于那些愚蠢得看不到善于协商和领导下级象在战场上指挥作战一样重要的人,他也很生气。

再者,马歇尔将军不能容忍悲观主义者,因为这样的人总是把困难说得非常可怕,并且特别害怕用已经掌握的方法去克服这些困难。他从不任命一个军官到负责岗位上去,除非他认为这个人热诚地拥护这项特定的计划,并深信他会作出成绩。他信任积极进取的人。

当然,有时必须从各方面都不完全符合这些标准的军官中进行挑选。但在这种例外情况下,马歇尔将军在思想上总是有一个明确而永远不变的保留看法。

在为陆军及其航空兵拟订战略、后勤和作战的计划时,作战处

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联合参谋长会议保持着紧密的合作。从对当前军事形势的估计出发——即在抗击已判明的敌人的兵力及其惊人的领土扩张时我们所掌握的力量——，我们的任务是根据既定目标，根据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资，以及根据迅速满足这些需要而采取的最有效的方法，来决定我们的军事政策。

用这样一种术语意味着：在积累、研究和综合影响军事行动的各种资料时，要进行大量的选择工作。为一个既定的军事行动准备一项简单的指令，一定要有情报，这种情报的范围从某个关键工厂所承担的某个特殊项目的计划生产率，一直到影响组成一支强大的机动部队的各种因素，诸如军事、政治、地理和气象。战略的基本原则可以简单得连孩子都能懂得，但在具体情况下如何正确贯彻这个原则，就需要最优秀能干的参谋人员进行最艰苦的工作。这种特殊人材，我们还是很充分的。这批被选拔出来的军官，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真正接受了我国军事学校最优秀的体制的教育。他们除去实际的情报训练方面的任务外，还准备出色地完成制订作战计划的重要任务。在作战处，制订计划是一件辛苦的工作，它要将无数互不联系的事实加工改制成一项军事政策中的有机构成部分。凡是与战事和战争指挥稍有关系的事物，都要收进我们制订计划的加工厂。但是尽管我们对将来有所计划，并在考虑大举进攻的时刻，但是当前的各种作战要求的压力从未减轻过，我们的缺点也始终明显地存在着。

在每天的二十四小时中，战况报道、要求援兵和物资的申请、请示报告以及情报概要源源不断地从各大陆和仍为我们和盟国所控制的太平洋各岛屿送到作战处来。当时，经过我办公桌的这些译出的消息和报告，虽然内容偶尔也有琐碎的，但绝大部分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有的令人鼓舞，有的令人悲痛。它们经常提醒我们，

美国在进行一场全球战争；在一些地方，英勇的士兵们依然坚守阵地，进行着一场顽强的持久战；而在另一些地方，他们正在为准备反攻而建立基地和延长海、空通道，坚定不移地在一条围绕着全球的战线上逐步前进。

4月7日是典型的一天，也是令人悲伤的一天，因为放弃巴丹已迫在眉睫了。

那天早上从科里吉多岛的密尔斯堡传来了第一个消息，声称巴丹的粮食情况极为困难。对这类伤心的消息，我们过去的反应是除了给予冷静的安慰并答应尽力解决以外，再也无能为力了。但这时，如果巴丹再能坚持一段时间，我们至少能把少量接济送到那里。我们马上电复乔纳森·温赖特中将，告诉他我们正用潜艇运送一批物资前往那里，几天内就能到达；我们要求他在报告这些物资的到达时，也将他今后的计划和战局的任何变化告诉我们。我们还打电报给悉尼的麦克阿瑟将军，要求他搞一个计划提纲，内容是如何从澳大利亚用潜艇保持对马尼拉湾的供应，并提出能够运送供应的大概日期。另外，又打电报给在缅甸的约瑟夫·史迪威中将，要求他研究一下从他的战区空运压缩食品给巴丹的可能性。

温赖特将军第二次来电报告，巴丹前线继续受到猛烈的攻击，敌人正进逼我们的中央阵地。那里的医院又一次遭到轰炸，这次他特意补充说，日本人曾为前一次的轰炸作过辩解。

电报一个紧接一个给我们送来。有的是报告在中美洲、南美洲和利比里亚又有另外一些机场在工程兵主任领导下正在进行扩建；有的是报告在通过苏必利湖和密执安湖之间的梭运河时，海岸警卫队将给每一艘船派四个警卫兵，因为那里是美国运输最拥挤的地区，我们早就担心那里会发生破坏活动；有的是报告约翰·德威特中将要求授权发给阿拉斯加国防警卫队三千支步枪；有的

是报告德罗斯·埃蒙斯中将调查了新西兰在斐济群岛的防务措施后,发现这些措施抵抗不住日本强大攻击;有的是报告麦克阿瑟将军要求输送干部到澳大利亚建立五个出国部队集中地和一个补充兵营;有的是报告查尔斯·博尼斯蒂尔少将要求批准一个申请,其内容是让在4月中旬运送美国增援部队去冰岛的护航舰队,把解除驻防任务的英国部队送回国去;有的是报告加勒比海防区建议在帕土斯岛部署一个海防炮兵中队;有的是报告南方防区正在墨西哥湾的沿岸防线加紧成立一个新司令部,因为担心轴心国潜艇的活动在那里可能会加强。

我们打电报给澳大利亚和我们在圣诞岛、博腊-博腊岛、坎顿岛及斐济群岛的司令官,向他们发出了关于太平洋防务的指令。对冰岛的指示是,美国部队一旦达到全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博尼斯蒂尔将军将担任那里整个部队的指挥工作。我们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给温赖特将军的贺电,褒奖巴丹守军在前一星期对日本大规模进攻所作的英勇抵抗。又给麦克阿瑟将军去电,询问有关他在西南太平洋的参谋部接纳荷兰军官的情况。

我们对收到的电报要进行研究,对发出的电报要作好准备,但这项工作经常被会议所打断。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常常要与各军种的代表、政府官员和工业巨头以及盟国的代表研究大量的问题。

大部分会议是在我办公室举行的。这些会议所作的决定,有许多是无足轻重的,但有一些却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个决定都要求作战处内部,或陆军部内部的某个部门,或驻有军队的某个遥远地点行动起来。为了保证不使一个决定被遗忘,以及便于下级随时使用记录,我们采用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自动记录系统。

这个系统就是在我的作战室内各处安装录音机的线路,使室内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录下来。这样就能把对话记录在我办公室

外的一架录音机中,在那里有一个秘书立刻把录音记在笔记本和备忘录上,以便我的作战处的同事们使用。这样,我的参谋人员便常常不用再和我进一步商量就能把每一个决定和协议付诸适当的行动。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把录音保存下来。

我习惯地把我们所使用的这个录音系统告诉来访者,使他们明白,我们使用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它使我在口授有关函件和指令方面节省了不少时间,并且使我不必再去回忆摆在我面前的事情和意见的每一个细节。

4月7日,我代表作战处参加了联合参谋长会议召开的一次会议。在休会以前,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有的很具体,如原来打算给还在抗日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分配飞机的问题,有的则很模糊,如德国在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意图问题。

当4月7日夜幕降临时,作战处的每一个人又过了平淡的一天。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与从事战争活动的一些部门进行了接触,又和一年前在地图上仅仅标有地名的一些遥远地方进行了联系。

早在1942年2月,我们就为登陆艇的生产而担心。登陆艇主要用于进攻战;因此,正当大家都在迫切地关心防御时,就难于使人们对登陆艇产生普遍的兴趣。虽然海军负责建造登陆艇,但它却甚至通知我们不能为登陆艇提供船员。萨默维尔将军立刻针锋相对地提出由他来干这件事。于是他干劲十足地承担了这项任务,而且胜利完成了。几个月后,当他试图把这个编制移交给海军时,我们意外地遇到了一种奇怪的主张,说海军不能接受征募的士兵。

如果那时我们有一套协调政策和单一领导体制,情况会多么不同!在1942年的整个春季,我们企图通过联席会议和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就我们在登陆艇方面所需要的性能和容量问题达成一项



协议,并指定某一个人负责办理。当然,这必须纳入总的海军建设计划,这样才能在发展登陆艇的同时,不致严重影响护航舰、潜艇和对执行计划有重要意义的其他装备的生产。然而,当时海军只是从恢复舰队的角度考虑问题。他们对为将来进攻而建造登陆艇一事并不特别关心。但是,如果我们目前不着手建造,我们就永远不能进攻。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奎松总统成了又一个流亡政府的领导人。他是在菲律宾最后陷落前乘潜艇从那里撤出的。后来他来到美国。就在他到达后一周内,他来陆军部访问我,把关于菲律宾动员、战斗和最后失败的详细内情告诉了我的幕僚。他对美国深为感谢;对我们当时不能提供更多有效帮助的理由也知道得很清楚,但他相信,菲律宾终将在自己的旗帜下生活。他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信念。

这个时期的太平洋战争史有一天终将得到详细叙述。各种决定、调动和行动将会得到正确的评价,各种想当然的事情将由华盛顿和战地指挥官的成绩来衡量。这一简短的回顾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西南太平洋的战局在某些方面影响到与我有密切关系的大西洋战区的战争指挥计划。但是,尽管我们作了努力,还是无法解救菲律宾。巴丹的史诗于4月9日以悲剧告终;接着科里吉多也于5月6日失守。

当然,我定期和马歇尔将军会面和商讨问题。我们养成了至少一星期进行一次全面回顾的习惯。会面时,我们两人在一起分析不断变化的形势,有时也找其他人参加,这样,会议就有为重要参谋人员制订总路线的形式。马歇尔迅速抓住问题要点的力量,他的果断精神,以及他断然拒绝任何悲观失望的态度,使整个陆军部产生了力量和信心。他任用干部的能力,不但能使工作顺利进

行,而且还能推动他的每一个部下去完成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能完成的任务。

托付权力给部下,就意味着勇敢果断地充分支持他们;但不能把这种行动与明知有困难而又希望别人去处理的那种懒散作风混为一谈。这样行事的人,他们不仅自己无能,而且当其可怜的部下为完成本职工作或上级交下的任务而采取的某些做法产生不良效果时,则总是立即谴责和处分他们。

陆军部不断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在整个陆军最后投入生死搏斗前,如何让某些部队取得实战经验。我们的盟军正在亚洲和非洲进行激战,原来我们只是派遣美国军事观察员到各地区去,现在利用盟军战斗的机会,让部队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汲取实战经验,这样做看来是合理的。

一天早上,我们接受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听起来是如此通情达理,以致使我们全体作战参谋立刻行动起来。这个建议是运送我们的一个装甲师去埃及增援英军。一旦我们需要这个师,我们只把人调回,而把装备作为补充物资留给英军。这点似乎就是这个建议更为吸引人的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正在生产一种经过改进的坦克,到我们自己要使用这个师时,我们指望能得到这种已准备好的新式装备。

在考虑这样一个部队的司令官时,我马上想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乔治·小巴顿少将。他既是一位坦克战专家,又是一位杰出的部队领导人。但使我惊奇的是,我的选择遭到了相当一部分参谋人员的直接反对,然而我相信,这完全是由于巴顿的古怪的保守作风和有时作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举动而引起的。他不愿循规蹈矩,这使许多人担心他和别人合作的能力。由于我相信他的战斗意志,相信他能有效地领导一支战斗部队,所以没有受到这些人的影响。我

认为我对他很了解,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友谊。在有些问题上我们也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即使这样,也未曾使我们的友谊受到损害;当然我们所争论的大都是理论和学术性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私事和物质上的计较。

经过参谋长的同意,我把巴顿召到华盛顿。虽然我事先预料到他的答复,但还是问他,是否愿意离开教导军的指挥岗位去率领一个师参加实际战斗。他欣然答应,这和另一位军长的态度截然不同。那位军长在被要求调往太平洋去指挥一个美国的战斗军时,立刻拒绝了,其理由是象他那样一位高级的军司令官,在一个澳大利亚的“外行”军人的领导下工作是不恰当的。

把巴顿的师运往沙漠地带的计划主要因为缺乏现成的船只而未能实现。从海路运输一个装甲师,除去护航舰外,整整需要四十五艘运兵船和货船。同时,这些被护航的船只还必须经过长途航行绕过好望角才能驶抵开罗。在那时,使如此多的船舰脱离其他重要的补给任务是不能容许的。

然而,这件事却给了我有益的教训。我体会到,选拔一个干部去担任要职,即使在战时,也往往会由于不合正规手续和公认标准而遭到反对,有时候连单纯的举止这种因素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也认识到,一定要从那些喜爱前线岗位的人中选拔战斗指挥官,而不必考虑那些次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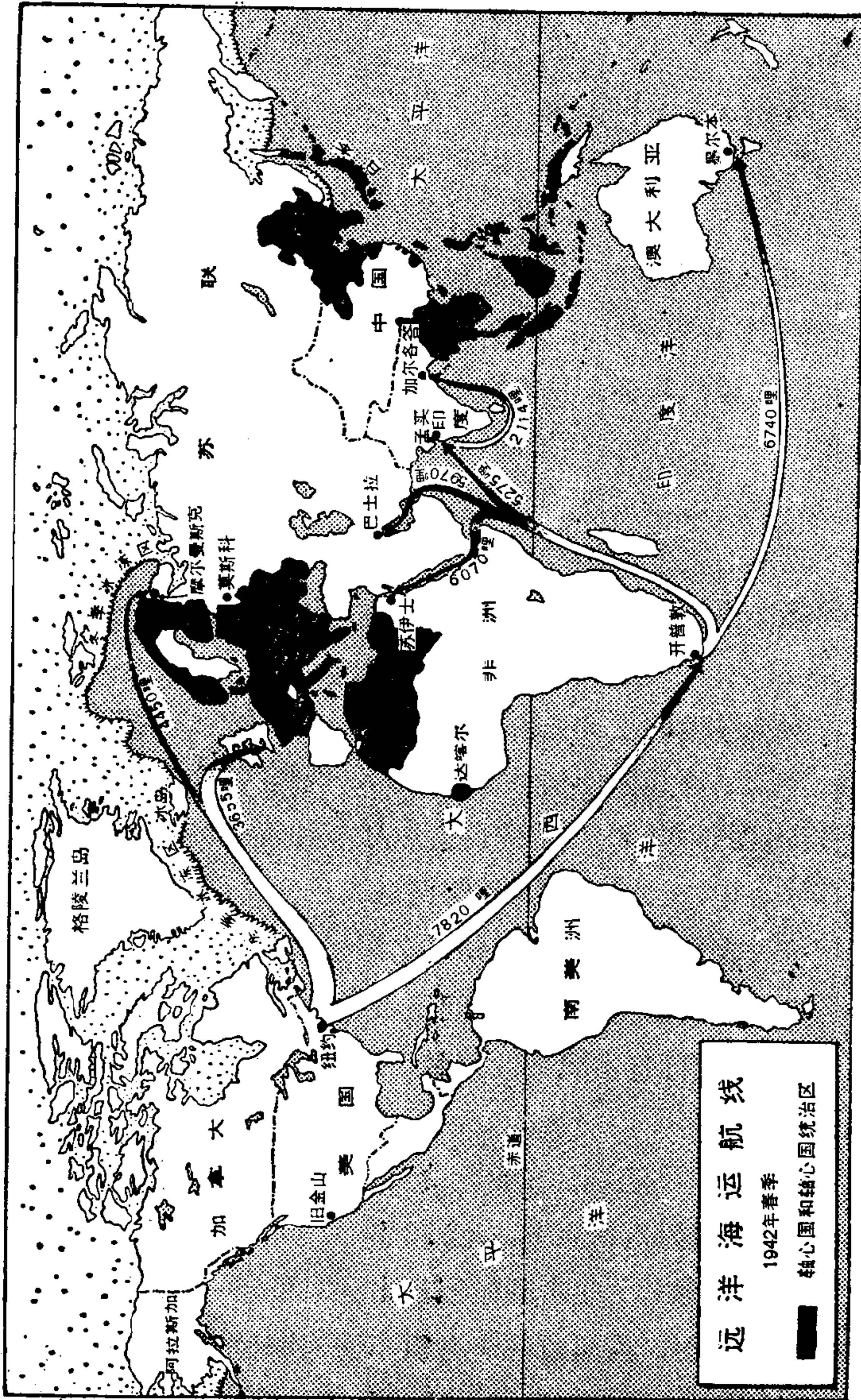
作战处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和我的主要助手逐渐地得到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和研究问题。我们可以放心地把一些日常事务交给一批优秀的年轻参谋军官去处理。他们在托马斯·汉迪准将、马修·李奇微准将、罗伯特·克劳福德准将以及约翰·赫尔上校、艾伯特·魏德迈上校的领导下工作,这些将校,在战争结束以前,都在陆军中得到了应有的荣誉。

为了确保胜利和有利于总结，我们很容易举例说明陆军部所犯的**错误**。但是即使我们之中最直率和最善于分析的人都不敢回想当时内心的恐惧和忧虑。这种心情在一些负责军官的感情和精神紧张的强烈程度上反映了出来。时间是关键，所以当时不管是根据可能作出的估计，还是根据有用的情报，都必须迅速作出决定。

例如，我们有过两项计划，一项是打算铺设一条通往阿拉斯加的输油管，另一项是打算修筑一条通往南美洲的国际公路。产生这两项计划的原因是有人非常担心我们可能不再生产战争所需要的油船和护航船只，而这两项计划的实现可能使一些重要战区摆脱困境，也是使重要的石油供应路线保持畅通的手段。但作战处竟作出了轻率的判断，认为这两项计划对战争都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尽管断然作出这个判断的人事先曾听取过石油供应问题专家的意见。

盟国已经批准了首先击败欧洲轴心国的政策。我们在为执行这项政策而制订具体计划时，力图对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重要因素都作彻底的研究和分析，以免忽略了各种机会、风险或必要的准备。在战争中，无论从战术、战略问题或后勤供应问题来说，我们在为积极进攻而进行集结时，始终必须根据那些敌人会严重打击我们的地区的最低需要来考虑问题。这就是说，在1942年1至3月这段期间，在制订基本战略计划时，必须注意到西南太平洋不能再削减的需要。

在盟国中，只有美国才能提供大量可供自由支配的后备军。英国的空军、地面部队和海军，大部分为保卫本国而被牵制住了，不过地面部队和海军所受牵制的程度比空军稍轻一些；如果敌人经过北欧发动进攻，英国是一个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的基地。英国由于进行战争，已经出现了人力明显不足的紧张局面，只有征募



〔按原图译制〕

妇女才能承担它在中东、波斯和印度的任务及维持它在那里的摇摇欲坠的地位。苏联的武装力量数字虽然庞大,但正在和威胁它生存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

摆在陆军部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为自己选择一条准确的作战行动路线,以便最有效地把美国的潜力用来对付欧洲的轴心国。这个选择一旦决定,将成为在打败德国以前的作战指导方针;所有其他的军事行动和攻击对这个主要突击来说,必须被认为是附属的或是次要的,一旦主攻部队准备就绪,附属的军事行动和攻击应被用于守卫我们防御体系的主要环节,或者用于支援主攻。

把美军用于俄国战线一侧攻击德国是不可能的。当时通往俄国的路线只有两条,而且都很漫长、迂回和曲折,在北面是经过摩尔曼斯克的航线,在南面是经过好望角驶往波斯湾的航线。这两条航线,在俄国的受到严重摧残的工业恢复以前,只能供应俄军战斗所必需的装备和物资。

我们还非常周密地研究了通过挪威、西班牙和葡萄牙发动进攻的计划,甚至研究了完全不使用地面部队而单靠海、空优势的进攻计划。

我们曾考虑把地中海区作为对德发动主攻的另一个战场。1942年初春,英国在中东的局势并不很坏。奥金莱克正在西部沙漠支撑着,他指望从英国得到增援部队和从美国取得已经答应提供的装备,以便使他最后能发动一次进攻,把隆美尔赶出非洲。但是地中海中部对盟国来说是个禁区。马耳他岛已遭围攻,不断受到从西西里和意大利起飞的轰炸机的袭击。从直布罗陀直接进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任何企图,肯定一开始就会失败,因为进攻部队如无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必然会遭到敌人以陆地为基地的优势空军的袭击。

甚至早在战争初期,我们就研究过这个问题,即是否可以派遣一支远征军去夺取北非大西洋沿岸的法属领地,进而将该地区作为进攻“欧洲要塞”的主要基地。有一位高级军官还认真地提出过这样一个建议:我们先在利比里亚登陆,然后经过艰苦奋战,再从那里打到欧洲对面的非洲海岸。

有很多理由使我们不能把地中海区当作主要的进攻路线。第一个不利条件是北非各基地远离德国的中心。虽然我们可以预料,意大利这个敌人随时会被消灭,但我们攻击的中心是德国,意大利的垮台不是决定性的。从德国南侧和西南侧通过山区进攻其本土的困难是很明显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这种情况,即英、美不可能把充分的力量集中于地中海区,只有以英国为基地发动进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英国需要用来保卫本国的陆军、特别是空军和海军的剩余力量,也只有在跨越英吉利海峡直接投入欧洲大陆时,才能被用来进攻。此外欧洲西北部的海岸线和德国边境之间,没有象阿尔卑斯山脉那样重要的自然屏障。

把英国作为对德发动进攻的重要基地的另一个理由是,从纽约横渡大西洋至英国的航线最短。这一有利条件能最大限度地加快船只的周转,并能使用英国一些已经建成的和运转得很好的巨大港口。选择这一基地还能以另一种方式节约航运的船只。我们可用重型护航舰与当时横行于北大西洋的德国潜艇群进行最有效的战斗。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军事作战路线,通向英国的这条生命线必须保持畅通。

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生存的需要,英国每年必须进口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物资——和平时期的进口量超过五千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因此,我们必须保住这条航线,因为在德国潜艇的威胁完全被消除以前,在这条航线上护送部队和装运军

用物资的船只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的安全。

经过与其他可能采取的进攻路线相比较,同时考虑到集中兵力的需要、抵达德国中心的距离、对难以通行的险要地形的迂回以及扩充兵力的进度等因素,我们认为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英国为基地发动对欧洲西北部的进攻。

所有这些情况洞若观火,不言自喻,所以没有发生过争论。但后来我们碰到了困难,弄得所有问题都讨论不下去,几乎伤了和气。我们一些有经验的陆、海、空军人员坚决认为,攻击坚固的西欧沿岸是不会成功的。我们早已了解德国人正竭尽全力以确保“大西洋壁垒”的完整。此外,一支相当庞大的德国空军可能仍部署在沿岸地区,德国舰队中的一些重要战舰仍停泊在法国北部、挪威以及波罗的海的港口。海岸线上到处有德国潜艇巢穴。同时,德国在我们可能进军的每一条航线上正在迅速布雷。

许多人认为,进攻这样的防御地带是发疯,完全是军事上的自杀。甚至在那些主张最终必须用地面部队直接进行突击的人中,大多数也认为,必须在德军士气明显出现瓦解迹象以后,才有可能开始这种军事行动。

只有少数人——一开始是很少几个人——持相反的意见。马歇尔将军已经知道我们正在建立的这个基本观念,他是支持者之一。其他的人如麦克纳尼少将和航空兵的卡尔·斯巴兹少将,还有作战处中我的一批忠诚的助手如汉迪将军、克劳福德将军、赫尔上校和魏德迈上校同样都是热诚的支持者。总的来说,真正知道我们有这项计划的军官并不多,他们也没有听到过在拟订这项计划时正反两种意见的任何激烈争论。尽管我们不得不和许多人进行商讨,因为这些人总是表示怀疑,认为这项计划毫无成功的希望,但这些怀疑的看法从来没有使负责制订这项计划的小组灰心



丧气。

这个小组认为我们作战计划的制订应根据下述设想：我们的空军力量到发动进攻时将具有绝对的优势；德国的空军力量实际上将在空中被肃清，这样，我们的轰炸机就能实际上阻止敌人迅速增援而把攻击区孤立起来；德国潜艇将受到有力的打击，而我们的被护送的船只能够比较有把握地安全横渡大西洋；我们的海军支援军舰将拥有摧毁局部防御的力量，并且能用大量专门登陆艇把一支强大的陆军通过先打开的缺口源源不断地迅速运上岸去。到了那时，突击“大西洋壁垒”不但可行，并将导致德国的彻底失败。此外，这个小组坚决认为，其他的军事行动所能作的只不过是德国的防线外围进行敲凿而已；他们还认为，如果不进行这个特殊的战役，要在陆地上打败德国是毫无希望的。

我们感到我们正在为战略思想提出一个新的观念，一个几乎可说是崭新的信条。这个战略思想可以使人们想象到空军和地面部队协同作战所产生的效果：即一个地空协作单位的作战效果是两个单独军种的作战效果的几倍。

陆军中的许多军人贬低飞机袭击地面部队的潜力。令人非常奇怪的是，相当多的空军军官也反对这种地空协同作战的新观念，他们认为这种观念是想用地面部队制约空军，因此认不清空中袭击的充分威力。这需要耐心地反复说明，地空协同作战的结果不但彼此不会受到制约，反而会使空军基地不断地向前推进，并把战略轰炸的效果与地面部队的战略联系起来；因此，空军不断协助地面部队向前推进，不但有利于空军进行远距离轰炸，而且选定目标的摧毁将为战胜纳粹作出更加直接有效的贡献。所有这些现在看来都很清楚，但在当时却引起了长达数日乃至数周的激烈辩论。

最后，我们把这些理由、支持的意见连同大量的专门文件归纳

成一个战略提纲草案送呈参谋长。当然，他已知道我们在拟订这个提纲。

马歇尔将军向来是一个易于接受新事物和思想开朗的人。他要求我们对这项计划作出充分的说明。说明计划的担子落在我们肩上，但是对整个计划的关键之点，即整个计划的真正的基础几乎必须用信心来加以解释。整个计划的基础是相信利用拥有数千架（而不是数百架）飞机的空中优势，能够摧毁德军的防御工事或者使之失去作用，能够严重破坏其交通，使之反集结发生困难，能够在空中肃清其空军；同时也相信我们的地面部队将始终拥有一种力量无比强大的本钱。如果没有这种信心，整个计划就成了空想。但是，我们当时还无法证实这个具体的信心，因为我们计划中所需要的飞机那时并不存在。

参谋长耐心地听完了长篇的说明，最后说：“就是它了，我同意。”他立刻与金氏海军上将和阿诺德将军商谈，他们也都同意了。下一步就是要总统批准，然后再说服我们的盟国。很明显，我们必须取得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否则这项计划就会自行破产。如果没有英国政府的全力合作，就不可能把这个国家变成美国的兵营，更不可能得到英国海军、空军、陆军和后勤部队的支持。总统指示马歇尔将军前往伦敦，随行的还有总统的私人助理哈里·霍普金斯先生。他们于4月7日出发。

在以后几个月中，我和霍普金斯先生曾多次会晤。我因为全神贯注地考虑战争问题，从未直接听到过许多有关他个人的政治哲学的事，而这个问题当他在华盛顿担任政府职务期间曾引起过激烈争论。但他几乎是狂热地忠于总统的，当他认为必要时，这种感情就会毫不犹豫地发表不同意见和持久的争论中表达出来。他对军事问题中各种因素有惊人的理解力，并且为了加速胜利的

来临而经常忘我地工作着。他从不怜惜自己，甚至有几次当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到医生命令他卧床休息时也还是那样。他作为总统助理，成天没完没了地处理着主要与战争有关的各种工作，这些工作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同时也使他成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马歇尔将军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伦敦会谈的详细情节，但我确实知道，他回国时带来了英、美两国政府达成的一项协定，内容是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攻击作为两国政府在欧洲的主要进攻行动。这个协定是在1942年4月达成的。

历史证明，在战争中没有任何事情比坚持一项单一的战略计划更为困难了。事情的无法预见和诺言的闪烁其词，再加上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往往诱使人们放弃既定的行动路线而另谋他途。这项战略计划也不例外。它的制订距离实现还有很长的时期，所以在此期间，出现了无数争论、奉承和劝告，企图取消这项计划。但是欧洲战争终于胜利了，这是因为总统、马歇尔将军和其他许多人经受了各种考验和诱惑——如不顾困难、拖延和压力，也未受地中海最初几次有利战役的引诱而放弃原来的想法——始终没有动摇过他们的这个决心，即在适当时机尽早渡过英吉利海峡，对欧洲发动一场全力以赴的进攻。

## 第四章

### 进攻的基地

马歇尔将军参加4月份伦敦会谈回来后不久，就召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访问期间很少有机会去视察美军的活动，但他感到担心，因为在伦敦供职的美国军官并不熟悉陆军部所考虑的更加广泛的问题和目的，特别是他们似乎对将把英伦三岛自始至终作为最大的作战基地这些日趋成熟的计划毫无所知。马歇尔指示我去伦敦访问，寻求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并且还要我带回有关我们驻欧部队未来编制和发展的建议。我要求带马克·克拉克少将一同前往，他当时在负责领导地面部队的麦克奈尔将军那里担任参谋长。克拉克曾提出英国适合做训练场和军队运输基地，我认为他的这个看法是有价值的。

刚过5月中旬，我们就出发了。我们沿着北方航线飞行，这条航线是由陆军航空兵开辟的，并且必将成为最终打败轴心国的一个重要因素。设在缅因州、纽芬兰、拉布拉多、格陵兰、冰岛和苏格兰的机场，终于使我们有可能把所有的飞机，甚至把战斗机运往欧洲。尽管这条航线是在困难、沮丧甚至对其有效性抱着严重怀疑的情况下建成的，但如果没有它，我们就难以维持住投入欧洲的部队。

我们到达英国后，就和美国司令官詹姆斯·钱尼少将会晤，他早在我们参战前就被派到这里当“军事观察员”。他与他的一小批

幕僚没有机会去了解后来在美国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并且对美国的下一步战争行动的真实意图完全不知所措。他们肯定已落在潮流的后面了,如果不把他们调回美国,就难以赶上形势。直到那时,美国始终忙于太平洋战争,以致把伦敦的这个小组全给忘了;这就是说,注意力还没有转向欧洲。

我们这个视察团在英国呆了十天。回国后我向参谋长汇报时说,在我看来,在欧洲负责美国军事活动的人应该充分了解美国政府的各项计划,对于我们建立陆、空、海三军部队的能力和在进攻战斗中支援他们的物资也应有实际知识。马歇尔将军立刻问我,谁适合担任这个工作,这时我已准备好了答复。我推荐麦克纳尼将军。我知道他以前在伦敦工作过几个月,对英国三军军部的工作非常熟悉,并在那里还认识了许多要员。此外,很明显,从大不列颠发动的最初的军事行动将限于空中袭击,因为从进攻计划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强大的空军部队建立后的初步行动,将是发动一场持久而激烈的轰炸战役。最后,我知道,麦克纳尼将军坚决相信,空军有力量使盟军从陆地进攻法国成为可能。

参谋长没有接受这个推荐。他刚刚任命麦克纳尼为陆军部副参谋长,而其他将领都不适宜担任此职。为了保证统一指挥和建立相互信任,马歇尔将军认为,在那时从航空兵中选拔一人担任他的助手是必要的。

6月8日,我呈送参谋长一份《给欧洲战区指挥将领的指令》的草案,其中提出了关于欧洲战区美军各兵种的统一指挥问题。我提醒马歇尔将军,在发出这个文件前必须详加阅读,因为它在以后的战争中可能成为一个重要文件。他的回答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他说:“我当然要阅读的,你也许是执行这个文件的人。如果真是这样,你何时能离开这里?”三天以后,马歇尔将军明确告诉

我，我将指挥欧洲战区。

当然，我常常觉得奇怪，是什么促使他作出这个特殊的、显然是突然的决定。马歇尔将军是从不随便说话的，当然我也很了解，这个决定只有我才感到突然，他早已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了。从参谋工作转到指挥岗位，这是一个军人所欢迎的；但这个职务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以致使我忘却了任何高兴的想法，这个职务又是如此的紧要，以致使我必须全力以赴对待它。然而不管怎样，这个意料不到的命令迫使我必须赶快去做准备，主要是把我在陆军部的工作移交给汉迪将军。

我和一些重要领导人有过数次会面。在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的一次短时间谈话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希望很快开始积极的军事行动。我告诉他，在对欧洲大陆发动任何进攻以前，必须进行长期的集结兵力的工作，而且我的确了解他是这项计划的坚定支持者。

稍后，我拜访了罗斯福总统和正在白宫作客的丘吉尔首相，和他们进行了非正式的谈话。这次谈话并没有军事上的意义，但却是我第一次和他们两位的个人交谈。当时非洲沙漠地带的托卜鲁克刚刚沦入德军之手，忧郁笼罩着盟国世界。然而这两位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悲观失望的表现。令人鼓舞的是，看到他们正在考虑的是进攻和胜利，而不是防守和失败。

我还访问了金氏海军上将，他是一位斗志旺盛、性格严峻、作事果断而又举止粗暴得常使部下感到害怕的海军军官。在谈话中他强调说，我去英国进行的这次冒险标志着美国三军第一次有意识地试图在战场上为这一无限期的战役建立统一的指挥。他向我保证，他在自己职权范围内支持我这个名副其实的美军“司令官”。他告诉我，他不愿听关于我的职权要服从“合作和最高利益”的这

种愚蠢说法。他坚持认为要有单一的责任制和执行权,他还诚恳地对我说,如果我认为海军有意或无意地违犯了这个观念,希望我随时和他进行个人联系。

这些话对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时以前,《指挥战地陆、海军联合规定》曾强调说:在决定哪一军种拥有指挥职权和指挥责任时,应服从“最高利益”的原则。

克拉克将军和我以及少数几个助手于1942年6月末离开华盛顿。这次我和我家庭的离别似乎感到特别留恋,虽然这样的分别在过去多年中不断重复过。我的儿子从西点军校前来看我,我同我的妻子和儿子团聚了两天,接着就分别了。

我们一行在英国平安着陆后,我立刻承担了欧洲战区美军指挥职务,当时的驻欧美军只包括驻联合王国和冰岛的部队。由于战争时期人们习惯于把一连串名词的字首拼成新名词,这个战区也不可避免地立刻取得了一个通俗的名称,叫“ETOUSA”<sup>①</sup>。

为准备美国参加进攻欧洲大陆而开辟欧洲美国战区,是英、美两国政府一致同意的击溃德国的主要战略行动。下面是这项指令的摘要:

欧洲战区……的指挥将领……将指挥现在和以后派往欧洲战区的所有美国陆军,包括被派遣去与陆军协同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在内。

在海军部和陆军部的同意下,指挥将领……将对指定在这个战区参加战斗的所有海军……实行计划指挥和作战指挥。

欧洲战区的指挥将领在英伦三岛应服从防止损害英国主权所必需的一些限制,担负起战区司令官在战术、战略、地区防卫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职务。

---

<sup>①</sup> 原文全名为 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 United States Army (欧洲战区美军)。——译者注

欧洲战区指挥将领的任务将是在欧洲战区准备和实施军事行动,以反对轴心国及其同盟。

1942年6月末,美国和大不列颠的报刊对俄国发出的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呼声作了响应。这使一些职业军人感到不安,倒不是因为对这一想法是否睿智有什么争论,而是由于公众的急躁情绪清楚地表明,他们对所牵涉到的问题完全缺乏了解,特别是不了解发动这种军事行动必须需要时间。如果认识不到这些问题的牵涉面之广,那么对以后两年所发生的任何情况的解释,将会是毫无意义和难以理解的。为了帮助了解情况,这里列举几个统计数字。

当1944年6月6日对欧洲西北部发动实际进攻时,我们在英国拥有随时可用的人员和装备数字如下:

17个英国师,其中包括3个加拿大师	233艘LST型登陆艇(一种大型登陆艇,能直接把坦克和重型卡车输往滩头)
20个美国师	835艘LCT型登陆艇
1个法国师	6艘战舰和2艘低舷重炮舰
1个波兰师	22艘巡洋舰
5049架战斗机	93艘驱逐舰
3467架重轰炸机	159艘小型战斗舰艇,不包括鱼雷艇、鱼雷快艇和布雷艇
1645架中型轰炸机、轻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	255艘扫雷艇
698架其他作战飞机	72艘步兵登陆艇
2316架运输机	
2591架滑翔机	

这里列举的战斗机只包括实际在空军中队的数字。登陆艇、商船和海军战斗舰总数为六千多艘。这个数字不包括水陆两用车或两栖坦克。



那里还有大量的基地部队、运输队、地勤人员、医院以及各种维修编制。当时，在盟国陆、海、空军中，有二百八十七万六千四百三十九名官兵被编成远征军。还有四十一个师，连同装备和物资，只要英国港口和在欧洲大陆上能夺回的港口容纳得下，就可立即从美国运到。此外，还有十个师（其中有几个是法国师）预定参加地中海战区的进攻。我们有些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装备，在1944年5月进攻前夕还没有运到。

回头再看看1942年6月份的情况。

那时，美国刚刚动员和训练它的陆、海、空军。已经开到北爱尔兰的美军只有第三十四师、第一装甲师和美国空军的几个分队。他们还没有受过充分训练。三军进攻所需要的大部分战斗装备也不存在。有些类型的登陆艇还没有达到设计阶段。单就生产上的限制，就打消了在1942年或1943年初进行大规模进攻的任何可能性。如果美、英两国的生产在实际上不能集中起来用于支援进攻欧洲这个唯一的目的，那么这一军事行动就不能在1944年初以前实施，这是很清楚的。

这些情况显然不能公诸于众。敌人是竭力想知道我们在将来进攻时的辎重准备情况的，但我们却尽力不让他们有任何可能取得这方面的情报。所以当国内那些不明真相的战略家们可以高喊、而且确实已在叫嚷我们“胆怯、拖延和优柔寡断”时，我们至少有一点感到满意，即希望纳粹也同样会过高估计我们的能力。

美军在伦敦市中心已经接受了一座大公寓作为司令部的所在地。我并不愿意在一个大城市中成立作战司令部，但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住处也是一个问题，绝大部分可用的旅馆和其他住所都在司令部所在地格罗夫纳广场的附近。在初期，我们的大部分活动是经常和英国政府的文职官员和军官们举行会议，而运输工具

又是如此缺乏，以致使我们感到必须在主要的联系地点附近找些房子。还有一点是我们在郊区找不到一个能容纳下参谋部的场所，而当时也还无法建造临时营房。从这里不难看出，我最初的安置计划为什么遭到失败和为什么把司令部暂设于伦敦。

驻欧美国海军司令部是由原海上作战参谋长斯塔克海军上将指挥的。他的办公处不属我管辖，但我刚到不久，他立刻来访问我，并对我说：“我在这里设立办公处的真正原因是协助美国在欧洲的作战部队。如果您有任何事需要找我，白天黑夜随您便。您来找我，可叫我‘贝蒂’。这是我在这个岗位上人们经常对我的称呼。”

为计划中的军事行动而拨归我统率的美国海军由安德鲁·贝内特海军少将指挥，在我到达伦敦不久他就作为我的直属部下向我报到。这个海军分遣队在许多月内只能指望作一个训练编制。然而，我们的计划的最重要特点是：在对欧洲大陆实施任何进攻以前，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训练。

我的第一件工作是物色和组织一个工作班子。马歇尔将军批准了我要求让沃尔特·史密斯准将当我的参谋长的申请。他真是一个得心应手的人；他善于处理日常事务，也长于清醒地理解重要问题。由于他认真、勤奋和忠诚，他既能处理麻烦的协商，又能从事专业工作。他性格坚强、举止果断，对人既不迁就，又能融洽相处，这些优点使他在欧洲的军界和政界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声誉。他于9月7日到达伦敦，从这时起，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维持着个人友谊和公务联系。

当计划清楚地表明参战兵力最后要达数百万时，我决心避免使地面部队在一开始就发生机构臃肿的弊病。最初，我们只把第二军调来，把该军司令部作为地面部队的最高一级司令部，并委派克

拉克将军负责指挥。我知道，在我们的军队和给养积聚到足以发动一次大攻势以前还有几个月，在此期间，我们会有时间把我们所需要的几个集团军也调来。这样就避免了由于突然出现许多高级军官，造成人浮于事而必然引起的混乱现象。由于我们的一切筹建工作是从基层开始的，所以就能把准备工作做得既具体又明确，而且还有时间仔细选拔高级司令官。我们使第二军驻扎在索耳兹伯里平原，那里是英国最好的训练场所。

约翰·李少将向我报到并去负责供应处。他马上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繁重的工作，如准备港口和建仓库、盖营房、平机场和修理设备，这些都是我们从英国基地发动进攻前所必需的。在他领导下，供应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如此重要，其规模是如此宏伟，以致需要一本专著才能详细叙述。两年以后，我们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时，英国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空军基地、车间、仓库和调遣军队的兵营。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只有在英国上空经常飘浮大批防空气球，才能使英伦三岛免遭沉海之灾。

欧洲的美军司令部的建制计划是按照通常的格局制定的，其中包括一般参谋部和特别参谋部。在欧洲战役期间，自始至终使我们伤脑筋的一个问题是，在不增设司令部的情况下，如何把行政事务和作战行动分离开来。美国的法律和有关规定授予一个战区司令官广泛的行政责任和职权，其中大部分必须由他个人来行使。如何使一个机动的战术参谋摆脱在一个固定的司令部中经常必须要完成的大量工作，而且还要节省受过高级训练的人才，这始终是一个问题。这在一开始就是一个难题，但在我被任命为盟军最高统帅以前，还不算是个真正麻烦的问题。那时我们采取了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本土终究是一个基地，而不是战场。我们责成供应处处长兼英国基地司令官李将军负责处理行政

事务。

空军的建制计划一直在加紧拟订。我们打算尽快参加对德国的轰炸战役。于是把第八航空队调到我们的战区，并任命斯巴兹将军担任司令。他于7月份来到伦敦，从此以后直到欧洲战区的最后一次胜利的射击为止，他从没有长期离开过我。在以后几乎三年的激战中，我每天都有新的理由来感谢战神和陆军部，因为它们给了我“土埃”·斯巴兹。他不爱出头露面，总是那样谦虚、稳重，所以公众从来不能充分认识到他的贡献。

所有这些初步组织工作都合乎这些计划的标准。这些工作就其迫切的需要而论，都被事先估计到了，所以很快就得到了处理。此外，我们还不得不做另一种其性质非常独特的工作，这就是如何使我们的训练、营造和组织等活动适应英国的生活。

大量战斗部队进驻英国的计划，要求人口高度集中的英伦三岛准备接受二百万名美军，并提供必需的设备，其中包括为大规模进攻作准备的训练场地。英国的食品供应不足，早已使它采取了在贫瘠土地上实行密植耕作的措施，同时为了节省燃料和动力，一切不必要的运输和动力设备全被取消了。我们的友好“入侵”，必将大大加重当地居民的负担。英伦三岛的总面积只不过比科罗拉多州稍大一些。按照我们的要求说，有些地点不是不能用就是不适用。南爱尔兰是中立的，苏格兰则缺乏合适的训练地区。几乎全部负担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英格兰的中部和南部，此外还有些部队驻扎在北爱尔兰。我们必须预料到会与民事诉讼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尽管双方都怀有世界上最善良的愿望，但我们必须有思想准备，防止发生彼此不愉快的事情，一旦有这种情绪，自然就会引起误会，而且必然会妨碍作战行动。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外，美国公众习惯于把欧洲的争

端看作只是欧洲自己的事。因此，来到英国的每一个士兵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享有特权的远征军战士，到这里来是为了把英国救出绝境。他们期望英国人也能这样看待。而另一方面，英国的公众却把自己看作是民主的救星，特别是因为在这整整一年中，英国作为纳粹主义和欧洲轴心国所打不垮的一个对手而在单独作战。不了解这个观点，自然就会产生不幸的后果。

如果英国有广阔的空间可以集结美军，问题就不会这样尖锐；但是由于英国人口的高度集中，来到英国的每一个士兵都会使英国的生活条件更加困难。街上的每一辆美国卡车，对每一块耕地的征用，都会引起英国公众的不满。

幸亏我们预见到了这些问题，并和英国负责作战工作的官员们进行了坦率的讨论。我们的主要伙伴是英国情报部部长布伦丹·布雷肯先生。他在英国生活中，正象哈里·霍普金斯在我国一样，是一位有争论的人物，但他始终在协助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作事坚决果断，精力充沛旺盛。他还有一个特点，使他在一个通常被认为是保守的和遵守礼教的民族中显得更加突出。以前我总认为美国的西部牧人是世界上最擅长作生动表情的人，但在我和他见面后，看出他也是一个富于表情的人。此外，布雷肯讲话时强烈的焦急语态，更加强了他语言的效果。

我们和布雷肯领导的这个非常得力的情报部一起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方案，使刚到的美国士兵能适应一个人口稠密地区的非常复杂的生活，以便把麻烦事故减少到最低程度。在这些方案中，大概最成功的一项就是对双方进行教育，让他们在家庭和公共场所中常常接触。英国公众通过布雷肯，经常知道希望他们怎样做。他向英国全体居民讲，必须进一步适应形势和作出牺牲，还要宽容忍耐。同时，当美军在本国启程前，就被发给有教育意义的小

册子和印刷品。这些宣传品用英国的土话写成，专门用来帮助美国士兵去适应新的环境。

只要有可能，我们总是让新到英国的美国官兵到遭受轰炸的地区走一圈。在美国红十字会和英国的救济福利机构的协助下，还建立了一种由英国人在家中招待美国士兵的制度。凡是我所遇到的曾在英国人家里度过周末的美国士兵，无一不认为美国有一个坚定忠实、刚毅不屈的盟国。然而我们发现，有的英国人家为了表示他们的好客盛情，在招待一个美国士兵过礼拜日时，竟用去了整整一周的定量。于是我们立刻鼓励士兵，让他们带着自己的口粮去作家庭访问，同时进行了一次向英国主人说明情况的宣传活动，这样就既保持住了他们的自尊心，又避免了尴尬局面。在各个方面，只要我们预料到会发生麻烦，就制定预防措施，一般都取得了成功。这次宣传活动的关键是消除那种令人讨厌的伤感，把我们的一切方案都置于事实的基础上——重点是让每个美国士兵都有发现事实真相的机会。在那个时期，凡是在英国身负要职的人，对双方几乎普遍表现的合作、容忍和友好的精神，始终表示感激和钦佩。

这类问题，立刻使我们注意到需要在各司令部中设立一个有效的对外宣传科。我们所关心的重点是必须让美、英两国的人都知道各种问题。我开始经常举行简短的和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商讨互相关心的问题和寻找共同解决的办法。我坚持认为，记者们在我的参谋部门中应该有象准参谋人员那样的地位，并且我尊重他们在战时所负的集体责任，就象他们尊重我的责任一样。

我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在我到达英国以前，美国司令部对黑人部队与其他士兵或平民发生的一些小纠纷实行了新闻检查。这些事件常常牵涉到我们的黑人士兵

和英国姑娘的社交接触。除了大城市和上层阶级外,英国居民没有象美国那样强烈的种族意识。小城市的英国姑娘,象对待任何人一样,会毫不迟疑地和一个黑人去看电影或跳舞,这种习惯是美国白人士兵不能理解的。结果往往发生争吵,当我们的白人士兵发觉英国报纸坚决支持黑人时,就更加迷惑不解了。

当我在记者招待会上知道了这类新闻是在被检查之列时,立刻撤消了这项命令,并告诉记者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只是希望他们不要报道失实。使我奇怪的是,有几个记者反而要求我维持这个禁令,并提出许多理由来为他们的建议辩护。他们说有些无事生非的人会夸大这些事件的严重性,并说如果国内看到这些报道就会引起纷争。我向他们表示感谢,但仍然坚持我的看法;结果是这些事件被公布于世,也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纷争。这是我要永远记住的一个经验。

关于行政管理、作战准备、军队训练和制定计划等工作,必须齐头并进。在战争时期,我们陆军的最初的一个缺点是,我们的士兵对于爆发战争的基本原因的无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们认为区别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是学术问题,而不是个人利益问题,因此看不清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促使美国去关心两者的争端。在战争开始之前,且不管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意见冲突,而现在,我们的士兵对这个问题必须要有清晰、简明和一致的理解。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缺点是,对于为什么需要战斗纪律,为什么要不断地进行协同作战训练和武器使用训练的问题同样缺乏认识。

这两个问题经常引起一些有洞察力的记者的评论。有些司令官借口说,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部队还没有经过“浴血战斗”,但自鸣得意的供述是消除不掉这些缺点的。另外还有一种奇怪的见解,认为当敌人的第一颗子弹呼啸飞来时,这些缺点会立刻得到

纠正。应该承认，有些事情只能从战争经验中学到，非此别无他途。但是无论哪个司令官，如果他事先未能使一支部队拥有它应该具备的特种技能、必要训练和有用知识，便把它投入战斗，这是对他所统率的士兵的极大犯罪。

一个士兵应该懂得为什么而战，这个问题似乎并无争论。然而我却听到有些司令官企图把这个心理问题过分简单化，硬说士兵们作战只是为了某些简单的、基本上是狭隘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一支部队的荣誉、尊重战友的意见以及对一个直属上司的盲目忠诚。这些是重要的，而且一个英明的司令官要想努力建设一支第一流的战斗部队，要想使其士兵受到的训练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胜利的机会和个人生存的可能，就决不能忽视这些因素。然而美国士兵是聪明人，他们要求基本上了解，而且也应该基本上了解，他们的国家究竟为什么要拿起武器，胜败的不同后果又是什么，尽管他们爱讲俏皮话，有时还会说些嘲笑语。在美国革命时期，冯·施托本<sup>①</sup>对这点曾作过生动的评论。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在欧洲，你命令一个士兵怎么干他就怎么干；而在美国，就还必须告诉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1941年当新兵应征入伍时，军事领导人就不得不几乎是单独地担负起向他们讲清这些道理的责任。但是这也表现出了我国教育中的一个显著缺点。在我看来，经常强调美国公民的个人权利和特权就忽略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真理，这就是只有当公民们为保护他们行使这些权利的国家的繁荣昌盛尽到全部义务时，才能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冯·施托本(Friedrich Von Steuben, 1730—1794),美国独立战争中著名的德国将军。生于马格德堡,1747—1764年入普鲁士军队,七年战争中颇为有名。1762年任侍从武官参谋。美国独立战争发生以后,投入独立军,以教育总监而参加义勇军的训练,后任华盛顿的参谋长。——译者注



维持住这样的个人主义。

就赢得战争胜利而论,对一种根本事业的信念,其重要性完全不亚于无论哪种指挥行动所激发和产生的任何局部的士气或纪律。克伦威尔的“铁骑军”<sup>①</sup>在进军时唱着赞美歌。配合他们的铁的纪律的是他们在任何严重危机中都不会放弃的那种内在信念。

我们的司令部和美国大使馆位于格罗夫纳广场,由于士兵们爱起外号,那里不久就成了“艾森豪威尔广场”,并且报纸上也时常这样称呼。

这只是一件好笑的事,但是在这个地点要过安静的私人生活是困难的。英国方面的盛情好客和在伦敦的许多美国朋友都以各种名义向我发出无数的邀请。最后,为了避免旅馆生活中一些不可避免的事件,我把自己的住所迁到了城郊一所安静的小别墅。和我住在一起的有我的海军副官哈里·布彻海军中校、勤务兵米歇尔·麦基奥士官。还有两个黑人,约翰·摩安奈士官和约翰·亨特士官,负责照料住房和准备简单的伙食。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一直在我身边。

7月以后,在整个战争期间,除了首相和美、英武装部队的领导人外,我再也不接受任何邀请。他们邀请我的主要目的总是商谈要事。

当时,在我的日程中对部队的视察还没有象以后那么多。因为那时在联合王国可去视察的部队还比较少。我最早的一次视察与我们的第一次对敌进攻作战——为庆祝1942年的7月4日而进行

---

<sup>①</sup> 克伦威尔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独立派的领袖。1642年内战爆发后,他组织了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铁骑军”。1644—1645年击溃了英王查理一世的军队。——译者注

的一次空袭——有关。轰炸目标是位于荷兰的四个德国飞机场。由查尔斯·凯格曼上校率领的六架“波士顿”式轰炸机，作为一支更大的英国轰炸机编队的一部分，冲入了猛烈的高射炮射击区，结果有两架未能返航。为了表示我们进入欧洲的战斗，在飞行员出发前不久，我抽时间看望了他们，在返航后，还和没有遇难的人员谈了话。

在战争期间，丘吉尔先生和一切军事行动保持着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致使他成了英国参谋部的实际上的成员；根据我的记忆，凡是与英国参谋部讨论重要问题的会议，他没有一次缺席过。

他是一位很有威望的领袖。他具有英国人在困难时所表现的勇敢而坚定、在顺利时所表现的因循而守旧的典型性格。他有非常强烈的信念，善于争论和答辩。他全力以赴争取战争的胜利，履行自己作为英国首相的职责，如果有一种信念和他的观点发生抵触，这时要想争辩过他确实是很困难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许多问题几乎是根据当时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的，但是有些时断时续的重要争论，就远不是这样解决得了的。他甚至在和一个人讨论问题时也要进行激烈的辩论，而且他的强烈的决心使他的陈述听起来似乎是通情达理的。他同样也擅长使用幽默诙谐和哀婉动人的语言，并且还能引用远至希腊古典文学，近至唐老鸭<sup>①</sup>中的词句、老生常谈和有利的俚语，来支持他的论点。

我钦佩他，也喜爱他。他对这点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在争论中从不犹豫地利用我这种感情，想把我争取到他的思路上去。尽管他有强烈的意图，但在一些问题上当我们的意见针锋相对时，虽然我坚持己见，他却从来没有一次对我表示过不友好的态度，也从来没有对象我这样一个美国高级军官和后来担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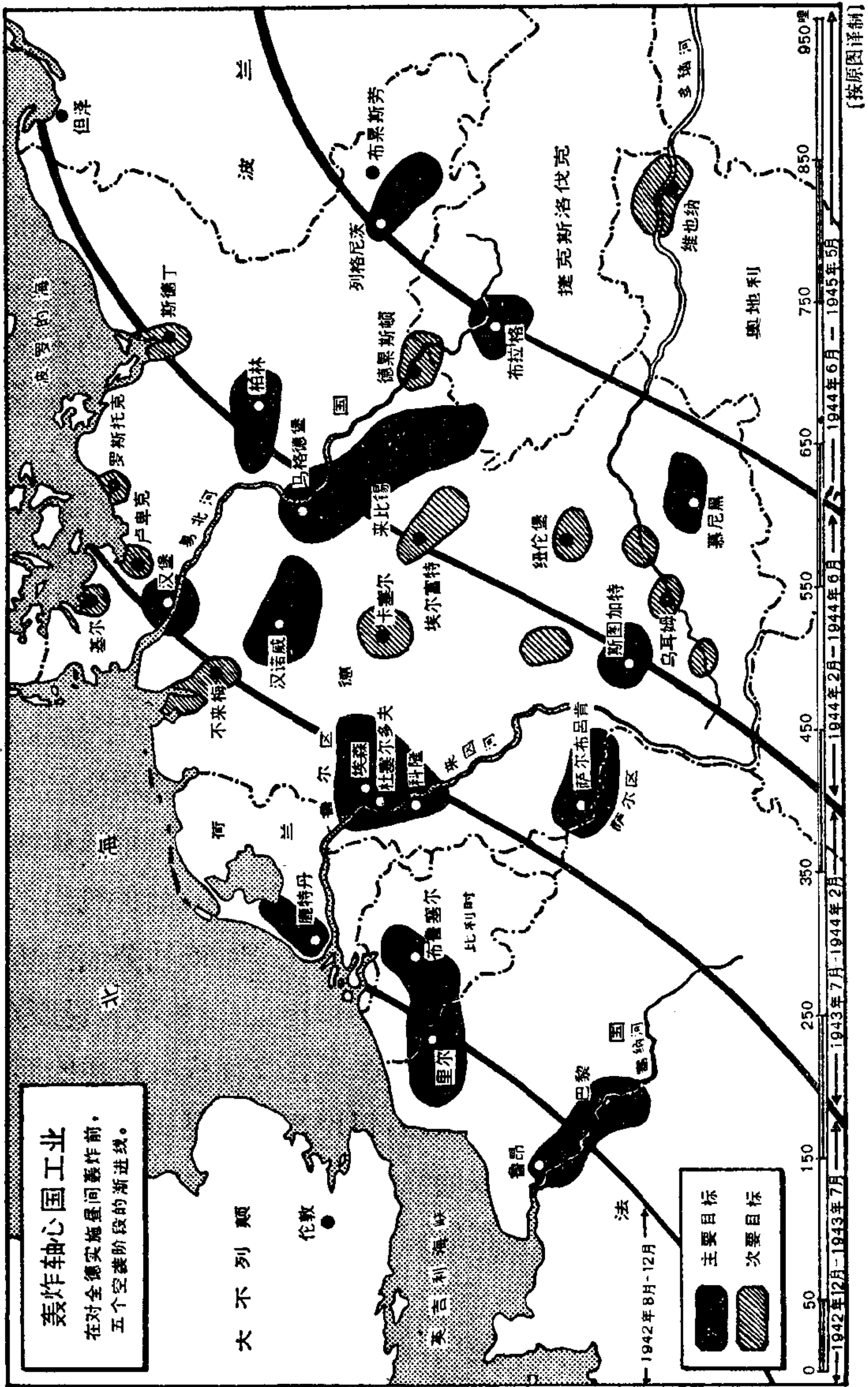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美国的一种通俗连环画和动画短片。——译者注

务的人表示过怠慢和不尊敬。他是一位对战争发展和军事史有深刻研究的专家,即使和他讨论纯专业问题,也不是毫无益处的。如果他违背心愿地接受了某个决定,仍会反复不断地进行争论,力争按照他的想法去做,甚至到即将执行的时刻也还不放弃这种努力。但当这个决定开始付诸实施,他就能忘掉一切原来的想法而前进,并且常常力图让英国提供比原来答应承担的更多的支援。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在我遇到的最重大问题中,我发现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与首相有抵触,但只要我在联合指令的范围内行动,他就无权干涉,除非对我进行说服或者全部推翻盟国的观念。然而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如果他不是那样伟大,他就会使我的工作更加艰巨;因此,尽管他对一些重要决定并不喜欢,但对他的一贯彬彬有礼和热诚支持,我始终表示无限感激。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我们的计划工作和建制工作有时会受到不同的民族主义观点的阻碍,它们经常冲击着我们的基本计划的真正基础。这些观点虽然在诚挚的和客观的气氛中讨论过,但仍然严重地存在。不论何时,只要我发现自己和首相的意见相对立,他的战时内阁和技术顾问必定是支持他的。这种分歧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自然的。各国地理条件的不同,会引起军事理论的不同,个人的战争经验也会给计划中的战略带来严重分歧。最初受到阻碍的一件事,就是计划如何使用我们缓慢发展的轰炸力量。

美国的陆军航空兵主张,把有严密防卫能力的空中堡垒轰炸机作为编制的中坚力量,以使用来实施昼间轰炸。我非常同意这个意见。每一架这类飞机都配备有十挺零点五零厘米口径的机关枪作为防御之用。我们相信,适当的密集队形可以集中猛烈的火力,这样,它们就能在它们自己的战斗机保护区以外继续前进并实施昼



[按原图译制]

间轰炸，而不致遭到过分的损失。

首相却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美国如果进行这种尝试，只能是浪费力量和资源。当然，斯巴兹将军知道，美国正在生产远程战斗机，这种飞机在他的第八航空队达到预定力量时就能使用。然而在最近几个月内，他的航空队只能使用P-39型和P-40型战斗机，这两种战斗机的作战活动半径很有限，大致在三百哩左右。首相敦促我们放弃昼间轰炸的全部想法，要我们开始为夜战训练空勤和地勤人员。当时英国的空战经验要比我们丰富得多。经过1940年整整一年的不列颠大空战，他们已经努力建成了一支轰炸机队，能深入德国心脏地区。但他们的经验只限于夜间轰炸，不然就会遭到无法忍受的损失。1942年5月30至31日晚，英国对科隆进行了第一次一千架飞机规模的大空袭，损失飞机达四十二架。

英国的轰炸机在白天实施这样的空袭行动，就会受到非常重大的损失。我们认为，这是由于设计这种飞机时注意了航程和载重，而忽略了速度和防御火力。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的弱点是航程很短，虽然在当时还算得上是最优秀的。英国方面也承认我们的空中堡垒编队拥有优势的防御能力，但还是认为，如果我们不迅速转入夜间轰炸，我们取得的结果将是损失惨重，而且劳而无功。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进行过长期的辩论，但谁也没有说服对方。进行昼间精确轰炸，如果成功，其效果要比夜间成吨投弹的面积轰炸好得多，这是公认的事实。最后，讨论集中在昼间轰炸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斯巴兹将军和我的立场受到美国参谋部的支持，我们坚决主张，在我们首先进行彻底而全面的试验以前，决不放弃我们的方案。

几个月后，最后的结果证明，双方的理由都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当我们的重轰炸机首先开始在战斗机航程以外编队作战时，它

们的防御火力之猛使敌人胆战心惊，所以在一段时期内，我们取得相当大的程度的安全。然而，德国人逐渐想出了新的战术和方法，开始集中大量的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机队，于是我们损失的百分比迅速上升。1943年6月13日，美国第八航空队的七十六架飞机在空袭基尔时，由于没有战斗机的支援，损失了二十二架。以后的一次空袭，在二百九十一架中损失了六十架。被击落的每一架飞机，至少要损失十名官兵。面对着这样高的损失率，如果远距离有效的战斗机得不到大规模生产，我们就不得不修改我们的轰炸计划，只能让飞机在黑夜或者恶劣气候的掩护下进入德国本土。

但在开始辩论时，这些经历尚未出现。我当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准备从地面进攻法国的途径时，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依靠精确轰炸行动。

这是进攻计划的关键。我相信，如果昼间精确轰炸行不通，那么对欧洲大陆的大规模进攻将要冒特大风险。因此，我坚决主张，即使只能在我们战斗机的极限范围内进行精确轰炸，我们还是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美国的武装部队，以便在对选定的进攻地区进行作战准备工作时能拥有一支必要的强大力量。

结果是美国空军仍坚持他们的精确轰炸方案，而英国轰炸机队则集中力量提高夜间轰炸效率。1943年1月，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最高一级上又提出了这个问题，讨论结果只是确认了早先的决定。

除了拟订建制方案和作战准备方案外，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制订一项军事计划来贯彻两国政府一致同意的战略观念。在那时，伯纳德·佩吉特将军还在指挥英国的国民军，必须从这支部队中抽调出英国的进攻的军队来。他的部队包括有好几个加拿大师，这些师是由安德鲁·麦克诺顿将军指挥的。萧尔托·道格拉

斯空军上将被任命为英国远征军空军司令。伯特伦·拉姆齐海军上将负责指挥英国海军。正是由于和这几位领导人进行合作，美国司令部才能着手进行拟订进攻欧洲计划的初步工作。

现在要回想起当时那种严肃的、甚至是吓人的气氛是困难的。那时的形势是：那么多服役和退役人员的想法反映着公众的思想状况。除去6月初在中途岛打败日本舰队外，盟国的运气一直不佳。只有从长远观点看，前景才是光明的，而且这一前景是否能实现，还要取决于美国在发展自己潜力的同时能否向俄国提供物质援助以使它在战争中坚持下去。此外，还有一点是重要的，即英国为了使两个主要敌人分离，并不让他们取得中东石油，而在印度和西部沙漠顽强地坚持着。

在1942年夏，虽然还谈不上乐观，但已经可以很有信心地展望光明前景的来临，到那时候，美国的潜力将得到充分发挥，三个强大盟国可以同时欧洲轴心国实施坚决打击。我们要求所有的高级司令部都应抱有这种信心。任何失败主义的表现，或者在推进工作时丧失信心，都成了撤职的直接原因，每一个军官都懂得这点。

5月份，我第一次访问伦敦时，对欧洲西北部沿岸发动进攻的战术计划还没有进行详细研究。对于部队、飞机、物资和装备的需要量都有待决定。总之我在设想：在1943年及早发动的一次突击，一开始要由英军担任主攻，可能有十个或十二个美国师支援。这个总的想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上的：那时英国有一支航空队经过加强后，能够提供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和起码的支援。此外我们还假定：那时英国在迅速运送我们所需要的各种两栖作战装备方面，能在物质上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也设想，美国能按规定运来足够数量的新师，以支持连续不断的进攻和扩大对敌作战的行动。

虽然我有这些总的设想,但还没有经过细致研究以形成明确的结论。就在这时,我应邀参加了英国参谋部举行的一次非正式会议。会议刚开始不久,他们就请我对拟议中的军事行动的性质谈一谈总的看法。当时,我是以一个被华盛顿陆军部指派的计划人员的身份发言的,还不知道以后会把我派往英国。我的讲话大致如下:“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任命一位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司令官。此人必须拥有两国政府能给与的一切权力。必须责成他拟订一项进攻欧洲的计划,这项计划必须保证进攻一定成功,或者至少在欧洲大陆上建立一条能够对德实施有力作战的坚固战线。还必须责成他立刻准备一个计划草案,并向参谋部提出所需要的各种部队以及海、陆、空三军所必需的各种额外装备。”

会上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么您希望提谁担任远征军司令官呢?”

当时我还在想,在1943年初的军事行动中,在开始阶段,英国必须提供大部分部队,因此我回答说:“在美国,我曾听说有一个人许多月来一直在深入研究两栖作战。我知道他现在担任着联合作战处处长的职务,他就是蒙巴顿海军上将。有一位司令官总比没有强;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不能在委员会指挥下进行。此外,我还听说,蒙巴顿是一位精力旺盛和机智勇敢的人,如果这一军事行动在开始阶段主要由英国部队担负,我估计他是能完成这项任务的。”

我的讲话在令人惊奇的沉寂气氛中受到了欢迎。布鲁克将军接着说:“将军,您可能还没有和蒙巴顿海军上将见过面,他就坐在您的对面。”我在参加这次会议时没有认出他来,尔后又又在讲话中提到了他,这自然会使我们一时处境尴尬。但我仍坚持我的看法,并回答说:“我还是认为成功的关键是指定一位司令官,并给与他必要的职权和责任来制订计划和进行作战准备工作,否则这项任



务永远完成不了。”

这只是一次交换意见的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不用说，蒙巴顿海军上将从此就成了我的热诚的和坚定的朋友。

在我被委派常驻伦敦以后，就开始和有关司令官举行一系列的会议，来审查这一计划中军事行动的各种详细需要。在一般情况下，参加会议的有佩吉特将军、拉姆齐海军上将、道格拉斯空军上将、斯巴兹将军、蒙巴顿海军上将和我，另外还有双方的有关参谋人员。我们之中谁也没有权力，所以谁也不能作出决定性的行动计划。我们还连续地讨论过十几种对战略、战术、建制和供应有影响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军种和个人都抱有成见，加之对空军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的有效性持有不同看法，所以这些讨论愈来愈复杂了。

但是通过这些研究和会议，美国人更加充分地了解到在对欧洲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时所涉及的有关战略、战术和后勤等问题的详细情况。我们和英国的各情报部门打了交道，精确地了解到英国陆、海、空三军的力量和任务。要想进一步动员相当大数量的英国人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人力，包括十八至五十二岁的妇女在内，都已经充分地组织起来了。

我们还了解了不少事情，促使我们大大地修改了我们对这个军事行动的一些早期的总的想法。首先，英国的空军，不论在飞机的类型上和数量上，也不论在人员的训练上，都还没有装备到足以去进行空中紧张的作战准备工作，而我们认为这种准备工作是使进攻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其次，由于英国舰队必须保留下来准备随时应付德国水面舰队突击的任何威胁，所以不能为顺利登陆提供大量必要的直接支援和猛烈的海军炮击。

英国的陆军力量也大为分散。考虑到他们在印度、中东所承担

的责任，还有在西部沙漠的危急处境，他们对这一新的进攻可能提供的部队不会超过十五个师。最后，我们发现，英国所拥有的必要的登陆艇、专门装备以及物资的大量储备，并不比我们富裕。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只有当美国在一开始参加这一军事行动就能提供至少与英军兵力相等的必要的陆、海、空力量，接着又能提供所需要的大量陆、空部队时，才能对欧洲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否则是毫无希望的。此外，在美国工业能提供大量必需的特种装备和物资以前，也不可能采取进攻行动。

美国司令部对于在1943年初春发动全面进攻一事愈来愈怀疑了；而且由于在这一年秋季横渡英吉利海峡去发动一次大的军事行动是极端危险的，我们开始明白，在1944年春季以前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这是一个想起来就令人苦恼的前景。这不仅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参谋部来说是如此，而且对两国政府的首脑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们不但担负着指导生产船只、大炮、坦克和飞机的工业活动以及动员数百万人员的责任，也还必须在备战时期保持公民的士气。此外，大部分延误的原因不能公诸于众，因为如果这样做，就会暴露我们当时的弱点，更会加重由于日军侵略的迅速推进以及夏初英军在沙漠地区的失利而引起的十分浓厚的悲观失望情绪。

参谋部至少已经清楚，在1942年不可能对欧洲西部大举进攻。我们主要通过可靠的参谋军官给马歇尔将军带口信，让他知道我们所作的结论。1942年7月中旬，马歇尔将军和金氏海军上将来到伦敦和英国参谋部会谈。他们了解到，还需要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对欧洲西北部沿岸发动全面的浴血决战，于是进而讨论了从这一认识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他们必须慎重考虑以下这些因素：

英、美两国将要联合实施的这个一致同意的巨大战略行动，由于缺乏部队和装备，最早也不能在 1943 年末以前实现，并且由于这一年秋季是发动这场战役的最不利的时刻，因此，未来的欧洲登陆日，如果情况不发生预见不到的大变化，可能要推迟到 1944 年春。

俄国坚决要求英、美在 1942 年期间采取进攻行动，因此，当时有过一个重大忧虑，即如果英、美不采取这一行动，俄国战线可能产生最严重的后果。

如果在 1942 年不采取某种积极行动，美国、英国及欧洲各被占领国将会产生简直是灾难性的心理反应。

1942 年不论采取什么军事行动，其规模一定要比计划中的进攻欧洲的军事行动小得多，并且尽可能不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并使最后的主要军事行动成为可能的生产计划和备战计划产生严重的干扰。

总统特令美国参谋部于 1942 年对欧洲地区发动某种地面进攻行动。

鉴于这些情况，有三条行动路线似乎应予认真研究。

第一条是绕道好望角直接支援中东的英军，争取摧毁隆美尔的部队，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牢牢控制住地中海中部。

第二条是准备两栖作战部队夺取非洲西北部，以期进一步向东发动军事行动，置隆美尔于一个巨大的钳形包围中，最后开放地中海以供盟国使用。

第三条是用相当少量的部队在法国的西北沿岸发动一次有限的军事行动，但其目的只限于夺取一块能抵抗得住德国进攻的地区，然后在那里构成一个桥头堡，以供两国一致同意作为最后目标的大规模进攻使用。预定地点是科汤坦半岛或布列塔尼半岛。我们把这个计划中的军事行动称为“大铁锤”行动。

当时，看来没有其他行得通的路线了。这些讨论是旷日持久的

和耗人精力的。美国人当时思想上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严重怀疑英国不愿考虑这项一致同意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计划,并怀疑它对大举进攻欧洲西北部是否切合实际这一点在思想上有很大保留。因此,当大举进攻遇到各种阻碍,并且阻碍越来越多时,虽然我们不能为一项无所作为的政策作辩护,但是我们也不赞成看来极力想使我们为一项我们所不相信的战略承担无限责任的任何方案。我十分清楚,英国真正担心的是当时被称为“围捕”的这个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重大冒险行动,这点不但丘吉尔先生经常谈到过,而且佩吉特将军还特别明确地表示过。马歇尔将军由衷地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就是当时正在举行的伦敦会议不论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我们必须从英国方面取得对横渡英吉利海峡战略的明确保证。

经过对这些意见的考虑,我当时赞成第三条行动路线,即在法国西北部沿岸夺取一个小的桥头堡。然而,我告诉马歇尔将军,这是一项冒险计划;同时还告诉他,我赞成这项计划的唯一真实原因是我看到在别处忧虑愈来愈大,以致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大规模进攻会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甚至有可能被取消。几乎可以肯定,1942年在地中海区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会排除1943年进行横渡英吉利海峡的主要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后来形势的发展使我相信,那些认为“大铁锤”行动不策略的人,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1942年,我们的航程有限的战斗机在科汤坦半岛和布列塔尼半岛上空还不能提供足够有效的空中掩护来对付当时的德国空军。至少,这个军事行动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另外一个理由是,从西北非的战斗中产生了一些对盟国有利的形势,这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能感觉到,而且在1944年真正发动进攻时,还能在物质上帮助盟国去赢得巨大胜利。如果我们当时占领了瑟堡,也得不到多大的好处;这项计划的可取之处只是马上能

开辟一个小型的“第二战场”，并且能按照以后我们发动全面突击的方向和路线实施最早的进攻。

无论如何，联合参谋长会议首先作出了结论，认为企图直接增援当时在埃及的第八集团军不但是无益的，而且也是不经济的。关于这点，伦敦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因此，英、美两国的参谋部，必须于1942年7月下旬在进攻非洲西北部和夺取法国西北部沿岸的桥头堡两者之间作出抉择。

就我所知，并没有发生起因于民族主义路线的争论。历次会议的目的，只是为1942年要采取的联合行动寻找一条最有利的路线。

7月24日，决定着手拟订一项计划，考虑在一位美国司令官的指挥下，用一支装备齐全的盟国军队对非洲西北部实施进攻。这一军事行动的代号是“火炬”。7月25日，总统批准了这项计划。两国政府同意，全部军事行动至少在开始时完全由美国人担负。这样做是希望法属北非对进攻军队只在形式上抵抗一下，并且如果人们知道这一军事行动完全是由美国人实施的，那么这个顺利发展的战局，前途将会光明得多。由于在奥兰、达喀尔和叙利亚的一系列事件，英、法两国部队曾发生过公开冲突，所以英国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威信扫地了。

7月26日，马歇尔将军在他设于克拉里杰旅馆的司令部中通知我，我将担任盟国远征军总司令。他说这个任命虽然已经决定了，但还需要一段不长的时间办理正式任命手续。8月份，联合参谋长会议的一项指令正式任命我为总司令。

进攻北非的决定，需要彻底扭转我们的想法和果断地修改我们的计划和作战准备方案。我们原来指望会有许多个月让我们按程序进行集结兵力的工作，而现在只有几个星期。计划中的远征不是横渡狭窄水域的集团攻击，而是一个需要跨越辽阔的海洋区的

行动,并且在那里敌人的潜艇会构成真正的威胁。我们攻击的目标也不再是一个范围狭窄的战线(那里的地形、设施和人民我们了解得很准确,这些因素对军事行动都有影响),而是一块大陆的边缘,那里数百年来没有发生过重大战役。我们还没有一支打算用来袭击欧洲的空中力量,而我们已有的空军大部分要集中在直布罗陀这个单独的、非常脆弱的基地上,而且必须在交战开始时就要立刻取得重大胜利。我们可以在诺曼底守住一个滩头阵地,并且可以使它逐渐扩大,尽管速度缓慢些;但在非洲沿岸甚至连保持一个滩头阵地也不可能。

在攻击的目标、时间和环境方面所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对那些相信只有针对敌人的大陆要害地点实施进攻才能取得胜利的人,可能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然而使人感到幸运的是,进攻非洲的决定,并不等于或者意味着联合参谋长会议放弃了他们的这个决定,即如果时机成熟就通过横渡英吉利海峡之途进攻欧洲。这个非洲军事行动是牵制性的,也是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和希望从中取得巨大的收获。在这些收获中,最低限度是不让轴心国把非洲西北部用作潜艇和空军的基地。其次,希望通过向东推进使马耳他岛得到解救。我们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已表示了这个最终希望:在北非全部肃清轴心国的力量,并使盟国的护航舰队至少可以使用地中海南岸,这样在驶往中东和印度时,就不必采用绕道好望角这条遥远的航线了。

令人奇怪的是,有些军官认为,即使我们把隆美尔赶出非洲,我们还是不能利用地中海,因为德国人在欧洲南部仍会有飞机。有一位美国陆军中将在战争开始时就坚信,利用地中海的任何希望都纯粹是幻想。甚至在我去伦敦以前,他好几次敦促我抑制这种企图,他还把这种打算称之为“痴心妄想”。这种悲观失望的观点受到

了海军——尤其是英国海军——直率的驳斥。海军坚决认为，只要在非洲北岸给他们提供一些以陆地为基地的战斗机，他们就能确保护航舰队通过地中海而不遭受异常损失。

在作出进攻北非的决定后，马歇尔将军和金氏海军上将立刻飞回华盛顿，而我继续指挥欧洲战区的美军。但是这时我又承担了组织和领导盟军进入非洲西北部的任务。

我们显然已经开始接触到了这一类的盟国问题，这类问题将在今后的全部战争期间占去我和我的亲密同僚的注意力。

## 第五章

### 制订“火炬”行动计划

第一项任务是挑选美、英军官来填补进攻非洲所需的指挥机构和参谋机构中的各个关键职位。

在现代战争中，作战地带往往伸展到长达数百哩的战线以及同样广阔的纵深。在这整个战区之内，有战斗部队、补充兵员营、医疗中心、交通线、修配车间、军需仓库、港口，以及无数为空中和地面的部队服务的机构。在同一区域内还居住着一部分平民。这些平民的态度有时是友好的，有时是敌对的，有时则是中立的或是忽此忽彼的。所有这些机构、个人以及全部活动必须小心地加以控制，以便使一切都能为完成司令官的战略计划而协调一致。即使当所有这一切都已完成，最高司令部的任务仍未结束。战区司令官所需的一切都是来自后援国家。在他的参谋人员同其后方的各政府之间，每天交换着千百封函电，叙述着有关计划、估计、损失、要求、个人、运输，以及其他为达成上级所指定的目标所必需的一切事项。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所需的军事方法和军事机器已变得如此异常地错综复杂，以致高级司令官们必须拥有庞大的参谋队伍才能进行控制和指挥。由于这一点，有时候就有人认为个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已变得不突出了，一位负责军官的错误可以在大量助手的集体行动中得到纠正或者被掩蔽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现在个人进行工作时与过去不同，确实，今天一位有成就的军



官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他有能力不断改变他的工作方法，甚至改变他的思想方法，以适应在国家自卫感的迫使下发挥作用的现代科学不断给战场带来的变化。然而个人的特点在战争中却比以往更为重要。理由很简单。如果说那个威灵顿将军<sup>①</sup>恰巧是一个暴躁而不易接近的、最乐于对陆军部冷嘲热讽的人物，那并不算什么重大事件。他是唯一的首脑，他了解整个战场，而且他是通过一小群幕僚，几名助手和传令兵指挥作战的。只要他有足够的毅力和勇气作出决定并且坚持不渝，只要他的战术技能始终能应付他那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的要求，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司令官。然而现代司令官所赖以了解情况和借以运用权威的工作人员和参谋人员必须是一个配合得非常巧妙、运转得非常妥当的机构。全体人员最好几乎是一个思想；不称职的人员往往会使指挥机构的意图无法实现。而指挥机构的意图，对于庞大的陆、海、空部队和后勤部队的供应和管辖都是最重要的。这些部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对付敌人。高级司令官和参谋人员的个性都特别重要。高级军事职务所永远需要的专门军事能力和坚强性格，时常被恶劣的特殊作风所损害；有两种最常见的、有害的作风，其一是过分热衷于沽名钓誉，其二是妄以为表达意志的力量在于举止傲慢，甚至于盛气凌人。一位军人曾说过，一个确信自己脚底下扎实的人是不需要骑马的！

责任司令官作出基本决定之后，便由参谋人员去据此制订计划。制订计划的过程，如果是一项涉及陆、海、空三军行动的巨大的作战任务，有时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这些计划最后必须以

---

<sup>①</sup> 阿瑟·韦尔斯利·威灵顿 (Arthur Wellesley Wellington, 1769—1852)，英国的军事统帅和反动政治家。在与拿破仑一世作战时，曾在比利牛斯半岛和滑铁卢会战中指挥英军。1828—1830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事实和睿智的结论为依据,而且一旦制定,就必须内容明确,固定不变。只有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不得不修订时,才能允许偏离基本概念。因此,高级司令官必须冷静沉着,头脑清楚,刚毅坚决。在他所指挥的一切方面,尤其是在指挥盟国部队方面,他的成败更多地是取决于他的领导能力和说服能力,而不是取决于他能墨守指挥常规。这一真理在必须树立信心——这种信心不但会传回给国内的政府,而且也会传送到整个部队——的时刻特别显得适用。可是每当任何事件或问题需要司令官运用并维持其权威时,就必须坚持要求迅速及时和不折不扣的服从。

一件在早期发生的、幸而不是太重要的、危及安全的事情——一个美国军官饮酒过度——使我觉察到需要对被委派到每一个重要岗位上去的人员的习惯,加以特殊的留意。光有忠诚和效率还不够——谨慎、可靠和自制都是必需的。凡是比较不熟悉的或未经考查的人员,都请我们的工作效率很高的特工组织来进行秘密调查。我个人的全部僚属,都在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的情况下,受到了几个星期这样的审查和考察。这一问题关系过于重大,不能依靠碰运气;甚至连汽车司机也偶然可能听到一些对敌人有价值的消息。

在筹划、成立和组织我的参谋部的过程中,我们是从似乎参谋部全体人员都属于同一个国家这样的观点出发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量使每一个部门都既有美国国籍的人,又有英国国籍的人。由于两个国家的人事手续不尽相同,也不得不对正常的美国编制作某种修改。在早期,两种国籍的军官们在办理公务时,往往容易显出一种牛头犬碰上了公猫的态度,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自己发现,相互尊重和友好关系已逐渐造成了这样一支协作队伍——其目标一致、忠于职守以及没有磨擦的程度,即使其中全部成员都来自同一国家、同一军种,也是无法超越的。

由于有可能因意外事件使我无法执行任务，特别是在这个军事行动的最初阶段，因此当时就决定我的副手最好也是美国人，以便让人们说这次作战实际上完全是美国的军事行动的虚构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下去。被任命担任我的副手的是克拉克将军，他已经来到英国，任第二军军长。他比较年轻，然而却是一个非常能干的职业军人。他有一种善于挑选胜任的助手并在他的僚属之中激励士气的才能。克拉克将军在“火炬”计划制订阶段一直担任副手，并且在史密斯将军于9月初抵达之前，还担任参谋长。“火炬”计划是盟军在地中海区实施的第一个两栖进攻计划，在完成这项计划的细节时，克拉克组织了有效的协作，在这方面，他所尽的责任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考虑到1942年8月初我们在伦敦所遇到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决意要在那一年发动一场认真的进攻，在进行准备工作时就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夏季已近尾声，适合于作战的天气即将消逝。时间是如此紧迫，以致不允许有把计划制订得尽善尽美的机会——称心如意只能成为一种理想。

有上千个问题必须同英国运输部、调动处主任、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海运处主任，以及首相本人密切配合才能解决。在美国，也同样牵涉到这些过程。这个军事行动是前所未有的，它在概念上也几乎是全新的。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政府曾经试图完成那样一次从基地跋涉万里、并以一场重大的进攻为归结的海外远征。

我们最早碰到的、也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之一，便是确切判明哪些陆、海、空部队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加以利用。一般情况下，一个司令官会随着一项总的目标的确定，接到一份具体的部队分配情况报告，然后据此拟订他的战略计划，并辅之以详细的战术计划、

编制计划和后勤计划。而在这一次，形势不清楚，兵力和供应的总数不知道，最终目标不明确，整个事情中唯一的肯定因素是我们的进攻指令。我们仍处在一种匮乏的境况中；任何东西都谈不上丰足。当时的一本日记还摘录有数十封大半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函电，其内容都是关于能否得到美国陆、海、空部队这个问题的。美国海军特别不愿意对它能为这场远征提供多少舰艇一事作出肯定的估计。我们必须在其中进行工作和筹划的环境，正是这样一种伤脑筋的、捉摸不定的环境。

要把我们在1942年夏末和秋天所面临的全部问题作一叙述，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讲，可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却必须一起解决。大兵团战略、战术、登陆艇和船只的获得、海军后援部队的分配、空军部队的编制、出国部队集中地和训练集中地的准备、前期与后期给养的安排、对每一支进攻部队的每一个单位的实际组合作出决定等等，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一步接一步地在同一时期加以处理。其中任何一件事出了毛病便会马上使所有其他的事也都出毛病。

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决定进行攻击的地区和动用的力量。早在1942年1月，我们两国的政府曾考虑过一项称之为“体育家”的计划，即由美国仅仅进攻卡萨布兰卡的计划，可是后来把它撂在一边了。那项计划的目标仅仅是别让西非充当纳粹的潜艇基地。后来，把最初的“体育家”计划的范围扩大到和英国一起对地中海区发起一场进攻。附带插一句，这里我应该指出，在所有以后进行的战役中，我们从未在西非发现过任何证据，表明那边海岸上的港口曾被纳粹用作潜艇基地。

在为我们这场远征选定登陆地点时，首要的考虑是，从我们的护航舰队进入敌轰炸机航程内直至登陆完成为止的这一时期，能

否为它们提供适当的空中掩护。危险区域包括西至直布罗陀海峡的西地中海,而针对敌人的远程轰炸机而言,危险区域甚至还要遥遥向西延伸。我们无法得到很多的盟国航空母舰,从我们在地中海的全部经验来看,我们所得到的航空母舰,的确在任何时候都未能超过两、三艘。

提供空中掩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得由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来负担,而唯一能从那里起飞的可资利用的基地只是直布罗陀。这就使直布罗陀成了我们的空中掩护幕的焦点,而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划定了我们能用水面舰艇安全驶入地中海的距离。能得到的舰艇的数目限制了能被运送的部队的数目,而海军护航和后援船只的不足又把我们的进攻限制到三个主要地点;在制订计划的最初几个星期中,看来我们被限制为只能在两个地点进攻。

我们曾在力所能及的最大范围内,指出了四个重要港口或港口地区作为理想的目标。它们从西往东依次是:大西洋海岸的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以及地中海的波尼地区。对宾泽特—突尼斯城地区作一次成功的直接登陆将会获得巨大成果,可是那个地区远远超出了战斗机支援的航程,而且由于英国驶往马耳他的护航舰队曾经有过几遭覆没的经验,这项特别计划就被认为是超出了正当的冒险范围而很快地被放弃了。

然而,若能尽早占领宾泽特—突尼斯城地区,还是极其有利的,因为那样我们便能救援马耳他,并从陆、海、空三方面袭击隆美尔的供应线,这样就能保证非洲之战取得最后胜利。

位于这条线的另一端的卡萨布兰卡,在当时其重要性仅在于两点理由。第一,卡萨布兰卡是蜿蜒于阿特拉斯山脉的那条向东穿过奥兰、阿尔及尔,最后直到突尼斯的漫长而破旧的铁路的终点。这条铁路的运输量虽小,但若敌军决定从同它友好的西班牙挥戈

南下，并以轰炸机和大炮使直布罗陀海峡不能被我军用于给养目的，那么这条铁路却能为我军提供一条微弱的生命线。如果没有这条破烂的、从卡萨布兰卡通到奥兰的铁路，所有进入地中海的部队都会被截断归路，甚至想突围都要冒极大的危险。

卡萨布兰卡之所以重要的另一点理由是，在那个地点强行登陆必然会对西班牙和摩洛哥的部落民族产生影响。要是我们不在那里登陆，那么法国的维希政权就很可能把那些好战的部落引向我们发生公开冲突，而这种局面几乎肯定会给西班牙更有力的理由去站到轴心国一边进行干涉。

卡萨布兰卡方案还联结着一种不寻常的作战方面的危险。从小舰艇登陆的观点来看，非洲的西北海岸在整个晚秋和冬季形势险恶，大西洋的滚滚波涛在海滩上猛冲狂击，就连天气比较好的秋季平均每五天中有四天也是这种情况。从海军的观点来看，在这里作战所冒的危险要比在地中海大许多倍，在地中海可以期望天气比较好。

根据第一点理由可以清楚地看出，不管哪种作战计划，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是势在必夺。这两地都是重要港口，而且奥兰附近的飞机场对于日后的作战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对从直布罗陀直到前线一带——不管这些前线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施用短程战斗机时更为必要。阿尔及尔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中心，其重要性更不必说了。

因此，如何确定突击的侧翼，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一个方案是可以进攻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另一个方案则是进攻奥兰、阿尔及尔和波尼。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真地研究了很久。我个人终于赞成把全部兵力开进地中海。我相信，突尼斯城这个战利品是如此之大，以

致我们一开始登陆就应尽量选一个位于东面的、象波尼那样的地方。无可否认的是，若不在卡萨布兰卡建立起一个基地而想开进地中海，必然会冒额外的风险。可是我觉得既然我们已经在冒着不小的风险，那么不如孤注一掷，相信卡萨布兰卡在其东路被切断之后会自行陷落，要不就会被从奥兰沿铁路转回过来的纵队攻克。我脑子里也很想避开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必然会碰到的自然条件方面的巨大危险。

我们把这一计划传送给了联合参谋长会议，发现美国的参谋部反对从原先的进攻计划上抹掉卡萨布兰卡。他们认为光依靠直布罗陀海峡作为运输线所冒的风险太大，而且认为，尽管卡萨布兰卡—奥兰铁路的容量有限，我们还是一定要迅速占领它，以之作为万一轴心国对直布罗陀这条狭窄通道下手时的部分补偿。而且，他们还相信，除非马上派一支强大的部队在摩洛哥登陆，不然的话，西班牙非常可能参战，或者允许德国人利用西班牙作为过道来包抄我们的后方。反对在波尼作战的另一理由是怀疑我们在距离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轴心国空军部队如此近的地方提供足够的空中掩护的能力。后来在那个港口以及其他邻近的港口因敌军的轰炸机所招致的损失，似乎对这一怀疑的正确性给予了支持。由于联合参谋长会议的这一决定排除了一开头便攻打波尼的可能性，往后任何从阿尔及尔向东的进军只能以陆地行军，加上从当地对沿着指向突尼斯城的海岸上的一些较小港口发动海上攻击来完成。

就我的记忆所及，在整个战争中，这是上级领导进行干预从而使我们对所提出的作战计划作了部分修改的唯一例子。我们对决定欣然接受，因为这个指导意见侧重考虑的是政治方面，不是战术方面，而政治方面的估价，则是政府的职责而不是军人的职责。不

过，我们还是指出，按照这项决定，早日占领突尼斯城的可能性已从眉睫之下推移到远处去了。

下一项重大的问题是决定进攻的时间。气象报告指出，从初秋开始，天气将不断恶化。因此，时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重要问题了。一切都要按尽可能早地发动进攻来作准备，为此，甚至当海、陆、空部队达不到所期望的实力时也应在所不顾，因为若要获得更强的实力以求作战胜利，就会意味着贻误战机。

在组织这场攻势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对北非政治局势的估计。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美、英两国政府都已对之研究了相当长的时间。两国政府都认为，远征部队应该尽可能做到从外貌上看去完全是美国人，不过又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要让远征部队在人力方面众多到足以使当地的法国政府和军事司令官们能合乎逻辑地向维希政权和它的纳粹主子诉说遇到了“压倒优势的兵力”，从而以此为借口立即投降并在以后实行我们所希望得到的合作。

策划这场远征时的根本设想是希望西北非的法国军队、官员和人民会不动干戈而让我们开进去，并同我们一起向德国进行共同战斗。然而，从1940至1942年的政治历史中找不到任何迹象能表明情况将会照此发展；这与其说是一种期待，毋宁说只是一种希望而已。最后我们不得不作好对付估计兵力总数会达到二十万之多的准备。可是我们两国的政府在指示中明确表示，我们应当努力在北非培植盟友；我们的行动不能显得象是在征服一个敌国，除非法国人的持续抵抗迫使我们采取那种态度。一切可能导致非洲的法国军队同我们联合起来的考虑都被纳入了我们的计划，包括在进攻初期即行发布的公告和宣言中如何斟酌字句。

要使进攻部队全部拥有美国面貌，这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是非常容易做到的。进攻卡萨布兰卡的全部队伍将直接从美国运来。



进攻奥兰的有美国第一步兵师及美国第一装甲师的一部分，两者当时都驻扎在英国。由于运输能力不足，无法直接从美国调来更多兵力，唯一能派去进攻阿尔及尔的美国军队是当时驻扎在爱尔兰的第三十四师的一部分，加上美国第九师的一个团和一个突击营。要是真碰到认真的抵抗，这一点兵力是不足以完成任务的，而且英国的后援部队又是那样地分散在登陆地带，它们只能在少数几处地方真正发动连续突击。

显而易见，在最初登陆后不久，非洲的法国军队和当地人民就会知道英国也参加了这个行动。不过我们相信，只要能够入境，并且能迅速而清楚地证明我们的友好态度，那么可能发生的复杂事情将会减少。我们的队伍和车辆将会由美国旗帜来标明。

经过研究、审议、核对、再核对，最后定下了进攻计划的要点，不管具体细节怎么变动，这些要点大家是严格遵守的。我们将进攻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美国部队将在摩洛哥保护我们的后方，而英国部队在尽速登陆后碰到局势许可的情况下，将冲往突尼斯城。

我向马歇尔将军提出报告，表示极希望让巴顿将军来指挥对卡萨布兰卡的进攻。不久，乔治<sup>①</sup>便到达伦敦向我报到。我在那里向他详细介绍了进攻计划中由他负责的那部分情况。他一回到华盛顿就发给我一份电报，说他已被卷入一场同海军部的可悲的争执，以致他们正在认真考虑解除他的指挥职务。我有把握地感到，这场争执不论其性质如何，无非是乔治那种生来喜欢使事情戏剧化的性格所造成的。我马上表示反对，建议说如果他的性格在会议上会造成困难，那么可以这样来解决问题，即让他随同部队一起

---

<sup>①</sup> 即巴顿。——译者注

出征,而让参谋部某个成员来代表他完成计划的细节。不管怎样,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我很知道巴顿喜欢以离奇的发言来使他的听众吃惊;很多自以为了解他的人,从来没有看透过那层他一直小心地用来掩盖自己而显得善于引人注意的外壳。他本质上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军事领袖,一贯得到下属的爱戴。从早年起他的一个壮志便是成为一个成功的战地指挥官,因此他不倦地阅读军事史,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都是过去时代的伟大将领。

他所表露的一切奇习怪癖都是他自己有意形成的。举例说,他有那么一种姿态,使自己象是军队中心肠最硬的人。实际上他心肠很软——尤其是在关系到私人朋友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他的一个最大缺点。在战争后期,有一次他强烈地要求我把他属下的八十名军官撤职,其原因据他说,是因为他们无能而且胆小到近乎懦怯。他是那么忧心忡忡,那么固执己见,以致我只好表示同意,但要他给我一份书面报告。他显然对我的让步感到惊异,便以这种或那种借口,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拖延着他的报告。最后他不好意思地承认,他经过重新考虑后,又不想撤他们之中任何人的职务了。

进攻奥兰的中路机动部队是美国第二军,由劳埃德·弗雷登道尔少将指挥。我仅仅在非洲作战计划开始前不久才认识他,不过他作为一个良好的训练者和组织者的声名是无与伦比的。

受命去占领阿尔及尔的东路机动部队的编制相当奇妙。为了要保持进攻部队的美国特色,这支机动部队归美国第三十四师师长查尔斯·赖德少将统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建立过光辉的战绩,并由此获得火线擢升,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升至中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中也一直享有完美的军人声誉。他品性纯正,在战斗中果敢骁勇。赖德将只指挥这次进攻直到占领该城市为止。一旦

我们的东路机动部队站稳了脚跟，指挥权就将移交给指挥英国第一集团军的肯尼思·安德森中将。他的任务是以局势所许可的最快速度东进，努力夺取突尼斯城。安德森中将是一位勇猛的苏格兰人，忠于职守，极富忘我精神。他诚实、坦率、直言不讳到有时候几乎是粗鲁的程度，而奇怪的是这种气质似乎使他同他的英国同仁比他同美国人发生更多的冲突。他的真正难题可能在于腼腆。他不是一个人有名望的人，可是我对他的战斗雄心竭诚敬仰。连批评他最凶的人也一定会发现很难贬低他最后在突尼斯城赢得的绝对胜利。

从开始设想进攻方案时起，我们两国政府就仔细考虑了让当时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参与“火炬”计划的可能性。他统率的部队曾经参加过那次倒霉的达喀尔远征，到头来进攻部队面对着当地法军的抵抗，不得不在一场混乱中撤退。英国人一直认为这场溃败的原因是伦敦的戴高乐司令部泄了密。两国政府给我们的指示也许已染上了早些时候那次不吉利的经验的色彩，要求在任何情况下，有关拟议中的远征的任何消息都不准传达给戴高乐将军。

有一个情况可以证实这种假定，即戴高乐参与最初的突击部队将会在法国驻防部队中激起坚决的反对。当我们在伦敦制订计划的整个期间，从国务院在整个战争期间留驻非洲的领事和其他官员那里，经常不断送来情报。所有这类情报都是说戴高乐当时在法军的正规军官团中间是被视作一个不忠的军人的。他在平民中的抵抗分子那里的名声则大不相同了。可是在那时候，抵抗分子，尤其在非洲，是无声无息、不起作用的，我们必须把武装部队作为首要的争取目标。

戴高乐不为法军的普通士兵所喜爱是可以理解的。当法国在1940年投降时，军队中的军官曾接受了他们政府的看法和命令而

放弃了战斗。在他们看来,如果戴高乐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话,那么每一个服从其政府的命令的法国军官便成了懦夫了。如果戴高乐是一个忠诚的法国人,那么他们就必须把自己看成是胆小鬼了。军官们当然不愿这样来看待自己;他们宁愿把自己看作是执行根据宪法产生的文官政府的命令的忠诚的法国人,因而他们不论是公开或是私下都把戴高乐看作是个逃兵。

不管怎样,据了解,在北非是存在着一股强烈的反对德国和反对维希政权的情绪的,甚至在某些陆军军官中也是如此。人们相信,如果我们在一开始的进攻中就充分显示了力量,那么所有这些军官都可能在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而自尊心得到满足后,顺天应理地参加到抗击曾在1940年屈辱过他们的传统敌人的战斗中来。形势是复杂而模糊的,可是把远征计划向伦敦的法国人严格保密却是盟国政府的既定方针。这样做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动机是,只有完全出其不意,才能使远征成功。关于这场远征行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在拟订这一军事行动的计划时,每天都产生新的困难。例如,妨碍了向俄国的海运便是这些麻烦问题之一。要及时地把舰艇从海路上撤回来重新修整、装备、集结,并进入地中海,必然会严重削减通往摩尔曼斯克的护航舰队;这种妨碍早在1942年9月便开始了。英国和美国的其它主要海运也会受到同样影响,但这是实施军事行动所无法避免的代价之一。

另一件麻烦事是所有最早运到英国的美国供应和装备,都是准备供给最后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时用的。由于当时迫在眉睫的考虑是迅速卸货以便加速船只的周转,那些供应和装备都被扔在仓库里和露天货场上,而没有顾及把它们分门别类和编造清册。我们曾以为,随着部队编制的发展,会有空闲时间来办理这些事项。

现在我们却突然碰到这样一种境况：急需利用我们已经运抵这里的那些东西，可是却缺乏一份可以据以在最短期间把所需的供应挑选出来、打包装箱、并装货上船的必需的记录。我们本该更多注意一些“繁文缛节”和文书工作的。

还有一件牵连到我们的空军的麻烦事。在1942年夏，我们在为指挥对德国的空军行动而建立一个配备有战斗机的轰炸机指挥部方面，只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相当数量的空军部队不得 不被匆匆调离它们原来的任务，接受重新训练，并按照参加进攻非洲的要求而进行改组。某些美国战斗机队的编制不得 不以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来配备。在英国国内运输系统方面，在利用英国的拥挤的港口方面，以及在训练地面部队方面，都发生了同样的问题。

每星期我们都接到有关敌人的潜艇击沉或击伤我们舰艇的报告；这些舰艇是已被列入我们运送军队、装备和供应的计划的。每沉掉一艘船都迫使我们 对作战计划和战术计划重加修订。

所有这些事都要求经常举行会议，通常是同驻英国的战术参谋部和战术服务处的成员一起举行，可是也时常同首相一起举行。在这段时期，在首相的请求下，我习惯于每星期同首相会晤两次。每星期二，我们在唐宁街十号一起用午餐，通常在场的是英国参谋部或战时内阁的一位或几位成员。每星期五晚上我同首相在他的切克斯乡间住宅共进晚餐，有时候这一会晤会延长到使我整夜都留在那里，在那段时间内往往会同军官们和文官们举行一连串的会议。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先生几乎总是在场的。

经过约六个星期的紧张筹划后，我们接到通知说，美国国务院驻北非高级官员罗伯特·墨菲先生将对我们作一次秘密访问，同我们讨论那一地区的政治局势和动向——这些因素在全部军事行动中仍是个很大的问号。维希法国是个中立国。在整个战争期间，美

国是同法国政府维持外交联系的。美国在它的全部历史中从未参与过一场对一个中立国进行的无端攻击，虽然维希是公然同希特勒合作的，但美国的政界领袖们从上述观点出发，仍对计划中的这一军事行动颇为不满，这是毫无疑问的。

英、美两国政府都认为北非公众舆论是支持同盟国的，因而自然希望使这次进攻表现为一场响应人民大众的要求、使之成为摆脱维希桎梏的战争。我们不但确实想避免把法国增列入已经够我们对付的敌人名单中去，而且如果可能，我们还想使事情看起来好象我们是应邀而来到非洲的，而不是强行闯入的。

我们了解，总会有人对登陆提出一些反对意见的，因为在欧洲本身内部，法国是经常遭受德国蹂躏的。不过只要我们能表明公众的意见肯定是反对维希统治者的，那么英、美国内对这场进攻的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态度都会缓和下去。

曾经长期在非洲任职的墨菲先生，早就获得了美国总统的信赖，并被告知了在那一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同他的一批助手一起，不仅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民意测验，而且出色地找到了一些肯定对轴心国持敌对态度的军界领袖和政界领袖，这些人之所以担任现职，仅仅是出于对法国的责任感。墨菲先生和蔼可亲，精明能干，对法语又运用自如，的确是非常称职的。他在1940至1942年后期所从事的传教式的工作，毫无疑问对最终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1942年秋，他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来到了我在伦敦的司令部。他曾先赴华盛顿，在那里换上了军服，挂了一个中校的假军衔，然后用了麦高恩的名字来看我。我是在城外某约定地点同他会晤的，仅仅停留了二十四小时，他就返回华盛顿去了。

我们从墨菲先生那里获知了那些同情盟国的，以及那些准备

积极协助我们的军官的姓名。我们也获知了不少有关法国军队的脾气和平民中间的情绪的情况。他非常精确地告诉我们，最强烈的抵抗将会在法属摩洛哥碰到，那里的奥古斯都·诺盖将军是摩洛哥苏丹的外交大臣。他告诉了我们有关非洲的法国军事力量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他们的陆、海、空三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的情报。从他的推断可以明显地看到，如果我们遭到法国人的顽强反抗，那么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如果法国人能当机立断参与我方，那么我们便能期望迅速推进我们的主要任务，夺取突尼斯从而打击隆美尔的后方。墨菲先生认为我们可能遇到的实际情况，将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事实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

可是在另一点上，他完全错了。那不是他的过失。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第十九军参谋长查尔斯·马斯特，卡萨布兰卡师师长玛丽·贝图阿尔，以及其他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我们的法国将军们曾使墨菲先生相信，如果能以协助反维希政府的起义为名把亨利·吉罗德将军带到北非，将会得到迅速而热烈的反应，整个北非将燃起暴动的火焰，并将在一个在北非各地都极孚众望的领袖的统率下团结起来。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从我们自己方面的一场危机中才认识到上述这种希望完全是空想。

墨菲先生确信，如果能从我的参谋人员中派遣一位高级军官去非洲参加一次会议，就可以同我们已知的在北非的朋友们取得更加有效的合作。这样的会议，当然只能偷偷地安排，因为如果发现，我的密使必然会被扣留，而任何被察觉与这件事有牵连的法国军官，很可能被维希政权作为叛国犯来审判。当时立即决定派遣一个小组去同马斯特将军等人会谈，这个风险值得一冒。由于我自己显然不能去，我就从许多自愿应选者之中挑选了我的副手克拉克将军去作这次旅行。他只带了少数几个随从。

这次旅行动用了飞机和潜艇,并完全是按照规定计划进行的,只是到最后,由于引起了当地的怀疑,法国秘密活动分子被迫仓皇出逃,克拉克将军一行才不得不在他们能够重登潜艇之前躲藏起来。恶劣的天气使得重登潜艇困难重重,可是除了湿透了衣服,丢失了一小笔钱之外,没有造成重大损失。这支远征队在收集更多情报细节方面很有价值。这些细节没有迫使我们作战计划作任何重大改变。

同墨菲先生举行的会议使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美国人,第一次对几位法国官员有了间接的了解。他详尽地谈论了我们极可能与之打交道的几位主要将军和官员的特点和政治倾向。他特别强调说,当时美国政府和人民在法国人心目中声望极高,相形之下他们对英国人却怀有戒心。

首相对这一看法表示能理解,并亲自关心这件事,要使这次军事行动尽人力之所及做到外表上完全是一支美国军队的样子。他甚至一度认真考虑过要求所有那些必须参加最初登陆的英国部队穿上美军制服。在进行有关可能产生的政治问题的讨论时,作为外交部首脑的艾登先生几乎总是在场的,正如我国战时的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先生也是经常在场那样。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关切有力地说明了一句老话:政治考虑永远不能同军事考虑完全分开,而战争仅仅是政治方针在武力领域的继续而已。盟军对非洲的进攻是武装部队进入国际政治领域的一次最奇特的冒险;我们是在侵入一个中立国家以培植朋友。这些政治问题虽然重要,但它们只是使我们天天绞脑汁的许多困难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押有巨额赌注的赌博,然而这却是战争的常性,其本身并不是一种特别伤脑筋的因素。可是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心中无数:对于西班牙人的态度以及敌人了解我方计划的情况,



我们心中无数；一旦远征部队启航，能够确切地提供多少舰艇，我们心中无数；等到我们的护航舰队驶近非洲海岸时，空军能有多大能力向其提供所需的保护，我们也心中无数。

另一项冒险行动是关于用运输机从英国运送一支降落伞部队去占领奥兰机场的方案。这些运输机必须相当缓慢地飞越一千二百哩以上的距离，穿过它们可能受到敌机袭击的地区。伞兵不得不跳伞，要不然，飞机就得在我们摸不清楚的机场上降落。许多有经验的军官面对这样一项“草率的”计划表示他们简直无能为力。其他的方案还包括用精选部队对阿尔及尔和奥兰的船坞进行直接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袭击，以图阻止破坏和毁弃，这样可把港口设备保留下来为我们日后利用。

我们的高级组织机构的整个基础都是前所未有的。整个夏天，军队中的老朋友一再警告我，说我们赖以作为指挥计划之基础的盟国团结概念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做不到的；他们说，被安排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任何一位司令官都是注定要栽筋斗的，除了因整个作战计划的失败而招致的普遍怨恨将归咎于一身，使我成为替罪羊之外，将毫无所得。人们还给我讲了许多结盟国家失败的故事，最早的有公元前五百年希腊人的败绩，而后是协约国之间争吵的年代，直到1940年法、英两国尖锐的相互指责。然而，“火炬”行动司令部中日益明显地增长着的合作精神、同志感情、信心和乐观，足以抵销这类悲观的预言。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专心研究共同问题时，不知不觉地抛掉了彼此猜疑和不信任的外壳。

在初秋，拉姆齐海军上将被英国参谋部解除了远征军的海军司令职务，而任命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接替他的职务。那时我还是第一次认识坎宁安。他是个纳尔逊式的海军上将。他认为舰艇入海就是为了搜索并摧毁敌人。他总是考虑进攻，从不考虑防御。

他精力充沛,不畏艰险,富有才智,正直坦率。尽管他顽固执拗,英国海军上上下下,甚至更广一些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其他军种也在内,对他拥戴的程度却毫不因之稍逊。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水手。1943年秋,当我要求他把载着一个师士兵的英国战斗舰队派往满布水雷和陷阱的塔兰托港时,他说:

“长官,英王陛下的舰队,无论您派往何地,都待命出发。”

他的这个答复我永世不忘。

当时我们在工作中受到的巨大压力,对于一个未曾亲自为盟军参加现代战争制订过作战计划的人来说,是很难体会的。可是,对一个有过这种经验的人来说,这种压力一直是不易磨灭而记忆犹新的。

要把我们那些耗费时日的问题理出头绪来也是同样困难的。首先是照管人。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埋头于准备“火炬”行动计划的具体细节,可是其他许多人却在操心各种问题,如从红十字会的事务一直到需要向阿拉伯人运送白布等。阿拉伯人坚持要用白布作埋葬时的裹尸布,而且说什么也非要不可。召开记者招待会几乎成了势在必行的事,因为美国国内和英国当地的士气问题,始终使我们萦萦于怀。

我们不仅必须同英国海军,而且还必须同美国海军协调我们的计划。这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开许许多多的会议。金氏海军上将派了两位干练的海军军官来协助制订计划。美国方面负责制订计划的人是艾尔弗雷德·格仑瑟准将,他在欢迎那两位军官时说,这里有成千的问题希望海军协助解决。可是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来此只是听听而已。”我想,如果我能私下同金氏海军上将谈一谈,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可是在当时环境下,这些杂七杂八的问题只能耐心细致地设法加以解决。

海军终究提醒了我们,认为我们一直要求的是历来最庞大的战斗舰队之一——约为一百一十艘运送军队和货物的船只和二百艘军舰。海军已经意识到需要监视德国舰队,据他们估计,那时德国舰队拥有至少一艘、也可能是两艘航空母舰。有些美国军官有时候似乎对这次军事行动感到愤恨,显然他们认为这是一项英国计划,美国是被强行拖进这项计划的。在制订计划阶段,我在各次会议上一再声称,“火炬”计划是来自总司令即美国总统的命令及首相的命令,而我是按照命令建议进入西非和北非的,不管有没有战舰保护。

轴心国对地中海的英国护航舰队的攻击不断地传来噩耗。有一支严加护卫的、由十四艘货船组成的运输船队企图把供应运送到马耳他,可是在到达那里时,只剩三艘货船能继续航行。而其中一艘又在船坞沉没了。曾被划拨给“火炬”计划使用的航空母舰“鹰”号被鱼雷击沉了。海军参谋部接二连三地带给我们这类消息,而每次消息的结束都必需使我们对计划作进一步修订。

9月中旬,即在进攻开始前七个星期,我向马歇尔将军呈送一份函件,报告了我们对进攻前途的看法。函件内容如下:

“拟议中由英国航空母舰提供的空中支援,其暂定的和非正式的细节如下:直布罗陀东面的掩护力量有一艘航空母舰,舰上载有二十架战斗机和二十架鱼雷轰炸机;在阿尔及尔的直接支援有六十六架战斗机和十八架鱼雷轰炸机。此外,还可能得到一艘旧航空母舰,舰上载有十三架飞机。

“直接危及这次军事行动的特殊因素如下:

“(1)在开始阶段航空母舰实施空中支援的能力。

“非洲的法国空军的作战力量约为五百架飞机。其轰炸机和战

斗机都不是最新式的，不过战斗机的作战性能较航空母舰上的海军类型飞机为佳，因此，如果法国决心一致抵抗最初的登陆行动，尤其是集中大量空军来袭击其中某个主要港口，它们即使阻挡不住在那个港口的登陆，也能造成严重干扰。航空母舰上的全部战斗机力量（把“突击队员”号航空母舰上的一百架美国战斗机和辅助飞机都计算在内），看来约有一百六十六架飞机，这些飞机可以实际用来支援登陆行动。而东面的海军掩护部队的飞机只有二十至三十架。这些战斗机在同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作战时，一般都有舰载飞机的弱点。

**“(2)在占领飞机着陆场之后，作为战斗机的装配点的直布罗陀的效率。”**

“由于直布罗陀是盟军在那个地区可以利用的唯一港口，能否把战斗机迅速转移到被占领的飞机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在直布罗陀为当前战斗每天装配至少三十架飞机并在以后能否源源不断地如数供应。直布罗陀的弱点，尤其是易于遭受西班牙军队的侵犯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西班牙人在我们开始登陆作战时就马上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那么想在几天之内得到在北非使用的任何以陆地为基地的战斗机，是完全不可能的。”

**“(3)另一个影响空军的重要因素是气候。”**

“我们计划把目前在英国的美国部队，除了‘喷火式’空军大队外，都空运到在北非已占领的飞机场。‘喷火式’空军大队务必运至直布罗陀或被占领的飞机场，并在那里驻扎下来。一连串的坏天气会削弱预料在作战早期阶段得到的空中支援，这是明显危及胜利的另一因素。”

#### “(4)法军抵抗的性质。”

“目前在这个地区约有十四个法国师，它们装备颇差，可是估计训练尚佳，还得益于专业军官的领导。这支军队如果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行动起来抵抗进攻，那么，从盟军能在奥兰和阿尔及尔这两个主要港口集结的缓慢进度来看，它们能够拖住并且阻碍作战行动，以使远征部队的真正目标——在轴心国大规模增援非洲北岸之前就把那里控制起来——无法达到。

#### “(5)西班牙军队的态度。”

“鉴于这一特别的军事行动，迄今尚无迹象表明西班牙人将在战争中袒护何方，但必须看到发生这种情况是可能的，特别是当德国有进入西班牙的明显行动时。不管怎样，西班牙一参战将会立即使我们丧失直布罗陀这一着陆场所，并会在盟军能够采取有效行动之前阻止我们利用直布罗陀海峡。鉴于能调用的人力和物力来源有限，我们是否有能力采取这样的有效行动，看来并无把握。

#### “(6)目前在西欧的德国空军迅速进入西班牙并对我方交通线进行袭击的可能性。”

“这对德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军事行动，除非它能得到西班牙的充分默许和支持。西班牙飞机场并不存在汽油、炸弹和润滑油，而且把地勤人员和维修人员以及给养运送到西班牙来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此外，有些情况使敌人不致采取这样的行动，这就是：第一，德国人已在西西里拥有优良的着陆机场，他们的远程飞机可以以那些机场为基地进行活动，不必去找建立新基地的麻烦。第二，德国以武力占领伊比利亚半岛的有利条件一直存在着。德国甚至在英国大部分海军力量最近驶入地中海的情况

下也没有明显地向这个方面移动,这一事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敌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军事行动。

“(7)我们在作下述结论时所考虑的其他因素是,最近马耳他护航舰队的经历以及对盟国海军在过去十天中所受重大损失的推断。马耳他护航舰队是在已驶至撒丁岛南面之后才受到空袭的,它在撒丁岛西面所遇到的障碍则是来自潜艇的行动。

“根据所有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如果西班牙保持中立,如果法国军队或者只作象征性抵抗,或者由于内哄和因盟国的政治计谋而四分五裂,以致无从进行有效抵抗,那么我们的这次军事行动便有相当大的成功把握。我们相信西班牙会保持中立,至少在这次军事行动的早期阶段会这样,只要我们能够对自己的意图严加保密。在过去,当类似的庞大的护航舰队驶经直布罗陀海峡时,西班牙也是这样做的。另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将会碰到法军某些部队非常厉害的抵抗。我们认为,阿尔及尔周围地区的法国人对我们会很有很大帮助,我们可能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之间的地区以及突尼斯城附近遭到抵抗。

“我们认为,开始登陆获致成功的把握在百分之五十以上,然而这一军事行动全面成功——包括在轴心国增援之前占领突尼斯城——的把握却远远不到百分之五十。在这里我们考虑了以下诸情况:在建立一支以陆地为基地的空军力量的问题上会产生巨大困难;各港口的工作效率低,因此地面部队的建立也会很缓慢;自卡萨布兰卡到奥兰的这条漫长交通线质量很差;最后,法国的态度捉摸不定。

“还可能发生一些其他难以预测的事情,如西班牙的态度是否

会改变，海军和运输方面的困难是否会不断增加，以及我们的增援是否会因此而减缓，等等。这个阶段的任何失败迹象，以及增援部队的延迟到达，都可能被轴心国抓住利用，作为进入西班牙的理由，而如果那时西班牙参加战争，后果将不堪设想。”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上述情况也在不断发展。虽然我们的作战计划的要点早已规定，然而却每天要对细节作某些细微的改动，直到几乎是启碇前的最后一天，情况都是如此。

随着计划的制订，我们对训练工作和物质准备作了数次视察。我们最后的、也是最有雄心的一次登陆作战训练演习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苏格兰西部举行的。有一部分参谋人员陪着我观看了这次作战演习，我们看到船员和舰艇的水兵明显缺乏技能，这使我们感到十分沮丧。不过这些人都是为了减少对盟军运输计划的干扰而在最后一分钟拼凑起来的，因此我们希望并且也相信，在演习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重大缺点不会在实战中重复出现。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样。

在这次旅程中我收到一则消息，使我又回想起美国在和平时期对战备问题一向是漠不关心的。有一位部队司令官曾告诉我，他的部队刚刚收到最后递运的一批“火箭筒”，这是步兵防御坦克的最佳武器。而他的部队定于次日开始上船，因此他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教会他的士兵运用这种最需要的武器。他说，“我自己对这种武器也一无所知，只是听人说起过它。”

在伦敦，现在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了。锁上办公室后，感到松了一口气。为了替我离开伦敦作解释，当时散布出一个精心炮制的消息，说我正在访问华盛顿。制造这个特殊骗局时，连总统也帮了忙。实际上我们已于1942年11月5日搭乘五架“空中堡垒”飞

往直布罗陀了。我们在直布罗陀受到了总督梅森·麦克法兰中将的欢迎。我们在他的盛情接待下来到总督府，并在那里下榻。我们一行中其他飞机平安到达的消息在伦敦已有报道，而由于一系列小小的意外事故，此后数小时内伦敦对我所乘的飞机的消息未作报道。这件事使仍然留在英国的大部分参谋部人员相当惊慌，不过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情况。有一架当时未能和我们一同起飞的飞机，在第二天起飞后，遭到了两架德国容克-88型战斗机的袭击。一人受了伤，可是这架“空中堡垒”上的机枪手们最后还是把它们赶跑了。

我走进堡垒的地道，那里面就是我们的办公室，我在那里会见了坎宁安海军上将，他是从伦敦乘快速巡洋舰来的。他和我开始阅览气象报告和作战报告，对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都一再核对，并谈论了本书至此已经叙述过的一切事情。



## 第六章

### 进攻非洲

在直布罗陀,我们的司令部设立在一个阴郁的环境中,那是我们在战争期间所占领的最阴郁的地方了。石层底下的地下过道是唯一能充当办公室的地方,过道中还安装着通讯设备,我们想由此同三支突击部队的司令官们保持联络。地道永远是漆黑的,只有某些地方星星点点地透射出一些微弱的电灯光。拥塞的漫长过道,潮湿而寒冷,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虽有电扇在不停地转动,但仍驱散不了停滞的空气;地表水渗过弧形的天花板接连不断地一滴一滴落下来。在一项军事计划完成之后,直到行动开始之前的那段漫长的、几乎是无法忍受的等待期间,时间就随着那沉寂乏味的滴嗒滴嗒声一分一秒地打发过去了。

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地方。在1942年11月,盟国除了直布罗陀堡垒之外,在整个西欧无立锥之地,在地中海区,自马耳他以西也无安身之处。可以用来对非洲西北部实施进攻的地点只有英属直布罗陀。如果没有直布罗陀,就不可能在北非战场迅速建立必需的空中掩护力量。在进攻初期,直布罗陀的那个小机场既要充当作战用的机场,又要充当自英国飞往非洲大陆的飞机的中途机场。甚至直到进攻欧陆开始日之前数星期,那里还拥塞着战斗机。每一吋地面,不是停着“喷火式”战斗机就是堆放着汽油桶。这一切都暴露在敌人的侦察机面前,连想伪装一下都做不到。更糟的

是飞机场本身就地处西班牙边境，只有一排铁蒺藜网把它同西班牙领土隔开。从政治上讲，西班牙是倾向轴心国的，不可胜数的轴心国特务经常把着这个铁蒺藜网在探视。每天都准备着敌人轰炸机的严重袭击；而当每天都平安无事地消逝过去时，我们都感到困惑不解，甚至是怀着诧异的心情去睡的。

对此可作的唯一的解释是，我们所采用的蒙蔽敌人的措施发挥了效用。我们知道，轴心国在能够进行轰炸之前很久就会获悉在直布罗陀的频繁活动的。我们希望敌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我方是在再一次以非凡的雄心试图增援面临困境已达数月之久的马耳他。

虽然敌人的任何空袭都会带来某些后果，虽然周围环境阴郁沉闷，虽然在即将发动的这个巨大的冒险行动中无数事情都极易出差错，可是在司令部内部，确实呈现着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聚集在那里的士兵们、水手们和空军人员都兴高采烈，那是人们在脱离了几个月的苦心准备和无聊的等待时期之后，在期望一桩宏举的来临时必然会产生的心情。

那里确实也有紧张的气氛，这在每一个临时充作办公室的小洞穴里都感觉得到。那是自然的。不出几个小时，盟军就会知道他们在战争中的第一次联合攻势的初步命运了。除开已经在西部沙漠中进行了两年之久的拉锯战，以及在瓜达耳卡纳耳岛上的战斗之外，盟军竟未能在世界任何陆地上进行过超出防御战范围的战争。即便是拿我们的防御战说吧，其纪录也是充满了悲惨的败绩，其中的敦刻尔克、巴丹、香港、新加坡、泗水和托卜鲁克等地的失败，是令人沉痛难忘的。

在我们于直布罗陀的洞穴中来回踱着的那些时日里，数以百计的盟国舰艇所组成的快速或慢速的护航舰队正在横渡北大西

洋,驶向非洲西北海岸上的一个共同点。为了进攻阿尔及尔和奥兰,这些舰艇中的绝大多数将通过狭窄的直布罗陀海峡,两岸的大炮任何时候都可能替纳粹发出轰鸣。其他来自美国的舰艇则将直接驶向卡萨布兰卡及其南面和北面的港口城镇。

三支主力远征队伍正在纳粹潜艇出没的大海中破浪前进。我们的大多数单独的护航舰队一到直布罗陀就会进入一个受到敌人轰炸机威胁的地区。我们的军队只是匆忙地训练一下就来参加这场错综复杂的登陆作战的,其中大部分人还从来没有打过仗。现有的舰艇数目并不允许我们把保证获胜所必须的全部士兵和装备都运送过来。当然我们感到紧张。

连我们飞往直布罗陀也冒着极大的危险。在我们飞抵那里以前,曾两度企图从英国起飞,然而都因气候恶劣而未能成功。在我们最终自英国起飞之前,被指派来带领我们一行人赴直布罗陀、负责指挥六架“空中堡垒”的军官,故意把应不应该起飞的问题连同他从技术上考虑反对这次飞行的建议,一起交由我来决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局面,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飞行指挥官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这件事对那次重大的冒险来说并不象是个吉兆,可是我们不得不冒此危险。我们在平均只有一百呎的高度飞行着。当直布罗陀的巨大岩石终于透过雾幔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的驾驶员说:“我在长途飞行到达终点时还得升高飞机才能作着陆航行,这还是第一次!”

虽然我们在直布罗陀被迫无法活动,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我们已经在筹划紧跟着登陆成功后应采取的步骤,包括及早把司令部搬到阿尔及尔。使我们关心的未来问题并不少,可是每一个问题都只有在首战告捷的情况下才能解决,甚至才能处理。因此我们的思想和言谈不可避免地要一再回到这个迫切问题上来。

我们还要等待三天。最后，先头舰艇在夜间驶过了这个狭窄的海峡，我们站在漆黑的海角上看着它们驶过。仍然没有空中轰炸或潜艇袭击的消息！我们愈来愈多地把希望寄托于下述情况：敌人依照过去袭击马耳他护航舰队的战术，将其空军力量、潜艇和海上部队集中于东面西西里周围，以期对来到西西里和非洲大陆之间的这一狭窄海域的舰只给以毁灭性打击！

在最初制订计划时，我预测在卡萨布兰卡可能遇到险恶形势，从这一考虑出发，我不愿把最大的一支分遣舰队投入这个特殊的军事行动。到最后一分钟推迟对卡萨布兰卡的行动确乎存在着危险，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出路只有两条。

第一条是只指令那支庞大的护航舰队推迟登陆而驶往邻近海域去绕圈子，等待有利时机。这一方案有好几个缺点。首先，西面的进攻将失去一切突然袭击的效果；其次，那些舰只将暴露在集结于比斯开湾及其南面的敌潜艇的攻击之下；再者，由同时突击三个港口而形成的具有优势兵力的态势将大为减弱。最后，舰只所携带的燃料是有限的。

另一条是让西面的全部护航舰队驶入地中海，集结在早已群舰密集的直布罗陀港口。这样可以节省燃料，而且可以驶回卡萨布兰卡按原定计划登陆，不然这些部队也可以跟着突击奥兰的部队登陆，再沿铁路线折回，向西北海岸推进。这两条出路都不令人向往，因为都需要对已在执行中的计划进行匆促的修改和调整；可是盖然率法则表明，我们非得两者择一不可。

甚至迟至发动进攻之前的那个下午，从我们在卡萨布兰卡地区的一艘潜艇传来的气象报告说，那里仍是阴天，因此我就姑且决定叫远征部队转而驶入直布罗陀，除非情况有好转。这样一来，我们的全部计划都将打乱，不过这看来总比在大海中漫无目标地打

转转以躲避潜艇要好。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一份简短报告，大意是说海滩的情况并不太坏，向卡萨布兰卡登陆正在按计划进行。当时我真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其轻松程度是我在战争期间从未感到过的。我于是作了感恩祷告；我最大的担心已经消除了。

一个意料不到的困难是发生在无线电通讯方面的。在战役初期，盟军司令部同几支远征军之间的通讯联络不得不完全依靠无线电，而当发觉我们的无线电经常效能低劣，有时完全失去作用时，真令人惊慌万分。出毛病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司令部舰艇上的海军线路和直布罗陀的通讯中心负荷过重。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决定尽快将司令部迁到非洲大陆去。

我们的第一份交火的报告是令人沮丧的。美国军舰“托马斯·斯东”号载着美军的一个加强营在驶向阿尔及尔的护航途中距目的地仅一百五十哩处，于11月7日被鱼雷击中。详情还不知道，但是可能有大量官兵死亡。虽然我们到此时为止的运气好得令人吃惊，可是这并没有减轻我们对那艘军舰上的士兵的命运焦虑。那天晚上，我们无法获得更多关于他们命运的消息，可是后来我们获悉，就美国纹章的荣誉而言，这件事的后果令人庆幸。伤亡很少，军舰本身也未遭到严重毁坏。没有沉没的危险。可是，在军舰能被拖曳到就近的港口之前，舰上官兵都不愿默默等待着。当他们的司令官宣布都上救生艇以争取准时赶到原定发动突袭的海滩时，他们都报以欢呼。然而，自下午凝聚起来的浓雾密云使他们的宏图未能实现，他们无可奈何地登上了驱逐舰和其他护航舰，终于在距原定时间约二十个小时之后被送上了岸。可喜的是，这些部队的迟到并没有明显影响我们的计划。

就在11月7日那同一天的下午，我作了战争期间最使我丧气

的一次接见。

由于伦敦和华盛顿都精诚笃信吉罗德将军能把北非的法军引领到盟国阵营中来，我们早在10月间便通过墨菲先生开始商议准备把这位将军从法国南部他实际上被监禁的地方营救出来。访问伦敦后已回到非洲的墨菲先生以及我们的某些法国朋友，精心地筹划了一项计划。事情的发展情况都经由可靠的中间人告诉了吉罗德将军；尽管有德国人和维希分子盯着他，他还是在约定时间抵达海岸线。他在那里登上了一艘小船，于茫茫黑夜中去同我们等候在近海处的一艘潜艇相会。那是一艘英国潜艇，在这次航行中指挥它的是美国海军上尉杰罗尔德·赖特。这艘潜艇经过极大困难接到了吉罗德将军，然后便出海了。它在另一个约定地点和我们的一架水上飞机相会；在这里，这位将军仅由三名侍从副官和参谋军官陪同，于11月7日下午飞抵我的司令部。这件事叙述得这样简略，实际上却是一次令人鼓舞和勇敢果断的壮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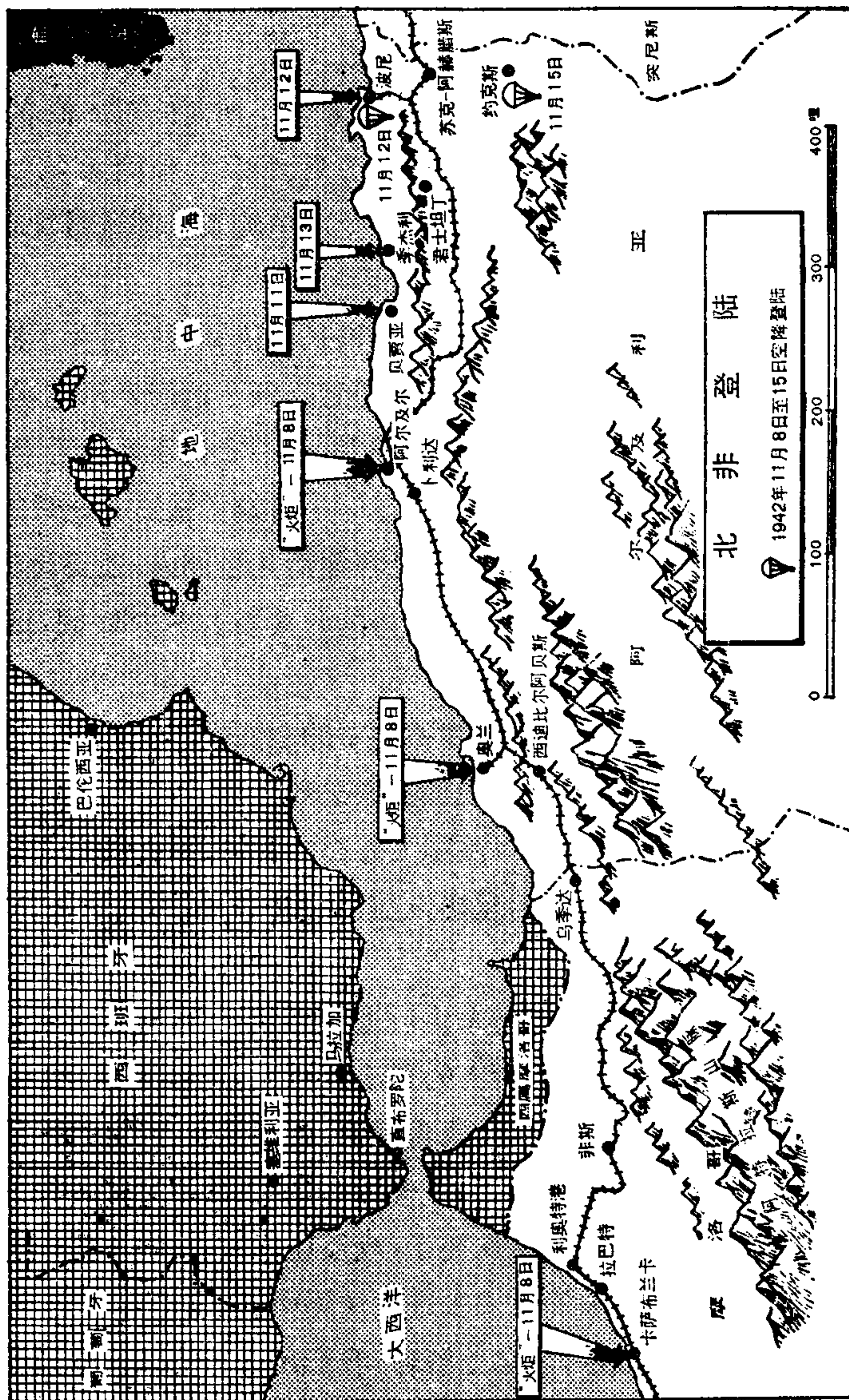
吉罗德将军虽然身穿便服，眉宇间却是一派军人气概。他身高六呎以上，身躯笔挺，几乎到僵直的程度，举止谈吐都较粗鲁。他虽受到屈辱，但仍不失英勇气魄。他对战争的体验，包括这次长期监禁和这次戏剧性的逃走，并未挫伤他的战斗精神。

我很快看出，原来他在离开法国时就有一个严重的误会，即以为他马上就要担任全部盟国远征军的指挥职务了。他一走进我的地牢就以那种身份同我谈话。我不能答应他担任这个角色。一俟我们能保证他的安全，我就要他去非洲统率愿意追随他的法军。由于我们内心经常害怕陷入一场与法国人为敌的旷日持久的剧烈战斗，我们渴望吉罗德将军能站到我们这边来。这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样的战斗不仅会造成我方的苦难和伤亡，而且会损害我们的对德作战。

吉罗德将军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在这场冒险的军事行动中，他根本不能考虑接受任何次于统率全军的职位，因为他认为这是涉及他本人和他祖国的荣誉的事。仅从表面上看，这也是不可能的。任命一位盟军总司令有许多手续，需要各有关政府的军政领袖协商同意。任何一名远征部队属下的指挥官，按法律都不可能接受吉罗德将军的命令。此外，当时盟军司令部中没有一个法国人；要说有的话，正好相反，法国人在敌人那边。

我费尽周章地把这一切都向这位将军解释了。他感到震惊、失望，而在经过许多小时的会谈之后，他觉得有必要拒绝同这项计划沾边。他说：“吉罗德将军是不能接受这个司令部中的从属职位的；这样做不会取得他的人民的谅解，反倒会玷污他的军人荣誉。”事实也是令人同情的，因为他觉得他的全家还在法国，德国人在盛怒之下可能将他们作为人质，而他自己为同我们一道作战也要经受巨大的生命危险。

当时我的政治顾问是美国国务院的弗里曼·马修斯先生和英国外交部的威廉·麦克先生。他们对这种情况极表忧虑，以致建议我给吉罗德将军一个名义司令的位置，而自己掌握指挥军事行动的实权。他们认为，要不要把吉罗德的名字同作战行动公开联系起来，很可能涉及到我们的成败。我不同意这类遁辞，并仍坚持自己的决定，那就是如果吉罗德将军不满足于统率在对德战争中投奔我方的北非法军，我们就要象从来没有同他会见过或商谈过那样，按原定计划继续实施我们的军事行动。同吉罗德将军的会谈断断续续地一直进行到午夜以后。虽然我对吉罗德将军的法语都能听懂，但我还是坚持用一位译员，以避免任何误解。当我们的谈话使几位精通法语的译员精疲力尽时，克拉克将军自告奋勇来担任译员，虽然他的法语远远说不上流利，但我们都能完全理解。



〔按原图译制〕



其原因之一是,在最初一小时的会谈之后,我们彼此仅仅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最初提出来的那些论点。当最后吉罗德将军要去就寝时,仍没有迹象表明他对原来的要求作了任何修正。他的晚安词是:“吉罗德将在这件事情上袖手旁观。”不过,他同意第二天早晨在总督府同我见面。那晚我们司令部中的人员都显得忧心忡忡。

我在那晚停止工作之前向联合参谋长会议呈送一份关于同吉罗德将军会谈的详细报告,并欣慰地即时收到了他们表示充分支持我的立场的答复。电文结尾虽有脱漏,可是我们还是能看得出其中的意思:“我们唯一遗憾的是你在……时期还被迫为此目的花费了这么多时间……”我没有能预见在往后几星期内,还要为北非的政治事务进行令人恼怒和一无所得的会谈用去多少时间,这是多么幸运啊!

幸而一夜的睡眠对改变吉罗德将军的主意起了些作用。在第二天早晨的会晤中,他决定按我们的设想和我们一起干。我向他许诺说,如果他能成功地赢得法国人方面的支持,那么民政当局在最后有机会确定当地人民的意志以前,我将把他作为该地区的行政长官来对待。

事实表明,在同吉罗德将军往后进行的会谈中,对当时我们应采取何种战略的问题,我们两人的想法有极大差别。他主张马上转攻法国南部,不必去管北非。我告诉他,就在他发言的时候,部队已经在各自选定的滩头登陆了,并告诉他,现在已不可能为他所建议的法国南部登陆提供空中支援了;我还让他知道,眼下盟国的舰只还没有力量运送足够的兵力去进攻法国南部,以对付肯定会进行反击的德国人。最后,我向他解释,我们所进行的这次战役是需要给养和供应支援的,这方面布置安排的复杂和具体程度,也使他

所建议的改变完全不可能。

他看不到把北非作为基地的需要——在我们能顺利地进攻欧洲南部之前，先需要在北非坚实地站住脚。

至于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能对未加护卫的海上舰只造成什么后果，战争中的经历已经提供了教训，可是吉罗德毫无所知。他可能对“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这两艘英国巨舰——由于疏忽而暴露在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的攻击之下，——丧失在西南太平洋一事，从未在战术意义上作过估计。而且，他还以为，只要盟国方面愿意，就可以在两、三个星期内把五十万人的兵力运抵法国南部。我们所承受的作战任务已使我们人力物力资源的消耗达到了极点，而且正是由于资源不足，我们才不得不仔细盘算我们的初步战略目标，可是这些情况要使吉罗德将军了解是很困难的。

11月7日的夜间和8日凌晨，战况报告开始来到，战局是令人振奋的。正如预料的那样，在阿尔及尔登陆的部队，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就迅速占领了那个地区。这主要归功于墨菲先生事先对法国陆军的马斯特将军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也依靠了阿万斯·朱安将军的同情，虽然他装样子作了一番正式抵抗。

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总觉得需要赶快挺进到突尼斯城地区。8日晚我用铅笔随意写了一些字作为备忘之用，至今还留在我手边。这些字是：“我们应该马上向波尼—宾泽特进军，可是现在却在东段磨蹭。”

在奥兰，盟军虽然登了岸，可是当地的法军，尤其是法国海军，进行了猛烈的抵抗。打了一些硬仗，在战争中辗转千里的美国第一师在这里第一次尝到了搏斗的滋味。第一师虽然训练不足，却在第一装甲师的支援下取得了进展。到了11月9日，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就要在奥兰告捷。10日那天，奥兰已停止一切战斗。弗雷

登道尔将军和特里·艾伦将军很好地经受了初次的战斗考验。

我们知道已经对西海岸发起了攻击,可是得不到其进展的消息。实际上在某些地点,特别是在利奥特港,战斗很激烈。狡诈的海洋在一个月之中只给了我们一天宁静的海面,这对登陆之成功是必需的,只不过宁静的期间太短,过了不久,增援就极其困难了。我用种种可能的办法想与西面的司令官亨利·休伊特海军少将和巴顿将军取得通讯联络,可是无线电又失灵,传给我们的只是无法听清楚的信号。因此我们想派几架轻轰炸机到卡萨布兰卡去取得联系,可是有几架被法国战斗机击落了,我们这才知道这种做法也是白费劲。绝望之余,我问坎宁安海军上将,港内是否有快艇。幸运的是,当时在直布罗陀正好有一艘速度最高的快艇升火待发,准备赶运一些必要的供应给马耳他。海军上将毫不迟疑地把那艘快艇拨给我用,并告诉我,同西路机动部队取得联系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我派美国海军少将伯纳德·比厄里率领一部分参谋人员前往,他们在一小时之内就出发了。

11月9日早晨,克拉克将军和吉罗德将军飞往阿尔及尔,企图同法国最高当局达成某种协议。他们的使命是要求结束战斗,并希望法国人在进行计划中的对德战争时能给予协助。

非洲的法国人对吉罗德将军的冷淡接待,给我们原先的期望泼了一瓢冷水。他根本没有被重视。他作了一次广播,宣布他将领导法属北非,并指令法军停止对盟军作战。可是他的演讲没有发生任何作用。我甚至怀疑到底有多少人听了他的广播。同阿尔及尔之间的无线电联系非常困难,可是最后终于收到一份电报,证实了早些时候的这个消息:达尔朗海军上将正在阿尔及尔!

有人说,他来这里可能是因为事先已经获悉我方意图,也可能是为了协助我们达到目的,我们当时没有立即完全相信这种看法。

我们已经在奥兰和阿尔及尔搜集到证据，证明我们的进攻是完全出乎北非的每一名士兵和每一个居民的意料之外的，除了极少数积极帮助我们的人之外。连他们这几个人，也是直到最后一分钟才知道我们的进攻日期的。毫无疑问，达尔朗完全是偶然来到阿尔及尔的，当时他极其钟爱的儿子得了急病，凑成了这个机会。

达尔朗是法国战斗部队的总司令！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他逮捕起来。可是只要达尔朗能够对在土伦和达喀尔的大量法国舰艇发一道必要的命令，我们就有希望立刻减轻地中海的潜在的海军威胁，同时可以随便增添我们自己的水面舰艇。在我离开英国之前，丘吉尔先生曾诚恳地说过：“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话，尽管我极恨他，但我若能以爬行一哩路来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

我们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理由，要求设法利用达尔朗的地位。克拉克将军在同法国官兵打交道时，很快就发现法国人有一个传统，即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这在法军中视若神圣。他们断言，他们在1940年的投降仅仅是忠诚的军人服从文官领导的合法命令的行为。

克拉克将军曾与之再三会谈的每一位法国司令官，都毫无例外地拒绝采取任何行动使他的部队投向盟军，除非他能接到叫他这样做的合法命令。他们每一个人都曾作过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宣誓；当时贝当元帅的名字对北非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深。这些司令官之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不受他的宣誓的约束或者可以发布任何停火命令，除非他们的合法总司令，那位被他们视作贝当元帅的直接代表和私人代表的达尔朗给他们以必要的指示。

那个时候以及往后许多天中，谁要是不首先认识到这位元帅

的超越一切的影响而去同一个法国人——不论他是士兵或平民——谈话,那是毫无用处的。每一所私人住宅中,都在显著地位挂着他的照片,在公共建筑物中,则除了照片之外,还有他的语录。任何建议,只要是“元帅同意的”就都会被接受。

克拉克将军拍回的电报说,如没有达尔朗参加,就不可能达成和解,而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当时躲藏在阿尔及尔的吉罗德将军的支持。克拉克一直在设法尽量把情况的发展报告给我,可是很明显,他在试图说服法国人停止与我们作战时遇到了困难情况。正当我忙于处理所有这些问题时,我收到了暂时留驻伦敦的参谋长的一份电报,其中说,鉴于“火炬”计划所取得的初步成就以及某些明显的后果,他接到了一项来自高级领导的建议,要我们削减“火炬”行动原来计划的兵力,以便用于其他战略目的。在战争期间,有些远在后方的的人总是过高估计初步成就而轻视未来的困难,我对于这种倾向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这次收到的电报着实使我发火了。我立刻拍了一份回电,内容摘录如下:

“坚决反对削减‘火炬’计划拟议中的兵力。局势并未稳定。相反,在突尼斯还胜负难卜。乡村尚未完全安定,交通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北非的两个主要港口遭到严重堵塞。想争取法国人同我们进行有组织和有效的合作的每一次努力,都陷入了政治阴谋和个人诡计的迷宫,这里给人的明显印象是谁也不想实际去打仗,谁也不愿全心全意地合作。

“我们应该为把北非打扫干净去探求加速集结兵力之方法,而不应谈什么削减兵力之可能。我们应该有条不紊地对战略问题作事先筹划,可是请看在上帝面上,让我们干完一件再干另一件吧。过去三天我们损失了不少舰艇,要为护航舰队提供空中掩护是极端困难的。德国经由西班牙进行干涉的危险依然存在。这不是我

变得疑神疑鬼，也不是我在谎报军情。我仅仅是坚持认为，如果我们的开端充满希望，那么现在正是加一把劲而不是松一松手的时候。我们只是才开始从事一项伟大的冒险的军事行动。绝对不能以毫无保证的设想去毁掉一个良好的开端。”

12日那天，克拉克将军报告说，显然只有达尔朗才是能够同我们在北非实行合作的法国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立即在当地处理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提交华盛顿和伦敦去处理，只会让长期的讨论造成不可避免的耽误。那样会耗费掉大量时间，也会耗费掉大量鲜血，造成无数苦难，对把法军纳入我们自己的远征军来讲，获得友好安排的机会将更为渺茫。

我们早已得到我们两国政府的书面命令，要我们在进入非洲时同我们遇到的任何法国政府进行合作。而且，这个问题在当时完全是军事性质的。如果最后产生的政治反应竟严重到要求作出牺牲的话，按逻辑和传统，都要求在战场上的人对这个问题负全部责任，而以随后解除他的指挥职务来象征纠正错误。我虽然可能被撤职，可是，只有迅速作出决定，才能保持两国全部努力的根本一致和满足迫切的军事要求。

我们非常冷静地和认真地讨论了这些可能性，一直牢记着给我们的这个基本命令：进入非洲是为了争取一位盟友，而不是屠杀法国人。

我清楚地知道，同维希分子打任何交道，都会引起那些不了解战争的严酷现实的英、美人士的强烈反感；因此我决心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局限于当地的军事方面。11月13日那天，我同坎宁安海军上将一起飞抵阿尔及尔，到达之后，就去同克拉克将军和驻当地的美国总领事墨菲先生进行会谈。这是从墨菲先生数星期前访问伦敦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他。

他们先把情况的最新发展详细地告诉了我。11月10日那天，达尔朗曾向所有法国司令官下达了停战命令。在维希的贝当立刻否认这个命令，并宣布把达尔朗撤职。于是达尔朗想收回成命，可是克拉克不准。接着，在阿尔及尔收到一则电讯，说德国人正在入侵法国南部。这时达尔朗说，由于德国人已破坏了1940年的停战，他可以毫无拘束地同美国人合作了。与此同时，吉罗德将军在最初发现当地法国人并不愿追随他而大为震惊之余，开始相信达尔朗是当地唯一能把北非带领到盟国一边的法国官员。当德国人侵入法国南部时，吉罗德去找达尔朗表示愿与之合作。卡萨布兰卡的战斗已因达尔朗的命令而停止了；在其他地方，在命令到达之前就已结束了战斗。那些公开帮助我们的法国军官，包括贝图阿尔将军和马斯特将军，都暂时丧失了体面；他们想做什么事都得去求别人。

在仔细地回顾了整个局势之后，墨菲先生说，“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成了一个军事问题。得由你来进行解答了。”

当我们在达成最后决定的时候，墨菲先生除了偶而作一下说明之外，把自己完全置身于事外了。要不要获致停战，要不要争取时间和拯救生命，这些问题都要由我来决定了。对盟军来说，同法国人早日达成可行的安排，要比专横地逮捕达尔朗更有利，因为后者必然会引起继续战斗和增添苦难。当地的法国官员的正式身份仍是一个中立国家的官员，除非我们两国政府准备向法国正式宣战，不然从法律上或其他方面讲，我们都没有权利去按照纳粹方式独断独行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选择的傀儡政府。

所达成的安排写入了一个文件，其中概述了法国当局协助盟军的方法。它同意给予一位处于友好地区——不是占领地区——的盟军总司令以他在管辖他的部队和指挥军事行动时所必需的一

切必要的法律上的权力和特权。我们还得到了利用港口、铁路和其他设施的保证。

盟方仅仅声称,只要法军和平民肯听从达尔朗的命令,在军事上同我们合作,我们就不干扰法国对北非的行政控制。相反地,我们还表明愿意同他们合作维持秩序。我们没有答应使我们两国政府作出任何形式的政治承认。根据当地官员的意愿和我们的允诺,只是授权达尔朗在我们正把德国人从非洲大陆清除期间管理北非的法国事务。他也同意让我们的朋友吉罗德将军指挥非洲西北部的所有法国军事力量。

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力量实行军事占领,除非我们愿意停止一切打击轴心国的行动。当时,阿拉伯居民对有效地清除了当地犹太势力的法国维希政权深表同情,如果阿拉伯人暴动起来反对我们——这肯定是德国人正在努力促成的事——后果会是不堪设想的。我们赢得北非的目的,仅仅是利用它作为推进反希特勒战争的基地。从法律上讲,我们在非洲的地位是同我们后来在西西里的地位不同的,而在西西里的地位又同我们在意大利的地位不同,也同后来在德国的地位不同。从理论上讲,我们是在一个盟国的国土上。达尔朗的职责的实际功效是承认我们的支配地位,并使之产生作用——可是如果我们想避免麻烦,我们就必须巧妙地利用这种地位。

达尔朗向法国军队下达的命令得到了遵守,这同早些时候吉罗德下令时遭到的轻蔑适成对照。达尔朗制止住了西海岸的战斗,在那里,美军刚好集结完毕准备对卡萨布兰卡的防御工事发起总攻。巴顿将军早些时候在摩洛哥取得的经验表明,这场仗要是打起来必定伤亡惨重。

11月13日,我们同以达尔朗为首的法国陆、海、空军官在阿尔



及尔达成了最后协议。当晚乘飞机回去时，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我对恶劣的天气和直布罗陀的简陋的着陆条件都身受了一次极不愉快的经历。我们是在一团漆黑中绕着直布罗陀飞行的，几次都越过了机场。我看不出摆脱困境的办法。最后我们平安着陆了。可是我仍认为，这位年轻的中尉驾驶员一定是更多地依靠兔子脚<sup>①</sup>而不是他的操纵器完成这次巧妙着陆的。这一次经历加强了我早先所作的一个打算，即把司令部赶快搬到阿尔及尔。这一决定使得通讯兵团慌乱起来。一位通讯军官说，他无法于年前在阿尔及尔提供通讯设施。可是我们还是在11月22日搬去了。

所有政治问题的正式报告，当然已经定期呈送给我们两国政府了。虽然如此，两国的报刊仍提出了批评，其抨击是如此猛烈，致使总统和首相都要求得到更充分的解释。他们是从一份长电报中得到这些解释的。这份电报在华盛顿和伦敦两地的政府官员中间流传甚广。现在，我在对当时的局势进行了长时间回顾和研究之后，仍对那份电报中的解释想不出什么可补充的东西。为了遵守确保密码安全的规定，我用意译方式把这份电报摘录如下：

“11月14日

“伦敦和华盛顿对我们与北非法方人士的谈判中发生的变化感到迷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间法国人之情绪同早先料想的大相迥庭。下面是与此有关的一些事实，而重要的一点是，国内不应轻率行动，以免我们所能建立的平衡遭到破坏。

“贝当元帅的名字在此间极有魅力。人人都企图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他是在元帅声望的庇护下生活与行动的。地方民政长官、军事将领以及海军司令官们一致认为，唯有一人有权在北非以元帅之名义说话。此人即达尔朗。连吉罗德——经过早先的几次会谈，他确实已经成为我们

---

① 喻能带来吉祥和好运之物。——译者注

一直信赖的顾问和忠诚的朋友——也承认这一考虑压倒一切，因而已相应地改变了他自己的意图。

“我方最初所以遇到抵抗，是因为法军上下一致认为，这是元帅的希望。因此，当吉罗德敦促他们对我方登陆勿加抵抗时，就被认为他至少是犯了抗命之罪。吉罗德将军对于这种普遍存在的观点是理解的，并在某种程度上表示同情。所有有关人士都说，只要达尔朗叫他们帮助我方，他们就准备这样做，但是他们不愿接受任何其他人的命令。突尼斯城的埃斯特瓦海军上将说，他将接受达尔朗的命令。诺盖根据达尔朗的命令停止了摩洛哥的战斗。在这方面要想不承认达尔朗的地位是做不到的。

“协议之要旨是法方将尽其所能协助我方占领突尼斯。这群人将为进行有效的合作而组织起来，并将在吉罗德领导下开始改组其选募来的武装部队以参加战争。这群人将用一切办法争取得到土伦舰队。我方将支援他们控制这个国家和实行绥靖政策并帮助他们装备选募来的部队。细节尚在商议中。

“除非按照我们刚同达尔朗和其他控制着突尼斯行政机构和摩洛哥部族的官员们一起制定的路线，使大家接受一项全面协定，不然我们想迅速征服突尼斯并使这里的居民支持我方的希望便不可能实现。吉罗德现在已经认识到，凭着他自己、甚至加上盟国的支持，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他已欣然接受了达尔朗集团的军事首脑职务。他同意在若干天之内不要提他的名字。若无一个强有力的法国政府，我们便将被迫实行军事占领。那样将会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巴顿将军相信，单在摩洛哥一地，要使当地部落安定下来便需要六万盟军。只要看一看部落骚乱对西班牙的影响，你们就会明白我们碰到的问题是多么严重了。”

在长时间的谈判过程中，达尔朗从来没有满怀信心地说过他能把法国舰队带到我们这边来。他想，可能是由于缺少燃料用油，也可能是由于法国南部一定普遍发生了混乱不定的局面，舰队司令目下不想让舰艇出海来加入我们这边，但是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土伦的法国海军上将决不会让他的舰艇落入德国人手中。他一再重复这句话，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方面，达尔朗确实认为，在突尼斯城的司令官埃斯特瓦海军上将一定会同北非的其他法国官员一起服从他所颁发的任何命令。使这一巨大的希望遭到破灭的原因，首先是在阿尔及尔进行的谈判耗费时间太久。这使埃斯特瓦海军上将方面产生了犹疑；因为他在获悉阿尔及尔谈判的性质的同时，也接到了维希政府要他抗击盟军，甚至据说要他让德国人进入他的地区的命令。那个地区的军事司令官们，即阿尔及尔的路易斯·科尔茨将军和突尼斯城的路易斯·巴雷将军，都处在同样犹疑不定的状态中，我们还获悉科尔茨将军断然反对与盟军达成任何协议。

就在这种犹疑不定的情况下，德军开始在突尼斯地区登陆了。第一支德军分遣队于11月9日下午乘飞机到达该地区。随后他们又尽可能迅速地进行增援，因此在阿尔及尔同达尔朗达成暂时性协议的之前，埃斯特瓦海军上将已不再可能独立行动了。他在同阿尔及尔的一位法国官员作最后一次通话时说，“现在我有了一个监护人。”这句话我们认为就是表示德军确已把他作了人质。另一方面，科尔茨将军和巴雷将军都毫无疑问地服从了达尔朗的命令，特别是科尔茨将军最后在盟军中成了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官。

在伦敦和华盛顿收到我的电报之后，两国政府使我们司令部确信，它们对这个问题已经完全明白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将支持我们的安排，只要法国方面忠实地履行其条款，并一直支持到在非洲结束敌对行动时为止。

这一安排同我们原先在伦敦时所设想的当然是完全不同了。但我们两国政府的错误估计，不仅在于对各个人物以及他们在北非的影响方面。我们两国政府还曾相信，这个地区的法国居民对维希—纳粹的统治是深恶痛绝的，因而会把在这个地区站住脚的任何盟军视为解放者而与之热烈拥抱。德国人对阿尔及尔的第一次

轰炸——有过很多次轰炸——就证明了那种想法的谬误。当然爱国者是很多的，并且当我们在突尼斯的胜利已有把握时，爱国者的人数又增加了，可是在最初胜负未定而且夜间有空袭的日子里，我经常听到这样一些怨言：“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们带来这场战争呢？在你们开始使我们全遭杀害以前，我们是过得很满意的。”安德森将军在这场战役完全结束之后写的最后一份电报中，对当地居民的最初态度作了如下叙述：

……我们在进军之际，同许多市长、铁路站长、邮政局长及其他重要官员（例如，民用电话最初就是我与先遣部队和盟军司令部取得联系的主要工具）打过交道，他们对我们的表情很冷淡，而且不大愿意公开表态，其中有少数人还怀有敌对情绪。确切地说，开始时，军队中的高级军官顾虑重重，不敢表态，低级军官大都赞成帮助盟军，士兵只是服从命令；在人民中间，阿拉伯人的表现是漠不关心或者倾向于敌对；法国人赞成我们，可是表现冷淡，民政当局总的来说是对抗的。至于说如果在遭到一次严重挫折后，我的这支孤立的小部队是否还能确保安全，对此我并不很有把握。

我们的政府曾经希望，在我们进入北非时，那里的人民能掀起一场反对纳粹控制下的维希政府统治的暴动，可是这与实际相去太远了！

通过达尔朗担任北非法国行政职务和他在法属西非的影响，达喀尔这个重要城市很快落入了盟方之手。那里的行政长官是皮埃尔·布瓦松，他是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一条腿并且双耳失聪的老军人，因此，显然不假，他对德国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深恶痛绝。他对法国忠诚到狂热的程度，认为他唯一的责任是替法兰西帝国保住法属西非。在这次战争初期，他曾在达喀尔海岸击退了企图入侵的英国部队和自由法国部队，并宣称，谁要是侵

犯他的职权范围他就打谁。然而，随着德国人侵入法国南部，他宣称，他准备通过达尔朗海军上将只接受我的军事命令，其他人的一概不理。

由于达喀尔当时并不在我的战区范围内——何况我的战区那时正在进行的一场战役已使我忙得够呛——，还由于英、美报刊对我与达尔朗达成的军事安排感到严重不安，所以我提醒我的上级注意，我没有责任使布瓦松服从那个总的投诚条件，除非命令我，否则我不参与此事。不过我也向我的上级报告，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把达喀尔拿过来；另外我还向他们报告了布瓦松所讲的话。我很快收到了复令，其中大意是：要我象取得北非地区那样，继续挺进取得西非地区以供盟国利用。

我同布瓦松行政长官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会谈是近乎戏剧性的。有很多重要的细节问题需要解决。当时还有许多英国水兵被拘留在西非，他们是在战争初期因沉船而被送上岸的。英国方面坚持要求立即释放这些人，而布瓦松则提出一项反要求，坚决要立刻停止来自与西非接壤地区的自由法国广播宣传。他说这类宣传不断地以种种罪名指控他和他的政府，使得他同当地居民之间发生麻烦。他说英国政府应该命令它马上停止广播。还提出过其它类似的要求，但没有一项被载入后来签署的文件。参加这次会谈的有达尔朗海军上将和其他法国官员，还有墨菲先生和我参谋部的其他成员。在会谈过程中，与会者越来越激动，法国人方面似乎都在同时讲话。布瓦松行政长官懂得一些英语。最后我把他带到屋角同他个别交谈。我谈话的主要内容如下：

“行政长官，要我详细而确切地告诉你英国政府将做些什么，根本不可能，就象我无法详细地告诉你美国政府将做些什么一样。不过我可以有把握地这样讲：我方两国政府已经指示我在法属西

非同北非一起参加反轴心国战争的总基础上同你签订一项协定。它们已经声明不干涉这个地方政府的事务。它们期望从你这里得到它们会从其他友好地区得到的同样的合作，这就包括迅速释放现在可能仍被拘留在你的地区的任何我方公民。它们将设法停止任何可能是针对你或你的政权的宣传，它们并将毫无疑问地尽力劝说其他合作的部队，包括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自由法国部队，同样停止这类宣传。不过，它们显然不能在这一问题上向戴高乐将军下命令。我们要利用穿越你的地区的航空路线，我们还要你站到我们这边来，而且我们希望很快实现。这些细琐事务若要把它们每一项都解决，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你就在这协定上签字，我以军人的荣誉向你担保，我将尽人事所及之一切可能，确保你我之间商定的总安排能在我方政府所指定的合作基础上得到实现，就象我们正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只要我方两国政府继续把我留在我目前的职位上，盟国方面就决不会违犯我们协定的精神，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他二话未说就走到我的办公桌旁坐下来在协定上签署了他的名字，而那时屋内其他地方还在喋喋不休。一等他签完字我就对他说：“行政长官，我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能开始利用达喀尔机场？”他看着我，立即用法语回答说，“现在就能。”布瓦松在接着的谈话中强调了他对我以军人所作的保证的重视，认为那样可以避免西非的法国机构的不必要的骚扰，并可帮助改组法国军队使之参加我方进行战争。当时我们所面临的关于法国人的问题，用过分简单的方法处理也是容易的。但是只有耐心和恒心才能使我们获得有价值的、最终也是民主的盟友。另一方面，如果运用暴力和无视法国人所感到的屈辱，那就只会发生争吵，使我们被公正地指责为纳粹分子，此外一无所得。

因此,由于我们自己武器的力量以及在北非承认了一个临时的法国行政机构,非洲西北部——包括阿尔及尔以西——的战斗,在11月12日完全停止了。

在东段,突尼斯的情况则大不一样。

## 第七章

### 阿尔及尔的冬季

进攻北非的最低目标是夺取位于卡萨布兰卡和阿尔及尔之间的主要港口，不让轴心国用来作为潜艇基地并从这些地方出发去攻打东面沙漠中的英国部队。最初几天的军事行动所获得的成功，使我们达到了这个最低目标。于是我们立刻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交给我们的一项更重大的任务上，即同当时位于一千二百哩以外地中海另一端的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的部队协同作战。我们将要摧毁处于我们两地之间的全部北非轴心国军队，重新开放地中海供盟国舰艇使用。

10月23日，在埃及，亚历山大将军把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统率的第八集团军投入战斗，突击阿拉曼的敌军战线。在两星期内，敌军匆忙向西逃窜，英军乘胜紧追。如果我们能够推进到轴心国的交通线，那就可以肯定，第八集团军辉煌的战术胜利终于会产生更伟大的战略效果。

以埃及和马耳他岛为基地的英国空军和海军，已使轴心国不能在的黎波里以东取得横渡地中海的任何实用而可靠的交通线。

我们在波尼以西占领了法属北非的阵地后，就迫使轴心国只能利用该地以东的海域。这样，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只能使用位于阿尔及利亚的波尼和利比亚西北部的的黎波里之间的港口去支援隆美尔。盟国在任何一个侧翼的推进，都会压迫轴心国的供应渠道，



并且随着盟军的不断推进,最后将会把这条供应渠道全部切断。

驻在西西里、班泰雷利亚和意大利南部的轴心国空军力量还是十分强大,所以盟国的海军不可能进入这个区域;要在最后成功地切断轴心国的交通,仍需要陆地上的推进,并且还要不断地扩建前沿的空军基地和扩充前沿的空军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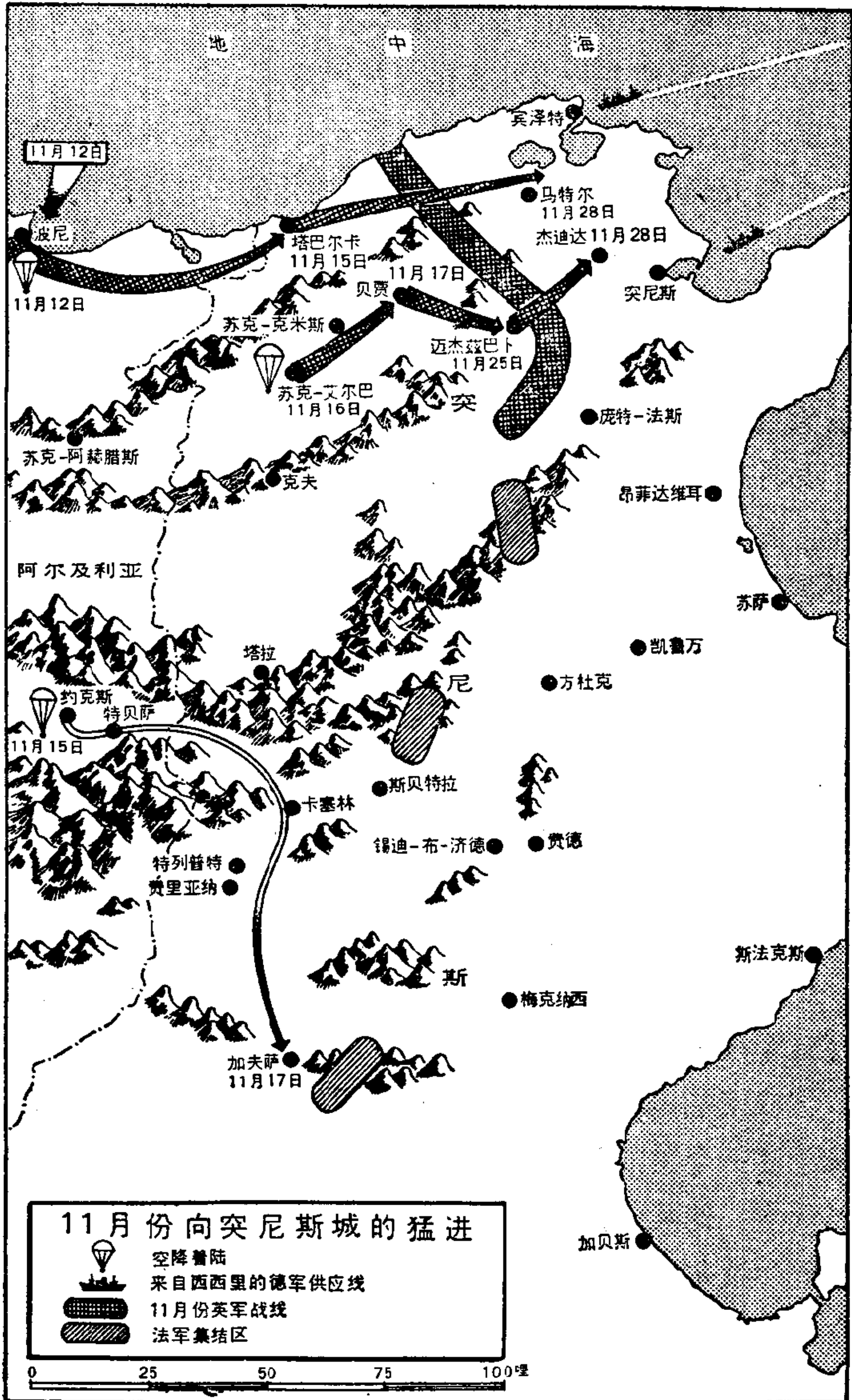
当时轴心国在非洲所占据的最重要港口是宾泽特和突尼斯城,其次是远处于南部的斯法克斯和加贝斯。的黎波里虽然是个良好的港口,但轴心国的船只驶往那里,几乎要在马耳他岛的大炮下经过,因为马耳他的日益强大的英国空军这时已足以使敌人遭到严重的损失。显然,如果我们能迅速占领突尼斯城和宾泽特,非洲的轴心国军就几乎不可能再得到增援,那时,敌人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

因此,我们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迅速占领突尼斯北部。我们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活动,都要服从这个战略目标。无论是赢得胜利或遭受失败,无论是发生什么意外或事故,也无论士兵们在战场上经常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必须时刻注视着这个唯一的目标,并且应当确信,一俟达到这个目标,轴心国在非洲就宣告完蛋。

11月中旬,我们开始了第一个军事行动,那时我们还在阿尔及尔敦促达尔朗,要求他命令法军停止战斗并与我们合作。安德森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已经建立,它的专门任务是从阿尔及尔这个基地向东进行战斗。他受命按计划实施军事行动,并竭尽全力夺取宾泽特和突尼斯城。然而他遇到了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他的兵力太弱。船只的缺乏使我们没有力量迅速及时地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安德森将军的计划只能凭着速度和勇敢来实现,而不是依靠兵员的数量。

第二个困难是我们摩托化装备的严重不足,从阿尔及尔往东



[按原图译制]

通向突尼斯城的蹩脚的单轨铁路，其距离比从纽约到克利夫兰还要远，这种情况使各种困难变得更加严重。

第三个主要困难是天气。军事行动开始不久，我们就遭到了不合时令的大雨的袭击；此外，我们打算使用的那些分散的临时机场跑道，没有一条称得上是铺设得很坚实的。因此我们的弱小空军的活动受到了阻碍，而且一连数天几乎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敌人的处境就好得多，因为他们设在宾泽特和突尼斯城的大型机场，不管天气好坏，都可以使用。

另外一个不利条件是突尼斯地区靠近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轴心国军。我们在非洲西北部登陆后的第二天，轴心国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把部队运进突尼斯，并且很快得到了支援。

还有一个在开始时就碰到的困难，即驻守在君士坦丁和突尼斯城之间的法军态度暧昧。这些部队由巴雷将军指挥。安德森将军在开始进军时，这些法军和当地居民对他向突尼斯城的推进是抱敌对态度，还是坚持中立，或是与他合作，他还一无所知。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绝对忠诚和勇敢的指挥官才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样的军事行动，出于这一考虑，我们指定安德森将军执行这一任务。他按照我的紧急命令，于11月11日脚刚踏上岸时，就发动了这个战役。

据我回忆，安德森将军及其部队几乎全是英国人，他二话未说就接受了一个美国人的这个大胆命令，对我说来，这确乎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他是一位真正的同盟者，也是一位勇敢的军人。他的部队自阿尔及尔出发，从陆、海两路向东推进，实施了一系列迅速运动之后，占领了季杰利、菲利普维尔和波尼三个港口，同时还深入内陆攻取了塞蒂夫和君士坦丁。轴心国的空军和潜艇不断使我们的舰只受到损失，并对我们能夺取的一些小港口进行严重破坏；但是

坎宁安海军上将率领的海军果断地全力支持这个军事行动，安德森将军也不顾这些威胁，毫不迟疑地向前挺进。英国第一集团军从波尼和君士坦丁这个地区继续向东推进，在通过苏克-阿赫腊斯和苏克-艾尔巴时，他们与轴心国地面部队发生了第一次接触。

11月23日，当我把司令部从直布罗陀迁往阿尔及尔时，在旅途中顺便视察了我们的部队和设备。在奥兰机场上，我确实体会到了在整个严冬折磨着我们的那种不利条件。我们在一个地面坚实的临时机场着陆，但由于周围的深不可测的泥潭，离开跑道简直不能滑行寸步。于是开来了一辆大型牵引车，凭着有人在我们的“空中堡垒”轮下放的大木板，才把我们拖离跑道好几码远，这样，后来的飞机才能够着陆。这时战术行动处于僵持状态，于是我花了一个上午去了解有关供应、住所和食品等问题。我趁这个机会第一次和库里斯·诺斯塔德中校见面，他是一个年轻的空军军官。他的谨慎态度、对问题的理解和个人品德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使我以后永远忘不了他。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少有的人，对他来说，从来没有办不到的事。

当天傍晚，我们飞抵阿尔及尔时，我才知道，我以前发出的关于从奥兰地区抽调尽可能多的美军分遣队去支援安德森的英国第一集团军的命令，并没有被明确理解，也没有坚决执行。我到达时，看见伦斯福德·奥利弗准将在办公室内，他是美国第一装甲师B战斗群的司令官。他曾去前线进行过了解，并且断定，铁路交通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刻把他的部队运往那个战区，因此正在申请用铁甲牵引车把他的一部分部队从奥兰经过七百哩运至苏克-艾尔巴。那个听取申请的参谋军官很清楚铁甲牵引车的性能，拒绝了这一个要求，理由是这样的行军会损耗这种车辆的一半使用寿命。

不能责怪那位年轻参谋军官的这种不寻常的态度。他是在和

平时期受过刻苦训练的人,那时一直要求履行节约,避免浪费。和平时期的训练,正如他所清楚地知道的,只有在费用不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他还不理解战争的严酷性;他既不懂得“战争”就是“浪费”的同义语,也不明白每一个积极的军事行动都需要付出代价。问题在于使用财富时,如何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取得最大限度的效果。当一个军事行动决定之后,就必须毫不吝惜地去使用财富,特别在这些代价可以减少生命牺牲时更应如此。

奥利弗将军的坚持态度,要求上战场的愿望,以及他宁愿进行极度疲劳的行军而不愿接受使他摆脱责任的简易解决办法的这种决心使我深为感动。于是在五分钟内,他如愿以偿地踏上了征途。

当晚和第二天晚上,阿尔及尔不断遭到轰炸。从敌方来的飞机每次数量并不多,但其持续不断的震响使人不能入睡,因此司令部人员的脸上很快就表现出了睡眠不足的倦态。敌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是停泊在港内的船只,那里距我们旅馆只有四分之一哩,但落在城内的炸弹造成了一些伤亡和严重的混乱。

我们的空中防御力量只能缓慢地发展;因为有一艘船只被敌人潜艇击沉了,船上载运着战斗机防御必不可少的警戒装备和操纵装备。但到11月底,我们已经部分地补救了这个缺陷,而德机受到几次迎头痛击后,就放弃了对我们主要港口的袭击,但试探性的偷袭和突然袭击还是有的。一天晚上,我们得到确证,说明敌人轰炸机的空勤人员对我们的防空质量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我们截获了敌轰炸机的一个中队长发回基地的电报。他说:“按命令已投弹于阿尔及尔。”但他自己也知道炸弹是扔在三十哩以外的海中,因为当时他与我们的一架飞机发生了接触。敌人士气日益衰落的事实,立刻在我们自己人中间传播开来。看到这个形势所产生的振奋人心的效果,简直令人惊奇。

在司令部只进行了三天紧张工作之后，我和克拉克将军乘汽车驶往前线。由于敌人当时还掌握着制空权，所以无论到前方地区的任何地方去行动，都是一件令人紧张的事。监视哨密切地注视着天空，只要天空一出现飞机就必须立刻下车分散开来。当然偶尔也有飞机最后弄清楚是友好的，但即使侥幸碰到这样的情况，也没有人敢继续驱车前进。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了辨别飞机的专家，不过我还没有看到谁老远就能辨别得如此有把握，以致愿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前方地区的卡车驾驶员、工程兵和炮兵，甚至步兵，都必须经常保持警惕。他们对这种情况的不满反映在他们日常的谈吐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些话：“我们那些不顾人死活的空军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德国飞机？”只要敌人还拥有空中优势，我们的地面部队就会毫不犹豫地咒骂“飞行员”。

克拉克和我在苏克-阿赫腊斯附近找到了安德森，从那里向前，我们进入了一个到处都显示出曾发生过持久激战的地区。我们沿途听到了一些言过其实的谈话。有人说：“贝贾已被炸成一片废墟。”另外有人说：“在这条路的那一头，没有活着的人了。”“我们的部队肯定要撤退，在这种条件下，人没法活下去。”但总的来说，士气还是良好的。这些夸张语言只不过是个人想表示他曾经历过极端恐怖和毁灭的场面而已，并不是想逃跑。

安德森将军的部队和指挥官们都没有经验，但是他们所具有的勇猛、大胆和坚韧的品质，即使连最有战斗经验的老兵也难以相比。物质条件之差几乎难以忍受。污泥愈来愈深，使一切军事行动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而这些漫长的道路实际上已支离破碎。冬天的严寒已降临到突尼斯高原。物资和弹药的输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務。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尽管安德森缺乏兵力——全军只有三个步兵旅和一个拥有过时坦克的坦克旅，他还是占领了苏克-

克米斯和贝贾，最后来到了一个能俯瞰突尼斯城郊区的地点。

在与敌人第一次接触后，战斗一天比一天更激烈、更艰巨、更困难。敌人的增援比我军更加迅速。

很早以前，我曾决定冒削弱后方力量的风险去加强安德森的兵力。但是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所以只能转运少量的援军，而这种增援所包含的危险甚至连最没有经验的新兵也懂得。有些顾问也警告过我，说公众反对“分散”美国陆军。有人常常问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潘兴<sup>①</sup>是怎么出名的？”但是这些顾问并没有记住潘兴在1918年3月协约国军正面临严重危机时所发表的著名声明。当时，他了解到危机的真相后，就推迟了组合一支美国集团军的打算，并对福煦说：“我们的每个人、每支枪和每一样东西都归您使用，只要您认为恰当就行。”我认为，在突尼斯，虽然作战规模比那时小，而情况却显然可与1918年危机相比，只要盟军能拿下突尼斯城作为给我国人民的新年献礼，我甘愿受此后的一切批评！

这是一场大赌博，赢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所以我们不顾一切，全力把战场上能使用的一切战斗人员完全调去支援安德森将军。当时还有人担心德国空军会飞越比利牛斯山脉来攻击我们的后方。尽管如此，美国空军一开始就被指示尽量向东移动，参加支援安德森将军的空中战斗，并协助切断轴心国在突尼斯城和意大利之间的海上交通。这是一个明显的改变，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美国空军应保留在地中海西端。美国空军向东移动就和英国空军紧紧靠拢，这样就产生了每天要协调作战的要求。

我以前把斯巴兹将军留在英国，现在召他来执行这项特殊任

---

<sup>①</sup> 约翰·潘兴 (John Pershing, 1860—1948)，美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欧洲美国远征军总司令。——译者注

务。我们只是临时增设了一个指挥机构,给了斯巴兹将军“代理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最初,美国在北非的空军司令是詹姆斯·杜立德少将,他曾因指挥对东京的空袭而闻名。此人精明强干,精力旺盛。他经过一段时间才心甘情愿地担任起美国空军司令官这个高级职务,放弃了驾驶战斗机去袭击敌人的机会。他从战斗经验中学得了极为宝贵的才能。他确实是我们的一位优秀司令官。

11月末到12月初,主要由美国部队加强东线的过程还在时断时续地进行着。由于战斗一天比一天激烈,同时又缺乏运输工具,我们不能等着把任何一支大部队整批地调来,也不能等着把这些部队集结起来以后再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拿不下突尼斯城,我们就会遭到严重损害,但我们给安德森将军下了明确的命令,要他在天气日趋恶化之前,在轴心国增援力量迫使我们只能在那种讨厌和荒凉的环境中进行持久的冬季战役之前,尽一切力量攻下突尼斯城。

我们从奥兰调来了美国第一装甲师的一些部队和第一步兵师的一部分。美国第三十四师部署在交通线上,保护一些重要地点和保证这个广阔地区的安全,否则那里会毫无防御。我们只是在一些最重要的地点才使用盟军防守,于是敌人立刻在夜间空投伞兵部队进行破坏,这使我们只好依靠法军分遣队去保护几百个暗渠、桥梁、隧道以及类似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只要有几个坚决果敢的敌人,就可以给我们的交通线造成几乎是决定性的破坏。

虽然我军每天都表现出无比的勇气、机智和耐力,但仍不能完全克服敌人、天气和地形所造成的重重困难。在12月初,敌军的机械化部队还强大得足以发动局部的、然而是很激烈的反攻,因此我们不得不从我们在突尼斯城前面的许多前沿阵地后撤。

我们停止攻击以后,突尼斯北部的形势即使从防御的角度看,



也变得对我们十分不利。由于在一次局部撤退中所犯的错误，我们失去了美国第二装甲师中B战斗群的大部分装备。美国第一步兵师中的第十八步兵队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另外一个优秀的英国团的整整一个营几乎全军覆没。安德森将军立刻认为他必须放弃迈杰兹-巴卜，这是一个交通中心，也是他与自己右侧法军的会合点。由于这里是我们一旦取得必要力量后重新发动进攻的关键地点，我不同意他这样做，因为我个人对于该地驻防部队的命运，以及对于该地一旦失守后给整个指挥区的安全所造成的后果负有责任。

我们还想发动一次我们自己部队的进攻。每天二十四小时我们一直在忙于集结兵力。我们认为，只要天气好转，这支兵力就会给我们以良好战机，在一切军事行动毫无进展希望之前，占领突尼斯的东北部。我们选定12月24日作为我军发动一次最后的、也是寄予最大希望的进攻的日期。我们把争取胜利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暂时还比较强大的炮火优势上。但从突尼斯前线传来的报告使人失望；天气不是好转，而是愈来愈坏。于是发动另一场进攻的希望变得愈加黯淡了。

我还是决定不放弃进攻，除非我自己相信进攻是不可能的。天气不容许飞行，于是我在12月22日驱车驶往前线，刚离开阿尔及尔，就遇上了糟糕的公路。一路上几乎没有停顿。12月24日凌晨，我在安德森将军的司令部里遇到了他，并且和他一起立刻前往苏克-克米斯。这里是英国第五军司令部的所在地，该军在英国陆军的奥尔弗里少将指挥下，即将发起进攻。几支分遣部队已经开始了进攻的初步行动，企图为预定在第二天晚上发动的总攻击先夺取几个重要地点。

雨不停地下着。我们亲自视察了部队必须越过那里向前推进

的郊区；就在此时，我看到了一起事件，我认为，正象其他情况一样，它使我相信这次进攻毫无胜利希望。在离公路大约三十呎远的一块冬小麦地里，有一辆摩托车陷在泥潭里。四个士兵正在设法把它抬出来，尽管他们用尽了气力，结果反而使自己陷进了烂泥坑。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这个企图，而让这辆摩托车比原来陷得更深。

我们回到司令部后，我便下令无限期地推迟进攻。这是一个迫不得已的决定。命令立即下达，从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整顿和改善我们的战线，把部队集结起来重新编队，在当地征集后备队，以及保护我们的南侧，因为那里的地形并不妨碍冬天作战。在春季天气好转以前，安德森将军要做这几方面的工作，同时要牢牢保持住已经取得的战果。

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官必须始终防止失败主义的表现；高级司令官如果灰心丧气，这种情绪必然会迅速传至指挥区，而且总会招致不幸的后果。但在这种形势下，要表现出任何特别乐观的情绪也是非常困难的。

早在11月中，突尼斯的法军就倒向我们一边，现在正守卫着向突尼斯以南延伸的险阻山区，形势朝不保夕。那里的法军虽然完全缺乏现代化装备，但并未遭受严重的损失。我们放弃立刻攻占突尼斯城的计划后，就选择了一条防线，用以保护位于特列普特、约克斯-巴因斯和苏克-艾尔巴的前沿机场。只要我们有这些机场，就能够至少在适宜的天气条件下用日益强大的空军去经常袭击轴心国的交通线。而且一旦天气、地形和日益增长的兵力等条件许可，我们就完全能够重新发动突击。因此，在冬季剩下的时间里，我们的防御计划是保护这些前方地区。如果失去了这些地区，我们将被迫撤至波尼-君士坦丁地区，而且在来年春季将面临这样一

个问题,即要在没有适当的空中支援下,付出大量生命代价,通过艰难险阻的山区,杀出一条前进的血路。我认为,我们没有忽视这些前沿阵地所存在的供应不便和遭受危险的不利条件,但这些不利条件,并不比全面撤退到比较安全和有利的阵地所产生的危险更严重。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撤退会在北非居民中产生什么样的道义上的影响,而且这个问题对吉罗德和其他法国将领也有严重的利害关系。

直到这时,从特贝萨到南面的加夫萨这个宽阔的地区的侧翼,我们只能部署分散的法国非正规军担任防卫,而这些非正规军受到由骁勇善战的埃德森·拉夫上校指挥的一支美国伞兵小分队的增援和鼓舞。拉夫上校在那个地区的战绩本身就是一部短篇史诗。他善布疑阵,出击神速,大胆勇敢并长于进攻,他的这些特长使敌人在几个星期里完全陷入混乱状态。但由于我们在北部停止进攻,就使敌人能立即在沿岸山地屏障背后随意集结部队。假定敌人不了解我军在特贝萨地区的严重弱点,那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如果我们不立刻采取预防措施,敌人可能很快给我们以严重打击。

为了提供必要的防御力量,弗雷登道尔将军领导的第二军司令部奉命从奥兰迁到特贝萨。美国第一装甲师划归第二军指挥;该师这时大部分已恢复元气,尽管有些装备已经过时。后勤参谋人员反对我提议把一个整军全部集中在特贝萨以东的主张。他们诉苦说,我们的简陋的交通条件只能维持一个装甲师和一个团的供应。但我相信敌人将会很快地利用我军在这里的明显弱点,所以我还是命令开始集结这支拥有四个师的军,并且告诉后勤人员必须设法使该军能得到供应。

我们希望划归第二军的美国第一步兵师能够尽快地从前方各分散阵地集结起来,加入该军编制。美国第九师,除去已参加阿尔

及尔突击战的第三十九团战斗队外,要从卡萨布兰卡地区逐步向东转移,当这一行动完成后就归第二军指挥。第三十四师也接到同样的命令,该师保卫交通线的任务由法军接替。

美国第二军接到的指令是为我们北部的主力部队提供战略上的侧翼防卫。弗雷登道尔奉命用几支小量的步兵分遣队守卫各山口,把已经集结起来的第一装甲师集中于各步兵前哨的后方,以便随时打击那些企图通过山口进逼我交通线的敌军纵队。弗雷登道尔在完成集结全军的任务后,又受权对斯法克斯和加贝斯方向发动进攻,力争切断隆美尔部队与突尼斯之间的交通线。有一部分参谋人员对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可能产生的战果着了迷,希望立刻命令行动。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目前我们还没有进攻能力。为了不致产生误会,我还和弗雷登道尔将军单独谈了一次,全面地说明了我要他统率的第二军集结于特贝萨地区的意图。如上所述,我的目的是为我军右翼提供一支机动的战略侧卫力量,这支侧卫的打击力量主要由已经集结起来的那个装甲师来实现,因为它拥有的坦克要比敌人能对付它的任何武器都强大。只有在他能保证这个地区不致遭到敌人攻击的前提下,他才可以向海岸线方向实施进攻,而且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不能把任何一支孤立的步兵驻防部队放在他可能占领的任何一个沿海城市。

在这次事件中,我明确地反对某些参谋人员爱用地理上的地点和目标来表达作战思想的做法。如何在必要时保护自己,如何在选定的地点集结力量以消灭敌人,象这样的作战思想是很难表达的。这样一些思想在军事行动中有着巨大的灵活性,因此计划人员感到难以把这样的思想写成文字。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在拟订计划时,按照习惯只写明夺取或者守住某些特定地理地点,这种做法有时——尤其在拟订战略计划时——是必要的,但是这样的计

划仍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可能会使接受和执行这样计划的指挥官在行动上受到束缚。不论是进攻或是防守,一般只应向一位称职的指挥官指定一项总的任务,然后提供完成这个任务的手段。这样,他才能完全放手地去实现上级所指定的总目标。

在这几个星期里,除了盟军司令部本身外,未能对这条战线建立起统一的指挥。法国人拒不接受英国人的指挥,而且坚持说,如果我一定要作这样安排,他们的陆军会发生叛乱,因为英、法两国以前在叙利亚、奥兰和达喀尔的冲突所产生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当时英国第一集团军在左翼,法军居中,美军在右翼,但是它们各自守卫住一条紧密相关的战线的单独一部分,共同依靠着一条唯一的、供应力量不足的交通线。这种日益恶化的形势充满着隐患。当时我能做到的就是设立一个我自己的前沿指挥所,并尽可能留在那里。在那里我经常留有一个小参谋部,领导人是特拉斯科特将军,他的任务是代表我处理前方的一些细小问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月中旬。那时据守战线中部的法军,在德军小规模、但却是迅猛的攻击下溃退了,这样就出现了危急形势,需要把正在集结中的美国部队重新分散开来去堵塞前线的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刚过了1月中旬,我就断然命令安德森将军负责指挥全部战线。我亲自访问了指挥前线法军的朱安将军,要他向我保证他将接受安德森将军的命令。后来,我又将这件事告诉了吉罗德将军,他没有提出异议,因为这样的要求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当安德森将军接管整个战线时,在从宾泽特延伸至加夫萨的一条漫长而脆弱的战线上,防守部队严重混杂,也没有地方后备军。在美国第二军能在特贝萨地区充分集结以及从英国来的援军能在突尼斯北部执行同样任务以前,没有现成的力量来支撑这样

一条漫长的战线。整顿部队和提供机动后备队的工作在圣诞节以前虽已开始,但因1月中旬法军的溃退和美军被迫填补缺口而遭到了严重挫折。法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缺乏勇气和胆量,而只是由于根本没有现代化装备,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设法补救的一个缺陷。

在这段时期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一直在困扰着我们;要识破成套的阴谋,层出不穷的假情报和误会,以及识破甚至是围绕这个总问题的枝节部分所产生的强烈偏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产生这种形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阿拉伯居民及其爆炸性的潜在势力。在摩洛哥的法国将军诺盖,是个靠不住的人,而且很坏,但他是摩洛哥苏丹的外交大臣;我们收到的情报都说,他深得摩洛哥人的信任 and 好感。那个地区凶猛的部族人是一股需要认真对待的势力;巴顿将军对整个形势十分担心,并且坚持他的这个看法:如果摩洛哥人起来反对我们,单在那个地区就需要六万名装备精良的美军来维持秩序。我们不可能调去——而且也没有——这样大量的部队。巴顿坚决劝我们不要理睬诺盖!

阿拉伯纠纷中的一个复杂问题,就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由来已久的对立。在北非,由于前者的人数以四十比一的比率超过了后者,所以安抚阿拉伯人而损害犹太人已经成了当地的政策;结果产生了压制性的法律,阿拉伯人把修改这些法律的任何建议都看成是企图建立一个犹太人政府的预兆,唯恐导致对他们自己的迫害。回想到纳粹多年来为煽动这里的无知居民的这种偏见而作的大量宣传,就不难理解,这种形势为什么只适于进行谨慎的和逐步的改革,而不适于采取轻率措施和进行可能的革命。谣言支配着、几乎可说是统治着这个国家。有一个谣言说我是犹太人,是罗斯福那个犹太人派我来这个国家镇压阿拉伯人,并把北非转交给

犹太人统治的。负责政治工作的参谋人员对这个谣言甚为关心，于是他们在报纸和专门小册子上公布了有关我家谱的材料。阿拉伯如果不稳定，甚至出现更坏的形势，如公开叛乱，那将把我们往后拉回好几个月，而且会使我们丧失无数的生命。

至于谈到咖啡馆里的法国人，即成天向新闻记者唠叨的那些人，对待他们的一个十分简单的办法就是：一旦辨清他是维希政府的或者是接受该政府命令的官员，就擅自把他撤职，而代之以宣称同情我们的人。但由于这些可恨的维希官员都小心翼翼地讨好阿拉伯人，所以对于人事的更替，显然只有采取逐步撤换和慎重处理的办法，才能防止这个阿拉伯人一法国人一犹太人的杂烩锅沸腾起来。

下面这个事例可以说明当时微妙的形势：很早以前，我们就坚持要法国当局修改反对犹太人的法律和措施，我们要求之强烈已远远超越了“盟国合作”的范围。于是就公布了相应的布告，我们也感到已取得一些进展。有一天，达尔朗到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封他认定是“君士坦丁的犹太法学家”的信，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惊奇。这封信要求法国当局在削弱反犹措施方面不要操之过急，否则阿拉伯人无疑会策划一次大屠杀！象这种涉及种族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使人为难的小事，每天层出不穷。

政治、经济和战斗都不可分割地混杂在一起，而且在互相干扰。

在政治方面，墨菲和他的英国同事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孜孜不倦地在工作，但他们一开始就必须与危险的达尔朗打交道，以后还要和英勇正直但不关心政治的吉罗德、怯弱的伊夫·夏泰尔、奸诈的诺盖及其他这类人物打交道。我们坚持主张实现政治自由，但每天都有新的抱怨——其中大部分是有充分理由的，说什么继续

存在着不公平、缺乏信用、只会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行动的现象。我们下决心开始清洗一批最使我们反感的人，但又为找不到满意的代替人而着急。此外，我们必须注意到我们虽然名义上是在一个盟国的土地上行动，我们没有某种军事占领所包含的权力和义务。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早就告知达尔朗，要他必须清除阿尔及利亚的夏泰尔和摩洛哥苏丹的外交大臣诺盖。

对于这一类问题，吉罗德将军是于事无补的。他讨厌政治；他不但讨厌政治中的勾心斗角和欺诈诡骗，而且对于组织一个能够适应北非千变万化形势的、有秩序的民主政府所需的各项必要工作，也嗤之以鼻。他只要求得到物资和装备以建立几个战斗师，除此以外，他对政府机构或官员一概不感兴趣。他的目的是纯洁的，但他处理比较重大的行政问题和进行组织工作的能力却是令人怀疑的。

达尔朗在12月24日被人暗杀，也就在那天，我不得不放弃立刻进攻突尼斯北部的全部想法。当时我正在位于贝贾附近的英国第五军司令部里，我听到他死亡的消息后立刻前往阿尔及尔。在雨雪和冰雹交加之中，我乘车不停顿地经历了三十个小时的旅程，才到达那里。

我和达尔朗认识，为时总共只有六个星期。他以前因与希特勒合作而臭名远扬，但在他担任法属北非行政长官期间，就我所知，他从没有违背过任何义务和诺言。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态度和性格并不能使人信任，而且由于他的名声，我们在和他打交道时总感到不安。无论如何，他的死亡又给我带来了一些新问题。

众所周知，当时在法国政府中，我最信任的自然还是吉罗德将军，但是我的司令部还不能去扶植一个傀儡政府。如果采取这套纳粹的做法，就将严重破坏我们那些为之战斗的原则，这样的错误将比



仅仅暂时吸收几个我们对其过去的经历并不满意的人要严重得多。此外,在内部会议上,我们怀疑吉罗德在这个重要岗位上是否能站稳脚跟,但是当时还没有既能接受又可以立刻使用的人。当地的法国官员立刻提名吉罗德将军继达尔朗担任北非临时行政长官。吉罗德来到了我的司令部,他的第一个要求是要我“不要把北非当作一块被征服的领土来对待,而更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正在力图转变的盟国。”一个我认为对我们的意图非常了解的人竟表现出这样的态度,确实令人有些震惊。

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夏泰尔是个软弱的人,我们谁也不信任他。他和诺盖将军就是我们要决心尽快清除的两个人,尽管巴顿将军坚持认为后者在摩洛哥为盟国工作得很得力。我自己的看法是:在诺盖将军认为盟国打胜仗时,他就会与我们合作,但当他一旦看出我们软弱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反对我们。达尔朗每次听到我们对这俩人的不满言论时,总是回答说:“我也不愿要他们,不过治理阿拉伯部落是一件难事,需要很多经验,只要您们能提出适当人选,他们在这方面有经验,而且是忠诚的法国人,我愿意立刻撤掉这些在职人员,任命您们中意的人。”

为了物色满意的人选,我们决定让马塞尔·佩罗东来阿尔及尔。有人向我报告,佩罗东在阿根廷实际上过着流亡生活,不能回国,因为皮埃尔·赖伐尔非常痛恨他。也有人报告说,他以前在北非当殖民地行政官时曾因富有才干而出名。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曾当过维希政府的官员,所以在民主世界里,他被看成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我们向国务院解释了我们的困难,并对这件事交换了几次意见,最后国务院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佩罗东虽然比其软弱和摇摆不定的前任要好得多,但让他当阿尔及利亚的总督是一个错误。要物色一个对法国殖民地的行政

管理既有经验又与维希政府没有瓜葛的人，的确是件难事。最初我们打算使用马斯特、贝图阿尔和另外一些人，因为他们以实际行动证明对我们是友好的。这里的困难在于法国陆军的态度，而我们又急需它的帮助。我们可以强迫官方接受甚至提升马斯特和贝图阿尔，但在那时，我们不能强迫社会承认他们。他们的妻子遭到了其他军官的妻子的冷遇甚至侮辱。反对他们的情绪一开始就是如此强烈，以致连他们自己和吉罗德也规劝我们，不要考虑让他们担任行政职务。

在这段时期，我又犯了一个动机善良的错误，这就是对从北非发出的政治新闻实施了为期六周的检查。因为我个人不喜欢搞新闻检查，所以除非使我相信采取这个行动的理由是重要的，否则我就不会这样做。这次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我的政治顾问和我本人的计划是，最终促使当地的法国行政机构和伦敦的戴高乐部队团结起来。我们认为，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但又很必要。

当地的法军和政府中的各级人员，对于戴高乐有一种强烈的反对情绪，但他颇得平民的欢迎，并且这种感情随着盟国的胜利前景所发出的光辉而日益增长。伦敦和中非的戴高乐部队，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激烈地攻击在非洲的每一个法国军官和政府官员，而后者也以同样尖刻的语言公开回击。我相信，如果容许这种公开点名的互相抨击继续发展下去，必将造成以后势不两立的局面。通过对双方实施政治性的新闻检查，我就能阻止当地法国官员参加公开的争吵。他们和战地记者一样，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我认为这次新闻检查取得了某些预期的效果，而且当我知道吉罗德和戴高乐已同意在卡萨布兰卡会晤时，就立刻解除了检查。我们当时不能说明实施这次新闻检查的原因，所以自然地引起了国内的误解。

军事和政治的微妙形势，又因经济上的困境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北非缺乏日用品，而海运力量又是如此薄弱，以致每一个能用的吨位都被用于军事需要。这里迫切需要小麦、煤、布匹、药品、肥皂和其他很多项目的日用品。我们虽然把军事需要作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准则——对每个问题的决定都要看它对军事形势的影响，但经常还是很难说清楚，究竟是运一船炸弹，还是运一船煤，最能满足军事的需要。

在圣诞节的日子，我骇然感到人的精力有一定的限度，一个人确实不能超过这个极限。我从健壮的前辈那里继承了结实的体质，而且对保持健康的要点一直十分注意。我常常看到别人表现出疲倦和精疲力竭的现象，但过去相信自己还不致于这样。我认为，一个人只要不陷于无谓的烦恼或过度浪费精力，就很容易持久不停地坚持工作。但是在12月的几个星期里，我不断地在旅途中疾驶或飞行，睡眠时间愈来愈少，而且还被过去所没有的神经过敏所打扰，我明显地感到精力衰退到不能恢复的地步。圣诞节那天，我得了重感冒，但还认为不用上床休息。最后我真的病倒了。

于是医生对我进行了照料。在四天中，他们不准我活动。在那个时期，我不但恢复了健康，而且还得到了一个永不违背的教训，即健全的体质是成功地指挥作战的基础。所以在战争期间，除了一些小毛病外，我再也没有生过病。

12月份，我们接受了第一个陆军妇女队，这个编制当时称为陆军妇女辅助队。在我到伦敦以前，我一直反对妇女在部队中服役。但在英国时，我看到她们在各个岗位上，甚至在现役的高射炮兵连里，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从此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在非洲，许多军官对妇女在军队中的作用还有怀疑，尤其是一些年龄较长的司令官，更是满腹的忧虑和怀疑。这些人没有注意到战争的需要起

了变化。格兰特将军<sup>①</sup> 或李将军<sup>②</sup> 的简单司令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支包括管档案的文书、速记员、办事员、话务员和司机的队伍已经成了必不可少的力量，如果有大批的十分称职的妇女不去使用，反而到需要的人力中去抽调人干这些工作，那就不能不说是犯罪行为。在来到我们部队之后，她们这支队伍因工作富有成效而声誉不断提高。到战争快要结束时，连一些最顽固的人都信服了，而且还要求增派妇女队员。在一开始，我们出于关切，把她们安插在总司令部和一些安全基地，但随着服务范围的日益扩大，她们的工作地点也逐渐靠近前线。长期以来，护士早就被看作是战斗力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从这次战争爆发时起，我们的护士就沿袭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传统；因而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其他工作中使用妇女时最初会遭到抵制。她们成了医院的护理、营养师、私人助理，甚至许多司令部的低级参谋人员。乔治·巴顿在战争后期坚决认为，在对他帮助最大的助手中，有一个就是陆军妇女队的办事员。

八个月以前，我的私人幕僚只有两个，但到12月末，已经有了一个班子，这个班子在以后的战争年月里始终稳固地保持着。哈里·布彻海军中校和欧内斯特·李上尉是我的私人副官。南纳·雷、马格丽特·奇克、休·萨拉菲安是我的私人秘书。凯·萨默斯比是通信秘书兼司机。伦纳德·德赖士官和皮尔里·哈格里夫斯士官是司机。波普、摩安奈、亨特、诺瓦克和威廉斯（后由法尔士官接替）等士官负责住所、野外营房和炊事等工作。苏格兰警卫队的詹姆

---

① 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 1822—1885),美国将军,南北战争末期,曾任联邦军队总司令,1869—1877年任美国第十八届总统。——译者注

② 罗伯特·李(Robert Lee, 1807—1870),美国将军,南北战争期间,担任南部同盟叛军总司令。——译者注

斯·高尔特上校不久前来到我这里,而且在以后的战争时期一直以英国军事助理的身份和我在一起。

米歇尔·麦基奥士官是我的勤务兵,他总是日夜紧跟着我。在非洲,有一天我必须立刻赶赴前线,于是我打电话给麦基奥,叫他把我的行装带到机场来。当时飞行条件很不利,而且在突尼斯这个山国里根本没有飞行支援,所以飞行的前景并不是愉快的。当我进入飞机时,发现麦基奥准备和我一起去。我说:“密基,我打算明天就回来。我想,在这段时间里不需要你帮助。飞行条件又不舒服,用不着我们两人一起去受罪。你回司令部去吧!”

这位士官的脸色变得有点苍白,他两眼盯着我说:“长官,我妈来信说,我在战争中的任务就是照顾您。她还说‘如果艾森豪威尔将军在这次战争中回不来,你也别打算回国。’”

不仅这位士官如此忠诚热情,而且连他的母亲也说出这样的话来,此情此景使我感动得几乎无话可说。我只好回答说:“好吧,快进飞机来。我们已经晚了!”

战争结束后好几个月,我听说有一个女房东不让麦基奥全家在她公寓的一个单元里临时居住,理由是:“不管怎么说,他总归是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随从,我必须在我的公寓里保持原来的社会风气。”我相信这个女房东没有考虑过她和麦基奥士官在我的喜爱、尊敬和钦佩的感情中所占的比重!

我在战争期间的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就是我的私人幕僚对我的帮助。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认为,为了我的事务和安宁,甚至为了我的舒适和方便,他们可将自己的一切个人愿望和抱负完全置之度外。

在公务方面,我有一个出色的参谋部,其中许多人在整个战争时期和我一起工作。参谋长是史密斯将军,他领导下的参谋人员

是：英国陆军的汉弗莱·盖尔将军、怀特利将军和肯尼思·斯特朗将军；美国陆军的埃弗雷特·休斯将军、本·索布里奇将军、洛厄尔·鲁克斯将军和阿瑟·内文斯将军。他们以及他们的很多助手在非洲战役中，已经掌握了在单一指挥下调度大量盟军的艺术。如果没有这批有才干的人在盟军司令部的各重要参谋岗位上工作，就不可能使盟军统一起来。公众实际上对他们毫无所知。但他们以及其他许多高级司令部中工作的同事，在为争取突尼斯、西西里、意大利和欧洲西北部的胜利而进行共同行动方面所负的责任，并不亚于许多因取得辉煌战果而闻名的将领。

每一个司令官总是细心地只物色最优秀的军官来担任他司令部中关键的参谋职务。尽管这种人一般都很想上战场去指挥战斗，而且都能干得很出色，可是他们却把自己的才能投入了参谋工作的苦差使，而所获得的奖励，却比他们的前线战友要少。

## 第八章

### 突尼斯战役

12月,我们接到命令,说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将各自率领一批军、政要员于1月份来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我们奉命为这次会议作好一切准备。

我始终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总统和首相来卡萨布兰卡开会。选择这个地点,可能是想使斯大林总理远道来参加会议,也可能是他们两人认为,在盟军刚占领的地方会面会产生某种心理上的好处。当时我们认为,在这里开会是一件冒险的事,因为敌人轰炸机不时飞临该地区上空,而且在居民中有许多敌对分子(其中不少是狂热分子)完全可能采取极端行动。我们对会议作了十分谨慎的准备和大量的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保守秘密的工作上。

会议按期召开了。在会议进行讨论期间,英、美两国的三军军官被召来参加会议,以便为专门问题作证。我也参加了整整一天的会议。在来这里的旅途中,由于飞机的两个发动机失灵,突然碰到了一点意料不到的危险。在驾驶员约克·里迪上尉的命令下,在最后五十哩的旅途中,我们所有乘客都揸上降落伞站在机舱门口,只要有紧急通知,就准备跳伞。当时我有点焦急地想到过去因踢足球而负伤的膝盖,但使我高兴的是,我没有采用这种方法着陆。

我只参加了一天会议。我在别处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在 这里除了参加必要的会议外,连一刻也不能多呆。后来马歇尔将

军来阿尔及尔访问我时，我才知道了许多情况和决定。但在我参加的这次参谋会议上，对北非的军事形势还是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我分析了在北部迫使我们中断进攻的形势，又概述了最近在特贝萨地区筹建第二军的情况。我还告诉与会人员，如果我们能在那里建立和保持这个军，而敌人又没有行动，我们以后还能向加贝斯和斯法克斯推进，但现在还不能预测准会这样做。如果有此可能，并且能尽快地进行集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行动，但是我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当时是、以后仍然是保证我们无掩护的右翼的安全。

亚历山大这时插话说，我们可以放弃进攻的打算，因为英军很快就会攻入的黎波里，如果该港全部可以使用，英国第八集团军在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就可以到达突尼斯的南部边境。这真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还和马歇尔将军、首相以及另外一些人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在傍晚，总统传话说要单独接见我。在战争期间，我和罗斯福先生进行过几次亲密无间的私下交谈，这是其中的一次。他表现得乐观而轻松，几乎达到了无忧无虑的地步，我认为这与他冒险远征卡萨布兰卡有关；看样子，他精神非常振奋，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几天来成功地摆脱了繁忙的国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能秘密从华盛顿脱身，到这个在两个月前还是战场的地方来举行这次历史性的会议。虽然他认识到盟国仍面临着严重的战争问题，但他所议论的，大部分是遥远的未来和战后的任务，其中包括有关殖民地和领土的处理问题。

他详细地预测了法国在欧洲恢复过去的威望和势力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他是悲观的。因而他就在这个问题上绞起脑汁，想着用什么方法去控制他认为法兰西帝国再也不能掌握的那些战



略要地。

他特别感到有趣的是我对法国的几个知名人士，尤其是布瓦松、吉罗德、戴高乐和弗兰丁的印象；这最后一人我还没有见过面。

我们详尽地讨论了前十个星期中军事和政治形势的发展；他明确而直率地对我们已取得的进展表示高兴。然而当我简略地谈到由于冬季的到来，形势会对我们转向不利的某些可能时，他的态度表示出我对形势估计得太严重了。我们俩人都知道，非洲的轴心国部队不能长期地抵挡亚历山大将军和我们所发动的钳形攻势，但罗斯福总统估计敌人的最后崩溃会提前许多个星期，我认为这未免太乐观了。他坚持要我定一个日期，我顺口说出了我在战争时期作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一个猜测。我说：“5月15日。”此后不久，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亚历山大，他笑着说，在那次会议上他也回答过同样的问题，他是说“5月30日”。

我发现总统在考虑非洲当前的问题时，总是没有把对敌占区的军事占领和我们在北非的处境这两个问题明确地加以区别。他不断用命令、指示和强迫性的语气提出一些对当地居民、法军和政府官员有影响的计划和建议。因此我不得不提醒他说，从一开始，我们的行动所遵循的政策就是要求我们去赢得和利用一个同盟国，而决不是去统治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我们的企图只是促使该政府逐渐扩大其基础，从而最后达到把全部内政转交民众管理的目的。他当然同意这个看法，并且我也知道，早在进攻前很久，他亲自参与研究过这项政策的原文；但他仍然是——也许是下意识地——从一个征服者的角度讨论当地问题的。如果我们照他说的那样去干，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了！他还机智地指出，既然法国人迫切地想取得大量军事装备，那么我们就以此为条件，采取要他们服从美国在欧洲方面的战略观点，使用他们的基地，并逐步撤换反对

美国政府的法国官员，这是完全适当的。如果他们对这些重要问题不予全面支持，那么武装他们显然是毫无价值的。他特别迫切地想让布瓦松继续管理法属西非。

在整个谈话中，我最感到满意的一部分是，我已取得了总统坚决支持我们欧洲战略基本概念的保证，即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sup>49</sup>他确信在春夏之际，地中海区的战役会产生巨大的战果，但他确切地认为，这些战役只不过是对于几乎一年前盟国已经一致同意的那个宏伟行动的初步支援，而那个行动才是盟国力争打败德国的真正路线。

我在后来拜访首相时，也很高兴地得到了这样的保证。他说：“将军，我在这里听说我们英国人正在计划拆‘围捕’行动的台。不会这样的。我不会食言。但现在我们面前有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决不能放过它。只要时机一到，您就会看出英国人在其他战斗中随时会贡献他们的力量。”“围捕”行动这个代号后来改称为“霸王”行动。

总统希望通过吉罗德和戴高乐之间的和解，能迅速解决法国的政治局势，并认为他能去说服双方，使他们相信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符合法国的最高利益。在谈话时，他还经常谈到些私事。他记忆琐碎事情的能力之强，使我感到惊奇。他记得我弟弟米尔顿曾经到过非洲，而且告诉我他指派米尔顿到由埃尔默·戴维斯领导的战时情报局工作的原因。他几乎能逐字逐句、甚至能整段地重述我过去向他报告达尔朗问题的电文，他说这份电报对于安定人们唯恐我们会变成法西斯的恐惧心理非常有用。

我回到阿尔及尔不久，总统和首相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其中与我直接有关的一项决定是：一俟英国第八集团军和沙漠航空队通过的黎波里和突尼斯南部而进入突尼斯，它们将并入

盟国武装部队并归我指挥。我在卡萨布兰卡时就已知道了这个总的计划,但直到马歇尔将军后来到阿尔及尔时,我才知道它已被正式批准。亚历山大将军担任盟军的副司令,坎宁安海军上将继续担任我的海军总司令,阿瑟·泰德空军上将任命为空军总司令。我们设想的这个建制将于2月初生效。

这个发展使我特别高兴,因为它首先意味着地中海中部的行动将会完全统一,并且它为进行有效的战略和战术的配合提供了必要的机构。我向总统和参谋长报告,如果授予亚历山大最高职权,我乐于在他下面工作。我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盟军的地面力量在与沙漠部队合并后,英方兵力将更占优势。我们都表示满意,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在一个盟军指挥部内进行统一思想和行动的工作,这是一段特别令人愉快的经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还作出了一些对我们以后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决定。对我们来说,其中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在肃清非洲的敌人之后,立刻准备进攻西西里。

1月剩下的时间和2月初,我们赶快对战线进行适当的部署,并改建机场和调运增援的部队和物资。敌人以小股部队连续不断地攻击我们的前线,阻碍我们完全实现把较大的部队组成适当队形的计划。这种攻击对美国第一装甲师的影响特别严重,因为集团军司令认为必须把该师分成较小的单位,部署于他前线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马歇尔将军和金氏海军上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来到了阿尔及尔,我们三人详细分析了局势,他们虽然都看出我的这项全面行动计划暂时失败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但还是热烈地支持这项计划,金氏海军上将说:“我们见过一些司令官因为坐等敌人进攻而得到的结果。要继续不断地狠揍他们!”

我预期亚历山大将军和泰德空军上将能于2月4日或5日在突尼斯与我们会合,并希望他们来到后,会使这个战线的几个部分能够更好地采取统一行动。指挥英国第一集团军的安德森将军早已把全部兵力投入了北部战线,由于他受到交通线和指挥所位置的限制,要他再有效地去控制这条漫长战线的中部和南部,就非常困难了。另一方面,从西部横跨北非到东部的通讯设备质量很差,这使我不可能持久地呆在实际上是单独的一条战线上。亚历山大来到后,就会自行改变这种局面。

我仍然对安德森和弗雷登道尔表示担心,认为他们应该明确理解我在突尼斯南部的意图暂时是防御性的,也应理解我们的部署是为了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和守住前沿机场。1月18日我飞往君士坦丁,在那里我和安德森、弗雷登道尔和朱安三位将军以及一批参谋军官举行了一次会议。我再一次指示安德森要尽可能把第二军、特别是美国第一装甲师的兵力充作快速预备队。我又重申南部地区的防线应该加强。在这次会议上我告诉他们,我从卡萨布兰卡了解亚历山大所以要越过沙漠迅速向西推进,其目的完全是为了我们的需要,即在两军最终会师之地有效地保护我们自己。我们鼓励发动小规模袭击和战术行动,但不准进行扰乱我们步调的行动。

2月1日,我在一次前线视察中又碰到了安德森,再次向他重述了我的指示:在南部战区,必须保留一支强大的快速预备队。然而,装备很差的法军无力抵抗敌人在英军和美军之间的山区不断发起的小规模攻势,这使安德森一直不能按照这些命令去行动。他经常被迫抽调英、美部队去填补中央战区的缺口。

2月初,我们得到的情报表明,敌人正在准备对我前线发动比过去任何一次更加凶猛的反攻。为了加强这次反攻力量,隆美尔

的一些部队匆忙地从黎波里回到突尼斯同冯·阿尼姆和梅塞的部队会合。我们最初的情报曾预料，敌人可能通过方杜克山口发动进攻。当然我们到处都已有了防备，但不管敌人会通过哪个可利用的山口发动进攻，为了对付这次即将来临的攻势，把我们的快速预备队，特别是我们的装甲部队充分集中起来，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

从南部的加夫萨一直延伸到左翼靠近方杜克的这一漫长战线，是最危险的地区，这里由美国第二军防守。我和几个参加过卡萨布兰卡会议的人在阿尔及尔商谈过以后，立刻就到这一部分战线视察，并呆了一个星期，那里的防务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足以应付预料中的进攻，对此我感到满意。但我从亚历山大将军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即他在本月16日或17日以前，不能到达这一战区，因此我认为，虽然安德森将军已在这条战线指挥了好几个星期，但我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个人行动还是迫切需要的。

2月12日深夜，我离开阿尔及尔，沿途召开了几次会议，于13日下午来到弗雷登道尔的司令部。这是2月11日授予我四星上将的临时军阶后的第一次公出。在正规军中，我仍然是一个中校。

第二军司令部设在一个很深的和几乎难以到达的峡谷中，它位于特贝萨以东几哩的地方。这里距战线很远，但是考虑到战线的长度和交通的不便，作为主要司令部的所在地，这里可能是能选择到的较好的地点。我到司令部时，听到一阵阵锤击和凿岩的嘈杂声。经询问后，我才知道是该军工程兵为了给参谋部提供安全场所，正在峡谷的一侧凿隧道。我私下询问，为什么这些工程兵不先去协助和准备前线的防御工事，有一个年轻的参谋军官对我不了解情况显然感到惊讶，他说：“噢，各师都有自己的工程兵在干！”这是我在战时第一次看到一个师级以上的司令部这样关心自己的

安全而在挖地下掩护所。

在弗雷登道尔的一个参谋军官拉塞尔·艾克斯中校陪同下，我立即开始对前线进行整夜的视察。当时第二军由美国第一装甲师和第一步兵师组成，和它们在一起的还有集结在这一地区的美国第三十四师。第九师也接到命令，在它调来时，就到这里和它们会合。

我发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是苟安心理，这表现在有些人毫无道理地拖延不去加强一些山口的防御阵地。这是因为这些司令官缺乏训练和经验。有一个地点根本没有布雷，理由是防御的步兵到这里刚刚两天。那个司令官还傲慢地解释说，他已制订了一张地雷防御图，准备第二天开始布雷。我们在突尼斯北部已有了经验，敌人往往在到达一个地点后两小时内就能构筑一个足以抵抗反攻的坚固的防御阵地。敌人在夺取一个丘陵或其他地势后，一贯的做法是立刻布雷和建立机枪阵地，还要在附近部署后备力量，以便随时能使用这种力量有力地抗击我们的进攻部队。这些战术教训显然被一些司令官忽视了，他们之中有些人甚至已到这个战区达三个月之久，但对这些教训也置若罔闻。我命令他们立刻改正。

但是最严重的缺点是，第一装甲师仍没有充分集中起来，这就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使用。当时，在安德森将军负责的漫长战线上，后备力量非常薄弱，以致使他认为，必须把该师的一半力量部署在预料敌人会发动主攻的方杜克附近，而且把这部分部队当作后备力量，由他自己亲自调动。该师的剩余部分，以分遣队的形式分散在第二军整个前线的南面。结果，第一装甲师师长奥兰多·沃德少将，除了掌握一些轻型坦克分遣队以外，就一无所有了。

那天晚上，我视察了梅克纳西和费德山口之间的防线。在费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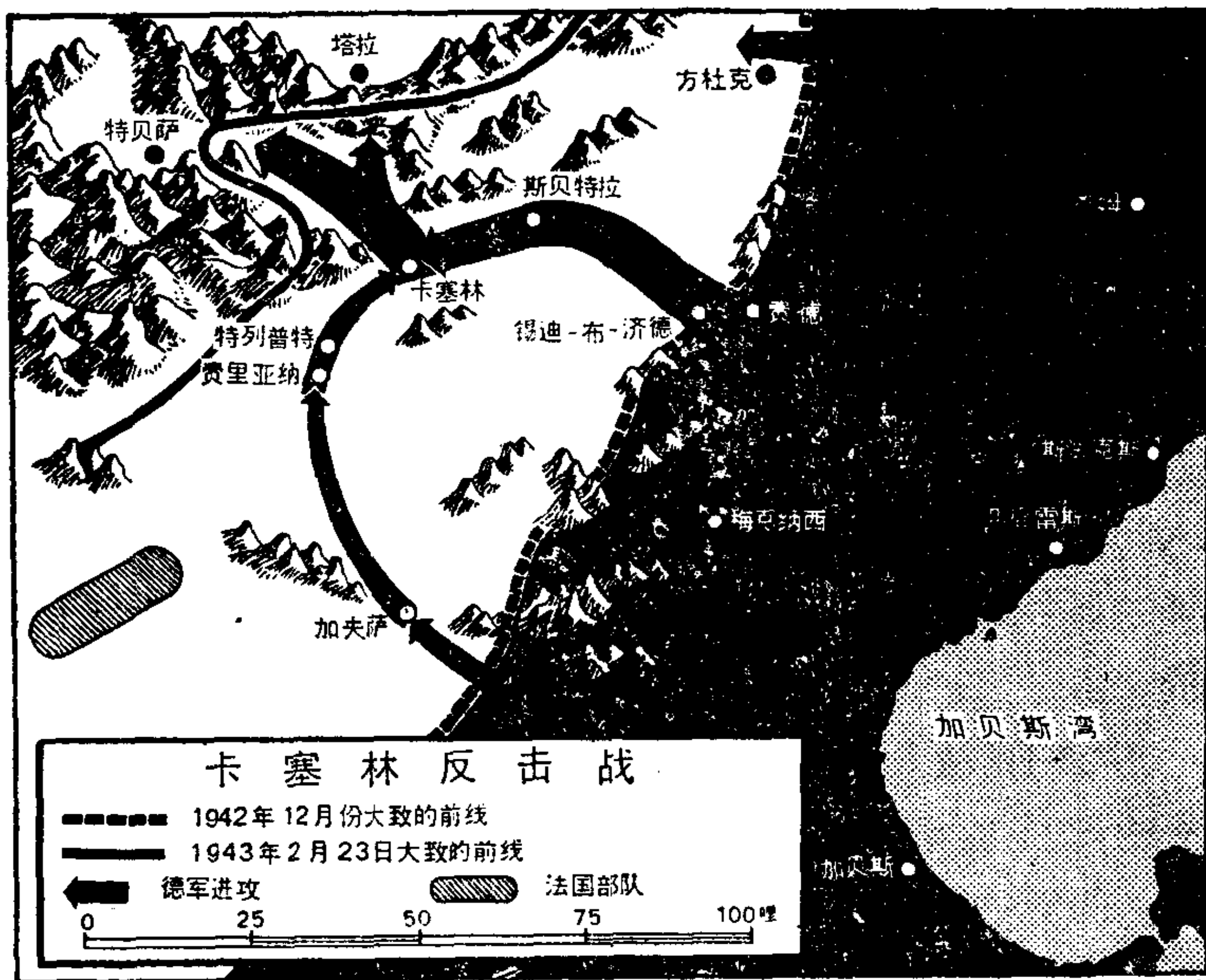
山口附近，我授予一个英勇善战的美国军官一枚勋章，在这之后的两、三小时，敌人就向锡迪-布-济德山口外面的阵地发动了进攻。

我的老朋友保罗·罗比内特准将，当时在方杜克附近的一条山谷内指挥一支装甲部队。他肯定敌人不会在这里发动进攻，并且在地图上给我指出他的侦察巡逻队渗透的距离。他说他已多次把这些事报告给了他的上级。我相信他的报告是准确的，并告诉他，我明天将与军长和集团军司令一起处理这个问题。

在这个疲劳的夜间的剩余时间里，我和一些司令官进行了商谈，有些问题我记录下来准备与弗雷登道尔将军一起处理。我们这个小视察团于黎明前返回原途，但刚到斯贝特拉，前面突然响起了一阵阵枪声。于是我的助手李上尉和艾克斯中校组成了突击波，而我拿着零点四五厘米口径的武器作为快速预备队，共同进行了一次威力侦察，然后我们又驱车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这个城市。不久，我的司机睡着了，把车开进一条浅沟，但没有造成伤亡。我刚到军司令部，就知道德军已开始进攻。现在要改变部署，为时已太晚了。

早晨，美国部队把敌军的兵力和从费德发动进攻的方向不断地报告给安德森将军，这些报告后来证明是十分准确的。但集团军司令部和盟军司令部的情报科都未予重视，认为这是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部队把事情看得过分严重了。原来集团军司令部和盟军司令部的情报科都坚信敌人的主攻仍将来自方杜克，它们的这个判断是我以后才知道的。情报科的错误是严重的，所以在这次战斗结束后，我立刻撤换了盟军司令部中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由于这个错误的判断，使敌人在安德森将军了解实际情况以前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傍晚时刻，我知道前线迫切需要援军和装备，于是赶回司令部



[按原图译制]

催促赶快运送。在我们凑集了枪炮后，我又折回前线。

美军在往卡塞林山口撤退的途中，进行了一系列英勇的、但是无效的拖延性战斗，因为卡塞林显然将成为一个需要固守的地点。但由于对当地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被派去的部队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足以守住那个重要阵地。于是敌人的装甲部队突破了我军在这个山口仓促设立的防线。

然而，尽管我军遭到突然袭击和较大的损失，但最后还是恢复了元气，并后撤以掩护特贝萨这个重要城市和从卡塞林向北通往克夫的几条要道。

我们被迫暂时放弃了位于特列普特的前沿机场，但在撤退时，飞机和人员都没有损失，只是丢弃了少量的燃料和其他物资。在特贝萨后面就是约克斯-巴因斯机场，因此，对第二军来说，守住这



个交通中心,无疑是很重要的。再往北,第二军必须抗击德军顺塔拉方向朝克夫的渗透。第三十四师位于北侧,尽管它长期没有战斗并且兵力分散,但在这次防守中表现得很出色。为了阻止敌人向北推进,英军的炮兵和坦克从北部赶来,那时北部的敌人为了加强对卡塞林的进攻,已经削弱了它的战线。美国第九师的炮兵部队也有力地参加了这次战斗。到21日晚上,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敌人的推进已经到了极限,而且供应情况正在恶化。更甚于此者,敌人的交通线必须要通过易受攻击的卡塞林峡谷,并且敌人部队在通过那个地点向西面推进时,随时会遭到我们能调来的任何部队的攻击。

到22日,敌人的推进完全停止了。乔治·巴顿一贯喜欢引用历史的先例,他说:“好啊,冯·阿尼姆应该读一读李将军进攻斯特德蒙堡的历史教训。”斯特德蒙堡位于彼得斯堡外边,当时南军<sup>①</sup>在那里发动了最后一次不顾死活的反攻,但为强大的北军<sup>②</sup>后备部队所阻并被赶了回去,南军在撤退时受到惨重的损失。

参谋部总是被人指责爱从阴暗面考虑形势,这次它又制订了一项计划,内容涉及万一敌人渗透到第一集团军的主要交通线时我们应采取的各种行动。我告诉他们,这项计划已没有进一步考虑的必要,因为敌人实质上已经受阻。但是我最后还是同意不妨让下级知道,如果发生某种象这样完全预料不到的情况,他们该如何行动。亚历山大、斯巴兹和其他一些人都一致认为,当前的危险已经过去,我们应该回头来考虑如何严惩敌人。

在此以前,恶劣的天气使我们不能有效地使用日益强大的空军,但这时倒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于是我们把所有作战飞机全部投

---

① 即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部同盟叛军。——译者注

② 即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联邦政府军队。——译者注

入战斗。在空袭期间，发生了一件使人为难的事件，这件事的产生，一方面是战斗飞行人员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是技术上的困难，这是那些坐在安乐椅上侈谈战斗的人所无法体会的。

有一批“空中堡垒”奉命轰炸卡塞林山口，它们在阴云密布的天气下起飞，因此要花费一些时间去搜索目标。它们单纯依靠推测航行法飞行，结果完全迷失了方向。当它们最后确定已飞临目标区时，便把炸弹投到苏克-艾尔巴，这是我们战线内的一个重要城镇，距卡塞林山口一百多哩。有许多阿拉伯人被炸死和炸伤，许多财产被炸毁。我们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以避免不愉快的后果。我们已经了解到，当地居民几乎对任何问题都乐于用钱来解决，何况我们的错误是如此明显，所以除了向他们道歉外，我还马上批准了几千美元的赔偿费。在战争中，经常有这类偶然事件需要立刻用钱去处理。陆军部知道了这种情况，就给每一个战区司令官一大笔款项，以备不时之需。

22日晚，我单独和弗雷登道尔将军讨论了形势，并告诉他，敌人已没有能力再发动进攻。我还告诉他，如果他能得到他的炮兵的适当支援，他可以十分安全地冒任何合理的风险去发动一些局部性的反攻。我对这个估计有着充分的把握，所以我告诉这位军长，如果他因采取猛烈行动而发生什么不利后果，我愿负完全责任。但弗雷登道尔感到敌人的“弹药柜里还有一些子弹”，并且认为，在此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应该改善和加强他的防线，而不是去集结足够的力量向卡塞林发动反攻。谁也不能为这个决定进行激烈的争吵；我当时的想法和愿望是迫切希望立刻利用这个为时极短的机会，在敌人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恢复过来以前，能狠狠地打击他们。

第二天早晨，德军开始撤退的迹象变得很明显了。敌人在夜间迅速移动，在白天又依靠云层的掩护，成功地撤走了大量进攻部

队。盟军在全线不断施加压力,敌人不久就被赶回他们原来的阵地,此后,敌人从那里再也不能打算发动重大的反攻了。

在这次战斗的最后几天,亚历山大亲临战场实行指挥。此后,我对他的军人品质甚为尊敬和钦佩,而且这种感情在以后的战争年月里与日俱增。我们战线上的某些弱点使德军在这次战斗的初期取得了胜利,对此我应该负责。在1942年11月把法国部队划归盟军指挥时,如果我立刻明确地说明他们的战线应隶属于安德森将军,那么以后就不致于这样混乱了。这样的安排,在一段时期中也许会产生不满和增加困难,但总的效果将会是有利的。此外,在蒙哥马利的军队从沙漠向我们靠拢以前,我就应该明确限定第二军的主要军事行动将在我们的南侧地区。毫无疑问,我们把第二军的战线向南延伸并包括加夫萨,就是打算要这个军去做力所不及的事。

在沙漠部队迫近突尼斯南部边境以及在这两支军队有可能进行有效的协同作战以前,加夫萨本身对我们并不重要。然而它是保护特列普特的重要机场,使机场不受来自南方的任何袭击或攻击的最有利的地点。我们迫切地需要前沿机场,而其中最好的一个就在特列普特。这个机场位于一块沙质平原中,从来不会因下雨而影响作战行动,只是偶而发生的沙漠风暴才会妨碍使用。由于这个机场有这些优点,我们在那里部署了大量的空军部队,存放了大批的物资和修理设备。较好的部署应该是:只派一支侦察队到加夫萨,而把防御部队置于较远的后方。要守卫加夫萨,就会削弱第二军防守的这条漫长战线的其他部分,而且由于美国第一装甲师还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强有力的反攻,因而整个形势显然出现了危险。

从技术上看,我们产生的困难来自以下四个主要原因。首先

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想很快夺取突尼斯城,这一胜利希望很小的冒险行动的失败造成了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这个冒险行动是按照我个人的命令进行的。以后,分散的兵力不能迅速地集中起来准备抵抗敌人肯定会发动的反击。如果在11月底我就承认这个暂时的失败从而转入防御,那么敌人对我们的进攻连暂时的胜利也不能得到。

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情报部门的失职。参谋人员绝对相信他们手头所掌握的一些片面情报,而不考虑任何相反的可能性。他们断定,敌人一定要通过方杜克发动进攻,虽然我们驻在方杜克附近奥赛尔提阿山谷的侦察队坚决认为德军没有在该地区集结,但情报部门还是盲目地坚持它的看法,这样就促使集团军司令作出了错误的部署。

第三个原因是没有清楚了解敌人的力量和对付这些力量的最好办法。从第二军前线的形势来看,只需要用少量的侦察部队和掩护部队守住各山口,而把当时拥有的最强大的快速预备队部署于紧靠山口的后方,以便迅速而有力地打击敌人对山区的任何渗透。总的来说,关于这次防御的指示在这方面是明确的,但是局部地区出现的恐惧,再加上不准确的情报,导致了快速预备队的分散,从而使他们在敌人进攻时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第四个原因是缺乏经验和锻炼,这特别表现在某些司令官方面。战争实际爆发后,美国虽然制订了加强训练的计划,但在这里作战的美国师尚未从中受益。其中大部分师是被仓促运到英国的,而且由于当时的运输设备没有象以后那样高的效率,所以他们和自己的建制装备曾经长期分离。在1942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训练。美军官兵的表现就是这种缺陷的结果,虽然他们刚毅勇敢,但他们最初的战斗力就不如受过整整一年紧张训

练而后投入战斗的美国师。

这些教训的代价很高,但它们是有价值的。最后这个代价还是减少了,因为我们损失的绝大多数人成了敌人的俘虏,战争结束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找到了。我们的部队遭受了伤亡,装备也有损失,但敌人在成功地撤至他们以前的阵地时,其部队和装备的损失也与我们不相上下。从2月14至23日,美军有一百九十二人死亡,二千六百二十四人受伤,二千四百五十九人被俘和失踪。

敌人为时一周的进攻,搞得我们精疲力竭和焦虑不安。无论何时,只要把主动权断送给敌人,就必然会产生紧张和忧虑。因为在这种局势下,随时可能发生各种情况。谁也不能避免;尽管对全局和最终结果抱有信心,但局部性的灾难总有可能发生。

卡塞林战斗标志着这次战役的一个阶段的结束。这次德军进攻的失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敌人已经失去了大规模进攻的最后机会,但是在一个短时期内,他们确曾对北部的英国第一集团军发动过一系列猛烈的局部进攻。在整个3月份,激烈的战斗从未断过;德军企图扩大和加强包括突尼斯城和宾泽特的这个防御地带,而英军则力图重新取得有利于最后发动毁灭性进攻的阵地。不断的战斗以及为日益空虚的部队所掩护的这条战线的长度,最后迫使亚历山大不得不用美国第一师的部分兵力去支援英国第一集团军。然而,德军的攻势主要是正面的,所以不会有让敌人取得任何巨大优势的危险。有了这个把握,我们就开始采取措施来整顿和重新组织我们的战线,改进我们的后勤工作,并且作好准备,以便在天气一旦对我们有利时,就立刻大举进攻。

卡塞林战斗结束后,我们的地位在一些方面不断得到改善。首先,这次战斗的结果,使拥有四个师的美国第二军终于在特贝萨地区集结起来。在那里,它可以成为突尼斯北部的盟军和从沙漠向这

边推进的第八集团军之间的坚固环节。部队、司令官和参谋人员还从这次战斗中获得了他们终生难忘的丰富的战斗智慧。

此外，华盛顿作出了一个辉煌的壮举，另外又把五千四百辆卡车运进这个战区。这批卡车大大改善了我们的运输和供应情况，而且对以后的一切军事行动有着深远的影响。运进这批卡车的情况，应使那些把陆军部和海军部想象为专搞官样文章的机构的人们为之瞠目结舌。运送这批卡车需要一支专门的护航运输队，而在当时，商船和护航舰都非常宝贵。这时萨默维尔将军正好来我的司令部访问，于是我向他说明我们迫切需要这批装备。他说，只要海军部能提供护航舰，三天以内就可运出美国港口。我电询当时在卡萨布兰卡的金氏海军上将，在几个小时内，就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简单的答复：“行！”从我开始提出申请以后不到三个星期，卡车就开始运到非洲。

当陆军部来电说最后一批卡车已经启程时，萨默维尔将军还在我的司令部。电报是萨默维尔的助手威廉·斯太尔少将打来的，电文生动地叙述了为安排这次紧急货运而进行日以继夜的紧张工作的情节。电报最后诉苦说：“如需把五角大楼运往你处，务请于一周前电告。”

这批卡车的惊人价值在于它增强了供应前线物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使我们有能力把部队从前线的这一部分迅速调到另一部分。如果没有这批额外的卡车，那么以后要把美国第二军从特贝萨地区全部调到突尼斯北部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我们的铁道工程兵在卡尔·格雷准将的领导下，在改善通往前线的陈旧的法国铁路时，创造了各种奇迹。我们刚到北非时，这条铁路每天最多只能运输九百吨军需物资。格雷发挥了美国人的魄力，采用了现代的美国调度方法，把每天的运输量增加到三千吨，这是他在没有从

美国收到一个单独的机车或货车以前作出的成绩。

有一个进展使人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空军的力量和效能稳步提高,建设合用的作战机场和基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另外一个进展是沙漠中的英军迅速开辟并开始使用最近夺取的黎波里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肯定的保证,即第八集团军将不象过去那样,因受供应的限制而被迫停止前进。

在这一时期,我们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有利条件,即我们会按照卡萨布兰卡会议作出的安排,在一个健全的和永久的基础上建立我们完整的指挥系统。所有空军部队经合并后归泰德空军上将指挥,斯巴兹将军担任他的助手;突尼斯前线的地面部队由亚历山大将军指挥。后者既然没有必要再去指挥一支单独的集团军——这是安德森将军的一个沉重包袱,就能全神贯注地去从事日常的战斗协调工作了。

3月1日以后,我调巴顿代替弗雷登道尔担任第二军军长。我这样做,并不是打算降弗雷登道尔的职,或把卡塞林战斗一开始的失败归咎于他,我也是这样告诉他的。有好几个人,包括我在内,对那次战斗开始一周的失利要负责任。但是第二军的士气已大受打击,因此必须要使部队立刻振作起来。对这个工作,在陆军中只有巴顿最合适;另外我相信,弗雷登道尔在国内担任训练工作要比指挥战斗更为合适。我向马歇尔将军建议,让弗雷登道尔在美国指挥一个集团军,在那里他被提升为中将。

巴顿将军领导灵活,坚持严格的纪律;这样第二军很快恢复了元气,达到了可以作战的程度。此外,部队现在都有了战斗经验,对训练、纪律和迅速行动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们所损失的坦克、人员和装备很快得到了补充。东部地区的机场又被我们所掌握,机场上布满了战斗机。

在冬季，沙漠的气候和地形要比北部有利得多，这使蒙哥马利将军统率的第八集团军能不断地向西方推进，以期与突尼斯的我军右翼会师。我们预计，蒙哥马利为此将会在马雷斯防线进行一场大战，这条防线是以前法国人沿着突尼斯边境建成的，现在我们预料，轴心国将会在这里进行顽抗。为了在这次战斗中协助蒙哥马利，亚历山大将军命令美国第二军把其大部分力量在加夫萨全区集中，并由此向东面推进，以便尽可能多地把隆美尔的兵力从第八集团军的前线吸引过来。这一调动产生了理想的效果，因为隆美尔的交通线如果受到攻击，那他就吃不消，所以必须抽调大部分兵力来防止对他的交通线的威胁。

到3月20日夜，蒙哥马利将军对马雷斯防线开始发动进攻。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但在战斗中间，他机智而神速地改变部队进攻方向，从侧翼突击敌军，迫使他们狼狈向北撤退。第八集团军的左翼立刻与向东迅猛推进的巴顿的第二军会师。最后，我们的所有部队在一条单独的战线上连接起来了。

马雷斯战斗结束后不久，我访问了蒙哥马利。他的第八集团军是自汉尼拔<sup>①</sup>以来在北非作战的、人种非常复杂并且也许是最富有世界性的军队了。除了英国部队外，它还包括苏格兰高地人、新西兰人、印度人（里面杂有廓尔喀人，他们备有一种叫库克利斯的弧形长刀，用来砍杀敌人）、波兰人、捷克人、自由法兰西人、澳大利亚人和南非人。但他们并没有全部来到突尼斯。在第八集团军中有几支美国空军中队，他们是第一批在非洲对德作战的美国人。他们从阿拉曼开始，一路上不断作战。在访问蒙哥马利期间，我很高兴地能利用这个机会与驾驶员和空勤人员谈了话；以后，我还送给

---

<sup>①</sup> 汉尼拔（约公元前247—前183），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名将。——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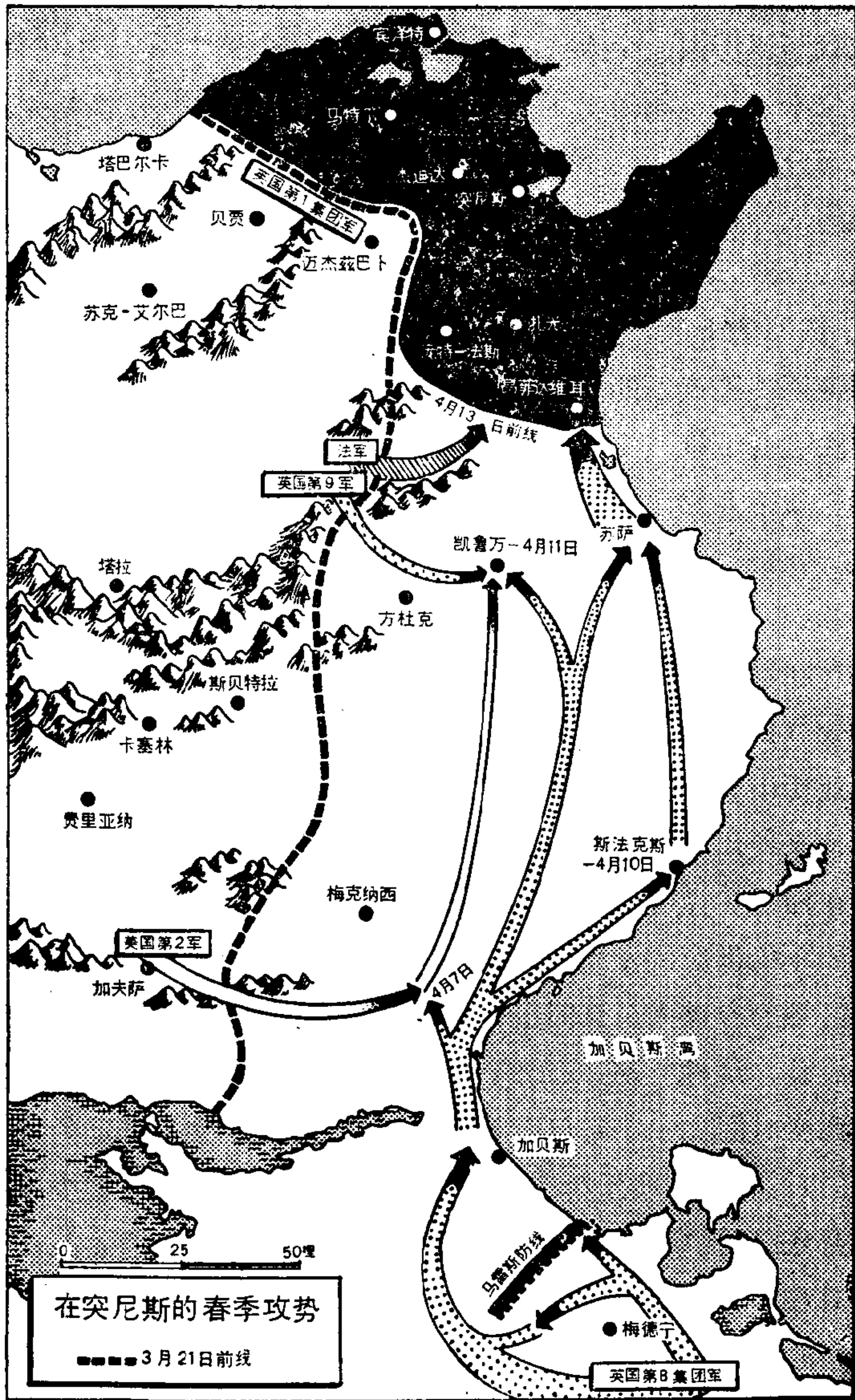


他们一些部队中的享用品,因为他们以前在横跨沙漠的长期征战中,一直没有享受过这些物品。

为了切断德军从蒙哥马利前线的退路,亚历山大将军实施一次突破方杜克山口的进攻,并朝东向地中海方向推进。美国第二军的左翼参加了这次进攻,但整个作战行动是由一位英国军长指挥的。当时用于参战的美国师只有一个,这个师以前只受过初步训练,并且许多星期以来一直在执行保护交通线的任务,没有机会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过。而分配给这个美国师的任务又很困难,所以这次进攻失败了。这一突破最后是由英军完成的,但效果并不特别好,因为德军顺利地完成了向北部的撤退。这位英军军长约翰·克罗克将军当着记者猛烈批评这个美国师的失败。在非洲作战期间,英、美两军之间的互相责备,可说只有这一次。这件事使我们颇为不安,况且它又毫无意义。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我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了这种言行。在盟国间,最经常和最容易引起纠纷的是那些不必要的言论,尤其是贬低对方的言论。内部的争吵总是会被人们夸大得超过其原有的严重性。

这次进攻的结果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德军的迅速撤退产生了压缩敌人防线的效果,这样就可以腾出美国第二军,并把它用于这条战线的任何部分。

我们还讨论了这个军是否能有效地参加最后决战的问题。亚历山大的参谋人员认为,其中的大部分应该送回君士坦丁地区进行补充训练。应该承认,有些部队相对来说依然缺乏战斗经验。但巴顿和我相信,这个军现在随时可以采取进攻行动,并能防守这条战线的某个重要部分。最后,有一件事使这些部队大为愤怒。这不但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而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军的战斗质量受到了侮辱性的评论,这些评论最初来自德军俘虏,后来在这



(按原图译制)

个战区传播开来。

我与亚历山大个人谈了一次，坚持把整个第二军作为一个作战单位来使用。我提出了几个理由。首先，盟国需要用来战败德国的大部分地面部队将不得不由美国提供。因此，显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战斗训练。其次，在以前的各次战斗中，该军总是被迫以小股部队作战，从没有机会作为一个作战单位去发挥它的战斗力。第三，该军的士气，自3月1日以来，已经有了明显提高，因此它有权象证明美国武器的质量那样来证明自己的作战效能。

胜利会造就一支部队，并使美国人民感到自己作出了成就。从他们自战争开始以来所作的艰苦努力来说，他们完全应该有这种感觉。两国参加大规模战斗而取得的胜利，会产生别处无法得到的伙伴意识。士兵们本身有权参加条件一开始就对他们有利，而不是还存在着重重障碍的战斗。一次真正的胜利将能使他们产生巨大的锐气去迎接更严酷的考验。

亚历山大立刻同意了我的主张，即把整个第二军作为一个作战单位来使用。他建议，最好使该军穿过第一集团军的后方，把它部署在面对宾泽特的北侧。我同意这个意见。为了避免与英国第一集团军的供应线发生纠缠，就需要进行精密的参谋工作，而安德森和巴顿的参谋人员这时已作出了细致而有效的安排，所以没有产生混乱。这种行动，战前的军事学院会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准确的调度时间和十字路口有效的交通管理，成了整个调动的特点。

同时，我又调换了第二军的军长。奥马尔·布莱德雷少将已于2月底以“视察员”身份向我报到。他个人有着杰出的才能，而且在3月和4月初的战斗中已经取得了很多经验。这次调动还有一个迫切的原因，就是让巴顿将军有机会回到第七集团军司令部并完成进攻西西里的准备工作，这个军事行动在非洲战役结束后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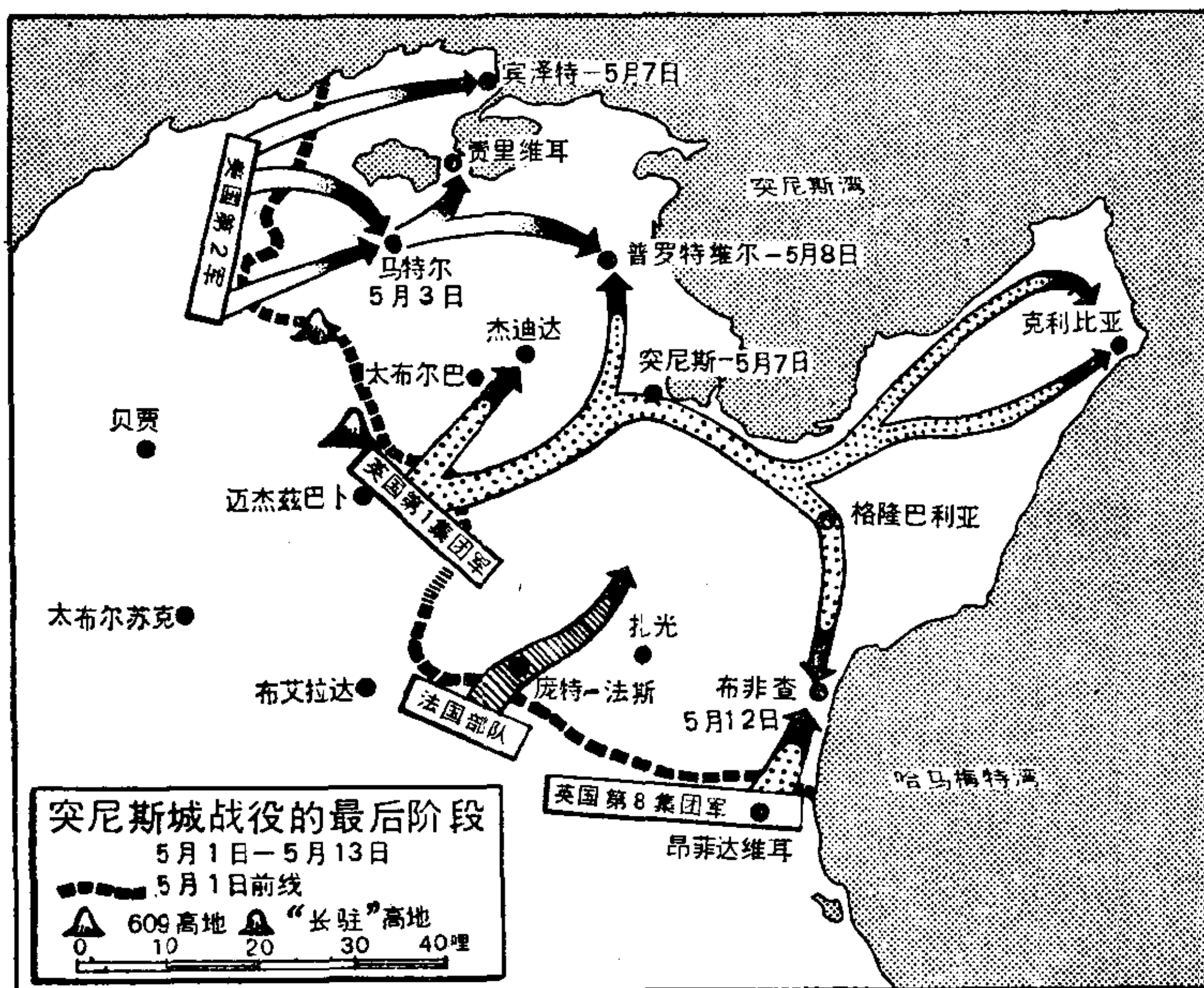
要尽快地进行。第二个次要的原因已经公开，因为这时事实已明显得不能用暗示方式来表达了；第二军今后的作战特点是使用步兵而不是采取坦克战术，因此把擅长坦克战的军长换成一位指挥步兵战的专家，这是理所当然的。布莱德雷于1943年4月15日担任第二军军长，这时，第二军的一部分兵力已经部署在北部了。

在此期间，蒙哥马利将军继续向北推进，最后一直到了昂菲达维尔防线，在那里遇到了敌人非常坚固的阵地，迫使他停止前进。

然而，向敌人阵地发起决定性的、全面进攻的阶段现在几乎已经完全确定。我们的空军极力抓住好转的天气来袭击敌人在非洲和意大利之间的交通线，使得轴心国的阵地更加岌岌可危。随着我方空中优势的日益增长，海军也把他们的基地和军事行动向前推进，从而增加了敌人的困难。我们的地面部队充满了信心，急于希望一举结束全部战斗。敌人在其西侧山区仍拥有一些纵深的防线，所以第一个行动就是发起突击，打算把敌人赶回突尼斯平原的边缘。这些突击从4月23日开始，并在全线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空军和地面部队的配合，较之突尼斯战役开始时好得没法对比，我们的全部突击都得到有力的空中支援。我军炮兵优势又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

这时，亚历山大来到前线的西部，打算从那里发动最后进攻；因为昂菲达维尔防线的地形不利，第八集团军如从南部发动下一次进攻，显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也没有把握。同时我们确信，德军会预料到主攻将由第八集团军发起，因为这个集团军曾跨越西部沙漠，长途追击敌人，获得了显赫声誉，所以敌人自然会料想我们将用它来实施致命的打击。

因此，亚历山大将军确信，敌人在第八集团军阵地前无论如何会保持强大的兵力，于是迅速而机密地把第八集团军中几个最精



锐的师从那个侧翼调出，转归英国第一集团军指挥。这些部署及时完成，并于5月5日开始最后突击。

所取得的战果很快起了决定性作用。位于左翼的美国第二军和几个法国“殖民地军骑兵”分队猛烈推进，突破了险阻的地形，于7日攻陷宾泽特。在南面，安德森将军统率英国第一集团军发起主攻，大致在第二军到达宾泽特时也进入了突尼斯城。

在突尼斯战役的最后几天，在北部有两个局部战斗引起了整个战区的注意，其中一个在英军的攻击区，另一个在美军攻击区。这两个敌人阵地因自然地形而非常坚固，并且防守顽强，同时对我们夺取最后胜利又是很重要的。英国攻击区的敌人阵地称为“永驻”。在整个非洲战役期间，为夺取这个阵地而伤亡的人数，可能比攻占突尼斯任何地点所遭到的牺牲还要多。美军攻击区的

敌人阵地是六〇九高地，这个阵地最后被第三十四师攻陷。美军最高司令部对此特别满意。这个师以前受训的机会比别的师要少得多，而它能夺取险要的六〇九高地，这就最后证明美国地面部队已经成熟了。

紧接着这次突破，亚历山大立刻命令英国第一集团军的装甲部队越过崩半岛的底部迅速向前推进，因为我们认为，敌人可能撤退到这里构筑最后的一个阵地，就象我们过去坚守巴丹的情况那样。这时，数千名敌军沿着第一集团军的前线仍在混乱地坚持战斗，但亚历山大对此毫不在乎，以神速的行动粉碎了敌人最后一线苟延残喘的希望。此后的军事行动就属于扫荡战的性质。在12日以前，有些战斗还在继续，但到第二天，除了山区还有少数迷路失散的敌人外，只要是在突尼斯还存活的德军都俯首贴耳地进了俘虏营。单是在战役的最后一周，俘虏的敌人就达二十四万人，其中十二万五千名是德军。在这些俘虏中，一部分是被丢下的德国非洲军，另一部分是德国和意大利的精锐部队。

隆美尔看到败局已定，急于解救自己，于是在总崩溃的前夕溜跑了。从此，隆美尔和纳粹不可战胜的神话完全破产。冯·阿尼姆交出了德军。名义上称为全军总司令的梅塞元帅交出了意大利的分遣队。当冯·阿尼姆在被俘途中经过阿尔及尔时，我的几位参谋人员认为，我应该遵守惯例，容许他来访问我。

这个惯例有它的历史渊源，即从前的雇佣军与他们的对手并没有真正的仇恨。双方或因爱好战斗而打仗，或是出于责任感，甚至可能是为了金钱。在十八世纪，一个被俘的司令官很可能在几周或几个月内成了胜利者的贵宾。一切职业军人实际上都是武装的战友，这个只有着残存形式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不是个人的事，所以不能抱有这种

感情。随着战争的逐日发展,我内心逐渐产生了这个信念:虽然过去发生过很多国家之间的战争,但这些争取人类幸福和人权的军队从没有象现在那样遭到一股如此罪大恶极和决不容许与之妥协的阴谋势力的对抗。因为只有彻底摧毁轴心国,才可能出现一个善良正直的世界,所以我认为,这次战争是一场具有传统意义的十字军远征,而这个字眼经常被人滥用了。

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我告诉负责情报工作的军官肯尼思·斯特朗准将,要他尽量从被俘的德国将领那里获取一些情报,但对我来说,我只对那些尚未被俘的将领感兴趣。任何一个战俘都不许访问我。我坚持这种做法,一直到战争结束。约德尔元帅于1945年来到兰斯在投降书上签字以前,我从未和一个德国将军谈过话,即使在那时,我也只说了几句话,内容是责成他个人对投降条款的履行负完全责任。

突尼斯战役的结局当然是令人非常满意的,但最高司令部因忙于准备对西西里的进攻,所以几乎没有机会来庆祝这个胜利。然而,突尼斯城在12日终于举行了一次胜利阅兵式,以此来欢庆轴心帝国在非洲的垮台。

我们取得的宏伟胜利给我们进攻西西里的准备工作增加了困难。就拿战俘一事来说,在突尼斯,我们关了二十五万名以上的战俘,那里的交通设备质量低劣,使我们难以供养和看守他们,更不可能把他们迅速转移。但是非洲战役的结束,确实使一些司令官和参谋人员摆脱了紧急的军事行动,而能把全部精力转到下一步的工作上。早在2月份,有一个专门小组就已开始进行制订计划的准备工作,这个小组隶属于盟军司令部,但由亚历山大将军领导。它这时完全并入了亚历山大将军的参谋部,因而准备工作的进展大为加快。

各盟国都为突尼斯的胜利而热烈欢呼。这一胜利使朋友和敌人都清楚地看出，盟国终于前进了。去年冬天，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也打了大败仗，于是不得不放弃对俄国其他战线的进攻，以便进行顽抗；突尼斯战役以后，他们被迫考虑的问题只是如何保卫已征服的地方，而不是去扩大战果了。

在非洲战区中，胜利的最大成果之一是加强了盟国间的团结和建立了一个指挥班子；这个指挥班子已经显出了这些效果，即存在于它的所有成员之中的信心和信任正在不断增强。要统率庞大的盟军，就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指挥机构，但始终存在着阻挠这项工作进展的障碍，而且这些障碍还容易被人忽视。有些障碍，例如有关装备、训练和战术理论、人事手续以及组织方法等方面的分歧，还容易认识到。但这类分歧也会被民族荣誉感和偏见弄得模糊不清。

现代战争有很多方便条件，可以把战况迅速向外传播，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分歧都会被夸大，因此一个为自己生命而战斗的士兵很可能变成非常神经质的人。甚至一些经过锻炼的老兵，他们在一般情况下虽然都表现得公正和稳重，但当看到一段他们认为是偏向别国的重要新闻时，也会突然大发雷霆。这是一个伤脑筋的、难以处理的、然而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只要政府中和战场上的重要人物，在公开场合或同部下和参谋人员的私人接触中，能顾全大局，不违反团结的基本原则，那么盟国的事业就会获得成功。毫不犹豫地和坚定不移地忠于团结的概念和忠于各盟军司令官，这是胜利的基础。一旦某些司令官失去其政府和大部分主要部下的信任，就必须将他们撤换。

这就是盟国在突尼斯所取得的主要经验；在技术方面，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重视训练。充分的技术训练、心理训练和体



质训练,是一个国家在把它的士兵投入战斗之前所能授予他们的一种保护和武器,但战争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总是一件预料不到的紧急事件,因此这种训练主要要在和平时完成。在世界秩序尚未建立,普遍裁军尚未取得合理结果以前,如果不让人们去接受在战斗中赖以取得适当生存机会的各种各样的训练,这始终是一种犯罪行为。今天插在突尼斯国土上的许多十字架,就是这个真理的见证。

## 第九章

### “赫斯基”行动

突尼斯战役的最后几个星期，特别是这一战役的结果已能明显地预见时，主要参谋人员就忙着计划下一战役。按照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指示，下一战役将是夺取西西里。会议期间，联合参谋长会议讨论了地中海兵力的两个可供选择的任务，一是尽可能不误时机地突击西西里；另一是攻击撒丁和科西嘉。

一月份我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发表过如下意见：如果我们的首要目的仍然是清扫地中海以利于盟国的海运，那么西西里就是合适的突击目标。西西里紧靠非洲和意大利，实际上把地中海分割为两部分，攻占该岛将大大减少使用那条航线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盟国的真正目的是攻入意大利，进行一场彻底击败这个国家的大战，那么我以为撒丁和科西嘉是我们开始突击的适当目标。对敌军兵力的估计表明，攻夺这两个岛屿比攻夺西西里所使用的兵力要少，因此战役可以早些开始。而且撒丁和科西嘉位于意大利这个长靴形半岛的一侧，攻占这些岛屿，比之仅仅占领紧靠半岛的多山尖端的西西里，将会迫使敌人在意大利的兵力更加广泛地分散开来。

这次讨论有助于再次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下的愿望上，即最后确定地中海区的主要目标。在进行判断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分歧意见，这完全是正常的，因为在击败轴心国的过程中，究竟何种

具体行动能够明显地导致胜利，我们还远远不能得出明确的和一致的结论。马歇尔将军和我都认为，在地中海采取的一切行动，仍应服从于和有助于1944年初横渡英吉利海峡实施进攻的这一主要目的。在这点上，我们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战争中要及时抓住战机，如果在“柔软的腹部”<sup>①</sup>上万事顺利，就不应该仅仅因为我们已有了渡峡之战的决定而在这里停顿下来。常常适用于战术上的机会主义原则，用在战略上则是一种危险。战略方面的各种重大变化，一直会反映到工厂和训练中心。因此，战略上的变化必须慎重考虑。此外，把渡峡之战作为基本战略目标的一切原来的理由，目前仍然是正当的。然而，即使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个目标，今后如何最有效地使用南部兵力以支持拟议中的1944年大规模进攻，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西西里军事行动的理由有两点，第一点，这一行动对于打通地中海航线有很大的、直接的好处。第二点，因为这个岛比较小，攻占之后，即便敌人发动大规模反攻，也至多牵制盟军有限的兵力。这个理由很受马歇尔将军的重视。此外，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这个决定，防止了在该地区作不明确的战略进攻。成功的袭击虽然会把我们的轰炸机基地更向前推进，但是我们没有必要陷入一场不断消耗贵重资源的战役。联合参谋长会议委任亚历山大除了作为我的副司令外，还担任西西里军事行动的地面司令官。

地中海各基地对于把我们的空袭进一步推向德国中部，具有重要意义。这点始终是我们制订计划时考虑的一个因素。1943年春，华盛顿曾制订过一项从非洲基地起飞轰炸普洛耶什蒂油田——

---

① 指意大利。——译者注

轴心国所能利用的唯一最重要的原油产地——的计划。这项脱离实际的计划制订以后，华盛顿还派来一个专门参谋小组向我们解释这项计划。由于抵抗猛烈，目标遥远——油田在罗马尼亚，地势险要，以及所谓的“水平”轰炸的效果，计划要求每个飞行员在树梢的高度进行一次突然袭击，攻击巨大油田中的一个特定设施。计划的制订者非常详尽地计算了各种数据，然后规定必须使用双倍的轰炸机。他们估计，这次轰炸可能达到几乎全部破坏的效果。

这项计划的一个特点是相信一次袭击的效果，我们反对这种看法。我们常常发现，一些被我们的专家列为已经破坏的工厂，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内又全部投入生产。我们对这项计划还提出了另外的疑问。选择的目标是一座大炼油厂，但是情报使我们相信，敌人有多余的提炼能力，它在石油方面真正缺乏的是生产和分配的设备。然而我们对这件事的怀疑和反对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所使用的空军部队是为了执行这个特殊任务而专从美国派来的。

8月1日进行了这次轰炸，战斗很英勇——授给了五枚荣誉勋章。数学计算虽然和以往一样，未能把各种意外情况都估计进去，但轰炸总算相当成功。这是美军对普洛耶什蒂的第二次袭击。1942年春，当我还担任作战处处长时，一个巨型轰炸机小队从近东基地起飞进行过一次袭击，然而毫无收获，飞机损失大半。一些飞机当时迫不得已已在土耳其降落而被扣留。上次称为霍尔沃森计划——得名于司令官——的袭击，多少消除了以为几架巨型飞机就能赢得胜利的幻想。

代号“赫斯基”的西西里作战计划，在2月份开始拟定。需要决定的要点是进攻的兵力、时间和确切的地点。很明显，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尚在突尼斯作战的兵力。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把所

决定的有关时间推迟到非洲决战后。既然日期不能准确预定下来,那么所有其他计划也就无法肯定,而司令官和参谋人员也就不能有信心地进行工作。

考虑到敌人防御部队的力量,我们认为,开始登陆时应投入五个或六个师。象这种规模的进攻,需要集中大量的登陆艇以及额外的海军战舰。

在1943年的整个春季,我们经常和联合参谋长会议进行磋商,以求确定我们希望得到的物资数量以及这些物资备齐的时间。美国参谋部决定派给我们受过良好训练的第四十五师,并及时用护航舰队运来作为突击之用。此外,我们还有在突尼斯战斗中尚未打算使用的第三师。还计划于胜利在握时,尽快地从突尼斯战场抽调美军第一师。这三个师,再加上尚在摩洛哥的第二装甲师、第八十二空降师的伞兵部队以及突击队员,组成美军方面的突击兵力。英国方面决定从本国调来一个加拿大军投入这次突击战,同时第八集团军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前的某个时候也能派出部分兵力参加西西里突击战的准备工作。这些部队将在7月初进攻西西里,所有的工作都要在这个日期准备就绪。由于我军的所在地和登船处,各护航舰队将从东、西、南三个方向直逼该岛。

选择突击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各分散港口出发的盟军如何容易地接近该岛,如何保护交通线以及海岸线的特点这些方面来考虑,选择该岛的东南部较为有利。但供应参谋确信,在各个可利用的滩头上不能维持预计数量的兵力。即使估计很早就能攻克位于该岛东岸的锡腊库扎,技术专家也断然声称,要是没有更多的港口,战斗将因缺乏援军、军火及其他物资而失败。较好的办法是使进攻能够尽快地夺取更多的入口处和港口,但是登陆艇的力量有限,所以各路进攻就可能相当的弱。以往的经验使我们极为

轻视意大利军队的防御能力；但是在这次即将来临的军事行动中，他们是保卫自己的国土，这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我们的情报参谋非常注意德国防御部队的兵力。我们认为——以后的经验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有道理的，如果在进攻时德国的防御部队实际超过了两个足额的、有充分装备的师，那么我们计划的突击力量就太弱了，明智的做法是，把这个军事行动推迟到能够集中更多兵力的时候。

由于估计到在南部和东部滩头上无法供应几个突击师及其援军，我们研究并打算采用梯队突击方案，先从东南部开始，接着在南部进行第二次突击，继之在北岸的巴勒莫附近发动第三次突击。这个想法是，每一次突击都能为下一次的突击提供空中掩护，这样我们就会尽快地获得许多滩头和港口以便于供应。

这样一个军事行动也有如下的危险：任何一次突击的失败都将取消以后的突击，而且即使开始登陆成功，以后集中兵力仍会有困难，因此，我们有遭各个击破之风险。这后一种可能性我们并不认为是严重的，除非在进攻前，德国防守要塞的兵力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即确实超过两个师。但这项计划实行起来困难重重，而且总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不过在突击开始阶段，这看来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清楚，德国人正在加强西西里的防御部队，但是我们的情报使我们相信，它还没有达到、或者至少还没有超过我们认为危险的程度。

没有人真正喜欢这个梯队突击方案。这个方案执行起来很复杂，并使兵力分散，还需要依次突击而不是同时突击，这些方面都被认为是冒险的，其危险程度比起因缺乏港口而遭致失败的可能性还要大。蒙哥马利是一个始终相信实力的人，他特别希望在该

岛的东南部投入重兵。于是再次责成供应参谋研究这个问题，而这次他们的估计就比几个星期以前乐观得多了。

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出乎意料地能够使用大量的 LST 型登陆艇，生产了大批的称为“鸭子”的水陆两用车，这种两用车被证明是战时美国所生产的最有价值的装备之一。附带说一句，大多数高级军官认为，另外还有四种装备是我们在非洲和欧洲取胜的一个最重要因素，这就是推土机、吉普车、二吨半卡车，以及 C-47 型飞机。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这些装备中，没有一种是被设计来供作战之用的。

由于即将得到大量经过改进的装备，所以供应参谋同意大大修改他们的估计，并且根据把英军调向东海岸和把美军调向南海岸的原则，制订了各项具体的计划。

在结束这个问题以前，谈谈另一项计划的“可能结果”。有一些专家和其他人，一直坚决向我主张，如果我们对庞大的意大利防御部队的低劣作战能力的估计是正确的，那就坚持“围攻”计划，在十至十五天内一举占领全岛，而用不着最后需要三十八天。并且还断定，我们可以俘获德军防御部队的精锐部分，而不是仅仅将它赶回意大利。很可能的是，随着锡腊库扎、杰拉和巴勒莫迅速落入我们手中，我们在德军能充分集结兵力击破我们的进攻以前，就攻占墨西拿重镇。但是即使再有先见之明也不敢肯定全部意大利守军会撤退，因此我仍然认为，聪明的办法是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有条不紊地占领这个有将近三十五万名守军的岛屿。不管怎样，这个简单的、同时进攻的方案被采纳了。

亚历山大将军指定第八集团军在蒙哥马利将军指挥下，向英国的攻击目标实施突击，在美国方面，巴顿将军担任指挥，他是 4 月中旬从突尼斯战场调来的。亚历山大将军将直接负责地面突

击；他的司令部奉命指挥第十五集团军群。

当这些计划还在拟订过程中时，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首先夺取班泰雷利亚岛是有希望的，该岛位于西西里和突尼斯东北海岸之间，号称“地中海中部的直布罗陀”，很多人认为是不能攻克的。岛上有一处飞机场，轴心国的飞机能从这里起飞袭击我们，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迫切需要这个机场，以便为进攻西西里提供更多的空中支援。当时，除了少量的P-38型飞机外，我们仍使用着英国短程“喷火式”飞机和美国的P-40型飞机，所以缩短机场和攻击目标之间的距离会有很大好处。

从地形上看，班泰雷利亚岛对于实行突击有着几乎令人沮丧的障碍。它的地势完全不适宜于空降部队，而海岸线又峭壁重叠，部队只有通过岛上一个小港的入口才能从冲击舟登陆。显然，我们必须发动毁灭性的进攻，即向攻击点倾泻大量炮火；这样，进攻虽然缺乏突然性，但我们的突击部队仍能登岸，并巩固其阵地。

许多有经验的司令官和参谋军官十分关切地劝告我们，不要实行这次军事行动，因为任何失败都会挫伤进攻西西里海岸的部队的士气。然而坎宁安海军上将特别同意我的看法，认为用微小的代价便可拿下这个地方。我们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估计大多数意大利军队已经厌战，正在找撤退的借口。我们相信，如果对该岛进行连续几昼夜的猛烈轰炸，不让防御部队有睡眠和休息的机会，再加上强大的海军炮火的支援，这次攻击将比较容易。防御部队甚至可能事先投降。

由于我们的空军当时已经发展到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这类预计的轰炸，我们就按上述假设行事了。泰德空军上将、斯巴兹将军和空军都热烈支持这个方案。在六个昼夜中，我们把将近五千吨的烈性炸药投于该岛东部，而且在这样一个狭小地区内，集中轰炸



的效果要比以往任何一次更大。

这次突击的实际结果是，我们轻而易举地攻克了班泰雷利亚岛——守军于6月11日投降，那时我们的部队正从大船登上冲击舟，以致很少有人感觉到在战斗中必须要克服的那种疑虑和惧怕的心情。诚然，我的计划当时遇到了一些人的强烈反对，这使我决定，在突击日期之前亲自作一次侦察，由我自己来判断敌人的防御是否已削弱到足以使我们取得胜利的地步。这次侦察的形式是，在进攻前两天用海、空军轰击该岛，使守军误认为是真正的突击，并尽量使它和在预定的日期和时间发动的实际进攻一样。一天黄昏，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我在波尼登上一艘英国巡洋舰，当晚全速东航和集结在班泰雷利亚岛附近的舰队相会。坎宁安告诉我，除了我们航行的这条狭窄水道的水雷被扫除外，这里的整个海域都有水雷。这使我问道：“附近有没有漂浮水雷？”他回答：“噢！有，但是象这种速度，船头的波浪会把它们荡离船身。要是我们碰上一个，那真算是倒霉。”

舰队约有五、六艘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上午11时开始轰击，飞机则一批接一批地向选择的目标投弹。反抗微弱而零散。虽然我们的船只都逼近了海岸，小型快艇几乎已冲到防波堤的旁边，但都没有受到损失。坎宁安和我确信，这次进攻将不会遇到什么抵抗，那时如果我们身边有军队，早就拿下这个岛了。

首相当时正和我在非洲进行访问，他非常希望参加这次战斗。我避免作直接回答，但决不同意他去，因为象他那样的大人物，犯不着到战场上去冒风险。但是后来我在向他如实解释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我一直打算参加这次战役时，我感到有些为难。两年后，他提醒我说，那次我对他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因为他对这次战役下了一笔私人赌注。

他和我是打过一个小赌的,起因是这样:他估计岛上意军不超过三千人。要是我们俘获的意军超过那个数目,他将为这个超额数目中的每一个俘虏付给我五生丁。结果我们俘获了一万一千人,虽然我早已自然而然地忘记了这个开玩笑的赌注,但他立即付了钱;他自己计算了兑换率,并且说,他要按此价格(每人二十分之一美分)把我们所能抓到的俘虏全部买下来。

攻占班泰雷利亚岛后,我们立即把强大的空军部队运进该岛机场。同时我们在马耳他附近的果佐岛兴建一处新机场,以进一步改善我们的空军地位。马耳他岛本地驻有其机场能容纳下的各种飞机。

5月下旬,即在我们进攻西西里的前一个月,丘吉尔首相以及马歇尔将军、英军参谋长布鲁克将军来到我的司令部。我们在一起除了讨论攻占西西里以保证自由使用地中海的航线问题外,还进一步讨论了西西里战役的各种目的。此外还曾谈到,一旦我们掌握了西西里,就停止地中海的大规模行动,以便为欧洲西北部的主力战节约物资。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慎重考虑了如下情况:如果停止猛烈攻击,将会取消对南线德军的所有威胁,这样就给了敌人大肆活动的自由。在欧洲,从1943年夏到1944年初夏的这段时期,盟国的地面部队将完全停止战斗。我们还迫切需要意大利南部的良好机场。最后,只要我们保持压力,相信意大利会很快土崩瓦解。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巴尔干各国无意军防守,从而迫使德国把兵力延伸到更远的地方。

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还有坎宁安海军上将、泰德空军上将、斯巴兹将军,以及我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丘吉尔先生滔滔不绝地描绘了一幅在西西里攻占后

他设想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光明前景。他在会议讨论中强调说，他无意干预 1944 年渡峡之战的准备工作，但是所关心的是要我理解两国政府希望盟军尽快利用西西里占领后出现的一切战机。他担心我们会片面地解释我们的任务，以致不管形势好坏，在攻占西西里后突然停步不前。

每次战斗的一个正常组成部分总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胜利；因此，就我个人来说，我摸不清首相期望的究竟是什么。但是据我所知，他没有建议过把巴尔干的、或者甚至意大利北部的大规模战役作为起码的目标。看来，他当时真正关心的是迅速占领意大利南部，就我所知，仅此而已。

然而在私下谈话中，布鲁克告诉我，他乐于重新考虑渡峡方案，甚至乐于把那个大胆的想法从已被采纳的盟军战略中去掉。1940年，他在欧洲大陆上的短期战役中曾指挥过一个军；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都是他的部下。他象他的爱尔兰祖辈一样，生来性格冲动；他很有才智，并且全心全意致力于赢得胜利这个唯一目的。1941年11月，我第一次会见他时，觉得他老练而不稳重，机灵而不聪明。但是我逐渐觉察出，他那种我以为古怪的脾气，只是偶然的；他很诚实。他虽然不象马歇尔将军那样，在遇到问题时能冷静地分析其中的矛盾因素和作出果断的决定，但我很快发现容易与他共事。他有不同意见，就断然说出，措词虽然尖锐而激烈，但态度坦率而真诚；激烈的正式辩论，从不影响他与别人的私交，也不影响他那种彻底的助人为乐的品格。他可算是一个有丰功伟绩的军人。所以我那时总是注意地倾听他的意见。

他说他赞成这样一种策略：用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封锁德国，摧毁它的工业，但避免在主要战线上进行大规模的地面战。他认为，在一个大战场进行地面战争，对我们极为不利，而且会蒙受毫无意

义的巨大损失。除了维持意大利战线外，他不主张开辟更多的战线。我不知道首相是否同意主张无限期推迟渡峡进攻的这个意见，但他确实要求把在地中海所能使用的盟军最大限度地投入意大利。

对于任何企图放弃“霸王”行动的提议或暗示，马歇尔和我总是要予以指摘，并且毫不妥协地、断然地加以拒绝，不予考虑。我们俩人一再重申，我们不仅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最初把“霸王”行动作为欧洲主要战略目标时所依据的各种基本理由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还从对“霸王”行动的胜利前途有无帮助的角度，严密审查关于动用别处军队的每一个建议。我们俩人都愿意承认，而且也愿意竭力争取由于进攻意大利南部获胜而将产生的有利条件，但坚决拒绝把我们自己、或者把盟军投入通过意大利去赢得胜利的战役。

会议根据上述意见和其他一些理由，达成了—一个协议。该项协议实际上是让我裁决如何利用西西里战役——不过要求我抓住有利时机攻入意大利，另外也强调指出了福贾的几个机场的巨大价值。因为在意大利需要一个大港口用于供应，所以那不勒斯被定为盟军打算夺取的另一个主要地点。

会议对于是否需要轰炸罗马附近的编组站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会议一致同意没有必要破坏这个“不朽之城”——这确实是我们对所有意大利古代文化遗迹所采取的政策。但是众所周知，德国人一直在利用我们的这一克制态度把罗马作为他们交通系统的一个主要枢纽。当时没有得出最后的答案，后来授权我们轰炸那里的编组站，但要我们务必注意不要破坏罗马和梵蒂冈城。

西西里战役的大概轮廓，在战役开始前一个月就告知了我们

的记者。采取这一前所未有的措施，反而是为了保密。

我觉得我必须消除战地记者对盟军未来意图的推测。我知道德国人密切注视着我们，而且令人惊异的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情报参谋把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零星情报收集起来就能勾画出敌人作战计划的轮廓。那时北非是准备进攻西西里的基地。沿海滩头的每一个可能利用的地点，我们都在进行演习；港口堆满了必需的物资；海港和海湾在接纳登陆艇。看来可以确定，如果那些为他们的报纸和广播网搜集重要材料的记者们继续报道整个战区的活动，即使我们对进攻的地点严加保密，敌人对我们进攻的兵力和时间也能很快作出相当准确的预测。

在停战期间，记者们习惯于用推测来充实他们的报道，而且由于有了若干个月的战地经验，每一个新闻记者都有很高的能力解释即将发生的事件，这就增加了敌人迅速了解我们计划详情的危险。国内那些远离战场的、自称为军事分析家的人也作推测，我不认为这种推测对敌人会有多大帮助。这些远方的结论是根据某些最简略的情报作出的，它们经常是可笑的，但不是可怕的，只有当这些结论接近真实并且提出可以证明某些意图的统计资料时才是危险的。但在一个实际的战区中，情况就完全两样了；由于我生性讨厌那种不作解释的新闻检查，更由于我相信我战区内的记者的诚实，因此我决定让他们知道我的秘密。

这是一次我再也不想重复的尝试，因为这次战地消息的披露使一个把保密当作首要职责的人措上了包袱。但在披露消息时，我立即要求每一个战地记者都具有象我和我的同事一样的责任感。结果完全成功。从那时起直到发动攻击，从这个战区没有发出过任何带推测性的消息，也没有记者试图送出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任何资料。这次军事行动结束后，很多记者告诉我，他们唯恐一

时疏忽而犯下泄密之罪。在这次战役准备期间，他们甚至情愿彼此不讨论这个问题，并且发明了一些非常巧妙的代号来表示各种装备和这一拟议中的军事行动的详情。

会一开始，我就告诉记者们，我们将在7月初突击西西里，巴顿将军率第七集团军攻南部滩头，蒙哥马利将军率英国第八集团军攻锡腊库扎以南的东部滩头，这时大家都为之一惊。我解释说，亚历山大将军将指挥这两个集团军，而且我们为了摧毁德国空军，切断它的海、陆交通和削弱它的抵抗，已经进行了试验性的空袭；此时会场上几乎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我告诉新闻界，我们进行这样的空袭，是要使敌人误认为我们将从该岛西端进攻。我告诉他们，我们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使用的空降部队，其规模要比过去战争中使用的要大得多。这次进攻完全按照上述安排于7月9日开始实施。

马耳他的海上交通极为良好，所以我们选它作为这次军事行动开始阶段的司令部所在地。我们的空军部队大多集中在突尼斯东北部的机场上，因此，主要的空军司令部仍留在古代的迦太基附近。在进攻前一、两天，亚历山大将军、坎宁安海军上将和我都前往马耳他，以便能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我们成了该岛总督、陆军元帅戈特的客人。

当时的马耳他，与数月前相比，完全是另一幅景象。数月以前，它还是敌人空袭的目标，防御能力很差。马耳他曾遭到可怕的打击，但守军的军心从来没有动摇过。当盟军的空军和海军征服北非后来支援这里的守军时，他们已有充分能力应付局势。在我们感到需要马耳他的设备时，那里的机场仍然良好，当地守军斗志昂扬，求战心切。

在这次备战中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掌握了美国大规模生产方

法的美军,有时会创造出奇迹来。这就是在马耳他附近的果佐小岛上修建机场的事。该岛地势很坏,英国野战工程兵使用的主要是人力工具和简易设备,因此对于在那里修建机场以便及时供西西里战役之用,已不抱任何希望。幸而在这个紧要时刻,指挥该岛空军的帕克空军中将那里有个美国客人,他是一位专门建筑机场的工程师。

帕克把这个特殊问题告诉这位工程师,指给他看了选定的地点,请他估计铺设一条作战用飞机跑道需要多少时间。他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十天。”这使帕克——他自己就是一个干劲冲天的人——感到荒谬,以为自己成了开玩笑的对象。但他看到这位工程师确实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于是又问:“什么时候您能开始?”

“过几天我的设备一到,就可开始动工。”

结果发出了几份电报,在首批美国建筑队踏上该岛后十三天,第一架战斗机就从跑道上起飞了。

为了完成这项奇迹般的工程,工程兵几乎使用了在美国大型建筑业中所能见到的各种新式推土机,这些设备使英国工程兵感到十分羡慕,而且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设备竟能运到这样一个战斗正在进行的战区的偏僻地点。该岛的英国军官就这件事一再对我说,他们对美国工程兵的钦佩简直达到了敬畏的地步。这条战斗机跑道又给我们增加了一个支援攻击西西里的基地。

运送军队去各指定地点的舰队,必须从地中海范围内的各个港口出发。各种舰队不得不在西西里和非洲大陆之间的这个狭窄的、布满水雷的水域内准确地完成定时的和最后的调遣。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要在最后发动进攻之前,使敌人处于一种混乱和犹豫的状态。坎宁安海军上将、休伊特海军上将以及他们的所有部下,准确无误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突击日之前，各项工作看来都在完善地进行。在地中海的那个部分，夏天通常是晴天，然而这时气候却开始急剧恶化，以致使我们的登陆受到了威胁。当时一般是西风，所以我们很担心南部的滩头。东部滩头可以得到该岛本身的掩护。

我和坎宁安海军上将在他的办公室内度过了几个小时，气象专家不断送来气象报告和天气预报。海军人员习惯把风速称为“风力”。有时会进来一人报告：“风力四级！长官，”或者说“风力五级！长官。”在我看来，应该说成时速若干哩，但这时倒也不发生什么困难，因为只要看看坎宁安的脸色，就知道风力五级比四级更糟糕。然而天气预报说，日落时风速将减低，这使我们感到振奋，因为照这样继续下去，到了午夜，情况就会令人满意！

我们有些人到室外走了走，带着畏惧的心情，不，几乎是哀求的心情，看了风力计，因为进攻时刻正在迅速到来，到了那时，想从准备登陆的地点撤回突击部队就不可能了。马歇尔将军来电询问：“攻击是进行还是停止？”我的回答是天晓得！到了傍晚，天气预报表明，情况将有所好转。于是我们决定按计划实施，并将这个决定电复马歇尔将军。我的想法是，即使进攻南岸的部队觉得有必要推迟登陆，攻击东岸的部队仍可以安全登岸，这与企图停止整个舰队行动的后果相比，我们可以减少混乱和损失。

但是过了傍晚，风速惊人地增强。这时我们除了绝望地祈祷外，简直一筹莫展。



## 第十章

### 西西里和萨勒诺

预定抵达该岛的第一批部队是几个空降分遣队。其中一部分所取的路线正好经过马耳他，我们许多人便到山顶上去看他们经过。对他们来说，要在狂风暴雨中保持方向是困难的。在空军作战室里，我们的标定图板指出，很多飞机和拖机都被风刮得远离航线，但总的说来，各纵队还对着目标。当我们观看的那个纵队的飞机从头上飞过后，我们就回到司令部等候消息。我们大多回到屋里，抓紧时间睡了几个小时觉。

清晨得到的第一批情报有好有坏。许多在英国战线参加空降进攻的滑翔机，被风刮得远离目标。大风把其中一些抛进海里。我们担心伤亡惨重，尽管后来的统计表明，伤亡比我们估计的要轻，但这仍然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从海上在两侧登陆，看来进行得还顺利，只遇到轻微的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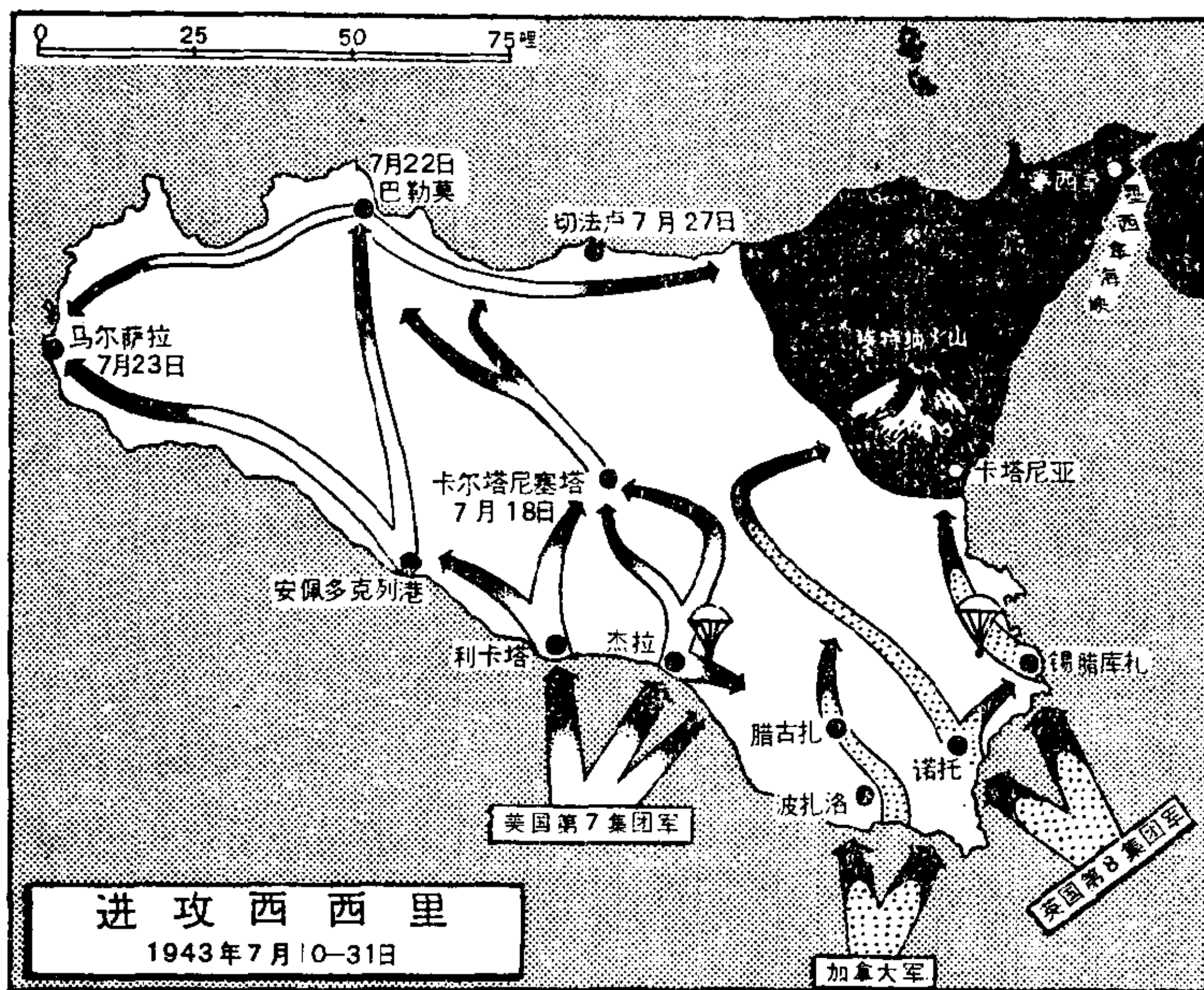
南线的伞兵已经着陆，虽然有的远离指定的着陆点。我们对美军进攻区的战况报告几乎感到惊讶，我们原以为，指挥突击护航舰队的艾伦·柯克海军少将甚至有可能把部队转入小艇的时间推迟几个小时，以待天气好转。坎宁安海军上将则认为在这个地区登陆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立即登上一艘驱逐舰去看情况。他回来报告说，第四十五师进攻区的登陆，是他四十五年海上生涯中所乐于见到的一次最出色的航海技术表演。

从开始收到的战斗报告看,很明显,敌人弄错了我们进攻的地点。敌人把最精锐的部队主要部署在西西里的西端,显然,他们认为我们会选择西部为进攻地点,因为那里接近我们的北非港口。他们的反应是典型的。他们用绝大部分机动兵力向东方和南方推进,攻击杰拉的美军第一师。这个师尚未完全登陆,敌人的攻击有突破滩头的严重危险,不过他们缺乏援军,特别是缺乏步兵和炮兵。第一师英勇作战,加上一支空降部队坚定的支援和海军炮火的援助,经过几个小时艰苦而危险的战斗,击退了敌人的反扑。

我认为敌人还会向我们这部分部队进行反扑,于是当天晚上,我离开马耳他,乘一艘英国驱逐舰去见巴顿和休伊特,他们是直接指挥这场战斗的陆军和海军司令官。第二天早上我抵达时,德军正在后撤,可能是为了加强他们岌岌可危的卡塔尼亚地区的防御。我们的每个士兵都是斗志昂扬,虽然我们在驱逐舰上所见到的战斗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炮火,但我们对南线的整个行动还是看得很清楚。两个随行记者(其中一个约翰·根特),则为他们的报道寻找地方色彩。我抓住在滩头上停留的机会,发给加拿大师一份电报,欢迎它接受盟军的指挥。

截至那个时候,历史上的两栖进攻还没有达到这次的规模。沿着好多哩长的海岸线,部署着数百艘军舰和小艇,岸上则是数不清的向前挺进的队伍。空中飞着用作掩护的战斗机。

我们希望尽早拿下的地方是墨西拿,这是敌人在该岛东北端的一个港口,与意大利大陆仅隔一条狭窄的海峡。敌人的供应几乎全部来自这个港口,一旦拿下它,就能使该岛守军处于绝望境地。敌人当然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看出这个简单的道理,于是迅速集中兵力以阻止最靠近墨西拿的蒙哥马利前进。在这个战斗中,敌人占有非常有利的地形。埃特纳火山俯瞰该岛的整个东北角,



第八集团军北上的途程是沿着埃特纳火山面海的肩状部位上的一条小道。蒙哥马利的进攻，开始进展神速，横扫了东部的滩头，其中有对我们供应计划非常重要的纳粹港口锡腊库扎。但从那里到卡塔尼亚，抵抗逐渐猛烈。7月17日以来，第八集团军停留在卡塔尼亚平原上，前面是埃特纳火山棱堡，突入北上各山口的希望很小。蒙哥马利开始集结增援部队，向西投入一支包围纵队，这是他直捣最后目的地的唯一希望。

平原上疟疾流行。在地中海战役中，我们还没有在别的地方因疾病而遭到如此大的损失。在西西里的其他地方，我们也有一张十分惨重的疟疾死亡名单，而卡塔尼亚更是一个瘟疫窝。

巴顿这时正在向西西里中部猛进，同时在最左翼，他投入了几支机动纵队，沿岛屿的西缘进攻，登陆后十二天内就进入了巴勒

莫。他的迅速行动很快使敌人只剩下了墨西拿一个港口；它挫伤了庞大的意大利守军的士气，并且使巴顿的部队能够从西部进攻，以打破东线的僵持局面。

巴顿是一个机智的军事家，他在指挥战斗时总是清醒地估计速度的价值。神速的行动常常使部队把敌人暂时的优势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更重要的是，速度可以充分利用每个有利战机和防止敌人重新调整兵力抵挡连续的进攻。这样，只要争得速度和下定决心，每一次连续进攻就会比前一次更容易和更省力地获得胜利，最终将削弱敌人的斗志。因此必须不断成倍地加快速度，因为顽强而迅速的追击是战争中最有利的行动。

为了保证行动迅速，所有的司令官和士兵都必须认清各种战机，而且必须以坚强的意志去尽量创造这些战机。在每次战役进行时，高级司令官必须经常有计划地教导他的部队：在适当的形势和条件下，发动连续不断的进攻就必将取得胜利。为了整顿队伍而长期停止战斗，这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是正当的。有丰富战斗经验的部队都知道，向一支动摇的敌军发动不断袭击和进攻，就能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速度来源于训练、体质、信心、斗志、适当的运输和熟练的指挥。巴顿坚定不移地运用了这些原则，因此不但大大减少了伤亡，而且强烈地动摇了整个意大利政府，使墨索里尼在7月下旬垮了台。

当第七集团军逼近埃特纳火山高地的西麓时，战斗越来越激烈。主要由第一师进行的特罗英纳之战，是这场战争中最激烈的小规模战斗之一。在战斗中，敌人发动了二十四次反攻。那个地方岩石嶙峋，坎坷不平，所以很难肃清隐藏的敌人。攻占该地后的几天，我军在一个小山谷中发现了几百具德军尸体，这使他们大为惊奇；这些尸体迄今数字不清。他们是美军炮火的牺牲者。



(按原图译制)

在从巴勒莫向东挺进时，第七集团军的左翼沿海岸线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两栖作战，每次有一、两个营的兵力登陆。由戴维森海军少将率领的一支人数很少的海军机动部队以及沿着西西里海岸的悬崖峭壁挺进的部队，在完成这些攻击时所表现的协作精神和效能，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那一带的唯一道路是崎岖的山坡“台阶道”——其实是峭壁上的壁龛，而且被敌人在撤退时所破坏了的数不清的桥梁和沟渠切断了。第七集团军沿海岸向墨西拿的挺进，这也是工程技术、航海技术和步兵英勇战斗的胜利。

到7月底，除了受德国主子直接控制的少数意大利守军外，其他意军已经全部溃逃，但是沿着以埃特纳火山为中心的巨大的锯齿形山脊，德国守军仍巧妙而又凶猛地在进行战斗。这里的敌军装甲部队和伞兵部队，是我们在战争中遇到的一支最厉害的部队，

每一个据点都是在彻底消灭守敌之后才攻克的。

尽管如此,但当第七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已经完成包围,并准备向埃特纳火山的要塞进行最后突击时,德军发现大势已去,便开始横渡墨西拿海峡撤退。于是我们的轰炸机便袭击这条逃跑路线,但狭窄的海峡使大部分受到严重打击的德国守军趁着黑夜在数小时内就逃走了。

8月17日晨,美军第三师进入墨西拿。第八集团军的一支分遣队不久也赶到,当天,敌人在该岛的最后残余兵力全被歼灭。

开始研究西西里战役时,亚历山大曾经模糊地希望,在西西里东部登陆的部队能够很快北上逼近墨西拿,在那里有效地切断敌人容易撤退的道路,进而渡过狭窄的海峡,作一次可能的突然登陆,以便在以后支援我军迅速进入意大利大陆。

蒙哥马利在东岸的作战,开始时进展很顺利,看来亚历山大的希望在几天时间内就可实现。但当蒙哥马利准备突击从埃特纳火山延伸至海边的自然屏障时,敌人兵力已大为增强。即使在此以前有过奇袭的机会,这时也不复存在了。此后,从地形看,第八集团军北上的道路与第七集团军左翼东进的路线同样难走。另外,第八集团军还必须战胜敌人的优势兵力。就在埃特纳火山东部临海的峭壁上,我看到难以置信的野战工程技术。有一条道路完全被炸断,成为一个长达两百码的缺口,看上去象一处几百呎高的悬崖。工程兵在这个缺口上建造了一座架桥,能够承受最重的辎重负荷。这是军队在战场上遇到在绝对必要时所能创造的奇迹的又一实例。

尽管如此,蒙哥马利的“慎重”又受到了批评。当他正在横越沙漠长途追击隆美尔时,我第一次听到记者和飞行人员对他的批评。批评是容易的——一次失败的攻击被斥之为“刽子手”<sup>①</sup>,正如

<sup>①</sup> 指在战斗中无谓牺牲兵员之将领。——译者注

每次停顿被叹惜为“懦夫”一样。这类指摘不好辩解，因为证明或反驳都是不可能的。在战争中，评价一位司令官的唯一标准是他胜利和失败的总记录。只要是一个经常打胜仗的将军，他就理应因其才能，因其对事物可能发生的情况所表现的判断力，以及因其领导能力而受到赞扬。有些人指摘蒙哥马利，说他有时未能取得最大的战果，但他们至少必须承认，他从未遭到过一次惨败。对于这次例外情况，我和蒙哥马利及亚历山大都认真地回忆了当时的一切细节。我那时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如果依靠7月中旬所能得到的人力和装备就去轻率地进攻埃特纳火山阵地，恐怕早已失败了。要好好地记住：慎重和怯懦不是同义语，正如勇敢并不等于卤莽一样！

在西西里战役中，美军将领战绩最好的要数布莱德雷，所以在8月末，当马歇尔将军要我推荐美军驻英国的集团军司令的人选时，我回答说：“说实在话，您应让布莱德雷去，而且您什么时候要，我就什么时候放他走。”不久，布莱德雷将军赴英就任新职。

在这次战役中，英、美两军之间的战友精神日益增强和发展，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收获。第七集团军首战告捷，颇享盛名，深为久经沙场的英国第八集团军所敬仰，而美军对他们的英国、加拿大伙伴的战斗品质，也表示由衷的钦佩。

这次战斗大大提高了空、海、陆三军的协作效率。海军在护航、支援和供应方面尽到了责任，创造了奇迹，而且只要其他兵种提出要求 and 援助时，它总是予以密切配合。空军强有力的轰炸是这次突击的真正序幕。它除了成功地击败敌人空军外，还严重破坏了敌人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交通线，使敌军的机动能力显著减弱，造成敌军供应方面的极大困难。

这种国际之间和军种之间的互助精神的发展，始于前一年7月

伦敦司令部的建立。在西西里战役结束时,这种精神已经牢固地树立起来,而且如此经常地体现在司令官和参谋人员的日常生活中,以致不再需要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来对待了。

在这次战役中,发生了不幸的巴顿将军“毆人事件”。巴顿到一所基地医院探望伤员,很快接连发现两个没有明显负伤的人。巴顿遇到第一个人,就问他为什么住院。那人回答说:“将军,我想我的神经有毛病。”巴顿大为恼火。多少天以来,他本人已经是过度紧张。再者,他坚定地认为,没有什么真正的“战争疲劳症”或“战争神经病”。他总是强调,谁要是在战争条件下表现萎靡不振,只要给他一个震动就可恢复责任感和充分的工作能力。当时,巴顿的情绪还异常激动,因为他在医院中目睹伤员的情况,体会到了他们的痛苦。他破口大骂那个士兵。他的不停辱骂引起医生和护士的抗议,但由于他在盛怒之下,所以他们不敢进行干涉。

不一会儿,他又遇到第二个有同样情况的士兵。这次他再也不能克制自己了,于是挥手打了那个士兵的脑袋。他把那个士兵的钢盔打落在地;这时候医生和护士克服了对这位将级司令官的畏惧,在巴顿和这个士兵之间进行了调停。

这两个士兵当然是吓得魂不附体,其中一个害了重病。医生后来证明他发烧到华氏一百零二度<sup>①</sup>。巴顿很快克制住自己,继续视察,然后离开医院。在整个探访过程中,他不断地大声斥责那些自称患精神病的人是懦夫,并且大声叫嚷,不应当让他们和那些勇敢的伤员住在一起。

这件事闪电般地传遍了医院和附近的部队。不久,我接到该院院长的一份非正式报告,仅几个小时后又受到一群记者的访问,

---

<sup>①</sup> 摄氏四十度。——译者注



他们已到医院进行了采访。他们的报告证实了我收到的那份报告的内容。问题是怎么办？在前线，每一个老兵都知道，采取严厉措施，以使部队中每个士兵迅速履行职责，这经常是必要的。在一个排或一个营中，若是有人畏缩或逃避，那就必须立即予以严厉惩处。士兵们只有当他们知道他们的长官要求部队中人人充分尽职时，才会有信心跟随他。在枪林弹雨中，一个士兵的安危取决于部队中其他人能否尽职，士兵们决不愿接受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当领导。巴顿的过错，如果发生在前线上一个突击排里，那就算不上是个罪过。它不过是战斗中的一个偶然事件，甚至没有人会注意它，至多使人产生这样一个转瞬即逝的想法：这个长官是不能容忍任何人逃避职责的。

但是巴顿的行动是发生在这个时间和这个地点，所以说他的过错是严重的，而他的地位和身份更加重了这一过错的性质。在医院殴打和侮辱一个士兵，如果不是用巴顿本人一时感情激动作解释，那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暴行。巴顿感情容易激动，性情容易冲动，但正是他的这些品格，使他成了一位著名的、非凡的集团军将领。在追击敌人和利用战机时，我们需要的正是只知勇往直前的司令官；他越是驱使他的士兵向前，就越能挽救他们的生命。他必须不顾疲劳，无情地要求部下发挥出最后一点体力。

巴顿的这些品质我全都了解，因此，尽管我对他的这个行为感到恼火，但还是能谅解他的。我觉得应当挽救巴顿，以便在今后我们面临的欧洲大战中使用他。不过我必须想出办法，尽量减少因他的粗暴行为而产生的危害，还必须使我自己确信不再发生这种行为。我那时正在紧张地拟订进攻意大利的方案，不能立即到西西里去。因此，我派了三个人到那里去，我对他们的判断力、机智和诚实都很信得过。我派一人去见巴顿将军，另一人去访问出事

的医院。还有一人到巴顿集团军所辖的各师，由他亲自确定这件事在部队中传布的范围以及他们的反应。我不但需要从几个来源得到的独立情报，而且要尽快完成整个调查工作。

结果是我决定保留巴顿。我先写给他一封严厉谴责的信，告诉他，如果再犯这类错误，就要立刻免他的职。我还告诉他，他能否在我的战区继续当一名司令官，还要看他是否向两个受辱者道歉。我又要他向出事时在场的所有医务人员道歉。最后，我要求他当着军官和他所辖各师的士兵代表小组的面，保证不再为所欲为，并且尊重他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战士的身份。

巴顿立即答应。我又通过一系列的观察者和检查员了解了结果。

同时，我一决定措施，就立即召见那些告诉我这件意外事件的记者。我向他们详细解释了我所采取的办法以及这样做的理由。我把我写给巴顿的信念给他们听，另外还念了巴顿回信中的一部分内容。在我当时看来，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在和这件事有关的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误会。这就是人们猜想会对这件事实行新闻检查。恰好相反，我通知我的参谋部和巴顿将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有任何压制这件事的行动。我亲自向一批记者发表的这些特别说明，既可说是直接的新闻检查，也可说是“间接的压力”。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可以自行判断！有两个记者在向我作了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报告之后，于出事后几天内就返回美国了。这一事实证明，他们是自愿地拒绝报道或谈论有关事件的。他们当时都不在盟军司令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他们是德马里·贝斯和昆廷·雷诺兹。

然而，这段插曲的余波使我们和新闻界一向良好的关系暂时紧张起来。几个月后，这件事通过小道消息终于传到华盛顿，当评

论员把它广播后，舆论立刻喧哗起来。为了公平对待驻我们总部的新闻记者，我的参谋长决定举行一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提供他们不了解的详情。我给他的唯一指示是：“披露全部真相。”

在这后一次会议上，有记者发问：巴顿是否受到纪律处分？参谋长回答说，没有进行处分。从手续上说，这样回答是对的，因为处分并未记录在正式档案中。但在事实上，那样说是错误的。会后有记者立即用电话向我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对新闻界的卑鄙行径”。我马上下令加以改正。可是危害已经造成，消息已传到美国；仅仅晚了十分钟！参谋长对他的错误极为悔恨，他的自我谴责是如此深刻，以致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今后再也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了。这件事还向我们两人表明，新闻记者的行动是非常迅速的。我们和他们打交道，必须在一开始就不出差错。

事情全部结束后，我的老朋友乔治<sup>①</sup>写给我一封长信，其中有如下一句话：“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表示我的悔恨和难受，因为我给您——一个我深受他的恩泽并乐于为他献出生命的人——带来了不快。”

西西里战役的结果，远不止仅仅占领敌人的这个要塞。前面已经提到，好吹牛皮的墨索里尼垮了台。整个意大利国家骚乱和不满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意大利显然在寻求一个最容易摆脱战争的办法。墨索里尼的首相职位由年老的陆军元帅彼得罗·巴多格里奥继承。后者的第一篇宣言表明，他的政府的宗旨是继续战争，但他发表的这篇宣言不过是希望取得德国人的谅解，使意大利人不致遭受那个蛮横的盟友的惩处。

意大利单独议降的希望确实是微小的，因为在墨索里尼的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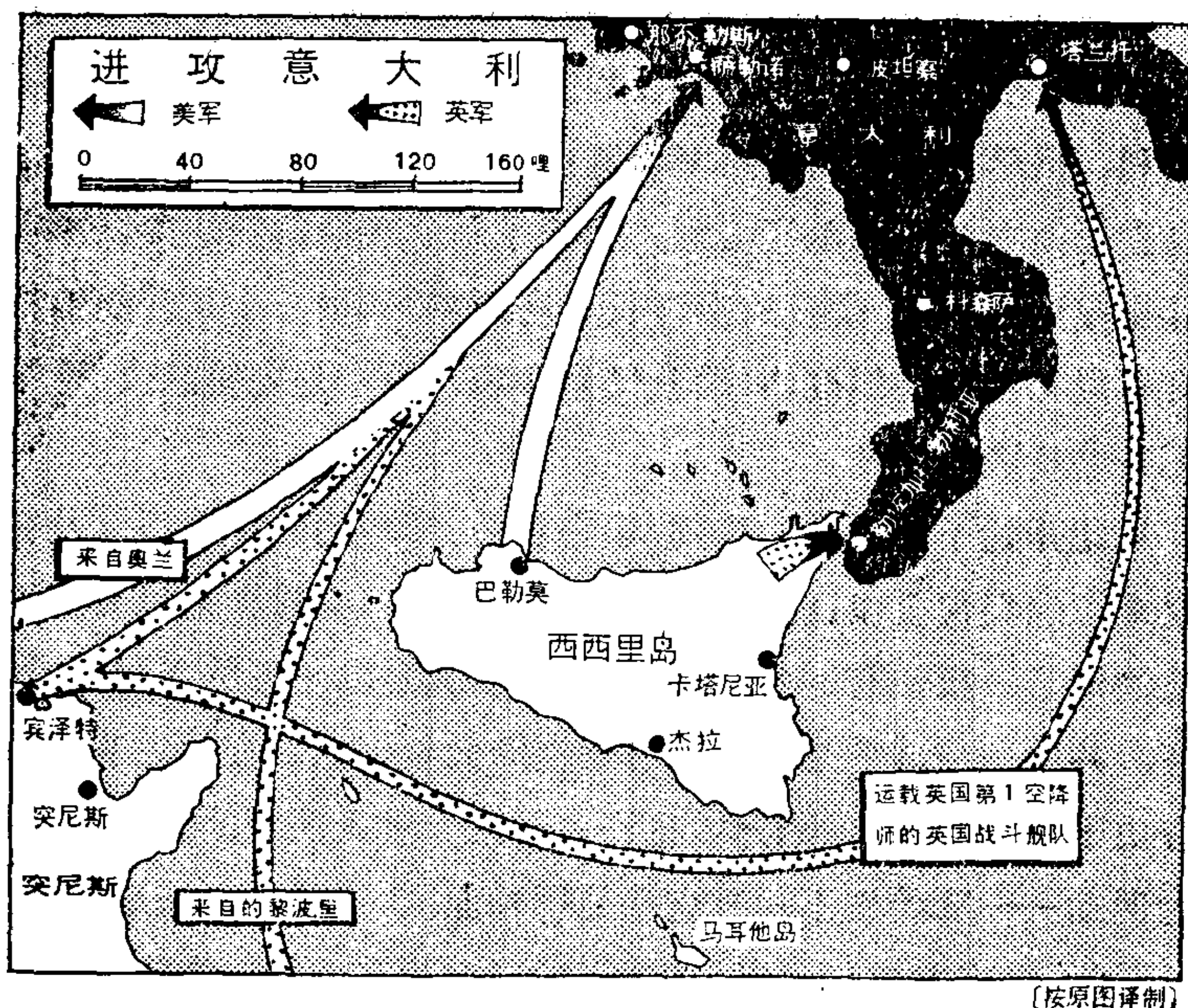
---

<sup>①</sup> 即巴顿。——译者注

许或者被迫同意下,大量德国人已经渗入意大利所有政府部门。这些德国人准备抓住意大利背叛的苗头,在名义上和实际上接管意大利。但尽管有德国人的密切监视,意大利政府还是派了一个代表去里斯本企图和我们接触。我派了两个我最信任的参谋军官去那里接见他,一个是我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另一个是我的情报军官肯尼思·斯特朗准将(后升任为少将),他们是安排意大利军队无条件投降的密使。

从此开始了一系列的谈判、秘密联系、密使的暗中旅行以及在秘密地点的经常会谈;如果小说中出现这类事,必然会被讥笑为不足信的情节。我们有过各种各样的计划,只是由于形势变化才被放弃。其中一项计划是在罗马附近空降大量部队。在最后时刻,也许由于意大利政府的恐惧,也许由于意大利人所说的德国后备军的调动——我始终不知道究竟是哪种原因,这项计划被迫取消。与此同时,马克斯威尔·泰勒准将(后来成为第一〇一空降师的英勇的师长)秘密赶到罗马,他个人以及他的同伴在那里的经历,给这段扣人心弦的故事添加了惊险的一章。他冒的危险,比我在战争中要求其他代表或密使所冒的危险大得多;他身负重任,而且以正确的判断力履行了这些责任,在此期间,他时刻都有被立即发现和杀害的危险。

意大利人迫不及待地要投降。然而,他们只有在取得下述保证时才能投降;在他们投降的同时,将有一支足够强大的盟军部队登上大陆,以保护意大利政府和城市完全免遭德军的破坏。因而他们企图获得我们计划的详情。我们没有透露,因为背信弃义的可能性永远不能排除。再者,要以意大利人认为必需的兵力进攻意大利是完全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即我们在这个地区没有那样多的军队,即使有,也没有运兵船只。意大利军事当局不能想象,盟



军能用不到十五个师的兵力，以波状突击实施这个军事行动。我们计划只用三个师和一些支援部队，此外，还有两个师将横渡墨西拿海峡。

当谈判还在进行时，蒙哥马利按照计划用两个师的兵力在一个夜晚未遇抵抗就渡过了墨西拿海峡，从此，盟军进入欧洲大陆已成事实。这天是9月3日，比我希望的日子晚了十天。两栖进攻的准备是要花费时间的，如果我们这次能节省几天，那就更易于解决萨勒诺问题。虽然如此，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容许我使用蒙哥马利渡峡时用过的一些登陆艇来实施今后的主要进攻。他立即向这个长靴半岛的尖端挺进，敌军一面小心翼翼地阻挡着他，一面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我们的主要行动。

墨索里尼垮台后的短时期内，我们停止了对意大利的猛烈空

袭。我们宣布,停止轰炸是为了促使新政府立刻接受我们提出的全部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同时给新政府一个使国家免遭更大破坏的机会。这一行动引起伦敦方面的愤怒抗议。这件事再次提醒我们,战场上一个现代司令官,与本国的都市和公众舆论的距离再也超不出个把小时的时间。实际上,暂停轰炸是为了转运空军部队和补充物资;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我们能够再次最有效地利用我们的空军力量时,就立刻恢复空中战役。

在实际决定战术计划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有尖锐分歧意见的问题。一些人认为,进入意大利的最安全的——虽然算不上是决定性的——方法是,在蒙哥马利建立了第一个滩头阵地后,就沿着长靴的尖端前进,艰苦地通过蜿蜒的小道向意大利的心脏地区挺进。这项计划是安全的,但它不能提供有价值的结果。事实是,一旦敌人弄清我们的主要行动方向,就能很容易地在我们无法疏开和运用兵力的许多山区阵地上阻止我们前进。

情况清楚地表明,必须在更广阔的战线上发起进攻。我们研究了从罗马到靴尖的每一个滩头,最后选中萨勒诺湾。这项计划的一个最不利之点是,敌我双方都清楚,选择萨勒诺湾作为进攻地点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大部分驱逐机仍然受到航程短的限制,萨勒诺湾大约位于它们有效地支援登陆的最远航程内。此外,在这个海湾和靴尖之间,没有其他特别有利的登陆滩头,所以我们就不能抱出奇制胜的幻想去进行这个军事行动。

同时,有关意大利投降事宜的谈判仍在进行。这些谈判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在谈判中讨论了势力仍然强大的意大利舰队和空军残部的问题,以及驻在半岛和巴尔干各国的意大利地面部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讨论了在德国人对意大利整个国家实行如此牢固控制的情况下,意大利能否实现投降的问题。最后一致同意:

投降将在9月8日晚生效，巴多格里奥和我将同时宣布投降协定。我选择这个日子的原因是，当天深夜我们将开始进攻萨勒诺。所有这些冗长的、有时令人生气的谈判，都是我的参谋长替我们进行的。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9月8日中午，我收到一份通过秘密渠道转来的电报，大意是说巴多格里奥推翻了他的决定，理由是我们过于匆忙，结果只能使德国人完全控制意大利，同时有关的人将遭到血腥镇压。对我来说，这件事已进行到这种地步，以致不能再作任何妥协了。我在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中回答说，不管他采取什么行动，我将按照原来的约定，在6时30分宣布意大利投降，如果在我宣布的同时得不到他的响应，意大利在战争中将不会再有朋友了。

那时我正在迦太基附近的前沿指挥部。巴多格里奥把电报首先发给设在阿尔及尔的总司令部，参谋部接到电报后完全不知所措，一面把电报原件送交给我，一面又打电报向联合参谋长会议请示。我决定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命令参谋部不要电告联合参谋长会议，如果非电告不可，就说这件事已由我亲自处理了。我在当天傍晚6时30分宣布了意大利投降，巴多格里奥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最后决定在一个半小时后跟着宣布。

这件事丝毫没有改变我们的进攻计划。几天以来，我们已经获悉，防守萨勒诺湾地区的意大利部队已为德军的精锐部队所代替。我们的情报部门预言，在滩头阵地将有激战，在开始登陆后四至六天内，某些地方将有强大的反击，这时是战斗的高潮。

我们是用大约四个师的突击兵力，加上已经登陆、但仍远处于东南部靴尖的两个师去攻打一个据估计驻有十八个德国师的国家的。尽管后援部队比开始的突击兵力要增加一倍，但从某些方面

说,进行这次军事行动看来是冒失的;但是我们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是相信空军有能力集中它的打击力量,在开始阶段给滩头阵地以空中掩护和紧急支援,还相信在登陆部队自己能独立行动以前,海军有力量用近距离的和持续的炮火来援助他们。

登陆及登陆后的战斗,其发展几乎和参谋部情报处的预测完全一致。在登岸过程中发生了激烈的、但是为时较短的战斗,除少数情况外,实际登陆进展顺利。敌人按照它的习惯,立即开始反攻,到13日,敌人已集结了足够的兵力,企图竭尽全力把我们赶下海去。这期间,德国的宣传机构把这次军事行动讥笑为一个大错误,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大事宣称,盟军的进攻将彻底失败。

13日这天,德军疯狂进攻,激战时间相当长。德军攻击的最大压力来自中路,并且推进到离滩头不到二、三哩的地方。前景变得有些暗淡了,尤其是美国第三十六师从意料不到的方向受到了打击,遭到惨重损失后才转危为安。有一个时候,我军的进攻部队很有可能被分割为两部分,因此,克拉克将军拟定过一个初步方案,准备把他的司令部迁回到军舰上,以便指挥两部分军队,并判断哪一部分军队最有希望取得胜利,就从哪一方面继续进攻。这个初步方案被以断章取义的形式送至总司令部,引起了一阵惊愕,因为它好象表示,在现场作战的司令官们已经气馁,准备撤出全部军队了。事实并非如此。克拉克将军和指挥英国第十军的理查德·麦克里里将军的决心从来没有动摇过。

克拉克将军在率领第五集团军进入萨勒诺之前,还没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事实已经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将领,而且也充分说明,我信任他并委派他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是正确的。在以后的战斗中,亚历山大将军成为地中海战区的最高司令,而克拉克被提升为在意大利的集团军群司令,这一任命清楚地



说明,英、美两国政府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

13日那天接连不断的报告和侦察,提供了德军进攻的详细情况,同日,泰德空军上将奉命集中全部空军,包括每一架能起飞的飞机,向德军阵地的重要地点进行袭击。这次强大的空袭,在14日凌晨准确而有效地开始。它严重破坏了敌人的交通线、供应和机动力,在海军炮火的支援下,地面部队又获得主动权,此后德军的反攻再也得不到足够的兵力来全面威胁我们的阵地了。

但是,激烈的战斗还没有结束。进攻意大利原来有两大目标,一个是攻占那不勒斯,把它当作供应部队的理想港口,另一个是占领福贾的机场,用以补充对中欧的空袭;到那时,轰炸中欧的飞机几乎全是从英国基地起飞的。

16日那天,我去萨勒诺了解到一些情况,看来可以说明,有个别的或更多的美军司令官缺乏才能。经过仔细调查,我认为必须同意克拉克将军的意见,把他手下的一个美军军长解职。

在战争期间,不能轻易地撤除一个指挥战斗的司令官的职务。这样做所产生的第一个影响,将是向部队表示不满意他们的表现;不然的话,司令官将会受到赞扬,而不是遭到解职了。但这种可能产生的效果,必须始终与任命另一个也许是没有经验的司令官所能带来的好处互相加以权衡。另一方面,对于真正不称职的司令官必须很快察觉出来,立即免职。事关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这不是一个对司令官空谈公道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很多人,也是一个关系到胜利的目标的问题。

萨勒诺和我们在西西里的空军基地距离太远,因此我们特别渴望迅速攻占福贾的机场,为了加速实施这个军事行动,我们预先研究过若干方案。

西西里战役完全结束后,我们开始把七个师——四个美国师

和三个英国师从地中海战区调往英国，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大突击。这些师调离意大利后，留下来的部队只有一个英国空降师可以用来朝福贾方向攻入意大利半岛的脚跟和小胫部分。指定该师的登陆港是塔兰托，这是我们希望通过意大利投降条款来得到的一个基地，那里几乎没有德国兵。只要我们能够立即把哪怕是少量部队送上岸去，我们就能以微小的代价迅速取得那里的重要机场。

登陆塔兰托会赢得丰硕的战果，可是我们除了海军战舰外，海上运输船只都已被指定参加萨勒诺战役。此外，空降师因缺乏陆路运输工具和重型装备，在需要长途陆地进军的攻击战中，它并不是特别适用的兵种。于是我们再次决定进行一次冒险。这一次，坎宁安海军上将承担了重任。他不顾可能出现的背信行径或战舰在布雷区被炸毁的危险，毫不犹豫地同意把他的战斗舰队直接驶进塔兰托港，并把英国第一空降师送上该港码头。9月9日，我们开始按计划行动，但损失了一艘优良的英国巡洋舰和舰上的二百多人。它是在塔兰托港触雷沉没的。

官方报告记录了这次行动期间的一个戏剧性事件：

9月9日下午，战舰“豪”号在四艘巡洋舰护航下，载运英国第一空降师的士兵，经扫过雷的海峡向塔兰托疾驶。在此以前不久，意大利舰队塔兰托分队从该港驶出。当两支舰队彼此交错经过时，形势一度紧张起来。因为不能保证意大利舰队会遵守投降条款，也不能保证它最后不会开火。坎宁安海军上将神态镇静自若——这是这位伟大水兵的一贯特征，提出了最后挑战，但是没有得到反应。意大利舰队驶出视线，前去投降。

算上这次登陆，我们在意大利大陆上已有了三个登陆点，这就是萨勒诺、塔兰托和勒佐加拉勃利亚。

萨勒诺的激战，使敌人抽走了与蒙哥马利对阵的部队，从而加快了他北上的速度。到16日，他的左翼和紧靠萨勒诺湾南部的克拉克右翼会合。蒙哥马利的右翼继续前进，与向福贾推进的空降师会师。几天之内，这个丰硕的战利品就落入我们手中。克拉克仍向那不勒斯方向推进，1943年10月1日，他的部队胜利进入这个城市。

工程兵和海上打捞队——他们在修复海港方面的功绩常常使我们惊讶——立即联合起来协同工作。过去他们在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奥兰、宾泽特和巴勒莫作出的成就，如与他们在修复似乎已被破坏得无法使用的那不勒斯港口设备方面所作的功绩相比，无论在速度和效率上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建立了这个基地，牢牢掌握住福贾，就完成了意大利战役中最初的两大任务。以后在该地区的主要战斗目的是：第一，牵制德军，使他们远离次年渡峡之战的主要突击地区。第二，当然是迫使德军不断消耗从意大利的一些曲折而脆弱的交通线上运来的补充队伍和供应物资。第三个目的是政治性的，即保持对罗马和意大利北部工业中心的经常威胁，造成巴尔干各国和欧洲其他部分的不安，以挫伤德军的士气，增强我们的斗志。

但是，从根本上说，今后的意大利战役显然已成为辅助性的军事行动，尽管它在实际击败德国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几乎是不可估计的。可以明显地看出，向德国本土作决定性的进攻，意大利本身并不是一条有利的途径。只有横渡英吉利海峡，通过法国和荷兰才能进行这场决战。

9月初，意大利投降后不久，地中海东部出现了一个情况，不仅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而且将使不同意见的两方在今后长时期内争论不休。多德卡尼斯群岛地位很重要，那里主要由意军驻守，

在意大利投降后,几乎不用战斗就可取得这个群岛。如果能够劝说意大利驻防部队为盟军防守这些岛屿,看来我们几乎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在该地区得到很大的战略利益。

陆军上将亨利·威尔逊领导的中东司令部,对此情况极感兴趣。它立即派遣一个小分队前往这个群岛——其中包括累罗斯岛和罗得岛,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很快就发现,意大利驻防部队无意和任何人打仗。这样,要守住这个群岛,盟军就得派出驻防部队,而这些部队只能从当时尚在意大利艰苦战斗的盟军中抽调。

首相迫切希望支援这个群岛,我的参谋部和我以最大的谅解心情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一些临时的空中支援外,无力提供援助。派出过多的空军部队,特别是向该地派出陆军,对于我们当时进行的战斗必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同时,地中海东部所能提供的援军,可能不足以守卫这个重要的群岛。

首相坚持要采取某种办法来支援中东,我们就奉命和中东各军种总司令举行一次会谈。他们来到突尼斯与我们会晤,我在那里召集了我统辖的几位陆、海、空军总司令。

战争期间,在我参加过的任何这类会议中,这是最简单、最无争议的一次。我叙述了我们了解的全部情况,宣布了我作的决定,它如果不被联合参谋长会议推翻,就是最后的决定。决定的内容是:不能保证从意大利战区得到分遣队,我们无力、也无意对这个群岛采取行动。在我看来,这个群岛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其军事价值却不能和意大利战斗的胜利相比。与会的军官都很同意我的结论,尽管它使中东各军种总司令非常失望。同时,我们也都知道,首相是难于接受这个决定的。我向联合参谋长会议汇报了这些结论,它支持我的决定。不久,这个群岛很快又被敌人夺去了。

自从开始征服西西里以来，我们就已着手一项新的工作，这就是向占领区的居民提供一个管制机构。我们特别训练了一批“民政官员”，其中有美国人，也有英国人，他们随同突击部队前进，从战斗部队的手里接收管制居民的主要任务。

美方人员是在弗吉尼亚州的沙罗特斯维尔学校受训的。后来，英、美两国的军事管制官员又进一步在北非受训。我的司令部里有一个特别部门，他们就在这个部门总的监督下进行活动。

公众的健康、管理、卫生、农业、工业、运输以及其他成百项为大众生活所需要的事务，都由这些官员加以监督和指导。他们的工作是困难的，但又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而且也有利于我军的胜利。每一个军辖区的后方都要有和平和秩序；否则它必须派出部队去维持通讯和交通，保护物资和运输，另外还要镇压敌人的地下活动。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它虽然还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但完成得很好。我们为今后在意大利和德国进行类似的、更重大的工作取得了经验，也得到了教益。

## 第十一章

### 开罗会议

当夏、秋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时，我们得到消息说，总统和首相以及他们的参谋人员准备在开罗附近举行另一次联席会议。当时埃及不在我们战区之内，但除了要求在通过我们战区时保证安全外，我们还奉命为预备性会议和与会人员的膳宿提供安全地点。在预期总统停留——即使暂时的——的一切地方，美国特工人员总是比总统先蜂拥而至。为了保证总统的安全，他们开始和我的参谋人员进行侦察工作，但这就不可避免地预示了总统的到来。

有关会谈计划的秘密，显然已在华盛顿或伦敦透露出来。由于全世界的新闻界大量予以评述，开罗报纸上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准确报道，因此我国政府非常担心。就在首脑们已经动身去会谈地点之后，我国政府还提议改变整个计划。陆军部紧急动议把会谈地点移至马耳他，甚至移到喀土穆。有消息说，所有狂热的纳粹同情者已得到通知，准备采取各种可能的行动。这样，我们保证总统和首相安全的责任就更加重大了。经过考虑，我仍坚决劝告总统不要对计划作任何改变。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防御措施，其中有以重兵保卫的禁区和防空工事。我认为，如果这样都不能保护会议和与会人员，那么，把会议突然移到我们没有很好准备的地方，就只会增加危险。突然停留一、两天，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令人满意。但是一个计划要开几个星期的会议，唯一的保护

办法就是作充分的准备。

首相比总统先抵达我们的战区。我在马耳他会见了丘吉尔先生，我们在那里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经过认真的讨论，他同意我的意见：按原计划进行会议是明智的；他并且把这个意思电告了总统。

首相由他的军事参谋陪同，所以我有机会利用一天的时间和他们讨论了许多涉及现在和将来的军事行动中令人关心的问题。

丘吉尔先生始终是那样风趣横生。我还没有遇到过其他任何人能使宴会如此满座生辉。他对事件和人物的评论虽是尖酸刻薄，但总是谈笑风生。他非常热情地期待与总统会晤，他说，对于处理战争问题和以后的和平问题，他经常从总统那里得到启发。他滔滔不绝地谈论了他喜欢的一个话题，这就是通过“柔软的腹部”攻击德国，以及保持进攻意大利的速度并将进攻范围扩大到包括地中海北岸大部分地区等方面的重要性。他似乎总是只看到地中海有着巨大的、决定性的希望，而一谈到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方案时，他便兴趣索然。在谈到“霸王”行动的前途时，我曾多次听他说：“我们必须慎重，不要让美、英两国青年的鲜血染红海水，或者让他们的尸体阻塞海滨！”

我不能不感觉到，丘吉尔先生的观点不自觉地受了两种考虑的影响，而这些考虑都不在当前的军事问题范围之内。我虽然没有具体的东西来证实这种感觉，但是，我知道，作这样推测的却大有人在。这里说的两种考虑，其一是，丘吉尔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关心着巴尔干各国的前途。我对这种关心极表同情，不过作为一个军人，我特别小心地从我的建议中排除这种考虑。其二是，出于他内心的驱使，他要证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持的战略观点，因为在这方面，他是加利波利战役的主要代表人物。很多专家都

一致认为，加利波利战役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因为错误估计了胜利的可能性，而是因为草率从事。有时看来，首相决心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公众接受这个观点。

在马耳他古老的骑士宫，首相授与亚历山大和我每人一枚英王赐给的特制勋章，象这样的勋章过去还没有过。授勋仪式是非正式的；一个来宾评论说，如果在四百年前的这座宫殿中发生这样的事，城堡内要连续几天举行比赛、集会和喧闹的宴会。

不久，我应召去见总统，他乘船抵达奥兰。我们在奥兰让罗斯福先生转乘飞机，把他送到突尼斯海滨的一座别墅，凑巧的是，当地人也把这座别墅称为“白宫”。当时，总统看来很健康，并且乐观而有信心。他在突尼斯多留了一天，凭吊那里的古沙场。在经过这些古沙场时，他推测说，我们的战场很可能正是古代的战场，尤其可能是扎马的战场<sup>①</sup>。就总统和我所知，扎马战场还没有被历史学家确切地考证出来，但我们断定，当时迦太基人使用过大象，因此它应位于平原而不在我们打过许多仗的这个山区。总统喜欢历史，谈吐中经常引用典故，这就增添了和他谈论军事题目的兴味。乔治·巴顿，还有首相，也都有这个爱好。

总统和他的陆军妇女队司机进餐时，我离开他们去看一些被击毁的坦克。当我回来时他问道：“艾克，如果一年前你提出打赌，预测美国总统今天将在突尼斯的路旁进餐，你要下什么样的赌注？”这个思想明显地表明，他在回想刚好一年前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他先告诉我，他感到失望的是，我们进攻非洲刚好在1942年选举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他提到达尔朗、布瓦松和吉罗德。他谈到意大利和墨索里尼，以及他对卡塞林战役的不安。他举出他和丘吉

---

<sup>①</sup> 扎马在迦太基城以南。公元前202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与罗马军会战于此。在这次战斗中，汉尼拔第一次被罗马将领阿非利亚的老西庇阿所击败。——译者注



尔先生之间发生分歧的事例，但是他又真挚而几乎是激动地说：“再也找不到比这个老保守党员更好、更坚强的盟友了！”罗斯福先生看来确实是兴致勃勃，但他的回忆被一个特工人员打断，后者上前说：“总统先生，我们在这儿已超过我希望的时间。我们应当马上动身。”总统苦笑了一下对我说：“你很幸运，没有我那么多的监工！”

特工处曾极力反对总统巡视战地，但我自信十分熟悉情况，所以认为这次巡视是绝对安全的。因为这是一个突然的行动，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这种情况只能增加而不会危及总统的安全。

随同总统一行巡视，必然要受到拘束，为了使马歇尔将军和金氏海军上将多少摆脱这种拘束，我邀请他们到我在迦太基的小别墅去住宿。他们两人因有机会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都真诚地感到高兴；看来他们的身体都很好，精神也很饱满。在一次餐前谈话中，金氏海军上将提起了指挥未来“霸王”行动的话题。他说总统和首相在一次较早的讨论中，一致明确地同意任命一个英国军官担任这个职位，这也许是因为已经有一个美国人在地中海战区担任了司令官。后来，当总统逐渐发现在“霸王”行动中美国兵力实际上将超过英国兵力时，他断定公众舆论将会要求一个美国人充当司令官。他就这样通知了首相，首相表示同意，尽管这次同意使他个人有些为难，因为他已答应艾伦·布鲁克担任这个职位了。

同时，总统向丘吉尔先生提出，接受这一安排，就理应把地中海战区的指挥权交给英国，由大英帝国的武装部队在那里提供大部分的陆军和海军。金氏说，总统不顾他和其他一些人的迫切和坚决的劝告，初步决定把“霸王”行动的指挥权交给马歇尔，而金氏等人则担心马歇尔离开联合参谋长会议会产生不良后果。

金氏海军上将在解释时，马歇尔将军在旁默不作声；他好象感

到为难；这时金氏直率地说，只有把我本人推选去接替马歇尔在华盛顿的职务，他才不会那么惊慌地看待这个方案。但他仍然觉得，调走一支胜利队伍的主要成员是一个错误，他宣称他要再次向总统提出他的意见。

首相虽然几天前在马耳他谈起过这个问题，但除了一些来自道听途说的消息外，这是我第一次从美国人那里听到对“霸王”行动指挥权的议论。金氏海军上将的话和首相曾经告诉我的情节完全符合，所以我几乎把他们的话当作正式通知接受下来，这就是说，我很快就将放弃战场指挥权，回到华盛顿任职了。

顺便说一下，首相对于布鲁克没有得到“霸王”行动的任命虽然感到失望，可是他曾非常满意地谈到任命马歇尔的前景。他说：“这是总统的决定；我们英国人乐于接受您或马歇尔。”他又补充说：“马歇尔的任命必将保证美国政府以全力投入这项计划。”接着他又匆忙补充说：“美国政府也是始终这样作的”，但是他又说，这个安排可能会引起更加强烈的反应。丘吉尔先生象平常一样关心个人的情绪，他安慰我说，迄今为止，他对在地中海战区取得的战果是满意的，不过他认为我会理解，在一个美国人去指挥渡峡大战时，把地中海战区交由英国人管辖，是明智之举。

我和金氏海军上将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总统就未来“霸王”行动指挥权问题和我进行了简短谈话。我最后了解到，这是我国政府和公众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他没有向我暗示他的最后决定，只是说他怕想华盛顿失掉了马歇尔后的情况。但他又说：“你和我都知道南北战争时期参谋长的名声，可是军界以外的美国人却很少知道。”他接着好象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可是任意改组一个正在打胜仗的班子是会引起危险的。”我没有回答什么，只是说，只要政府需要，不论到什么地方，我一定尽力而为。

第二天，总统一行前往开罗，临行时，亲自吩咐我两、三天之内去开罗参加会议。除了生病的亚历山大外，我的主要司令官都随同我一起赴开罗，申述我们对地中海战区兵力的意见。

我总是利用这类旅行的机会，给我的下属一个休息时间。在我离开司令部期间，这些人一般都没有什么事干，因此在我的座机容纳得下的情况下，我邀请一些人跟我一起去作这次旅行。他们听说将去远地旅行，都极为高兴，因为他们当中大约有四至六人能指望得到一次休假，到陌生的地方去观赏景色。军官、士兵和陆军妇女队队员取得了许多受之无愧的、但用别的方法得不到的机会。

英国小组和美国小组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分歧，我和我的幕僚们在开罗会议上都看出了这点。英方仍然主张积极地和尽快地进行地中海区战役，甚至必要时不惜再次推迟“霸王”计划的实施；美方则拒绝削减次年夏初发动渡峡进攻的兵力。美方坚决主张，审查所有地中海区作战方案的出发点，必须是看这些方案对1944年渡峡进攻有无帮助；而英方则认为，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于意大利战役，或许会导致意料不到的突破，从而使海峡之战成为不必要，或者降低为一场扫荡战。

首相和他的几个主要军事顾问，对于“霸王”计划仍然是不加掩饰地表示疑虑；他们的态度似乎是这样：只要把空、陆、海三军一切能用的人力和物力全投入地中海区，就能够避免隐藏在一次新的两栖战中的多余的严重危险。他们认为，只要推动意大利战役，攻入南斯拉夫，拿下克里特、多德卡尼斯和希腊，就能给德国人以沉重的打击，而用不着再去冒全力进攻欧洲西北部时要遇到的那种公认的风险了。我的参谋部，包括其中的英国成员，还有我自己，都继续支持一年半以前达成的协议，这就是只有在渡峡攻击战中，我们的兵力才能充分集中，才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

后来，诺曼底登陆获得成功，没有遭到意外的损失，所以很容易忽视在这项计划中所包含的真正风险和危险。如果我们在那里遭到惨败，那些当时批评这项计划的人——有些人还抱着等着瞧的态度——后来一定会大声谴责另外一些坚持计划有效的人。反对者所害怕的是，唯恐这项计划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覆辙。英国人对于帕斯舍德尔和维米岭的事件记忆犹新。我们都不愿重复这些经验。而且，1942年夏对第厄普的袭击说明，攻取滩头本身并不容易。那次袭击是由一支强大的加拿大部队进行的，结果伤亡率很高。从那次战斗我们得到许多教训，并在日后应用了这些教益，但加拿大人付出的代价仍然令人痛心。

许多人——其中有一些是美国人——想到这些过去的经验，就倾向于认为避免渡峡的危险是明智的，而且主张盟军全力推进意大利战役和地中海区的其他战役。

不过我从未听到过丘吉尔先生关于完全取消“霸王”计划的主张和建议，根据我的判断，他坚信在将来某个时候盟军必定会渡过英吉利海峡。但是看来，他认为我们应在别处发动攻势，直到有一天敌人被迫将其大部分部队从欧洲西北部撤走，那时盟军可以轻易而安全地渡过海峡。

盟军司令部参谋部向开罗会议提出的观点是，在意大利战役中预定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这就是夺取了包括福贾机场在内的战线和满足后勤需要的那不勒斯港口。我们一致认为，如果地中海区盟军能够立即向波河流域推进，并在那里集结，他们就能向北欧战役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持。盟军还能从波河流域出发，经过里维拉的山路以雷霆万钧之势进入法国。他们还能以同样的声势向东北的的里雅斯特和卢布尔雅那山峡推进，从而进入奥地利，同时还能选择最短的水路，或对法国南部，或渡过亚得里亚海，随时发动

一场两栖进攻。但是我们认为，在1943至1944年冬向波河进军一事，只有在立即停止从地中海区向英国输送部队，并且集结起最大兵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我们认为，根据当时可调用的部队，在夏季气候使得空、陆、海作战再次成为可能之前，没有抵达波河流域的希望。

这意味着在地中海区必须采取一种更谨慎的方针，因为要保证夺取波河流域，必须停止向联合王国运送大量的部队和重要装备，以致使渡峡之战的计划不能在1944年春实施。

和以往一样，当时我的意见仍然是：除了对渡峡进攻有直接帮助的行动外，不应当再在地中海区作战，而且我们向英国调运军队的计划，应当尽快地进行。很明显，在地中海区必须保留一支足够的兵力，以保卫我们取得的成果，并迫使纳粹把庞大的兵力留在这个地区。

这就是开罗会议采纳的方案，因此我们把部队和装备毫不减少地继续运往英国。不过，这次会议——特别是首相——向我们强调了攻占罗马的心理价值。

在会议期间，我又得到机会和总统进行了几次私下会晤，在一次会晤中，总统非正式地授与我一枚军功勋章。他谈得较多的是战后问题，而不是当前的军事行动问题。他告诉我他对战后占领德国的看法，并耐心地倾听我的意见：一旦战争时期的紧急情况容许，政府中的民政机构应立刻负责占领区的工作。在谈到国内政策时，他只是说，虽然他差不多要退休了，但看来还必须参加竞选。

一个傍晚，马歇尔将军邀请我和其他一些人进餐。这是一顿丰盛的美国晚餐，有火鸡以及其他精美的食品。客人们离去时，有人对马歇尔将军说：“谢谢您这顿精美的感恩节晚餐。”我很吃惊地回转身去说：“哎呀！战争对人的影响多大。我一点也不知道今天

是感恩节。”

开罗之行中有一件使我很愉快的事，这就是参谋长命令我休息和游逛两天。我利用这两天时间匆匆访问了卢克索尔，这里是古埃及的底比斯城遗址，还用几个小时访问了耶路撒冷和伯利恒。这是我首次来这些地方观光，我在专心致志地瞻仰这些古文化遗址时，一时忘却了经常萦萦于怀的军事问题，在战争期间，还没有其他任何事物使我的精神达到这样的境界。

## 第十二章

### 意大利

总统和他的智囊团从开罗前往德黑兰，我仍回到自己的战区。前沿司令部那时正迁往那不勒斯附近的城堡卡塞塔，还计划进一步迅速地把整个总司令部迁到这里，我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变动。通过这次迁移，我可以更接近作战现场。再者，我们在非洲的事务已不再那么重要，因为我们对非洲港口的需要不断减少，运输船只能够直接从本国驶往已占领的意大利港口。迁移的另一原因是可以把指挥及后勤系统牢靠地集中在战线附近。最后，如果司令部的成员象在阿尔及尔那样舒服地“定居下去”，那么将它移动一下总是件好事，因为指挥作战的参谋人员过多地关心生活的方便，就会逐渐脱离军队，不过问实际的战争问题。

我沿着整个前线作了一次临时视察，这使我再次确信我们的下述看法是正确的：冬天在意大利作战将会遇到极大的艰难，特别是在作战中得不到我们的宝贵财富——占压倒优势的空中力量——的不断支持时。我觉得要维持士气，就需要认真控制军事行动，还需要所有指挥官作出最大努力。当然，我打算就近予以协助。

大约在这时候，我们开始收到一种新式装备，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它是“坦克推土机”。每当德军放弃哪怕是一呎土地时，他们肯定要把简陋道路上的每一条阴沟和每一座桥梁全部炸毁，同样也要把从陡削山腰上开出来的每一条台阶道破坏。要

把它们恢复到略可使用的程度，我们必需使用常用的推土机。为了能够运给部队必要的给养和撤退伤员，推土机须在我们的火线上工作，有时甚至要赶在前面。

敌人用隐蔽的机枪和长射程的小口径武器对付它，这些武器从上千码远的安全地带击中操作人员，并经常击毁机器本身。国内战线上的一些富有想象力的聪明人，听到这一困难后，便简单地将许多谢尔曼坦克改装成推土机，这样困难就解决了。这种坦克，各种小型武器都射不穿；除了大口径炮的炮弹和大型地雷外，别的武器都不能毁坏它。从那时以后，我们在前线的工程兵分遣队开始感到一定程度的安全，从而使他们实际上愿意去执行这种冒险性的工作。我们之中谁都不能确定谁是负责改进这种装备的人，但如果他在场，就一定会在欢呼声中接受我们所能授与他的一切勋章。

指挥一场支援性的或辅助性的战役，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可能少付代价。既然它的目的是诱使敌人分散兵力，所以这种战役要取得好的结果，就必须迫使敌人相对地付出大于我们的物资损耗。但是，很明显，在辅助性战役的威胁下，必须有某种值得敌人重视的因素，因此，我们的兵力必须强大到足以维持这种威胁。要是缺乏上述两个条件，敌人就会对我们的整个活动置之不理。

我们有好些理由断定敌人对我们的威胁将有所反应，并将竭尽全力来维持他们自己。“征服者的心理变态”势必迫使他们这样做；正如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这种心理变态还诱使他们不断把士兵和军火投入突尼斯一样。他们在西西里也是这样干的，只是规模较小罢了。何况罗马具有极其巨大的心理价值，意大利北部的工业资源在经济上对德国人也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已经掌握了制海权，我们的运输稳妥地依靠着那不勒斯，所以，在意大利南部和中部进行积极主动的战斗，对我们说来，要



比敌人容易得多,因为敌人必须在漫长的、曲折的和无掩护的交通线上穿过阿尔卑斯山才能运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物资。我们的问题已变成了强制作战的问题,但必须节约和慎重,以避免把能用于“霸王”行动的部队和物资作不必要的转移。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方针:既要避免失败,不作代价昂贵的进攻和不大量消耗供应,但又要使敌人不安,尤其不让敌人把驻在意大利的兵力转运去加强他们在欧洲西北部的阵地。

我们认真计划了一些保证每次都能成功的小规模进攻,它们构成了我预期在冬季实施的战役;这个战役是按照维持士气的方针和需要进行的,因为意大利山区不可避免的恶劣条件会影响部队的士气。

随着秋季的到来,我们已受到恶劣天气的袭击。美国兵在谈吐中常常提到的带讽刺的厌恶词句是:“阳光灿烂的意大利”。这里的铁路被破坏,桥梁被摧毁,公路的许多部分被炸得支离破碎,所以即使没有敌人的抵抗,进军也是够困难的。这个国家是进行防御战的理想地区。河流纵横交错,切断了进军的路线。有些河流曲折迂回,必须渡过好几次。

第三十四师前进的路线要三次渡过沃耳土诺河。一个晚上,副师长卡菲准将和他的吉普车司机一起从前线回来,司机说他简直不能理解这样一个“七沟八岔的”国家。卡菲问他为什么那样看待意大利。他回答得很高明,他说:“我看,这个七沟八岔的国家中每一条该死的河都叫沃耳土诺。”

德国人在各山口上都构筑了从正面几乎难以攻破的防御工事。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受到了最大限度的考验。攻下卡米诺山不久,我被领到一个地点,在那里一个人数很少的分遣队,为了从侧翼包围一个据点,作了精彩的爬山表演。其中数人靠绳索之助爬上

了很高的陡壁。我永远没有弄明白，他们有装备之累，怎么能够爬上去。总之我认为，任何一个爬登高山的人在试图攀登此山之前都要迟疑地打量一下这个地点。然而分遣队登上了山顶，侦察出了德军的连部所在地。他们进入连部，俘获了连长，他惊呼：“你们到不了这里。你们不可能爬上那些岩石。”

美国第五集团军和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前线都有困难，美军前线多山。蒙哥马利的前线，晚秋季节的主要困难是河流、泥沼和敌人。尽管如此，整个战线仍在缓慢而稳步地向前推进。

1943年11月15日，第五集团军由以下部队所组成：美国第三、第三十四和第四十五三个步兵师，以及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一装甲师，另外还有英国的第四十六、第五十六两个步兵师和第七装甲师。但第一装甲师尚未全部调到意大利，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七装甲师即将撤回英国。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共有六个师，即第五师、第七十八师、加拿大第一师、印度第八师、新西兰第二师和第一空降师。

在秋天，我们安排把朱安将军率领的法国军从北非转移到意大利战场。为了提供更多的兵力以进行我认为对以后西北欧之战大有帮助的战役，我向华盛顿建议，如果力所能及，立刻给美军补充两个或三个新师。

1943年12月2日，巴里港口发生了一起令人最为懊丧和烦恼的事件。我们一直在利用那个港口支援第八集团军和正在意大利迅速集结的空军。那里经常停满了船只，港口本身又和敌人在狭窄的亚得里亚海彼岸的几处空军基地近得令人不安。

一个夜晚，港口遭到袭击，我们受到了盟军在地中海和欧洲作战的整个时期中因敌人空袭造成的唯一的一次最大损失。我们损失了十六艘船只，其中有些船只装载着极为贵重的物资。一艘油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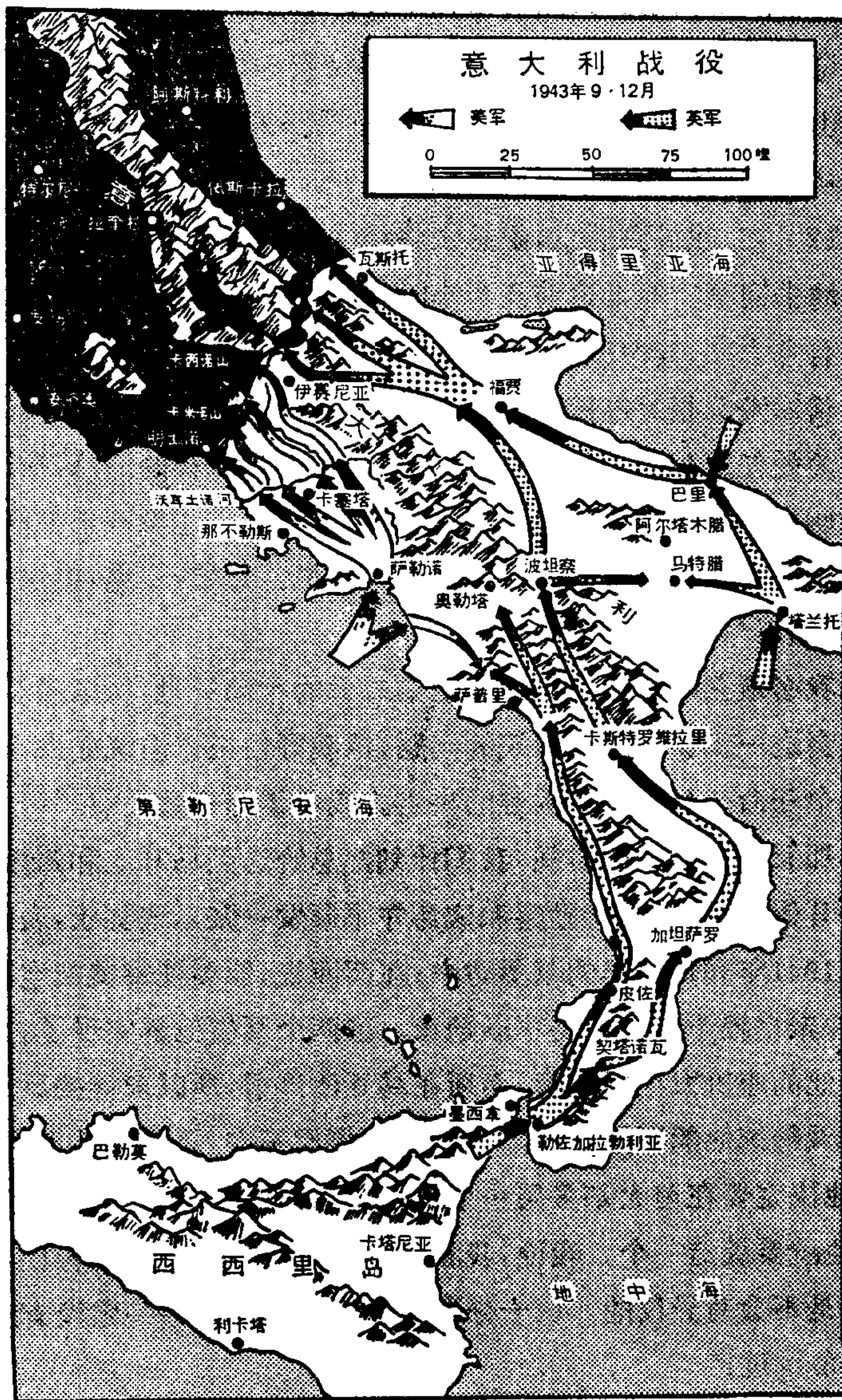
被击中，受到最严重的破坏，流出的石油引起邻近很多船只着火。和这件事有关的一个情况本来有可能产生最不幸的恶果。有一艘船载着大量芥子毒气，因为不知道德国人是否有使用这种武器的意图，所以我们不得不总是带着它。幸好风是朝着海面吹的，漏出的毒气没有造成伤亡。要是风从相反的方向刮来，其结果将不堪设想。我们生产和运载这种东西，虽然只是为了准备在敌人突然施放毒气时作报复之用，但也确实很难解释。

这次不幸事件的一个结果是，海、陆、空三军建立了有很大改善的防空情报和指挥机构。这也是敌人空军在地中海区对我指挥的部队的最后一次严重打击。

和这件事有关的一个插曲清楚地表明，战争始终是在可能和推测的领域中、而不是在必然的领域中进行的。它决不会让你十分肯定未来的情况！巴里遭到袭击的前一天下午，指挥英国空军以支援第八集团军的阿瑟·康宁汉空军中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估计，德国空军已被彻底击败，几乎已从当前战场上消失，无力再参与战斗。他直截了当地向与会记者宣称：“要是德国空军能在这个地方采取任何大的行动，我认为那是我个人的奇耻大辱。”第二天早上他必定是狼狈不堪。因为他的新闻界朋友丝毫没有容许他忘记前一天所作的那个随意的和不加考虑的声明。

到圣诞节那天，我最后一次视察了我们在意大利的军队。我们的前线大体上推进到沿奥尔托那一阿列里—奥尔索那一索格罗、佩西阿和哥里格连诺等河以东的地带。旷日持久和损失惨重的卡西诺山战役，是在我离开这个战区以后进行的。

最高司令部把一个军事行动定为“辅助战役”，这对前线士兵说来，并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决不意味着会减轻他们的困难。天下着大雨，河流经常泛滥。天气日益寒冷。人和车



[按原图译制]

辆都陷进泥沼。但激烈的战斗却在继续进行。敌人的炮台往往构筑在坚硬的岩石里，控制着每一条道路；要夺取每一呎土地，都必须在山坡上进行疲劳的战斗。只有通过爆破和挖掘才能把敌人的炮手从他们的掩体中暴露出来。

12月初，我得到消息，说总统将经过我们战区回国。我赶到突尼斯城去迎接。他抵达前几个小时，我收到马歇尔将军一份电报，内容有点含糊，其中谈到有关我即将就任新职的一些行政事项。马歇尔将军发电报时显然以为我已经通过参谋部的渠道，明确知道了有关就任新职的消息。但实际上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所以不能确切地推断他的意思。总统于午后抵达，几乎还没有坐上汽车，他就用一句简短的话澄清了这件事。他说：“好啦，艾克，你快要去指挥‘霸王’行动了！”

我必须立即与他详细讨论他第二天的行动计划，所以当时没有机会进一步谈论就任新职的问题，但我顺便说：“总统先生，我知道这个任命牵涉到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希望您不致失望。”

那天下午剩余的时间，我们计划把总统送到马耳他和西西里。在马耳他，他要给戈特勋爵和该岛守军颁发一张总统奖状，表彰他们在1941年和1942年的英勇防守；在西西里，他要视察美国空军基地，并亲自授予克拉克将军以勋章。这两个愿望他都实现了，但是由于他的座机发生了故障，必须在马耳他停留，所以未能按原计划在当天继续他的回国行程。特工人员焦虑不安，总统却私下告诉我，他决定要在迦太基多呆一个夜晚，要是提不出逗留的合法理由，他就要编造一个。我说，我相信美国总统在确定他的行程事宜方面是不会有异议的。他十分郑重地回答：“你过去一定没有和特工处争论过！”

总统在他访问期间，几次谈到把我紧急调往伦敦的有关事情。

他说,他任命我指挥“霸王”行动的意见和马歇尔将军完全一致,因为任命司令官一事,时间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他还说,他原来打算把这个指挥权交给马歇尔将军,这是注意到高级军官能够适当地轮流分挑参谋和指挥职责的重担,并分享其荣誉。但经过考虑,他决定不让马歇尔离开华盛顿,尤其不能离开他在联合参谋长会议中的职位。总统说,正是因为马歇尔坐镇联合参谋长会议,这才始终使他对该机构的决定产生极大的信任。他补充说,英国人虽然乐于接受马歇尔当“霸王”行动的司令官,但事实是,总统的所有助手都表示喜欢现在的这个决定。

总统有两件十分关心的事在我看来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但他和哈里·霍普金斯先生都认为意义重大。第一件事是宣布的时间问题。最后决定总统将在华盛顿宣布;但在此期间对我的调任要严加保密。第二件事是关于我作为“霸王”行动司令官的头衔问题。他在谈话中随便提到了“最高”这个词,但当时没有作出决定。他仅说他必须想出一个名称,以表示盟军采取这个新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性。

总统离去后几天,我接到马歇尔将军的一张便条,它迄今仍然是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珍贵的纪念品之一。便条内容如下:

总统致斯大林元帅

已经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

罗斯福

开罗,1943年12月7日

亲爱的艾森豪威尔,我想你也许乐意把这个便条当作一件纪念物。这个便条是我在昨天最后一次会晤结束时十分匆忙地写成的,总统随即签了字。

乔·卡·马歇尔

From the President to Marshal Staleis

of The <sup>immediate</sup> appointment of General  
Eisenhower to command of  
Overlord operation has been  
decided upon.

Roosevelt

Cairo, Dec. 7. 43

Dear Eisenhower, I thought you  
might like to have this as a memento  
It was written very hurriedly by me as the  
final meeting broke up yesterday, the  
President signing it immediately.  
W.E.W.

对我来说,这一非正式纪念物的真正价值在于马歇尔的附笔。在1943年秋已经流传着流言蜚语,说什么马歇尔和我在进行私斗,争夺的目标是“霸王”行动的指挥权。我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希望留在战场上,不愿回华盛顿任职。然而无论是我,还是马歇尔将军,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都从未堕落到争夺名誉地位的地步。我从来没有,并且我知道他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我们个人冀求

某一特殊任命。就个人而言，我宁愿留任地中海战区司令官。

马歇尔能想到送给我一个他知道我会珍视的纪念品，这肯定不是一个因谋求“职位”失败而不满的敌人的行动。我没有直接和他讨论过这件事，但我始终认为，让我指挥“霸王”行动，这正是他的决定，而不是其他人的主意。自从战争爆发之初我第一次会见马歇尔将军以来，我就对他怀有极端的忠诚和尊敬，而且我已告诉总统，我确信只有马歇尔指挥“霸王”行动，才更能获得夺取胜利的希望。那时我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如果他在战场上指挥战斗，也会象在华盛顿处理复杂工作一样出色。

选择我担任这一关键职务自然是对我的极大尊重和信任，这点我很明白，也非常感激。不过在战争中，当一个军事司令官调动职位时，情绪上总有所波动。由于工作的性质，他已与身边的朋友和助手们相处得亲密无间，也已与许多复杂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一旦为指挥另一军事行动而再次面临建立部队、组织参谋部和制订计划等问题时，几乎会感到怨恨。此外，我们当时正处于激战之中，而我和我带去的人却要一连好几个月离开直接的和激烈的战斗现场，到另外一个环境中去进行研究、调查和计划等工作。

1943年圣诞节存在于地中海战区的指挥机构，是一系列变化过程的结果；它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42年夏秋在伦敦的那些纷扰的日子。

1942年11月，我们带着英、美两国在非洲将分别使用各自军队的先入之见进入这个地区。指挥机构是为适应这个预测的情况设计的。当我们发现军事的要求和那些预测完全不同时，就不得不开始改组指挥机构和参谋机构。这个教训是很清楚的，即在进行新的军事行动时，务必避免在战斗中对指挥机构作重大改变，而应采



用一种基本上健全的、有伸缩性的和能够应付任何可能的战斗形势的组织。

我们在地中海的经验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即统一、协调和合作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战争虽在陆、空、海三个方面进行，但这三个方面却不是彼此分离的。如果这三个方面的力量不能有效地结合和采用协同行动以打击一个经过适当选择的共同目标，它们的最大潜力就不能得到发挥。有些自然目标虽然可以被一块大陆和一个海洋分隔开来，但是只要最大程度地实行联合作战计划，就一定能够摧毁它们。这就是协作的意义。

我不仅需要懂得这个真理的司令官，而且还需要那些懂得士气的重要性、并且表明有能力发扬士气和维持士气的人。在胜利战争中，士气是唯一最主要的因素。在其他基本因素方面——诸如领导能力、纪律、技术、人数、装备、机动性、给养和保养，经得起与敌人进行对比，乃是士气存在的先决条件。在战争胜利情况下，士气最容易产生；但在一个优秀司令官的领导下，即使处在长久的困难时期，也仍能维持军队的士气。成功的司令官用来提高士气的方法极不相同，很难总结成一些规律。但有一种情况始终是适用的，即任何一次长期的和艰苦的战役都将挫伤士气，除非所有的士兵完全相信他们的司令官首先和始终关心的是作战士兵的安全。人的谅解精神以及在平等基础上与所有的人融洽相处的天生才能，比任何特殊技能都更为重要。

我对泰德空军上将在“霸王”行动中担任我的副手一事感到很高兴。他在地中海战区受到了他的所有同事的尊敬和钦佩，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飞行员，而且也因为他是这个战区实行“联合”原则的坚定支持者。我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也被批准与我一起赴任，没有他的协助，要组织一个指挥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的参

谋部将是困难的。最初我知道，亚历山大将军或蒙哥马利将军本来都有可能在新的军事行动中指挥英军。那时我表示要亚历山大，主要是因为我和他交往密切，而且几年以来对他产生了崇敬和友谊。我认为亚历山大在制订战略方面是英国的一位卓越的军人。他还是一个友好的、容易相处的人物；美国人从内心喜欢他。

首相最后决定，亚历山大不能从意大利的军事行动中调走；意大利战役对我们来年夏季的军事行动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首相仍然希望这里的战役能取得近乎决定性的结果。因此派蒙哥马利指挥新军事行动中的英国军队，我对这个选择是满意的。蒙哥马利有两个优于别人的最重要特点。他在英国军人中迅速赢得了热诚的信仰和崇拜，这是一个司令官所能拥有的最大的个人资本。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实施所谓“有准备的”战斗中，他有战术才能。在研究敌人的阵地和情况方面，在组织他自己的装甲部队、炮兵、空军和步兵联合对敌以争取战斗胜利方面，他是认真的、谨慎的和有把握的。

我特别高兴的是得到了海军总司令拉姆齐海军上将的协助。海军上将坎宁安几个星期前离开我们就任海军大臣。拉姆齐海军上将是一位最胜任的司令官，他勇敢机智，精力充沛。此外，我们全都知道，他乐于助人，好交朋友，尽管我们在私下有时嘲笑他，说他在小心翼翼地按照英国传统和习惯维护着英国海军的“元老”地位。

圣诞节前夕，我们收听了广播，因为听说罗斯福总统要发表重要演说。他在演说中首次公开宣布将我调去指挥“霸王”行动，同时宣布了我新任职务的官衔，即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这个官衔听起来很有气派，以致使我的海军副官布彻海军中校感到振奋，他说他在下周或以后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就是设计一种印有我这

个崇高官衔的正式信纸。

在地中海战区的后期,我进行过一些很有重大意义的活动,这发生在1943年圣诞节。那天,我刚完成对意大利前线的另一次视察,然后前往突尼斯会见首相。和他在一起的有新任地中海战区的总司令亨利·威尔逊陆军上将以及亚历山大将军和许多参谋军官。讨论的问题是打算向安齐奥实行一次两栖进攻。这个军事行动不能在我离职后的1月份以前实行,所以我自己对这问题的论断并不是决定性的。尽管如此,这个军事行动仍然与我有关,因为发动这次进攻将要求推迟原定把部分登陆艇运往英国的时间。因此就要征求我对这个方案的同意。

很明显,按照当时意大利的情况,要在半岛上稳步推进,就需要从海上连续实行侧翼包围,最好是在两侧进行。对山区防线的敌人予以正面攻击,速度将是很慢的,而且要付出极高的代价。这里要决定的现实问题是:究竟是给意大利军事行动调配足以保持其攻势的资源最能符合盟国总的利益,还是相反地,我们应当满足于在山区发动一些只限于某些目标的、但能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有充分准备的小规模进攻。要从两侧实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当时不可能立即提供足够数量的部队和登陆艇,并且在意大利的西侧实行这样的军事行动,比之东侧更为可行,因为西侧以后容易取得支援。

我同意继续向前推进这个总的愿望,但是我指出,用两个残缺不全的师在远离当时前线数百哩的安齐奥登陆,不仅是一件危险的事,而且这一进攻本身也不能迫使德军前线后移。兵法和下棋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把两者作过于不适当的类比就有危险。棋盘上受威胁的国王必须受到保护;而在战争中他可能反而选择战斗!纳粹并没有仅仅因为后方受到威胁立即从非洲和西西里撤退。正

好相反，它增援军队，一直把战斗进行到底。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主要目的当然是诱使敌人加强它驻意大利的部队，但同样重要的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付出的代价应当尽量减少。正是从减少代价的观点出发，我极力主张认真考虑这一整个方案。我争论说，在安齐奥必须有一支由几个强大的师组成的兵力，才能取得重大成果。我还指出，由于距离远，迅速增强向安齐奥进攻的兵力是困难的，而且需用登陆艇的时间也会大大超过预定调走它们的日期。

尽管如此，首相还是决定实行这个拟议中的军事行动。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不但肯定这次突击将取得巨大而迅速的胜利，而且还保证只要有二个师在滩头上站住脚，就尽快地调走登陆艇。尽管我对可能发生的后果一再提出过警告，我还是接受了他们关于调走这批在英国急需的登陆艇的日期的坚决保证，并且同意向美国参谋部提议让这些装备在地中海多留两个星期。

结果安齐奥战役打得很漂亮，但这个战役初期阶段的发展不出我的司令部的预料。此外，预定运往联合王国的登陆艇还必须在地中海使用很长一段时间，以迅速增援在安齐奥受到严重压力的部队。幸好这种情况对“霸王”行动没有损害。但在取得实际的战果前，安齐奥的兵力必须增添到六个师以上，还必须在不利条件下鏖战四个月左右。另一方面，这一军事行动无疑使希特勒以为我们打算把意大利战役发展为一场大战，于是他给意大利的驻军增加了八个师。这对其他地方的盟军甚为有利。

在行将调赴伦敦时，我发现自己陷进了地中海战区的一大堆琐碎的结尾工作之中。我不能不对安齐奥方案感到不安，并且当我获悉我的打算把整个盟军司令部集中于卡塞塔的计划将被放弃时，内心也很烦恼。在我看来，这个决定好象是不了解情况，不了解这个战场的最高司令官的职责；一个战场的最高司令官不管有多

少重大问题缠身,他必须永不失去与他的部队“感情上”的联系。他能够并且也应该把执行战术的职责委派给部下,避免干预他所挑选的部下的职权,但他必须在事实上和思想上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否则,在一次大规模的关键性战役中,他会遭到失败。这种联系需要经常到军队中去访问。一个盟军司令官常常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访问其他国籍的军队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一种令人过意不去的礼节,但他在访问本国军队时,就能够而且应该免去这种礼节。

移交战斗指挥权是一件简单的事。大部分参谋人员和主要属员仍留在地中海战区。他们和曾在地中海东部执行过任务的新任英军司令官威尔逊将军一样,熟悉各种计划和资源。他和首相都出席了圣诞节那天在突尼斯城召开的会议,在这次会上,我们对军事情况的每一个因素都详尽地进行了检查。墨菲先生和麦克米伦先生仍然留在他们的行政岗位上协助威尔逊将军。因此,尽管他不熟悉主要的法国官员以及美国政府武装法军的计划,我也不担心这些问题会使他作难。

但是在行政工作方面尚有很多事要做。我除了负盟军的责任外,当然也是这个战区的美军司令官。管理这支队伍,解决他们的供应、维修、替换、升级、降级以及和陆军部的大量联系等这类没完没了的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工作,有时只能由我亲自处理。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选择一个美国军官,从现在起作威尔逊将军的副手,并担负起管理地中海战区美军的行政职责。

这就引起了在两个战区补充美军高级职位的问题。马歇尔将军和我当然都想在每个职位上安插一个人,我们认为,这两个人的专业才能能够最有利于战争的进行。

对于这两个战区美军司令官的最可能的人选,我当时有过一

些想法，这可见于1943年12月23日我发给马歇尔将军的电报：

在“霸王”行动初期，我认为没有必要任命英国集团军群司令和美国集团军群司令。事实上任何这类职位都会损害陆军地面部队和空军之间的基本协作。当集团军群司令成为必要时，我便非常希望任命一个在这场战争中有战斗经验的军官。如果在“霸王”行动中作战的美军超过一个集团军，那么我推荐布莱德雷将军为美国集团军群司令。他手下的一个集团军司令可能是巴顿；另外一个，也许从“霸王”行动中产生，也许从霍奇斯、辛普森等人中挑选，问题是他们之中不论哪位军官担任，都应能及早来到联合王国，随同布莱德雷参加初期的战斗。

照我的看法，布莱德雷应担任美国突击集团军的司令，必要时任集团军群司令。

我曾向华盛顿送去一封给您的长信，概略地叙述了我对这里和对“霸王”行动中美军指挥职位的意见。我希望您抵达华盛顿时将看到它，这里我将它略述一遍，供您即刻参考。在地中海这个战区，美军司令官应是德弗斯，让克拉克在适当时候脱身，全力负责“铁砧”行动。

我对布莱德雷的良好印象，始自西点军校时期，而在地中海战区共事的几个月中，这种印象与日俱增。他应我之请于1943年2月来到非洲，以准将的名义协助我完成一个我们称之为“眼和耳”的任务。我们委派他并期望他在美军的地区内随时随地进行视察，向我报告他认为值得我注意的事项。他特别适合干这类内情差事，这不仅因为我们有着长期的友谊，而且因为他有能力，还因为他以一个可靠的、苦干的和受过广泛训练的军人而闻名。他到非洲后不久，就任当时在特贝萨作战的美国第二军的副军长。他在1943年4月16日升任该军军长，显示了真正的领导才能。他对部下及其才干有敏锐的鉴别力，对待他们也绝对公正合理。除此之外，他意志坚定，把握得住重大问题，这清楚表明他适合于担任高级职务。我希望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军事行动中我们能重新密切合作。

我预感到提升布莱德雷为“霸王”行动的美国地面部队最高司令官，可能会遇到一些磨擦，因为我还打算在这次作战中使用巴顿，要是他同意这个新的安排，那就使他们两人在胜利的西西里战役中担任的职位来个颠倒。他们都是我多年的亲密朋友，我也知道他们都会诚实地接受分配的任何职务。但是我希望巴顿——在某些方面说，他是我们国家造就的一位杰出军人——全心全意地支持我考虑的这项计划。我和他坦率地谈过一次，满意地看到，他完全同意接受最适合他本人的这个职务——集团军司令。那时他不要更高的职位。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军事行动中能用上这两个能干和有经验的军官，我预料在同一机构中就不那么迫切需要雅格布·德弗斯中将了，当时他在联合王国指挥美国部队。他被誉为一个很优秀的行政长官。这种才干在非洲将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他缺乏作战经验，但这并不要紧，因为意大利的美军战术行动将由指挥美国第五集团军的克拉克将军负责。陆军部同意了这些意见，德弗斯被调往地中海战区担任美军高级将领。

我还希望把斯巴兹将军带到英国。按照在开罗达成的协议，驻地中海战区和驻英国的美国战略轰炸机将合并起来归斯巴兹一人指挥作战，这一情况使他更有必要到联合王国去进行即将开始的主力战。结果作了这样的安排：把艾拉·埃克中将从联合王国调往地中海战区任空军总司令。在联合王国，杜立德将军继埃克任美国第八航空队司令。

正当我在办理这些事情，同时指望在1月10日动身前往英国时，我接到马歇尔将军的一封圣诞节电报。他催我马上到华盛顿和他以及总统作短期会晤，并在开始就任新职之前略事休息。我表示反对，因为时间是重要的；此外，我在伦敦至少要有足够的时间亲自了解一下那里的一些问题的实质，否则我去华盛顿做不了什

么事。马歇尔将军不同意。他劝我容许别人指挥二十分钟战争，仍要我去华盛顿。严格地说，我的上级虽是联合参谋长会议，但感到马歇尔将军的诚挚邀请，我就很快和英方办清了住房的问题，准备前往美国。我计划一周后返回非洲作短期逗留，以便完成把美军指挥权移交给德弗斯将军的事项，他在我去美国之前，尚未从伦敦启程来到非洲。所有这些都要花费时间，而时间又是最宝贵的因素。

在我抵达伦敦以前，为了向位于该地的参谋部提供指导，我觉得有必要先派一个了解我总的意图的人到那里。幸好蒙哥马利将军可以立即到英国去。他来到我的司令部举行会谈，我告诉他说，几个星期前，我看见一份关于拟议中的渡峡攻击战的提纲，它是由美军的威廉·钱伯斯准将送到我的办公室的。我对这项战术计划是否妥善表示怀疑，因为它设想在一条相当狭窄的、只能容纳三个师兵力的前线发动两栖进攻，而在攻击时海面总共只有五个师。我还告诉蒙哥马利，除了这个拟议中的攻击的范围狭小使我不安外，我发现这个提纲实际上未提出迅速攻占瑟堡的方法，这也使我感到担心。我认为，这项计划没有充分强调在渡峡之战初期对于大港口和迅速集结兵力的需要，除非在我看过后作了修改。

因此我指示蒙哥马利，在我到伦敦以前，他代表我分析和修正这项突击滩头的初步计划，特别要他注意我感到不安的几点。我告诉他，即使我在华盛顿，他也可以迅速而容易地与我联系。我把这些看法也告诉了我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他将在其继任者熟悉了地中海战区司令部中复杂的参谋工作的性质之后，立即前往伦敦。

当我正在意大利和阿尔及尔处理这些事务时，首相在突尼斯城得了重病。到年底他已充分恢复健康，并遵照医嘱，前往摩洛哥



的马拉喀什休养几个星期。他发给我一份急电，邀请我在返美途中与他会晤。12月31日下午，我在那里会见了他。

这时已明确决定实行安齐奥军事行动，首相象往常一样生气勃勃，不顾对健康的严重威胁，积极地致力于寻找每一种可能的方法来加强兵力以尽早地发动这一进攻。他希望这次军事行动很快以征服意大利而告结束，不过我对这样一个乐观的结果一直表示怀疑。首相私下请求我允许把史密斯将军继续留在地中海战区担任参谋长，对这点我不能同意。司令官和他的参谋长之间的关系是很特殊的。这种关系因每个司令官而不同。史密斯将军完全使我满意，所以我认为在冒这次最大的战争风险的前夕中断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不明智的。此外，我觉得威尔逊将军对他的地中海战区班子中的这样一个重要成员有他自己的看法，如果有人从外部强迫他，哪怕此人是他本国政府的首脑，他也会大发脾气。首相的病显然未愈，甚为衰弱，不过他对安齐奥行动极感兴趣，以致使我们的会晤一直延续到晚上。

我们在元旦那天早上4时45分离开马拉喀什，次日凌晨1时抵达华盛顿。旅途没有发生意外，只是在飞越亚速尔群岛中一个岛屿的边缘时，一门神经过敏的葡萄牙高射炮向着我们发射了几枚不起作用的炮弹。

抵达美国后，我先访问了陆军部参谋部，以后又会见了总统。罗斯福先生偶患流感，但看来很愉快，他让我在他床边坐了一个多小时，我们讨论了有关过去战役和未来战役的许多细节。他的世界地理知识甚为渊博，我对此一直感到很惊奇。那些遥远国家的最偏僻地方，总是准确地标记在他内心的地图上。他抓住机会扼要地讲述了他对战后占领德国的计划。他明确地希望把西北部作为美国占领区，但他也认真地倾听了我的意见，我反对把德国分为

“各国占领区”。我承认实行真正的共同占领是有种种困难的，但是我说，我们应当坚决主张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案。此外，它还可以迅速检验真正的“四方行动”的可能性。我还极力主张，占领区应尽快移交给民政机构。他似乎有所触动，但没有表态。

我和总统谈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对国内政治基本上没有提及。他的儿子埃利奥特——我在非洲和英国都见过他——也避免把政治作为话题，只是偶然用一种滑稽的腔调说，他本人是“败家子，家庭的叛逆”。

我离开总统时说：“我衷心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他很快回答：“哦！多年来一直未见好。我卧床休息，只是因为医生担心我早日下床会引起旧病复发。”以后，我再也未见到他。

在美国短暂逗留期间，我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和我的妻子去西点军校看望儿子。后来我又匆匆忙忙看了我的母亲和弟兄、我妻子的双亲以及我们家庭的其他一些成员；我们大家在堪萨斯州的曼哈顿城作了一次临时聚会。家人团聚是一种愉快的事——直到那时我才完全体会到这点，可是战争把它的参加者和正常生活中的利益、目的和事务分隔得多么远啊！

我是临时摆脱战争急务的，当然还有事情需要办理。从伦敦定期拍来的电报，经常提出一些最严重的问题，有时在我对一个问题各种因素尚不摸底以前，就要求我作出最后决定。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蒙哥马利的确正在制订一项计划，按此计划，将建立一条五个师的突击前线，另外，在海上部署两个追击师；这个消息使我在抵达联合王国前就不太担心了。

在这同时，英国政府对地中海战区的指挥情况感到有些不安。只要我在名义上是那个战区所有部队的司令官，安齐奥进攻战的准备工作就不能决定下来，因为这次进攻将在我和地中海战区的

关系中中止后实行。我知道,有些要负最后责任的人在作决定方面还有点犹豫不决,因为我的任命尚未正式决定。因此,我立即放弃重返非洲的计划,建议马歇尔将军马上采取行动,结束我和那个战区的联系,并把地中海战区的一切权力交给威尔逊将军。这使我感到有点惋惜,因为这样我就不能再回到我的旧指挥区,向所有那些忠实、有效和热心地与我一起服役的人表示感谢和道别。不过我已经送给部队一封最后的告别信,预言我们将在敌人国土的心脏重新会面。

## 第十三章

### 制订“霸王”行动计划

1月13日,我离开美国,去着手组织两个西方盟国所能召集到的最强大的战斗部队。第二天傍晚,我回到伦敦。准备进攻的工作现在又开始了,但和一年半以前的同样工作相比,秩序已代替了混乱,把握和信心已代替了畏惧和不安。我的直接属员有泰德空军上将、布莱德雷中将、蒙哥马利将军、斯巴兹中将和拉姆齐海军上将,他们都是经过考验的作战将领,对促进大规模战役中真正的联合团结问题都有经验。利-马洛里空军上将调归盟军部队,任空军总司令。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特别表现在不列颠空战中,可是迄今为止,他还没有指挥过要求和地面部队密切配合的空中战斗。

1942年6月,我第一次到达伦敦时,发现司令部的参谋部门都集中在市中心,但是这次我决心在郊区找个合适地点,而且一定要达到目的。我找到了一处,但出现了反对意见和悲观的预言。不过,一当集中在布歇公园区时,我们很快就发展了一种家庭关系,大可弥补因远离英国行政机构的所在地而带来的小小不便。我的司令部正式名称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取其名称各字的第一字母,简称为SHAEF。

在以后的这段时间内,制订计划和准备战争的工作将由专家和技术人员详细研究。关于指挥和参谋机构,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是决定最急需的统帅部参谋部的建制。自从1942年7

月我被任命为盟军司令指挥陆、空、海三军以来,我们已经懂得,并且还研究过,一个有陆、空、海和后勤各部门大致相等的代表参加的真正统一的参谋部,是有某些可取之处的。我认为,在一定的情况下,例如当大规模的机动部队必须在远离最高统帅部的地方实行广泛的军事行动时,这种建制的参谋部将是必不可少的。1942年在准备“火炬”行动的日子里,我们起初曾打算按照这个方式来组织。最后我们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这样做会浪费人员,而且在我们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必要。

我们发现了一种几乎能把所有的司令官立刻聚集起来的有效体制,这就是把海、空、陆三军的司令官视为担负双重角色的人。第一个角色是,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的参谋部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助手同我们一起参与制订计划的工作;第二个角色是,他们每个人又是在整个军事行动中负责某一部分具体任务的司令官。这就是我们在整个地中海军事行动中所遵循的总的体制,并且我深信,只要考虑一下我们战区的条件,就应当采纳这个体制作为新组织的指南,虽然这里有着某些不可避免的例外。

第一个例外牵涉到空军。为了突击的准备阶段,为了在登陆作战的关键性初期阶段作及时支援——直到我们牢牢地站稳了脚和失败的危险消除后,我期望除空军海防总队以外,全部驻英空军都归我指挥。这将包括战略空军,这支空军是由阿瑟·哈里斯空军上将率领的英国轰炸机总队和杜立德将军率领的美国第八航空队组成的。这时很快产生了一些反对意见,这些意见部分来自首相及其参谋长。战略空军司令官们也不愿接受远征军战术空军司令官的命令。我敢肯定,他们的反对不是基于个人的理由,而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战术空军司令官首先考虑的始终是支援前线部队,不能指望他很好地理解战略空军的真正作用和能力,因此

会错误地使用它。

还有一个更大的争论，即认为这些大轰炸机队具有袭击西欧任何地方的力量，所以它们的主要工作虽是支援单独的地面战斗，但决不应哪怕暂时地把它们的任务只限制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在答复中指出，美国和英国即将实施的这个军事行动，不能视为一个普通的战术行动，因为一个普通的战术行动的胜负不会大于一场普通战斗的。两国政府明确地把一切希望、前途和资财都集中在为开辟西欧战场而作的巨大努力上。失败的后果简直是致命的。这样的一种不幸结局，说不定意味着把所有集结在联合王国的美军全部调到其他战区，同时对盟军士气和决心打击之深也是不堪设想的。最后，这样一种失败必然要严重影响俄国局势，因为我们有理由设想，如果俄国认为它的盟国完全是些脓包，在欧洲干不出任何大事来，那么它也许会打算单独议和。

当时我坚持要指挥这些空军部队，原因是我深受萨勒诺战役中已被确凿证明的教训的影响，这个教训就是：当一个战斗需要使用最后一点可用的兵力时，司令官必须不指望依靠请求和谈判来得到它。重要的是，我们的全部突击力量（包括两个战略航空队），要在进攻的关键阶段都能用得上。我毫不含糊地表示，只要我负指挥之责，就不会接受其他的解决办法，尽管我同意重轰炸机部队的两个司令官可以不归我的战术空军总司令的领导而直接听命于我。这对我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额外负担，因为我的副手泰德空军上将不仅是一个有经验的空军司令官，而且还得到英、美两国空军部队中所有人的信任。

我们无意把战略航空队仅仅当作战术航空总队的附属物来使用。相反地，我们非常希望继续摧毁德国的工业，特别是石油工业。斯巴兹将军使我相信，德国因石油储备的减少而会越来越困难，地

面战斗也随着会受到非常深刻的影响,因而就能相对地加速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我的建议在4月初被采纳,从那时起,直到法国和比利时战役的危急阶段结束,杜立德和哈里斯都直接受我指挥。不过,严格地说,利-马洛里的编制只包括明确划归远征军长期作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那些空军部队。这就是支援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几支英国空军部队,支援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的第九航空队,还有以后用来支援南部第六集团军群(包括法军和美军)的几支美国空军部队。属于他指挥的还有大型空运队、空中侦察队和其他一些特种空军部队。

为了控制地面部队,我们没有打算特别任命“地面部队总司令”。我们两栖进攻的战线比较狭窄,只投入了两个集团军,因此一个战线司令官在战斗开始阶段,必须经常地和直接地负责两个集团军之间的战术联系。蒙哥马利担负了这一责任。但是计划要求在欧洲大陆上及早分别建立英国集团军群和美国集团军群,而当两国的集团军群有足够的兵力完成决定性的突破,并开始迅速通过西欧向前挺进时,每条天然进军路线中的地面部队就应当有一名自己的司令官直接归我的统帅部领导,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方案也适用于以后从南面进攻法国的集团军群。在这三个主要地面部队司令官和我的统帅部之间再设置任何司令部,将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就会产生厨师过多做不出好菜的现象。因此,每个地面部队司令官在他负责的特定地区内,实际上就是地面部队总司令,他们三人都将得到一支战术航空队的逐日支援。

这一点经过彻底讨论,在实施这个军事行动前很久就为大家所深刻理解了。然而,不少的英国军官——但不包括我统帅部的英国人——墨守成规,坚持要严格遵守“三头”指挥方式,他们认为

应当有一个单独的地面部队司令官，在我的统帅部内担任副职。

乔治·巴顿的到来，使我们的队伍增添了一名重要成员，他是应我之请从地中海调来的。有时候他和我一起，在统帅部中度过夜晚，虽然我们经常总要熬到深夜以后，但跟他谈话总是令人兴奋鼓舞，以致几乎忘记了在实行双倍日光节约制的情况下<sup>①</sup>，工作日在黎明前就已经开始了。

我特别指示巴顿避免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公开讲话。他有发表爆炸性讲话的天才，他的讲话几乎总要惊动听众。长期以来，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不分场合地大发奇谈怪论，使他的朋友和同事为之震惊，这已成了他的第二本性。他在抵达联合王国后不久，对一个美军师的讲话，引起了轩然大波和报纸的评论。所以我很清楚，最容易的办法是让他战争中担任一个重要职务，阻止他作公开讲话。他诚恳地答应照办。

但是，后来在春季，另一次风暴又落到他头上。在英国的一次集会上，他发表了轻率和不适当的言论，说战争胜利后，英国和美国需要联合起来管理世界。

公众对于他在西西里殴人的事件记忆犹新，所以这篇广为流传的讲话就在别的情况下更加引人注目。有些公开批评他的人肯定地说，他完全不宜于指挥一个集团军。我第一次开始真正怀疑我有无能力控制我的这位老朋友，虽然他的作战才能我是绝对信赖的。不过，我对他的这个成为批评对象的特殊讲话倒不很担心，而担心的是，他的违约意味着他在这方面恐怕永远不会改进。

经过调查，很快弄清楚了影响我作出决定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在会前巴顿曾拒绝发表演说，只是在主人的坚决要求下才站起

---

<sup>①</sup> 夏季把钟点拨快一小时的制度。——译者注



来说了一两句,表示支持这个集会的宗旨;第二个是,他曾经得到保证说,这是一次私人集会,没有记者在场,会议情况不会向外报道。

在这同时,这个事件已成为用海底电报与陆军部交换意见的大事,但和往常一样,陆军部长和参谋长都完全让我根据对战斗需要的判断作出最后的决定。

在我进行调查期间,乔治<sup>①</sup>前来看我,他以他特有的直爽性格和激动的方式提出辞职,以免我为难。我最后向他表示,我决定完全丢开这个问题,保留他未来的第三集团军司令官的职务,这时他感动得几乎掉下泪来。在这样的时刻,巴顿将军暴露了他性格的另一面,这一面除了他的亲密朋友外,是任何人都难以理解的。他非常悔恨,这不仅是因为他给我增添了麻烦,而且还因为他曾当着他的同事激烈地批评过我,因为他想我会撤他的职。他的情绪波动很大,忽而兴奋激动,忽而悔恨消沉。我笑着告诉他:“你还欠我们一些胜仗;偿清它吧!全世界将相信我是一个聪明人。”

这次军事行动——两栖袭击不过是它的开端——的长远的战略概念,应当早日形成,这点是重要的。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指示极其简单,只命令我们在法国海岸登陆,然后摧毁德国的地面部队。其中重要的一段是:“你们要进入欧洲大陆,并与其他盟国合作,采取以攻入德国心脏地区并摧毁其兵力为目标的军事行动。”摧毁敌军的目的始终是我们的指导原则。地理上的地点只有关系到下述情况时才应予以考虑:这种地点或是对敌人的作战行动有重要意义,或是在我们摧毁敌人的陆军和空军的过程中,可以作为供应点和交通枢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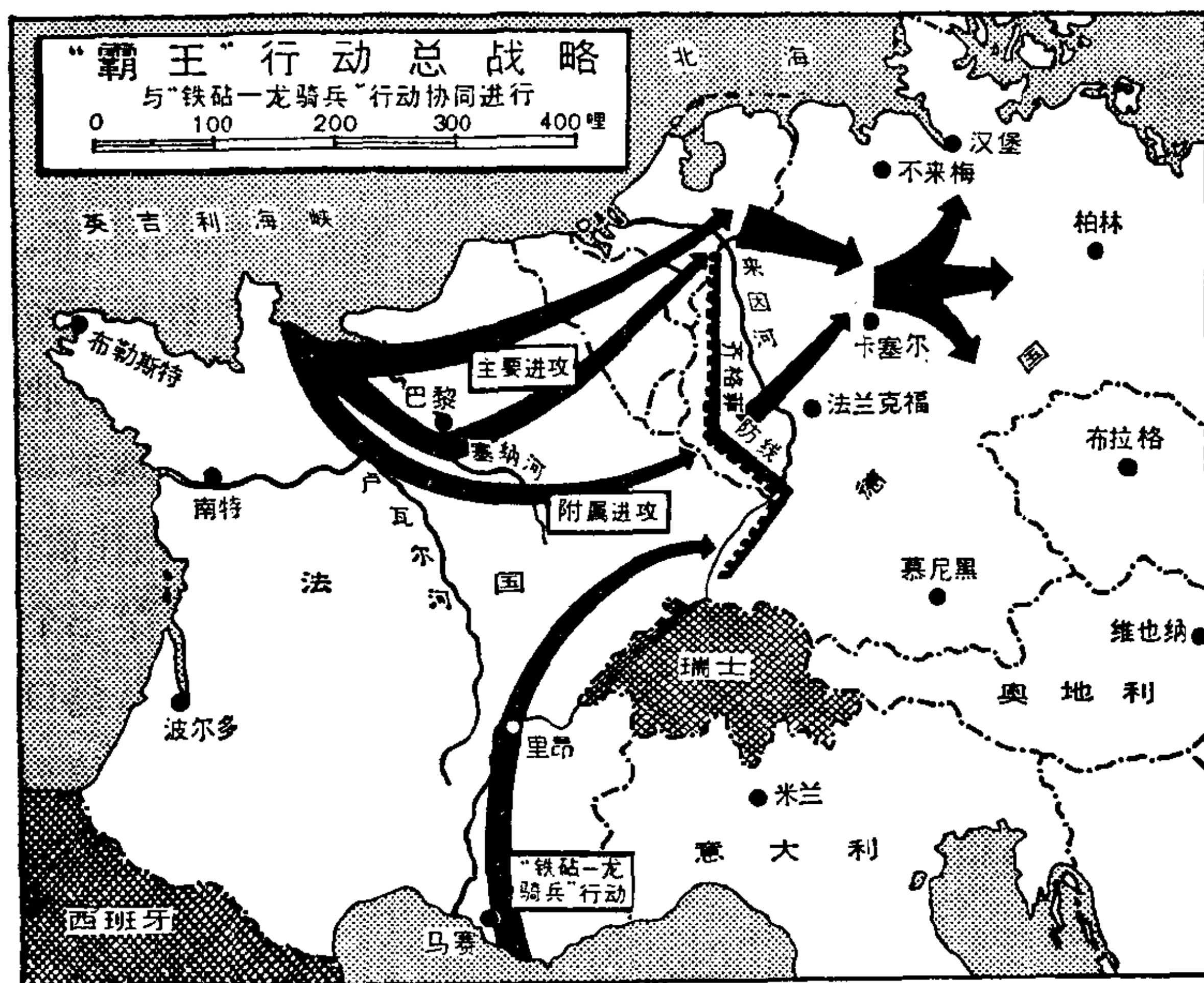
① 即巴顿。——译者注

西德的心脏是鲁尔，它是德国战时军火工业的主要中心。西德第二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是萨尔盆地。德国赖以进行战争的大部分能力就来自这两个地区。

用强大兵力渡过来因河的天然途径，一条是在鲁尔的北面。另一条合适的路线是穿过法兰克福地区，此外再往南，即在斯特拉斯堡地区渡河也是可行的。在这几条可取的途径中，我们认为，北面一条最为重要。理由之一是，在鲁尔以北，来因河附近的地形特点对攻击战更有利。另一个理由是，在这个地区，从来因河稍往前行，就可以把鲁尔及其军事工业从德国其他地方分割开来。第三个有利于北线作战的理由是，从后勤考虑，欧洲西北部的最优良港口安特卫普正处在理想的位置上。攻占和使用这个港口将大大缩短我们的交通线；很清楚，我们一旦抵达德国边境，后勤供应将会成为关键问题。

但是，如果只是希望把我们的所有人力和物力用在沿着北部海岸一条狭窄路线上组织一次唯一的突袭，就消灭德国最后的抵抗力量，那是办不到的。问题仍在于如何把德国武装部队消灭在战场上。可以肯定，敌人觉得他的安全在哪个地区受到最大的威胁，他的武装部队就会迎头在哪里进行抗击。在进攻时，只把我们的部分兵力用在前线的某一地点，这仅意味着我们的前锋和敌人能够集结的所有防卫兵力发生正面的遭遇。我们需要的是把全部兵力用来对付敌人，即把全部机动部队和全部增援部队都直接用来全歼敌人的野战部队。

为了避免僵持局面和取得为消灭德军而需要的实力地位与机动地位，我们的计划是，只要进攻一发动，就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向前推进，并且首先应在左翼推进。这样我们将能尽早地使用比利时的一些十分重要的港口。这一推进还将占领一些据我们获悉装



[按原图译制]

置着某种神秘的“秘密武器”的地区，再继续前进，我们将直接威胁鲁尔。此外，我们还计划从一开始就向萨尔方向推进，只要保证占领比利时港口和左翼到达威胁鲁尔的地点以后，这一进军将是可能的。当我们向萨尔方向推进的部队同计划中从南面通过罗纳河谷北上的进攻部队迅速会合时，敌人会为萨尔盆地的安全而神经过敏。我们整个战线的这种连接是必须的，并且会得到几个巨大的和眼前的好处，这就是，首先，将解放法国；其次，将为我们开辟另一条巨大的交通线，以保证从美国迅速运来部队和充分的供应；最后，将切断留在汇合点后面的一切德军，从而把他们从战争中消灭。这样就容许我们把一切军队用来打击敌人，避免以昂贵的代价设立漫长的防御侧翼，因为在防御侧翼，我军只能执行消极被动的任务。

如果这些行动都获得成功,我们下一步就必须准备最后消灭敌军,我们估计,敌军那时将防守齐格菲防线和来因河。

1944年5月我们估计,在我们渡过来因河作决定性冲击的时刻到来时,依靠我们指望的入口港,也许会得到六十八个可供使用的强大的师,这里不包括来自地中海的师。用其中的三十五个师来进攻亚眠—莫伯日—列日—鲁尔这条轴线,从供应方面估计,这是沿那条进攻路线所能维持的最大兵力,剩余的大约三十三个师,再加上从法国南部进入的师,将被用于从来因河畔的威塞尔往南直到瑞士的这条漫长战线上作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摧毁齐格菲防线,那就会除了防守鲁尔以南的战线外,再也不能做什么。而敌人却能利用种种有利的条件,几乎是任意集中兵力进行强大的反攻。

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基本上占据了来因河整个河流,形势就会彻底改观。一旦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在整个战区获得相当程度的安全,并将允许把进攻的任务实际分配给我们的全部兵力,而不是仅仅分配给由鲁尔以北的一条路线所能维持的三十五个师。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理由表明,在对德国内地发动最后突击以前,占领整个来因河流域是明智的。我们的目的是摧毁德国的武装部队。如果我们能够在来因河以西大败敌军,那么可以肯定,敌人以后用来防卫来因河的物资必将不敷需要;苏军已经进入波兰,大量的德军将被牵制在东线迎击苏军今后的进攻。最后,在来因河屏障以西我们有最短的供应线,如果我们在那里不能消灭敌军,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在不具备这一有利条件的来因河以东消灭敌人呢?布莱德雷将军和巴顿将军,还有我的整个参谋部都一致同意这个意见:从梅斯山口和阿登以北同时进军。

从这点往前再走一步,我们推侧,敌人一定会用最强大的兵力

防守鲁尔地区，因此最好是以两翼包围来攻占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打算使北面的进攻强大到尽交通线所能支持的程度，并使法兰克福的进攻强大到尽剩余的人力和物力所能供应的程度。我们进一步认为，一旦这两个地区的进攻在鲁尔以东的卡塞尔一带会合，从军事意义上说，德国的败局就定了。不管怎样，我们认为，一旦占领了卡塞尔地区，我们就能轻易地在我们的两翼实施进攻。这将意味着欧洲战争的结束。

虽然所有这些连续的军事行动以及可能的变化是长期讨论的题目，但下面这个总的方案已被认为是我们打算指挥这一军事行动的纲领：

在诺曼底海岸登陆。

为诺曼底—布列塔尼地区的决战准备必需的兵力和物资，打破敌军的包围阵地。（在这开始的两个阶段，登陆作战将由蒙哥马利任战术指挥。）

用两个集团军群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进行追击，重点是在左翼取得必需的港口，进逼德国边境并威胁鲁尔。在我们的右翼，我们要同从南面进攻法国的兵力相连接。

取得比利时、布列塔尼以及地中海的港口，以便沿着德国占领区的西界建立新的基地。

在我们为最后战斗准备兵力的同时，还要用一切办法继续不断地发动猛烈的进攻，既要削弱敌人，又要为决战创造有利条件。

彻底驱除来因河以西的敌军，同时不断在河东寻找桥头堡。

按照两翼包围鲁尔的方式发动最后进攻，重点再次放在左翼，随后朝着当时决定的特定方向直接突入德国。

肃清残余的德军。

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以前由参谋部会议认真概括出来的这个总方案，在整个战役中一刻也没有放弃过。

确定实施这个军事行动的时间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问题。总统和首相在德黑兰曾答应斯大林大元帅，进攻将在5月份开始，但我们被告知，在这一年的那个时期选定任何一天都算履行了我们两位政治领袖的诺言。

为了尽量获得有利于战斗的最长的好天气，发动进攻越早越好。另外一个主张及早进攻的理由是，德军正在继续不断地和疯狂地增强海岸防御。由于英吉利海峡的气候条件，5月份是能够胜利实行登陆战的最早日期，5月初潮水和日出将同时出现，这对我们是第一个有利条件。因此5月初就成为最初假定的进攻日期。

情报部门报告，德国人在发展有巨大破坏力的新式远射程武器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个惊人的消息也表明，早日发动进攻是适当的。

在春季的几个月中，华盛顿的参谋军官一次又一次来到我的统帅部，告诉我最近对德国发展新式武器的估计，其中包括制造细菌武器和原子武器的可能性。这些报告极端机密，因而只能口头告诉我。我获悉美国科学家在制造这两种武器方面也取得了进展，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能够机智地推测出德国在这方面的某些详情。伦敦的情报机构在这方面常有定期报告提供补充消息。此外，我们还极为认真地检查空中摄影，借以发现显然只能用于某种新式战争的新装置。

英、美两国的最优秀科学家，都被召来帮助我们估计种种可能性。在1944年作准备的几个月中，我们唯一有效的抵抗办法是轰炸。我们在欧洲断断续续地空袭了科学家认为德国人正在试图生产新式武器的每一个地点，还空袭了认为正在建造发射装置的沿海地带。

在这段长时期内，情报机构的估计必然是根据很不充分的情

报作出的。因此在推算德国的进展时，他们的估计不时变动。不过，到我们发动进攻前，情报专家已能够十分精确地向我们提供有关德国新武器的存在、特征和性能的估计。

有两个理由使我们把进攻发动日期从5月推迟到6月，其中一个理由有着决定性意义。首先的、也是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坚持进攻的规模要超过原来由摩根中将领导的伦敦参谋部所订的计划。摩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官，在我到达前很久就受到马歇尔将军的高度赞赏和尊敬。我也很快地就看中了他的才能。他在我抵达前几个月，就已经完成了大量的、细致的计划工作，积累了资料，集中了物资，正是这些工作使得进攻欧陆开始日有可能实现。我的意见得到摩根将军个人的支持，但是船只、登陆艇和其他物资的数量已被固定，这样他就只好按此数量制订他的计划。因此他除了计划在一条三个师的战线上进攻外，别无他法，而我却坚持用五个师，并通知联合参谋长会议，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登陆艇和为进行更大军事行动所必需的其他装备，哪怕把这一突击推迟一个月也在所不惜。联合参谋长会议同意了这个意见。

另一个希望把进攻日期推迟的理由是我们对空军准备性战斗所依赖的程度。早期的进攻使空军只有极少机会对法国的重要运输中心进行准确轰炸，而预计5月份气候会改善，这将使空军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机会去阻滞德国后备部队的行动和破坏德国沿海岸线的防御。真正摧毁处于通向选定战区的主要公路和铁路线上的关键地点，是这项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如此，采纳推迟进攻日期的做法仍是使人失望的。因为我们希望在实施欧洲战役时能利用整个夏季的天气。

除了这项总的军事行动计划外，我们还充分考虑了在进攻的地点和时间上迷惑敌人的方法。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敌人相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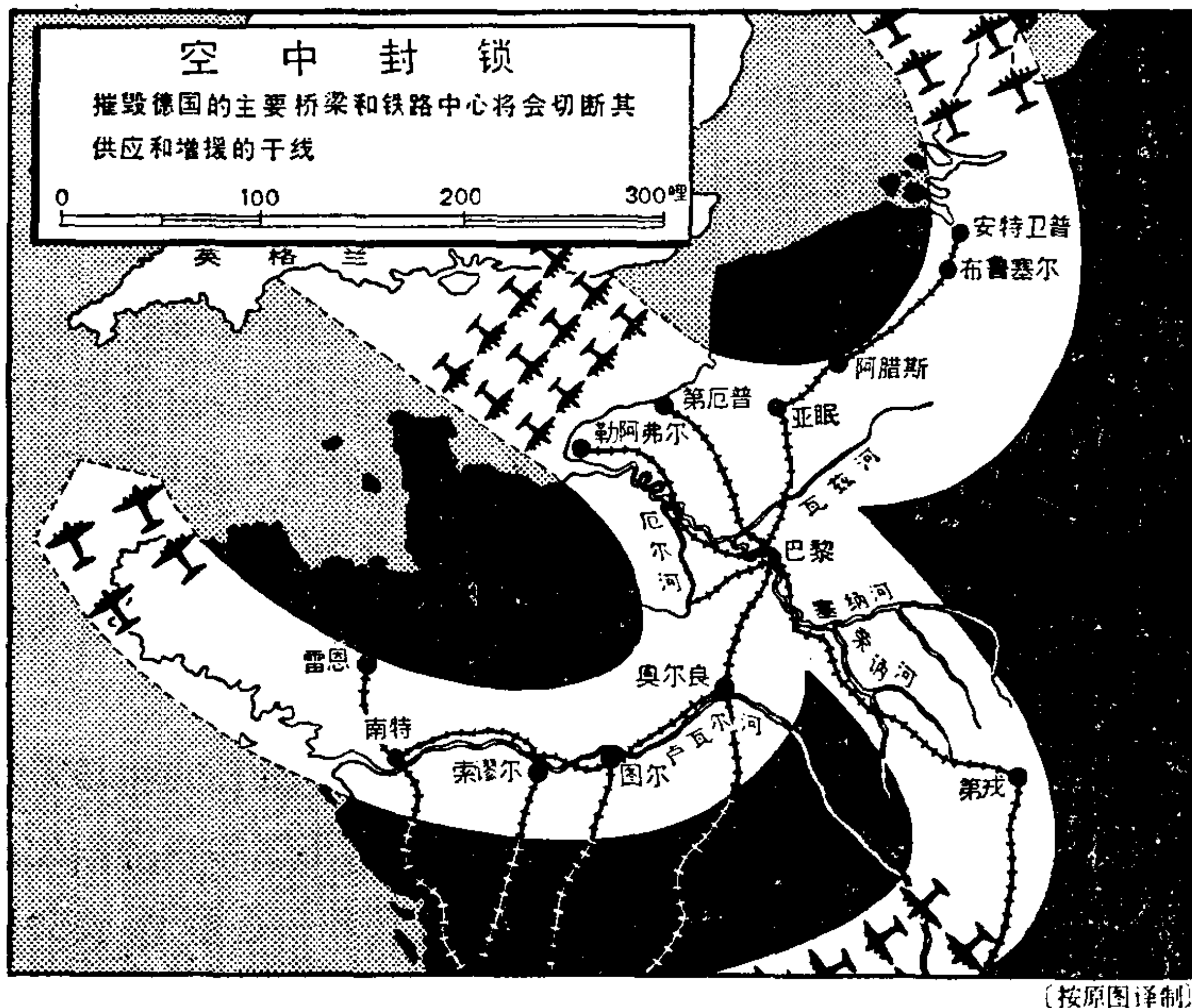
们打算直接渡过海峡的最狭窄地方攻击加来要塞。如果我们能在这个地区进攻成功,就会在很多方面得到巨大好处。那里的滩头不仅是沿岸最好的,而且最接近英国的海港和德国边境。敌人充分估计到这些事实,因此在这里保持了强大的兵力,并且加强了那个沿海的特区,使它比其他地方更加巩固。这里的防御工事是如此坚固,以致我们谁也不相信从海上进行突击会获得成功,除非我们付出如此可怕的代价,以致使整个远征军在登陆后就会发现自己已无力再完成任何积极的行动。但我们指望敌人相信我们会受引诱而采取这个行动。至于我们为迷惑敌人而采用的各种手段,敌人的情报部门是非常相信的。

向法国南部的辅助进攻是渡峡主力战的一个重要的和必需的组成部分,这点已经作过长期考虑,至少马歇尔将军和我是如此。1944年初作计划时,我以为所有的主要司令官和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这点上都是很一致的。但我们在伦敦所作的研究很快表明,即使以6月份为进攻日期,要同时以我们所需要的兵力发动渡峡战和地中海攻势,盟军还没有足够的登陆艇和其他装备。

那时,美国已在太平洋发动了攻势,所以不能再从那个战区调出必要的船只,面对这一情况,蒙哥马利将军建议完全取消对法国南部的进攻,这个行动当时的代号为“铁砧”。1944年2月21日,他给我写信说:“我强烈建议我们现在应以全力反对‘铁砧’行动”。我不同意这个意见。但是很清楚,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推迟南部的进攻,以便使船只和登陆艇有充分的时间先参加“霸王”行动,然后驶往地中海参加南方的战斗。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个安排并不是特别不利的,至少它比取消“铁砧”行动要好得多。

盟军驻在地中海区,会使德国不能够把它的军队全部撤离法国南部,另一方面,如果它逐渐抽走该地的军队,我们今后从南部





进攻的速度将大为加快。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推迟南部的进攻，并且建议，如果可行，就在7月15日后立即实行。

我们为准备这次大规模突击而使用空军的计划，遭到了极为认真和诚恳的反对，特别是在策略上更是如此。破坏法国的重要桥梁、货站和主要铁道干线，不可避免地会在法国居民中造成伤亡。就拿大城市来说，即使如我们所计划的那样，为了破坏交通线，只轰炸城市四周的关键地点，而不轰炸人口密集的中心区，据一些统计学家估计，这样仍将至少使八万法国人死亡。这种灾难自然会加重法国民族的痛苦；首相和他的很多部下都坚持必须要空军采取别的办法来支援进攻。反对我们意见的人向首相作了可怕的描绘，首相诚然为之震动，所以他相应地对我作了紧急和恳切的呼吁。他说：“战后的法国务必是我们的朋友。这不只是一个人道

主义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国策问题。”

我的空军司令官们和我,对统计学家提出的数字的精确性表示异议。我们预计,死亡的数字不会超过八万人的一部分——特别是由于我们打算向居民发出一般的和特殊的两种警告。我们采用种种可能的方法一再告诉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离开运输系统的重要地点。此外,每次袭击前,我们打算用无线电和传单警告居民,要他们暂时撤离这次选定的空袭地区。我们能够提出这些明确的警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大大削弱了德国空军的力量,另外也知道,敌人不可能有足够的防空设备来随时随地保护法国运输线上的每一个重要地点。这项计划必需安排得使它不因其一般的警告形式而暴露出选择空袭的地方。因此,为了继续实行迷惑政策,我们在进行每次重要空袭的同时,也必定选择加来地区的某些目标,予以猛烈的轰炸。

对于轰炸的价值和需要,我们进行过长时间的、认真的、当然也是带有同情心的争论,因为这牵涉到了人的问题。最后,首相和他的政府,还有法国内地军司令凯尼格将军都同意按原计划进行空袭,但希望我们所采取的警告居民的措施能够有效地减少伤亡。取得的结果清楚地证明了为地面攻势而作的这种准备性轰炸的功绩。不仅居民的伤亡只是原来估计的一半,而且法兰西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冷静地承受了这种必要的伤亡,并未因此对盟军产生敌意。除了用空军轰炸法国的运输系统外,我们继续坚定不移地袭击德国的炼油厂和其他重要军事工业。空军还经常向德国空军挑战,目的是要在地面战斗激化之前,进一步消耗它的力量。

同时,地面部队参谋部和空军参谋部经常改善地面部队和空军在实际战斗中进行协作的方法。我们已经很久不提“空军对地面部队的援助”了,在谈到时只说“地空战斗”。这种相互依赖是现

代战争的一个特点。地面部队必须始终下决心夺取和保护有利的地区,使空军可以从那里起飞紧靠前线作战;另一方面,战斗轰炸机对地面部队的经常援助,必需被认为是一种例行活动。在欧洲战役的几次危机中,空军每日的战斗出击超过一万架次,作为它应分担的地空战斗任务。

在为战术进攻制订计划时,必然要遇到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即如何进行支援、供应、撤退和补充。

在西西里战役前,我们总是认为,任何大规模的两栖进攻都必须在几天内夺取永久性的港口设备,否则就必须放弃进攻。这时,盟国在生产有效登陆工具方面取得的进展——包括LST型登陆艇、LCT型登陆艇、水陆两用车和其他登陆艇——大大减少了对固定港口设备的依赖。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盟军大量生产革新的装备,是挫败德国参谋总部计划的最重大因素之一。

我们虽然拥有能把物资送上无掩护的滩头的装备和工具,但丝毫不能排除对港口的需要。在“霸王”行动中尤其是这样。许多世纪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在一年的所有季节中,英吉利海峡都容易遭到毁灭性风暴的袭击,尤其在冬季最为厉害。所以确保供应和支援的唯一可靠办法是夺取大型港口设备。

由于我们面临的防御的性质,排除了迅速夺取适当港口的可能性,所以还必须想办法保护滩头物资免受风暴的影响。我们知道,即使攻占了瑟堡,其港口容量以及它通向外界的交通线仍不能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为了解决这个显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采用了一个极为别致的办法,以致很多讽刺者把它说成是纯粹幻想。这就是在诺曼底海岸建造人工港的计划。

1942年春,我首次听到蒙巴顿海军上将提出的这个试验性的主意。在一次有许多后勤参谋参加的会上,他说:“如果没有可用

的港口，我们可以制造配件，再把它们拖去装配成港。”他的建议顿时引起哄堂大笑和嘲讽，但两年后这个想法却变成了现实。

我们设计了两种普通的防护停泊处。第一种叫“鹅莓”，它仅由一连串的沉船构成，沉船首尾相接，其数量足以形成一条避风的防护堤，小船和登陆艇，除了在最恶劣的天气外，任何时候都能不断地在这里卸货。另外一种叫“桑葚”，它实际上是一个完备的海港。在英国设计和建造了两个这样的人工港，其装备是一件一件拖到诺曼底海岸的。“桑葚”的主要构件是一艘叫做“长生鸟”的巨大混凝土船，状似箱子，分量极重，如果沿一条海岸线把许多这种船只首尾相接地沉入海底，大概可以坚实地挡住几乎任何巨浪的冲击。便于卸货用的精致的辅助设备，还有现代港口操作所需的各种装置都已被设计出来，并且准备就绪。英国战区和美国战区将各有一个“桑葚”港。五个“鹅莓”港即将安装。

地中海战役的经验已经表明，我们每个加强师在攻势战斗中，每天大约要消耗六、七百吨物资。我们的供应安排必须准备每天达到这个数量。此外，我们必须同时在滩头上配置后备军队、弹药和给养，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时间内展开深入进攻，并确保在决战的整个漫长时期内能得到兵力和物资的补充。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需准备运进重型工程机械和建筑材料，以便重建和改装被攻占的港口，以及修复铁路、桥梁、道路和建筑机场。后勤计划的另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准备迅速把伤员从滩头运走，以便把他们立即转送到英国的许多医院中去。

在盟军最高统帅部中，我的主要后勤军官是汉弗莱·盖尔中将与罗伯特·克劳福德少将，他们两人都有丰富的经验，而且非常能干。美军后勤部队的司令官是约翰·李中将。他是一个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工程兵军官，被人誉为办事能手。因为他讲究规矩，严以律

己,所以许多朋友认为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他办事果断,为人正直,忠于职守;长久以来,他被人视为一个能干的管理人员,一个有崇高品德和宗教热忱的人。我有时觉得他是一个当代的克伦威尔,但我准备舍其严格的守旧习气而取其建设才能。其实,我认为,对于某种必须始终使用严刑峻法才能完成的活动来说,他固执的工作方法也许是必要的。

我们预料在开始进攻时会有许多特殊的战术问题,其中有些极难解决。一些主要的下属司令官和参谋军官经常和我一起讨论并且调整不断变化的计划;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和专家也时常参加这些会议,提供技术方面的意见。

经常参与商讨各种战术问题和作战事项的顾问都是我最信任的军官。他们是美军的哈罗德·布尔少将、阿瑟·内文斯准将和英军的怀特利少将。

在英国东部一个偏僻地方,英国陆军拟制了德军可能用来抵挡我们进攻的各种战术障碍。英国人建造了碉堡、大石墙以及大片的有刺铁丝网的地带。他们布了地雷区,设置了供水下和陆地使用的钢质障碍物,并且挖掘了反坦克壕。这些都是根据我们获悉德军已经设置的防御物复制的。然后英国人着手设计便于摧毁这些障碍的武器。他们把这个地区用来试验根据实物研制出来的武器,同时也用来试行新的战斗技术。

这种试验中的一个有趣事例是使用爆破筒。这类爆破筒只是一个装满炸药的长管。当把它投入布雷区而爆炸时,管身两侧的地雷也会全部爆炸。这样就在布雷区中开辟出一条小道,部队可以顺着这条小道前进并继续攻击,而后继部队则赶上来清除布雷区的其余部分。这些爆破筒长期以来就在战争中使用,但英国人发明了一种新的使用方法。他们的方法是,在谢尔曼坦克的外

部安装许多管子,每根管中有一个爆破筒。管子直指前方,实际上,这些都是后部装有微量黑火药的炮筒。坦克前进时,这些临时炮筒自动连续发出,射出的爆破筒在坦克前约三十呎处爆炸,这样就从布雷区清理出一条道路。每辆坦克安装有足够清理将近五十码道路的爆破筒。利用这个方法,就不再使用无防护的步兵去承担这个危险工作,而让有装甲保护的、比较安全的坦克兵去干。我虽然从未看见在战斗中使用这种特殊武器,但它是我们力图设法减轻步兵困难的一个例证。架设在反坦克壕上的可搬运的桥梁、喷火坦克、连枷、犁,以及破坏地雷的重滚轮,都是不断研制和试验的项目。

和往常一样,陆军的士气是所有高级将领经常注意的问题。但有时他们也不得不注意某些特殊的问题。例如,有个专栏作家估计,要在欧洲西北部的防御海岸登陆,突击部队将会损失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这个不负责任的论断在这个指挥区内广为流传,引起部队的疑惧和不安。布莱德雷和其他人在多次访问部队时立刻抓住机会,恰如其分地指出,这是一个可怕的、虚假的、也是完全错误的论断,作出这个论断的人根本不懂军事和不了解事实。布莱德雷预计,进攻的损失将不超过其他任何同等规模的激烈战斗。我们甚至在报纸上公布他的估计,采用我们能利用的各种方法,不让那个悲观预言动摇军心。

我们详细制订了空军在准备阶段和支援阶段的计划,随着春季的过去,准备阶段所取得的战果每周都要予以检查。潜艇和飞机的侦察没有间断过,同时还从许多来源收集情报。海军的计划涉及全面防护、扫雷、护航、支援火力及其他事项;此外,还涉及建造人工港,修复攻占的港口和维持渡峡的供应。我们研究了海岸的防御工事,并制订了拔除所有坚固据点和所有碉堡的具体方案。

还研究了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不断指出的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是，滩头的障碍物正在大量增加，其中大部分在涨潮时淹没在水中。军队、装备和供应的运载计划是很多的，而且非常详尽。到港口的路线、启航和抵达的时间、登陆地点、临时营地的防护和伪装以及上千件的其他有关事项，都要事先谨慎地确定下来，并尽可能地预先进行试验。

高级司令官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访问和视察军队。有个参谋官留下的一份记录表明，从2月1日到6月1日这四个月期间，我巡视了二十六个师，二十四个机场，五艘战舰，无数的仓库、车间、医院和其他重要设备。布莱德雷、蒙哥马利、斯巴兹和泰德也保持了类似的记录。这些穿插在一系列似乎无穷尽的讨论会和参谋会议中的视察，是必需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士兵们喜欢见到指挥战斗的人；如果司令官对他们稍微表现出忽视或冷淡，他们会感到非常愤慨，他们常常把一次访问——哪怕是短暂的——视为司令官关心他们的证明。一个司令官有责任在体力条件许可下到他的士兵中去，与他们交谈，和他们打成一片，而决不能因为腼腆或谨慎而妨碍履行这个职责。这个职责在鼓舞士气方面有很大好处。如果出现其他条件与敌方大致相等的情况时，士气在战场上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当我们把兵力向港口集中的时期到来时，英国南部成了一个大兵营、集积场和飞机场。英国政府应我们的请求，停止了英国这个地区和联合王国其他地区之间的一切交通；正如中断联合王国和爱尔兰共和国的交通一样，因为中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有大量的敌人间谍。英国政府甚至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断然中止从联合王国到外国的一切外交联系，因而引起了外国的愤怒和持续的抗议。此外，它撤销了沿岸的正常航运业，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些极有

价值的船只用于军事目的。这给已经负荷过重的铁路线又增添了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客车交通实际上已经停止。即使是基本货物的运输也感到困难。建筑巨大的人工港使用了几千人的劳力，这使已充满了人的港口更加拥挤不堪。

厌战的英国群众对这些额外的麻烦和困难没有报以哭泣。他们受到决胜即在眼前这一信念的激励，并在温斯顿·丘吉尔的榜样和领导的鼓舞下，愉快地接受了我们各方面的需要，例如容许我们冒撞倒他们的危险而使用他们的街道和公路，看着他们的田野和园林被践踏，甘愿排着长队等候班次极少的火车和忍受进一步削减已经少得可怜的定量。这样，什么东西也不会妨碍军队的调动，因而我们也毫不吝惜地消耗了大量的物资。

放弃了5月份的既定日期后，下一个月亮、潮水和日出同时出现的日期是6月5、6、7三天，这几天是发动进攻的可行日期。我们要在夜晚乘护航舰渡过海峡，因为黑暗可以隐蔽我们几次进攻的兵力和方向。我们需要借月光进行空降突击。我们需要在地面突击之前有大约四十分钟的日光来完成轰炸和预备性轰击。我们必需在潮水退到相当低的时候发动进攻，因为我们必须清除的滩头障碍物那时将暴露出来。这些主要因素确定了这个大致的日期；但选择具体的日子则要取决于天气预报。

从天气方面看，如果这三天都不好，那时可以预料，后果简直是令人可怕的。秘密将被泄露。突击部队将离开船只，挤回围有铁丝网的集结区，而他们在那里的原驻地却已被接踵而来的部队所占据。复杂的行动表报将作废。士气将下降。至少需要再等十四天，也可能等二十八天，这时，二百多万人就将陷入无能为力的困境之中！发动主力战所能利用的良好天气的时间越来越短，那么敌人的防御也就会愈来愈强！整个联合王国很快将发觉某些事



情搞糟了,英、美两国国民的沮丧情绪将会导致预料不到的结果。最后,还始终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因为我们知道敌人正在法国海岸发展一些新式的、而且估计是很有效的秘密武器。这些武器对于我们拥塞的港口,特别是普利茅斯和朴次茅斯来说,会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简直不敢设想。

这是个紧张时期,加之那种能使我们遭到灾难性挫折的完全不能控制的天气因素,形势就更加紧张了。一次有个士兵说:“天气始终是中立的。”再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如果有一方试图实施需要良好天气的作战方案,或者有一方拥有雄厚的实力(例如强大的空军),要依靠良好天气进行有效的作战,那么坏天气就显然是这一方的敌人。如果真正的恶劣天气长期延续下去,那么纳粹就不需要任何东西来保卫诺曼底海岸了!

我们计划在科汤坦半岛实行空降进攻,这是一个特别难以决定的问题。向这个半岛东岸的突击,将在代号为“犹他”的滩头发动,这个行动已包括在进攻计划之中,因为我确信——布莱德雷也同意——要是没有这个地方,及早攻占瑟堡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不能很快拿下瑟堡,敌人将会很好地利用时机把我们封锁在狭窄的滩头上,使这个军事行动归于失败。我们认为,在“犹他”滩头迅速取得彻底胜利,是这次整个战役真正胜利的先决条件。

但是在科汤坦半岛上,只有一个简陋的滩头可以利用。就在这个滩头后面有一个大礁湖,只有几条从各滩头到半岛内部的狭窄堤道可以通过它。如果这些堤道的出口被敌人守住,我们的登陆部队就会落入陷阱,最后将被大炮和其他武器所屠杀,对此他们无力还击。

为了防止这一不幸遭遇,我们计划向这个滩头的内陆空投两

个美国伞兵师，其首要任务是攻占和守住这些重要堤道的出口。那里的地势极不适于空降。在被称为“小树林”的地区，是一片宽阔的、牢固的和茂密的灌木树篱。易受攻击的运输机和滑翔机，必需飞越布满高射炮的海岸线。此外，这个地区还有敌人的机动部队，这些部队除了发射高射炮外，还准备在我们的伞兵和滑翔部队能够组织战斗之前向他们进攻。

这一完整的方案从第一次提出以来就有很大的争论，但是布莱德雷和美国空降部队高级将领马修·李奇微少将，在这个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面，始终坚定地同意我的意见。在早些时候，大家同意把这个方案纳入计划，我以为事情已成定局，但刚好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之前，这个方案又戏剧性地被提了出来。

发现、调整和记录所有这些细节的参谋人员，在工作中当然要经常与伦敦、华盛顿的许多机构和人士进行合作。在准备阶段，不断有参谋军官从华盛顿来到我的司令部，告诉我们关于所需物资项目的供应能力，确定航运日期，并和我们讨论有关人事更替、保卫工作和摄影范围的计划，另外还讨论了上千件有关事项。

萨默维尔将军的一名主要助手勒鲁瓦·卢茨少将和我们一起呆了几个星期，调查了保证从美国工厂把物资源源运往前线的各种安排。我们在不同时期还与英国内阁的艾登先生和贝文先生等人举行会谈；与我们会谈的还有从华盛顿来的史汀生先生、斯退丁纽斯先生和美国驻伦敦的几个代表如怀南特先生、哈里曼先生、比德尔先生，以及为此目的而从非洲赶来的戴高乐将军。这些会议必须讨论各类题目，其中包括许多未来计划，如我们在将来怎样控制预定的作战区，在我们抵达德国和奥地利后如何管理这些国家，等等。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个人和首相进行了频繁的接触，这些接触

都是有益的。他对每一件重要的事都很感兴趣，当我们提出一些要求，需要已经负担过重的英国民政机构作出额外努力时，他能给我们以有效的帮助。

到切克斯去总是以公事为主要目的。但郊区很舒适、安宁，在田野和树林中偶而漫步个把小时，确实是一种真正的消遣。切克斯一度为克伦威尔所据，那里的环境、建筑、家具都具有历史意义。

首相通常要求他的客人在傍晚时分去他那里。晚餐后看一场短电影，然后大约在晚上10时30分开工作会议。这些会议有时开到第二天清晨3时。几乎一直出席会议的，除艾登先生外，英国参谋部至少还有一个成员。各类问题都经过讨论，并且还常常作出明确的决定。伦敦司令部每隔几个小时就送来作战消息，丘吉尔先生总是和英国参谋部一起参加制订和发布训令的工作，其中有些训令甚至是纯属军事性质的，有些只是战术性质的。

通过参加这一类会议，我对我经常接触的许多人开始感到敬仰和喜爱。其中一个查尔斯·波特尔空军上将，他是英国参谋部的空军代表，是一个造诣很深的军事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实干家，他沉着冷静，谦恭有礼，意志坚强。和他讨论任何战争问题，不管是否涉及他本行的空军业务，都是一件愉快的事。他在英国军界和政界享有崇高威望，在盟军指挥区的美国人中也是这样。他的显著特点是稳重，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情绪；哪怕在最激烈的争论中，我也从未看见过他露出生气或异常激动的样子。

另一方面，丘吉尔先生几乎在大多数会议上要表现出某种情绪。有一天，一位英国将军偶尔用英国参谋军官们使用的术语把士兵叫做“肉弹”。首相立刻用激动的谴责打断了他的话，他说，这样冷漠无情地谈论士兵是不人道的，使人听起来，好象士兵只是货物，或者更糟糕，只是尸体！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个词一直有同样

的感觉,但这次我却同情那个参谋军官,他本人因为无辜地引起了首相的不快而显然感到惊慌失措。

如同大多数其他英国家庭一样,切克斯也有一本会客簿。客人在每次进门时都要登记。有一次我去南部海岸,顺便到切克斯和丘吉尔先生会晤了十分钟,然后匆匆出门继续我的旅程。我刚上车,就发现家庭管事极为严肃地站在旁边对我说:“先生,您忘了登记。”他郑重其事的语气,在我听来,就是说他认为我的过失是难以原谅的。我纠正了这个疏忽,继续登程。

丘吉尔先生虽有各种急务缠身,但还是经常表现出强烈的人情味。1944年2月,伦敦被迫忍受“小闪电战”的袭击时,他时常催促我住进伦敦的一所特别建造的地下掩蔽室。他甚至竭力为我准备一整套寓宅,其中有厨房、客厅、卧室和保密电话。我从未用过,甚至看也没有看过,但他对我的安全一直极为关怀,而把自己的安全却置诸度外。在空袭期间,他的唯一明显的愿望是去看他的女儿玛丽,那时她在保卫伦敦的一个防空炮台上工作。

在我们举行的各次会议上,丘吉尔先生总是清楚、具体地阐明他对“霸王”行动的态度和期望。他比过去逐渐变得乐观了,但仍然不让他的期望完全克服他的怀疑。他不止一次地说:“将军,如果在即将来临的冬天,你和你的三十六个盟军师在欧洲大陆上站住了脚,并且攻占了瑟堡和布列塔尼半岛,我一定向全世界宣布这次行动是战争中的一次最大胜利。”他接着补充说:“如果你们再攻下了勒阿弗尔港,把美丽的巴黎从敌人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一定宣称这个胜利是当代最伟大的胜利。”

我总是回答说:“首相,我向您保证,在下一个冬天盟军将在德国本土出现。您目前所看到的只是我们现有的三十六个师。我们将从地中海开进另外十个师,还将通过攻占的港口很快从美国再

运来四十个师。”

他对我们有余力在1944年夏、秋两季办到所有这些事表示怀疑，并且常常说：“这都是后事，我仍然保留我的看法。”我坚持说，即使德军奋战到底，我给他描绘的前景也并不过分渺茫。首相笑着回答说：“我亲爱的将军，一个领袖表示乐观始终是件好事。我赞赏你的热忱，只要在圣诞节解放了巴黎，我们谁也不能再作更多的要求。”

4月7日，蒙哥马利将军在空军参谋部和海军参谋部的协作下，准备提出地面部队袭击滩头的全面详细计划。我们在伦敦的圣保罗学校举行一次大会，用整整一天的时间来说明、审查和协调计划中的细节。

计划规定，部队直接向南进攻法国海岸，美军在右，英国和加拿大的部队在左。突击的最右翼指向瑟堡半岛的“犹他”滩头，左翼大致在奥恩河口。整个进攻战线长六十多哩。

我们希望使大量战斗轰炸机接近战线，并且占领一些使我们强大的坦克部队可以最有效地进行战斗的地区，因此计划提出，由英国第二集团军尽早攻占冈城以南的广阔平原。在该城的右面，美军和英军将并肩从“奥马哈”滩头南进，再往右，劳顿·柯林斯少将率领一个军在“犹他”滩头登陆后，以早日攻占瑟堡为其主要目标。因为加来地区驻有大量德军，敌人为了保持加来和诺曼底的交通，有可能在冈城一带集结重兵。还可以肯定，敌人会拚命固守瑟堡，不让我们利用这个港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希望快速进军和突然袭击会使我们及早占领冈城外面的开阔地带。据布莱德雷的估计，美军将在十至三十天内攻克瑟堡，究竟需要多少天，这要取决于我们运气的好坏。

蒙哥马利的详细计划还指出了据他估计我们在突击后的连续

时期内可能占领的地区。这些估计都标在“‘霸王’行动预测图”上。

当然,在各作战阶段范围上所标志的预计行动,并不是登陆计划的基本特点,因为首要的目标是突击和占领一个满意的和不可能摧毁的滩头阵地,有了这样的地方,我们就能尽快地组织今后攻占法国的决战。但进展的预测对供应参谋们总是有用的,因为一个总的概念多少能提出他们应该完成的职责范围,使他们可以据此计划自己的行动。预定的九十天的战线实际上比原计划略为提前就达到了,但要对更早期的军事行动作出预测,却证明是不可能做到的。由此便产生了一些困难。

已在执行的空军计划,要求进一步削弱德国空军,摧毁处于铁路和公路系统上的重要地点,以孤立被选作突击的海岸区。在进攻欧陆开始日,空军的任务是破坏敌人沿海防御工事中的选定目标,提供空中掩护,并在军队进入内陆时给予全面的战斗轰炸机的支援。

海军的计划是很复杂的,这是因为海岸区的地形和特点使海面只有很小的活动余地;此外,布雷区既稠密,又广泛。但在扫雷、护航、为进攻作准备的炮击、炮火支援以及全面防备敌人海面部队和潜艇部队等方面,仍然提出了一整套详细计划。后勤计划和其他任何计划一样广泛,运输、管理、军队的补给和物资的输送,无一不包括在内。

5月15日,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主持下,在圣保罗学校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英国参谋部和战时内阁的所有主要成员,此外还有英国国王和二十名左右的盟军将领。陆军元帅斯马兹和他的老朋友丘吉尔先生一起到会。在整个战争期间,我还没有出席过象这次有那么多要人参加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保证使前次会议上有疑问的地方得到澄清和纠正。它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使所有司令官注意最高统帅部的总的意图,让每一个司令官

对他能指望得到的援助有一个很完整的和全面的概念。会议还审核和批准了在向港口移动时期向小股部队下达的有关简明指示和注意事项的训令。保密是首要问题。

这次会议使我们有幸听到国王和首相的讲话。首相发表了一篇典型的战斗演说,其中有一句特别有力的话震动了我们许多人,特别是美国人。他说:“先生们,我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个军事行动。”这篇演说使我们感到意味深长的是,虽然他长时期怀疑过这个军事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原先曾主张进一步推迟它,以利于其他地方的战斗,但他终于在这最后时刻和我们大家一致相信,这个军事行动是取得胜利的真正战斗途径。整个会议包含着引人注目的重要性。它不仅标志着一切初期的计划和准备都已实际完成,而且看来,与会的数名司令官和参谋军官都详细地知道,在这个大规模军事行动中,他自己负责的那个部分能得到多大程度的援助,这样就增添了他们的信心。

在实际突击开始前,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部门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司令部设在南岸的朴次茅斯。这是我们主要的登船地方,海军也在这里设立了联络系统,使我们能够在进攻欧陆开始日的头几个小时内和大舰队中每一部分的进展保持联系。

在各作战参谋部已经移到朴次茅斯的时候,我觉得进攻欧陆开始日前唯一剩下要处理的重要决定是明确规定突击的日期和时间。然而,在利-马洛里空军上将的思想中,向瑟堡半岛实施空降行动是否明智这个老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后来,在5月30日,他来我处再次提出异议,反对把两个精锐师去作象他所说的那种“无益的牺牲”。他认为,瑟堡半岛的地形不宜于着陆,还有预计的抵抗,这两点合起来就是不可克服的极大危险。在英国空降师降落的左翼进攻地区,这种危险并不存在,所以估计伤亡不致于太严

重,但他估计,在美军方面,在空降部队着陆前,滑翔部队将损失约百分之七十,而伞兵至少要损失百分之五十。因此,这些空降师将不再有剩余的战斗能力,并且这一进攻不仅最终将牺牲成千上万的士兵,而且也无助于完成这次总攻。

利-马洛里的意见当然是真心实意的。他本人以勇敢著称,他只是出于责任感,才坦率地向我提出他自己的意见。

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加使人绞尽脑汁的问题了。如果我的这个技术专家的考虑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拟议中的战斗就比愚蠢透顶的事还要糟糕了,因为即使付出了预计的巨大代价,我们仍不能达到空降的主要目标。更有甚者,如果他所说的是对的,攻击“犹他”滩头大概就绝望了。这意味着,整个军事行动带有某种程度的冒险性,甚至具有蛮干的性质;这种情况预示着我们将遭到一场惨败,它可能就是盟军在欧洲的失败。

为了使这位空军司令在他的意见被否定后对这次军事行动不负责任,我指示他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一封信中,并且告诉他,在几个小时内他将得到我的答复。我没有和别人商谈这个问题。专家的忠告和意见不再有什么帮助了。

我独自走进我的营帐,坐下来思考。我一遍又一遍地检查每一步骤,差不多是按照这个军事行动中已规定的顺序检查的,但是检查得更加详细、更加周密。当然,我明白,如果我有意不顾我那位技术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而他的估计假若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我就应当背着良心上的沉重包袱进入坟墓,这是罪有应得,因为由于我的愚蠢和盲目,以致使数以千计的优秀青年遭到了牺牲。但是,问题还不止我个人背什么包袱,更重要的是,如果他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这次惨败的影响可能远不是局部的,而多半会蔓延到全军。



尽管如此,但最后我还是对以下几个关键的地方着重作了检查:

如果我砍掉这次空降行动,那么,我就要么取消对“犹他”滩头的进攻,要么将使那里的突击部队受到比预料中空降师可能遭到的更大灾难。

如果我取消了对“犹他”滩头的进攻,那么我就大大打乱了精心设计的计划,减少了在其他地方取胜的机会,使以后的供应也许成为不可能。再者,经过对整个宏大计划长时期的冷静考虑,我们已经一致同意,“犹他”之战是今后胜利的一个基本因素。放弃它确实意味着放弃我两年多来一直深信不移的这项计划。

最后,利-马洛里的估计毕竟只是一个估计而已,而且,我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经验无论如何不支持他的悲观论调。布莱德雷和李奇微,还有其他的空降部队司令官在这件事上始终支持我和参谋部,因此我受到鼓励,依旧认为利-马洛里是错误的!

我打电话告诉他,这次进攻将按原计划进行,我将立即书面批准它。后来,在进攻取得胜利时,他第一个前来见我,表达他的欢喜,并且表示了歉意,因为他曾认为,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之前最后的紧张日子里给我个人增添负担是必要的。

我们除了只等着作有关进攻日期的最后决定外,当然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们接待了许多重要官员的访问。我们的最后一个访问者是戴高乐将军,我们与他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牵涉到具体的进攻时间和登陆后立即要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的性质。戴高乐将军要美、英两国政府明确地、肯定地承认他是法国的统治者。他坚持说,只有他有权向法国人民发布命令,指示他们和盟军进行必要的合作。

罗斯福总统断然拒绝给予戴高乐将军以这种明确的承认。总

统一一如既往地强调指出,法国的主权属于人民,盟军进入法国,并不是为了迫使法国人民接受某个政府或某个统治者。因此他主张,我们的告人民书应当指出,我们随时准备和法国的任何团体合作,只要它们愿意参与这个摧毁德军的事业。他同意这样:如果法国的某些团体或者所有团体愿意追随戴高乐,我们可以通过他的领导进行工作,但总统不能同意把戴高乐强加于任何一个人。

试图制订一项既能使戴高乐满意,又不越出英、美两国政府所规定范围的方案的工作,主要落在我们统帅部的肩上,这使我们非常发愁,因为我们正在依靠法国起义者的大量援助。据说在布列塔尼地区和法国东南部的丘陵和山区地带,起义者的人数特别多。在这个方案上如果和戴高乐发生公开冲突,就会使我们遭到无法估计的损失,并将引起激烈的相互指责和不必要的牺牲。

参谋部认为,这场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究性的。可以认为,至少在作战的开始阶段,戴高乐将能成为使法国产生某种协调和统一的唯一权威,所以给予他所要求的那种承认不会产生危害。不过要他认识到,一旦法国解放,法国人民将自由表达他们的意愿去选择自己的政府和领袖。在我国政府的同意下,我们已经让戴高乐的代表凯尼格将军担任法国内地军的司令,他在盟军编制中直接归我领导。

我们特别希望戴高乐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和我一起向法国人民作广播讲话,要求群众避免在非关键时刻骚动和作无谓的牺牲,而在需要帮助时,仍应立即准备给予我们援助。我们在上级训令指定的范围内进行艰苦的工作,争取戴高乐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战役开始后,他虽然与我们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却并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

进攻欧陆开始日前在朴次茅斯的日子,还有许多其他细小

问题需要予以解决,但我们唯一能利用的6月初的日期,即5、6、7三天的天气,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号。

整个英国南部成了一座大兵营,塞满着等待最后出发命令的士兵,以及准备运往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堆积如山的物资和装备。这一整个地区已与英国其他地区隔开。政府设置了警戒线,任何人士未经许可不得在任何一方越过警戒线。每一座帐篷、兵营、停车场和每一支部队都被仔细地标志在我们的指示图上。每一支部队的预定行动都作了很好的安排,使它在抵达登船处时船只刚好能准备接纳。突袭部队集中的最南面的兵营,周围用有刺的铁丝网严密地围着,防止有士兵在一旦接到要他参加进攻的指示后离开兵营。这支强大的军队,犹如一根上紧了的卷曲发条,说实在的,真象是一条由人构成的卷曲的巨大发条,一俟发挥能量的时刻到来,它将以空前宏伟的两栖突击一举跃过英吉利海峡。

我们每天和气象委员会碰头两次。一次是晚上9时30分,另一次是早晨4时。委员会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领导人是斯塔格空军上校,他是一个性格倔强、行动机灵的苏格兰人。在这些碰头会上,每一点迹象都被认真地提出,由专家们周密地分析,再由与会的司令官仔细研究。随着关键时期的来临,紧张程度也不断增强,因为出现适宜天气的希望越来越小了。

为了决定把6月5日作为预定进攻日期的可能性,我们计划在6月4日晨4时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但是,有些进攻的分遣舰队已经奉命出海,原因是,如果整个部队要在6月5日登陆,那么驻扎在联合王国北部的一些重要部队不能等待6月4日凌晨的最后决定。

6月4日晨,司令官们开会时,我们接到的报告是泄气的。云层低,风大,波涛汹涌,这些情况预示着登陆是极其危险的。气象专

家说,空中支援既不可能,海军的炮火也将失效,甚至连驾驶小艇都是困难的。拉姆齐海军上将认为还能够驾驶登陆艇,但同意调整炮火有困难的这个估计。他的立场基本上是中立的。蒙哥马利将军很担心推迟行动会带来巨大不利,认为我们应该出发。泰德不同意。

我权衡了所有的因素,决定把进攻推迟。这个决定需要立即传达到已在海上的船只和军队,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即如果第二天有利于突击,他们能否在二十四小时后作好准备。事实上因为风暴关系,爱尔兰海面上的船只行动已是极为困难。他们成功地返回港口,重新添加燃料,为第二天采取行动作好准备,这些都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他们高超的航海技术、非凡的指挥才能和卓越的参谋工作。

6月4日傍晚的会议,对于翌日清晨的景况几乎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希望,这更增加了紧张气氛,因为延期的必然后果几乎可怕得不敢想象。

翌日凌晨3时30分,刮来飓风般的大暴风,把我们的营帐吹得东摇西晃,随之而来的便是铺天盖地的滂沱大雨。在泥泞道上走一哩多路到海军司令部去,这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看来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再来讨论形势问题了。

会议开始后,斯塔格空军上校和气象参谋给我们的第一份报告说,前一天预报的法国海岸的恶劣气候已在那里实际出现,如果我们坚持要在6月5日实行登陆,几乎可以肯定会遭到巨大的灾难。他们告诉我们这一点,可能是想使我们更加相信他们下一个惊人的报告。这第二个报告说,明天早晨,有一段时期天气较好,延续的时间大约会有三十六小时,这在以前完全没有料到。长期以来,天气形势预报是不好的,但他们使我们确信,这个短期的良好

天气将出现在我们目前这场风暴消失和下一个真正恶劣天气开始之间的时期内。

但前景并不是光明的，因为会出现这种可能：我们可以成功地把头几批部队送上岸去，但接着就会发现以后的增援不能实现，这样就只好使孤立的首批进攻部队轻易地成为德军反攻的牺牲品。但是，延期的后果有很大的危险，因此，我迅速宣布了将在6月6日发动进攻的决定。当时的时间是6月5日凌晨4时15分。到会的人没有表示反对，大家都喜形于色，二话没说就各回本职岗位，向部下迅速传达这个全军即将行动的指示。

许多人请求我允许他们乘支援的海军舰艇去观看进攻。参谋部的每个成员总是能够举出成打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特别应该随军远征，而不应该留在那个唯一用得着他的岗位即联络中心。除了那些负有特殊军事任务的人，当然还除了在分配名额以内的报刊记者和广播电台记者外，其他所有的人一概没有被批准。

在没有被批准的人当中有首相。他的请求无疑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他的战士本性使然，二是他不愿怀着急躁心情静坐在伦敦后方等候战报。我争辩说，万一他有个不测，从整个战争行动看，损失就太严重了，因此我拒绝了他的请求。他完全正确地回答说，两国政府授权我单独指挥作战，这种权力并不包括对英国政府的行政控制。他说：“既然这是实情，我亲爱的将军，你就没有责任来决定英王陛下舰队中任何一艘船上的全体船员的精确编制。”他更狡猾地继续说：“如果我自己是一艘船上定额中的一个正式成员，你就没有权力阻止我乘船前往。这是实情。”

所有这些，我不得不懊丧地承认，但我有力地指出，他这样阻挠我的训令就是给我增加负担。但是，当我在这件事上正要自认失败的时候，却来了一个预料不到的援助。我后来听说，英王知道了

首相的意图,但他没有擅自阻止丘吉尔先生的决定,而是通知说,如果首相认为有必要亲自出征,那么英王本人也认为有同样的责任和特权率领军队去参战。这使事情立刻变了样,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谁提起过这件事。

虽然如此,我还是完全同情首相的。现在我又必须忍受这段冗长的等待时期,这段时期总是从最高统帅部作出最后决定起,一直持续到这类军事行动的胜负开始显出眉目为止。我把这段时间用来访问那些将参加突击的部队。在5日深夜的一次访问中,我来到美国第一〇一空降师的兵营,它就是空军司令非常怀疑应否参加战斗的部队之一。我发现士兵们斗志昂扬,不少人开玩笑地劝我不必担忧,因为第一〇一师正整装待发,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我和他们一直呆到最后一人登机升空,那时大约已是深夜了。经过两个小时我回到自己的营地,这时,只要很短时间我就可以等到第一批战地消息了。

## 第十四章

### 进攻欧陆开始日和攻占阵地

第一个战况报告来自几个小时前我刚刚访问过的那个空降师，语气非常令人鼓舞。当早晨缓慢地过去时，看来登陆进展得很顺利。蒙哥马利乘一艘驱逐舰巡视滩头，并且想找个地点设立他的前线指挥部。我答应第二天访问他。

“犹他”地区的战斗是两栖登陆和美军空降部队的协同作战，正如最左翼的战斗一样，进展是令人满意的。但白天的战况报告表明，“奥马哈”地区的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我决定第二天早晨就去那个地点。

我们乘一艘驱逐舰前往，抵达后发现，突击“奥马哈”的第一师和第二十九师终于击溃了敌军，正在迅速向内地挺进。许多孤立的据点还在坚持抵抗，其中有些据点不断用令人恼火的炮火轰击我们的滩头和登陆船只。我趁机和布莱德雷将军会晤，发现他还是象以往一样勇敢，对结果满怀信心。事实上，我们在“奥马哈”滩头遇到的反抗，大约相当于我们曾担心在整个战线上会遇到的那种激烈程度。德军确信，我们不会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发动进攻，这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突袭成功的确定因素，也多少说明了我们在大多数滩头上未遇到猛烈反抗的原因。“奥马哈”地区的战斗之所以有些激烈，是因为那里敌人有一个警戒师，即第三五二师。据俘虏说，这个师曾在这个地区进行过操练和防御演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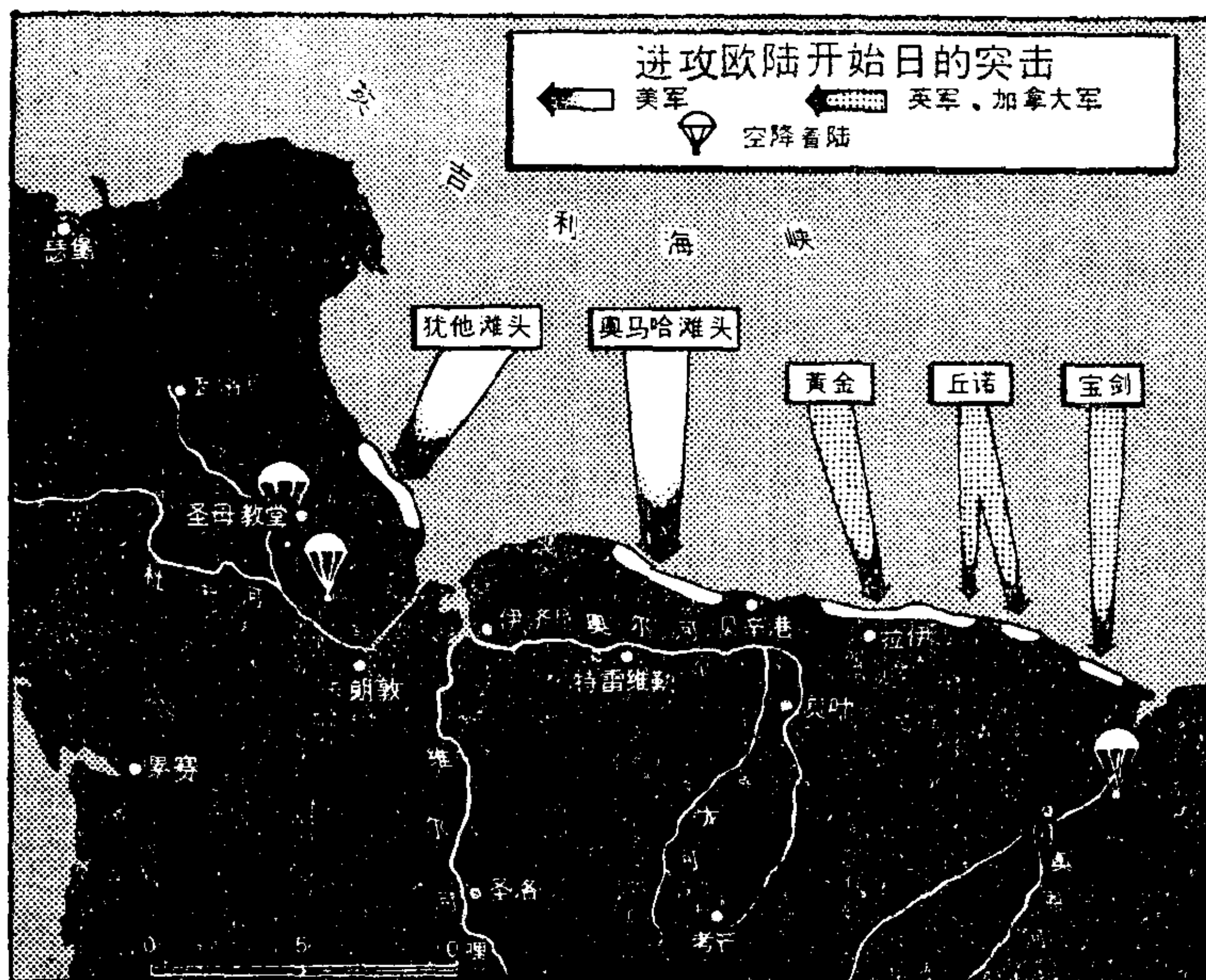
我用一整天的时间巡视了所有的滩头,并寻找机会和包括蒙哥马利在内的各主要司令官举行会谈。傍晚,我们的驱逐舰在沿海岸高速行驶时搁了浅,受到严重损坏,因此我们只得另换船只返回朴次茅斯。

以后的几天充分考验了增援计划的健全性;为了制订这项计划,我们曾孜孜不倦地花费了许多个月的时间。总的说来,它非常出色地经受了考验,但战场上到处出现的临时情况,要求对计划作细小的修改。由于我留在朴次茅斯,使这项计划的修改得以迅速而顺利地完成。

在执行这类计划时,预料不到的困难肯定是有的;而这种困难往往牵涉到两个以上的军种。如果最高统帅部对形势时刻保持警惕,能够立即作出决定,防止困难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那么困难就很容易解决。例如,船只运转超过了计划的海军时间表,或者装卸设备遭到了破坏,船只就会在登陆地点或上船地点拥塞起来。当时间紧迫而运输又受到阻塞时,这就是浪费。如果不是某个权威人士立即作出必要的决定,就可能产生混乱。为了处理这类困难,成立了一个有各军种代表参加的参谋机构。通过这样的机构,就能满意地解决这类问题,如保证在港口的军队和物资的使用和装运,协调军队、物资的运送和船只的抵达与启航。一旦困难的初期阶段过去,我们的麻烦就会大大减少。

我们不久获悉,在进攻前的长期准备时间内,华盛顿也出现了紧张。我们刚登上滩头,马歇尔将军、金氏海军上将、阿诺德将军以及由他们各自的参谋人员组成的一个参谋小组来到英国。我安排他们6月12日去滩头阵地。他们怀着极为满意的心情巡视各处时,使所到之处的军队受到了鼓舞。最高统帅部的这种访问——有时包括政府的最高级官员,对鼓舞士气所起的重要作用,无论怎样估





[按原图译制]

计也不会过分。每当士兵看见高级官员在他附近时，就有一种满意的感觉。这可能是出于这种见解：显贵人物来的地方总是安全的。

从进攻欧陆开始日到7月25日这段决定性的突破时期，是盟军行动的一个特定阶段，它被称为“争夺滩头阵地之战”。

无论是军人或是非军人，对于过去战斗的兴趣，总是要么集中在战争发生时并没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要么就集中在给战斗参加者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的问题上。浩若烟海的分析研究著作——且不谈抨击和反抨击的作品——经常注意的是某个思想的创始人，形势的发展与原定计划是否符合的详情，作出某项决定的动机以及某个人对某件事的影响。

“争夺诺曼底滩头阵地之战”证明没有离开这一规律。大量的废话和攻击，以及许多经过苦心研究的、客观的著述，都被用来支持

某些有关争议事件的不同理论,而这些事件如果在当时就被认识到往后会有特殊的价值,那就会被记录下来,后人就可以根据文字史料一劳永逸地予以解决了。

幸而参加战争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很客观的,在作战期间对历史的判断,看来并不象争取胜利那么重要。此外,由于缺乏时间,还由于要求所有司令官和参谋军官集中精力于作战,这就妨碍他们把每日每时发生的事都记录下来。很多重大的军事行动是口头联系的,常常没有记录。即使给大部队的作战命令,也往往是在一次详细的讨论会上发出指令以后才记录下来的,也没有实际讨论的笔记。再者,后人的好奇心所关注的往往是某个想法和主意应负的责任,而不是事件和结果本身;这样,也许甚至最辛勤的记录员也不能对一场战役中的一切事件都写下任何清楚的、无可争议的记载。

我确信,关于计划和决定的产生,一般没有哪一个司令官能够发誓说某项计划或某个概念是出自他本人的思想。他对他所负责的事务的操虑已到了如此全神贯注的程度,以致于处在这样地位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在事后断言,某个最后演变为一项伟大计划的主张,最初是发端于他自己的头脑,还是起源于别人的建议。他应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广开思路,避免把必要的坚定性同顽固的成见或悖理的偏见混为一谈。

另外一点是,一项确定的战斗计划或战役计划同希望达到的最后结果之间,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把军队投入战斗总有某些最低目标有待达到,不然,这场战斗便劳而无功了。进一步便可实现合乎情理的期待,再进一步更可实现所怀的希望——如果我们始终吉星高照,这一切都是可能实现的。

一般说来,一项作战计划甚至要为这最后一个方面提供指导,

这样,就不致于因为部队不明白司令官的意图而丧失可资广泛利用的战机。计划的这些方面并不包括死板的指令,它仅仅是个路标。一项周密的作战计划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要有伸缩余地,这样才能适应战争中不断变化的情况,从而完成司令官指定的最终目标。顽固僵硬必然会自取失败,有些分析家把改变一项计划的细节看成是计划缺点的证明,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战场上的特点。

“争夺滩头阵地之战”是一个不间断的、猛烈的战斗阶段,这场战斗除了攻占瑟堡外,很少占领地方。但正是这个阶段为以后辉煌壮丽的解放法国和比利时之战作了准备。在往后的整个战争期间,有许多对我们大有裨益的发展——包括物质方面的和理论方面的——,都得归因于那时对滩头阵地的争夺。

蒙哥马利获悉他在沙漠中的老对手隆美尔将在战术上指挥防守部队,就预言敌人行动的特点是把从师一直到营、甚至到连的任何立即可用的部队投入连续的攻击。他不相信在隆美尔领导下的敌军有可能老是选择一条天然的和坚固的防线,然后沉着而耐心地着手组织最大的兵力,向我们的滩头阵地发动全力的进攻。蒙哥马利的预言完全应验。

从我们登陆的那天起,除了在一些孤立的据点外,战斗从来没有达到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地战的程度。但我们绝不会忘记存在着最终出现这种局面的可能性,特别是我们的英国战友对维米岭和帕斯舍德尔记忆犹新。

布莱德雷曾预测瑟堡的攻占将是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为了在该地及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既要依靠突击部队的兵力,又要指望速度和勇敢。他的估计是:“如果我们运气好,十天就行,如果我们运气不好,就要三十天。”当然,所有这些预测尤其要取决于我们在保持增援计划方面的好成绩。登陆计划表十分详尽地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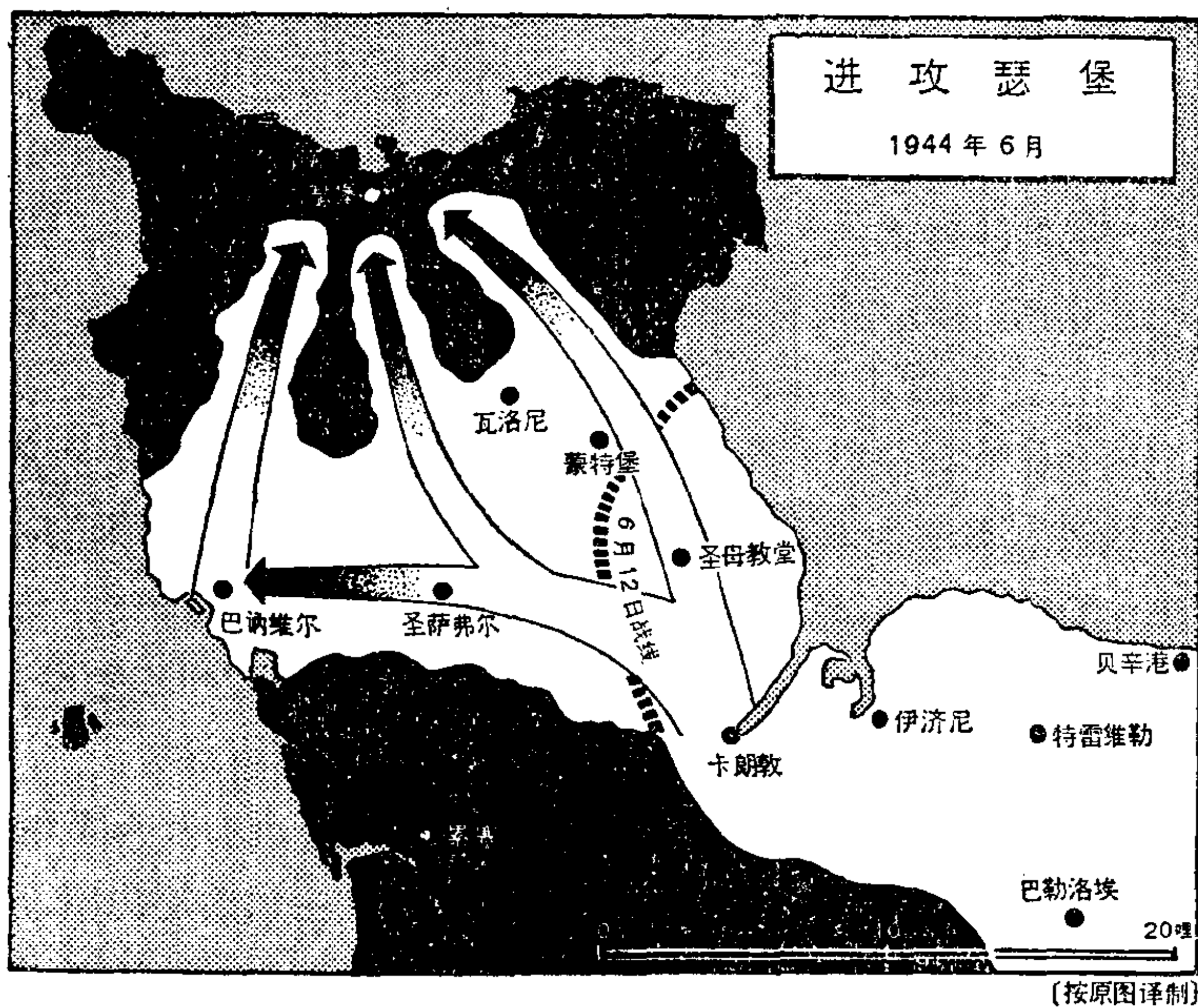
了我们需要的弹药和其他供应,其中还插进了每日每时即将抵达的各种预定数量的战斗部队。那些弹药供应不仅是用来进行逐日的战斗的,而且当我们一旦进入战斗的决定性阶段时,还要用作提供持续战斗的储备物资。

在东侧,冈城并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在首次冲击时就落入我们的手中,因此我们后来无法在该城南面和东南面取得进展,我们原来曾计划在那里及早发挥我们的坦克和战斗机的力量的。可是该地的战斗达到了持续的和猛烈的程度。隆美尔顽强抵抗,随着战斗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为什么他必须这样做。

为了援助受攻击地区的师,敌人首先把能够从布列塔尼半岛抽调出来的部队全部投入了战场。然后,又从法国南部和荷兰、比利时分别调来了一些师。敌人在西北欧唯一剩下没有投入战斗的主要后备部队,直属于德国第十五集团军,就驻在加来及其附近。为了保持和这些部队的联系,敌人必须守住冈城。如果冈城失守,敌人的两支主要部队就会被分割,它们都必须向后猛撤,才能在以后共同作战。因此,敌人把最强的和最精锐的师急忙调往冈城,并为固守到底作好各种准备。

我们在东线夺取直接的战术目标所遭到的挫折,并没有改变作战计划的总意图。它只是说明下面这个古老真理的又一个例子:每一项作战计划的内容,只是按照司令官对所期望的目标和必要的兵力、物资作出的估计,把军队顺序投入战斗,但始终可以肯定,敌人的反击势必要求司令官不断进行战术上的调整,以适应当时的需要。当我们一旦确定敌人打算不惜代价死守冈城,并把它作为作战枢纽时,那么就让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该地以利于所有其他盟军进行战斗,这样形势就立刻变得对我们有利了。

在尽西侧,柯林斯将军的第七军起初一直向西进攻,把半岛分



成两半。然后他迅速转向瑟堡，但仍必须在他的南侧建立一条安全线，以阻挡企图进入该半岛的敌人援军。

1944年6月12日，叫做V-1的第一枚飞弹落在伦敦。V-1飞弹是一架小型的无人驾驶飞机，它以很高的速度按预定路线飞行，并靠内部机械设备中止航程。它装有大量炸药，靠接触爆炸，爆炸力非常大。第一枚V-2飞弹到8月初才使用。它是一枚火箭，射入高空，以很快的速度下降，它快来到的最初警告就是它的爆炸。在飞行时，既无法听到它，又无法看到它，更无法阻截它。因此，它从来不像V-1飞弹那样吓人。

V-2飞弹在它直接命中建筑物时，破坏力特别大。由于速度快，它深深地穿到地下，巨大的爆炸力直接向上发挥。因此落到空旷的地方效果较小，但命中一座建筑物时，其爆炸力巨大到可以

把建筑物差不多彻底炸毁。

由于我们在春季空袭了那些我们怀疑是制造这些武器的地方，所以它们的发展和使用时无疑地被大大推迟了。我们知道德国的佩内明德是德国最大的实验工厂之一，于是我们定期派大型轰炸机队予以袭击。我们认为，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也是可疑的。其中一个是在挪威的特隆赫姆，我们认为德国人在那里研制原子武器。我们还轰炸了欧洲西北部沿海的可疑的发射场，根据侦察照片，表明那里有很多设备和装置是不能以任何已知的武器来解释其用途的。这些地区遭到不断的袭击。

新式德国武器对士气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大不列颠曾经遭受过可怕的空袭。但盟军于6月在诺曼底海岸登陆成功后，平民确实感到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不仅期待着胜利，而且希望以后不会再遭到空袭。当新式武器开始大量袭击伦敦时，他们的希望破灭了。的确，飞弹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影响并不限于平民群众；前线的士兵也开始担心家里的亲人和朋友，很多美国士兵曾用忧虑的语气问我，能不能告诉他们有关他们曾在英国南部驻扎过的一些城市的消息。

看来，如果德国提早六个月制成和使用这些新式武器，我们向欧洲的进攻将会极其困难，甚或根本不可能。我敢肯定，如果他们已成功地在六个月的时期里都使用这些武器，特别是如果他们把朴次茅斯和南安普敦地区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那么“霸王”行动可能早就夭折。

防御V-1飞弹的措施立即达到非常有效的高度水平，但是尽管如此，在白天和夜晚的任何时候，在各种气候条件下，V-1飞弹袭击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这些身处战场的人很想攻占那些向英国南部发射这些武器的地区。然而必须称赞英国的领袖们，因为

他们当中从未有人仅仅为了要消除这一祸害而要求我改变作战计划的任何细节。

6月18日，蒙哥马利仍然认为有条件使我们早日攻占冈城。那天他的指令说：“很明显，我们必须现在攻下冈城和瑟堡，作为彻底完成我们计划的第一步。冈城无疑是攻入瑟堡的关键……”在同一指令中，他向英军发出了如下的指示：“当前本军的任务是攻占冈城。”指令的最后一句是：“我希望冈城和瑟堡到6月24日都能攻占。”

在我们的左翼，德军的装甲部队和防御部队不断挫败我们的意图，但瑟堡港在6月26日，也就是在登陆后刚好二十天被攻占了。柯林斯将军曾向它发起了无情的进攻，此战的结果证明了他的绰号“闪电乔”是名副其实的。最后的突击得到了海军炮火猛烈而准确的巨大支援。

说到运气，布莱德雷对这个不可捉摸的因素的影响有他最低和最高的估计，我们大致是处在这两者之间。我们的好运气主要表现在下面两点上：第一，我们在德军认为不宜于进行大规模两栖作战的“犹他”滩头实现了奇袭登陆；第二，我们用几乎空投在半岛中心的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两个空降师进行了有效的奇袭。我们的坏运气表现在6月19日所遭到的风暴袭击。在四天时间内，它差不多使一切滩头上的登陆活动停止下来，因此严重干扰了所有的军事行动；风暴来势之猛，使攻击战的进展极为困难。

在那个时期，联合王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海上交通完全中断，我们在滩头阵地上修筑的小型跑道根本不能降落飞机。美军战区内的“奥马哈”滩头上的“桑葚”人工码头被毁坏得无法修理。大量的船舰和小艇搁了浅，或者被刮到海滩上。

如果不是以前空军进行隔离战役所收到的效果，那么这时候

德军就有了理想的反攻条件。和以往一样,在这里还要强调空军威力对地面战斗的决定性作用。

风暴结束的那一天,我乘飞机从我们滩头战线的一端飞到另一端,点了一下数,有三百多艘比小艇大的船只毁坏了,其中一些破坏得很厉害,无法修复。

风暴袭击时,美国第八十三师仍在滩头附近的船上。大批下船根本办不到,因此在整个风暴期间这个师经历了最困苦和艰难的时刻。在他们最终都上岸的那一天,我巡视了该师的士兵,发现他们许多人还在晕船,暂时仍疲惫不堪。

在战争中,没有其他任何景象象登陆滩头上的船艇残骸那样使我体会到美国的工业能力了。要是任何别的国家遭到这次灾难,那将会是决定性的打击;但美国的生产能力是那样强大,以致这次大风暴在我们增援的进程中,犹如一阵小小的风波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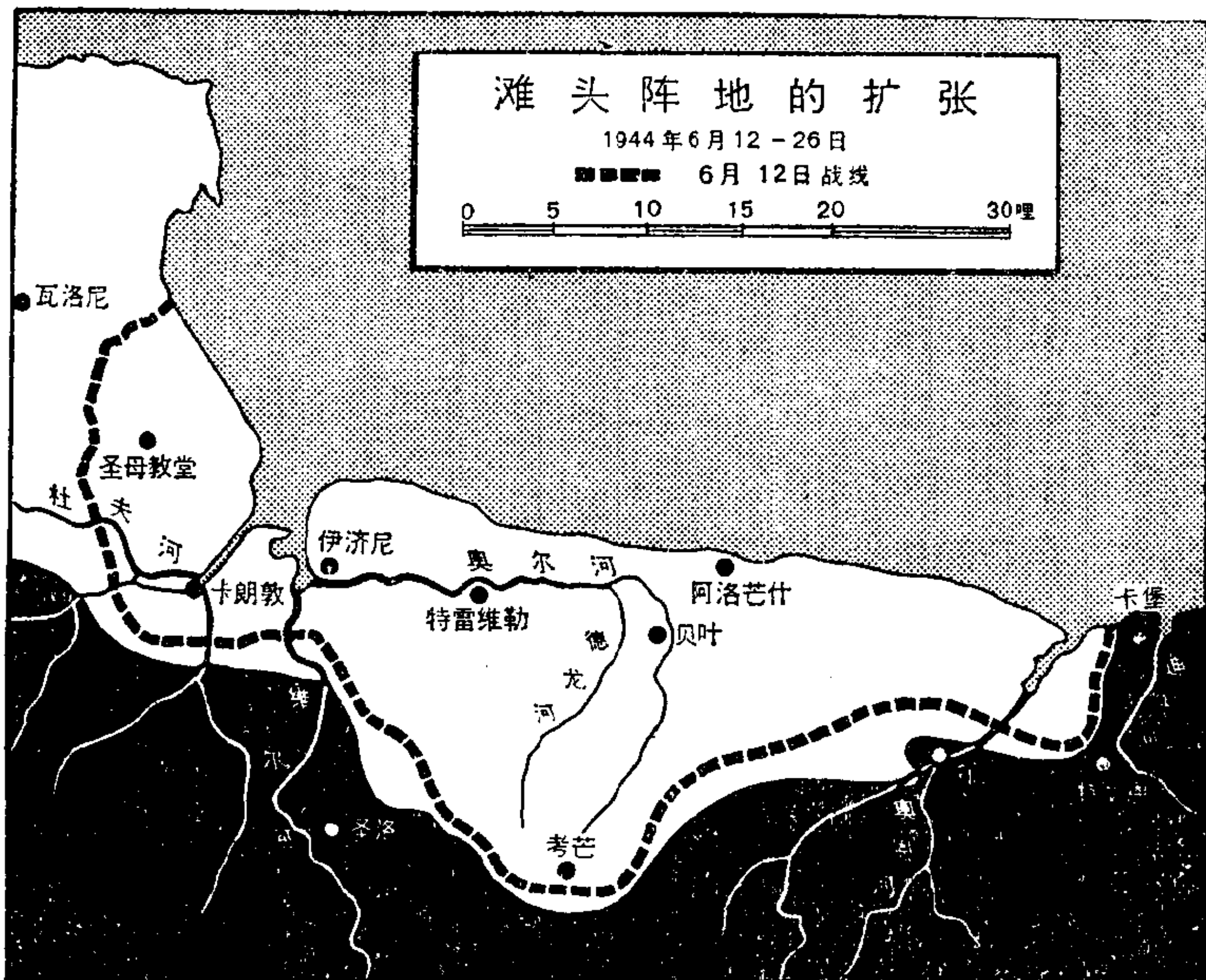
攻下瑟堡后,立即开始重建港口的工作。德军已对港口进行了严重破坏,并在港口及其入口处布下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水雷。有些新型水雷必须要深海潜水员潜入海底拆卸后才能扫除。瑟堡港的扫雷兵和深海潜水员的工作,是战争中引人注目的、英勇的事例之一。

在美国第七军攻占瑟堡所需的二十天时间内,在全线上的所有地方战斗一直没有停过,任何地方都只有局部的进展,冈城战区差不多处于僵持状态。示意图表明了我们在6月12日和26日两个时期的战线。

蒙哥马利对东侧英军和加拿大军的战术指挥,以及使这些行动和西面美军行动配合,正是他的擅长。他很了解英国士兵的个人误差<sup>①</sup>,因此他的部队尽管遭到挫折和损失,士气仍然很高,如

<sup>①</sup> 指个人对客观现象反应迟钝的程度。——译者注





(按原图译制)

果司令官并不拥有士兵们的绝对信任,那么这些挫折和损失就很容易使部队发生动摇。

布莱德雷将军具有有决心、有魄力、富于专业才能和善于理解人的长处;他的部下和上级对这些长处都看得很清楚,因此,美军在诺曼底滩头阵地许多战场上形成的协力合作,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动摇。他当时在指挥第一集团军。年轻而有朝气的空军司令埃尔乌德·奎萨达少将负责直接支援他的战术航空队。他们之间产生的相互信任,他们为战场的协作所制订的制度和办法,以及他们灌输给所有部下的思想,与我在战争初期遇到的其他情况相比,成了令人满意的对照。海军也完全协调一致。在统一指挥下行动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在欧洲的成就,大大加强了我坚定的决心,这就是主张在战后的华盛顿设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战斗的初期,我几乎生活于不断的来回奔波之中。在访问了蒙哥马利、布莱德雷或前线的部队后,紧接着的便是在朴次茅斯统帅部的活动时期,那里的工作是协调和调整航运事项和计划的主要阶段,其间还穿插了无数的会晤和会议。与此同时,我当然还经常需要巡视仍在英国、但预定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

有一件事使我个人感到高兴,并且也表示马歇尔将军始终关心他的部下,那就是我的儿子在6月中旬抵达这个战区。他在进攻欧陆开始日那天从西点军校毕业,经过马歇尔将军的同意,他获准在战场上和我度过短期的毕业假期,但要及时赶回美国参加7月1日的高级训练。他跟着我到处巡游;他唯一失望的是我拒绝干预一个年轻毕业生的正常经历,不肯把他分配到当时在欧洲的一个步兵师去。

英军和美军不断地集结兵力。尽管19日大风暴起了干扰和破坏作用,但所造成的耽误只是暂时的,对实现最后计划没有多少妨碍。

生力军的不断到来使我们得以保持攻势,但进攻是在不利的地势和气候条件下开展的。在东面,我们这时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多地牵制德国的兵力,而在西面则全力推进,这样才能发起最后的、协调一致的进攻,以突破受压缩的滩头阵地。

6月末对我们所有人说来是一个困难时期。在我们的高级来访官员中,不止一人开始担心我们已陷入困境,担心这种形势将证明那些预测“霸王”行动前景黯淡的人是正确的。一场进攻大陆上大片陆地的两栖作战,往往冒有在滩头阵地遭到封锁围困的巨大风险。部队和给养的集结,对于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机动战斗是必需的,然而必须以取得充分的活动空间为其先决条件。

当供应和增援的可能性和地形都对防守有利时,尽管登陆成

功,还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战场反倒很容易成为进攻者逐渐消耗力量的伤口,而不成为打击防守者主力部队的一场毁灭性战役的揭幕场所。这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在加利波利的经验,这个经验于1944年初期又部分地在安齐奥战役中重复了几个月。当然,这种可能性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以前很久就已被彻底研究过,并且还设法防止过。我们要不使这种可能性出现,主要凭借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使用前者,我们确信能破坏敌人的供应和交通,阻止敌军的移动和摧毁构筑的防御工事。通过海军兵力和人工港口的建造,我们有了一套牢靠而有效的供应和增援系统。因此,我们有信心在扩充力量的竞赛中肯定获胜。此外,还有一个可能的针锋相对的行动是向布列塔尼半岛进行配合性的两栖攻击,也可能是空降袭击。

最初的计划就已特别强调过该地区一些港口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如果敌人撤除那里的防卫,而设法在我们诺曼底登陆部队面前建立一条攻不破的防线,那么我们就能够突入布列塔尼地区,从翼侧和背后威胁敌人。与此有关的是,我们已经知道,德军在撤出一个港口时总是蓄意使那里变为一片瓦砾和废墟,使我们难以迅速修复;因此我们在布列塔尼选中的一个对供应和增援最有利的特定地点是基勃隆湾,它位于半岛底部南侧,是一个巨大而有良好掩护、但又未扩充的港口。

当6月逐渐过去而7月到来时,我们密切注视着形势,以确定进行一次配合性的登陆是否对我们有利。我越来越反对这个登陆行动。理由之一是,我们的空军和我们的迷惑性的威胁正在阻止德军在我们诺曼底登陆部队面前设立一条坚固的防线。还有,我知道发起一次配合性登陆的任何尝试,都会耽误主要战线上军队和物资的直接补充。我仍然认为我们以后必须尽量使用布列塔尼的一

些港口,但我相信,若要更快占领这些港口,只有通过不断的进攻,而不是为了作配合性登陆而在主要战线上减轻我们的打击力量。

我在法国度过很长时间,经常和布莱德雷将军和蒙哥马利将军讨论有关计划中的作战时间和兵力。和布莱德雷会晤始终是愉快的,因为他和我一样喜欢巡视前线,并与那些实际担负战斗任务的士兵们谈话。整个战争期间,我们私人之间的多次讨论,就是在我们经常视察作战部队的途中进行的。

我在法国各地巡视时,陪同我的一个士官是摩托警卫,名叫西德尼·斯皮格尔。他本人的忠诚以及为保卫和协助我所费之心机是没有止境的。他总是特别注意他的军人仪表,不管旅途条件多么恶劣,在抵达目的地时,他总是抓紧时机擦亮他的摩托车,使自己成为军人仪表的典范。当我们最后分手时,我失去了一个忠诚的朋友和可贵的助手。

这个时期内,我与布莱德雷和蒙哥马利两人一直保持着信函、电话和无线电的联系。到6月底,滩头阵地仍然严重地受着压缩,以致不容许把最高统帅部着手迁往法国,但为了和高级地面司令官经常接触,我在7月把我个人的统帅部分部搬到法国。为争夺阵地以及增强力量而进行的战斗,有时进展缓慢得令人失望,因此引起了英、美两国报纸的尖锐批评。评论者自然不可能了解真相。如果战争中一切事情都尽人皆知,那就没有机会使警觉的敌人感到意外了。

可是,在暂时的僵持阶段,当士兵遭到伤亡,同时听说他们的司令官受了批评时,始终存在着维持战士的斗志的问题。评论者的声音通过战士们经常带在身边的小型收音机,传到了每一个班和排。

有些士兵的家属相信了一些不可能的事,他们也把那些吹毛

求疵的批评从信中告诉了士兵,于是这种批评的影响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影响在新兵中比在老兵中更要严重得多。老兵的态度充分地体现在一个士官有一天对我的谈话中;这个士官和他所属的铁道兵部队正等待着到前方去进行某项必要的工程。他说:“将军,这项任务从地图上看起来是容易的,可是现在德国兵似乎也想对它有所表示哩。我们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只要来一场振奋人心的大胜仗就都给治好啦!”

## 第十五章

### 突 破

诺曼底战役的一个首要的紧急任务是，在瑟堡和奥恩河口之间的地区，建立一个有适当供应线的可靠滩头阵地，这个任务于6月底全部完成。

从一开始，蒙哥马利元帅、布莱德雷和我的想法是，从滩头阵地开始的这个大规模行动，最终将是向左大旋转进攻，把我们的前线推到塞纳河一线，这样，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向东远至巴黎的这一整个地区就在我们的牢牢控制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采纳了某项严格的和宏伟的战术计划。这只是一种估计，因为我们相信，一旦我们能集中全部空、陆、海军力量去打击预计在法国西北部遭遇的敌人时，情况将会是这样。

我们估计中的一个重要之点是建立一条冲击出发线，由此实施原来打算的这个大旋转进攻。我们战术预测中的这个部分并没有实现，因此需要进行调整。蒙哥马利于5月15日正式提出的那项计划指出：“一旦我们能控制住敌人在格朗维尔—维尔—阿尔让唐—法莱斯—冈城的主要侧面，并使这个范围内的地区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那时，我们将有一个我们需要的、能够开始向外扩张的据点。”

我们希望在6月23日，或者说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之后的第十七天建立这条战线。蒙哥马利在4月7日的一次更加详细的计划

说明中指出,这一军事行动的第二大阶段预计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之后的第二十天不久开始,这个行动要求英国陆军以其左翼在法莱斯站稳,“以其右翼向阿尔让唐—阿郎松迂回”,这就是说,在这个大旋转进攻开始以前,法莱斯将在我们手中。但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以后的第五十天发动突破时,我们实际上掌握的战线大致就是原计划规定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后第五天要占领的那一条战线。

这虽是事与愿违,但必须承认,打仗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这是战斗,是一再反复的互相比较,因为作战双方都想占领阵地和夺取其他有利条件,从而使各自的对手遭受最大限度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冈城地区在敌人看来是重要的,所以敌人使用重兵防御。因此,要夺取这个地区暂时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夺取,那么至少要进行一场代价非常高的战役。

自然,形势的发展造成了困难。如果我们在突击一开始就成功地取得了冈城南部的广阔地带,那么,美军向阿弗朗什地区的进攻将仅仅是一场对德军的追击战,而不象当时那样成为一场艰巨的战斗。这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在我们左翼取得较大的胜利,那么在右翼就能较容易地取得一条满意的冲击出发线,从这里发动这个大旋转进攻。

在登陆开始以后,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消逝,报纸对我们左翼缺乏进展特别表示不满。当然,我和我的所有高级司令官及参谋人员也非常关心冈城附近的僵持局面。我们想了各种可能的办法企图打破这一僵局,我也一再催促蒙哥马利尽力加速和加强他的作战行动。蒙哥马利在炮兵和空军的英勇而猛烈的支援下,一再发动进攻,但仍没有摧垮德军的抵抗。

此外,我们应当知道,当敌人加强行动或者集中力量顶住我们的一部分力量时,一般就没有力量再去适当地支持这个战场的其

他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当前的突破情况远远落后于原来计划,但是很明显,如果大量敌人部队在冈城的前线被牵制住,那么在西侧抵抗美国纵队的敌人兵力就会更少。从美国部队必须通过的地区的困难条件来看,这确实是个幸运。对于这种形势,我与布莱德雷和蒙哥马利是经常讨论的;后者当时仍在负责拥挤的滩头阵地上地面部队的战术协调工作。

布莱德雷和我早已认为,突破必须从范围更加狭窄的战线上开始,而蒙哥马利到6月30日也明显地承认了这点。他在那天发出的指令明确地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敌人兵力,位于左翼的英国第二集团军要继续不断地进攻,而在四天以前占领瑟堡的美军,将开始向南面进攻,以期在右翼实施最后突破。从此以后,这项具体的战斗计划没有变动过,虽然地形的性质、敌人的抵抗以及气候条件把我们最后的总攻击拖到了7月25日,但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在争夺阵地和集结必要的后备部队。

当然,这样就给美军一个比最初所预测的更加繁重和更加麻烦的任务。然而,布莱德雷完全了解当时的战局,并且早在6月20日就向我表示,他认为,应在圣洛阵地附近发动右翼的突破,而不是在原来计划的更南面的战线上发动。他以他一贯沉着的态度对待这一任务,并且熟练地着手执行这项任务。他给全线分配弹药,为各条战线调配部队,而且经常使他的战斗部队和后勤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只要一旦有机会,就全力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

在这个小树林地区布满着难以通过的灌木树篱,这使美军前方的突破成了更加复杂的问题。这个地区的田野,在过去数百年中被分成许多小块土地,有的超不过一幢房屋的面积。每一小块土地都围有密密层层的、一般长得比地埂高三、四呎的树篱。有时这些树篱和地埂形成现成的壕沟,因此,自然而然地给战场提供了几乎



是主要的掩体和天然伪装物。几乎在每一排树篱中都隐藏着敌人的机枪手和战斗小分队,当我们的步兵沿着所有进攻途径匍匐前进时,敌人就能处在有利的地形杀伤我们。

我们的坦克也帮不了多大忙。一辆坦克要想通过一排树篱,几乎必须垂直爬登,这样就暴露了它腹部的要害部位,从而成为任何类型的穿甲弹都可轻易击毁的牺牲品。还有一件同样使人恼火的事是,它的炮口朝天就无法向敌人开火;坦克手既难以保护自己,也不能消灭德军。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有一名叫丘林的美军士官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发明,这样就恢复了坦克的有效性能,并且大大地激发了整个陆军的士气。这个办法只是在坦克的前面安装上两把坚固的钢刀,它们起着有些象镰刀的作用,可从地埂和树篱中砍出一条道路来。这样,不但能使坦克一边开炮一边平稳地穿过障碍,并且还能把砍下的树篱当作天然的伪装物,带着它向前推进一段距离。

当丘林士官把他的发明向他的上尉进行示范操作时,立刻引起了第二师的沃尔特·罗伯逊将军的注意。他又把这一设计向布莱德雷作了示范,后者就布置任务,要求尽量把坦克都照这样子装配起来,准备以后的战斗。这件事有一个特点,使我们的士兵感到甚为高兴,即制造砍树篱的刀所用的钢材,正是德国人在诺曼底为了阻止我们登陆而在海滩广为设置的障碍物。

然而,当第一集团军为取得一条适于发动大攻击的冲击出发线而开始缓慢地向南推进时,我们还没有这种发明。要看到战斗地区的真实情况是困难的。有一天,我们几个人来到位于一座小山顶的瞭望塔,这里比周围树篱高出大约一百呎。但我们的视野仍受到限制。于是我到空军部队,登上一架战斗机沿着前线视察,想对我们的遭遇有个清晰的印象。但不幸得很,即使在高达数千呎的有

利地势,也没有看到多少对我有帮助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远射程的骚扰性射击外,我们不能期望大炮发挥什么效果。这是一场最险恶的和顽强的步兵战。参加这一战斗的每一个师,经过这次作战都锻炼得坚强、善战和富有自信心。

战术、后勤和士气这三者,是高级司令官和参谋人员时刻注意的问题。战术就是尽可能取得最好的战线,由此对包围我们的敌人发动强大的攻势。后勤就是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准备大量物资和调进我们将来需要的后备部队,以便使我们的进攻成为决定性的。士气是我们始终关心的问题,因为部队被用来不断参加艰苦的战斗,但是得不到经常增加军队锐气的那种令人满意的重大进展。到1944年7月2日,我们在诺曼底登陆的士兵约为一百万,其中包括十三个美国师、十一个英国师和一个加拿大师。在这同一时期,我们把五十六万六千六百四十八吨物资和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二辆车辆运上了岸。这虽是一项非常困难和耗费精力的工作,但这项工作的完成,使我们在最后准备对敌人发动全面进攻时获益非浅。在最初三个星期内,我们俘虏敌人达四万一千名。我们的伤亡总数为六万零七百七十一人,其中有八千九百七十五人死亡。

在夺取滩头阵地期间,我军的一个显著发展是在直接支援陆战方面不断对空军的使用。但在那时,要使地、空协同作战达到完备程度,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

当一架战斗轰炸机的驾驶员在地面上找到目标时,他很可能认错。他那时也许在一万至一万五千呎高空飞行,如果没有良好的能见度,很难辨认地面的精确地点。由于他急于支援步兵战友,也许会在突然间断定他所看到的地面上的大炮、卡车或部队是属于敌人的,就在作出这种判断的时刻,他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俯冲。一旦他作出了判断,他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他的目标上;他要达到的

目的就是在他能利用的一瞬间造成最大可能的破坏。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和学习,并有各种适当的机械帮助,才能把作出错误判断和攻击自己部队的危险性减少到最低限度。

我们使用过这样一个办法,即在属于进攻部队的一辆坦克中设立一支对空联络队。每一个联络队有一台与空中飞机通讯用的无线电,通过这一方式,我们不但避免了意外事故,而且还能为飞机指引特定的和有价值的目标。在这个时期,为了改善地、空之间的联络,发明了一些精密的技术和机械,并取得了显著成功。

在其他方面,也经常发生意外事故。例如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下述情况:友机驾驶员试图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但迎来的却是暴风雨般的枪支射击,许多驾驶员飞回基地时强烈地抱怨说,步兵仿佛不需要友机在他们周围。在非洲战役的初期,这类事故几乎每天发生,但到我们的滩头阵地之战取得胜利时,这类事故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在最高统帅部里,如果我们要在共同目标下一起工作并取得最大可能的成果,重要的一点是要清楚认识对德国本土的战略轰炸同陆军的需要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空军司令官和地面部队司令官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日益加深,象英国轰炸机航空队司令哈里斯空军上将和第八航空队司令杜立德将军在使用他们的机队轰炸所谓战术目标方面最初所抱有的对立情绪,也完全消失了。当突破获得成功时,紧急调用轰炸机力量协助地面战斗,几乎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总的说来是这样,但也有过一个显著的例外。美国第三十师不幸被我们自己的飞机所轰炸,遭到重大伤亡,这是在这次战役后期重复发生的一个事故。到这场战争结束时,这个遭到轰炸的师的师长坚持说,如果再接受进攻任务,他再也不要重轰炸机或中型轰炸

机助战了。

这时，有必要规定一个日期使整个地面部队最后定型，也就是说，每一个集团军群直接向最高统帅部负责。我们计划在8月1日把巴顿的集团军投入战斗，有了这个发展，布莱德雷指挥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将在法国建立。那时，第一集团军将归考特尼·霍奇斯中将指挥，他在战斗初期曾是布莱德雷的助手。然而，对于实施最后突破所需要的时间，对于在诺曼底前线的近战中如何打败敌人，以及对于投入各主要进攻路线的集团军群的最后选择，当时还不能预见。

在这些事能够实现以前，并且当全军在为消灭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德军这一共同目的而奋战时，显然还应该有一位作战司令官继续负责协调全线战斗的任务。我们估计，到9月1日条件将会成熟，并且已通知一些高级司令官，从那天起，各集团军群都将在最高统帅部的直接指挥下作战。幸好我的统帅部距离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两人的司令部都不远，所以我和他们的会晤都很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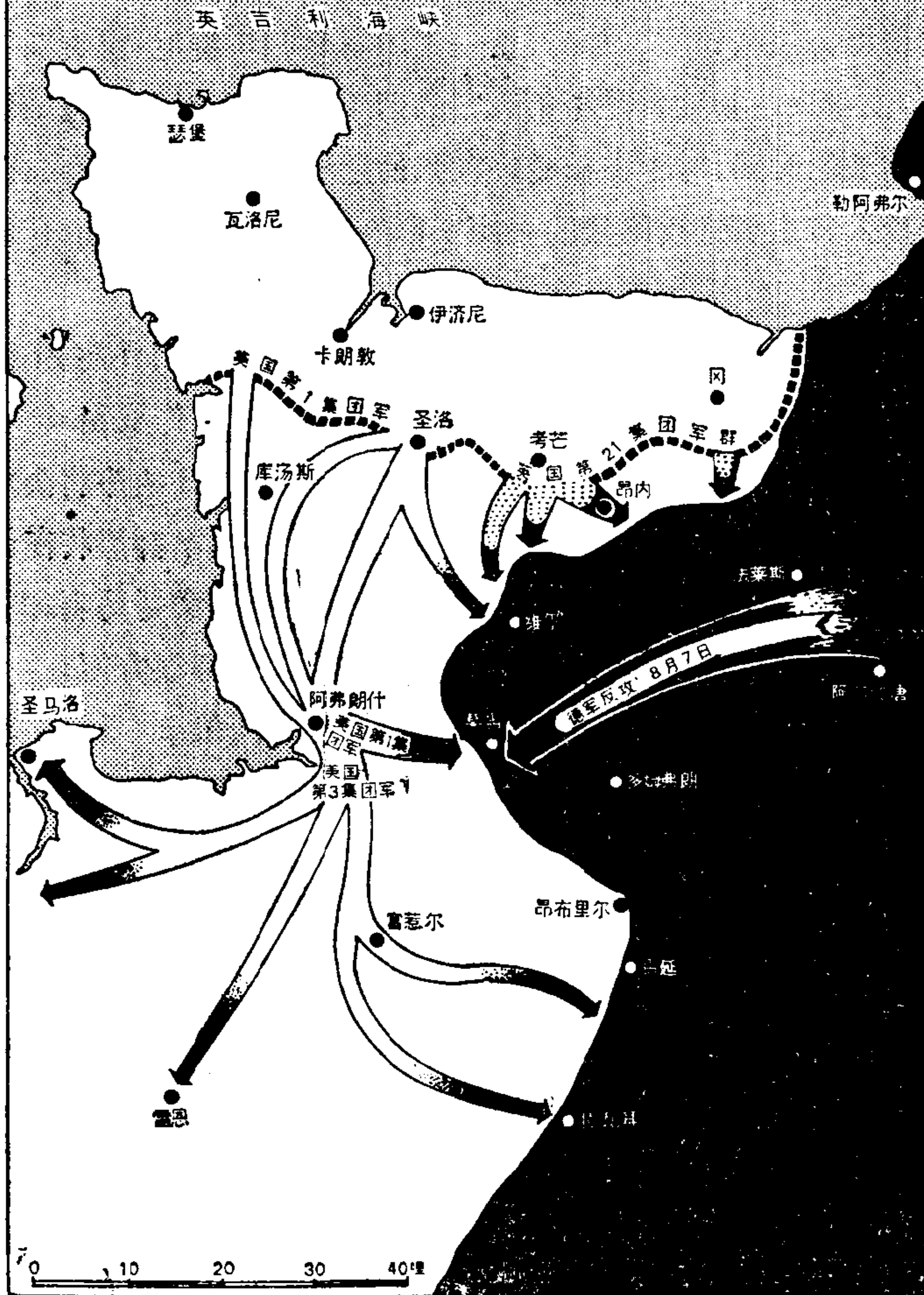
在7月的战斗中，在整个前线打了几场在这次战争中最激烈和人数伤亡最多的硬仗。美军前线的每一次进攻都受到沼泽和河道的阻碍；这种地形往往有利于防御。在此期间，布莱德雷的许多部下都出了名，他们显然被公认为有权列入美国最优秀的战术家的行列。我们的军长和师长，在领导和战术才能方面，一般都表现出他们堪称为第一流的战场领袖，还有数百名下级军官就更不用多说了；我们盟国陆军中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的部队，不管是哪一国的，也不管在什么旗帜下战斗，坚强勇敢是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预示着敌人的必然灭亡。

7月中旬之后不久，美国第一集团军在其前线的一部分，建立了从圣洛到西海岸的战线，从这里它能发动强大的突击。就在这

# 突破和利用战机

7月25日 - 8月6日

美国第3集团军8月1日在阿弗朗什附近投入战斗，美军在一条拥有两个集团军的战线上作战



[按原图译制]

时,本来就恶劣的天气变得愈来愈坏了,所以在以后的一个星期,我们都经历了一个烦恼的紧张时刻。为了利用天气方面将出现的第一个有利的转变,我们必须拟订一些计划,并且还要避免使部队常因行止不定的命令而不断处于警戒和变动的状态。若是在战争初期,这段时间会对部队的士气和战斗效率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现在,美国部队已经变得有战斗经验了,他们象老兵那样,经受了耐心等待的严格考验。

7月25日,也就是进攻欧陆开始日以后的第七周,我们终于在接近于原来希望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后第五天所建立的那条战线上发动了进攻,这条战线从冈城开始经过考芒一直延伸到圣洛。我们在美军前沿阵地的圣洛部分进行了惊人的地毯轰炸(或称面积轰炸),这一整天把敌人吓得魂不附体。但是不幸得很,由于轰炸机部队的错误,使第九师的一个营和第三十师遭受相当严重的伤亡,麦克奈尔将军也被炸死,当时他在一个观察哨里观察刚刚发动的进攻。麦克奈尔将军是一位最能干的和热忱的军官,他的死亡使所有认识他的人都感到悲痛。

第一天的进展是缓慢的。但布莱德雷当晚告诉我,这样的攻击在初期阶段进展总是缓慢的。他相信从第二天以后,会看到我军将以异常的速度向前推进。实际情况证明他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在第二个星期,他穿过了阿弗朗什的咽喉地带,向南直逼半岛的底部,把他的纵队插入德军的背后。在这同时,于8月1日,巴顿将军和他的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奉命进入战斗,负责第一集团军右翼的作战行动。蒙哥马利在这个时期仍面临着德军的纵深防御,他把攻击重点从冈城转到他右翼的考芒,向维尔河和奥恩河之间的高地推进。

布莱德雷取得了完全的、决定性的突破以后,他的紧迫问题就

是尽最大可能大量歼灭敌人。其他一切都会随着他对这个难得机会的利用而产生。敌人被歼灭后，一切别的事情肯定都能很快办妥。他的计划是把各地能抽调的一切兵力，都直接投向当时仍位于冈城和阿弗朗什附近的德军背后。实际上，他希望包围当时还在被迫全力向北抵抗加拿大部队和英国部队的敌军。

为了实现这一总的想法，原计划中的第一个改变是减少分配给夺取布列塔尼半岛部队的人数。为了不把第三集团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这项任务，我指令巴顿将军只把由特罗伊·米德尔顿少将指挥的第八军调回到那个地区。

当敌人看到美国第一集团军向南攻势愈来愈猛，并且最后突破了阿弗朗什的咽喉地带时，他们的反映是灵敏而典型的。由于敌人的整个阵地受到希特勒命令的制约和我们空军的瘫痪性打击，他们立刻把冈城地区的全部可用的装甲部队和后备部队向西调动，准备对美军藉以深入其后背的狭隘地带进行反攻。敌人的进攻如果成功，就会截断我们突击部队的后路，使我们处于危险境地。由于我们前进的走廊仍受压缩，所以德军显然认为，即使他们万一遭到失败而使遭受的损失大大增加，他们所冒的风险也是值得的。8月7日，敌人开始反攻，插入阿弗朗什正东的莫当。

在抗击敌人反攻中，我们的空军协同作战非常有效。美军第九航空队和皇家空军摧毁了敌人的几百辆坦克和车辆。皇家空军拥有大批装有火箭发射器的“飓风式”飞机。这些飞机对敌人的装甲车辆进行低空攻击，持续不断地打击敌军，大大地支援了防御的步兵。

布莱德雷和我知道德军正在准备反攻，因此对战局作了认真研究。在正面战场，我们有足够的兵力，如果我们只采取守势抗击德军的反攻，敌人甚至不可能推进一寸。然而，为了使我们在莫当

的防御有绝对把握，我们不得不减少插入敌后的师，这样，我们就丧失了希望全歼敌人的机会。此外，这时的天气很明显地在好转，并且我们有了一个空运署，只要有所要求，它每天能将两千吨的给养运到我方可能被暂时分割的任何一部分部队所指定的战场。

当我向布莱德雷保证，即使德军暂时获得成功，他也会得到这样数量的物资支援时，他果断地决定，只在莫当保持少量部队，其他部队向南和向东突击，开始包围德军先锋部队。当他打电话向蒙哥马利说明这一计划时，我正好在他的司令部。虽然蒙哥马利对莫当的处境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关心，但他同意未来的战果是巨大的这个看法，因此把这个任务的全部责任交给了布莱德雷。蒙哥马利迅速颁布命令，要求全军服从这项计划，并且他自己、布莱德雷和英国第二集团军司令迈尔斯·登普西中将一起会晤，讨论了协调这一军事行动的细节。

另外一个因素证明这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主要的战斗指挥官都已获得了布莱德雷和我的信任。在突破成功之后，巴顿立刻指挥右翼的第三集团军，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位善于利用机动形势的伟大将领。在美军左翼，我们有坚定沉着的霍奇斯，他不断对德军施加压力，而在这两个集团军中，还有一些经过战斗考验的军长和师长。他们都能被指望在任何情况下作出迅速和有效的行动，而用不着等待上级的详细指令。

布莱德雷关于他有能力守住莫当重镇的判断已被事实充分证明，但对整个战局的细致决定，则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决定往往要求前线指挥官在战争中作出。如果德国的坦克和步兵在莫当突破成功，其他地方的所有部队就会处于严重境地，虽然还能通过空运得到部分供应。即使德军万一能暂时切断我们的交通线，我们仍坚决相信，最终能使整个战局转向胜利，然而如果敌人确实切断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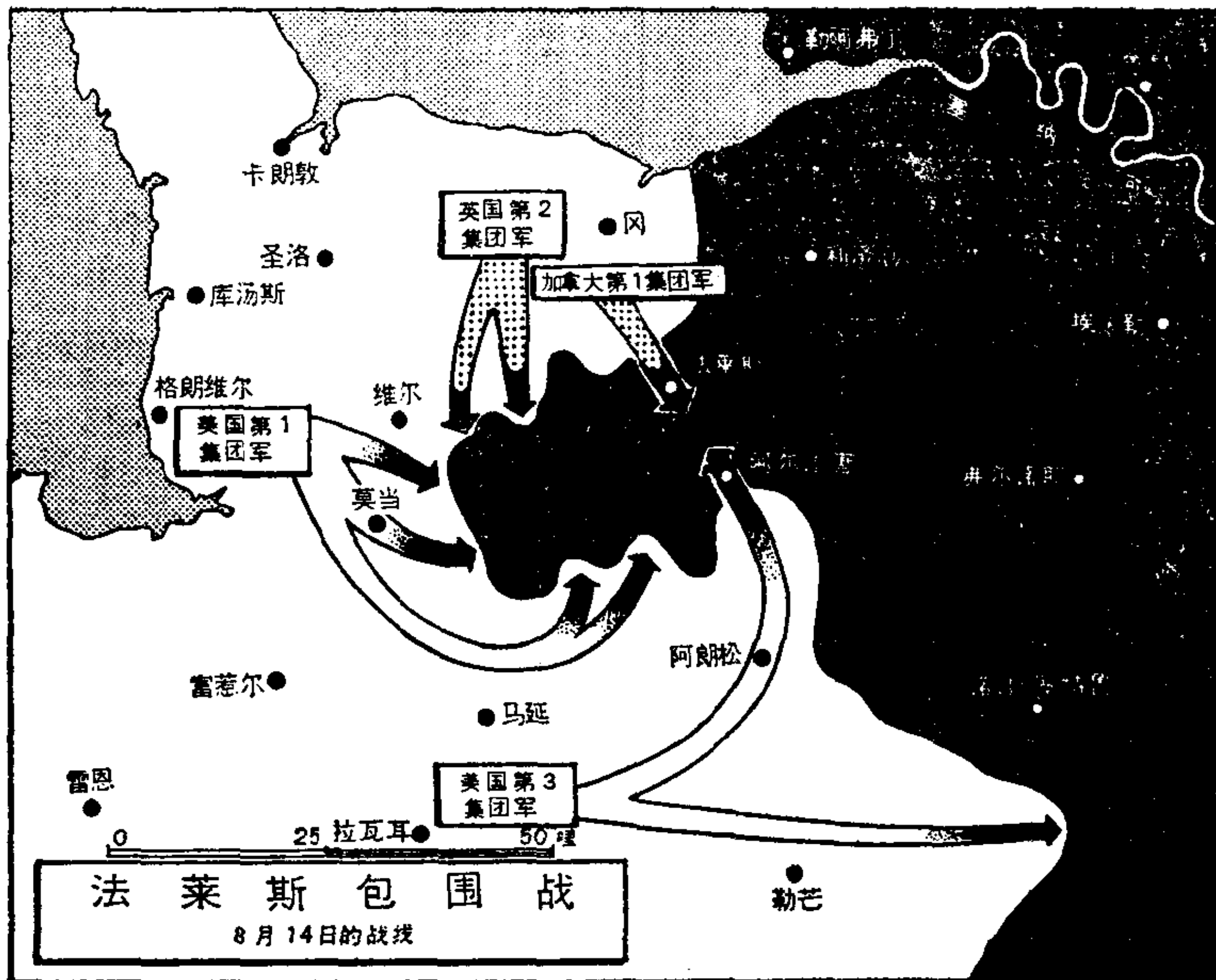
们的交通线，我们部队必要的后撤以及不够令人满意的战果，无疑会被公众说成是打了一场败仗。

这个战局和四个月以后在阿登形成的“凸出部之战”的形势有着许多共同点。我们对这两个战局的长远估计都证明是正确的，不过在阿登，德军曾暂时获胜，而在莫当，他们立刻被击退，并且加重了敌人在物质方面的战斗损失。

敌人在莫当集中了他们能利用的装甲部队的大部分兵力，在8月12日以前，不断发动顽强的进攻。到这时，布莱德雷计划的军事行动已经进行得很满意。

根据布莱德雷将军的指令，巴顿将军派遣由韦德·海斯列普少将指挥的第十五军向南直取拉瓦耳，然后从拉瓦耳的东面转向北面的阿尔让唐。吉尔伯特·库克少将指挥的第十二军奉命向第三集团军南侧的奥尔良推进；沃尔顿·沃克少将指挥的第二十二军奉命向夏特勒推进。后来，查尔斯·科利特少将指挥的第十九军也参加了这次包围战。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在蒙哥马利的命令下，为了与阿尔让唐的美军相连接，继续向南面的法莱斯猛攻，以期包围仍在该地西面的敌军。与此同时，美国第一集团军和英国第二集团军向被围的德军猛冲，以加速他们的灭亡。

因此，从南面实施的包围行动的首要目标是在莫当—法莱斯地区歼灭或俘虏德军，同时保留以后甚至更广泛地利用塞纳河渡口以扫清德国第一和第七集团军残部的机会。这个军事行动呈现出了这样一个总的局面：蒙哥马利的集团军群全面向南攻击原先的诺曼底滩头阵地的防御，而布莱德雷的部队，以其左翼固定于最初的突破点附近实施大包围，以期把仍在他的行军纵队和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前方之间的全部德军置于包围圈中。在此期间，盟国空军不停地袭击塞纳河上任何一个可能的渡口，以便阻止任何



[按原图译制]

一支德军在包围圈封闭以前渡河北逃。但是，象这样的军事行动要配合得完美无缺是很难做到的。

到8月13日夜，美国第五装甲师由已在非洲战役中取得丰富经验的奥利弗将军率领，到达阿尔让唐的外围。由雅克·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法国第二装甲师也已在该地附近，并且得到了美国第七十九师和第九十师的大力支援。德军仍在冈城的正南面拼命抵抗，到这时，他们在那里已经建立了在这整个战役中算得上最坚固的防御工事。加拿大军不断发动猛烈的攻击，但仍拖到8月16日才最后占领法莱斯。当时已成为一片废墟的冈城，于7月9日被攻克。

到7月末，敌人急忙派出增援部队渡过塞纳河，到8月5至12日的一周内，已有五个师进入战斗地区，但是，他们和以前一样，已不能挽回败局了。

8月13日，我以个人名义向这个盟军战区发出一个通报，其中部分内容如下：

由于只有用最大限度的热情、决心和快速行动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向你们提出最紧急的呼吁。

我要求所有飞行员担负起自己的直接责任，日夜不停地打击敌人，不能使他们安全地作战或逃跑。

我要求所有水兵保证不让任何一部分敌军从海上逃跑或从海面取得增援，并且保证供给我们陆地上的战友所需要的枪炮、船只和船员。

我要求所有步兵抱着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决心向指定目标前进。土地一经占领，一呎也不能放弃，战线一经建立，一个德国兵也不让逃跑。

由于盟军大部分部队从一个巨大半圆形的周围朝着一个共同中心进攻，所以决定各路部队在什么地方停止前进，以避免与对面的友军发生对抗，就成了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布莱德雷的以大旋转进攻的部队若要完成对敌包围，需要比英军和加拿大军行进更多得多的路程。另一方面，英军和加拿大军仍被敌军有准备的防御工事所阻，由于他们要通过严密防御地区才能前进，所以行动受到了限制。蒙哥马利虽然与战局保持着密切联系，但美军的行动是如此迅速，以致几乎不可能执行本来能使我们歼灭全部敌人的按时协作计划。

这时战场上出现了混乱状态，只有命令部队就地停止前进，甚至不惜让一些德军逃跑，除此别无他法。总计起来，有相当大数量的德军成功地逃走了。可是，德军逃跑时几乎丢弃了他们的全部重装备，而且是在遭受了极大的牺牲后才逃脱的。

我在布莱德雷司令部时，那里开始收到美军各前进纵队司令官发来的电报，抱怨由于司令部的命令对他们的限制，以致让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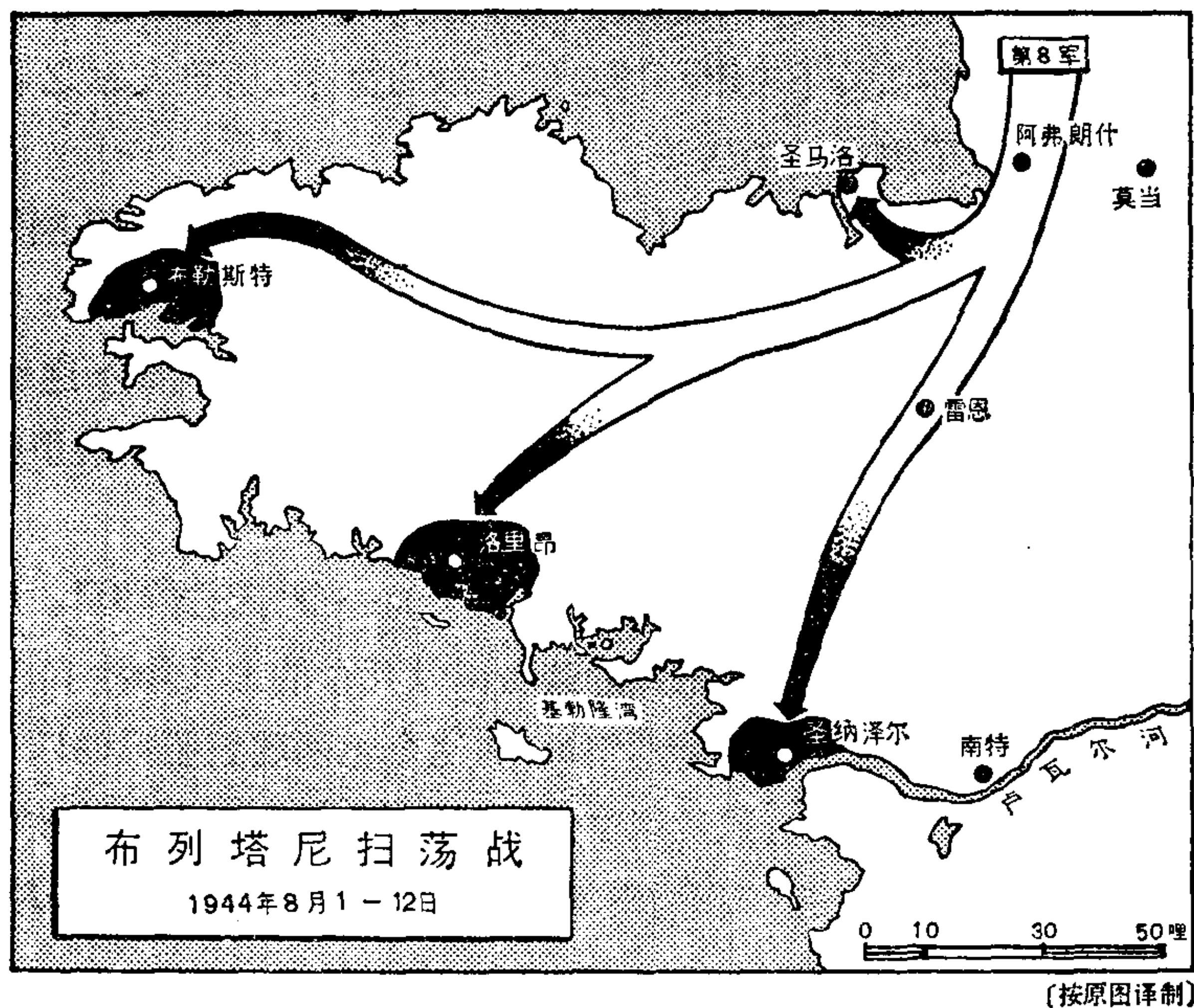
军逃跑了。我完全支持布莱德雷的这个决定：必须精确地遵守已有明文划定的各项关于集团军群之间界限的命令；否则友军之间可能早已发生了灾难性的战斗。

敌人面临全歼危险，于是拚命地为保持行将封闭的包围圈缺口的畅通而战斗，企图尽可能免遭溃败的灾难。德军司令官特别注意解救他们的装甲部队，而当德军几个装甲师的一小部分逃回塞纳河彼岸时，损失了大部分装备。德军八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几乎全部被俘。

法莱斯战场无疑是任何战区中最巨大的一个“死亡阵地”。所有的道路、公路和战场都被击毁的装备以及死亡的士兵和牲口所阻塞，所以要通过这个地区特别困难。在这个包围圈封闭后的四十八小时内，有人领我步行通过这个地区，那里的景象只有但丁才能形容。你完全可以在死尸和烂肉堆上一气行走几百码而不踩着别的东西。

迅速挺进的美军，在对德军后面的塞纳河各渡口进行更广泛的扫荡中，为了避免超过自己的目标而伤及友军，也被迫停止了推进。德军又抓住这个机会逃跑了更大一部分兵力。如果我们事先准确地预见到这个形势，就不致让这么多的德军逃走。

正当布莱德雷的大部分部队参加这些大会战，并驰骋在法国境内向巴黎进逼时，米德尔顿将军的第八军向西转回布列塔尼半岛以夺取那个地区的一些港口。我们依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还必须使用基勃隆湾，甚至还可能使用布勒斯特。米德尔顿奉命尽快攻占这两个地点。他迅速推进并包围了布列塔尼北部沿岸的小港圣马洛。这里的敌人守军疯狂抵抗，但米德尔顿得到空军和海军的协助，得以集中足够的力量在8月14日占领该港，虽然守军残部在该城的城堡内还坚持了三天。米德尔顿接着向西推进，直达布勒



斯特附近。该城的城防司令拉姆克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军人。

米德尔顿发动了强大的攻城战，但该城防御坚固，守军斗志坚决。单纯依靠突击来夺取这个城市的任何企图将会使我们付出极高的代价。幸亏在8月中旬，我们取得比布勒斯特更为良好的港口的前景愈来愈光明，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再也不象指望基勃隆湾那样来指望这个地方了。在这种情况下，米德尔顿奉命避免在布勒斯特付出重大伤亡，但仍要不断施加压力，直至该城守军投降。

在攻城战期间，我访问了米德尔顿，并眺望了我们必须通过的敌人防线。他机智地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每一次有计划的进攻都使我们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而经常把敌人驱逐到更狭隘的地区，在那里他们不时遭到我们飞机的轰炸。

在敌人守军中，有一支德国党卫军的特遣队。拉姆克将军并

没有把他们作为一支部队集中起来，而是把他们分配到各防御部队。他以这种方式来利用党卫军的狂热情绪，以驱使整个守军继续拚命战斗，因为士兵如果有任何软弱的表现，党卫军就会把他就地枪决。

我们于9月19日攻克布勒斯特。由于我们的轰炸和德军的破坏，港口及其一切设备被彻底摧毁，所以后来我们再也不打算使用它了。

当盟军最后完成了对塞纳河以西德军的包围时，德军在西欧的最后的败局已定。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这时立刻出现了一种危险，这就是英、美两国的人民和政府可能会轻视我们尚待完成的任务，从而放松国内战线上的工作，这会产生最严重的后果。我不但让我的上级注意这种危险性，而且早在8月15日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预示盟军尚有更加重要的任务，即消灭沿着齐格菲防线和来因河这条总战线上的德军。但是这一警告在这个巨大胜利的一片欢呼声中被淹没了。甚至战斗部队的一些老于行伍的司令官也产生了乐观情绪——一种几乎是无忧无虑的情绪。他们不去正视这类因素，诸如：大部分德军的狂热心理，以及一个被激励去拚命的民族的残余力量；而激励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完全忠于其主子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和突击队员。

我们的新的战局，使我和丘吉尔首相发生了一场在这次战争期间持续时间最长的争论。这次争论几乎与7月末的突破同时开始，一直到8月上旬。一次会议就持续达数小时之久。我们讨论了关于继续实施“铁砧”行动是否明智的问题。“铁砧”行动当时已改为“龙骑兵”行动，这是德弗斯将军的部队进攻法国南部军事行动的代号。

在计划这个进攻时，最初的理由之一是想再得到一个进口港，

使在美国已准备就绪的增援师能由此迅速攻入欧洲。首相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及时使用布列塔尼半岛各港口的保证，当时还在地中海战区的部队可以经由布列塔尼进入，或者可以把他们更适当地用于意大利战役，以便最后通过亚得里亚海的顶部进攻巴尔干国家。

我反对任何这样的改变，由于美国参谋部按照它的惯例，拒绝干预战地司令官作出的决定，于是我就成了与首相直接进行辩论的人。他提出的论点可以归纳如下：

我们已经用不着马赛港以及由此向北的交通线。美军可以经由布列塔尼进入。

通过法国南部实施的进攻，在地理上距离法国北部部队甚远，以致两者之间没有战术上的联系。

在德弗斯将军指挥下用于进攻南方的部队，如果在意大利向前推进，进入巴尔干国家，并从南面威胁德国，这一行动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所起的作用，要比坚持原计划的行动路线更为有效。

我们进入巴尔干国家将会点燃这个地区公开反抗希特勒的烈火，并能为这些反抗部队提供武器和装备，使他们能更有效地进行反抗活动。

我的立场大致如下：

过去的经验证明，我们可能会对布列塔尼各港口的使用大为失望。我们不但要预料到敌人会进行顽抗，而且我们断定我们一旦攻占这些港口，它们将被有效地破坏。我们预料马赛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因为我们知道敌人的防御部队大部分为抵抗我军进攻已往北调动。我们应当迅速夺取马赛，不让敌人有很多时间去进行破坏。

从布勒斯特到梅斯地区的距离，要比马赛到梅斯的距离远，连接前两个地点的铁路线要比罗纳河北面的铁路线曲折得多，而且更容易遭到破坏。

如果不能攻占马赛，我们将不能把美国的各师迅速从国内运来。

一支相当数量的部队进驻法国南部，肯定会使我们自己的军事行动

在战术上和战略上得到支援。

首先,当我们继续不断地向德国的抵抗中心推进时,它将保护和支援我们的右翼。其次,这支部队如与我们的右翼连接起来,就会自动切断会合点以西的全部地区,俘获留在这个会合点后面的敌军,进而解放法国,使它能消极地和积极地协助我们。

如果没有“龙骑兵”行动的进攻,我们就必须保护从布列塔尼半岛底部到我们进攻的先锋部队最前端的右侧。这将意味着为了仅仅保证我们自身免遭小股快速部队袭击而把大量的师置于右侧不能机动。这样,这些防御师就难以参加以后的进攻行动。

我们迄今只有瑟堡这个永久性港口。由此出发的各条路线根本不能维持前线我们作战部队的需要。在我们取得北方的安特卫普和南方的马赛或与此相当的港口设备以前,我们的给养工作和后方勤务工作将永远赶不上最终征服德国的需要。但是我们一旦取得了这些港口,我确信,我们就能在德国边境配置足够的部队和物资来发动最后的和决定性的进攻,把德国彻底打垮。如果没有这些设备,我们必将耗尽我们的给养能量。那时,我们就会处于英军从埃及向西推进时经常遇到的那种困境,而隆美尔在最后占领阿拉曼之后也曾陷入英国的这种处境,以致使他在当时不能利用他的优势。

另一个因素是美国政府花大量费用装备和供应了一批法国师。这些部队当然希望为解放法国而战。再没有别的理由能使他们这样热情和忠诚地战斗,也没有别的地方能使他们获得必要补充来补偿战斗损失。这些部队当时驻在意大利和北非,只有通过法国南部的开放,才能迅速投入战斗。

我坚决认为,我们的部队应在瑞士边境和北海之间这个广大范围内进行最大限度的集结,因为在那里,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向德国心脏突进,并最后与来自东方的红军会师。

首相为了坚持他的论点,还为从南方进攻的部队描绘了一幅血淋淋的惨景。他肯定那支部队为摧毁沿海防御会苦战好多星期,并担心在三个月内向北的进展不会超过里昂。他认为我们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并且坚决认为这个地区的战场只会成为另一个安



齐奥。很可能首相并不相信我们情报部门报告的可靠性,但是我们相信,除了大部分不能调动的师外,很少德国部队留在南方。因此,我们断定,德国的防御外壳很快会被捅破,而德弗斯的部队将会以迅速的步伐向北推进。

虽然我从未听见首相这样说,但我感到,他真正关心的可能是政治上的问题,而不是军事上的问题。他可能认为,战后如果西方盟国在巴尔干国家有强大的力量,这在缔造战后的一个稳定世界方面,要比俄军一方占领那一地区有利得多。我告诉他,如果这是他主张向巴尔干国家进军的理由,他应该马上去找总统,把事实和他自己的结论都摆在桌面上。我知道得很清楚,战略会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如果总统和首相为了达到他们认为必要的政治目的,决定延长战争,并认为值得增加人力和财力的代价,那么我立刻会忠诚地相应调整我的计划。但是我还是坚持,只要他单从军事角度来辩论这个问题,我就不能承认他的论据是妥当的。

我认为,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我个人必须是自己的责任和决定的主宰。只要这个改变出于军事理由,我就拒绝考虑。他不承认有政治的因素在影响着他,但我十分确信,一个有经验的军人,如果是严格地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对于坚持进攻法国南部的计划的明智性,是不会提出疑问的。

首相和往常一样,直到马上实施这个军事行动时,还纠缠着这个问题。但当他发觉他的一套想法不能实现时,又和往常一样,不惜一切地去支持这个军事行动。他飞往地中海战区去看这次进攻,并且我听说,攻击发动后,他确实在一艘驱逐舰上观察支援袭击。

在这次持久而又认真的争论中,首相曾得到他的某些参谋人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我的统帅部中执行任务的英国军官,始终

坚定地站在我这边。

蒙哥马利在1944年初制订计划过程中,为了保证“霸王”行动取得更多的登陆艇,曾主张完全放弃这个南部军事行动,但到8月初,也同意了我的意见,认为应按计划发动进攻。

很凑巧,就在进行这场持久讨论的同时,蒙哥马利突然向我提出,他应继续保持整个战役中的全部地面部队的战术协调控制权。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考虑到,在这同时,他需要保持对他自己的集团军群的直接指挥。我和我的参谋人员都认为这个提议是离奇的。设置集团军群司令,就是为了保证对前线某一部分逐日实行直接指挥,而这对一位最高统帅来说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人既能完成他负责的一部分战线的职责,同时又能对任何其他部分的战线实施合理的和明智的监督。这个意见的唯一效果,必然使蒙哥马利处于随意动用他所指挥的所有部队去支持他自己想法的地位。

我们在欧洲所面临的这种形势,使一位最高统帅不能逐日逐时地对战场的任何部分进行监督。虽然如此,他在建制方面是唯一有权给主要部队指定重大任务的人。也只有他才有权根据各主要战区的任务来分配兵力,他还有权安排输入物资的分配,有权指挥全部空军支援前线的某一部分。因此,如果在最高统帅和集团军群司令之间出现任何一个独立的地面部队司令部,这样一个司令部必然将处于反常的地位,因为它既无权分配供应物资和调拨增援部队,又无权授命空军去使用它强大的力量。

但是,现代英国,习惯于设置三个总司令,即空、陆、海三军各有一个总司令。许多人认为,违背这个制度是不可想象的,甚至还会带来灾难。我详细地解释:我们处于这样广阔的战场,我们的每一个集团军群司令就是他那个战区的地面总司令;现在不是有一

个,而是有三个所谓的地面总司令,每一位司令都会得到他自己的战术航空队的支援。他们的后面就是最高统帅,他有权把全部空军——其中包括各轰炸机总队——集中于需要它的任何前线,同时各集团军群的兵力,也会依敌人阵地对全军进展的重要性的不同而随时有所变动。

我的决定虽然不受在不同学派中培养出来的某些人的欢迎,但还是被接受了。这一问题在战役的后期又以另一种形式被提了出来,但决定始终未变。

尽管我们之间有这种偶然的意见分歧,但在逐日逐月的战斗中,我们的配合和亲密合作的程度使我列举的事件成了例外。这些例外一旦出现,就必须坚决果断地进行讨论,这样就能找出答案。我们的意见分歧很少变为严重性质的,这是一个奇迹。

蒙哥马利陆军元帅和巴顿将军一样,是个不拘形式的人。他愿意采取一些古怪的行动,其中之一是他习惯于和他的参谋部分处两地。他住在一个拖车内,周围只有少数几个副官。如果要赢得一次战斗,参谋工作必须要完成得及时而有效,但他的这种做法对这点造成了困难。他一贯拒绝和其他司令部的参谋军官打交道,而且在争论中,只要还没有作出决定,总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由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中有一位令人羡慕的、名闻整个盟军的参谋长,他的这种做法所造成的损失才被减到最低限度。这位参谋长就是弗朗西斯·吉恩甘德少将。盟军最高统帅部和其他司令部的同事们都称他为“弗雷迪”。他按照盟国的规则办事;他在协调对胜利必不可少的计划和细节方面,自始至终贡献了他非凡的能力、才干和精力。

蒙哥马利在欧战胜利后不久给我一封信,这封信是对他自己的最好写照。他写道:

亲爱的艾克：

现在我们都 在柏林签了字，我想我们即将开始履行我们自己的职责。在此以前，我谨向您表示，过去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是一种特权和荣誉。我十分感谢您对我的贤明的诱导和宽厚的容忍。我很清楚自己的缺点，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温顺的部下；我喜欢自行其是。

但是，就在困难和暴风雨的时期，您使我没有发生越轨行动，并且给了我很多教导。

所有这些我都非常感激。因此，我对您给予我的一切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您的非常忠实的朋友

蒙蒂

我在回信里实事求是地说：

您在贵国军事将领中的崇高地位是被牢固地确认的，所以对我来说，要对我所知道的您的真正信念持有异议，从来不是容易的事。但我要十分荣幸地证实一个事实，即无论何时，只要一经作出决定，您就不顾个人意见，忠实而有效地加以执行，对于这点我从来是确信不移的。

我还与财政部长摩根索进行过另一次即使不是紧迫的、但也算是很重要的讨论。1944年8月初，他来到我的统帅部访问。他说，在德国最后要规定的货币兑换率应该不让这个国家占任何便宜。我直率地告诉他，我现在忙得根本顾不上专门考虑德国将来的经济问题，但是我有一个能干的参谋小组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这样就引起了关于德国未来问题的一般性的谈话，我当时发表的意见大致如下：

“这类事情应由别人来决定，但我个人的意见是，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后，关于谁打赢这场战争的问题，一定不要再有怀疑的余地。德国必须被占领。此外，决不能容许德国人民忘记犯罪的感觉，也不

许他们忘记他们是造成这场危及全世界的悲剧的从犯的感觉。著名的纳粹分子以及某些工业巨头必须受到审判和惩处。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成员的身份马上就可以作为确凿的罪证。必须解散德国参谋总部，没收其一切档案；凡被怀疑与发动这场战争有关或与战争罪恶有关的人，都应受审。德国国民必须负责向比利时、荷兰、法国、卢森堡、挪威和俄国等国赔款。这个国家制造战争的能力应予消灭。这可能通过严格控制那些使用重型制造机器的工业的办法，或者只是通过禁止制造飞机的权宜之计来实现。应该容许并要求德国人制造自己的生活用品，但不应得到美国的援助。因此，破坏其自然资源是愚蠢的。”

我曾听到过一个建议，要求把鲁尔各矿区用水淹没。我断然拒绝了 this 建议。我认为这是愚蠢的和犯罪的行为。最后我说，应把对德国的军事管制工作尽快从军人手中转给文职官员。

在当时和以后，我把这些意见都告诉了所有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1945年7月，当总统和国务卿来到波茨坦时，我终于把这些意见也告诉了他们。

## 第十六章

### 乘胜追击和供应之战

在争夺滩头阵地之战期间，敌人把第十五集团军集中在加来地区。他们认为，我们打算对这个要塞发动两栖攻击，所以坚决不把这支兵力用来增援诺曼底守军。我们尽可能使用各种花招加深敌人的误会；例如，麦克奈尔将军当时在欧洲战场，所以我们可以半公开地称他为某集团军司令，实际上他的集团军纯粹是虚假的。他的名字被列在禁止公布的名单中，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联合王国这是个公开的秘密。这样，任何轴心国的间谍都会肯定他在欧洲战场的消息是一个重要情报，并立刻会把它传给德国人。我们希望德国人把他的“集团军”的任务解释为对加来山口前线的突击。

最后，敌人开始对局势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我们很快知道了这点。辨认敌军部队番号的工作是战地情报部门始终坚持的目标之一。正是用了这种情报，我们一般才能很准确地逐日搞出《敌军战斗部署报告》。《敌军战斗部署报告》表明，7月末德军已开始使第十五集团军的几个师渡过塞纳河投入战斗。但为时太晚了。当时所有前来诺曼底地区增援的士兵只是赶上了惨败的灾难，而无法影响战局。在遭到这次惨败的敌军中，还包括敌人从法国南部、布列塔尼、荷兰和德国本土调来的若干个师。当所有这些增援部队都不能胜任阻挡我们的任务时，敌人对建立任何一条连绵不断的防线来抵抗我们前进已不抱希望了。

当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在8月1日开始行动时,我们的地面部队已扩充为四个集团军。右翼是巴顿将军指挥的第三集团军。紧靠它的是霍奇斯将军指挥的美国第一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组成美国第十二集团军群,由布莱德雷将军统率。左翼是蒙哥马利将军统率的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这个集团军群包括登普西将军指挥的英国第二集团军和亨利·克里勒中将指挥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支援蒙哥马利集团军群的英国空军由康宁汉空军上将指挥。支援布莱德雷将军集团军群的美军第九航空队由霍伊斯·范登堡少将指挥。划归范登堡将军领导的有奥托·韦兰少将指挥的战术航空总队和埃尔伍德·奎萨达少将指挥的几支航空部队,前者负责支援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后者负责支援霍奇斯的集团军。

在每一个集团军和集团军群中的各联合航空队的正常任务是应各自地面司令官的要求进行空袭。但全部美国和英国的战术航空部队都归利-马洛里统率,因此,在紧急情况下,它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袭击盟军最高统帅部所指定的目标。这种联合行动的一个典型事例是,英国空军在布莱德雷战区的莫当协助击溃德军的行动。由于指挥方面的这种机动性,战术航空队在必要时也可用来援助重轰炸机,使重轰炸机甚至在深入德国本土时也能得到支援。

到8月底,盟军在欧洲大陆的兵力大致有二十个美国师、十二个英国师、三个加拿大师、一个法国师和一个波兰师。英国已没有可供调动的师,但在英国还驻有六个美国师,其中包括三个空降师。空军全部可以投入战斗的力量大致如下:有四千零三十五架重轰炸机,一千七百二十架轻轰炸机、中型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以及五千架战斗机。另外还有一个部队空运总队,它拥有的运输机,如把英、美两国的都算在内,共有二千多架。

对付打了败仗和士气低落的敌人，几乎冒任何合理的风险都是正当的，因为胜利者所取得的战果之大小，一般将取决于他的勇敢、甚至是取决于他的蛮勇。在连续三个星期里，我们进行了代价很高的突破和旋风般的进攻，其总的目标是要造成我们现在取得的这种局面；我们一直在拟订计划，以便从最初的胜利中取得最大的成果。但是一旦我们的纵队开始向前猛攻，如果要获得丰硕战果，就必须有效地解决供应困难的问题。

在整个争夺滩头阵地之战中，我们的后勤部队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地区内。可以使用的海港只有瑟堡和阿罗芒什附近英国滩头上的一个人工港。修复瑟堡有许多困难。在港口及其一些航道中，必须扫除大量的水雷，其中有许多是新型的，爆炸力特别强大。我们在7月份开始使用这个海港，但一直到8月中旬，它还没有达到很大的容量。美军战区滩头的人工港，在7月份的暴风雨中已被彻底破坏。我们不能从阿罗芒什和瑟堡向前铺设公路、铁路以及设置军需品堆积站，然而，要是我们的突破线象预测的那样，实际上向南延伸到科汤坦半岛底部，我们就能办到。因此，我们的所有行军纵队不得不从设置在滩头附近的储备中，以及从设置在我进军过程中必须予以修复的公路和铁路沿线的储备中取得供应。

这些很不充足的设备，不可能无限期地支援我们，因此，在向德国进军的某条战线上准会出现这种情况：若不是被敌人所阻，也会因为供给线达到极限而迫使我们停止下来。

一个加强师在进攻战中每天要消耗六、七百吨物资。在固定阵地作战时，消耗的物资大部分是弹药；在进军时，要消耗汽油和润滑油，负责供应的军官把这两样物资称为“波尔”。

我们有三十六个师在战斗，这样就产生了每天要把二万吨物资从滩头和港口输送到前线的问题。此外，我们的先锋部队迅速



挺进,经常每天达到七十五哩。供应部门不得不用满载物资的卡车紧赶。每前进一哩就会使困难加倍,因为运输卡车为了给前进的部队多装一次车,就需要在滩头和前线之间多打一个来回。还要把好几千吨物资运送给前线的机场,作为建设和维修之用。我们另外还需要大量包括必要的重型设备在内的物资,用来修复桥梁和公路。

当我们被限制在滩头的时期,还不能精确地预见到当我们右翼突破成功后敌人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最合理的行动似乎是把部队撤回塞纳河,以保护该河渡口。如果敌人选择这个行动,他们无疑会依靠塞纳河作屏障进行顽抗,直到我们的进攻部队能对他们进行侧翼包围并迫使他们撤退为止。

如果我们被迫在塞纳河畔进行大会战,我们的交通线本来是相当短的,后勤问题按照我军前进的速度,本来也会逐渐得到解决。然而,敌人在希特勒的坚持下决定就地死守,并且还在莫当对我行军纵队的侧翼进行反扑,这样,整个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努力抓住了这一机会,从南部迂回到敌人的背后,以期全歼敌人;如果我们做到这点,那么我们一直估计可能在塞纳河和松姆河上发生的中间战斗就不会进行,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变成了估计在供应完全用了以前,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战线最远能达到什么地方。

因此,当布莱德雷将军的大部分兵力迂回到敌人背后时,我认为,必须把我们的全部战役计划作一审查,以便决定在新的形势发展下,应该进行哪些重大的和必要的修改。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最有希望和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及早夺取远在南面的马赛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占领了安特卫普,要是它还能使用,就可解决我们战线整个北半部的后勤供应问题。

安特卫普不但是欧洲最大的港口,而且它的位置向前正对着德国边境,这将使我们的铁路和卡车的运输量大为减少,至少在北部战区,供应问题将不再是一种限制战役进行的因素。

我们希望及早使用马赛,因为德国人已从这个港口调走了大部分机动师,而且迅速夺取这一港口,才能防止它遭到大规模的破坏。马赛地区的最后胜利,能给盟军的右翼提供几条最好的供应线。美国的增援部队也将及时通过这一条路线源源而来。而且通向罗纳河流域的几条铁路干线运输能力十分巨大,它们一旦被使用,我们在卢森堡地区以南各条战线的任何部分上,后勤支援不会再发生很大困难了。

要充分利用这两个最可能出现的情况,首要的当然是使我们自己集团军的右翼尽快地和从南面挺进的德弗斯将军的第六集团军群会合。同时,我们必须大力向东北方向突击。这样,我们就会顺便迅速清除敌人用于不断发射V-1和V-2飞弹袭击英国南部的那个地区。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及早攻占安特卫普,并占领由此向东的一线,以使我们能安全利用这个巨大的港口。

除了迅速的、但非战斗性的进军的前景使我们有希望及早使用北部较远的那些港口,从而减少对布列塔尼港口的依靠外,所有这些都符合原来的计划。但是还有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在战斗开始后的七个星期里经历了重重障碍的供应系统,是否能支持我们直到实现这些目的。

所有的部队都肯定会逐渐感到供应不足。我们的任务就是分配亏缺的物资,以免部队在完成其主要任务前停止前进,而这种分配本身就意味着没有一个部队能多得一磅超过其完成基本任务所必需的供应物资。

当战斗正在象8月末和9月初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横扫法

国那样迅速进展时，师以上的每一个司令官的志向变得越来越大，认为只要多几吨物资，他就能势如破竹地去赢得战争。这种争取胜利的精神，始终应予鼓励。主动、自信和勇敢是优秀的战斗指挥官的最令人钦佩的特征。因此，当我们在法国和比利时猛冲时，每个司令官都恳求得到作战优先权。这种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因为每个司令官面前都有可以迅速利用的战机，所以他们的要求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1944年夏末，我们知道，德国本土仍拥有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后备军。因此，企图以很少兵力向前突击，并在来因河上架起桥来继续深入德国心脏的任何想法，都完全是荒谬的。即使最初我们能有十个或十二个师的兵力——可以肯定那时即便是暂时的支援也不再能得到，由于进攻纵队必须留下保护其两翼的部队，所以力量也会逐渐削弱，最后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失败。因此那种想法只能对敌人有利。

我们对整个形势愈是进行详细研究，就愈加清楚地看出，我们经过许多个星期乃至许多个月的酝酿而制订的这项计划仍然是适用的，尽管在执行这项计划时所遇到的具体条件与原来设想的军事行动中要发生的细小情况不相符合。因此，我决定在右翼，我们将向与德弗斯将军部队的会合点冲击，这个会合点我们认为将在第戎地区；而在左翼，蒙哥马利将军将奉命尽快向前推进，稳稳占领能够足以掩护安特卫普的一条战线。布莱德雷命令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大致朝着亚琛的总方向与英军并肩前进，以保证我们左翼的胜利。

我们希望向东北方向的突击能迅速进展，从而使德军遭到惨败，这样，我们在必须停止前进以前，甚至可能在来因河对岸取得一个直接威胁鲁尔的桥头堡。

以后几个星期的战斗，就是按照这一总的计划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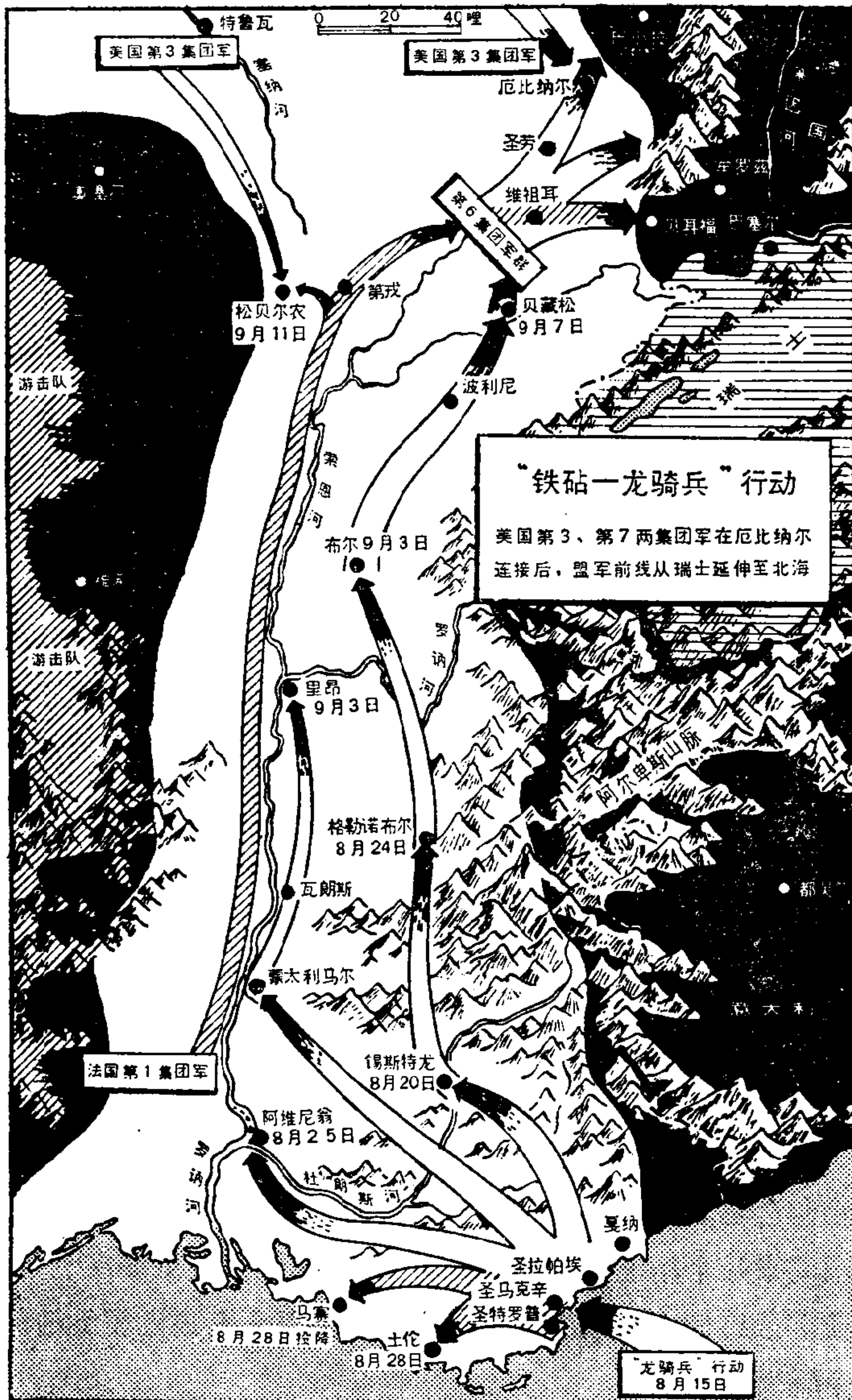
正当第十二和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群前线上的战斗取得十分令人满意的进展时，亚历山大·帕奇中将的第七集团军在法国南部也正在取得显著的战果。

1943年末，在德黑兰召开的盟国军事首脑会议上，西方盟国通知斯大林大元帅，说进入法国南部的辅助性军事行动，将是我们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从而在欧洲建立第二战场的必要部分。然而在1944年初，盟军一方面在意大利作战，一方面又在计划重大的“霸王”行动。因此，在1944年上半年的整个时期内，指挥地中海区战役的威尔逊将军，不可能确有把握地估计到在实施“龙骑兵”进攻时会需要什么。

我在1月份作出的决定是，必须在前线投入五个师实施“霸王”进攻。这样，就使“龙骑兵”进攻不可能按原计划和“霸王”登陆同时进行。于是，在联合参谋长会议、威尔逊将军和我的统帅部之间进行了大量的电报联系，讨论了关于坚持“龙骑兵”行动是否明智的问题。从一开始，我就热烈支持这个辅助性进攻，在长期的讨论中，从未同意过把这个进攻从我们的计划中撤销。我的这个立场得到马歇尔将军的支持。

所有这些争论和讨论，现在显然已成为过去的事了。当时我们得到的保证是：不久将组成由德弗斯将军指挥的第六集团军群，它至少包括法国南部的十个美国师和法国师，这些师正在向北赶来与我们会合。还有一个保证是：紧接着这些师的到达，还要很快从美国调来几个增援师。在这个时期，使我们获得更多有利条件，并对我们最终彻底击败德军有更大帮助的是正在逼近罗纳河流域的这个辅助性进攻。

由于帕奇将军的部队和我的统帅部之间相隔很远，而且缺乏



〔按原图译制〕

通讯联络,于是作了如下的安排:威尔逊将军保持对那支部队的作战指挥权,直到我能设立指挥机构为止。设立机构的日期我们估计是9月15日。然而,从南部的进攻一开始,法国的各条战线实际上成了一个整体,而所有的战术计划和后勤计划,都要根据所有的战斗很快将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战斗序列这样一个假设来制订。我们要争取很快实现这个假设,因此为了在8月底完成塞纳河上的战斗,布莱德雷命令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向东推进,首先与第七集团军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连续的战线。

盟军的其余兵力,一般是继续向东北方向推进,解放比利时,夺取安特卫普和威胁鲁尔。这一攻势是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进行的,因此在行军中和战斗中引起了很多事件,这些事件只能由详尽的历史著作来叙述。例如,美国第七军和第十九军进展是如此迅速,以致在蒙斯附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发生数次大会战——把整整一个德国军夹于其间。经过激烈战斗,俘获敌人二万五千名。在平时,这个战果早已被欢呼为伟大的胜利。但在这种非常时期,这个战绩在报纸上几乎没有受到注意。

到8月底,如何对待巴黎这个具体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在所有预备性战斗中,我们极力采取克制态度,避免直接轰炸法国首都。甚至在摧毁法国交通线方面,我们也只是袭击巴黎外围的铁路枢纽,而避免轰炸市内的终点站。根据这一总方针,我们必须避免把巴黎作为战场,因此计划切断它和周围的联系并加以包围,然后迫使守军投降。当然,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城内居民的生活条件和处境。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了把各条战线最大限度地向前推进,迫切需要为战斗节省每一滴燃料和每一颗子弹。因此,只要还没有获得巴黎市民挨饿受难的情报,我就希望推迟实际夺取巴黎的日期。

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按照城内自由法兰西军的行动行事。

在整个法国战役中，自由法兰西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在布列塔尼战斗中表现特别积极，而在前线的每一个部分，我们都受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支援，法国的解放以及敌人在西欧的失败，将会延缓很长时期，而我们的损失也会更大。所以当城内自由法兰西军准备起义时，就必须迅速援助他们。获得的情报表明，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斗，我们相信盟军只要开进一、两个师，就能解放该城。

布莱德雷将军把首先入城的荣誉给了勒克莱尔将军统率的法国第二师。这个师的老兵早在三年前就从乍得湖开始行动，越过了几乎不可能行军的撒哈拉沙漠，与英国第八集团军会合后参加了后期的非洲战役。1944年8月25日这天，该师师长又接受了指挥巴黎守军的德国将军的投降。这是从中非到德国的贝赫特斯加登的这篇长征史诗中令人鼓舞的高潮。

然而，在使巴黎的德军完全投降和城内秩序得到恢复以前，美国第四师必须进驻。幸亏这次战斗没有给这个城市造成重大损失。在我们看来，在所有这些称心如意的情况中，最有重要意义的是塞纳河上的桥梁都没有遭到破坏。

在占领巴黎后，我立即通知戴高乐将军，希望他能很快进入首都。他是法国抵抗运动的象征，所以我要求他在我来到巴黎或从那里通过以前先行进入该城。

在攻克这个城市后的星期六，我访问了布莱德雷将军的司令部，在那里我才知道戴高乐将军早已在巴黎的一座政府大厦中设立了司令部。我立刻决定进城对他进行正式访问。为了体现盟国的统一阵线，我把我的意图告诉了蒙哥马利，并请他和我一道去访问戴高乐。但是由于他战线上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不能与我前往，这样，有我的英国军事助理高尔特上校陪同前往，我也就满

意了。

在前进的旅途中，布莱德雷和我围着一个仍进行战斗的地区绕了个小弯，但还是按照我们的设想，在8月27日，星期日中午以前，安然而秘密地进入了巴黎。我们立刻访问了戴高乐，他已被身穿盛装的传统的共和国警卫队护卫着。我们还在美国第五军司令部访问了杰罗将军，并留在那里会见了凯尼格将军，他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统辖下指挥着全部自由法兰西内地军。当我们在城内到处走动时，布莱德雷和我在城内的消息显然已传出去了，所以我们经过埃托勒的凯旋门时，被一群热诚的市民围住了。这些被解放的人民的热情欢迎，使我们有些为难，所以赶快找了一个出口，回到位于夏特勒附近布莱德雷的司令部。

我在城里时，戴高乐将军把他的一些忧虑和问题告诉了我。他要求食品和供应。他特别迫切需要几千套制服，准备发给自由法兰西军以区别于一些不良分子，因为后者正利用暂时的混乱，可能要损害无依无靠的市民。他还要求额外的军事装备，以建立几个新的法国师。

从市内的混乱状态来看，当时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赶快建立他自己的权势和维持市内的秩序。他要求暂借两个美国师，按照他的说法是，想用这两个师来显示威力和巩固他的地位。这时我突然回想起几乎两年前的非洲和我们当时面临的政治问题。那时我们承认了在那里早已存在的政府机构，并且在我们整个逗留期间，从来没有一个法国官员为了建立和加强他在当地的行政权力而找过盟军。而现在这位象征法国解放的化身，在已经获得自由的首都为了建立和维持自己的行政权力而不得不求助于盟军部队，这似乎有点讽刺味道。

我理解戴高乐的问题，但当时我没有多余的军队能暂驻巴黎。



我答应他让我们两个开往前线的师通过市内的主要大街。我提议，当这两个师通过巴黎时，可以隆重的队形行进，并邀请他检阅。我想这样显示威力和使戴高乐出现在检阅台上，就能满足他的全部要求。我个人谢绝参加这个仪式，但告诉他，布莱德雷将军将回到城里来和他一起站在检阅台上，以象征盟国的团结一致。

由于这次隆重的行军正好与一个局部的作战计划相符合，所以这一行动也许成了历史上一支部队在行军中通过一个伟大国家的首都接受检阅，并于同日去参加阵地战的唯一事例。

当时，英国报纸发表一段评论，说“美国人爱举行阅兵”，并且还用批评的口吻说，英国部队也参加了解放法国的战役，但盟军之中谁也不应该追求这种荣誉。可是没有一个官方人士对这种情况发生过误会或者对这件事有过批评。此外，当那些犯了错误的报纸了解原因后，就立即收回了原来的看法；尽管如此，这件事至少是要求一个司令官在现代战争中必须如下行事的又一例证：他在关心一件事的实际完成时，也要使自己始终关心公众对这件事的看法。如果认为，往后的胜利一定会使人们忘记暂时的误会从而忽视公众，那就是懒人作风。

8月份，还有一个涉及美、英两国报纸的类似事件。当时美国报纸发表一篇报道，说蒙哥马利将军不再负协调地面部队之责，他和布莱德雷将军早已处于同等地位而直接对我负责。盟军最高统帅部否认这则消息，只是因为所报道的这个安排还没有实行。这篇报道虽说早了一点，但是完全正确：这个变动早经计划，但在9月1日以前还没有付诸实行。

英国报纸对这则消息表示强烈不满，断定蒙哥马利是因为他的战功而降级的。另一方面，美国报纸却以相当满意的心情对此热烈欢呼，因为这件事说明，美国部队现在在自己的进攻道路上可

以真正独立自主地作战了。盟军最高统帅部立即予以否认,结果在美国造成了混乱,于是马歇尔将军认为有必要向我电询此事。我不得不把改变指挥安排的详尽细节原原本本地重述一遍。在复电中,我还自以为是地表示了某种不满情绪,我说:“对公众来说,赢得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不够的,更重要的似乎是赢得伟大胜利所采取的方法。”然而,两国的反应是完全正常的。如果没有产生民族尊严感的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精神,在不断遭到损失的情况下,要完成建立和维持军队的任务是不可能的。在处理公众肯定十分关心的问题方面,这个事件恰恰是一个更加有益的教训。

在战争时期,新闻界和军事当局之间决不可能有彻底的协调和完善的合作。对一个司令官来说,保密是一件防御武器;但对新闻界来说,则是该受咒诅的。这里的问题是制订一种考虑如何统一双方观点的工作程序。

新闻界向国内公众提供消息,这是它的主要的、也是正当的工作。正是由于民众的努力,我们拥有了取得胜利所必要的战斗队伍和装备。所以除了因压倒一切的军事安全需要而必须保守的秘密外,民众有权了解战争中的一切情况。战地司令官务必牢记他有责任同政府首脑协同搞好保持民众士气的工作。这种工作并不亚于其他的任务。

要有效地做到这点,司令官可利用的主要力量是他战区内的记者。他们是各种报纸、期刊、无线电网、电影以及摄影记者的代表。有些司令官对这批非战斗人员的出现感到不快;这类人员的数字有时增长得相当大,在欧洲战区,总人数一度达到九百四十三名。

当我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两位将军在非洲首次会面时,他们赞成对记者实行严格的限制和规定,所以他们的新闻检查项目

表很长。他们虽然知道记者是政府委派到战场上来的,但是由于他们十分关心保密,以致似乎把这些新闻界人士看成是难以避免的祸害,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与国内联系的重要环节,也不是把他们当作对进行战斗有巨大帮助的力量。

在对待记者的态度上,英国表现得更加谨慎和保守,而在美军司令部一贯赞成的政策中所反映的对记者的态度,则不是那么严格;英国采取这样的态度是有充分理由的,特别是在战争开始阶段。在战争初期,特别是在1940年和1941年英国单独作战时,除了用迷惑的手段对付德国外,简直没有其他办法。他们采用了各种手法,包括设立假司令部和公布假消息以迷惑德国,使它弄不清英国拥有的军事力量,而更重要的是使它弄不清英国的军事部署。由于这种必要,就养成了以后很难扭转的习惯。

我认为,司令官对待记者的正确态度是应该把他们看成为准参谋军官,承认他们在战争中的使命,并协助他们去完成使命。一般来说,必须扣发敌人用其他办法不能取得的重要情报,这是实行新闻检查的唯一正当的理由。在战争期间,我自己违反过这个总的规定,一次是在北非强制实行了临时的政治新闻检查,一次是扣发了关于诺曼底战役的最后指挥安排的预告。这两件事,在我看来,虽然似乎有着正当的理由,但后来证明是错误的,对此我一直感到遗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庞大的美、英记者队伍中,有一批有聪明才智、爱国思想和精力充沛的人。这些人只要完全可靠,并能作到互相帮助,他们是能够得到司令官的信任的。如果做到了这点,他们自己就会很好地维护他们借以进行工作的信任和制度,而约束破坏这种信任和制度的那些人。在整个地中海区战役和欧洲战役期间,我发现记者们通常都是公正的、坦率的和有同情心的。

美军对记者的做法是,提供各种方便,容许他们随时到他要求去的地方。这虽给我们增加了一些额外的行政负担,但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全都确信我们不打算隐瞒任何错误和蠢事。如果发现了问题,就能够立刻被宣扬出来,而不致因为企图隐瞒而发展成为流脓的伤口。

把报道已投入战斗的部队的番号列入新闻检查,就会使司令官得不到鼓舞和维护其部队士气的最大帮助。战士希望被人知道,他希望别人了解他的痛苦和困难,因而推测会得到人们的感激。看来没有比他发现报纸赞扬他所在的营、团或师更使他高兴的事了。与部队番号无关的笼统提法会使士兵不满,而且迟早会表现为公开的不满。此外,敌人的任何一支著名部队,通过前线的接触,很快就会知道和他们对阵的所有部队的番号。实行以不利于作战为借口的鸵鸟政策,除了激怒新闻界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根据美军在欧洲采取的政策,特派记者负有很多责任。其中一种责任是公正地和正确地报道新闻。有些人逐渐成了某个部队或某个司令官的鼓吹者和支持者。在某个盟军司令部中,如发生这种偏见,并且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时,就成了严重问题。不愉快的事件当然就会随着发生,而且这种过错往往肯定是由记者负责,正如在其它情况下要由司令官负责一样。但当我们考虑到,当时存在过作出偏见报道的许多情况,存在过引起部队之间、军种之间和民族之间发生纠纷的许多情况,就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战地记者也和其他任何团体一样,符合各盟国合作的基本要求。

从8月份以来,由于弗兰克·小艾伦准将负责对外宣传工作,新闻界和军事当局之间的友好关系加强了。他曾是在北非和法国作过战的某个装甲战斗群的一位有成就的司令官,但我认为,他既有能力维护军事安全,同时也有能力保证向公众提供他们所需要

的消息。他的这两方面的能力对于作战有最大的价值。我把他调到统帅部来工作，这虽然使我失去了一位经过考验的战斗指挥官，但却使我摆脱了许多麻烦问题。

8月25日巴黎解放了，这对世界各地人民有着巨大的影响。甚至一些怀疑论者也开始看到希特勒的末日已到。到这个时候，敌人已经损失惨重。自从我们登陆以来，敌人有三个元帅和一个集团军司令被撤职或因负伤而失去指挥能力。隆美尔于7月19日因遭到我们一架飞机的扫射而身负重伤。几个月以后，他因逃避参与所谓7月20日谋杀希特勒阴谋的审判而自杀。一个集团军司令、三个军长和十五个师长被打死或被俘。敌人伤亡和被俘的总数达四十万名。其中半数是战俘，而在这些战俘中有十三万五千名是在7月25日以后的一个月內被俘的。

德军的物资损失包括一千三百辆坦克，二万辆其他类型的车辆，五百门强击火炮和一千五百门大炮。另外，德国空军也遭到重大损失，虽然它在我们进攻开始前就已被严重削弱，但被击毁的飞机仍超过三千五百架。

敌人的士气显然已经低落。从战俘来说，这种情况在高级军官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因为他们受过专业训练，所以已能够看到最后失败势所必然。但是德军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还没有明显地达到总崩溃的阶段，所以德国的师只要有合宜的条件，毫无疑问仍能进行顽抗。

我们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以前预测在登陆后三、四个月要取得的那条战线，在攻占巴黎时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样，从时间上来说，我们比计划提前了几个星期，但从运输能力这个重要方面说，我们却大大地落后了。由于几乎这一整个地区都是在8月1日以后的迅速行动中攻取的，所以维持不断推进所必需的公路、铁路、

仓库、修理站以及基地设备等，还在远离前线的后方。

当德军不顾溃败和混乱，成功地把大批部队撤过塞纳河时，在他们能重新建立一条有效的防线以前，我们仍有希望再次围住他们。德国第十五集团军的几个部分仍留在加来地区，在那里它们将成为撤退中的第一和第七两个集团军的坚强骨干。我们考虑，德军也许打算沿着比利时的航道所提供的某一条天然防线进行一些顽抗。如果敌人准备坚守，那么用空降部队进行一次突然的垂直包围，看来最有希望把敌人围住。

一当德军在诺曼底前线的失败成为定局，空军立即奉命为在一些相连的阵地上实施空降拟订计划，空降的适当地点还要进行选择，这个地点在战局发展时应当有最大的用途。单是在纸面上订作战计划，虽说费劲，毕竟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对一次拟议中的空降进行实际准备时，就要周密地权衡得失。要准备空降进攻，就得从供应任务方面抽调运输机，因此有时很难断定继续使用运输机执行供应任务是否会取得更大的收获。

不巧的是，从其他任务方面抽调运输机，必须在空降行动前若干日进行，因为需要一段时间来改装设备，并对机务人员讲解要领和重新进行训练。8月末，随着我们的供应情况愈来愈恶化，加之随着战斗的进展，我们极力寻求切断大批敌人的另外途径，使用空运总队就成了每天讨论的问题。我们的飞机不管天气好坏，平均每天能运输二千吨物资到前线。这个数字虽然在全部分运输量中所占比率很小，但每一吨物资都是如此珍贵，以致在作决定时需要认真考虑。

在我看来，布鲁塞尔地区正在出现发动一次有利的空降进攻的好机会；虽然由于对能否成功还没有把握，因而在从供应任务方面抽调运输机一事是否合适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意见，但我还

是决定利用这个机会。9月10日,部队空运总队暂时调离供应任务,开始为布鲁塞尔地区的空降行动进行紧张准备。但是很快就看出,德军撤退之急速使我们的这次努力成了无效果的行动。德军除了后卫部队外,根本不想对这个地区实行防御。

我们在全线向前推进,急速追击逃窜的敌人。在四天内,英军先锋部队及其在右翼并肩前进的、同样强大的美军先头部队,突进了一百九十五哩,这仅是我们部队在横越法国的强大追击中所创造的优秀进军成绩之一。9月5日,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到达南锡,并在该城和梅斯之间渡过了摩泽尔河。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到本月13日已经接近齐格菲防线,紧接着就向亚琛进攻。德军被逼退到本国边境后,有迹象清楚地表明,他们在那里要进行死守。9月4日,蒙哥马利的军队开进安特卫普,并且我们获悉,德军从这里撤走时是如此慌忙,竟没有来得及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这使我们感到惊奇。8月28日,我军攻占马赛,接着开始修复这个巨大的港口。

战局的这一发展,使我们的后勤供应问题得到了最后解决,这意味着在适当时期内,我们能够在德国边境发动一场其规模之大和火力之猛是敌人根本无法抵抗的战斗。然而,在我们取得这种有利地位之前,还有不少事要做,因为当时我们负荷过度的供应线只剩有很少一点伸缩余地。在南方,帕奇部队和布莱德雷部队必须会师,通往罗纳河上游的铁路线必须予以修复。在北方,我们面临着甚至更大的困难。

安特卫普是个内陆港,由此通过巨大的些耳德河口与海相连。德军在这些航道上的防御工事仍旧完整无损,因此,我们只有清除那些防御工事才能使用这个港口。

北方的任务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我们必须远远往东建立一条战线,以掩护安特卫普及由此通往前线的各条公路和铁路。其

次,我们还必须摧垮位于该港和海口之间的德军防线。最后,我希望先锋部队尽量向前推进,如有可能,甚至渡过来因河建立桥头堡,以威胁鲁尔和便于以后的进攻。

在蒙哥马利一侧,迫切需要决定的问题是应优先进行哪一项任务。首先需要把我们的战线尽量向东推进以保证安特卫普的安全,否则这一港口及其一切设备就将对我们毫无用处。这项任务必须立刻进行,在这项任务完成以前,其他任务甚至不能开始。同样明显的是,在通向该港的航道上的防御工事全部肃清以前,它对我们是没有价值的。德军在南贝佛兰德岛和伐耳赫伦岛上建立了坚固的防线,所以这将是一场激烈的和旷日持久的战斗。我们动手愈早,就愈加有利。但问题仍然在于,在我们进行攻占安特卫普所有航道这一艰巨任务以前,继续向东突进,追击还在撤退中的敌人,以期渡过来因河在鲁尔附近取得一个合适的桥头堡,这对我们是否有利。

当我们正在研究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时,蒙哥马利突然提出这样一项建议:只要我们能够提供一切装备支援他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他说他就能直捣柏林从而结束这场战争。我确信,蒙哥马利元帅从后来的情况看,也会同意这个建议是错误的。但在那时,他受到前一星期我军迅速进展的激励,并且由于相信敌人的士气已彻底瓦解,所以满怀热情地宣称,只要他有充足的供应,便可直捣柏林。

9月初,当我从前方地区视察回来时,因在滩头被迫着陆而受了轻伤。当时突然遇到暴风雨,我们发现已不可能飞回统帅部附近的简易着陆场,而且除了邻近的滩头我们已无处着陆。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以前,这个滩头曾是德军的要塞地带,而且一度布了地雷。这样,虽使我们的处境更为困难,但我们极力使飞机远离水边,以



防被涨潮淹没。就在这时，我的一条腿严重扭伤。我的驾驶员安德伍德中尉扶着我越过海滩，而我则注视着前面平坦的沙滩，忧虑地提防着埋有爆炸物的任何迹象。我们走上一条乡村公路，开始了向统帅部的长途跋涉。天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狼狈而行，但并没有指望搭乘一辆过路汽车，因为士兵们很少使用这条偏僻的道路。但在几分钟内，从我们后面驶来一辆吉普车，里面挤着八个士兵。

我们招呼它停了下来，车里的士兵立刻认出了我，并跳出来帮助。他们看到一位将级司令官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淋着大雨跛行，显然感到惊奇。我要他们把我送到统帅部，他们对我非常关切，以致几乎是把我抬进了吉普车的前座。而且为了小心地防止挤住我那条伤腿，只留司机一人坐在前面。我至今仍不明白，其他的人究竟是怎样挤进车的，又如何设法把我的驾驶员也弄上车的，但是他们的确都坐上了车。

我被迫卧床两天，而且此后不得不在腿上用了—个时期的石膏夹。记者们发现我不在统帅部，就猜测我可能因操劳过度而病了。当这个猜测见于报纸时，我不得不公布这次遭遇的详情，而且希望我妻子在收到我的说明情况的信以前，不致于把这个事件看得过分严重。

行路虽然暂时还有困难，但为了使蒙哥马利完全知道我们的计划，9月10日，我和他在布鲁塞尔会晤。当时泰德空军上将和盖尔将军也在那里。

我向蒙哥马利解释了我们供应系统的情况，并向他说明我们需要尽快使用安特卫普。我指出，如果来因河上没有铁路桥梁，如果我们手头没有大量的物资储备，就不可能在德国维持一支能突入其首都的部队。在德国中部，敌人还有一支相当庞大的后备部队，因此我认为，象他所建议的那样径直插入德国心脏，除了必取

灭亡外，不会有其他结果。不管在前线的哪一部分作此试图，结果都是一样。因此，我不会考虑这个建议。

在8月末，如果我们停止前线其他地方所有盟军的行动，他可能会、也许肯定会成功地建立一个直接威胁鲁尔的强固的桥头堡，正如我们把其他部队需要的给养拿来供应别的一支部队时，后者能更快更远地向前推进一样。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一处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会使前线其他部分陷入难以恢复的危险境地。

蒙哥马利将军只熟悉自己战区的形势。他知道，如果支持他的建议，就意味着除了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外，要使其他所有部队在好几个星期里偃旗息鼓。但他不了解，当他的部队因需要的给养超过供应的可能而被迫停止前进或后撤时，我们漫长战线的其他部队就会处于无法支持的境地。

我通知他，我在北部最需要的是使安特卫普发生作用，同时我还需要一条掩护这一港口的战线。此外我认为，我们利用空降部队的援助，有可能在来因河对岸的阿纳姆地区夺取一个桥头堡，从侧面进攻齐格菲防线。夺取这样一个桥头堡的战斗——其代号为“市场—花园”——将只是一个附带的行动和向东方的扩展，这一扩展会使我们突进到我们的暂时安全所需要的一条战线上。我们北侧的这条战线就是来因河下游。如果没有这个屏障，就会使我们处于完全无掩护的地位，特别是在蒙哥马利为伐耳赫伦岛的作战必须集结重兵的阶段。

如果这些事都能做到，那么在扩大后方勤务以前，我们在北方将不再作重大推进。但我们能够而且也必须在漫长的战线上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以利于后来的大规模进攻。蒙哥马利迫切希望夺取桥头堡。

因此，在9月10日的布鲁塞尔会议上，蒙哥马利元帅被认可推迟清除安特卫普航道的行动，并允许他竭尽全力去夺取我所要求的桥头堡。为了支援蒙哥马利，我把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拨给了他，这个集团军不久前组成，由美国空军的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指挥。进攻的预定日期暂定为9月17日，并且我答应尽我所能给他提供供应，直到这次战斗结束。在夺取桥头堡战斗结束后，他要立即回头利用全部兵力去夺取伐耳赫伦岛，以及德军用于防守安特卫普航道的其他地区。蒙哥马利开始全力执行这个任务。

除了供应任务外，我们所有的工作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所以联合参谋长会议在魁北克的会议上作出决定：驻在英国的两个轰炸机队不再需要归我个人直接指挥。联合参谋长会议所作的一个安排是：通过设于伦敦的一个联合机构使战略轰炸机直接隶属于联合参谋长会议。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笨拙和效率很低的安排，但就我们的军事行动而言，怎么办都一样。这是因为指令中有一段规定：欧洲最高统帅有优先使用战略轰炸机的权利。由于有了这一保证和明确的权力，所以尽管我认为这个安排是笨拙的，但没有予以反对。

在我告诉斯巴兹这种安排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以前，他是坚决反对战略轰炸机的这个新指挥系统的。哈里斯原来是个以主张只以轰炸取胜而著名的人物，同时还被人们认为是嘲笑过动员陆、海军的行动的人，但连这样一个人这时也以作为“盟军陆、空协同作战编制”中的一员而越来越感到自豪了。当他接到他被划归联合参谋长会议直接指挥的命令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以下是这封信的摘要：

1944年9月21日

亲爱的艾克：

在新的部署下，我和我的轰炸机总队不再能在您的直接指挥下工作

了。虽然我确信您会认为我的保证是多余的,但我还是要借此机会向您保证: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将一如既往,竭尽一切技能和力量,为继续支援您的部队而投入战斗……

在整个战役期间,不论安危,我们一贯得到您的帮助、鼓励和支持,对此,我谨以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我的轰炸机总队,向您表示谢意和感激……

我们轰炸机总队不但向您表示祝贺和感谢,而且也向您表示,只要您有所需要,我们将随时随地竭力为您效劳。我热诚希望,我们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继续努力,共同完成我们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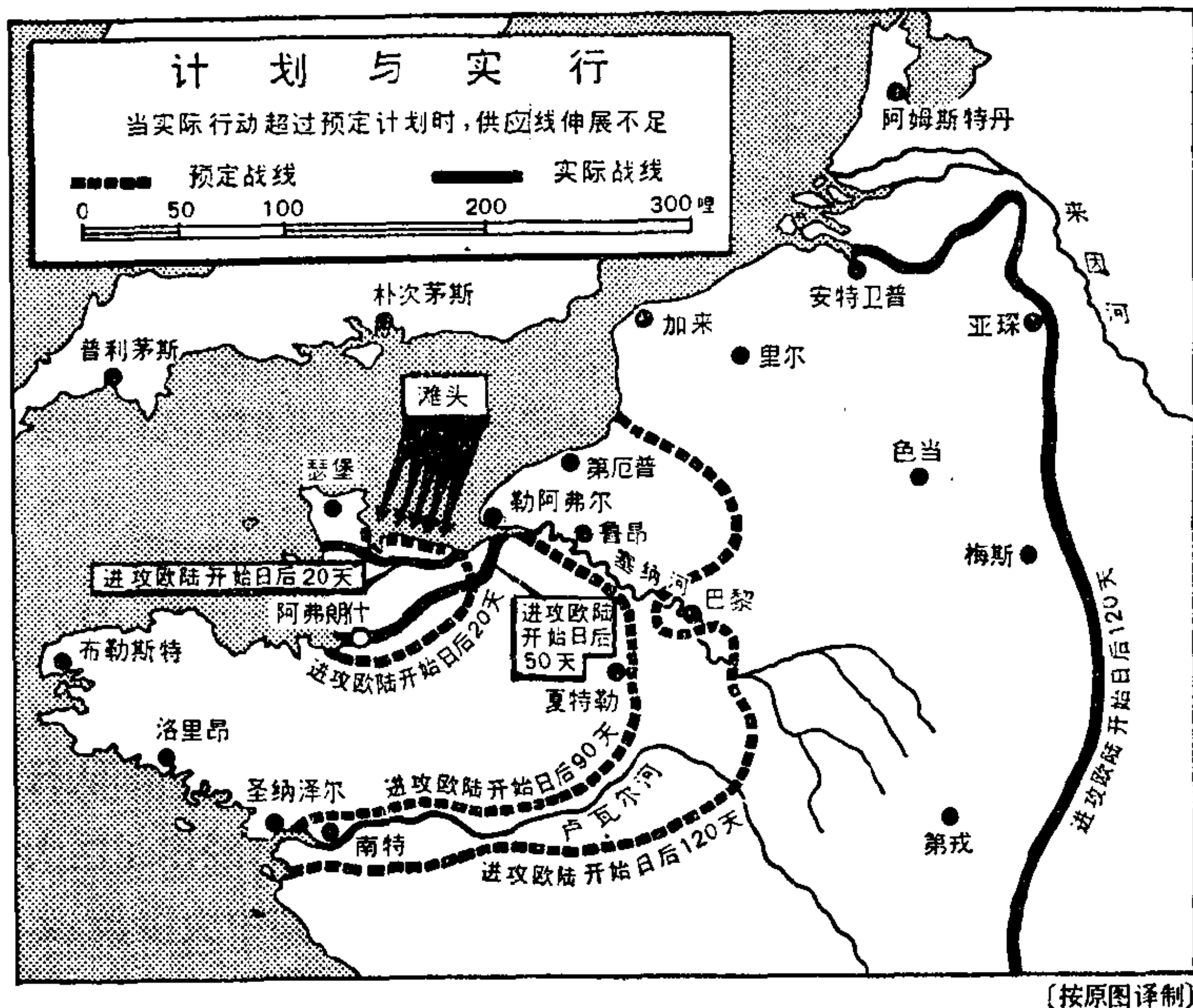
您永久的朋友

伯特

在整个战线上,由于不充分的交通线,我们日益感到部队行动愈来愈困难。供应处为使我们将前进到最后一分钟,已经作了巨大而有效的努力。它接收了法国的主要公路线,并将其中大多数改为单程交通线,从而建立了卡车运输体系。这些川流不息地行驶着卡车的公路被称为“红球公路”。每辆车一天至少要行驶二十个小时。替换的驾驶员是从各个能够提供的部队凑起来的,而卡车只是在需要装卸和维修时才容许停顿下来。

铁道工程兵日夜不停地在修复损坏的桥梁和路轨,设法恢复铁路车辆的运转效率。通过铺设于英吉利海峡的可以伸屈的管道,把汽油和燃料用油输送到欧洲大陆,再从滩头通过地面管道把这类油输送到主要分配地点。航空工程兵以惊人的速度铺设着简易着陆场,这支工程部队所表现的士气和忠于职守的精神,可与全军任何作战部队相媲美。

在敌对行动结束以后的几个月里,我有很多机会和俄军的将领们回顾各种战役。我不但和他们的元帅及将军们讨论过供应问题,而且也和斯大林大元帅就这个问题谈了相当长的时间。这些



俄国军官毫无例外地向我提出一个迫切要求,希望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供应方法竟使我们从诺曼底狭隘的滩头阵地一下子横扫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而直捣德国边境的。因此,我必须向他们说明我们的铁路的维修和建设制度,以及装卸、调度和空运等制度。

他们建议,在这次大战的所有辉煌战绩中——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战绩在内,盟军越过法国追击敌人时在供应方面取得的成就,应作为最大的惊人事迹载入史册。他们这样说也许只是出于礼节,但我仍希望在那些振奋人心的日子里为了设法使前线得到每一磅弹药、汽油、食品、制服和各种供应而艰苦工作的人们,都能听到这些话。

尽管我们为建立供应系统作了异乎寻常的努力,但是供应仍旧是我们最严重的困难。在整个战线上,到处都可听到要求更多

弹药和汽油的呼声。我们的每一支先锋部队本来都能比实际取得的进展前进得更远、更快。我过去和现在都相信，在巴顿的战线上，梅斯城在当时是可以攻下的。虽然这样，但我们仍不得不按每个部队的基本任务给予供应，而且也只能这样。

9月11日，也正是在法国南部登陆后的第二十七天，我们的右翼和帕奇的先头部队在第戎附近相连接。从此以后，对梅斯以南我军所有部队实行充分供应方面存在的唯一问题，是修复通向罗纳河流域的铁路线。和帕奇部队相连接的结果是，大批德军在法国西南部被围困。德军开始零零碎碎地向我们投降，只有一次，德军以二万名之众集体投降。

17日，我军在最左面按照预定计划向阿纳姆发起进攻。三个空降师在那里从北至南纵向降落。最北面的是英国第一空降师，往南是美国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两个空降师。进攻发动得很顺利，要是没有恶劣天气的干扰，进攻肯定会获得成功。恶劣的天气妨碍了对北面先锋部队的充分增援，结果使英国空降师遭到严重伤亡，整个战役也只取得了部分胜利。我们虽然没有夺得桥头堡，但战线的迅速推进，已足以使我们保卫安特卫普基地。

战斗的进展吸引了这个战区每一个人的注意。我们对空降部队感到非常自豪，但这场战斗的意义还有比自豪更加深刻的东西。我们认为，这次战斗将证实德军是否能重新组织有效的抵抗，而且根据这次战斗的结果，我们会对今后战斗的激烈程度作出一个估计。当时的一个普遍印象是认为，这次战斗确实是立即开始向德国心脏推进的全面尝试。这就使这场非常富于戏剧性的战斗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

当时空降部队及其地面支援部队虽然英勇奋战，但仍被阻于途中。我们有充分证据说明，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面。充当先锋



的英国第一空降师进行了顽强战斗，这是这次大战中最英勇的战斗之一；它坚强的战斗精神，实质上支援了它后面的两个美国空降师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地面支援部队，使它们得以夺取和固守一些重要地区。但这个英国空降师受到严重损失，大约只有二千四百名士兵从河上撤退至安全地区。

这时的关键问题是毫不延误地夺取安特卫普的航道。当时，蒙哥马利的兵力非常分散。他的战线呈不规则凸出部，直达来因河下游。他必须在些耳德河口集结大量兵力，并且还要为围攻沿海敌人仍在坚守的一些小港提供部队。为了使他有时间为些耳德战斗集中兵力，我调给他两个美国师，即林赛·西尔威斯特少将指挥的第七装甲师和特里·艾伦少将指挥的第一〇四师，艾伦是参加过突尼斯战役和西西里战役的老将。

美国第一集团军在结束了从塞纳河到德国边境的出色的进军后，立刻发动了几次战斗，最后攻陷亚琛，这里是进入德国本土的通道之一。这个城市的守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柯林斯的第七军巧妙地完成了这次进攻。这个军在10月13日包围了敌人守军，攻入城内。敌人逐渐被迫退入市中心的一座大楼，那里是他们的最后堡垒。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制服了他们。我们拉来了一五五毫米口径的“长臂汤姆”<sup>①</sup>，在距离大楼不到二百码处实行平射，逐步把围墙轰得粉碎。在几枚炮弹打穿了大楼之后，德军司令官于10月21日投降，并且懊丧地说：“当美军开始使用一五五毫米的大炮当狙击武器时，就该投降！”

德弗斯的第六集团军群在南面开始行动，并从9月15日起归我指挥。至此，盟军最高统帅部所指挥的战线，南起地中海区，北

---

<sup>①</sup> 即主炮。——译者注



至来因河口，绵延数百哩。

德弗斯的兵力包括帕奇中将指挥的美国第七集团军和塔西尼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这个军以前作战时受帕奇指挥）。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包括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以及最近组成的、由威廉·辛普森中将指挥的第九集团军。蒙哥马利仍拥有登普西的英国第二集团军和克里勒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暂时调给他的盟国空降集团军直属盟军最高统帅部。

10月份，我们获悉，其他战区需要利-马洛里。我虽然不愿意放他走，但当时我们的机构显然已经健全，协作也已相当完善，所以同意了 this 调动。此后不久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亡，从而使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位刚毅勇敢的人物。

夏末，盟军最高统帅部开始从它在欧洲大陆上的最初所在地格朗维耳迁到巴黎城外的凡尔赛。在选择新址时，我希望在巴黎东部较远的地方找个合适的地点，以免去前线时经过拥挤的市区。但是，由于通讯联络主要线路的位置以及巴黎东部地区缺乏现成的设备，所以参谋部一开始就不得不把凡尔赛选为指挥作战的最合适地点。我在兰斯城外设立了一个前沿指挥所，从那里我可以很容易地到达前线任何一个部分，即使在无法飞行的日子里。

从9月1日开始的以后三个月中，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旅途中。战线不断扩展，距离愈来愈远，以致每次视察都得花费不少时间。但是，这些视察都很有价值，值得花费这些时间和精力。由于坚持了这种做法，所以我能够到各司令部去访问司令官，和他们讨论发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够了解部队。两个月后，当冬季来临时，通向兰斯我的小营房的曲折道路有时变得难以通行。一天下午，我的车陷在沟内，等了三个小时，才用牵引车把它拖了出来。这种情况迫使我搬回凡尔赛统帅部，从那时起，除了良好的飞行条

件以外，出门就变得更不方便了。

在秋天的一次视察中，我在一个前沿地点停了一会儿，和第二十九步兵师的一个营的好几百名士兵谈话。我们大家都站在一个泥泞滑溜的山坡上。我在进行了几分钟的视察后，转身要走时摔了个脸朝天。于是引起大声狂笑，从笑声中我完全相信，在战争时期我和士兵的会见中，没有哪一次能比这次更为成功。甚至连冲上来帮助我的那些人，也笑得几乎不能把我从泥潭中拉起来。

我的朋友们时常劝我，要我放弃或者减少对部队的视察。他们正确地指出，现在士兵的数量那么多，我个人只能和其中很少一部分人谈话。因此，他们议论说，这样做除了把我自己弄得精疲力竭外，对全军来说，收不到什么重大效果。我不同意这个意见。首先我认为，经常和士兵谈话，能如实地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我和他们无所不谈，我最喜欢向他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哪个班或排已经想出可以用于步兵作战的新方法或新发明。只要我能使士兵们也和我谈话，我什么都愿意谈。

我当然知道，即使我和某个师中的少数几个人谈了话，消息也会立刻传遍全师。我认为，这样会鼓励士兵去和他们的上级谈话，并且我相信，这种做法能提高战斗力。在大批扛枪作战的士兵中，蕴藏着大量的发明才能和首创精神。如果士兵能自然地、毫无拘束地和军官谈话，他们的才能所创造的成果将有益于全军。另外，这种做法还能产生相互信任，即共事感情，这是集体精神的精髓。一支害怕本军军官的军队，决不会与一支信任其领导的军队一样优良。

有这样一句古话：“沙场荒凉。”在一个目击过战斗的人看来，这是一句富于描写的话，也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除了象渡河或两栖突击这类非常集中的战术行动外，前方地区的普遍感觉是孤

单寂寞。那里简直看不到什么；当部队疏散开来准备作战时，朋友和敌人乃至武器似乎都已从视野中消失。士兵们很容易控制不住自己而大发脾气，因为每个士兵都感到非常孤单，而且每个人为惊慌和恐惧所折磨，生怕移动或暴露自己会招致立即死亡。在这时，对领导的信任，也就是与领导的战友感情和对他们的信赖就会起作用。

我个人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起不了很大的作用。但我知道，如果士兵体会到他们可以和将军们谈话，也就不致于害怕尉官了。此外，我的榜样也许能鼓励军官们去向士兵们了解情况和与他们建立战斗友谊。不管怎样，我在整个战争期间坚持了这个做法，并且不论是与个别士兵的谈话或者与成批士兵的谈话，对我总是有好处的。

此外，各次视察也都是认真讨论问题的机会，而讨论特别多的是有关补充、弹药、制服、冬季装备和未来的计划等问题。当然，各级参谋部门经常在处理这些问题，部队的各种需要会通过参谋系统按照规定自动地得到供应。但这决不能代替司令官之间的直接联系，而且一位高级军官经常出外视察，比在司令部坐等下级来汇报，要更有价值得多。

必须不断密切注意战斗部队的士气。只要士兵们认为他们得到的待遇是公正的，认为上级关心着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功劳为人所知并且受到了赞扬，那么他们吃苦耐劳的能力就几乎会是无限的。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士兵是不公正待遇的牺牲品，就会理所当然地引起他们的愤怒和不满，而且这种情绪会象野火般地蔓延于全军。在非洲时，有一次，前线的部队向我抱怨，说他们得不到巧克力糖和纸烟，当时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已充分地发到供应处了。我问了当地部队的司令官，他说他已再三要求过这些东西，但

只是答复说没有可以利用的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往前线。

我只给后方打了个电话,并指示说:在前沿机场和前线部队得到这些应得项目的份额以前,不准发给供应处任何人一块糖、一支烟或一支雪茄。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从前线收到一份令人高兴的报告,说他们的要求正迅速地得到满足。

1944年秋,发生了一件使人生气的事。当时前线最感缺乏的两项物资似乎是汽油和纸烟。有一份可靠的报告说,巴黎的黑市充斥着这类物资,而且是由供应处人员操纵的。我们立刻组织一个小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并揭露了所有的卑鄙勾当。我们原来以为,有些人一定是因受食品和纸烟高价的强烈诱惑而落水的。但这个案件表明,实际上是整个供应处组成了一个神通广大的走私集团,并且整卡车和整车皮地在出售这些物资。这个罪行的阴险,与其说是偷盗财物,不如说是对前线的掠夺。我对此非常愤怒。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美军的这一整个单位不是突然走向犯罪道路的。合乎逻辑的是:我们以为,这个卑鄙勾当最初是由少数几个坏蛋搞的,而其他的人几乎是不自觉地陷了进去,而一陷进去就难以自拔了。

我命令司法人员对这个罪行提出起诉——幸好这些人并不象最初报告的那么多——,但我告诉他们,判决未经我个人看过不得最后批准。当这个案件审理完毕后,我才说明了我的处理办法。这就是给每个受审人一个机会,让他们自愿去执行前线任务以恢复自己的名誉。一些严厉的判决已在全军公布,因此前沿部队都知道犯罪的人没有逃脱法网。但现在我决定给犯罪的人一个机会。其中大部分人急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清除了自己名誉上的污点,体面地得到了开释。然而参与这个勾当的军官并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由于整个战线上出现了不幸的情况,我们开始遭到比例相当

高的非战斗伤亡。战壕足就是一个主要原因。治疗很困难,有时几乎无法治疗,但医生发现预防是比较简单的。有效的预防只是一个纪律问题:确保每个士兵重视规定的操作方法,即至少每天脱一次鞋袜,按摩足部五分钟。为了确保这个动作做得适当,正规的作法是两人对坐,看着表,彼此轮换按摩五分钟。我们仅仅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但当我们一知道预防效果,就在流行这种病的所有地区严格推行这一措施,从而使这个严重的伤亡数字每月减少了数千。

医疗工作是有效率的,在美军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一百个伤员的死亡率还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半。这有很多原因,其中有配尼西林和磺胺制剂的问世、血浆的及时使用以及有效的伤员撤退系统,即用飞机运走大量伤员。在对待伤员方面,医生的任务是尽快地使士兵恢复健康和投入战斗,如果伤员成了残废,就把他迅速、安全和舒适地转到国内医院。医生、护士队以及有关人员在这两项工作中作出了出色的成绩。有些伤员在一年的作战中,曾数次从医院返回前线。我看到另外一些人被安置在离前线几百哩的后方医院,那里经常几个小时内就要接纳一个残废伤员。

关心士兵的福利,始终是各级司令官的事。但在1944年秋季,这件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盟国士兵当时面临着平常战斗中的各种艰苦和危险,而这种情况使得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难以忍受。这是一场既要管理家务,又要打击敌人的斗争。但是我的同事和我认为,必须保持作战进度。这个任务就是一方面对敌人保持猛攻的速度,一方面在秋冬之际加强兵力和供应,准备在春天对敌人发动最后的致命打击。

美国陆军的司令官都是我自己挑选的。自从非洲战役开始以来,马歇尔将军和我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谅解。他说:

“你不必接受或保留你不完全信任的司令官。只要他在你的战区担任指挥职务，我就相信他是你满意的人。这么多人的生命处于紧急关头，我不愿意让你在误解你的职权和责任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你的职权和责任就是拒绝或撤换任何你所不完全满意的人。”马歇尔将军从不破坏这个原则，而我对我的高级部下也规定了这样的办法。

在“霸王”行动初期，丘吉尔首相和布鲁克元帅曾顺便告诉我，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对我部下的某个英国要员有所不满，他们就决心立即撤换他。从“火炬”行动的第一天以来，盟国的合作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时期。

我们在陆、空两方面，都有精锐的部队和优秀的司令官，而且每天愈来愈多地从美国来到这里。我们除去不断加强兵力外，最需要的就是对前方地区的供应。我们确信，到我们能够提供供应时，我们就会有为肃清西欧敌人而发动决战所需要的兵力。

当我们在西欧迅速推进时，盟军的先头部队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到处传着同样的消息。居民都在饥饿和贫困中生活，但是现在他们重新获得了个人自由，取得了和邻居自由交谈和了解外界事物的权利，这种欢乐情绪看来至少暂时掩盖了他们所遭受的饥饿和痛苦。这些国家的人民实际上已经过了四年多的囚犯生活。

在那个时期，这些国家的对外贸易已经停止，工业转而为纳粹利用，人民每天时刻担心着被拘禁和碰到更坏的遭遇。甚至外界的消息都是经过过滤后，通过纳粹控制的报纸和电台才传到他们那里。当然他们也偷偷地从英、美两国的广播中知道一些消息，但不能随便传播，如果收听者被发现，就会受到严惩。这些国家的人民看见盟军到来，大家群情激奋，有时甚至使我们的士兵感到不

安,但是我们对人民因摆脱纳粹压迫而表现的极大欢乐是毫不怀疑的。

西欧各国重新建立的政府和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合作是诚恳的。各国尽能力之所及,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劳力和其他援助。当然,也有与我们意见不同的。这些人拥有武器,长期进行地下活动,习惯于偷偷地用暴力达到他们破坏的目的,他们不容易再使自己适应正常社会秩序的要求。在有些情况下,他们要保持和扩大其权力,想成为被解放国家的统治者和控制者。这些情况虽然引起了局部的、甚至有时令人忧虑的困难,但却被人民要求在自由制度下重谋生计的迫切希望掩盖住了。

由于1940年的停战协定把法国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由于法国地下武装不但强大,而且非常活跃,所以在重建稳定局势时,碰到的困难就比平常的更大。然而,法国的农民一如既往,一心耕耘土地,继续勤劳地管理庄稼。城市中就混乱得多了,因为共产党人渗入了工会和其他部门,造成国内尖锐的政治对立,这表现为议会的分裂,表现为甚至在战争时期的某种程度的不团结。例如,以前的地下武装力量的大部分,或者说被称为游击队的那些人,就拒不参加法国陆军,除非作为单独编制。他们坚持要建立自己的团或师,由他们自己的领导统率。

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担心他们甚至会在全国各地作为武装集团保持下来,随时向中央临时政府的政权挑战。法国政府不能全部接受他们的方案,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建立两支法国军队,一支军队忠于这个被普遍承认的政府并受其领导,而另一支则只对自己负责。尽管如此,法国政府还是制订了一个以不超过营的规模收编游击队的方案。

一些有头脑的法国人经常和我讨论他们国家在1940年崩溃的

原因。在别的国家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法国军事的瓦解主要是因为过分相信马奇诺防线的效能。我还没有发现任何法国人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沿东部边境建立这条坚固的防线是必要的，而且说，如果当时法军能聚重兵于防线北侧以抗击德军通过比利时的进攻，这条防线会起很好的作用。他们还认为，军事上的困难起因于内政上的弱点。有一个法国商人对我说：“我们从内部打败了自己；我们是企图用每周四日工作制抵抗德国的每周六至七日工作制。”

总的说来，被解放的人民对美国及其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无知得惊人。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作出的努力，竟被纳粹的宣传贬低和嘲弄到这种地步，以致美军的显而易见的力量使西欧人民大为惊奇和迷惑不解。我们用种种办法试图向他们指出许多事实，说明美国在参战前的状况和参战后作出的贡献。但由于不了解情况而造成的隔阂是如此之深，以致我们所做的工作只取得了部分成绩。我们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

此外，战争并没有肃清法国的分裂势力。共产主义的教义在从事地下活动的大部分人中显然已经流行。在快要解放的时候，共产党——它人数不多，但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开始削弱法国在西欧恢复其强盛和繁荣的民族意志。

在我们后方，各地党派之间的不团结并不影响盟军的军事地位；被解放的人民，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政治派别，对我们都是友好的。但在我们从法国沿海一直延伸到前线的交通区内，还存在着一一种有威胁的、实际的弱点，这种弱点的确会使我们将来的进攻受到危害。当时，象维持生命的血液一样的供应，其流经我军战线前端的数量简直微弱得可怕。



## 第十七章

### 德国边境的秋季战斗

9月,我军大量拥向德国边境。敌人的防御,无论从自然条件或人工条件看,都是强大的。德弗斯的美军第七集团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正往东向孚日山脉迂回。这个山脉构成一道传统的防御屏障。北面是齐格菲防线,它凭借来因河构成一个只有给养充足、坚毅果敢的部队才可能突破的防御体系。

当时,我们还是依靠瑟堡和阿罗芒什的港口。由于这些港口容量不大,对外交通有限,集结前沿后备军的工作根本不能开展,甚至每日难以保持有足够的兵力投入前线阵地。在我们能使安特卫普和马赛港充分发挥作用前,这种情况将肯定会继续下去。关于安特卫普,布莱德雷9月21日给我的信中说:“……今后所有的作战计划总是要关联到来因河以外各种规模战斗的补给问题,安特卫普的港口是个关键问题”。他从没有忽视过这个问题,即后勤将是最后击败德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坏天气的到来,供应处又增加了一个养路问题。因为欧洲很多公路的路基很浅,特别是比利时,载重卡车压坏主要公路路面的情况频频发生。用足够的沙石去填满由此而造成的泥泞路面,把公路修到可以使用的地步,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减少对公路的依靠,我们运来大量车皮,去更换早期在战争中被破坏了的的车皮。为了迅速完成这项工作,铁道工程兵提出了

一个简便方案，这方案因其良好效果而被采纳。象车厢这样的重型装备，在一般情况下只卸在有准备的码头上。由于必须使用重型吊车和横江铁索，卸船极为费事。但是我们的工程兵只是在登陆艇的舱底铺上铁轨，再把地上的铁轨铺到上船和登陆的海滩的水边，然后把船上和陆地上的铁轨顺势连接起来，这样就便于把车厢推进和推出登陆艇。当秋季这几个月补给战正在进行和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前线的战斗一直没有停止过。

我们的地面部队那时还没有达到最高数字，因此仍在继续不断地增加。8月1日，我们在这个大陆上的兵力共有三十五个师，其中包括在联合王国的四个美国师和两个英国师。到10月1日，我们在这个大陆的总兵力，包括经由法国南部向前挺进的第六集团军群，以及正从联合王国开拔的六个师，共有五十四个师。但各师都缺乏步兵补充兵员，所以从地面部队的兵员总数来说，德国人还占明显的优势。我们的部队部署在北自来因河岸南至瑞士边境这样一条长达五百哩的战线上。分遣队部署在对着瑞士以南的法、意边境上，以防意大利的德军袭击我们的交通线。

这就是说，把步兵师、装甲师、空降师都算在内，我们在前线每十哩布置不到一个师。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为了保存我们建立后勤系统所需要的力量和避免冬季作战的艰苦，应及早采取防卫措施。但我拒绝采纳这样的主张，而所有的主要司令官都同意我的意见，即加紧作战对我们有利。

当时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即认为在我们军队和后勤能力所允许的范围内保持我们的进攻是有利的。这一考虑出于这样一种认识：敌人为了补充7、8、9三个月所遭到的重大伤亡，正在匆忙组织和装备新师，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把只经过初步训练

的部队投入战斗。这样的部队,在开始作战时,战斗力很弱,立即对他们发动进攻,比之等待他们继续完成训练并建立了防御工事而成为敌人的精旅后再去进攻,损失将会小得多。

我们要求情报部门逐日对前线各部分敌人的伤亡进行详尽的分析,目的是避免进攻敌人伤亡比我们小的那些地区。在这个时期,我们的一个一般性指导原则是:除了具有象罗尔水坝那样的特殊目标和重要目标的地区外,只在那些根据逐日统计敌人的伤亡比我们多一倍的地方实施进攻,对我们才有利。

我们确信,通过持续不断的进攻,只要不顾艰难困苦,就能获得比敌人更多的有利条件。特别是我们确信这种策略终于会缩短战争的时间,从而拯救数以千计的盟军士兵的生命。

由于一系列激烈的争夺战经常是在最困难的气候和地形条件下进行的,所以这年秋季成了一个值得回忆的时期。伐耳赫伦岛、亚琛、赫特根森林、罗尔水坝、萨尔盆地和孚日山脉,在1944年秋天的几个月内,它们的名字都成了战役的名称。由于这些胜利,总的结果是大大加快了欧战的结束。当时除天气的障碍之外,又有缺乏弹药和供应的困难,但盟军士兵的大胆、勇敢和机智,从来没有象这个时期那样经受了全面的考验,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我们日益壮大的地面部队,其力量因有强大而有效的空军而增强。

从战术上说,空军有机动性。这种机动性使高级司令官掌握了可以连续攻击相距数百哩的目标的有力武器。空中轰炸是如此集中,能使敌人的防御部队惊慌失措,这种效果是不论多少门大炮都难以达到的。

对于袭击可接近目标的精确性来说,空军一般不如炮兵。况且对于一般目标,空军只能造成破坏,不能彻底摧毁。对一个工业基

地的单独一次袭击是决不能把它消灭的,甚至在连续轰炸下,部分地方仍可修复。除非有一段较长时期的好天气,交通线决不能被完全切断而达到毫无使用希望的地步。但空军能使它所攻击的任何目标瘫痪;而如果空军有理想的飞行条件,并被高度集中使用,就能使被攻击目标接近完全不能使用的程度。

一架单独战斗机的空中攻击是一刹那的事,所收的效果总与最初的估计不符。空军关于炸毁车辆,特别是炸毁装甲车辆的报告,总是过于乐观。这倒不怪驾驶员。每架战斗轰炸机都装有自动摄影机,自动记录每次攻击的可视效果,胶卷在基地上审查后,就成了“空军请功”的根据。但我们发现这种方法并不提供对实际所造成的损失的准确估计,只有在地面部队占领这个地方以后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

把一个高吨位的爆炸物一举送进某一指定地区,空军的这种威力是独一无二的。用大型轰炸机担负这个任务,有利于减少前方交通线的紧张。每一枚炮弹所使用的弹药都卸在主要基地上,从那里通过拥挤的铁路和公路运往前线,经过几度转手之后,最后才能到达炮位以供使用。大型轰炸机一般都停在很远的后方,我们的停在联合王国。它们所使用的炸弹,或者由所在国制造,或者由美国用货船运去。炸弹从工厂和港口被运到合适的机场,从那里就可一下子拿去直接轰炸敌人。

空军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推动地面战斗的进展。最普通的作用是防止敌机对我们地面部队的干扰,还可以用战斗轰炸机轰炸前线的特定目标,给地面进攻部队以战术上的支援,或者以猛烈的轰炸协助地面部队容易地攻占坚固的防御据点。当然在这些近距离支援的活动中,空军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欧洲,恶劣气候就是空军的大敌。出乎意外的暴雨,浓雾和密云常常严重打乱作战计划。

12月中旬,恶劣的天气使空军没有能侦察出在阿登集中的德国备用兵力,并使我们在那个战役开始后的第一个星期很少使用空军。况且由于空军的特点,它不能长期留在前线,每架飞机必须定时飞回基地加油和维修。这就使在前线只有极小一部分可调用的飞机。所以尽管我们的空军力量在总数上相对地占压倒优势,而敌机仍能偶然飞来袭击我们的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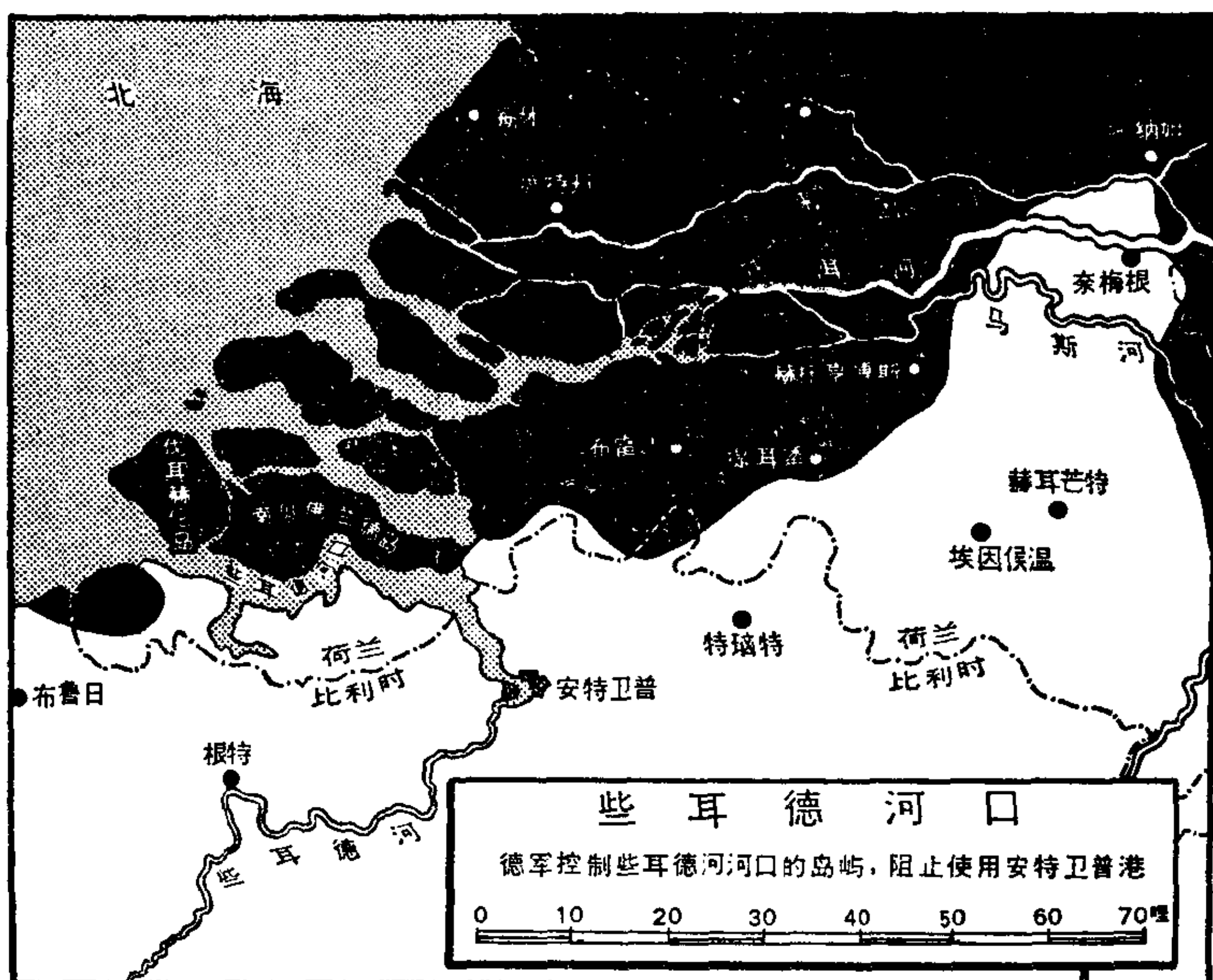
空军还有另外的重要用途,一是攻击敌人的补给线,另一是加强地面战斗的决战能力。每个地面司令官都在寻找歼灭战,只要条件允许,他会试着在现代战争中因袭坎内战役<sup>①</sup>的老例的。一个大战役开始的时候,歼灭战只能用于敌军总兵力中的某些孤立部分。使用空军破坏桥梁、渠道、铁路、公路和运河,即使交通线未被完全切断,也能有助于孤立被攻击之敌。

1944年秋季,我们各作战部队的空军力量,包括辅助轰炸机力量在内,大约有四千七百架战斗机,六千架轻轰炸机、中型轰炸机和重轰炸机,四千架侦察机、运输机和其他种类的飞机。

在秋季的几个月中,除继续集结足够的兵力外,按照原订计划,在作战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北面,除了夺取通向安特卫普的各条道路外,还希望逐步封锁来因河,因为在强渡来因河时,我们将从这个地区发动最猛烈的攻击。再往南面,在布莱德雷的战线上,则有利于发动一些预备性战斗,以期最终消灭来因河以西的全部德军。所以我们不仅要消耗敌人以后用于防卫来因河的兵力,而且还要保证萨尔地区一些地方的安全。因为当我们准备包围鲁尔时,计划与北面的一些地方配合,从萨尔地区的这些地方发动强大攻势。

---

<sup>①</sup> 坎内是意大利东南部的村名。公元前216年,汉尼拔曾在这里附近运用两栖夹攻和最后大包围的战术击溃在数量上占优势的罗马军队。——译者注



[按原图译制]

在这次秋季战斗中,我们又遇上了天气这个老对头。这年6月份,滩头风暴之强烈,创造了四十年来最严重的记录。秋季洪水打破了过去几十年的另一项气象记录。11月1日前后,很多河流决堤,整个战线的气候条件推迟了我们的进攻。尽管有这些恶劣条件,但我们仍然按照总的计划,建设巨大的基地和通往德国边境的交通线,封锁来因河——开始时重点放在左侧——,准备消灭整个河西的德军和对德国心脏进行最后突击。

夺取安特卫普周围地区是艰苦的一仗。敌人在些耳德河口严密布雷,伐耳赫伦岛和南贝佛兰德岛上的德军又完全控制了通往这个城市的各条水路。不幸的是,9月初,我们向东北大进军时,夺取这个地区未能成功。

要拿下这些据点,需要海、空、陆协同作战。蒙哥马利让加拿

大第一集团军的克里勒将军负责制订和执行这些计划。9月4日，这个城市落入我们手里以后不久，准备工作便开始了。

通往敌人阵地的唯一陆路是靠南贝佛兰德岛与陆地连接处的一个咽喉地带。这个军事行动的实施，包括沿这个地峡往西的进攻，并配合以从海上实施的两栖突击。这次攻击所必需的兵力到10月下旬才能调齐。若我没有欲夺阿纳姆的军事行动，我们就可能提前两、三个星期开始进攻伐耳赫伦岛。

加拿大第二师被指定进入咽喉地带，并从那里沿着这个地峡往西进攻南贝佛兰德岛的德军。部队常常被迫在齐腰深的水中进攻顽抗的德军。他们用了三天时间才抵达地峡的西头。到10月27日，该师在这个岛上站稳了脚跟。英国第五十二师于10月25日晚到26日，在南贝佛兰德岛南岸登陆。这两支队伍向交叉点实施向心突击，到10月30日，南贝佛兰德岛全部为我们占领。

伐耳赫伦岛的守军是从南贝佛兰德岛逃来的残部，以及原先驻扎在加来地区的德国第十五集团军的一些分遣队。

11月1日，我们粉碎了这次欧洲战役中在海岸线上遇到的最猛烈的局部抵抗，完成了对伐耳赫伦岛的两栖突击。要提供支援火力，只能使用一些小型的海军舰只。这些舰只毫不犹豫地逼近伐耳赫伦岛的海岸，为协助部队登陆坚持与猛烈的海岸炮台交战。这些舰只损失很大，但胜利登陆和最大限度地减少进攻人员的伤亡，得归功于所有这些英勇顽强的船员。

这次艰苦战役的一个特点是，使用大型轰炸机炸毁部分在岛上低地阻挡海水的堤坝的新做法。破坏堤坝，让海水淹没关键的防卫地段，这种方法在这次自始至终充满异常困难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岛上德军的最后抵抗，于11月9日被彻底粉碎。到这时为止，

大约俘虏敌军一万名,内有师长一名。这次作战代价是很高的。在这个地区的一系列战斗中,我们的加拿大第二师和英国第五十二师共伤亡二万七千六百三十三人,几乎是全军覆没。这个数字可与攻占西西里的伤亡相比拟,在那里我们损失不到二万五千人,但击溃守军三十五万。

在完成这一战役后,我们开始清除些耳德海湾的水雷。和其他海湾一样,德军在此布雷很多,即使海军不停地扫雷,也得要两个星期才能清除。

在安特卫普港开始卸货的第一艘船是11月26日到达的。10月中旬,德国人开始发射V-1和V-2飞弹轰炸这个城市。这种飞弹,虽然象发射到伦敦的一样,常常是不准确的,但V-2飞弹使这个地区遭到了重大损失。很多市民和士兵被炸死,交通线和补给工作常常在一段时间内被阻断。安特卫普的市民毫无畏惧地忍受了这种袭击。有一次,一枚V-2飞弹击中了拥挤的剧场,炸死了一百多个市民和几乎同样数量的士兵。

敌人也使用大量的E艇(一种小型快速的水面鱼雷艇)和小型潜艇,阻扰我们使用安特卫普港。我们以海军和空军的有力行动对付这些舰艇。安特卫普港尽管有一切困难,但还是迅速成为我们整个后勤系统的北方壁垒。

当壮烈而令人兴奋的战斗在北侧进行时,其他战线上也是很平静的。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战线上,蒙哥马利成功地集结了足够的兵力,在伐耳赫伦岛被攻克后,于11月15日立即乘胜向东追击。冬季环境已逐渐来临,蒙哥马利虽是在一个困难重重的地区向前推进,但于12月4日肃清了马斯河以西德国人的最后一个据点。这同一条河在比利时南部和法国被称为默兹河。

由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战线太长,这时在那个地区再发动猛



攻已不可能。蒙哥马利的军队早已合并了在联合王国所有待命的英国部队，包括加拿大军和波兰的一个师，再进一步加强毫无可能，只是后来，才从地中海战区给他调拨了一些部队。美军情况不同，增援师迅速从国内调来，一到前线就能执行重要任务，并有可能随时扩大美军战区，以使两翼有集结兵力的机会。

10月22日，布莱德雷把辛普森将军指挥的美国第九集团军投入紧靠英国战区的南面作战。11月16日，布莱德雷重新开始了对他战区北面来因河的进攻。这次进攻由美国第九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完成，并以对敌猛烈的轰炸和炮击为先导。共有一千二百零四架美国重轰炸机和一千一百八十八架英国重轰炸机参战。这次军事行动，是我们当时利用重轰炸机有效协助地面部队作战的又一例证。

这些进攻开始时使用十四个师，不久即增加到十七个师。虽然如此，进展仍然缓慢，战斗进行激烈。在这次进攻的右翼，第一集团军为赫特根森林所困，这里是整个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争夺战。敌人具有坚守这个地区的各种有利条件，而进攻的美军由于稠密的森林只能依靠步兵武器。虽然天气很坏，守敌又特别顽固，但是顽强的美军终于获得胜利。后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美国第四、第九和第二十八师的老兵谈起他们所参加的激烈战斗来，总要用赫特根森林战役作比较。这几个师在这次战役中是名列前茅的。

尽管那里尚有无数同样激烈的、较小规模的战斗，而且为了肃清敌人守军，有些部队在那里还要被牵制一些时日，但总的挺进一直继续到我们抵达罗尔河岸。第九集团军是12月3日到达这里的。

在罗尔河岸，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战术问题。在这条河较远的上游什米特有个大坝。这对德军有特殊的防御价值，因为他们控制了闸门，就可以改变下游的水位。这使我们不可能立刻渡河

实施突击,因为即使有部队胜利地渡过了河,也会被泛滥的洪水所隔离,从而被德军用后备队加以消灭。

我们首先试图用空军炸毁水坝。对水坝的轰炸是准确的,因而取得了直接命中的效果。但水坝的混凝土结构非常坚固,轰炸损坏不大。这样,除了地面攻取外,别无他途。水坝位于崎岖的山区,因此地面进攻肯定进展缓慢,代价很大。第二十八师发动的一次攻击,未取得满意的进展,于是12月13日,第一集团军又开始猛攻。

与此同时,在阿登森林以南,第三集团军于11月8日发动一次进攻。这次进攻总的目标是萨尔地区。进攻一开始取得很大进展,并越过摩泽尔河在梅斯以北建立了桥头堡。11月中旬以后不久,先头部队越过德国边境。梅斯被包围,并被切断了与外界的通路。11月22日,梅斯投降,但附近一些碉堡仍顽固抗拒,几乎到12月中旬才被彻底肃清。

在第三集团军的右方战区,我们的推进很快遇到了齐格菲防线上最坚固的防区,这些防区是保卫摩泽尔河和来因河之间的三角地带的。在这个地区,齐格菲防线包括两道全面的防线。前面一道是连续的障碍物和碉堡系统,但纵深不大。后面是特别坚固的另一道防线。它的特点是,在纵深两哩多的一条线上布置着一系列互相支援的碉堡。这些防御工事使第三集团军的推进放慢。摧毁这些工事需要大量重型炮弹,因此这里的进攻一直要停顿到能够提供额外的后勤支援时为止。

再往南,德弗斯的第六集团军群正在许多地方进行战斗。9月,他经罗讷河谷向北挺进,已与在艰难的孚日山区里面东的第三集团军战线相并列。11月14日,德弗斯为进入阿尔萨斯平原进攻了那个可怕的屏障。一旦我们能攻取这个地区,德弗斯就能把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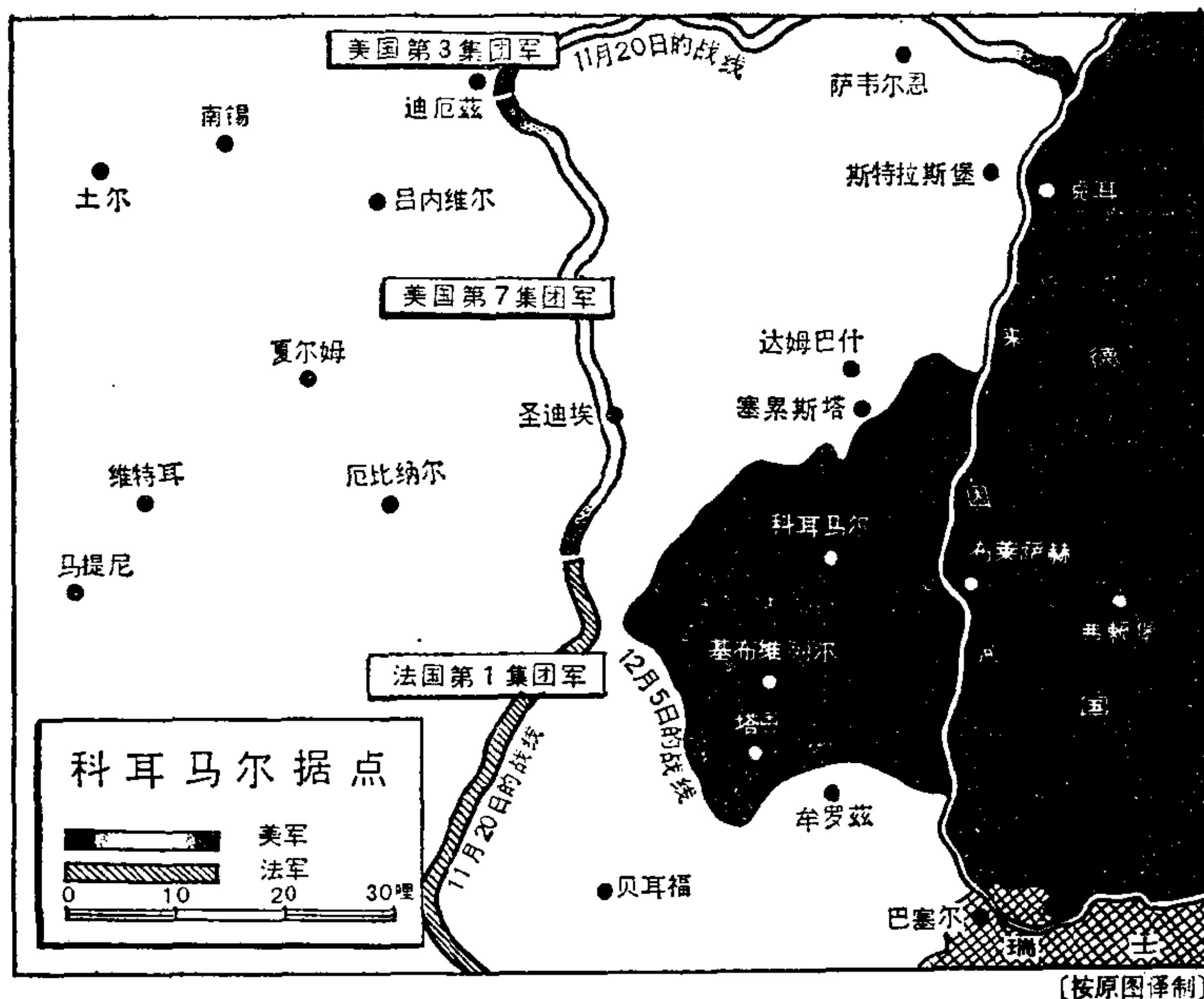
大部分兵力集中在左面，这样萨尔的守敌就处于左右夹攻之中了。

在德弗斯的战线上，法国第一集团军打先锋，一周内攻破贝耳福山峡，先头部队迅速抵达来因河。这就迂回到孚日山脉德军阵地的侧翼，从而迫使德军在帕奇将军指挥的美国第七集团军的战线上全面撤退。与法国第一集团军并肩作战的这支部队，发觉要穿过这些崎岖不平的山路是非常费劲的。帕奇集团军的爱德华·布鲁克斯少将指挥的第六军在右面，过去与巴顿在一起的韦德·海斯利普少将指挥的第十五军在左面。当法军获胜而德军开始后撤时，这两支部队迅速向前推进。11月21日，美国第四十四师攻占萨尔布克，22日，我军突入来因河平原。同日，法国第二装甲师进入来因河畔的斯特拉斯堡。敌人还是老一套，几乎立即发动反击。开始，我们的挺进部队丢失一些阵地，但第四十四师赶走了敌人，收复阵地。第七十九师现在和第四十四师并肩作战，这两支部队迅速向阿格诺推进，12月12日攻占该地。

当这些进攻正在推进时，我会晤了德弗斯，和他一起观察了战况。在他的极左方冲进来因河平原好象没有直接的好处。我指示他，把帕奇集团军的左翼的一个军调往北面，与孚日山脉西坡巴顿集团军的右翼连接起来，那个军是支援第三集团军的，这个集团军不久将恢复对萨尔的进攻。

在德弗斯战线的剩余部分，当然希望能尽可能快地逼近来因河，然后再往北移动，希望占领往北到萨尔一路上的河岸。但是我特别警告德弗斯，在他后方的德军没有彻底肃清以前，孚日山脉的东端不要开始向北的行动。

有时候，绕过敌人守军，只把他们围困起来，直到他们孤立和缺乏补给，然后强迫投降，这样做反而适当。但是这种方法一般只有在敌军完全被包围的情况下才适用。再则，这样做法总是要牵



制我们一部分部队，而如果敌人据点的所在地区是我们进攻的必经之路，或者他们能从这个据点袭击我们的交通线，那么这种方法就根本不适用。我对于为了警戒后方敌人守军而削弱部队颇感厌烦，所以我让德弗斯记住，如果让德国人留在河西斯特拉斯堡以南来因河上游平原，以后肯定会使我们遇到很大麻烦。

法国第一集团军在打开贝耳福山峡和抵达来因河的战斗中表现得很出色，所以德弗斯将军相信它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溃在科耳马尔地区他们正面的德国第十五军的残部。他在向我叙述战况时说：“德国第十九军作为战术力量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他估计，不要布鲁克斯将军的第六军的支援，就可以完成我关于消灭科耳马尔附近德军的指示。特别是从德军已遭受沉重打击这个观点出发，他有理由认为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他命令第六军向北转到

孚日山脉以东的平原,这样就能与山西的第十五军相配合,进攻萨尔。

德弗斯可能低估了德军决心顽固坚守据点的防御力量,而对法国第一集团军当时实力的估计则过于乐观了。被这次进攻所削弱的法国第一集团军,已认识到不可能击溃它正面战线上德军的抵抗,于是科耳马尔据点形成了,一支德国守军在来因河西科耳马尔附近这个宜于防守的地方站稳了脚跟,并将坚持下去。科耳马尔据点的存在今后将给我们造成极大的不利。

从瑞士到来因河口,整个战线上的战斗到秋末进入了最讨厌的步兵拖拉战。进展缓慢而且极端艰苦。收获常常不能以哩而只能用码来计算。作战主要靠大炮和弹药以及步兵的坚毅、耐劳和勇敢。在这种条件下,步兵伤亡很大,特别是来福枪排。在各类战斗中,如果说伤亡人员中步兵通常占大多数的话,那么现在的伤亡实际上就全是步兵了。这种伤亡的造成,决非单单由于敌人的行动。还有其他的原因也使步兵遭到百分比异常大的伤亡,例如,由于寒冷而引起的冻伤、战壕足、呼吸器官疾病,在步兵中要比其他兵种中发病率高得多。由于步兵的伤亡,各师的战斗力迅速削弱。如果没有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去完成每日的推进和突击任务,我们的进攻力量就会明显下降。

除去部队力量损耗的问题外,我们还感到已经难于找到足够的步兵师去完成紧急的任务和维持为成功的进攻所必须的集结。

步兵的补充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使用一切权宜办法保持部队的实力。我们给陆军部送去了数份全面的报告,希望国内集中力量满足这方面的需要。我们搜索自己的所属单位,从供应处以及从其他部门寻找能迅速受训后充实步兵队伍的人。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我们就用陆军妇女队或者非战斗部门的人去把后勤

人员换出来。斯巴兹将军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一万人拨归地面部队。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未能使步兵编制保持满员。马歇尔将军知道了这个情况,给我提了一个看来有很大价值的建议,即把国内已受过训练的各个师的步兵迅速给我们派来,不必等待为运载他们的大炮、卡车和其他重型装备所需增派的船只。他和我都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把一些新部队投入战斗,而把早在战线上的各个师的步兵换下来,使新部队受到有益的实战训练。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满员的新部队到前方以后,使老兵师中的疲惫不堪的步兵有个休整的机会。

结果,我们的希望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冬季过去后,我们的兵员需要量变得如此之大,而我们漫长战线上的兵力又是如此薄弱,以致新部队到达后,各集团军的司令官都往往认为,不是用新的部队去替换疲惫的部队,而是需要把新部队派到某个战区,并用为此目的而能从各军和各集团军调来的大炮支援他们。

形势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出现了完全事与愿违的情况。现在不等重装备到达就已将新部队投入了战场。然而前线的需要不允许我们再有另外的做法。尽管如此,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我们就恢复原来的轮换计划,不过我们是永远无法照原来所设想的方式去实行了。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步兵部队的提前到达,产生了深远的和良好的影响。在这次战役的特殊危机中,他们使我们把老兵部队集中了起来,而如果没有这些部队的到达,这样做是不可能的。

两次世界大战中步兵的补充问题,伤透了美国战地指挥官的脑筋。步兵在战场兵力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他们往往是在师所建立的轻炮阵地之前作战。这一小部分步兵的伤亡约占全部兵员损失的百分之九十。大多数伤员虽然不久即能返回前线,但这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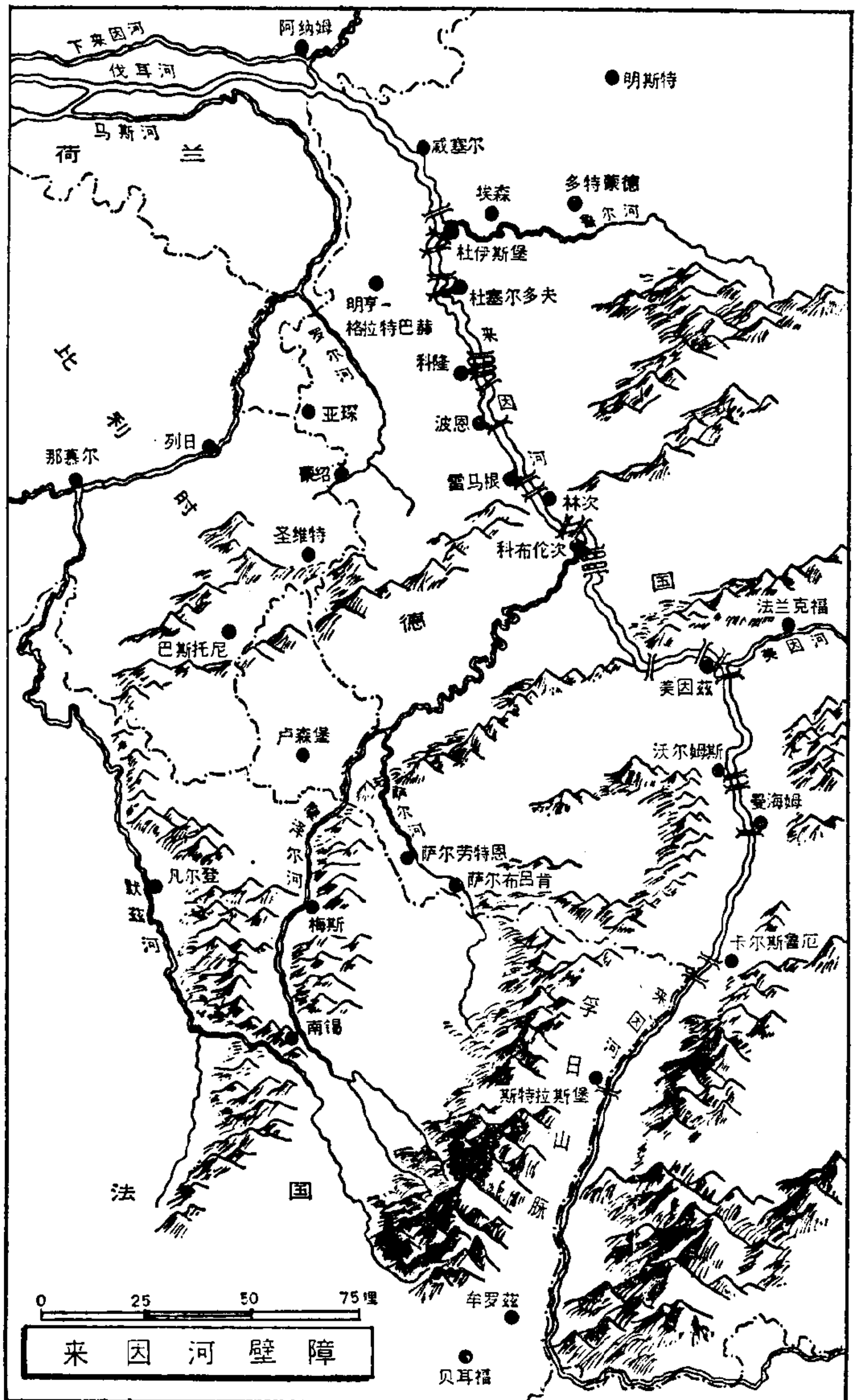
生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表现在维持士气方面。

无论是从国内新来的补充兵，还是不久前从医院返回的补充兵，一般都是经过补充兵员集中处来到前线的。这样，从许多师来的老兵和从来没有见过战斗的新兵大量混合在一起。当兵员补充的需要尖锐时，效率要求把补充兵员集中处的所有可用的士兵立刻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按照个人志愿进行个别分配是根本办不到的。

但是老兵常常坚持回到他们自己的师里去。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士气就大为低落。我们在迫切需要所允许的限度内，试着让老兵回自己的部队。但在紧急关头，这个规矩就不得不被破坏。1944年秋，在尽力给最迫切需要的地区支援人员时，所有这些意图不得不被抛在一边。

保持士气是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我们制订了一项休假计划。这项计划至少给一些人回到巴黎或伦敦去的机会。我们也在战线的后方设立了师的休假中心。一个连或一个营可以暂时离开战场，去那里安心地洗个澡，暖暖和和地睡一觉，休息一、两天。我们在巴黎的一个最大的饭店里设立了盟军俱乐部。这是专门为士兵准备的，也是我们为士兵利益而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这对有机会观光这个城市的士兵来说，是个有利条件。我们在娱乐和招待方面，依靠的是专门从事民间帮助事宜的红十字会和联合服务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在娱乐和招待方面受到了各种群众团体的协助。这些团体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但在与这么多不同团体的接触中，在行政方面产生了很多困难，这使陆军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坚决主张，这项工作一定要由两个主要机构处理。娱乐方面由红十字会负责，招待方面由联合服务会负责。



[按原图译制]



这些热诚的人在这方面对士兵的服务是备受赞美的。红十字会开设俱乐部、咖啡馆和小吃服务站。它送观光士兵去医院、代写书信、提供友好的劝告。所有这一切都成功地使远处美国几千哩以外地区的战斗人员尽可能地享受一种暂时的家庭温暖。

联合服务会也同样成功地使士兵们享受到一、两个小时的招待，对此士兵们是永远表示感激的。我在前沿的和无掩护的阵地上，有时在敌人轰炸下亲眼看见过他们的招待活动。无论在休息地、营房和基地上，还是在各种形式的医院里，他们使战士们暂时忘却了战争，而这种忘却在战时总是一种恩赐。

秋末，我们抵达德国边境的时候，研究过让空军炸毁来因河上所有桥梁的想法。这些桥梁是河西德军赖以存在的支柱。如果能炸毁所有的桥梁，我们用强大的空军又肯定能限制浮桥的使用，敌人就不得不立即撤退。我们对保留这些桥梁供自己以后使用一事不抱希望。众所周知，敌人一旦决定必须撤退，就会炸毁所有桥梁，除了极其偶然的机会外，我们到达时是不会留有什么桥梁的。

我们不让空军炸桥的理由是考虑到事情的轻重缓急和效果。如果只炸毁少数桥梁，用处不大。当时我得到报告说，横跨来因河的桥梁总共二十六座；必须使大约二十座不能使用，否则炸桥行动只有局部影响。甚至有最好的飞行条件，这个任务也需要拖延一些时间，并且要进行猛烈的轰炸。但是那年欧洲的这个季节，很少出现一天令人满意的天气可使高空准确轰炸。同时敌人的防空火力还是如此强大和如此有效，以致低飞轰炸损失太大。因此我们用来破坏桥梁的唯一办法是穿过云层进行盲目轰炸。据空军参谋部估计，炸毁大部分桥梁所需要的时间和炸弹吨位，比我们能从其他极端重要的计划中匀得出来的要多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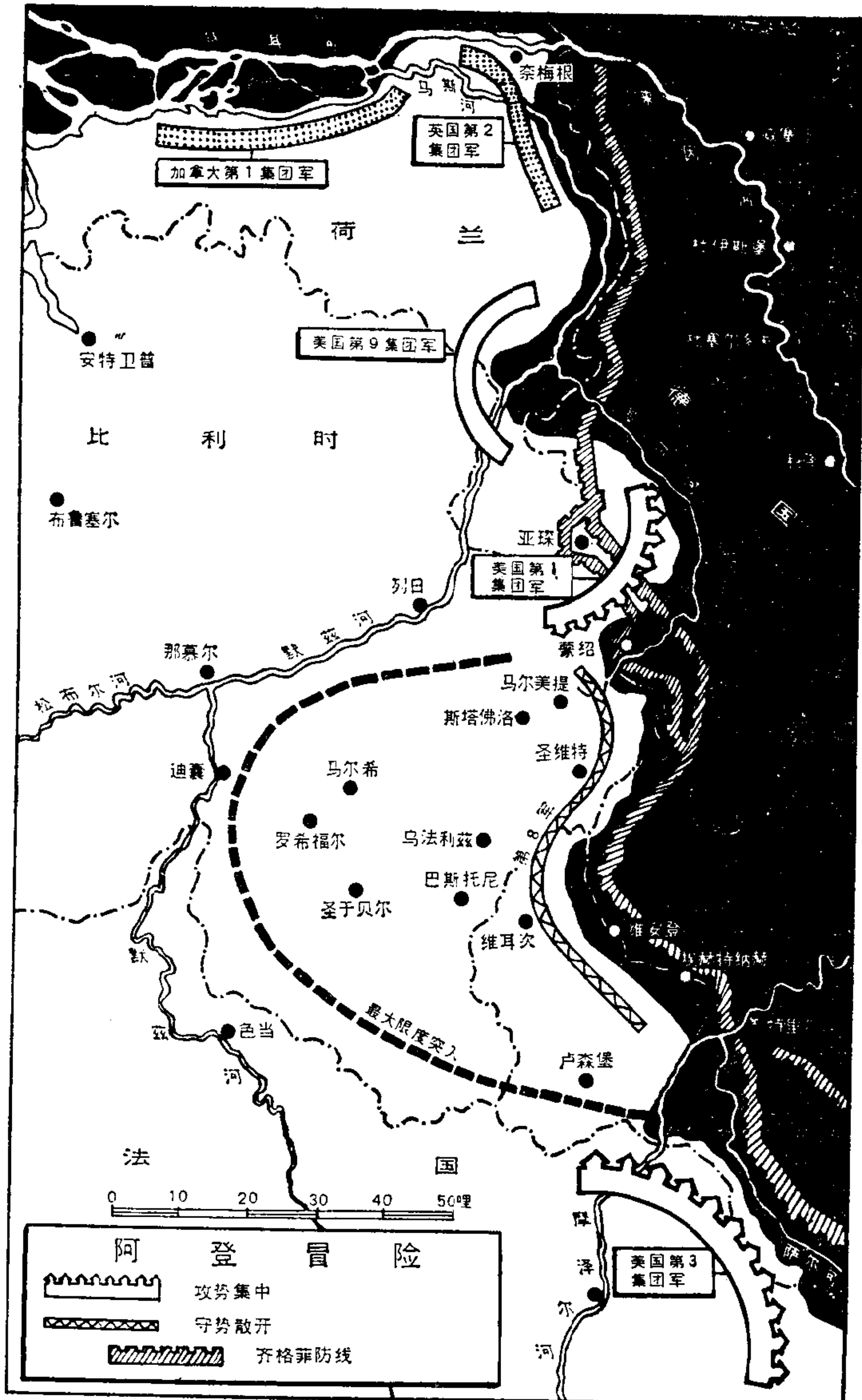
另一项重要的计划是摧毁德国燃料油的储备。这时，就燃料

油这个重要供应项目来说,敌人已经到了危急地步。我们给重轰炸机的命令是,全力以赴地连续轰击敌人一切油源、提炼设备和供应系统。这个策略不仅一般地对德国的全部作战力量有影响,而且也对前线有直接影响。每个德国司令官总是不得不根据可利用的燃料来考虑他的作战计划。因此坚持连续轰炸,以增加敌人的困难,这对我们有利。

轰炸敌人的油料储备的空中战役,有助于充分发挥我们在地中海战役和欧洲战役中已经胜过敌人的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即相对的机动性。美军的一个特点始终是部队的组织和装备方面的机动性。在汽车问世以前,我军的骑兵比当时其他许多军种要强些。随着汽车的出现,美军热切希望利用它增加机动性。美国工业的大规模生产方法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有利条件。可以肯定地说,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供应、维修和支援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那样庞大的汽车运输队。

从11月末到12月初,我军严重的人力紧张状况不断地令人关心,特别是在布莱德雷的战线上。为了维持当时我们认为重要的两次进攻,不得不把可调动的兵力集结在北面罗尔水坝附近和南面邻接萨尔的地方。这样就削弱了阿登地区的对阵兵力,或者说防卫兵力。有一个时期我们在特里尔和蒙绍之间大约七十五哩的战线上,一共只有三个师,而且从来没有能够在这个地区部署过四个以上的师。当我的参谋人员尽可能与这个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的时期,我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与布莱德雷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在阿登地区我们肯定会很快遇到风险,但我们认为,如果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在国内来的增援部队使我们有足够兵力以前停止我们在整个前线的作战,那是一种错误的策略。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布莱德雷对我具体地概述了他认为在他



(按原图译制)

的战线上宜于继续进攻的因素。我坚决赞成这些看法。首先,他指出,在敌我伤亡方面,正在出现对我们极为有利的局面:敌人每天的伤亡平均比我们多一倍。其次,他认为,敌人能够发动一次凌厉反击的唯一地方是阿登地区。为了实施进攻,我们已经把第十二集团军群集中在阿登地区的两侧,北侧由霍奇斯负责,南侧由巴顿负责。布莱德雷认为,这样,我们就处于最好的兵力集中点上,如德军对阿登地区的两侧发动任何进攻,我们都能予以抗击。他还进一步估计,假如德军在阿登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如果还想推进到远至默兹河一带,那么他们的供应就会发生极大的困难。除非敌人占领我们巨大的供应仓库,否则他们将立即会遇到麻烦,特别是在我们空军能有效地作战的时期。布莱德雷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他估计德军先锋部队可能到达这一带。他的估计以后被证明是十分正确的;在任何一点上,最大误差不过五哩。他在他认为德军可能以突然袭击占领的地方设置了极少的供应点。我们在列日和凡尔登有大补给站,但他确信敌人不可能达到这两个地区。

布莱德雷也确信,我们是始终能阻止敌人渡过默兹河到达我们河西大补给基地的。因此,敌人发动任何长距离进攻,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我们总的结论是:当德国人在加固防御和训练部队时,我们决不能按兵不动,因为我们认为,敌人在承认最后失败以前的某个时间,将企图发动大规模反攻。布莱德雷最后说:“我们设法在德军能够退入齐格菲防线以前完全俘获他们。如果他们将来再跑出齐格菲防线与我们在无掩护的空地上作战,那就完全对我们有利了。”

我和布莱德雷都认为,对我们来说,在等待国内增援时期,让前线行动停止下来,让部队进入防御的冬季营地,这是最大的

浪费。

在阿登前线只留四个师，并使部队陷入德军大规模突入这个地区的危险，这个责任应由我负。自11月1日以来的任何时候，我本来可以使整个战线转取守势，并且在等候增援时使我们的各条战线得到绝对保障，以免敌人进攻。但那时我的基本决策却是尽我们能力所及继续进攻。正是由于这个决定，德军12月袭击的第一个星期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12月初，巴顿将军领导他的第三集团军正在积极准备重新对萨尔发动进攻，并且准备在12月19日开始攻击。巴顿满怀胜利的希望。但为了坚决避免陷入一场旷日持久、毫无结果和耗费巨大的进攻战，布莱德雷和我一致同意，第三集团军的进攻必须在一周以内取得巨大收获，否则停止进攻。我们当然清楚，如果巴顿获得巨大胜利，敌人必将抽调其他战区的兵力去对付他，因此巴顿的胜利将有助于增加其他地方的安全。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使很多师牵制在代价昂贵和行动缓慢的推进中，我们不仅会收效甚微，而且在沿线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对作战迅速作出反应。

同时，第一集团军对罗尔水坝的进攻，按预定计划在12月13日发动。但投入的师比较少。在这个月初，本来就是断断续续的坏天气，这时变得越来越坏，浓雾和密云实际上阻止了空中侦察。山地随着转冷，开始降雪。

出现在我们前方的德国第六装甲集团军，是他们留在整个国内的最强大和最有效的机动后备队。当这个集团军到达我们前方时，它最初是对着第十二集团军群的左翼，显然这是为了抗击我军渡过罗尔河的行动。12月初，美军在那个战线上不得不暂停进攻时，德国第六装甲集团军不见了，而且后来想尽办法都找不到它的位置。那时，有些情报部门报告说，我们在阿登的兵力之薄弱，越

来越令人焦急不安。我们知道敌人正往那里增加步兵。原先，敌人象我们的做法一样，一直利用这条战线的这一部分作为疲惫师团的休息地。

但是，前线的各部分都送来了这样的报告。一个司令官若只依靠这些令人忧虑的情报估计，他是永远打不了胜仗的，只有在惊慌中束手待毙。在这件事上，我以后听说，预言敌人进攻即将临头的那个人曾估计，在这次危机中敌人有六、七个刚调来的、未经使用的后备师准备投入战斗。

总之，这次秋季战役都是根据我亲自制订的方案进行的。我们保持了攻势，但在必须不断实施进攻的地方削弱了自己。这个方案给德军提供了对我们各条战线的薄弱部分实施进攻的机会。如果这个方案应该受到历史学家的指责的话，那么这个指责应该由我一人承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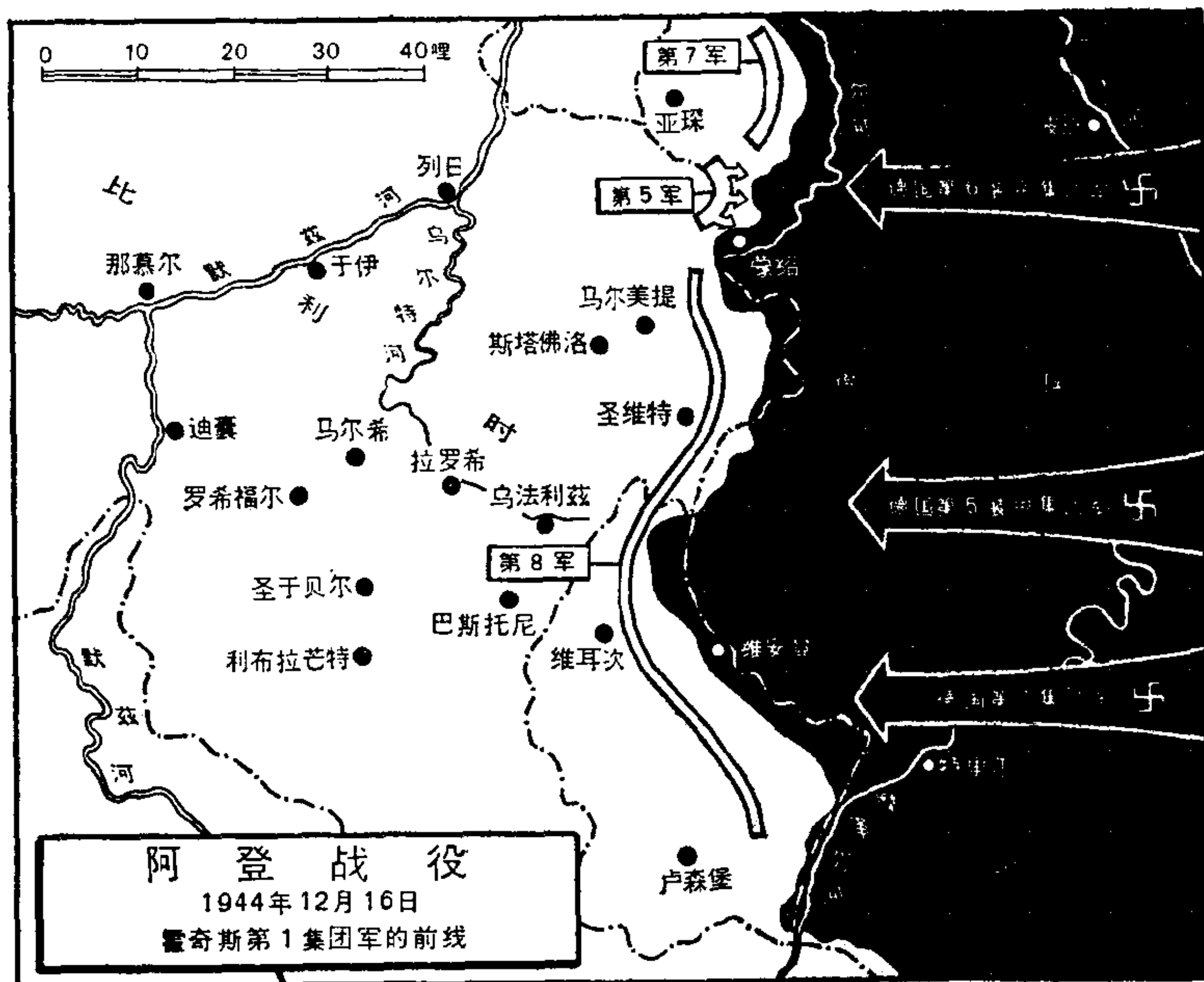
## 第十八章

### 希特勒的孤注一掷

1944年12月16日，布莱德雷将军到我的司令部来讨论克服我们步兵补充兵员严重不足的方针和办法。他刚走进我的办公室，一位参谋军官进来报告说，在阿登地区，德国人在米德尔顿将军的第八军正面和杰罗将军的第五军右翼略微突入我军战线。这个参谋军官在我的作战图上标上了位置，于是我和布莱德雷讨论了敌军此举的意义。

我立即确信这决不是一个局部攻击。只打算在阿登地区进行小规模进攻，这对敌人来说是不合情理的，当然，除非这是一种佯攻，吸引住我们的视线，而在另外的地方发动大规模反攻。但是我们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在我们前线的其他地点，要么那里我们的阵势很强，德军不可能有进攻得胜的希望，要么那里没有值得他们夺取的重要目标。此外，我们知道，多日来，德军在阿登地区一直在增加兵力。1940年，德军正是在这个地区发动了强大进攻，把英国赶出欧洲大陆，并把法国打得一败涂地的。那次进攻的司令官正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冯·龙德施泰特。他可能希望四年多以前的好景再现。我们总是深信，德军在西部最后认输以前，会企图发动一次殊死反击。在我和布莱德雷看来，他们似乎现在已经发动了这种进攻。

在这个关键地区北面，霍奇斯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在攻击罗尔



〔按原图译制〕

水坝方面,到目前为止只投入四个师。阿登前线的南面,巴顿将军还在集结队伍,准备恢复对萨尔的进攻,这一进攻将在12月19日开始。

布莱德雷和我都充分相信,敌军针对第十二集团军群中央阵地的攻势已经展开,所以我们同意把两侧的某些兵力调往阿登战区。这是一种为了支援第八军的七十五哩长的战线所采取的预备性调动,说得更正确些,是一种警戒,假如我们对德军意图的推测证明是正确的话。

我们召集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部分参谋人员到我们的会议室来;其中有泰德空军上将、史密斯将军、布尔将军和斯特朗将军。我们面前的作战地图表明,在阿登两侧,一个美国装甲师的大部分队伍在战线之外,并能迅速移动。北面是罗伯特·哈斯布鲁克少将



指挥的第七装甲师，南面是属巴顿军的第十装甲师，由威廉·小莫里斯少将指挥。

我们同意这两个师立即开始向这个受威胁的地区靠拢，每个师的准确方位以后由布莱德雷决定。这就是说，进攻萨尔的准备工作要搁置起来，并且我们知道巴顿将军会提出抗议，因为他一心想发动他认为将取得巨大战果的这一新攻势。但对布莱德雷和我来说，由于我们的兵力集结位置是在薄弱的阿登战线侧翼，所以现在那里出现的正是我们认为有理由进行挑战的那种形势。我们一直认为，冒这次风险是正当的，因为我们确信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我们能够作出迅速反应。我们意料中的一个关键时刻现在终于到来了。布莱德雷除了指挥这些预备性调动外，还给他的集团军群内所有的司令官打了招呼，让他们准备为预料中的战斗增派部队。

我们同参谋人员一起，仔细地检查了当时我们可以调动的后备队的名单。其中最容易调来的是位于兰斯附近由李奇微将军指挥的第十八空降军，它包括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两个空降师。这是两支久经考验、能力极强的空军部队。它们不久前在荷兰作战时担负过艰巨的任务，至今还没有充分恢复元气。此外，它们的重型支援武器也相对地薄弱。但是布莱德雷认为，这类武器可以从他漫长战线上的那些没有受到威胁的地点调去予以补充。

当时，美国第十一装甲师已经到达，在联合王国的第十七空降师准备开到欧洲大陆。第八十七步兵师也能在一定时间内调入这个地区。

在北方较远的英国战区，蒙哥马利正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当时他有一个完整的军，即第三十军，没有进入战斗。有了这些现成的兵力，我们相信，德军可能发动的任何攻势，我们最后都能有效地予以回击。但是我们承认这个现实：第八军的战线薄弱，德军

的任何强大进攻都能通过这里而向纵深突入。因此，我们同意，假如德军的进攻证明是一次全力以赴的突击，那就不能把后备队零零碎碎地投入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把每个单独的增援部队尽快调到前线马上投入战斗。这种做法是隆美尔的一个弱点。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这种做法肯定只会使每个增援部队被进攻兵力所压倒。我们知道，即使我们这么干能最后挡住敌人的进攻，但到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反击时，就没有可用的兵力了。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准备足够的兵力迅速支援第八军，以便它能有计划地撤退，从而保全它的大部分兵力。

我们又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必要时，在我们不致受到无法挽救的损失的情况下，能让敌人在那个地区突入到什么限度。这条突入线包括南面的卢森堡和色当两城，西抵默兹河，北至列日。我们不能比这退得更远了。当然我们希望尽可能早地挡住敌人。

使我们特别关心的、甚至是特别焦虑的一个因素是天气。这些日子来，我们强大的空军由于云层和无法穿越的浓雾一直不能起飞。空军是我们的最大资本，而现在，如果天气不改变，就实际上等于无用。只要天气使我们的空军不能起飞，就无异于帮助敌人增添许多个师。

会议以后，布莱德雷回到他在卢森堡的司令部。在后来一些危急的日子里，他从那里几乎每小时都通过电话与我保持密切联系。

布莱德雷的第一个任务是调动增援部队，帮助第八军撤退。同时，布莱德雷的司令部和我的统帅部开始调集后备队，以便一遇有更确实的情报时，随机应变。

米德尔顿有几个师被使用在第八军从北到南的战线上，它们是阿伦·琼斯少将指挥的第一〇六师，诺曼·科塔少将指挥的第

二十八师，雷蒙德·巴尔顿少将指挥的第四师，以及约翰·伦纳德少将指挥的第九装甲师。

12月17日晨，德军进攻力量的强大是越来越明显了。我军战线被打开两个缺口：一个在第一〇六师前线，另一个在第二十八师前线。报告很混乱，正确的情报很少，但是很清楚，敌人使用大量装甲部队正在迅速向西推进。所有的情报部门当然都在不辞辛劳地工作，因此，不久我们对这次德军进攻的总兵力有了很清楚的了解。

冯·龙德施泰特为了实施这次突击集中了三个集团军，即第五、第六两个装甲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其中包括十个装甲师和装甲近卫师。把支援部队计算在内，总共有二十四师。有些情报直到这次战斗的后期才到手，但到12月17日傍晚，情报部门已识别出了十七个师，而且确信至少有二十个师已投入这次战斗。

敌人有两个重要之点确实使我们出乎意料。第一点是反攻时间。在夏末和秋季，敌人遭到了沉重打击，在征募新部队时，他们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常措施，从这些方面看，我们以为敌人不能这么快准备好一次大规模的突击。另一点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敌人的反攻实力。第六装甲集团军是我们原先不知下落的一个机动后备队，它刚从德国本土调来，是一支战斗力颇强的生力军，而第七集团军和第五装甲集团军都是挨过我们狠揍的。

敌人所以做出如此使人意料不到的事，是天气给他们帮了忙。这些日子以来，空中侦察无法进行，没有空中侦察，我们就无法判断敌人后方的主要后备队的位置和行动。齐格菲防线的强大人工防御工事也使敌人得到了攻击的力量。防线上的障碍物、碉堡和固定炮火，大大加强了敌人守军的防御力量，这样敌军就能从他们的漫长战线上抽出兵力，集中起来进行反击。虽然从双方投入的

兵力看，卡塞林战斗与阿登战役比较，不过是个小冲突，但是两者之间有一些共同之点。在这两次战斗中，敌人都是疯狂进攻，都是利用异乎寻常的坚强的防御壁障集中兵力打击盟军交通线，妄想诱使盟军最高统帅部放弃对他们无情进攻的全部计划。

我们虽然对敌军反攻的时间和实力感到惊讶，但对于他们反攻的位置以及这次反攻终会发生的估计是不错的。此外，就我们准备反击的一般性质来说，布莱德雷将军和我早已有了一致的计划。

为了胜利地实现我们总的计划，牢固地保住我们防御阵地上接近德军突入线两侧的肩状部分是非常必要的。北面的关键地区是蒙绍附近。在德国人反攻开始时，第一集团军所属的杰罗指挥的美国第五军，正越过这个地区向罗尔水坝进攻。杰罗军中由罗伯逊将军指挥的老二师和由沃尔特·劳尔少将指挥的新九十九师，首先遭到德军袭击。我军战线在敌优势兵力攻击下被迫后撤。第二师和第九十九师的一部分非常熟练地迎战，并且在以后三天里打了一场这次欧战中的漂亮仗。这两个师是在向罗尔水坝挺进时受到德军攻击的。第一集团军司令霍奇斯将军开始没有意识到这一威胁的严重性，指挥美军继续进攻。但是在现场的罗伯逊将军立即看出苗头，采取了果敢的行动。

罗伯逊首先必须选择一条他的师能够进行有效防御的战线。当时必须逼迫部队占领这条防线，并准备迎接敌人的凶猛突击。所有这些，这个师都做到了，同时，从邻近部队的某些部分得到了一些补充兵力，这些人被编入了第二师的各级队伍。

德军对第二师发动了猛攻，可是这个美国师顽强地守住了阵地。但若无第七装甲师在圣维特的英勇战斗，很难说第二师在援军到达以前能单独固守阵地达三十六小时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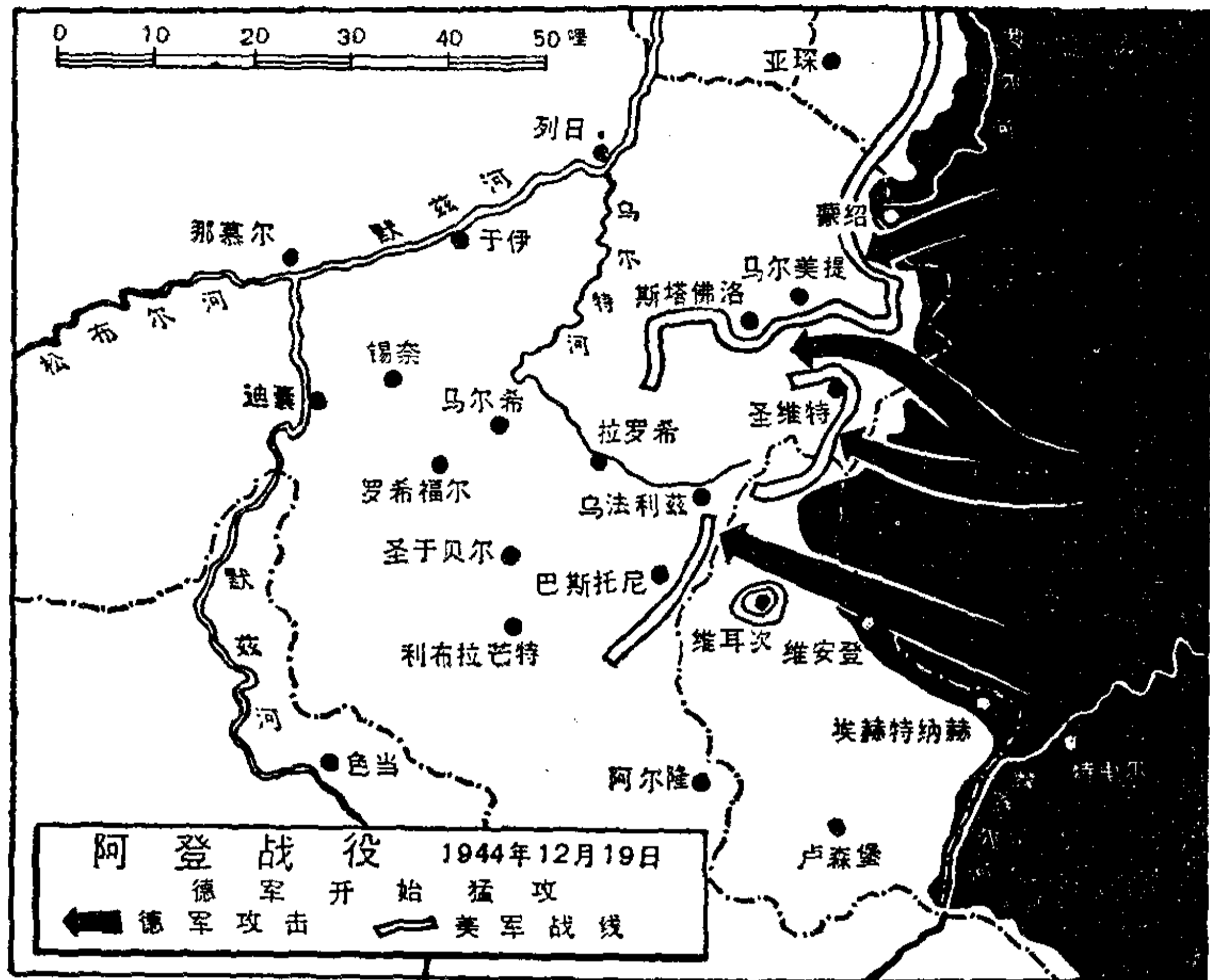
12月17日，第七装甲师从北侧开下来时，情况还是很不清楚。

它为支援第八军的左翼而向前推进，最后在蒙绍以南约十五哩的圣维特成了半孤立状态。圣维特是那个地区公路网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点，而且是德军先锋部队企图向西推进的必经之路。第七装甲师在那里与第一〇六师和第二十八师的残部会合后，顽强地顶住了敌人在正面发动的反复攻击。它们在圣维特的战斗不仅分散了敌人北面的兵力，而且制止了敌人对蒙绍阵地的迅速包围。

最后，德军不断地施加沉重的压力进一步孤立第七装甲师。12月20日，敌人用几个师的兵力实施一次集中攻击，把第七装甲师往西压到圣维特以北的地区。因此，第七装甲师第二天奉命撤退，加入建立在德军凸出部北侧的盟军战线。但是第七装甲师的顽强抗击，不仅大大地打乱了德军先锋部队西进的时间表，而且它的英勇战斗在克利夫特·安德鲁斯准将指挥的第一师和路易斯·克雷格少将指挥的第九师的增援到达以前，对在蒙绍肩状部分这个极重要地点的第二师也是个最大的帮助。从此以后，由这三个久经考验和英勇善战的部队来守卫这个阵地，北侧肩状部分的安全就肯定无虞了。

早在12月17日，第八十二和第一〇一空降师就已从盟军最高统帅部后备队拨归布莱德雷将军。当时立刻作了如下的安排：使用刚到的第十一装甲师和开始把第十七空降师调往法国。

领导庞大的后勤部队的李将军，奉命带领一些能调用的工程兵和其他的一些分遣队去准备防御默兹河的各渡口，包括在必要时炸毁桥梁。下这个命令的理由是，这项任务主要是一件预防性的和静止的工作，我不愿意在这类工作上使用机动师。供应处反应甚为迅速，开始为美军战区内的默兹河战线提供强大防御工事。在英国战区，蒙哥马利将军也及早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后方的仓库和供应站。



[按原图译制]

德军的进攻，不顾在蒙绍的失败，非常急速地通过突破口的中央地带。但当敌军继续推进时，开始逐渐向北和西北方向迂迴。很明显，敌人的目标是在那个方向。我们认为，敌军的第一个目的是攻占列日。我们推论，即使他们的更大野心是夺取安特卫普，也必须部分地依靠在列日夺取的物资。我们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就算定他们供应缺乏，特别是他们在把给养运往前线方面肯定会遇到困难。因此，我们认为，他们的继续推进，几乎不管我们会采取什么反措施，总是希望夺取我们某个巨大的后勤供应站。

即使德军具有象我们一样高效率的后勤供应系统——当然事实上他们没有，他们要想依靠一些极糟糕的现成公路来供应他们的先锋部队，也还会有极大的困难，何况与此同时这些公路上拥塞

着开往前线的敌增援部队。

所以我们对列日特别关心,那里有大量的各种重要的供应物资,包括燃料和食品。但是,我们有决心使敌人距那里不远时就停下来。结果他们确实未曾接近过列日。后来我们听说,德军曾指定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为突击部队的主要目标。虽然如此,我们的推论还是正确的,因为供应的缺乏成了冯·龙德施泰特实施进攻的一个主要困难。

12月17日,布莱德雷命令第十八空降军从后备队转入前线,到原来目的地巴斯托尼。当时在巴斯托尼的米德尔顿将军看到这个地方的极端重要性,催促准备坚守。他打电话与布莱德雷商量,虽然他说这个地方不久可能被包围,但仍然主张要坚守。当时需要把第八十二空降师往北调到斯塔佛洛,这样,第一〇一空降师和第八军的一些分遣队就成了巴斯托尼的保卫者。

12月17、18整整两天,我们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并进行了分析。18日夜,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关敌人的兵力、意图、动向以及我们自己的实力等方面的充分材料,可以据此拟订一项我们发动反攻的具体计划。19日凌晨,我在泰德空军上将和一个参谋小组的陪同下来到凡尔登。布莱德雷将军、巴顿将军和德弗斯将军奉命在那里与我会晤。会议一开始,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桌旁,我说:“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而不是灾难,所以今天应该高高兴兴开会。”任性的巴顿叫喊起来:“嗨,我们要沉着镇静,让这些狗崽子往远里冲,一直冲到巴黎才好,那时就真能把他们一段一段分割,一口一口吃掉!”于是引起哄堂大笑,巴顿自己也笑了起来。但我回答说,决不能让敌人越过默兹河。

我们仔细地回顾了形势,大家都高兴地看到与会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司令官还是参谋人员,都沉着、自信。我没有听到表现出歇斯

底里或者惊慌失措的言论。

在这种形势下,假定最高统帅部不惊慌失措命令整个战线作全面撤退的话,防御部队的反应一般有两种可实行的方针:一种是沿着受攻击的整个地区只建立一条安全的防线,选择一些如河流之类的强固地势,据此坚守。另一种是防御部队一俟集结好必需的兵力,就立刻发动进攻。我选择后者,这不仅因为从战略意义上说,我们是处于进攻的地位,而且因为我坚信,敌人跑出齐格菲防线正好给我们提供一个最有利的机会,我们应该尽快抓住这个机会。当19日我用无线电与蒙哥马利联系时,这一点我是牢记在心的。我对他说:“我们的最大弱点是在那慕尔方面。我们总的计划是北面堵住漏洞,南面发动联合进攻。”第二天,我在另一封电报里更加具体地对他说:“北侧局势,有此可能,即必要时要放弃一些地方,以便缩短战线,积聚强大的后备力量,在比利时彻底消灭敌人。不知意下如何,请示。”

我已决定,没有必要在南北两侧同时发动反攻。北侧在德军进攻中正首当其冲,我们得采取几天守势;但在南侧,只要我们尽可能早地向北发动进攻,将有助于战局的改变。在19日的凡尔登会上,我的直接目的是安排开始南面的突击。

规划部队的准确战位,以及规定其他有关指挥和协作的局部细节,这是布莱德雷的责任。但因德弗斯的部队必须扩展一下他的左翼,去接收布莱德雷的一部分战线,以便使他有更好的机会来集中兵力,我还必须作出一些适当的决定,其中包括总的兵力和确定反攻时间。

我们首先决定了一个地点。我们相信,德弗斯能将其左翼延伸到那里而不致有失机宜地暴露出南侧。再一个问题是决定巴顿为反攻所能集结的兵力的数量和能发动反攻的大致时间。我希望他



在兵力十分充足以后再发动反攻，一旦反攻开始，他可以逐渐地粉碎那个正在发展着的凸出部的南侧。这么一来，在我们攻击点以西的德军就会被迫停止前进，因为通过这个地区的东西交通比较有限。我们估计，巴顿在12月23日晨，也可能在22日，能发动一个有三个师兵力的进攻。

为了立即执行这些安排，我发布了口头命令，但有一个条件，即巴顿在布莱德雷指挥下实施进攻，进攻时间不得早于22日和迟于23日。还进一步同意巴顿的部队抵达巴斯托尼后可以大体朝着乌法利兹的总方向继续前进。一俟飞行条件改善，飞机能起飞，就决定给予充分的空中支援。此外，我在会上还通知大家，我打算一俟北侧的德军进攻兵力消耗殆尽，就立即开始布置这一侧的进攻行动。

对巴顿的安排是要求他把至少有三个师的进攻军集中在阿尔隆，并且从那里开始向巴斯托尼推进。我警告他不要分散进攻，指示这次进攻必须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巴顿最初对德军的突击力量似乎没有足够的理解，因此谈起分配给他的任务来总是很轻松的，这使我认为有必要向他强调指出，他的这次进攻需要实力和高度计划性。

我们还讨论了另一个问题，即与此同时，针对凸出部南侧的肩状部分稍微往东推进是否适当。结论是将来事变可能表明这一行动是恰当的，但在那时，我们在那个局部地点只应保证凸出部南侧肩状部分的安全，而把我们的进攻限制在指定的部位。

12月19日，在凡尔登会议上发布的一项指令确定了在南侧实施反攻的计划草案，这项指令后来没有改变过。当巴顿在发布他自己的进攻命令时，还是按着他的老习惯，给部队规定了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但是，这倒不伤大体，布莱德雷和我所关心的只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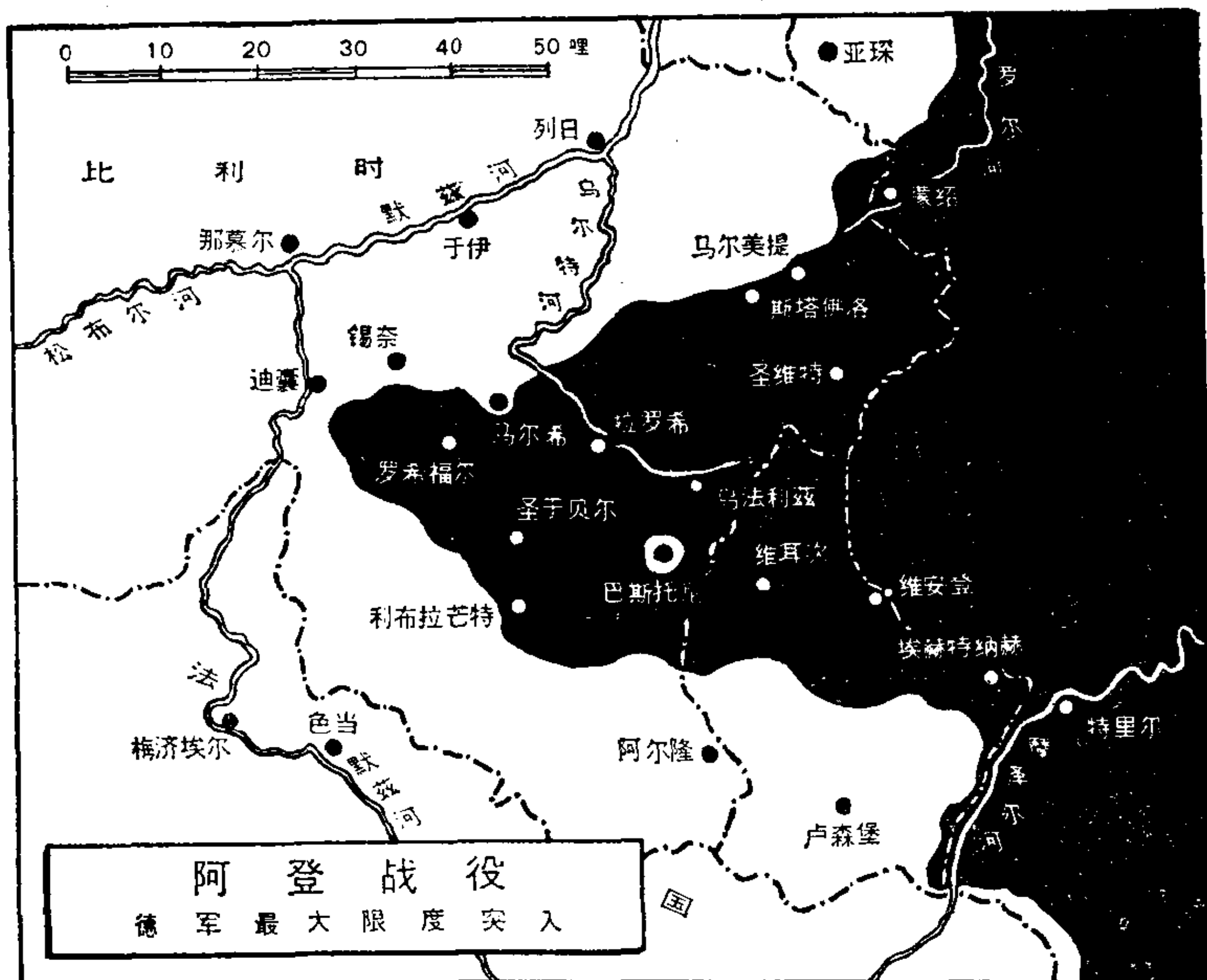
组织地向巴斯托尼进攻，在此以后，布莱德雷会决定下一步的具体行动的。

敌人在科耳马尔的据点对我们那天早晨拟定的计划有一定的影响和牵制作用。如果这个据点不存在，法军就能很容易地守住从瑞士边境往北到萨尔地区的来因河防线，这样就能把美国第七集团军腾出来用在那个地点以北的地方，从而为巴顿的进攻提供更多的兵力。但是科耳马尔据点对于孚日山脉东面来因平原上的我军是一个威胁，因此，把那个地区本来可以节省出来的全部兵力都调走，那是不明智的，也是有危险的。

德弗斯奉命，只要能节省兵力，就放弃他战区里的任何向前的凸出部。一旦遇到攻击，就从北侧慢慢往后撤，甚至完全撤退到孚日山脉也行。北阿萨坦平原，对我们来说，并不迫切需要。那时，我十分希望德弗斯的战线往后撤，必要的话可以远远撤至孚日山脉的东端。但我不允许德军再次进入山区，这条界线是德弗斯战线上所必须守住的。

这些训令当然也通知了法军，因为他们也暗示了后撤的可能性。如果后撤幅度大的话，连斯特拉斯堡也可能要暂时放弃。法军司令官后来把这个通知转交巴黎，从而引起了法国军界和政界的极大关心。法军参谋长朱安将军来找我，要求竭力保卫斯特拉斯堡。我告诉他，在那时我不能担保这个城市的安全，但同意尽量不放弃。然而在阿登战役的整个过程中，斯特拉斯堡问题使我伤透了脑筋。

到19日夜，在凡尔赛的最高统帅部接到报告说，德军的进攻通过凸出部中央迅速向前推进，先锋部队继续向西北方向迂迴。进攻的方向越来越表明德军的计划是在列日西面某处抢渡默兹河，并从那里——我们认为是在包围列日以后——继续向西北去抢占



[按原图译制]

突破口以北我们整个部队的主要交通线。北侧明显地处在危险之中,战斗越打越激烈。此外,看来德军可能企图在更北一些地方发动第二个属于支援性的进攻,以便尽量分散我们的兵力,完成对我们整个北侧的两翼包围。情报处掌握的一些证据证明,敌人对这种支援性进攻已经作了计划。

德军的这次进攻很快获得了一个称为“凸出部之战”的浑号。因为敌军一开始就猛烈突击我军防守薄弱的战线,取得了迅速进展,结果突入我军前线最大纵深竟达五十哩左右。

这类战斗给在战场上的部队造成极大的压力,可说从最高统帅到基层列兵无一例外。当然,也使被攻击部队的士气受到非常严重的有害影响。在实际战斗中正遭受着种种危险的前线士兵,面临敌人压倒优势的兵力,而又无法了解司令官心里的增援措施,

就必然要表现出混乱、恐慌和沮丧。

高级司令官在不同方面受到同样大的压力。不管他们如何相信他们有能力最终击退敌人并使战局转而有利于自己，当敌人先发制人的时候，总是存在着难免出错的危险。惊慌失措的情绪，天气的突然变化和其他的意外情况，都能破坏最周密的计划，以致不仅不能取胜，还会适得其反，这在战争史上是不乏先例的。说阿登战役的第一个星期，盟军各梯队不紧张、不忧虑，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虚伪的。同样，过分强调这种紧张、忧虑的程度和影响也是不真实的。

在战争中没有一个负责的人能避免精神上的紧张；而这种紧张，在德军发动的那次先发制人的阿登战役中，达到了高峰。但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战斗部队，人人都有经受突然事变的训练。由于极度恐惧而产生的歇斯底里，只是一些例外情况下才会遇到。在这种战斗中，比平常更需要的是：责任司令官要表现出坚定、沉着和乐观，这样才能洞察由互相矛盾的情报、惶恐疑惧和变化不定所形成的复杂形势，利用敌人的弱点，去争取胜利。美国司令官恰恰就有这种修养。

在这次战役的初期，12月22日，我发布了一项我在战争时期很少写的“当日命令”，其中写道：

敌人一冲出他们的固定防线，这就能给我们机会把他们的大冒险变为对他们的毁灭性打击。所以我号召全体盟军战士，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努力奋斗。希望每个人都坚持这个唯一的信念：从地面、从空中、从一切地方消灭敌人！让我们以这个决心和我们为之战斗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团结起来！在上帝的帮助下朝着最大胜利奋勇前进！

在突破口以北，三支盟军部队和另外一部分队伍占据着一个很大的凸出部，这个凸出部的半圆形战线约长二百五十哩。最北面是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沿着下来因河和马斯河部署，面向北和东，接着往南是美国第九集团军，面向东，再过来是美国第一集团军，仍留在突入部之北的那一部分部队，面向南。

能从第一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前线匀出来的所有部队，集合起来建立了一条东西防线，抵御德军的进攻。在那时，这两个集团军一点也提供不出机动后备队。

但是，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还剩有后备队，即英国的第三十军，那时它没有投入战斗。如果北侧这个大半圆弧的阵地上有什么地方遭到德军的攻击，就可用它支援。可以完全肯定，那个凸出部成了只有一个后备队的战线。这个后备队，可能被派去增援英军和加拿大军，也可能被派去支援美国第九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18、19两日，德军进攻的深度已经破坏了布莱德雷在卢森堡的司令部和第九、第一集团军司令部之间的一切正常的通讯联络。因此，布莱德雷就根本不可能——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在照顾凸出部南侧的肩状部分的进攻的同时，再与北侧正在抗击德军最猛烈攻击的那个部队保持原来的接触。

要控制整个局势，看来只有一种办法是合适的。这就是把位于我们北侧凸出部的所有部队交由一个司令官指挥。达到这种必须的统一的唯一办法是，委任蒙哥马利暂时指挥北侧的所有部队，同时命令布莱德雷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南侧的战斗。因为我很信任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健全的协作制度，所以毫不犹豫地采取了这种解决办法。我把这个决定用电话通知了布莱德雷，然后又用电话向蒙哥马利陆军元帅传达了对他的命令。

那天傍晚，丘吉尔先生来电话问我战斗进展情况。我把我们

早已在执行的对策简略地告诉了他，并通知他临时的指挥系统。他说，我的计划可以使英国后备队立即在最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而不管原来规定的战区如何。并且还说：“我向你保证，英军将总是以能象他们的美军战友一样参加这个战斗而感到光荣。”

这个指挥方案是实行了，并且由于当时的必要性而被普遍接受。

不幸的是这次战斗结束后，蒙哥马利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这次记者招待会又为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随军记者在新闻报道里加以渲染，这在美军中间造成了一种不良的印象，好象蒙哥马利自命为美军的救星。我不相信蒙哥马利的话就象人们所传播的那样。但这种坏影响以后一直没有减少。

这个事件比起这次战争中其他同类的事件来，更使我忧虑和烦恼。我想蒙哥马利无论如何体会不到一些美军司令官有多么愤怒。这些美军司令官认为他有意贬低他们，所以毫不延迟地反唇相讥。但一个时期在这个指挥区到处出现的互相攻讦，并不是针对当初为健全军事领导而作的那个决定，而是针对美国人加于蒙哥马利的记者招待会的那些解说和出之于他的司令部的那些新闻报道。在大家都为赢得这一决定性胜利而欢乐的气氛中，插进这样一件事，实在令人遗憾！

在这同时，一部分英国报纸又重新提起了单一地面司令官的老问题。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相信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甚至提议，只要我同意，他愿归布莱德雷指挥。我不同意这是个原则问题，因此我一直拒绝这个建议。甚至马歇尔将军为这件事在12月30日打电报给我，其中说：

他们可能已经让你注意伦敦某些报纸的文章，建议给你的整个地面

部队设立一个英国副司令官,并且暗示你负担太重。我的想法是: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作丝毫让步。我并不假定你已经有这种让步的想法,我只是希望你坚持我们的立场。你做得很对,干下去吧!别听那些鬼话。

元旦那天,我作了如下的回答:

您不必担心我会打算设置一个地面副司令官。我接到您的电报后,已经查看了您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报纸上登载的文章。我们当前的困难正被某些报纸和他们的记者利用来倡议他们一直想要的东西,而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全的组织。在目前情况下,德军的进攻并不牵连集团军群的分界线,而恰恰是进入了一个单独集团军群管辖区的中心。在指挥安排上的这种紧急改变,即在每个侧面委任一人负责,乃是形势所决定的。因为这次德军的突入是如此之深,以致布莱德雷不可能再指挥两个侧面,而在北侧能调动的仅有的后备队大部分又是英军。所以南、北两侧不得不分别实行单独领导。

巴斯托尼的防御不仅是军事上的一个壮举,而且对这个战役的结果也有很大影响。巴斯托尼位于德国第五装甲集团军总攻击的路线上。我们后来发现,这个装甲军曾下过这样的命令:如果巴斯托尼设防,先头部队可绕道而行,先往西突击,然后向北迂回参加主攻。

12月17日,第十八空降军和它的两个师拨给了布莱德雷将军,并奉命开往巴斯托尼。因为巴斯托尼只是个极好的公路中心,当时没有预料到会在那个地区展开战斗,所以后来当地司令官能够把这些调去的部队调往他认为合适的地点。当18日北侧前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时,这些部队正在开往前线。布莱德雷立即把先头师、即第八十二师调往左面,让第一〇一师继续向原来的目的地进发。后者于12月18日夜接近巴斯托尼。当天夜间和19日,当德国人正忙于对付原来防线上部队的一些被隔绝的分遣队时,第一

○一师即趁此准备保卫巴斯托尼。19日晨在凡尔登的会议上,我们还不知道巴斯托尼是否已被包围,但从德军在那个地区进攻的兵力和方向来看,巴斯托尼可能很快会被包围。

于是,第一〇一师准备全面防卫。虽然德军的突击装甲师绕过第一〇一师去参加往西北方面的进攻,但是这个师从那时开始一直到得救,始终不断受到其他德军部队的压力。

受到德军进攻的北方战线的危急局势,一直延续了好几天。12月21日,第七装甲师的残部以及它的增援分遣队,在德军优势兵力的猛烈突击前抵抗了一天之后,已从圣维特附近无掩护的阵地上撤退下来。在以后的几天里,北侧的战斗一直是异常激烈的。蒙哥马利担负起北侧的统一指挥后,立即开始组织一支美国部队以领导以后北侧的反攻。

柯林斯将军及其第七军被选中担任这项任务,但是在几天内很快就能分配给他的那几个师,却陷入在几个危急地点阻挡敌军进攻的战斗中了。

这种规模的战斗一直维持到26日。从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来看,德军似乎至少还要发动一次猛攻,以期突破巴斯托尼的我军防线。

在南侧,布莱德雷于12月22日晨发动了进攻。进展特慢,因为大雪阻塞了公路和积满了田野,行动十分困难。第三军,其中包括第四装甲师、第八十师和第二十六师,首先发难。这是巴顿将军特别不喜欢的一种战斗:进展既慢,费劲又大,而且根本没有一下突破的可能。在这次进攻中,巴顿将军因为他不能很快前进,几次打电话向我表示他的失望。在19日晨的凡尔登会议上,他曾暗示——或者甚至可说是预言——他可以一举攻进巴斯托尼。我回答他说,只要他在前进,我就十分满意了。他的情况完全没有出乎我



的预料。我知道他开始进攻时所遇到的不过是德国第七集团军的一些防御师,但地形和气候条件太坏,所以快速推进根本没有希望。

12月23日,突然出现了一种对我们有利的新情况,即前方地区的天气突然暂时晴朗,这使我们的空军可以投入战斗。从此以后,除了坏天气有些干扰外,我们久经考验的地空战术协作又发挥了它的传统效率。空军轰炸德军运输系统中的敏感地点,袭击行军的队伍,侦察和报告敌军的种种重要行动。这以后捉到的德军俘虏,一致激烈地抱怨他们空军的惨败以及盟国空军在他们中间造成的破坏和恐怖。

26日,巴顿的一个小纵队终于成功地冲进巴斯托尼。但这是从他左翼一个狭长地带冲进去的,所以它同我们被围的守军只能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这天以后,我们的守军和援军才围绕着巴斯托尼展开了艰苦的战斗。

我计划于23日去会晤蒙哥马利,但是在这个后方地区乘飞机去,仍不合适;乘汽车去,又慢又不可靠。这次旅行可能使我离开统帅部好几天,这是不明智的。幸好我与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之间的电话和无线电通讯联系还令人满意,这样就能使我及时了解形势的发展。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趁黑夜坐火车去布鲁塞尔会晤蒙哥马利,会议一结束就立即赶回。我准备用的火车于26日夜被德国人炸毁,但匆忙又准备了一列,我于27日动身前往。

这次旅行因为保安队非常担心,所以戒备森严。他们害怕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敌人的暗杀者谋害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我,可能还有另外的人。这个情报是令人吃惊的。几个月来,我走遍了法国各地,保护我的除了一个保安人员和一个经常与我同车的副官外,没有什么特殊的保卫措施。这个情报是一个很激动的美军上校于12月20日告诉我的。他肯定他有充分的和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

阴谋的存在,并且说得非常详细,保安部的其他成员也同意他的结论。我对这种暗杀的说法是打着折扣听的,但是同意把我的住所搬到统帅部附近。我曾住在圣歇尔曼镇上冯·龙德施泰特原来住过的一幢房子里。我相信德军非常缺乏人,它不可能派人到处游荡去寻找他们打算谋害的人,而且明知暗杀一个还可以再来一个的。我对保安队坚持要我限制自己行动的自由感到很恼火。但是我发现,如果我不是适当地顺从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只有用更多的人来执行保卫措施。

于是我同意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出统帅部,只要他们把保安队压缩到最低限度,以便把这些士兵投入战斗,而不要跟着我打转转。他们同意把这种严密保卫的时间限制到12月23日。但我于12月27日动身到布鲁塞尔去时,发现车站上布满了宪兵和岗哨,我严厉质问保安军官为什么又这样使用人,而他们向我保证说,这些人只是在车站上单个集合起来的,他们本来就在附近值勤。但我们登上一段旅程后,我发现仍有一个班的士兵跟着我。每当火车停下来时——这是常事,因为冰雪的阻塞难以行车,他们就立刻跳出车厢,站成警戒线保卫我们。

我对负责具体工作的下级保安军官说过,怀有野心的德国暗杀者如果能够预先肯定将在某个具体列车、某个特定时间和欧洲某一特定的地点找到他期待的牺牲品,我认为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让他把人召进来,以免在严寒中挨冻。他原则上同意,但是他所接受的命令对他的约束是如此严格,以致我怀疑我能使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放弃这种徒劳无益的活动。

几乎到28日的中午,我才和蒙哥马利会晤。公路太坏,根本不能乘车。我们的火车在到哈塞耳特的整个路途中不得不走一条漫长、弯曲的支线。我在哈塞耳特会见蒙哥马利。他详细告诉我

最近进攻北线的情况,指给我看他的总后备队的位置,并说他又开始集结柯林斯的军,将用它来发动盟军从北侧的进攻。他打算向着乌法利兹的总方向推进。

在那个会上,我们没有确切的情报说明德军打算停止北侧的进攻。蒙哥马利根据他得到的情报——这个情报在收到的时候是正确的——肯定德军至少还要对北线发动一次疯狂的进攻。蒙哥马利自信能击退这次进攻,并且准备好了后备队,一旦德军被击退,立即进行追击。当然,这项计划的实施会捉住适于发动大规模反击的最好战机。唯一的困难是发动进攻的时间要依靠敌人的行动。我同他讨论了有没有德军不再对北侧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他认为德军的进攻是十分肯定的。蒙哥马利说,万一敌人不恢复突击,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重新组织、装备和休整队伍。那时首要的工作是弄清楚我军北侧战线是否完整。德军还远在他们能使我们遭受重大损失的那些地区的南面。我们必须担心的一件事是,他们用刚到达那个战线的新部队再突破一个新的缺口。

我们一致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加强北侧前线的兵力,整编队伍和全面准备强大的反击。同时,随时准备击退德军可能发动的任何进攻。我们也一致同意,如果德军不发动进攻,蒙哥马利就在1月3日晨发起主动进攻。

结果德军没有进一步发动进攻,因为敌人改变了计划,把他们的部队集结于巴斯托尼。北侧的盟军部队充分利用了这段空隙时间,并按照12月28日所通过的计划,于1月3日晨转入进攻。

我29日返回统帅部。到这时保安人员才开始相信,他们所害怕的暗杀阴谋是言过其实的。这时,他们虽然继续对我采取保安措施,而且比之进攻发动以前更为严格,但我感到,至少现在离开我的统帅部时,屁股后面不再跟着一整排坐着吉普车和巡逻车的

宪兵了。

12月26日，巴顿与我们在巴斯托尼的守军建立了微弱的接触。当时，在北侧刚刚击退德军在那里发动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进攻，后来证明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大进攻。到这时，我们巴斯托尼的守军成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心目中的一根肉中刺。只要巴斯托尼在我们手里，德军往西的走廊就会被切成位于南面的巴斯托尼和北面的斯塔佛洛之间的一条狭长地带。穿过这个地带，只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名副其实的公路。26日，德军开始为进攻巴斯托尼地区集结强大兵力。敌军部队从北面的战线转移过来，并从后方调来了增援部队。

与此同时，我们也调来了第十一装甲师，并把第十七空降师转移到欧洲大陆。这两个师以及第八十七师都被部署在默兹河附近，在规定的位置上守住他们最有用的地区。由于德军从12月20至26日在北侧的连续进攻，看来我们把新的队伍充分投入北侧有了可能。但到27日情况就清楚了，德军现在的主要行动是进攻巴斯托尼。28日，我把几个新师拨给布莱德雷使用。第十一师和第八十七师被用来支援正对着巴斯托尼西面的巴顿的左翼，但布满冰雪的道路太难走了，所以这些新的部队收效甚微。12月底，米德尔顿的第八军经过改编后返回前线，加入了朝北面向巴斯托尼的进攻。德军坚持从北面对巴斯托尼地区的进攻直到1月3日夜，他们始终没有停止过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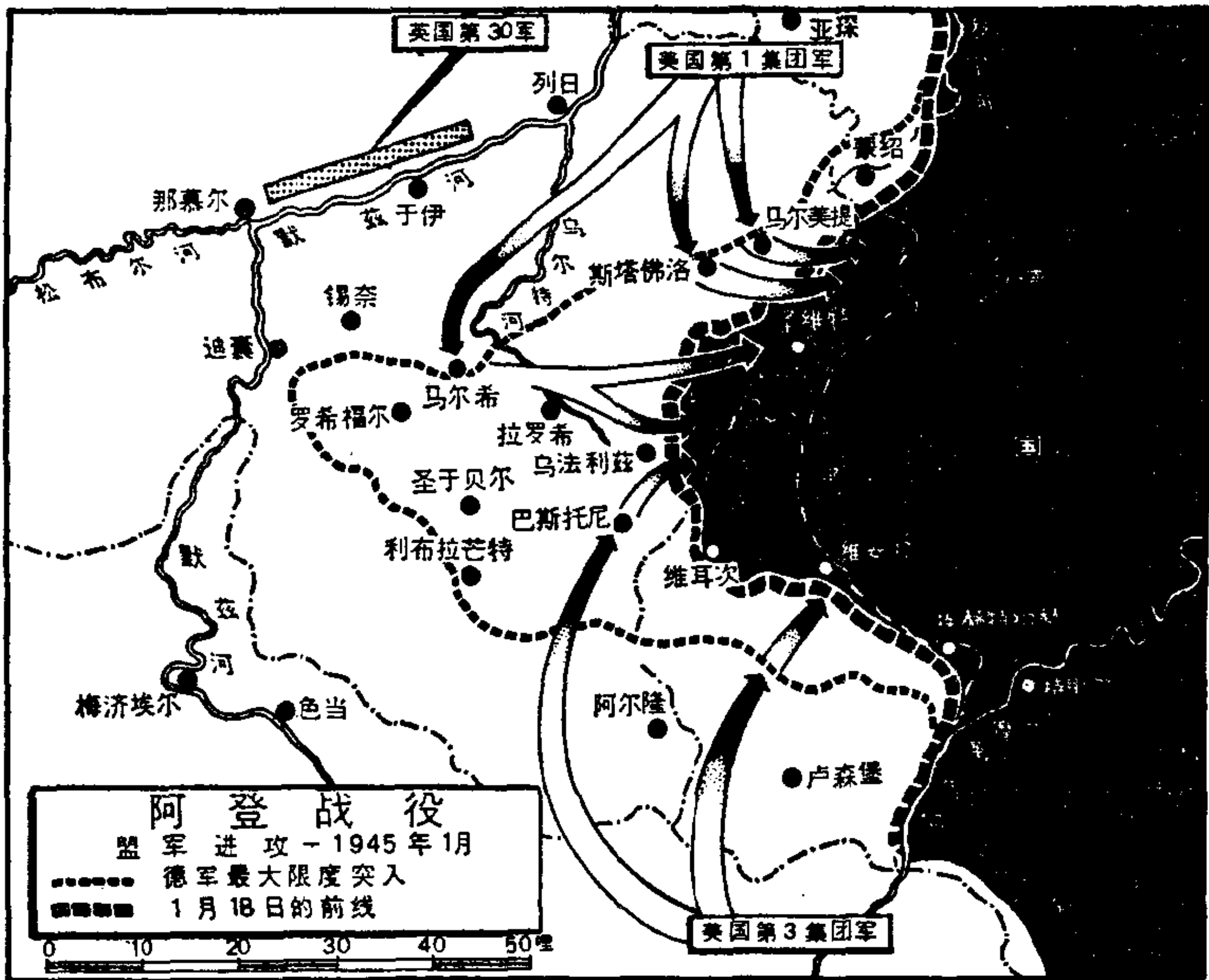
在12月的整个战斗进程中，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过恢复全面进攻的计划工作。12月31日，我交给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一份我们整个战线从波恩一直往北向来因河挺进的简要作战计划。

当阿登战役拖下去的时候，德军开始在阿尔萨斯作牵制性进攻。他们的力量并不大，但是我们减弱了自己在那里的兵力，所以

要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我告诉德弗斯决不能让较大的部队被分割和包围。

法国继续在为斯特拉斯堡的安全而担忧。1月3日,戴高乐来看我。我向他说明了形势。他认为我援救那个地区的部队的计划,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是他指出,从1870年的战争以来,斯特拉斯堡已成为法国人民的一个象征,即使是暂时放弃,也会使全体法国国民感到沮丧,并有发生公开叛乱的可能。他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切,说如果到了最后关头,他会认为甚至冒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斯特拉斯堡周围投下法国的全部兵力,也要比不战而退好。他带了一封信来,说如果我不同意死守到底,他将不得不采取独立行动。我提醒他,如果违背我的命令,将断绝对法国军队的弹药、给养和粮秣的供应。我并且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法国军队早消灭了敌人的科耳马尔据点,目前这种形势就根本不会出现。

一眼就可看出,戴高乐的理由象是以政治考虑为根据的,并且感情用事,而不是根据事实的逻辑和常识。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成了一个军事问题,因为如果放弃斯特拉斯堡,可能会从两个方向影响我们通过整个法国的交通线和补给线。这些交通线沿线的动荡事故或叛乱将导致我们前线的失败。此外,到这次开会时,阿登的危机早已过去。现在我们已在凸出部之内发动进攻。当时,我准备把能够从各地节省下来的兵力全部投入布莱德雷的战线。这种动机在今天已经是为了保证胜利,而决不是为了避免失败。我决定修改给德弗斯的命令。我告诉戴高乐将军,我要立即命令德弗斯只从他战线北端的凸出部撤退,把兵力部署于中央以便坚守斯特拉斯堡。而且以后不再抽调第六集团军群的兵力。这个改变使得戴高乐非常高兴。他走时情绪极好,宣称对我的军事见解无限信任。



(按原图译制)

当戴高乐同我会晤时，丘吉尔碰巧也在我的统帅部。他和我们坐在一起，但对我们的谈话不加一句评论。戴高乐走后，他平静地对我说：“我认为您作了一件聪明而又恰当的事情。”

在这个战役中，德国空军企图进行这次战事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1月1日，德国空军发动了几个月来对我们的最猛烈的攻击。它的主要目标是盟军飞机场，特别是“凸出部”附近及其以北的飞机场。在这一整天中，敌人摧毁了我们很多飞机，其中大多数是停在机场上的。我们的战斗机反应很迅速，虽然我们遭到相当严重的——而且部分是不必要的——损失，但敌人却付出了几乎是它整个进攻力量的一半的代价。

两天以后，即1月3日，以第七军为先锋的第一集团军在北侧发动进攻，德军强大攻击的一切危险已经消失。从此以后，只存在

一个问题，即我们能否通过敌人的防御工事以及越过阿登的雪堤大踏步前进，去俘获或者消灭敌人兵力的重要部分。

我们朝着乌法利兹的方向从两侧不断进攻，1月16日，在乌法利兹会师。但是这次进攻非常缓慢，而且受到敌人猛烈抵抗，以致敌人许多部队在我军封口的地方以西成功地进行了撤退。第一和第三两个集团军到达乌法利兹后，一起向东把德军赶过了他们最初的防线。这时第一集团军才又重归布莱德雷将军指挥。我把在美军左翼的美国第九集团军暂时调给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因为我们正在拟订一项渡过罗尔河和夹击北部战区的来因河的计划。我希望在2月8至10日发动这次突击。由于蒙哥马利的部队还在后面，部署于安特卫普一线，因此，我只能使用这两个集团军中的美国第九集团军来进行这次突击。

在这次“阿登之战”中，双方损失都很大。据前线司令官估计，到1月16日为止的一个月中，敌人遭到十二万人的严重伤亡。战争结束后，有些德军司令官承认，损失大约九万人，从这个数字看，我们的估计看来是相当准确的。除兵员损失外，敌人的坦克、大炮、飞机、运输汽车也遭到了严重损失。我们估计，这次敌人损失六百辆（门）坦克和强击火炮，一千六百架飞机和六千辆其他车辆。在阿登战役中，我们的地面部队在地面战斗中第一次使用了新的“近发引信”，这是一种大大地增加我们火炮威力的新发明。

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尤其以第一〇六步兵师为最严重。这个师的阵地是无掩护的，因此它不仅从一开始即进入战斗，而且很多士兵被孤立起来，后来成了俘虏。第二十八师同样受到沉重打击。第七装甲师在英勇的圣维特保卫战中遭到重大损失。我们计算全部伤亡为七万七千人，其中八千人阵亡，四万八千人受伤，二万一千人被俘或失踪。我们的坦克和反坦克炮损失七百三

十三辆(门)。

拟议中的2月8至10日的突击,不过是一系列沉重打击的开始,因为我们正在制订彻底消灭来因河以西德军的计划。我希望尽快转入全面进攻,因为我深信,在“凸出部之战”中敌人已投入了全部剩下的后备队。我预计,从今以后,敌人的抵抗将大为减弱,因为一方面德军遭到了重大伤亡,另一方面我认为敌军将遭到普遍的士气低落的沉重压力。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俄军在1月12日已经开始了他们等待已久的、强大的冬季攻势。我们早已得到报告,说他们正在取得巨大的进展。十分清楚,我们进攻得越快,就越能肯定德国不可能再次增援它的西部战线来发动进攻,以挽救败局。



## 第十九章

### 越过来因河

在整个“凸出部之战”期间，我们继续计划着最后的攻击。这个攻击一经开始，我们打算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直到最后打败德国。这个军事行动计划分三个总的阶段进行。开始阶段，沿着前线发动一系列进攻，消灭来因河以西的德军；第二阶段，包括越过来因河和建立重要的桥头堡；第三阶段，发动最后进攻；我们确信，这一进攻将把我们带进德国的核心，并消灭其残余的抵抗力量。

在这次最后进攻中，我们将会在某些地方遇到从东面来的部分红军，所以更为密切地协调与红军的行动，现在成了重要问题。在较早的战役中，联合参谋长会议不断向我们报告苏军总的意图。只要两个战区相隔很远，通过上述报告就能在两部分军队之间提供充分的协调。然而，现在已经到了就有关进攻目标和进攻时间的计划交换情报的时候。

1945年1月初，在联合参谋长会议的同意下，我派泰德空军上将去莫斯科为这种协调作必要的安排。陪同他前往的有哈罗德·布尔少将和贝茨准将，他们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部中很能干的两个美国军官。泰德空军上将授权把有关我们冬末和春季的作战计划的全部情报交给俄国军事当局，并取得有关俄国作战计划的同类情报。

我们早已知道，俄军打算在维斯杜拉河流域从华沙周围的各

阵地及早往西发动进攻。我们了解，俄军到年初已为这次进攻完成了兵力集结。但由于地形条件，尤其由于妨碍空战的浓厚云雾，他们要到这些条件变得更加有利时再发动进攻。然而，我们通过联合参谋长会议知道，即便这些条件不改善，俄军将不迟于1月15日发动进攻。这次进攻在1月12日开始，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泰德空军上将及其随行人员正是在这次进攻开始以后到达莫斯科的。斯大林大元帅和俄国军事当局极其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全面而准确地交换了有关将来作战计划的情报。大元帅告诉我们的特使，即便当时正在进行的这次进攻没能达到他们预定的目标，俄军将继续实施一系列进攻，这些进攻至少将阻止德军从俄军的战区抽出兵力去增援西线。

作为这个初步行动的下一步是，联合参谋长会议授权我在属于纯军事性质的问题上直接与莫斯科联系。后来，在一次争论中，我对这个授权的解释受到丘吉尔先生严厉的责难。这个争论起因于这样一个古老的真理：政治和军事从来无法截然分开。

在现代战争中，两支向着共同中心进攻的友军之间的协调，比起过去时代的战斗来更加迫切需要。以往的战斗只限于地面，而且是沿着小型武器和野战炮射程以内的一条狭窄地带进行的。而今天，支援进攻部队的战斗轰炸机不断飞及敌人战线，有时甚至深入敌人后方几百哩。他们的目的是寻找和摧毁敌人的司令部、仓库、供应站和桥梁，袭击他们的后备队。在两支友军本身远没有碰头之前，早就发生了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即如何使两支分离的盟军部队进行协作，以避免发生不幸事件和误会。

在战场上识别敌友决不是容易的。在我国的“南北战争”中，一方穿蓝衣，另一方穿灰衣，在这样的情况下同一军队的各单位之间还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剧烈战斗。在现代战争中，部队的各种制服都

是按照如何与乡村景色相调和的想法设计的，十九世纪的密集队形是从来看不到的，飞机和车辆的速度只能使观察者在一瞬间就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所以识别敌我这个问题是难于解决的。因此当我们向前进攻时，就需要越来越仔细地注意这些问题。但在1945年1月，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了解俄军下一次进攻的时间和方向，从而为将来的战场协作奠定基础。

1945年初，我们的空袭使德国经济遭到灾难性的损失。我们的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大大地瓦解了敌人的空袭警报和防御系统，并且占领了很多地方——特别是占领了潜艇隐蔽处所在地的欧洲西部港口，以前对这些地方的空袭使我们减少了对德国心脏诸目标的轰炸。另一个有利条件是：我们的战略轰炸机现在受到伴随的战斗机的更好保护。战斗机群能够部署在靠近来因河的前沿机场。尽管它们的航程较短，但几乎能够袭击轴心国领土的任何目标。

到这个时期，空军在破坏德国燃料油储备方面也取得了辉煌胜利。好几个个月以来，敌人的燃料油资源一直是我们的战略轰炸的主要目标，并且由于不断的轰炸，使德国的运输和其他方面的战争行动都发生了持续的危机。这对地面战斗有一定的影响。德国已经感觉到，把后备队和供应从一个战线运到另一个战线，困难越来越大，而它的各个战区的部队则又经常为缺乏车用燃料所困。这种轰炸效果也影响到德国空军，例如，新驾驶员的训练期由于缺乏燃料不得不大大缩短。

在漫长的冬季战斗中，我们的情报参谋开始给我们送来令人不安的情报，说德国人在发展喷气飞机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的空军司令官们的意见是：假如敌人能够成功地把这些飞机大量投入空战，它将立即使我们对德国的轰炸付出无比高昂的代价。我

们自己的喷气飞机的制造,在美国和英国也取得了进展,但我们还远远不能指望在春季战役中就有成批的喷气机中队。

我们唯一可能采取的办法是,试图用轰炸来推迟德国人对这种新武器的生产。空军知道,使用喷气机需要特长的跑道,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发现有这种跑道的德国机场,他们就进行断断续续的、而且是反复的轰炸。此外,他们还寻找他们认为是制造这种飞机的每一个地方。因此,在破坏燃料油储备方面,我们的轰炸有所减轻,但到1945年1月,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能力来这样做而无损于轰炸敌人油料储备任务的执行。我们对喷气机生产设施的轰炸,至少有部分是成功的,因为德国人从来没有能够使用足够数量的这种新型飞机来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

有关所有这些事情的情报都是我们的情报部门收集的。它们每日都向我提供他们的估计和结论。这些估计和结论都显著地说明,德国的战争机器遇到了日益严重的困难,并激励我和所有我的同事们相信,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必将使希特勒德国遭到致命的打击。

但是我发现,有些英国高级军事官员相当反对我的计划,这对我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美国参谋部和它的前线司令官的关系,显然不同于英国参谋部和它的前线司令官的关系。美国的军事原则始终是这样的:为战区司令官指定一项任务,给他提供一定数量的兵力,在他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尽可能少加干涉。这个原则和理论是:战场上的人对战术情况的了解总比距离战斗现场几千哩的人清楚得多。如果一个前线司令官所获得的战果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正当的处置办法不是对他劝说、警告和折磨,而是用另一个司令官替代他。

另一方面,伦敦的英国参谋部在整个战争中每天都与它自己

的前线司令官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并坚持要他们经常汇报有关兵力、计划和局势的详细情况。这种习惯可能是以我所不了解的一些正当理由为根据的,但对于我这样一个习惯于美军传统的人来说,发现英国参谋部定期向它的前线司令官询问战术计划,总是一个震动。例如,英军司令官被要求逐日向伦敦提出一份包括每一个情报项目的报告,而在我们军队里,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向比当地部队司令部更高级的机构呈送这类情报。

在整个战争期间,我自己的习惯只是向华盛顿和伦敦呈送每日战况简报,简称《战况报》(兼有形势和情报的报告)。

1945年1月,当我完成我的最后计划时,我的朋友布鲁克陆军元帅非正式地、但是非常热忱地提出了一个重大异议。他的问题是针对他所谓的有计划分散我军兵力一事提出的。他坚持说,我们决无足够的兵力实施一次以上的抢渡来因河的激烈进攻。因此,他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兵力能实施这样一次进攻,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应当在这条战线的的所有其他部分改取守势。

分散兵力是战争中的一个最大过失,但象使用所有其他通则一样,适当地运用这个真理要比只是认识这个真理重要得多。

1月,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德军拥有了萨尔以北地区——包括萨尔在内——的齐格菲防线上的很大有利条件。只要我们让他们留在这些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内,他们的能力就会增加到这样的地步,即以相对薄弱的兵力就能守住漫长战线上的巨大阵地。同时还能集结兵力对选定的地点发动掠夺性进攻。这意味着盟军的一大部分兵力为了实行保护职责而失去机动,而只有鲁尔北面能得到供应的那部分部队才能用于进攻。在那个唯一的进攻地带,从后勤方面说,我们至多只能维持三十五个师。

但是,如果我们首先发动一系列集中的和强大的进攻,消灭了

来因河西面的德军，其效果将会使我们沿着整个漫长的前线有一条与敌人的防线同样坚强的防线。我们估计，如果我们占领了来因河西岸，就能在对德国的大规模向心突击中投入大约七十五个增援师。如果我们允许鲁尔以南的敌人留在齐格菲防线内，我们就只能限于用大约三十五个师的兵力发动一次单独攻势。

我们计划的第二个优点是能摧毁今后将在来因河天险的渡口上遇到的德军；此外，这一向心突击，如果能得到1945年最初几个月我们在欧洲已具有的空军力量的支援，其效果一定会成倍地增大。我们使用空军就可以阻止敌人随意地前后转移兵力来抗击我们的任何一路突击纵队，并且我们同样可以在任何时候使用全部空军力量在我们所希望的任何地区推动进攻。

我极力向布鲁克陆军元帅解释，我这样指挥，不但不分散兵力，而且当我们准备好向来因河对岸的德国发动最后进攻时，能取得一支步调一致和威力巨大的进攻力量，从而使德国迅速崩溃。占领整个来因河流域的决定性优点，将是大大增加盟军可以用于进攻方面的兵力。

我没有能完全使他信服，他说：“我希望把第十二集团军群部署在鲁尔的北面，把英军部署在中央”，他的话意味着我的计划是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拟订的。

对此我反驳说：“我既不愿看着英军承担损失，也肯定不愿把美军投入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送死。我没有别的办法向鲁尔以北提供我认为对迅速执行我的计划所必需的兵力，所以我用整整一个美国集团军加强了蒙哥马利的集团军群。我并不是依据哪个人或国家获得荣誉的原则制订任何计划的，因为我必须告诉你，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战斗荣誉抵得过为战斗而付出的血的代价。”

布鲁克陆军元帅表示,但愿事情会象我相信的那样发展;但是他对盟军能够通过连续的歼灭性打击消灭我们和来因河之间的德军一事,显然有所怀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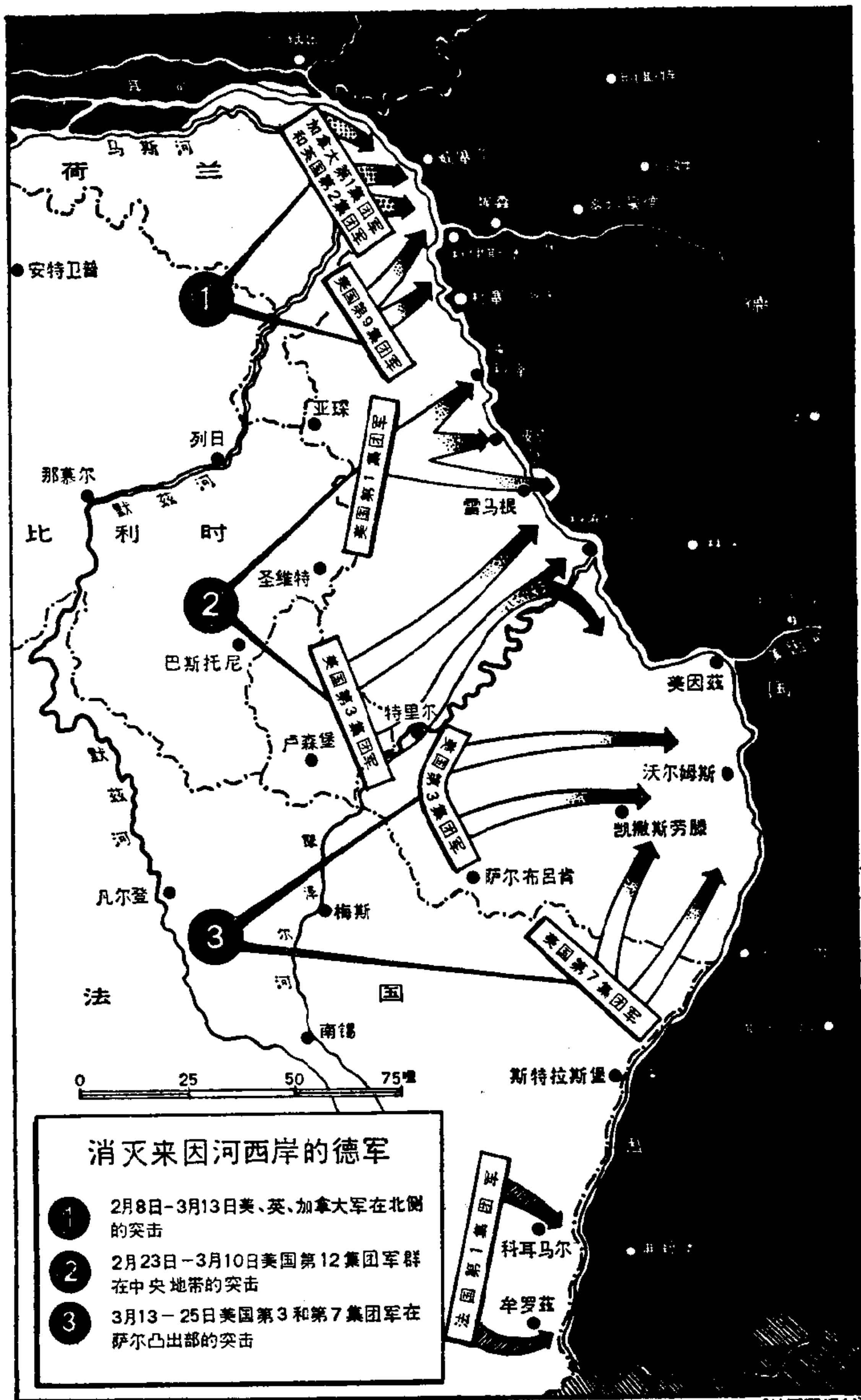
同时,还有人向我建议设立一个直接在盟军最高统帅部领导下负责作战的全面的“地面司令官”。我一如既往,拒绝了这个建议。我确信,我们用以打败德国的那些计划,是能够制订出来的最好的计划。我认为上述建议中的安排是无用的和愚蠢的,因此我将其置诸一边,决定排除任何干扰,正确而迅速地执行这些计划。

1月初,我听说总统、首相和他们的参谋人员又要和斯大林大元帅会晤。这次是在雅尔塔。马歇尔将军离开了美国代表团单独进入欧洲,我被安排在马赛和他秘密会晤。我于1月25日到达那里。我们就当时所了解的局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他在华盛顿听到了英国参谋部对我们计划表示不满的嘟囔声,也听到了要求设立单一的地面司令官的建议。我说明了我们的战局,概述了我们计划打败德国的准确步骤。他表示完全同意。

然而,那时我们计划中有一个错误估计,这个错误估计来源于技术情报。工程兵根据长时间的统计,对来因河作了很多研究。他们向我报告,大约5月1日以前恐怕不能越过来因河进行成功的突击。这个意见表达得非常有力,以致使我在思想上同意作必要的推迟,并计划在那个时间以前不发动大规模的渡河突击。当然,这并不影响在渡河以前执行我们计划的任何部分。后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技术性意见有了明显的改变,并且我们认为,在5月1日以前很久就渡河、架桥和稳住阵脚是完全行得通的。

马歇尔将军对整个计划的健全性,印象极为深刻,以致他建议我派我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到马耳他去参加一个会议,这是总统、首相和他们各自的参谋人员在去雅尔塔以前要举行的一次会议。



**消灭来因河西岸的德军**

- ① 2月8日-3月13日美、英、加拿大军在北侧的突击
- ② 2月23日-3月10日美国第12集团军群在中央地带的突击
- ③ 3月13-25日美国第3和第7集团军在萨尔凸出部的突击

(按原图译制)



他说：“当然，我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上支持你的立场，即这些决定属于你的职权范围。但你的计划非常周密，所以我想你最好派史密斯将军到马耳他去，以便能详细地说明这些问题。它们的逻辑会令人信服的。”我是乐于同意的，因为我很了解，有马歇尔将军支持我，就不会再有干扰我们制订计划的危险了。

布鲁克陆军元帅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是基于过分自信。他极大的忧虑没有一点根据。仅仅几个星期以后的事实就证明了这点。当来因河以西的德军被消灭，他和我站在河堤上目送第九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渡河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感谢上帝，艾克，您坚持了您的计划。您是完全对的。很抱歉，由于我对分散兵力的忧虑增加了您的负担。德军现在已被打败。只剩下一个他们选择停战时间的问题了。感谢上帝，您坚持了自己的主张。”

我们战略计划的第一阶段的作战进度表——摧毁来因河以西敌人的力量——预定实施三个大突击。第一个突击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我们战线的北侧实施；第二个突击由布莱德雷在中央部分实施；第三个是向心突击，由布莱德雷和德弗斯实施，消灭萨尔盆地的敌人守军。

第一和第三两个集团军于1945年1月16日在乌法利兹刚一会师，蒙哥马利就马上回头来专门准备这三个突击中的第一个突击。齐格菲防线位于来因河西面，从来因河和马斯河的会合处往南一直延伸下去，包括了萨尔盆地的防御线。紧接萨尔的南面，少数德军分遣队留在阿尔萨斯平原，而再往南，科耳马尔据点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1月，随着德军从他们在阿登的灾难性的冒险中溃退回去，我把注意力又转向科耳马尔。在我们战线的敏感部分的这个德军阵地，它总是使我感到刺激，因此我决定毫不延迟地加以粉碎。法国

第一集团军于1月20日开始对这个阵地发动进攻,但由于恶劣天气的阻碍,进展很小。有两个法国军包围着这个据点。我决心一举彻底消灭这个麻烦,于是给德弗斯增加了兵力,这样他就能用包括四个师的一个完整美国军去支援法军。他指派弗兰克·米尔本少将指挥的第二十一军和另外的第三、第二十八和第七十五三个步兵师以及法国第五装甲师担任这个任务。后来,第十二装甲师和法国第二装甲师也被用于第二十一军的战区。两个法国军和几个美国军同时发动了进攻,而以美国军为先锋。德军的防御迅速瓦解。2月3日,科耳马尔投降,同月9日,这个地区的残余德军被赶过来因河。在这次作战中,敌人伤亡二万二千多人,并损失了大量装备。

在计划进攻面对我们部队的德国兵力的战役中,第一个攻击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加拿大集团军和暂归蒙哥马利的美国第九集团军实施。加拿大集团军渡过马斯河向南和东南方向进攻,而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则渡过罗尔河向东北进军。这就形成了对敌人防御兵力的向心突击,并迅速把他们赶回来因河。

在这个地区中,敌人遗留下了一些最好的战斗部队,他们是敌人的第一伞兵集团军,其中的士兵和部队都受过训练,有高度的技能和刚毅果敢的精神。辛普森战线的另外一个困难是,敌人继续占领着罗尔水坝,他们通过这个水坝,能阻止我们实施成功的渡河攻击。因此,布莱德雷命令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尽早占领水坝。对水坝的进攻由第五军于2月4日发动。经过激烈的战斗,第一集团军在六天内攻占了水坝。甚至到那时,水坝给我们造成的困难还没有解决,因为德军关住了溢洪道的闸门,这样从水库里溢出的水就能使这条河在一些日子里处于泛滥状态。

当蒙哥马利开始为他的进攻进行准备时,他当然希望把美国

第九集团军的兵力增加到最大限度。他建议命令布莱德雷停止第一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通过阿登地区的进攻，以便节约兵力，进一步向北方作更大规模的集结。我拒绝这样做。我肯定，在阿登地区的继续进攻，将有助于使敌人兵力达不到北部战区。比这更重要的是，我很想把美军战线推进到阿登地区，这样，当参加主要的毁灭性进攻的时刻来到时，部队就会处于开始行动的极好位置上。我确信，我们能够获得这条我所希望的战线，而无碍于及时对第九集团军的加强。

蒙哥马利和我对他发动进攻的适当时间取得了一致意见。原来我们希望由加拿大军和美军同时发动进攻，因为这两支部队到2月10日都能作好进攻准备。但蒙哥马利和我都认为，不宜等到罗尔河的洪水退去后才进攻。他建议，即使美国集团军在进攻发动后两个星期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才能参战，加拿大军的进攻也要尽快开始。我同意他的这个意见。

加拿大集团军于2月8日开始进攻，并获得令人满意的初步进展。但部队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洪水和泥泞的地带，并遇上了猛烈的抵抗。进展缓慢而且代价很大。当德军开始把他们的部队从罗尔河调到加拿大军的进攻路线上时，抵抗越来越顽强了。这次德军的转移并没有使蒙哥马利颇感不快，因为这一转移带来了这么一个希望：一旦美军开始进攻，将高速推进。

在这期间，我访问过辛普森将军的第九集团军，见到它紧张而妥善地为进攻作好了准备。要说辛普森作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官在什么时候犯过一个错误，我可从来没有发现过。战后，我听说他这些年来犯严重的胃病，但在战时我却从来没有觉察到这点。他机警、聪明，有专业才干，是值得美国士兵所敬仰的模范将领。从他显赫的业绩看，他显然应该获得四星上将的头衔，不幸的是战后不

久,他还没有提升就由于健康情况而被迫退休了。

辛普森的集团军包括三个军。由安德森少将指挥的第十六军在左面;右面是由雷蒙德·麦克莱恩少将指挥的第十九军。麦克莱恩原是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军官,他作为一个指挥第四十五师炮兵的准将参加战争。后来在7月末的突破之战后紧接着的激烈战斗中,他接手第九十师。他对那个师的领导非常出色,以致当指挥第十九军的科利特将军健康情况不好的时候,麦克莱恩被提升为这个军的司令官。辛普森集团军的中路是由阿尔文·小吉勒姆少将指挥的第十三军。

在加拿大部队于北面发动进攻以后的一些日子里,美军除了监视来因河和准备在洪水一退可以在河上架桥时立即发动进攻外,干不了什么事。在克里勒将军指挥的加拿大部队开始进攻以后两个星期,美军的进攻才成为可能。辛普森在23日晨开始进攻。

第九集团军以猛烈的炮击为先导,按计划出击,并胜利渡河。一开始,部队遇到很大的困难,这特别是由于敌人对浮桥的炮击,也由于我们的轰炸和炮击对于利赫城的毁坏。进攻部队必须穿过这个城市,为了使车辆能通过,首先必须调来推土机,从瓦砾堆上开出一条路来。查尔斯·格哈特少将的第二十九师,即前此6月份参加过诺曼底突击战的老兵,象第三十、第一〇二和第八十四师一样,在这次初步的突击中,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三个师的司令官分别为兰利·霍布斯少将、弗兰克·基廷少将和亚历山大·博林少将。辛普森的部队尽管有延误,但仍取得良好进展,这里有部分原因是在此之前,德军已从这个战线转移到加拿大部队的战场上去了。不到一星期,第九集团军攻占明亨-格拉特巴赫,这是在这次战争中迄今我们所攻占的一个最大的德国城市。

攻占后不久,我同辛普森进入这个城市,第一次见到喷气飞

机。这是一架飞得很高的德国战斗机。这个地区的每一门高射炮立即猛烈开火，一会儿，弹片就散落在我们周围。在这次战争中，我戴钢盔仅这一次。不然我们就得停住吉普车，躲在车底下。在非洲，我们的一个很优秀的军官曾经被弹片击中，以致受重伤，住了一年多医院。幸好敌机感到这个地区不舒服就迅速飞走了。

这个地区的德国部队现在已经感到了强大的向心突击的威力，开始向来因河撤退。到3月3日，辛普森的左翼即第十六军向前迂回，与加拿大集团军会合后，向来因河推进。这整个地区的敌人被迅速肃清。在这次战斗中，由于德国守军处于来因河桥梁附近，所以在俘获方面，收获没有象我们在后来的攻击中那样多。

随着来因河西岸北面战区的敌人被肃清，蒙哥马利就担负起了及早发动突击，强渡来因河的准备工作的任务。对于这次渡河作战来说，他需要比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更大的兵力。所以我命令第九集团军留下来归他指挥。当这些部队忙于渡河准备时，南面的战斗显然取得了很顺利的进展。

辛普森于2月23日开始进攻，这对处在我们漫长战线中央部分的布莱德雷来说，是开始发动一系列猛烈进攻的信号。这些进攻处理得当，指挥及时。他当时指挥着两个集团军：左面是第一集团军，右面是第三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在1月末和2月初的战斗中，取得了可以实施一次大突击的好位置。布莱德雷的第一个行动是由霍奇斯实施的，他在辛普森发动进攻的同时，把第一集团军左面的第七军投向前方。第七军的第一个使命是，在第九集团军发动进攻时支援辛普森的右翼。这个行动如果成功，将有助于使敌军右翼的南侧一面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第七军就可迅速转向它的右面，从侧面攻击德军。霍奇斯集团军的其余部队那时将向东发动突击。再往南，巴顿那时将开始进攻，以便分割和包围德军，并就地

加以俘获或消灭。

一切都进行得象时钟似的准确。辛普森右面的第七军很快就能向南进攻，从此以后，我们在前线各地就会不断取得胜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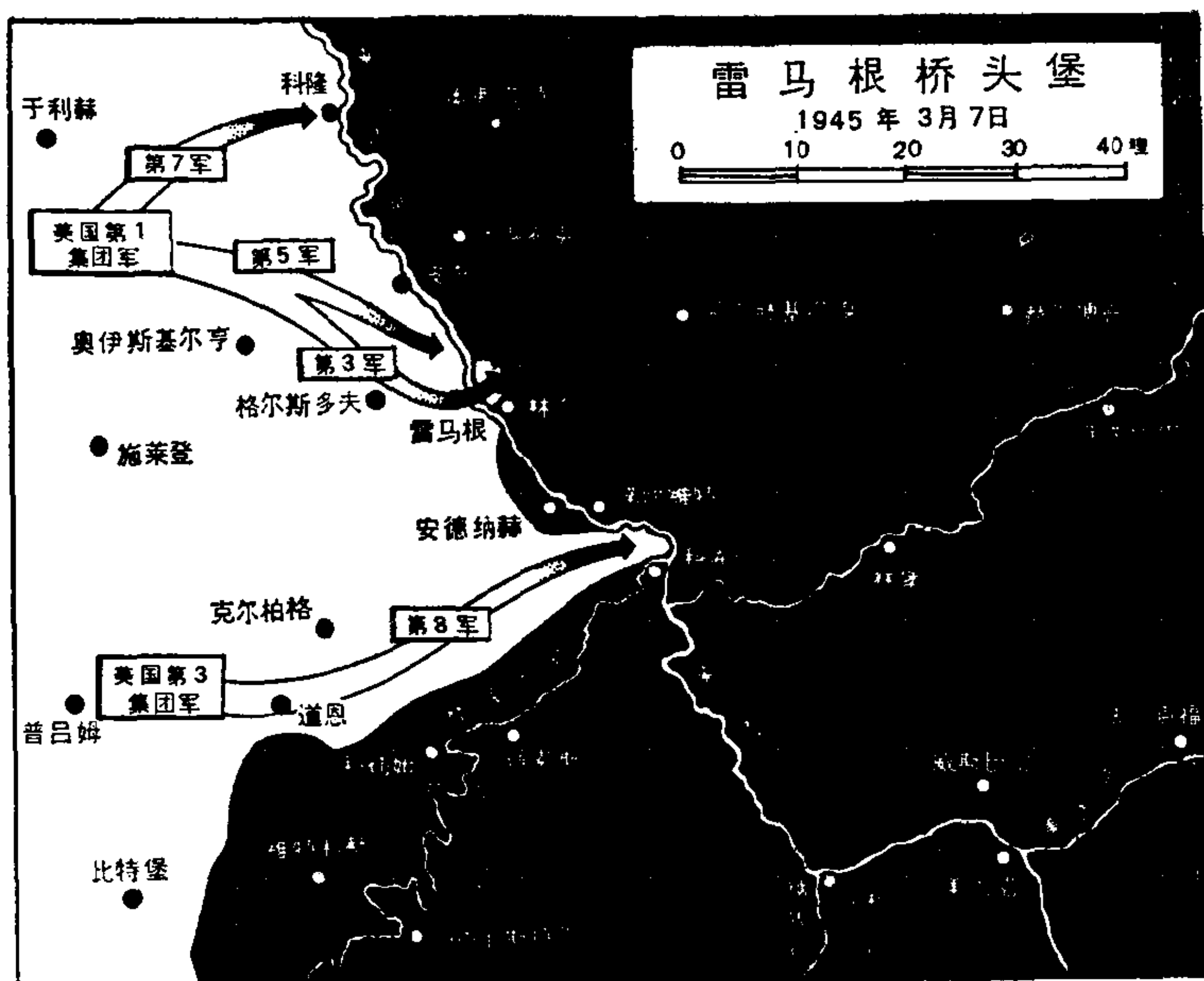
第七军首先粉碎了埃尔夫特运河附近的猛烈抵抗，继而取得惊人的进展，3月5日抵达科隆市郊。我们预计这个城市会象亚琛一样进行坚守。然而，这里的敌人守军与我们在这个战役中较早期所遇到的截然不同，他们只是匆匆忙忙地受了点训练，并已惊慌失措。3月7日下午，柯林斯拿下了整个城市。因为我们曾估计，他的这个军一段时间内将在科隆进行猛烈围攻，结果科隆被迅速攻占，这使我们有可能利用一些额外的师往南去争取其他地方的胜利。

当柯林斯的第七军取得这些巨大进展的时候，霍奇斯使第三军和第五军往东南向来因河展开进攻。第三军于3月7日在雷马根抵达来因河。它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极好的战机。只要迅速而坚定地抓住这个战机，将对今后的作战产生无法估计的效果。进攻的美军发现，横跨来因河的鲁登道夫桥依然屹立在雷马根。

当然，德军为摧毁来因河桥梁预先作了精心的准备。鲁登道夫桥并不例外。但是由于美军的神速进展和守军的极端混乱，以致使负责爆破桥下炸药装置的分遣队犹豫不决。显然，守军不能相信美军已经大批到达，而且可能认为，推迟摧毁桥梁，可以使河西人数众多的德军撤退。

伦纳德将军指挥的第九装甲师，率先向桥挺进。威廉·霍格准将的B战斗群的一个勇敢的分遣队毫不犹豫地冲到桥上，保护桥梁以免完全破坏，虽然这时桥下的一个小炸药包已经爆炸。

这个消息报告给了布莱德雷。当这个消息传来时，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位参谋军官恰巧在布莱德雷的司令部，于是立即讨论了



(按原图译制)

强渡这座桥的部队的数量。如果桥头堡的兵力太少，德军会在河东迅速集结兵力予以消灭。另一方面，布莱德雷认识到如果他使大量兵力越过来因河可能会干扰我的基本计划的进一步发展。布莱德雷马上打电话给我。

布莱德雷的电话接通时，我正在兰斯统帅部同美国空降部队的几个军长和师长进晚餐。当他报告说我们已有一座横跨来因河的永久性桥梁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和我屡次讨论过这件事，我们认为可能性极小，而从来没有当作一个有根据的希望。

我简直对着电话喊叫起来：“你在那附近有多少部队能够渡过去？”

他说：“我有四个师以上的部队，但我打电话给你是要弄清楚使这些部队渡过河去会不会干扰你的计划。”

我回答说：“好，布莱德雷，我原想会有很多师牵制在科隆周围，但现在他们自由了。前进吧，至少立刻投过五个师去，并且必须稳住我们的立足点。”

他从电话里用清晰而愉快的声调回答说：“我正想这样做，但这里有人提出，怕同你的计划相冲突，所以我想和你对对口径。”

这是我在这次战争中的一个愉快的时刻。因为战争中的大的胜利，往往在几天或几个星期以前就已经预见到，因而当胜利确实来到时，高级司令官和参谋人员已经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而又热衷于今后的计划了。这一次完全没有预见。我们已在一座永久性的桥上越过了来因河，保护德国心脏的这个传统的防御壁障已被突破了。长期以来我估计，彻底打败敌人的伟业将在1945年春、夏战役中完成，但现在看来，已经突然来到眼前了。

和我一起进餐的客人们，为我的喜悦所感染。他们都是些成功地空袭过敌人和在各种情况下能艰苦战斗的沙场老将。他们兴致勃勃地一致预言，战争可以提前结束。我确信从此以后，他们每个人将在战争必然获得胜利的愉快信念激励下，意气风发地投入战斗。

3月9日，第一集团军把雷马根的桥头堡扩大到纵深三哩以上。敌人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从最初的惊慌和混乱中恢复过来，而到敌人能够调集援军攻击我们的桥头堡部队时，我们已经强大得不再害怕被打败了。敌人一如既往，用能迅速到达这个地区的每一支部队实施逐次突击，但这种软弱的战术已不能抗击我们在敌人要害地方稳步扩大的立足点了。

从我们渡河这天起，敌人开始不顾一切地想摧毁鲁登道夫桥。敌人用远程炮轰击这座桥梁，德国空军集中了每一架可调用的飞机轰炸这个建筑物。敌人的这些行动没有一次是立即奏效的，我们



源源不断地把部队开过桥去，与此同时我们还建立了一座浮动车辙道桥。

这座浮动车辙道桥是我们的一个良好装备，能承受沉重的军用装载，它比较起来便于运输并能迅速安装。柯林斯将军和他的第七军渡过来因河以后，他当然关心能尽快建立他的浮桥。他请来了军里的工程师梅森·杨，对他说：“杨，我相信你在十二小时内能架起一座渡河桥来。如果不到十二小时你就完成这个任务，你要我给你什么奖励？”杨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倒不想要什么，只要您答应给我手下的人两箱香槟，我们一定想法提前完成这个任务。”“行，”柯林斯说，“如果不到十二小时给我一座桥，我就一定给你们香槟。”

十小时又十一分钟后，这座三百三十码的浮桥竣工，并且第一批装载过了河。柯林斯愉快地拿出了香槟。我听说，甚至这个光荣记录后来也被打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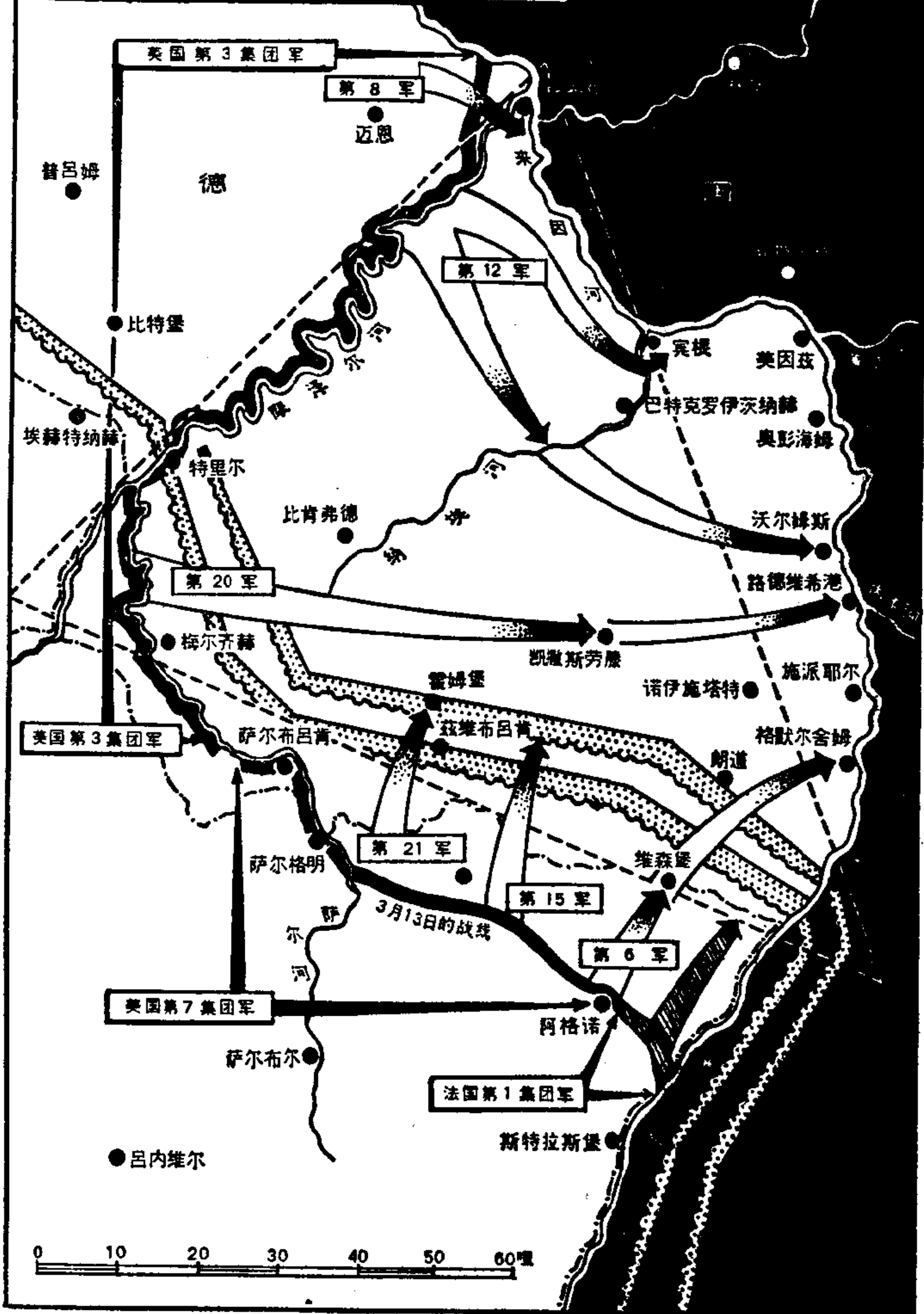
德国人对鲁登道夫桥的多次轰炸，终于使这座桥受到了严重破坏。五天以后，即到我们的便桥已能充分支持对岸部队时，我们停止使用鲁登道夫桥。然而，美国工程兵仍然顽强而坚持地继续加固这座桥的被破坏部分，以便将来使用。他们的这个努力失败了。3月17日，中央桥跨——德军在3月7日企图摧毁这座桥的尝试虽未成功，但是这段桥跨已被损坏——坠入河中。我们许多优秀的工程兵也随之落入河中，有些未能从冰水中拯救出来。

3月初，我们调动五个师去夺占雷马根桥头堡，这一行动并没有改变或妨碍消灭摩泽尔河以北德军的计划的发展。整个2月份，第三集团军忙于为向来因河发动攻击作必要的准备。米德尔顿的第八军越过普吕姆河往东挺进，曼顿·埃迪少将的第七军攻占比特堡。沃克尔将军指挥的第二十军于2月23日击溃了萨尔河和摩泽

# 萨尔河—来因河三角地带

1945年3月13—25日

齐格菲防线



(按原图译制)

尔河三角地带敌人的抵抗，越过萨尔河建立了桥头堡。齐格菲防线已被突入，3月2日攻占特里尔。两天以后，第十二军夺占了基耳河对岸的一些桥头堡。

这是第三集团军发动主攻的信号。第八军向东北进攻，突破所有德军的抵抗，于3月9日到达来因河边的安德纳赫，在那里立即与第一集团军连结起来。与此同时，第十二军沿摩泽尔河北岸向东北发动进攻，于3月10日抵达来因河。这两个军卤获敌人大批给养和装备。当他们的先锋部队沿来因河连结起来时，他们包围了敌人的全部作战部队。

第一和第三两个集团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完成了计划摧毁来因河以西德军的第二步。现在只是在萨尔盆地还留有大量敌人守军。这些守军被部署在一个以来因河沿岸为底边的大三角之内，两边在往西七十五哩处一点相接。这个三角地带的北面一边以摩泽尔河为屏障，南面一边以齐格菲防线一些最坚固的地段作掩护。回顾起来，很难理解，为什么德国人在看到自己的军队在摩泽尔河以北遭到全面崩溃和消灭时，不迅速撤出他们在萨尔盆地的部队，以便把他们从无掩护的阵地转移出来，使他们保卫来因河。

在先前的战役中，我们不止一次看见过这种在我们看来是战术上绝对愚蠢的类似例子。我个人认为，原因要从征服者的变态心理中去寻找：他们担心放弃一呎掠夺来的土地，会暴露出不可战胜的神话的脆弱基础。我的一些参谋人员认为：萨尔德军所以据地坚守，是因为他们确信摩泽尔河和齐格菲防线的防御力量。此外，敌人可能对于萨尔凸出部以南我第七集团军的力量一无所知。

如果理由确实是这样，那么这将意味着德国的司令官和参谋人员是极端愚蠢的。但当他们自由行动时，他们常常证明自己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不认为，这次未能撤回他们在无掩护阵地上的部队

是一个军事决定,而认为这多半是希特勒的直接行动!

在来因河西演出的长达一个月的这出戏剧的头两幕中,我要求德弗斯的集团军群,除了拔掉科耳马尔据点以外,主要采取守势。同时,我们把他的帕奇将军指挥的美国第七集团军加强到具有十四个师的不平常的兵力,还不包括一个法国师,即第三阿尔及利亚师。现在舞台已为第三幕准备就绪。

布莱德雷已摆好架势,准备攻打这个三角形凸出部的顶角和北面的底边。德弗斯准备向它的南边推进。

这项计划要求美国第七集团军向沃尔姆斯方向发动一个强大突击。这一突击要突入齐格菲防线,越过来因河夺取桥头堡。布莱德雷要发动一个进攻,越过摩泽尔河下游,以便深深插入第七集团军对面的敌军后方。这样我们希望能通过向心突击,截断德军部队,阻止他们撤过来因河。在向这个凸出部的底边发动这两个突击的同时,第三集团军的右翼打击其顶角。

这次进攻于3月15日发动。南面和西面的进攻虽然遇到了敌人强大防御力量的顽固抵抗,但仍取得了很大进展,致使德军把全部注意力似乎都集中在这两方面的大进攻上。这就使第十二军抢渡摩泽尔河下游的进攻获得很大效果。第十二军于3月14日渡过摩泽尔河,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从来没有遇到猛烈的和有组织的抵抗。这可能是由于德军预计这个军会顺着来因河北上,去和雷马根地区的河东桥头堡的部队会合。不管是否如此,当第十二军在这次战争中最富有戏剧性的这个进攻中径直往南跃进而深深插入萨尔防线的心脏时,德军便全然惊慌失措了。

敌人的阵地迅速变得毫无希望。在凸出部的整个半圆弧上,当美军拚命向前进攻时,埃迪的第十二军有效地堵截了几乎每一条可能的逃跑之路。巴顿在他的部队抵达来因河时,甚至没有稍停一

下,就把斯塔福德·欧文少将的第五师在未作任何正式准备的情况下推过了来因河。欧文的损失很小,3月23日,他的师在盟军第二个桥头堡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对萨尔敌人的肃清迅速完成。到3月25日,来因河以西所有有组织的抵抗全部结束。

所有这些作战行动,都是通过现在大家所熟悉的地空协作完成的。我们强大的空军四出搜寻,攻击许多重要目标,几乎使德军丧失机动能力,并摧毁了敌人大量的重要给养和装备。虽然天气对空战来说是不理想的,但从来没有坏到完全不能起飞的程度。

在华盛顿生日那天,盟国空军发动了一次军事行动,其规模之大是无与伦比的,甚至对一个战线的出击有时一天高达一万架次以上。这次行动称为“竖笛”,目的是猛烈袭击在德国运输系统中专门选定的特殊目标,以造成尽可能大的破坏,最大限度地延缓德军兵力的恢复。从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基地来的九千架飞机参加了这次袭击,确定的目标几乎是德国的整个关键地区。敌方反应很弱。这次袭击面很广,因此,德国空军显然无力提供有效的防卫。这是一次最理想和最成功的军事行动,是摧毁德国战争力量的长期空战中的一个光辉范例。

这个冬末战役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军事行动的发展与计划非常一致。在一个牵连这么多部队和这么广阔的战线的大规模战斗中,由于敌人的反应和未预料到的战况的发展,被迫对计划不断进行调整,乃是合乎常规的。但这次则例外。所以产生这种准确性,首先是由于盟军强大的地空力量;其次是由于部队的战斗质量以及排、营和师各级领导的才能;第三是由于敌人守军中所滋长的沮丧、慌张和混乱。希特勒在1945年2、3月间所遭到的惨败,抵偿了我们在“凸出部之战”中的部分代价。

我们命令无论何时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越过来因河夺取桥头堡，所有部队都带着这个命令进入战斗，因此它们时刻留意着夺占永久桥梁的微小机会。我们在雷马根的好运，加速了德国的灭亡，但这对于当时河西的战斗并无实际影响。

在萨尔战斗中，我们对作战计划有过一些微小的改变。布莱德雷集团军群和德弗斯集团军群的战区分界线直接穿过战场。把阵势有意地作如此安排，为的是使第七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能竭尽全力对敌方这个据点实施向心突击。随着战斗的发展，在帕奇第七集团军作战地带，德弗斯认为无法夺取的一些目标，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去进攻却成为可能的事了。我当时恰巧在那里，就授权对战区分界线作适当调整，并且特别详细地交代各部队之间要进行密切联络。这也包括从第七集团军拨给第三集团军一个装甲师。这个微小的改变虽不重要，但却说明了参谋人员对形势所作估计之准确。

在这次长达一个月的战役中，我们平均每天俘获德国战俘一万人。这意味着等于德军损失二十个完整的师。这个数字完全不包括正常的伤亡人数。敌人的装备和给养、重要工业区和原料来源地遭到了重大损失。

到这时，我们已经有了能够处理这么多数量的战俘的后勤管理机构。这些俘获只是暂时地妨碍部队的机动和进攻。我们从突尼斯战斗以来，虽然有了不少经验，但当时突然俘虏了二十七万五千个轴心国战俘，这使我有苦衷。我对作战军官鲁克斯和内文斯说：“为什么从来没有哪个陆军大学告诉我们，当在一条很糟糕的铁路的尽头有二十五万多战俘，既无法运走，又难以看守和供应时，该作如何处理。”

到3月24日，在雷马根桥头堡有一支包括三个足额军的美国集团军，作好了攻打任何一个方向的准备。再往南，第三集团军已

渡过来因河，在那个地区，现在敌人已经没有力量来阻止我们几乎是随意地进一步建立桥头堡了。

紧接雷马根桥头堡的北面，是济克河。它在鲁尔地区的南侧。鲁尔的安全，对德国的战争能力是如此重要，以致使敌人匆忙沿济克河集结了从西面其他危急地区所能匀出来的全部剩余兵力。因为德国人估计，我们会从雷马根直接攻打鲁尔。

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又犯了更换高级司令官的老毛病：冯·龙德施泰特被撤销指挥，从此就再也没有参加过战争。我们始终认为，冯·龙德施泰特是德国将领中最有才干的。当我们6月6日登陆时，他在西部担任指挥。由于未能按希特勒的命令把盟军赶下大西洋，于是在登陆后三个星期内，他被解职，而由冯·克卢格接替。当后者并不比他的前任打得更好时，希特勒又决定将他撤换，召回冯·龙德施泰特担任指挥。我们这时已经了解，第二次撤换的直接原因是认为冯·克卢格参与了7月20日谋杀希特勒的阴谋。

现在，希特勒决定从意大利调回冯·凯塞林陆军元帅。

## 第二十章

### 突击和包围

在北面，当蒙哥马利2、3月份消灭来因河前德军的一系列战斗刚打响时，给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增派的加拿大部队和英国部队已从地中海区开始转移。这次调动称为“金片”行动，包括从意大利调来一个加拿大军和从中东调来一个英国师。这些部队的大部分在马赛登陆，穿过整个盟军交通网，抵达他们在北侧的阵地。参谋人员对这次困难的调动处理得既顺利又得法，没有干扰前线的供应和保养。所以当布莱德雷和位于更南面的德弗斯发动解放来因河西岸的攻击时，北面的蒙哥马利在他完成了强渡来因河的准备后，就能指望及早得到增援。

蒙哥马利在为正正规规的进攻有条不紊地准备兵力方面，历来是一个能手。这次他作了最细致的准备，因为我们知道沿着鲁尔正北的前线，敌人有最好的部队，其中包括第一伞兵集团军的几个部分。

我们计划蒙哥马利在一条由四个师组成的战线上实施突击。在这四个师中，两个属于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两个附属于第九集团军。美国第十七空降师和英国第六空降师用空降攻击的方式支援这些师。空降部队的正常使用方法，是在地面攻击开始以前把它们投入战斗，以便在地面攻击开始前在敌人守军中造成最大的恐慌和混乱。但在这次战斗中，蒙哥马利计划把这个常规颠倒过来。



他决定借夜色的掩护渡河，第二天早晨紧接着实施空降攻击。还有一种正规做法是，在敌人战线后方相当远的地方投下空降部队，估计在这种地方着陆时只会遇到很微弱的直接抵抗，这样他们就有时间组织队伍，从而袭击司令部、堵截后备队的调动和造成全面破坏。但在这次作战中，这两个师却要靠近前线降落，只以不落在我们自己炮火范围内为限。他们要从那些位置出发去破坏敌人的炮兵部队，并直接参加战术战斗。周详地安排了烟幕的使用，以便为渡河提供人为的掩护，并且还调集了一大排大炮进行支援。

来因河是一个可怕的军事障碍，其北端尤其如此。这条河不仅河身很宽，而且水势难测，甚至水位和流速也变化无常，因为敌人能打开沿这条大河东面的那些支流的闸门。我们组织起专门的侦察队和警戒队，监视这种威胁。由于来因河这个障碍的性质，这次渡河，除了部队不是从船上向岸上攻击，而是从岸上向岸上攻击外，很象一次对滩头的突击。

对各种情况的研究表明，海军参加这次进攻大有好处。我们需要足够数量的船只随同登陆突击波运输坦克。所以海军开始把称作LCM的登陆艇和LCV(P)的登陆艇运往前线。这些船一部分由水路运来，但大多数必须从北欧的公路上拖运。为此目的还建造了特殊的拖车。这些小船（有的长四十五呎，宽十四呎）成功地由陆路运来参加这次进攻。

当这次突击开始时，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原有兵力是十五个师。加上两个空降师和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当时在蒙哥马利作战指挥下有二十九个师和七个独立旅。但是，不是所有这些部队都能立刻用来向东冲击的，因为蒙哥马利必须防卫他沿来因河向西伸展到北海的这一漫长的左翼。从地中海区来增援的皇家部队正行进在向他靠拢的途中。

3月23日晚至24日的突击,一开始先是一场猛烈的炮击。在两个美国师的战线上,有两千门各种类型的大炮参加作战。辛普森将军和我在一座古老教堂的塔楼上找到一个有利地点,从那里可以看到炮火。炮台分布在来因河西岸的平原上,所以每一枚炮弹的闪光都能看见。隆隆的炮声不断轰响。同时,步兵的突击部队推进到河边正在登船。我们来到他们一些人中间,发现部队迫切希望完成任务。在激发部队士气方面,什么也代替不了连续不断的巨大胜利。尽管如此,当我们向前走去的时候,我仍遇到一个青年士兵,他表情沉默而且沮丧。

“孩子,你有什么不舒服么?”我问。

“将军,”他说,“我很紧张。我两个月以前受了伤,昨天刚从医院回来。我感到不太好。”

“好,”我对他说,“那你和我是很好的一对了,因为我也紧张。但我们计划这次进攻已经很长时间,并且我们已经有了能够用来击溃德军的一切飞机、大炮和空降部队。也许我们俩一起走到河边去,会感到好一些!”

“哦,”他说,“我只是说原来有点紧张,现在不再紧张了,我猜这里的情况还不太坏。”我理解了他的意思。

我们对穿过鲁尔区北部作了如此仔细的和全面的准备,以致敌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预计会有强烈的抵抗,因此我们只有依靠突击的时间和兵力去达到出奇制胜,特别是我们考虑到敌人会有大量的大炮瞄准河中和东岸,试图以炮火把我们的部队阻挡在河边。

但是,并没有遇到这样的抵抗。在第九集团军战线上实施突击的两个美国师,即第三十和第七十九师,在实际渡河时总共有三十一人伤亡。这些师由第十六军的安德森将军指挥。

在当晚剩下的时间内，我们接到一系列鼓舞人心的报告。每一处的登陆看来都完全成功。在这种鼓舞下，我们认为能够很快实现东进，从而切断通往鲁尔的交通线。

清晨时分，我来到一座合适的小山上，观看空降部队的到达。这些部队按规定时间，在10时正开始降落。运送参加这次突击的空降部队的飞机总计一千五百七十二架，滑翔机一千三百二十六架；在这次空运过程中，有八百八十九架战斗机保卫它们，有二千一百五十三架其他的战斗机在目标地区上空提供掩护，并向东建立一道防御屏障。

战场上的雾和烟虽然妨碍了清楚地观察空降行动，但我还是看到一些。我们有些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但一般只是在它们投下伞兵以后。当他们飞离战斗地区时，看来要飞越防空火力特别准确的一个地点。那些被击中的飞机就落在我们自己的战线内，几乎所有的这些机上人员能成功地用降落伞自救。即使如此，我们飞机的损失也比预计的小得多。我们给这次进攻的这个空降阶段定了一个代号，称为“大学”行动，这是我在这次战争中实现的最成功的空降行动。

早晨，我和布鲁克陆军元帅会见了首相。看来，丘吉尔先生总是这样：只要是展开一个特别重要的军事行动，他就会出现在尽可能接近战斗现场的地点。那天早晨，他确实象我们大家一样高兴。他一遍又一遍地欢呼：“我亲爱的将军，德国人是打败了，我们打赢了，他们彻底完蛋了！”首相完全说出了我们大家所感到的和彼此正在谈论的东西。也就是那天早晨，布鲁克陆军元帅非常愉快地说，2月和3月的军事行动已经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彻底完成了。

3月24日中午左右，我必须赶到布莱德雷的司令部去，就他自

己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阶段的有关事宜进行磋商。我离开以后，首相说服了当地的司令官，让他乘一艘 LCM 型登陆艇渡过来因河。毫无疑问，他因亲自踏上德国的这个传统防御壁障的东岸而感到非常满意。也许他认为，这个行动是最后打败五年前把英国逼到绝境的敌人的象征。然而，要是我在场，那天他根本不可能被允许渡过来因河。

按照我们正规的做法，空军紧张地参加了这次攻击。3月23日以前的一些日子里，我们对这个地区各式各样的目标进行了持续的轰炸。其中主要目标是敌人的飞机场，而且特别注意我们认为德国人能出动喷气飞机的每一个机场。3月21日开始，我们经常向所有这些机场倾注炸弹。跑道完全给炸成了坑，飞机被摧毁在地面上。这些措施是决定性的：发动攻击的这天，盟国空军出击大约八千架次，而空中的敌机不到一百架。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们受惠于良好的天气，能见度特好。

3月24日，我们为了阻止敌人的战斗机向攻击点上集中，也进行了一些牵制性的空中行动。驻意大利的第十五航空队的一百五十架轰炸机，飞行了一千五百哩去进攻柏林。其他的空军部队从意大利起飞袭击南面的敌人飞机场。在此以前很久，只规定进行夜间轰炸的皇家空军轰炸机总队，现在也开始经常参加白天攻击。由于有我们的大群战斗机的保护，所以这个轰炸机总队能在白天的整个时间内安全出击，而且准确性也大大增加。24日，这个总队飞来攻击了鲁尔地区及其附近的铁路中心和提炼、贮存燃料油的目标。

3月24日的战斗决定了德国的命运。当然，我们那时已经拿下了两个更南面的桥头堡。但在每一种情况下，惊人的好运气照顾了我们。北面的战斗是迎着敌人沿这条长河各处所能作出的最强大的抵抗进行的。此外，战斗是直接鲁尔的边上发动的，并且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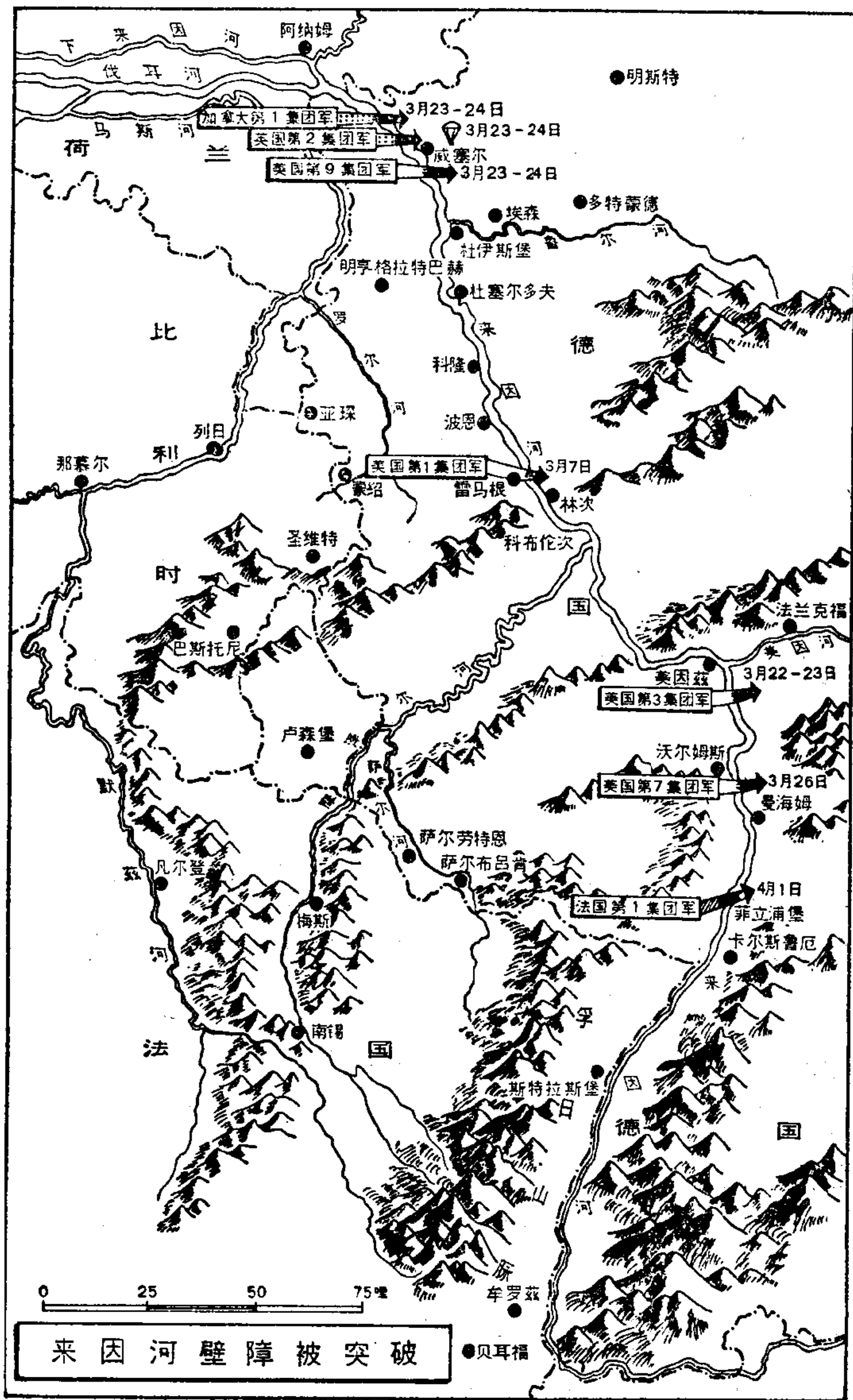
在东岸空降着陆成功,使我们能部署强大的兵力而不让敌人使用那个大工业区的重要部分。

同时,更南面的作战正在迅速进展。布莱德雷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法兰克福地区占据一个巩固的据点,从那里向卡塞尔发动一次强大的进攻。我们预计,布莱德雷在卡塞尔与蒙哥马利在鲁尔以北的攻击连接起来,就可完成对那个地区的包围。

从巴顿将军在3月23日晚把美国第五师推过来因河的那时开始,他继续不断地稳步扩大他的桥头堡。到3月24日傍晚,这个桥头堡已有九哩长,六哩深,并且进攻部队俘获了一万九千名战俘。整个第十二军现在已经过河,它的第四装甲师向前推进得如此迅速,以致在3月25日夺取了阿沙芬堡的美因河桥梁时,桥还完整无损。

雷马根桥头堡,自从建立以来,不顾德军反复的逐次突击而不断扩大。霍奇斯将军把第三、第五和第七这三个军投入了那个地区。到26日,这个桥头堡北侧的德军分遣队被赶过了济克河,他们在那里肯定等待着接受一次大突击。不管怎么样,德军在雷马根地区还得遭受另一次大袭击。美国部队开始在雷马根桥头堡巩固地站稳以后,布莱德雷和我立即发展我们的计划,争取从战局的这一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在布莱德雷的战线上,我们始终计划在巴顿攻占了桥头堡的那个地区,进行几次大规模的渡河,因为我们预计在包围鲁尔的巨大两翼进攻中,那里是南路发动攻势的最合适地点。我们当然可以从雷马根把第一集团军调往北面和东北面直接进攻鲁尔。但是,这将卷入强渡济克河的正面突击,而不能完成对那整个地区的大包围,而这一包围正是我们基本计划的主要特点。所以,布莱德雷和我早就决定把部队从雷马根桥头堡调往东南面,在吉森附近与



来因河壁障被突破

(按原图译制)

巴顿连接起来。那时布莱德雷就能集中他的兵力。我们确信，他进一步的胜利是迅速而有把握的。

3月26日，从雷马根桥头堡开始发动进攻。现在由克拉伦斯·许布纳少将指挥的第五军迅速向东南突击，攻占林堡。霍奇斯和巴顿发动的这些大规模的向心突击，使这个地区的敌人完全丧失了斗志。

第三集团军的米德尔顿的第八军仍在来因河西面，部署于布劳巴赫以北地带。由于崎岖的河岸，在这里架桥进攻敌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第八军不顾开始就相当猛烈的抵抗，进行了尝试，并获得了成功。这样就可能直接向前推进，去参加强大的进攻。3月29日，法兰克福的敌人被肃清，装甲先锋部队向卡塞尔方向突进。

再往南，第六集团军群的帕奇的第七集团军参加了这次攻击。当这个集团军被投入萨尔战斗时，在该集团军战区内的来因河防御被认为是非常坚固的，要保证胜利渡河，就需要使用空降部队。为此目的，美国第十三空降师奉命计划一次攻击。但是敌人在萨尔崩溃以后，阵脚大乱，以致我们感到空降攻击已没有必要。第七集团军的海斯利普将军的第十五军于3月26日强渡靠近沃尔姆斯的来因河。敌人的分遣队在河边进行顽强抵抗，但被迅速击败。第十五军于27日完成渡河。第七集团军立即开始进攻，与第三集团军连接起来后迅速推进，攻克曼海姆。法国集团军于4月1日在菲立浦堡迎着敌军的抵抗，最后渡过了河。法军接着从那里向东南方向的斯图加特突击，并肃清了从来因河东岸一直到瑞士边境的敌人。

现在，我们在为进攻而选定的各条主要路线上都已渡过了来因河。我们顺利地渡过了来因河，遭受了难免的轻微伤亡；但是，如

果德军在冬季已经从西岸撤回来，并在沿河坚守，那么情况将会大大不同。来因河是一个可怕的障碍，东岸沿线的地形又提供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正面突击德军，即便在1945年初它的实际兵力和战斗力大为削弱的情况下，也将是一件要付出很高代价的事情。

我们得大大感谢希特勒。毫无疑问，他的参谋总部如果在军事行动领域内有自由，就会预见在西岸必遭灾难，从而可能不迟于1月初就撤回它的防御部队。这时，德军对阿登的流产的突击证明已经失败，参战的德国部队在败北中被赶回。加之，1月12日，俄国人开始了强大的进攻，他们从维斯杜拉河一直攻到距柏林不到三十哩的奥得河。

那时候，从军事上说，德国人的最聪明的做法是投降。他们的局势已毫无希望了。但是，他们即使在政治上已挽救不了什么，而在战场上却还能防止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损失，并使它的城市和工厂免遭进一步的破坏。

敌人也许抱有这个最后希望，认为盟国内部会发生纠纷，不能完全取胜，因而选择继续作战的道路。只要他们作此设想，就应当立即在西面组织起那条最强固的来因河防线，并集结他们一切可以调用的物资，作为中央储备。但是，只要我们强大的空军现在每天以敌人几乎无法忍受的规模摧毁其日益缩小的领土上的资源，即使事态象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最后的胜利。但是这是他们延长战争的唯一希望，而现在越来越清楚，他们不可能还有其他继续进行战争的理由了。甚至希特勒那样的狂人，也必然会有清醒的时候，那时他不可能不会看到结局已在眼前。他正在写一出戏的结尾，而这出戏的悲剧性高潮，将远远超过他所喜爱的瓦格纳<sup>①</sup>的想象。

就盟军的形势而言，有点象八个月以前诺曼底突破以后的情



况。但有很重要的不同之点。我们现在已有一支把我们会遇到的任何抵抗全然不放在眼里的地、空兵力,并且在远处也没有可供敌人部署兵力的齐格菲防线。更重要得多的是我们后勤部队的健全和强大。紧挨来因河的后面,储存着大量的装备和给养,靠近来因河边的,就是为部队的迅速进攻及其经常给养所必需的各种后勤机构。我们一渡过来因河就尽快设置了浮桥,不久又补充了固定形式的桥梁。第一座半固定铁路桥建立在北部战区的威塞尔。那里是来因河最开阔的地方,在攻克后不到十一天,美国工程兵就架起一座桥梁,而且从这座桥上驰过了我们的第一列火车。

随着我们的部队在各地渡过来因河,以及德军因齐格菲防线的被摧毁而遭到重大损失,我们春季战役的第二个大阶段遂告完成。这时,必须考察一下形势,规定完成第三阶段——最后摧毁德国军事力量和占领德国领土——的部队的行动。

部队行动的第一步仍然是包围鲁尔。这始终是我们计划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当前形势下,没有什么情况表明放弃这个目的会有某种好处。相反,现在已很明显,包围鲁尔的两翼,不仅将最后地和全面地切断这个工业区和德国其余部分的联系,而且其结果将消灭敌人在那里残留的一支主力部队。

当敌人在3月初未能消灭雷马根桥头堡时,他们便开始沿济克河拚命加强鲁尔南面的防御工事。同样,当蒙哥马利3月24日在北部战区跃过来因河时,德军又匆忙地开始建立一条沿鲁尔地区北侧的防线。所以,这次两翼包围将围住这些防御部队,从中央突破一个宽阔的缺口,从而穿过这个地方开辟一条往东的通道。

我早已知道盟国有关划分战后对德占领区的政治协议。协议

---

① 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德国著名作曲家。——译者注

给英、美两国规定的南北线，是从丹麦半岛东面底部的卢卑克附近开始，大致往南到埃森纳赫，再往南直到奥地利边境。

将来对德国的划分并不影响我们最后战胜这个国家的军事计划。我认为，军事计划只能根据迅速取胜这个唯一目的来制订；以后经过调整，各个国家的部队可以集中在他们本国的占领区内。

鲁尔之后的目标当然是柏林。柏林作为德国残余力量的象征，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是很重要的。然而，我认为，柏林不是西方盟军部队的合乎逻辑的或最合适的目标。

当3月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占据了来因河时，我们距离柏林三百哩，在这个距离之间还有离我们战线二百哩的易北河障碍。

俄军在离柏林只有三十哩的奥得河西岸牢固地建立了一个桥头堡。我们的后勤力量每天能把大约二千吨供应物资空运到前线，因此能支持我们的先锋部队横冲过德国。但是如果仅仅为了试图包围柏林这一目的来计划一次强渡易北河，那么就会发生下面两种情况：首先，俄军完全可能在我们抵达柏林之前很久就包围了这个城市；其次，在离来因河我们主要基地这样遥远的距离内维持一支强大的队伍，这将意味着我方前线其他部分的部队实际上失去机动。我认为这远非不明智，而简直是愚蠢。除了包围鲁尔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主要目的需要迅速完成。

我们希望使先锋部队迅速横冲过德国与红军会合，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国家分割开来，从而使德国实际上失去作为一个整体来活动的任何可能性。同样重要的是尽快攻克远在北面的卢卑克。这样一来，我们会切断仍留在丹麦半岛和挪威的德军。这样一次冲击，通过占领不来梅或者汉堡（或者把这两个地方都占领），也将使我们得到德国北部的港口。这就会再一次缩短我们的交通线。

同样重要的是希望突入和摧毁所谓的“民族堡垒”。很多星期

以来,我们已得到报告说,纳粹在走投无路时打算把党卫军、盖世太保和另外一些狂热地忠于希特勒的组织撤至巴伐利亚南部、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山区。他们指望在那里堵塞崎岖的山道,无限期地进行坚守,与盟军顽抗到底。这样的据点,即使不用其他办法,一旦发生饥饿总是可以攻克的。但是如果让德国建立了“民族堡垒”,它就可能迫使我们陷入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或者是陷入代价很大的围攻战。这样它就可以保存它的最后希望,即由于盟军之间的不和,它还可以获得比无条件投降更为有利的条件。十分清楚,纳粹打算作这种尝试,而我决定不给他们实现这种尝试的机会。

象建立一种山区堡垒那样,纳粹的另一个目的是组织一支地下军,并给它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称为“狼人”。这个“狼人”组织,只包括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其宗旨是实行暗杀和恐怖。被吸收加入这个秘密组织的有男孩和女孩,也有成年人,他们希望在农村制造恐怖,并给占领造成困难,认为这样占领军就会乐于离开。

制止这个阴谋——实现这个阴谋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因为有那么多的德国青年狂热地崇拜希特勒——的方法,是在这种组织能建立之前占领整个德国领土。

由于有这些考虑,所以我决定,一俟第十二和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群完成对鲁尔的包围,我们的下一个主要进攻就要包括三个重要部分。

第一部分是,实施一次强大的冲击,布莱德雷直接穿过德国中部。他所辖的各集团军按照这个路线将越过德国的中央高原。这样他就在一些河流的水源附近渡河,那里的河流不象在近海的德国北部平原上的河流那样形成巨大的障碍。为了保证布莱德雷有足够的兵力不间断地横越德国,美国第九集团军重新归他指挥。另

外，我们为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组织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即杰罗将军指挥的第十五集团军。这个集团军有以下两个职能：第一，接办前进部队后方的军事管制工作，第二，为鲁尔对面的来因河西岸提供必要的盟军兵力，以防鲁尔德军袭击西岸我方补给线上的重要地点。杰罗还被委派指挥美国第六十六师。这个师在西面几百哩之外，还在包围比斯开湾的圣纳泽尔和洛里昂两个港口的德国守军。

布莱德雷在他确定鲁尔的德军不能干扰他的交通线后，立即命令他的三个集团军开始进攻。我无意为消灭鲁尔的守军发动一次艰苦的逐屋争夺战。因为那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且本地又无食物供应来源，单是饥饿就肯定能迫使它最后投降，从而减少盟军的大量伤亡。

这项总计划的第二和第三部分的具体设想是：随着布莱德雷和俄军在易北河某地的会师，在我们的两翼发动一次迅速进攻。北面的突击将切断丹麦，南面的突击则突入奥地利，并占领其西部和南部的山区。在布莱德雷进攻的开始阶段，南面的第六集团军群和左面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进攻，从总的方面说，是为了支援布莱德雷的主攻，但两者应尽快地向着它们各自的最后目标推进。

反过来，一旦布莱德雷完成了他在中路的使命，当北面的蒙哥马利和南面的德弗斯已经按计划规定发动他们的最后进攻时，他将支援他们。

这项总计划送给了斯大林大元帅。

根据1月份所作的、并经联合参谋长会议同意的安排，我认为将这项计划通知斯大林大元帅完全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丘吉尔首相激烈反对我的这个行动。他不同意这项计划，并坚持认为，由于目前战役已接近尾声，部队的调遣已具有政

治意义,这就要求在发展广泛的作战计划方面应有政治领袖的过问。他显然认为,我与斯大林大元帅的通信,已经越出了我只在单纯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联系的职权。他非常失望和不安,因为我的这项计划没有用能从美国部队中抽出来的所有兵力首先支持蒙哥马利向前挺进,以便不顾一切地试图在俄国人之前去占领柏林。丘吉尔先生把他的意见送给了华盛顿。

当然,首相知道,不管盟军往东能推进到什么程度,他和总统早已同意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区在东面将限于柏林以西二百哩的一条界线。他所以极力坚持用我们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来保证西方盟军先于俄军到达柏林,一定是基于这种想法:这个成就今后将会为西方盟国造成巨大的威望和影响。

我无法知道他的真正理由,但这个抗议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电报往来。最初的一份电报是马歇尔将军于3月29日发出的。他在那封电报里告诉我,英国参谋部留意着我与斯大林大元帅通信所采用的手续以及他们所谓的我对计划的改变。英国参谋部告诉马歇尔,我的主攻应当穿过德国北部平原,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打开德国西部和北部的港口。英国参谋部还指出:这样还会在很大程度上排除潜艇战。并且,我们将能自由进入丹麦,打开一条通往瑞典的交通线,从而把瑞典和挪威的将近二百万吨的船只解放出来为我们使用。

这份电报的收到,促使我发出了如下的回电:

艾森豪威尔致马歇尔电,3月30日:

老实说,说我已经改变计划的这种指责,毫无事实根据。鲁尔以北的主要进攻,按照孤立这个有价值的地区的目的,一直在坚持着。目前,我能预见我们部队在卡塞尔地区集中的日子,所以我仍然坚持我原来的计划,从那里发动一次主攻。这次主攻预计将与俄军相连接,共同摧

毁敌人的武装力量。我的这项计划比之现在威尔逊给您那份敦促我分散兵力的电报,会更迅速和更肯定地得到北海岸的那些港口和其他一切。

发出这份初步的电报后,为了使马歇尔将军知道详情,我起草了一份有关我们计划的全面摘要,用电报发出,电文如下:

艾森豪威尔致马歇尔电,3月30日:

这是致您的复电。

除了您那份电报中所谈到的“手续”外,首相昨晚用电话向我提出了同样的抗议。

我完全不明白关于“手续”的这些抗议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是奉命直接与俄国人处理有关军事协调问题的。基本战略并没有改变。英国参谋部去年夏天反对我打开法兰克福通路的决定,因为它说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并且会从北面的进攻中拉走兵力。我一向坚持,北面的进攻必须是包括孤立鲁尔在内的那一阶段的主要行动。但是从最初起,可以追溯到进攻欧陆开始日以前,我就向我的参谋部和高级军官们解释,我的计划是把卡塞尔地区的主攻和助攻连接起来,然后向东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突击。

在把卡塞尔地区的主攻和助攻连接起来以后,对突击的决定性方向甚至略加思考一下,就能指出,在当时情况下,主攻应指向来比锡地区,因为那里集中着大部分残存的德国工业力量,并且人们认为德国政府将迁往该地。我的计划并不把蒙哥马利的英国部队和加拿大部队调往南面。您会注意到,他的右翼将沿汉诺威—维滕贝格这条总的路线向前推进。我只是遵循布鲁克陆军元帅经常强调的原则,决定把兵力集中在一次主攻上。我的计划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包括从卡塞尔到来比锡地区——当然,除非在那个地区的这边遇到俄军——的中路进攻在内的这一阶段,把美国第九集团军拨归布莱德雷指挥。在这之后,那个阵地将被巩固;到那时,这项计划明显地指出,第九集团军将再次调去支援英国部队和加拿大部队,以肃清卢卑克以西整个海岸线上的敌人。

在为这次作战提供了兵力以后,我们认为,我们能向东南运动,以防止纳粹占领一个山区根据地。

我全面地考虑了这种形势下海军方面的情况,并明确认识到,及早夺得北部海岸线是有利的。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在第一个突击使我们占有了决定性地位以后,我便把夺取北部海岸线作为我们要达到的第二个目标。打开不来梅、汉堡和基尔的军事行动,包括进攻弗里西亚群岛、赫耳果兰岛以及广泛的扫雷工作。所有这一切以及进攻丹麦和挪威的军事行动就是下一作战阶段的组成部分。

请允许我指出,柏林本身不再是一个特殊重要的目标。它对德国的有用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摧毁,甚至德国政府正准备转移到其他地区。当前重要的事是,集中我们的部队,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大规模进攻,这与我们到处分兵作战相比,将能更快地攻占柏林,解放挪威,获得船只和占领瑞典的港口。

我想指出的另一点是:德国北部的所谓“好地”,每年这个时期实际上并不好。那个地区不仅严重地被水路所割裂,而且每年这个时候地面非常潮湿,与我们正准备在那里发动主攻的较高的台地不一样,不宜于部队迅速运动。

总而言之,我的意见是通过我们的主攻,尽早地和苏联共同分割和消灭德军。我们的主攻应从卡塞尔地区开始,径直往东朝着残存的德国工业力量的中心推进,直到这次突击占领包括来比锡城在内的整个来比锡地区,除非俄军的进攻在此地区以西与我们会合。这次战斗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使蒙哥马利的部队在左面推进,当上述的进攻一经完成,就把第九集团军转向左面,去支持蒙哥马利清除基尔和卢卑克以西整个地区的敌人。

在这两个军事行动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我将把部队推向东南,试图与俄军在多瑙河河谷会合,从而防止在德国南部建立纳粹堡垒。

当然,我的计划是灵活的,我必须保留随机应变的自由。最大的灵活性将取决于在中央部分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

对上面这份电报值得一提的,它最初是由我的一位英国助手在我的统帅部里起草的。

马歇尔致艾森豪威尔电。3月31日;

英国参谋部今天从伦敦把它对你计划的意见送交联合参谋长会

议。

它不承认有束缚战场上的盟军最高统帅手脚的任何愿望,但提到了盟军最高统帅职权范围以外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如潜艇战,瑞典的船只,从饥饿中拯救千百万荷兰人的政治重要性,进入丹麦和解放挪威的重要性),并且要求在你得到联合参谋长会议的指示以前,推迟向迪恩(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负责人)进一步提供细节。

美国参谋部今天作了回答,主要内容如下:盟军最高统帅与俄国人联络的手续,在作战方面似乎是必需的。对这次联络的任何改变,应由艾森豪威尔而不是由联合参谋长会议作出。盟军最高统帅的计划中所概略说明的作战路线,看来符合一致同意的战略和盟军最高统帅的指示,特别是从当前形势发展看。艾森豪威尔正在使他所能使用的最大兵力渡过来因河在北面摆开阵势。南面的助攻正在取得显著的胜利,并正按后勤能力之所及继续发展着。美国参谋部确信,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作战路线,比起英国参谋部主张的作战路线来,将会更迅速和更肯定地获得后者所说的港口以及其他一切。

德国的战斗目前正处于一个该由前线最高统帅来断定应该采取什么步骤的关键时刻。有意撇开敌人弱点,不加利用,似欠妥当。唯一的目标应是迅速取得全面的胜利。美国参谋部虽然承认存在着一些与盟军最高统帅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但它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概念是正确的,应得到完全支持。他应继续自由地与苏军最高统帅进行联络。

后来,在4月7日,我就这个问题最后又致马歇尔将军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我送给斯大林的信纯属军事行动,这与以前联合参谋长会议给我的广泛权力和训令是相符的。老实说,我没有想到要事先与联合参谋长会议商量,因为我认为我要对这个战场上的军事行动的效果负责,并认为,向俄军领导人询问他们下一个主攻的方向和时间,并把我自己的意图扼要告诉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现在正压着一封发给驻俄国的军事代表团的信。信的目的是:为地、空部队彼此识别建立一些具体的安排,以及建议一项我军与俄军彼此在对敌进攻中相遇于德国某地时应予遵守的行动程序。事关重大,



务须根据实际情况迅速予以裁决。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把自己的计划继续进行下去。我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在军事上的正确性是如此坚信不移，以致我的参谋部的一些亲信都知道我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据理力争。

这次特殊争论的另一个仅有的结果是，此后我们在与斯大林大元帅联络时感到有些拘束，并小心地把我们所有的联络限制在只具有单纯战术意义的问题上。这种情况我并不把它看得太严重，特别是因为美国参谋部坚决地再次肯定，我在执行我认为能尽快结束战争的计划方面有行动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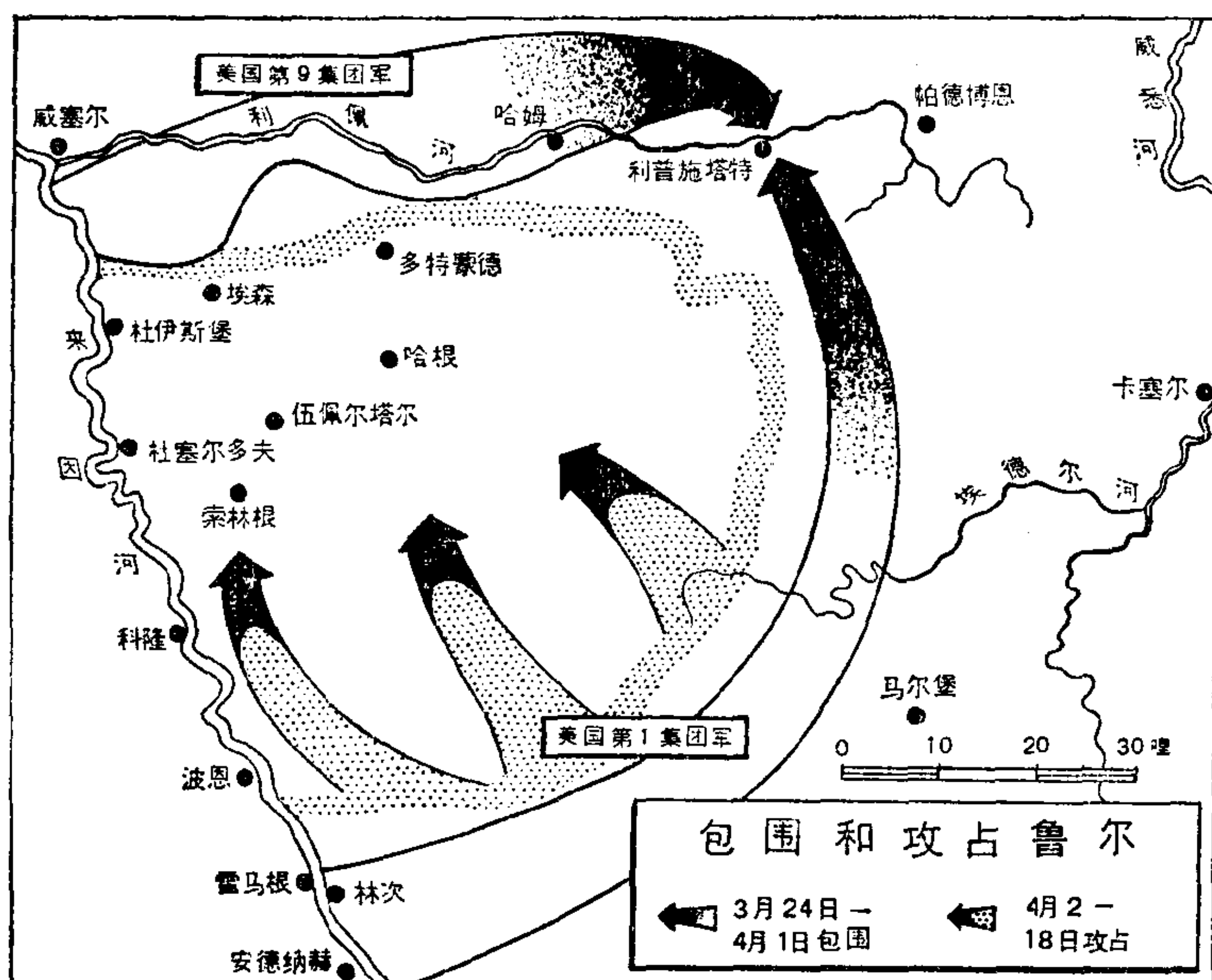
## 第二十一章

### 占领德国

鲁尔在工业上对于德国的重要性,甚至在我们包围鲁尔以前就已经大为减小了。不只那个地区的工厂已经成为大规模猛烈轰炸的目标,而且早在1945年2月,盟国空军已开始实行一项旨在切断从鲁尔通往德国心脏地区的交通线的阻截计划。这个军事行动获得了显著成效,因为我们知道,德军从鲁尔向当时还留在各战场的军队运送弹药遇到了巨大困难。由于现在该地的两侧受到威胁,同时因为那里的作用已大为减小,所以德国人从那里撤出他们的部队用以抵御我军的挺进,看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可以肯定,一旦鲁尔被围,德国不但要丧失该地的工业,而且无论什么样的军队都会被挤入它的防御工事,这点对德国参谋总部来说应该是清楚的。但是德军在那里还是一再负隅顽抗。

南面布莱德雷的部队和北面蒙哥马利的部队,稳步地向着他们预定在卡塞尔附近会师的地点进攻。位于蒙哥马利集团军群右翼的辛普森第九集团军所遇到的抵抗,比从法兰克福地区向前推进的第一和第三两个集团军遇到的抵抗要顽强得多。因此,我军钳形攻势的南路从鲁尔的东面和东北面急速迂迴前进,以便在邻近帕德博恩的利普施塔特附近与辛普森的先头部队会师。

到4月1日,即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威塞尔地区渡过来因河以后刚刚一个星期,就实现了会师,于是鲁尔被围,那里的守军成



〔按原图译制〕

了瓮中之鳖。

德军现在已经遭受一连串重大失败。自从敌军突击阿登未遂，在血泊中败退以来，盟军势如破竹的打击，继续使它遭到一系列惨重的损失和失败。没有丝毫的原因和理由再拖延战争了。东西两条战线的大军如今正在德国本土作战。敌人完全丧失了鲁尔、萨尔和西里西亚。它分散在国内中央地区的残存工业，不可能再支持其继续企图作战的军队。交通线被严重破坏，纳粹高级司令官再也不能确信他的命令能够下达到他所属的部队。虽然许多地方的部队还能进行凶猛而顽强的局部抵抗，但是只有位于漫长西线的北侧和南侧的一些足额的集团军，除了能阻止盟军的进攻外，还可以担负些其他的战斗任务。

3月31日，我发表了告德国军民书，敦促德军投降，勉励德国

人民开始种植庄稼。我向他们说明大势已去，并告诉他们，继续抵抗只能增加他们今后的苦难。

我的目的是要结束这一场流血战争。但是希特勒通过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对他的同伙的控制仍然如此有力，并且到处控制得如此有效，以致这个国家还要继续作战。

当布莱德雷抵达卡塞尔地区时，他面临着两个任务。第一个是，他必须把鲁尔的守敌压缩到小得只用几个师就可以围困住的包围圈里，并有效地防止敌人骚扰自己的交通线。第二个是，组织他的三个集团军，越过德国中部高原，全力向来比锡方向挺进。

他的三个前线集团军部署的位置，从北往南依次是：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霍奇斯的第一集团军，巴顿的第三集团军。他总共指挥四十八个师，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支空前庞大的美国部队。

莫德尔陆军元帅指挥被围困在鲁尔的德军。他最初向北进攻，企图突围未遂。他又打算向南突围，也没有成功，因此，德国守军除了最后投降以外，别无出路。布莱德雷不断猛攻，迫使敌军防线后撤。4月14日，美军发动局部攻势，将包围圈分割成两部分。两天以后，东半部瓦解了。18日，残余守军全部投降。我们原先估计，在鲁尔可能俘掳约十五万名德军。最后计算总数为三十二万五千人，其中还有三十名将级军官。我们歼灭二十一个师，缴获大量的军需品。希特勒一定曾希望围攻鲁尔将象围攻布勒斯特一样，会遇到顽强的抵抗，但是鲁尔被围十八天就投降了。在投降时，我们俘获的战俘，甚至比两年前突尼斯最后陷落时所俘获的数量还要多。

同时，布莱德雷迅速组织他的部队向东推进。到鲁尔守敌投降时，他的几支先头部队已抵达距离卡塞尔一百五十哩的易北河。布莱德雷的进攻是在一条广阔战线上展开的。在南面，第三集团

军向捷克斯洛伐克国境和在该国正北面的开姆尼兹城突击，于4月13至14日抵达那个地区。在巴顿的左面，第一集团军于4月11日展开攻势，进展迅速，只遇到零星抵抗。14日，柯林斯指挥的第七军的第三装甲师到达差不多位于易北河畔的德绍。这个军参加了最初对诺曼底滩头的突击，随后又攻占了瑟堡，它在欧洲西北部，从法国海岸一直打到易北河。

我和巴顿一起度过了4月12日。在这一天结束之前，我见到的情景和听到的消息使这个日子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早晨，我视察了巴顿的几个分散的军和师，它们正以典型的巴顿式突击迅速向东推进，到处包围和俘掳已处于瓦解状态的敌军中被孤立的小股部队。没有一个全面的防御线，甚至确实没有阻止我军前进的任何协调一致的企图。虽然有些局部的小股敌军还在顽抗，但在这一整天内，我们看到的都是些零星的战斗。

巴顿将军的集团军占领并发现了一个深藏在盐矿底层的纳粹宝库。我军一个班下到离地面几乎有半哩深的矿井里。

井底有一大堆德国纸币，其中有一些显然是在美军到达以前最后仓皇撤退时堆在那里的。在一个地道里有大量油画和其他艺术珍品。这些东西有些用纸和粗麻布包着，另一些只不过象捆起的木材那样堆在一起。

在另一个地道里，我们看到一个据我们专家估计约值二亿五千万美元的金库，其中大部分是金条。这些金条装在袋子里，每袋装两条，每一条重二十五磅。此外，还有欧洲各国铸造的大量金币，甚至还有好几百万枚美国金币。

在手提皮箱、衣箱和其他容器里，塞满了显然从欧洲各地的私人住宅里掠夺来的大量金盘、银盘和装饰品。很清楚，为了节省存放的地方，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铁锤砸平后随便塞进容器的，敌人显

然是在等待时机，以便把它们熔化成金条或银条。

一开始就注意到一个特殊地道，所有这些黄金就储藏在地道的一个新近用砖墙砌成的场所里，砖墙的中央有一扇现代化的钢制保险门。保险门是如此坚固，以致必须用烈性炸药才能炸开。但是有一个作过实地检查的美国士兵认为，周围的砖墙看上去并不特别坚固，并且他只用半根黄色炸药就证实了他的看法。他用这点炸药把这堵墙炸开了一个大洞，于是宝藏暴露在眼前。我们沉思，为什么德国人不打算在地道的迷宫里准备一个隐藏宝物的场所，反而企图选择一堵容易用鹤嘴锄掘开的墙来保护它。构造精巧的钢门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是一个陪同我们的美国士兵指出，“锁住大门拆开墙，这正是德国人喜欢的做法。”关于巴顿探查这个盐井的故事本身是引人入胜的。

当然，那座矿井也许迟早会被占领者仔细搜查出来。但是，据巴顿说，如果不是两个美国兵的正直本性，在其中许多东西被格外安全地转藏于别处以前，我们也许不会发现它。故事是这样的：

在邻近一个小镇里，美军先头部队实行宵禁令。天黑以后，市民们在街上要立刻受到盘问。一天傍晚，一辆巡逻吉普车看到一个德国妇女在宵禁令后匆匆忙忙在街头走着，于是停下来询问她。她力言急于去替即将分娩的一个邻居请接生婆。美国士兵决定查对这件事，如果属实，就决定进行帮助。他们把这个德国妇女带进吉普车，请到了接生婆，转回到这个德国妇女所说的分娩地方。这些士兵还是进行帮助，呆了很长的时间，直到把这个德国妇女及其担任接生的女朋友送回家。当他们路过该地区一个盐矿的井口时，一个妇女指出，“那就是藏金子的矿井。”

这句话引起了士兵们的好奇心，他们详细询问这两个妇女，才知道几个星期前，从东方运来大量物资，被放进这个矿井内。士兵

们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他们的上级，后者又找到矿业公司的几名德国官员，整个宝藏便落到我们手里。

这同一天，我第一次看到集中营。它位于哥达城附近。当我第一次目睹纳粹犯下的这些凶恶残暴、灭绝人性的罪行的铁证时，我感到简直无法描述我的感情反应。在此以前，我只是一般地或间接地知道这种情形。但是，我确信我在任何别的时候从来没有如此震惊过。

我视察了集中营的每个角落，因为我认为，一旦国内出现“关于纳粹残暴的言论纯属宣传”的信念或臆测时，我今后有责任用第一手材料证实这些情形。陪同视察的某些人未能看完这些罪行。我不但看完了，而且我回到巴顿的司令部，当晚就通知华盛顿和伦敦，请两国政府火速派一批随便挑选的报社编辑和国家立法机关代表团到德国来。我觉得应该立即把证据公诸于美、英两国的公众，这样就会消除那种讥诮性的怀疑。

4月12日这一天是在戏剧高潮的旋律中结束的。布莱德雷、巴顿和我坐到深夜，商量未来的计划，特别是商谈挑选军官和部队及早派往太平洋的计划。我们刚好在12时以前睡觉，布莱德雷和我睡在巴顿司令部的一所小屋里，巴顿睡在拖车内。他的表停了，就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报时信号。他从收音机里听到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他回到屋里，叫醒布莱德雷，然后他们两人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我们沉思总统的逝世对未来和平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深信这不会妨碍战争的发展速度，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太平洋开始实行某些击溃日军的重大措施。我们当然不知道罗斯福总统已经作出了对以后和平有影响的任何专门的或具体的安排。但是我们怀疑美国其他任何人在与同盟国的政治领袖打交道方面会有他那样

丰富的经验。我们几个人谁都不很了解总统；我通过各种会议比别人多见过他几次，但是从国际局势的观点来看，我们认为，我们是在最关键的时刻被迫更换了国家领导人。我们是怀着沉重而悲痛的心情入睡的。

对于罗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行动，我永远是不能同意的。但是我完全承认他有作为战时国家领导人的能力，而且在我看来，他在这方面履行了能够瞩望于他的一切。

在第一集团军进攻时，一万五千多名敌军被切断在哈次山脉中。守敌顽强奋战，坚守到4月21日。这个地区格外难于对付。经过一个星期的激战，攻占了这个据点，击退了企图援救守敌的其他德军。再往北面，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与中部和南面的进攻保持同样速度。到4月6日，第九集团军在宽阔的威悉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随后向易北河发动猛攻，于4月11日在马格德堡正南抵达这条河。第二天，第九集团军的第二装甲师在马格德堡下游十哩处的易北河上获得一个小型桥头堡。当敌人炸毁桥梁后，第十三军的第五装甲师在马格德堡北边建立另一个小型桥头堡的打算失败了。在这个地区，敌人似乎宁愿放弃易北河以西的地区，但是疯狂抵抗渡河的任何企图。德军立即对第二装甲师的桥头堡进行反击，这个桥头堡于4月14日放弃。再往南面，第八十三师还保持着一个渡口。

几乎与我军抵达易北河的同时，红军从他们在奥得河的阵地向西面发动强大攻势。进攻是在一条二百多哩长的战线上展开的。红军的攻势到处取得迅速进展。它的北路向丹麦半岛推进，中路向柏林推进，南路向德累斯顿地区推进。4月25日，第五军第六十九师的巡逻队在易北河遇到红军第五十八近卫师的部队。会师



地点在柏林南边约七十五哩的托尔高。第五军和第七军都参加过对诺曼底滩头的最初的突击，它们之中的无论哪个军的部队首先和红军接触并完成对德国的最后分割，看来都是非常恰当的。与俄军联络的问题，在我们越过德国中部向前推进时，变得更为重要了。现在迫在眉睫的事已不再是那些重大的战略问题，而变成了战术性的问题。主要难题之一是互相识别的困难。

由于语言不同，前线的无线电话已不能用作两支汇合部队之间的联络工具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对标记和行动步骤适时进行协商。早在4月初，西方盟国的空军和俄国的空军已经遭遇过，并且发生了一些不幸的后果。红军的飞机和我们的飞机互相射击，发生重大冲突的危险在不断增加。建立一套识别信号的工作是很麻烦的，而且直至4月20日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双方就各自飞机飞行的限制航线已达成了协议，而且由于飞行时小心谨慎，再加上相当程度的好运气，还没有发生过真正的严重误会。

我们和俄国人之间还一致同意，在两支夹击部队相遇时，当地司令官将根据地区的和作战的考虑，安排两军之间满意的会合线。我们切望两军之间总的会合线有一种容易识别的地理特征。因此，双方同意在战线中央的会合线沿易北河和木耳德河来划分。当然，我们各自的政府会同意在未来的任何时候将部队撤回各方的占领区，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中央部分发动这个决定性的进攻时，北面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和南面的第六集团军群正在按规定任务作战。

在北面，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进攻不来梅和汉堡，并派遣一支部队向易北河推进，以掩护布莱德雷北路的进攻。蒙哥马利向东的推进主要由英国第二集团军实施，而加拿大集团军则越

过阿纳姆向北突击，以肃清荷兰东北部和往东到易北河的沿海地带的敌军。在 frontline 拥有三个军兵力的英国第二集团军挥戈东进，于4月6日抵达威悉河，4月19日抵达易北河。在不来梅，英国集团军遇到决心顽抗到底的敌军。英国第三十军于4月20日抵达不来梅城郊，经过一个星期的激烈战斗，该城才最后投降。

同样，位于蒙哥马利左翼的加拿大集团军的北进，一开始就遇到非常猛烈的抵抗。但是在整个这条战线上取得了满意的进展，4月15日攻占阿纳姆。阿纳姆的陷落是那个地区的敌军退到泛滥区后面的荷兰要塞的信号；这个泛滥区成了进攻荷兰西部的严重障碍。

蒙哥马利认为，而我也同意，立即进军荷兰将使那个不幸的国家增加巨大的灾难，因为该国人民已经遭受着粮食匮乏的严重痛苦。地面上人为的氾滥、轰炸和德军的防御工事，已使那个国家大部分地区荒芜了。我们决定推迟进军荷兰，并且要做一些我们能够减轻荷兰人民痛苦和饥荒的事情。

4月初，德弗斯的第六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掩护布莱德雷右路的进攻。为了实行这一任务，德弗斯组织了以帕奇的第七集团军在左面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在右面的有条不紊的进攻。

一开始，第六集团军群正面就遇到全面抵抗，德军不顾北面的溃败和每天的战斗伤亡，继续顽抗。当第七集团军到达内卡河时，经过顽强战斗才建立了一个渡口，然后又用了一个星期才击溃了海尔布隆城的防御部队。这个地区的德军士气，没有象在盟军2、3月份的强大攻势中首当其冲的那些德军那样遭到严重的挫伤。4月7日，第十装甲师向克赖尔斯海姆方向推进，但德军的反应是如此迅速而强烈，以致这个师不得不急忙撤出它的无掩护阵地。第十五军于4月16日抵达纽伦堡，但又经过几天战斗，才使该城的防

御最后崩溃。

法军战区遇到的抵抗不那么顽强。在紧靠来因河的地方经过几次激战以后，法军推进的速度加快了。

当然，法军是在德弗斯将军指挥下发动进攻的，他有责任在自己的集团军群内部部署部队活动的范围，规定供应线和安排部队给养所必需的一切其他后勤措施。他把斯图加特城安排在帕奇的第七集团军区域内，因为美军供应线必须经过该地。这个城市是法军攻克的，后来法军拒绝撤出该城交由帕奇使用。法军断言，这关系国家威望，所以拒不服从，于是这个争执就被上交给我。我指示德弗斯坚持原意，指示他要求按他自己的计划办事。法军还是固执己见，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巴黎。戴高乐将军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在答复美国总统就这个问题发给他的措词严厉的电报时，在政府一级继续坚持强硬态度。当时我警告法国司令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必须通知联合参谋长会议，对于他们将来可能打算进行装备的任何法国部队，我肯定再也不能考虑在作战时予以使用。这一可能削减法军装备的警告证明是有效的，法军终于顺从了。

在法、意边界发生过一个有些类似的事件。那里有很小一个地区，法军和意军双方都声称在道义上和法律上拥有所有权。在那个地区，我和亚历山大陆军元帅达成了—个边界协议，但是法军急于加强他们对这块有争议地区的权利，就破坏了这个协议。

当然，法国人在战争中的处境是不舒畅的。他们曾经号称欧洲头号军事强国，但他们的军队和他们的自豪感在1940年的大溃败中被粉碎了。所以，当1942年的“火炬”行动再度给予有爱国心的法国人以参加反纳粹战争的机会时，他们对于有关民族尊严和荣誉的一切问题是敏感的。除此以外，他们特别痛恨纳粹，而对纳粹的憎恨似乎又加强了他们反对以前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情

绪。此外，戴高乐的威信和他在法国成立的政府机构的威信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并不是可靠的。另一个因素是法国军队和颇大一部分法国居民要完全依靠美国的供应。这是对于他们自尊心的又一个刺激，虽然他们始终坚持要求各种大量的装备和武器，但是当他们理解到如果没有这些物资就将完全无依无靠时，他们自然要感到恼火。所有这些都使得他们特别敏感，因此，在任何问题上——不管是多么细小的，在任何事情上，当他们发现涉及国家荣誉时，我们就很难和他们打交道。虽然如此，美国对法军的投资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在非洲战役中，法军是帮了忙的，不过他们极其软弱。就大的战斗来说，他们首先大力参加了意大利战争。1943年底和1944年初，法军在那个战场上打得很出色。此外，他们在进攻法国南部、突入孚日山脉和向来因河上游推进时都打得很漂亮。但是在1944年底，随着冬季的到来，他们的效率迅速降低，因为法国集团军中的大部分非洲土著部队在欧洲冬季作战时不能忍受寒冷和冻馁。但是在1945年春，也就是这次大战的最后几次战役期间，法国集团军勇敢而有力地攻占了德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同时他们在比斯开湾从地面和空中对德军发动攻势，解放了波尔多和奥累龙岛。由于别处的需要更为迫切，这个军事行动从1944年秋季起一再延宕。4月14日开始战斗，一个星期以后，打通了纪龙德河的出海口；5月1日，攻占奥累龙岛。当法军受到激励时，他们是伟大的战士。

在法国人中，有许多重要人物从来没有制造过丝毫麻烦；目光远大和对关键问题的理解力，使得他们成为我们伟大的盟友。我个人喜欢戴高乐将军，因为我看出他具有许多可贵的品质。但是我觉得他在一些我们认为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所表现的神经过敏和不寻常的顽固，损害了这些品质。我和他在战时的接触中，从来没有发

现过他在会见其他许多人时似乎常常流露出来的那种急躁脾气。

吉罗德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军人，为人非常诚实正直。但是他对政治完全缺乏兴趣，所以显然他不配在他的国家事务中担任任何政治职位。朱安将军、凯尼格将军、科尔茨将军和无数下级军官都是勇敢、正直和能干的职业军官。当盟军干涉非洲时，为了光复法国首先挺身而出的马斯特将军、贝图阿尔将军及其战友们的名字，将永远成为崇高的爱国主义和高尚品德的象征。

随着布莱德雷的集团军群在易北河站稳脚跟，这时便到了盟军进行最后的战役行动的阶段。敌军已被分割为南北两支互不依赖的部队，无论对俄军或对我军都无法恢复成一条完整的战线。处于四面楚歌之中的德国士兵无心恋战。仅仅在一些个别的情况下，司令官们还能够继续控制住自己的部队。4月份的头三个星期，西线盟军俘获了一百多万名俘虏。

甚至在盟军横穿德国中部的进攻开始以前，我们知道，德国政府已准备撤出柏林。行政机关看来是向南迁移，我们认为，很可能迁往“民族堡垒”区的贝赫特斯加登。自从布莱德雷的迅速挺进进一步切断了贯穿这个国家的南北交通以后，南迁再无可能。我们也知道希特勒不能南窜，他准备最后死守柏林。但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企图在“民族堡垒”中负隅顽抗的严重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及早攻占那个地区，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在北面，也存在着加速向卢卑克实施预定进攻的重要原因。

向卢卑克的进攻将占领德国最后几个残留的潜艇基地，并将有效地消灭那些一度是严重威胁的最后痕迹。

我们不能预测丹麦的德国占领军的行动。可能他们决心固守那个地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计划对他们进行闪电战。

4月初,蒙哥马利曾经估计,实现分配给他的任务,除了当时他所指挥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十七个师以外,不需要再增加兵力。我建议给他保留一部分位于威塞尔的美军铁路桥的运输量,作为额外的后勤支援。他谢绝这一帮助。但是当战斗在他的侧翼展开的时候,他发现兵力很快就用完了,为了加速进攻起见,他请求另外增加兵力和供应方面的援助。这两点我都痛快地提供给他。我临时将李奇微将军的美国第十八空降军调给蒙哥马利的部队。它的基本战斗任务是支援蒙哥马利的进攻。但是如果丹麦的德军决定抵抗到底,我们还准备提供另外的兵力,以便越过基尔运河实行空降攻击。

当蒙哥马利的部队于4月26日最后攻陷不来梅时,他的战线受到的抵抗显著减弱。他迅速将其主攻转向英国第八军的扇形战区,后者于4月29日展开越过易北河的攻势。美国第十八军在稍微往南的地方同时渡河,并且为英国第二集团军进一步的进攻提供了右翼掩护。

5月1日,英国第八军的第十一装甲师开始越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向波罗的海发动一次出色的冲击,5月2日下午进入卢卑克。这样就封锁了丹麦的敌人,并阻止德国的任何败军撤往那个国家。

现在蒙哥马利在其全线迅速巩固战果。5月3日,美国第十八军在蒙哥马利战区与俄军会师。柏林处于熊熊烈火之中,红军的北路进攻部队越过德国朝我军方向横扫过来。一切抵抗都被粉碎了。从俄军战线潮水般溃退下来的德军,现在开始向英、美军队投降。扼守易北河的美军,每天要接收数千名这样的战俘。

当时在蒙哥马利左翼的加拿大集团军继续乘胜作战,迅速肃清其整个前线的敌人,不过没有打算转回荷兰西部,在那里,德国

第二十五集团军已掘壕固守。

我们知道荷兰的情况已在不断恶化,自从我军的进攻把那个地区与德国隔离开来以后,荷兰人的处境变得几乎无法忍受。根据我所掌握的情报判断,我担心将会发生大饥荒,并决定采取积极措施进行防止。我仍然拒不考虑大举进攻那个国家,因为这样不但会增加惨重的破坏而造成灾难,而且敌人的掘堤将进一步淹没那个国家,使其大部分肥田沃野遭到多年的毁坏。我警告荷兰的德军司令官布拉斯科维茨将军不得再行掘堤,并向他指出,他在荷兰的所作所为,丝毫不能阻止德国的迅速覆灭。

纳粹驻荷兰高级代表赛斯-英夸特建议休战,以解决当地问题。如果盟军不再向西进攻荷兰,那个国家就不会发生进一步的泛滥,德军将协助输入救济物资。我的军事上级已赋予我处理这个问题的自由,于是我派遣我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于4月30日去会晤赛斯-英夸特。他们就输入盟国早已为此目的准备的食物和供应品的方法达成了协议。大规模救济立即开始了。甚至在此以前,我们已用自由飘荡的降落伞向这个国家空投过少量食物。史密斯将军警告赛斯-英夸特,我不允许扰乱救济计划,如果德军犯了违约的罪过,以后我就不把他们当战俘对待。我认为,德军继续占领荷兰是愚蠢的,如果进一步实行镇压,他们要对此负责,并将受到严厉惩处。在会议上,史密斯将军还提出,德国司令官布拉斯科维茨必须命令他的部队立即投降。但是赛斯-英夸特报告说,只要德国政府坚持下去,布拉斯科维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投降。

在北面进行这些军事行动的同时,南面也在实施决定性的进攻。进攻的基本路线是顺多瑙河流域而下,向东南直抵林茨,目的是与奥地利的俄军会合。布莱德雷在中部的攻势已经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将第三集团军调来实施这个大规模进攻,而让第六集团

军群全力以赴去占领更往西南面的“民族堡垒”。为了确保德弗斯的快速攻势获得成功，我们把美国第十三空降师调拨给他，让他在认为适当的时候使用。但是这个地面攻势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不必再使用第十三空降师，结果这支空降部队成了进入欧洲但从未参加过实际战斗的唯一的美国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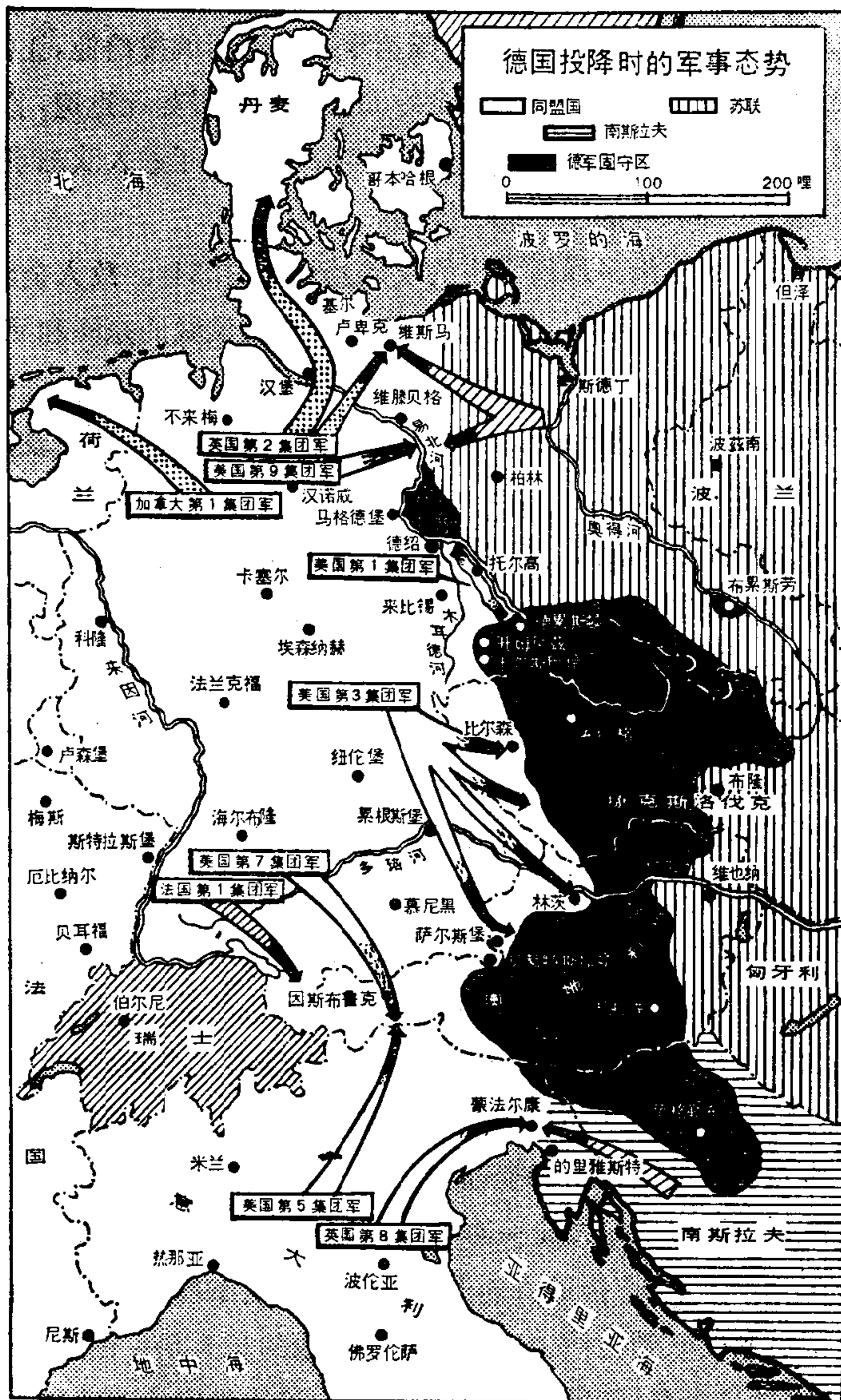
第三集团军沿多瑙河而下的攻势始于4月22日。敌人企图在累根斯堡进行防御，但是第三军和第二十军从该城的东面和西面渡过多瑙河，很快建立了几个桥头堡，并顺着这条河迅速挺进。第十二军的第十一装甲师于5月5日首先插进奥地利的林茨城，接受了德国守军的投降。

巴顿的第三集团军以其主力顺多瑙河而下向前推进时，得到了霍奇斯集团军的第五军的增援。巴顿命令第五军向东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军于5月6日占领比尔森。俄军在那个地区迅速从东面推进过来，所以进行谨慎的协调再度成为必要。经过协商，我们命令美国军队占领比尔森—卡尔斯巴德一线，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南部，双方同意以布迭约维策—林茨铁路和由林茨沿恩斯河流域为会合线。

4月22日，德弗斯集团军群的帕奇第七集团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在右翼，第十五军顺多瑙河前进，然后转向南面攻打纳粹活动的策源地慕尼黑。4月30日攻占这个大城市。5月4日，这个军的第三师拿下贝赫特斯加登。另一支部队占领萨尔斯堡。于是这个战区的防御崩溃了。

第七集团军的第二十一军和第六军于4月22日渡过多瑙河，稳步向“民族堡垒”推进。5月3日占领因斯布鲁克，第六军的一〇三师迅速突破勃伦纳山口。就在国境线的意大利一侧的这个地方，盟军的这个美国师遇到了从意大利向这边推进的美国第五集





(按原图译制)

团军的美军第八十八师。我在一年半以前说过，我将“在敌人国土的心脏地区”与地中海指挥区的士兵见面，这个预言实现了。

在整个前线，各战区的主要目标在4月底都已达到，或者有把握很快就能夺取到手。强大的进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行政、给养和组织等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经常拿出全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供应线又一次大大地紧张起来。如果我们完全依靠地面的运输，不管这种运输多么有效，单单距离之遥远就足以使我们的先头部队停顿下来。远距离的和移动迅速的部队有时几乎只能依靠空中供应，在4月份，我们始终保持一千五百架运输机经常在供应系统中执行任务。在战争的这些结束阶段里，被称为“飞行货车”的运输机，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除这些飞机外，我们为此还调拨并改装了许多重轰炸机。在整个4月份，空军向前线运送了六万吨物资，其中包括一千万加仑汽油。

西德到处充满了我们的部队，那里只剩下少数目标，空军可以对其直接轰炸而不致发生将炸弹投入我军或俄军的危险。但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空军进行了两次重大的轰炸袭击。一次是英国轰炸机总队袭击赫耳果兰岛，空袭这个岛是为了支援蒙哥马利，以便在他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越过基尔运河实施突击。另一次是美国第八航空队袭击贝赫特斯加登。这个象征纳粹狂妄骄横的堡垒，被烈性炸药彻底摧毁了。我们之所以实施这次轰炸，是因为我们那时仍然认为纳粹分子可能打算以贝赫特斯加登为首都，在“民族堡垒”负隅顽抗。摄影侦察带回来的照片表明，我们的轰炸机已将该地炸成一片废墟；我们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愉快的和可以理解的满意心情。

我们的运输机和改装的轰炸机每次从前方归来都载运着被营救的盟军俘虏。这些人集中在舒适的营房里休养，并及时转送回

国。仅仅在勒阿弗尔附近一个名叫“幸运”的营房里，我们一次就收容了四万七千名被营救回来的美国俘虏。英国人在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各地也设有类似的营房。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寻找回来这样多的盟国被俘兵员，这给医疗队、运输部门，也确实是我们大家提出了一系列细致的问题。他们大都健康状况很坏，以致必须大力关心他们的饮食。一些体弱者被送进医院，一个时期我们的医院有人满之患。他们回到自己人那里的高兴心情几乎是感动人的，但同时他们受到营养不良的极大痛苦，以致只有细心照料才能拯救他们。有些美国人从1942年12月突尼斯最初会战起就当俘虏。我们为英国找回来了1940年在敦刻尔克就已被俘的士兵。

有一天，我约定与五名美国参议员会晤。当他们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我从一位参谋军官手里接到一份电报，说报纸上有篇报道断言“幸运”营房的情况是难以容忍的。这个报道说，人们拥挤在一起，饮食不佳，居住条件不卫生，对待他们完全缺乏同情和谅解。我们的方针恰巧相反。我们允许所有被营救的美国士兵自行请假回国，并且指定专门挑选的军官照料他们。

即使这个报道部分符合实际情形，那也只说明在某些方面没有严格执行命令。我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于是告诉我的飞行员准备飞机马上起飞。我因未能守约，转身向五名议员表示歉意，并向他们说明了我必须立即动身去“幸运”营房的原因。但是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希望和我谈谈话，可以和我一道去。我指出，他们在“幸运”营房有机会访问数千名找回来的战俘，而在别的地方，他们看不到如此集中的美国公民。他们欣然答应了。

不到两小时，我们到达“幸运”营房，并开始视察。我们在营房四处巡视，没有发现象这份令人不安的报道中所说的那种耸人听

闻的情况。我们的士兵感到有些不耐烦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食物。食物的质量好，烹调也好，但是医生不允许放盐、胡椒或任何其他调味品，因为对于在几个星期到几年不等的期间实际上挨饿的人来说，这些东西被认为是有害的。参议员们和我与这里的士兵们共同进餐，我们同意完全不放调味品的食物没有味道，但这是个技术细节，我觉得不能因此责备医生。

另一个可理解的牢骚是，这些士兵在被送回美国以前，不得不长时期地留在这个营房。这是由于缺乏船只。在战争的那个阶段，货船在我们的海外运输船只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它们不适于运送乘客。这些货船缺乏供应饮水的设备，而盥洗室和其他卫生设备通常只够船员们使用。人们不了解这些情况，当他们如此渴望回家时，看到船只实际上空荡荡地驶离港口，就不免会感到愤怒。

看来这些士兵对我们的视察很高兴，以致有成百的人在营地四处跟着我们。当我们最后回到飞机那里时，我们发现一群大胆的人装置了扩音系统，并在我的飞机门口安了话筒。几名士官走来，有点腼腆地对我说，士兵们很希望看看司令官将军和听听讲话。飞机周围的人群约莫有一万五千至两万人。

几乎在各种战争条件下，我在几百个地方同士兵们谈过话，从个别士兵直到一个师规模的集体都谈过。但这次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遭受过常人不能想象的苦难。根据我的经验，对于这样一大堆痛苦的遭遇，不论打算讲什么可能表示同情的话，都是无用的。

当时我有一个愉快的想法，这就是加速把这些士兵送回国去。于是我拿起话筒，告诉这群人，他们可以有两种办法回家，第一种办法是在回国的每一艘运兵船上按设计的最大容量运人。这是目前实行的办法。

然后我又向他们建议，因为不再有潜艇的威胁，我们可以在每一艘回国船上载运比正常容量多一倍的人，但这就要求一个人在白天睡觉，以便另一个人在晚上能得到床铺。这样，船上必然到处拥挤和不方便。我问大家，他们希望我采取哪一个方案。赞成双倍载运方案的叫喊声毫无疑问表达了他们的愿望。

当叫喊声平静下来以后，我对他们说：“很好，这就是我们将采取的措施。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今天有五名美国参议员陪着我。所以，你们回国以后，要是向报社或你们的参议员写信控诉回国的船只过分拥挤，那是没有用处的。既然这是你们自己选择的，你们一定喜欢这个办法。”

一阵笑声无疑表明这些士兵完全乐于接受自己的选择。后来我未曾听到过这些士兵中任何一个人由于回国旅途中的不愉快而发过一句牢骚。

结束战争就在眼前。战争的大致期限是可以天数来计算了，唯一的问题是：在整个辽阔的战线上究竟是与红军和来自意大利方面的部队会合以结束战争，还是德国政府会进行某些投降的尝试。

最后投降以前几个星期，我们得到了德国各方知名人士探求投降的方法和方式的暗示。这些转弯抹角的消息都没有牵涉到希特勒本人。相反，每一个送消息的人都是如此害怕纳粹分子会暴跳如雷，以致他在关心实现德军投降事宜时，也同样关心自己在参与此项活动时需要严守秘密。

德国要求投降的最早一个暗示是通过英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所作的试探。暗示的明确目的是在西线安排休战。这显然是企图与西方盟国停止战争，以便德国能够集中全力对付俄国。盟国的政府拒绝了 this 建议。

另一个暗示发生在瑞士。它是在神秘的情况下由一个名叫沃尔夫的人传来的。显然有人在策划阴谋，企图使意大利的德军向亚历山大投降。我们的统帅部与这一特殊事件毫无关系，但是由于德国高级官员们的决心已经明显动摇，我们不断地收到有关这类情况的通知。当收到这类秘密消息或确实情报时，总要带来大量工作和引起密切关心，因为站在盟国一边的许多国家，自然都关心自己的利益要受到充分保护。在沃尔夫事件中，西方盟国虽然真心实意地判断情报的真伪和倡议人的声望，但仍然惹起苏联的怀疑。我们必须做大量的解释工作。这个事件明确提醒我们，如果再收到这类情报就要慎重处理。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收到的关于投降的第一个直接建议来自希姆莱，他与瑞典的贝尔纳多特伯爵交涉，试图与丘吉尔首相联系。4月26日，我收到首相一份很长的电文，讨论希姆莱在西线投降的建议。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分裂盟国的最后的绝望企图，并且就这样通知了丘吉尔先生。我极力主张，如果建议不包括所有战线上全部德军的投降，则不予接受或考虑。我的看法是，如果盟国接受德国政府提出的只限于西线军队投降的任何建议，就会立即引起俄国人的严重误会，那时俄国人就能振振有词地谴责我们背信弃义。如果德国人想让某一个集团军投降，那只是一个战术上和军事上的问题。同样，如果他们希望某一战线上的全部军队投降，前线的德军司令官可以这样做，而盟军司令官也可以接受；但是德国政府打算投降的唯一途径，就是向所有盟国无条件投降。

这个看法与首相的看法一致，他和总统立即把全部情况通知斯大林大元帅，并附去一份他们拒绝这个建议的声明。

但是直到最后一刻，德国人从来没有放弃分别在西线和东线投降的企图。由于这类谈判的失败，德军司令官们在各自战区已经

最后面临着彻底被消灭或军事投降的前途。

第一次大规模投降发生在意大利。亚历山大的部队在整个1944年已经进行了一场战果辉煌的战役，到1945年4月26日，他已使敌军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于是开始了就地投降的谈判，4月29日，德军司令官投降。5月2日，意大利的整个战争停止了。

这样就迫使正对着意大利北面的德军处于同样束手无策的境地。5月2日，德军司令官要求知道他应与哪一位盟军司令官交涉投降事宜，他被告知与德弗斯将军接洽。并且警告他，我们只接受无条件投降。这支敌军的番号为G集团军群，包括德国第一和第十九两个集团军。他们于5月5日投降，投降书于5月6日生效。

远至北方，在汉堡地区，德军司令官也眼见自己处于绝望之境。4月30日，一名德国密使来到斯德哥尔摩，说在北方负责指挥的布施陆军元帅和在丹麦负责指挥的林德曼将军一俟盟军挺进到波罗的海，就决定投降。我们已获悉，德军拒绝向俄军投降，但是一旦西方盟军抵达卢卑克，并把那个地区的部队与从德国中部来到的狂热的党卫军分割开来，他们将立即向我军投降。蒙哥马利的部队于5月3日抵达卢卑克。但是到这时，德国的政府机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动。

希特勒已经自杀，他的支离破碎的权柄落到了杜尼兹海军上将手里。海军上将命令其各地的全部军队向西方盟军投降。成千上万垂头丧气的德国士兵开始进入我军防线。5月3日，新任德国海军领导人弗里德堡海军上将由布施陆军元帅的一名参谋军官陪同，来到蒙哥马利的司令部。他们说，他们的意图是使还在与俄军作战的三个集团军投降，他们请求越过我们防线避难的权利。他们的唯一要求是避免向俄军投降。蒙哥马利当即拒绝按这样的条件

讨论投降事宜,并且把这几位德国密使送回到德国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陆军元帅那里。

我已经告诉蒙哥马利,要他在自己负责的战区内接受所有德军部队的投降。接受这样的投降是一种战术上的事,也是前线司令官的职责。因此,当弗里德堡海军上将于5月4日来到蒙哥马利的司令部,提出让德国西北部的全部德军(包括荷兰和丹麦的德军)投降的建议时,蒙哥马利立即接受了。当天在必要的文件上签了字,第二天早晨生效。当德弗斯和蒙哥马利接受这些大规模投降时,他们没有作过任何诺言,以使美、英两国政府在今后制订各项对德决定时感到为难或受到约束;投降完全是军事性质的,除此没有别的东西。

5月5日,杜尼兹的一名代表来到我的统帅部。前一天,我们已经得到他要来的消息。同时,我们得到通知说,德国政府已经命令它的所有潜艇返回港口。我立即把所有这些消息通知俄国最高统帅部,请他们派一名红军军官到我的统帅部来,在杜尼兹可能提出的谈判中,作为俄方代表。我通知他们,德军如不在各地同时投降,我将不予接受。俄国最高统帅部派来了伊万·苏斯拉巴罗夫少将。

指挥西线德军的冯·凯塞林陆军元帅也送给我一个情报,请求允许他派一名全权代表来商定投降条件。因为冯·凯塞林只在西线有权力,所以我答复说,谈判如不包括各地所有德军在内,我将拒绝参加。

当弗里德堡海军上将于5月5日抵达兰斯时,他说他希望弄清若干问题。我方参加谈判的是我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后者告诉弗里德堡,没有什么可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是接受无条件的和全面的投降。弗里德堡坚决声明,他无权在任何这样的文件



上签字。他被允许向杜尼兹发一份电报，得到的答复是：约德尔将军已启程来我们统帅部帮助他进行谈判。

我们看得很清楚，德国人是在争取时间，以便能够把仍然在战场上的德军尽可能多地转移到我们防线的后面。我指示史密斯将军，要他通知约德尔，如果他们不立即停止一切借口和拖延，我将封锁盟军的整个前线，并用武力阻止德军继续进入我们防线来避难。我不许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拖延。

最后，约德尔和弗里德堡给杜尼兹草拟一份电报，要求授予全面投降并在签字以后四十八小时生效的权力。如果我同意这一程序，德国人就能够找到种种借口来推迟签字，并进一步拖延时间。我指示史密斯通知他们，投降必须在当天午夜以后四十八小时生效；否则我将立即实行封锁西线的警告。

杜尼兹最后看到不服从不行，于是约德尔在5月7日凌晨2时51分在投降书上签字。整个战争于5月8日午夜停止。

必要文件由约德尔将军和史密斯将军签了字，法国和俄国的代表作为见证人也签了字，然后约德尔将军被带到我的办公室。我通过译员问他，是不是完全了解他所签署的文件的全部条款。

他回答说：“了解。”

我说：“这个投降书，包括德军司令官按俄军最高统帅部规定的去柏林向俄国政府实现正式投降的条款在内，如果遭到破坏，你在职务上和个人方面都要承担责任。完了。”

他行了一个礼便离开了。

## 第二十二章

### 胜利的余波

根据投降书的条款，德军各军种的首领被指定于5月9日前往柏林俄军司令部，在投降批准书上签字。按照我们的理解，这第二个仪式象征着西方盟国和苏联的团结一致，也是向德国人和全世界宣布：德国是向全体盟国、而不只是向西方盟国投降。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得到指示说，在完成第二个签字仪式以前，不得发表第一次签字的消息。

为了使美、英两国新闻记者能够充分报道兰斯投降的情况，我们邀请许多人参加了这个仪式。他们在接受邀请时，都同意在按照盟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正式报道以前，不公布消息。有个美国记者在正式报道以前公布了消息，这使其他守信的新闻记者极为愤慨。这件事除了引起其他报刊的颇大愤怒以外，没有造成真正有害的后果。

西方盟国得到邀请并被盼望参加柏林签字仪式，但是我觉得不宜亲自前往。因为德国人已经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完成了他们无条件投降的手续，所以我认为在柏林批准投降应该是苏联的事。因此，我派了我的代表泰德空军上将代替我参加那次仪式。要把有关到达的时间、允许参加的人数及其身份以及我们的飞机飞越俄军占领区的路线等等细节安排妥当，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是这一切都完成了，于是泰德履行诺言，由一些军官、士兵、陆军妇女队员和

新闻记者陪同分乘两、三架飞机前往。几个月以后，我在莫斯科看到一部描写柏林投降仪式主要情节的电影。那部电影没有提到以前在兰斯的投降。

我在《胜利的日程》中，满怀希望地期待通过合作来解决战后问题。我在对部队和国内战线的无穷尽的支援表示感谢后，写了下面一段话：

你们经历的数百哩的路程，是以已故战友的坟墓为标志的。每一个牺牲者都是你们队伍中的一员，而你们这支队伍乃是由热爱自由和反抗奴役的共同意志聚集起来的。合作的概念和献身于人类自由事业的概念，已经使这支远征军成为如此强大的、维护正义的毁灭性力量，同样，利用这些概念就能很好地解决我们目前的和遥远将来的问题。

其他的人必然要争辩哪个国家、哪支军队打赢了这场欧洲战争，但是我不想参与这类无益的争吵。参加欧洲战争的每个男人、每个妇女和每个民族，都按照各自的才能尽到了职责，而且他们的努力已经为结局作出了贡献。我们要记住这点，以此来向每一座光荣的坟墓表示敬意，向未能活着看到这一天的战友们的亲人表示慰问。

当时或后来，我们都没有举行任何局部的胜利庆祝会。当约德尔签字以后，我们就上床作充分必要的休息，以便第二天起来处理紧接着停战而来的许多工作。无论如何，从今以后，我们的各种工作都是在充分理解欧洲屠杀已经结束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遇到的问题虽然是困难的，但我们没有伤亡名单了。

我们眼前最复杂和最急迫的问题是调遣军队。

甚至从1941年起，盟国的全球战略就主张战胜德国后同心协力进攻日本。5月7日德国投降，标志着盟国实现了第一个最伟大的目标。

现在是加速转向第二个目标的时候了。全世界的盟军已经腾

出手来对轴心国的东方一端作战。俄国仍然与日本正式地保持和平,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斯大林大元帅在雅尔塔已经告诉罗斯福总统,红军从德国投降之日起的三个月内,将参加进攻日本。

在对付被分割的敌军时,以前不止一个将领采用机动和奇袭的方法,首先集中力量攻打并击败一部分被孤立之敌,然后再以压倒优势的力量消灭另一部分敌人。但是这个简单的作战方法,从来没有在超过一个洲的范围运用过。不过这个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和在局部地区一样,都是正确的。负责将这种方法运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将领们,并没有因为部署进攻第二个敌人时,要把数百万军队和无数装备从欧洲环绕半个地球运往日本,而感到惊慌失措。

俄军的调遣就是要把大批部队通过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因为只能使用这条铁路,所以这项工作很艰巨,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但是对于西方盟国来说,把它们在欧洲陆军和空军转送到亚洲战场也是一项惊人的工作,这项工作要动用几百艘船只航行一万哩的海路。

早在1945年2月初,我们已经开始拟订实行这种调动的计划。我的参谋部人员和陆军部人员之间一直在进行磋商。到欧洲胜利日那一天,我们开始大规模向太平洋转运的时间表、先后次序早已妥善安排。

有几种因素使得至多不过是一件很复杂的事变成了更加困难的问题。为了对被战败的德国实行占领,在欧洲必须保持适当数量的兵力。亚洲战区当前急需的是后勤部队,而我们如果要迅速把作战师运往远东,我们自己就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迫切需要后勤部队。而更大的困难是我们如何贯彻本管区几百万人员平等地承担作战任务的政策。

在投降的那一天,在伟大盟军中有三百多万美军归我指挥。这

支部队包括六十一个美国师，其中除一个师以外，全都参加过实际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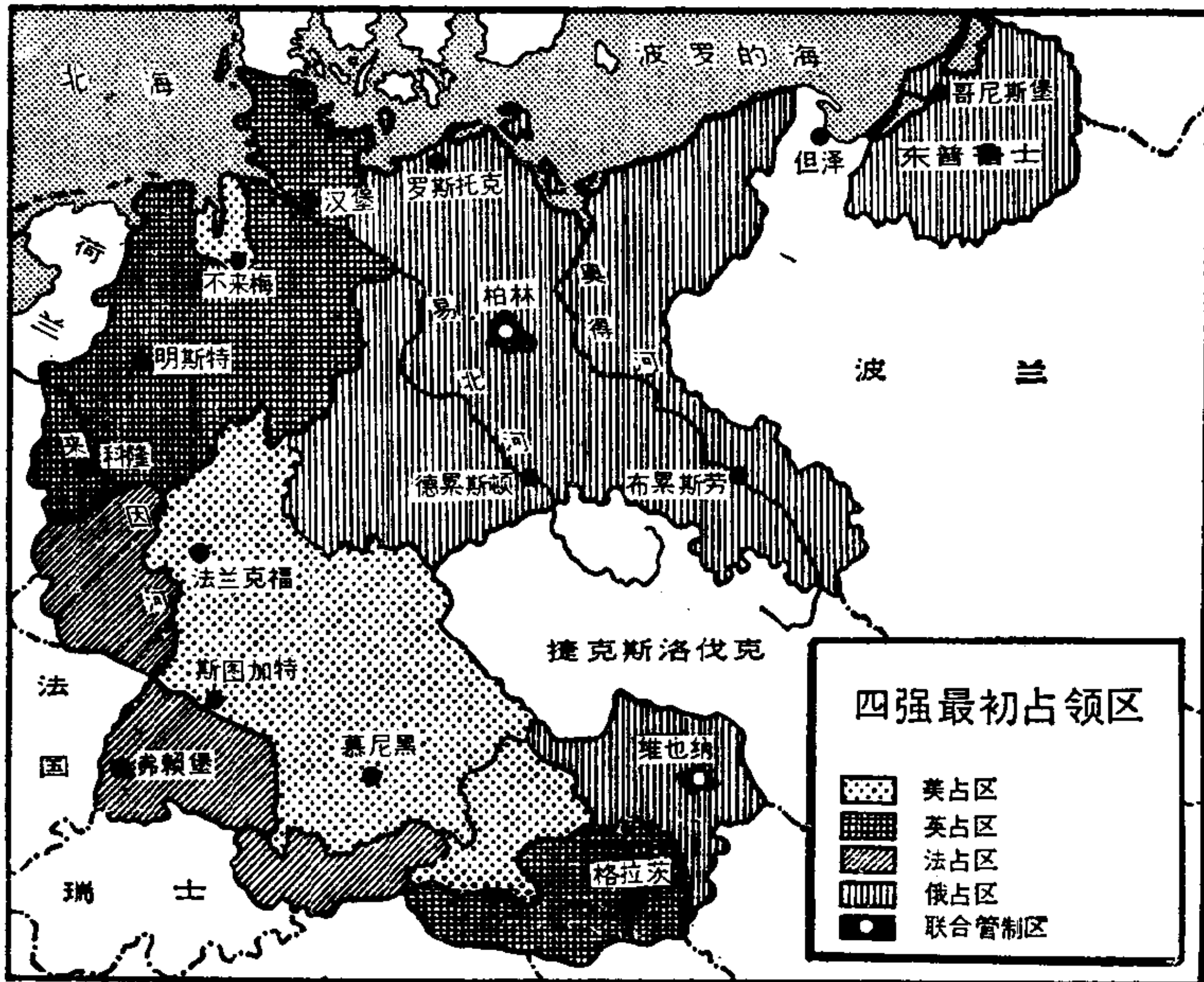
作战经历最长的士兵必须被分配执行占领任务，或被遣送回国；而另外的士兵将前往太平洋。我们的许多师是连续作战十一个月以上的老兵部队，而其中有些师，如第一、第三、第九、第三十六和第四十五这五个步兵师以及第八十二空降师和第二装甲师，都参加过地中海区战役。一些较老的师曾经连续作战两年半，而只有过短暂的间歇。现在仍然留在地中海战区的第三十四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就是这样的。

要实行必要的调整，就需要从许多久经战斗锻炼的师中抽调大批兵员，而用作战时期较短的士兵充实其缺额。同时，我们必须非常注意保持部队的效能；如果把几乎全是新兵的师整个整个地调往太平洋，那将是愚蠢的。

士兵个人是否适于留在部队或退役，这取决于根据服役期间的功绩、出国时间的长短、是否受过勋章、出身和年龄而精心制订的积点制。这个制度运用起来很麻烦，但是大概还想不出既对个人公平、又能保持部队效能的更好办法。由于陆军部认为改变“临界点”的根据是适当的，所以又产生了一种困难。这就增加了额外的工作，更不用说造成的混乱和某种不满了。

我们在欧洲的行政机构不得不朝相反的方向进行工作。基地、机场、车站、港口、公路和铁路都被动员起来加速把部队和给养运往德国的中心。说得形象点，它们必须回头朝另一个方向运转。给养和军需品分散在整个西欧、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和北非。这些物资必须加以集中、清点、打包和装船。而速度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单单这项工作就如此庞大和急迫，以致我们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指导、监督和加速这项工作的司令部。那个司令部于4月9



〔按原图译制〕

日，即在德国投降前整整一个月正式成立。

斯巴兹将军由于具有指挥大规模轰炸战役的无比经验，所以被免除了我们战区的职务，调往太平洋。远东还要求一位有经验的集团军司令官。霍奇斯将军被选中了，因为他的第一集团军在抵达易北河时，已经完成了它在欧洲的最后任务。他不仅十分能干和有经验，而且在我们的集团军司令官中，也是最早能从我们战区调离的一位。在德国投降日以前，他就离开前线，取道美国前往太平洋。

占领问题尽管是个重大的问题，但这无论如何不意味着把大量的工作移交给美军及其责任司令官们。随着战争的结束，西方盟国必须开始作出安排，把庞大的作战部队按国别划分开来。各国政府曾经拒绝过我一再提出的这个建议；西方盟国应根据一项统一

的原则各自占领德国的部分地区。我的计划被认为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虽然我坚持说，实行占领是战争遗留下来的一项工作，需要西方盟国的军队去完成，反对已经获得胜利的西方盟军留驻西德是没有理由的。但是这显然是个政治问题，我们的政府领导人认为，我的意见将会引起苏联的不幸的误解。

按国别划分部队，意味着我们必须整顿我们全部复杂的、但又是高度完整的参谋部、编制和工作程序，以便适应各国行政和职责方面的新要求。法国的几乎全部供应和英国的某些供应都依靠美国的物资和装备。由于租借法案的提前结束，必须建立详细的会计制度，以使用商业原则代替军事原则来处理这项工作。

在新近占领的德国地区内，必须迅速建立军事管制。除了这一切以外，还有管理庞大西方盟军的大量琐碎的行政工作，这一类事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就不难理解一位工作过度的参谋军官的话，他说：“我总以为，德国最后投降以后，我们会闹饮一场以示庆祝。然而现在我却每天服阿司匹灵——根本没有饮酒作乐的兴致！”

我们成天忙于日常琐事，以致对于我们举国欢乐的热情大都毫无所知。

我自己没有估计到民众的反应，在这点上我比其他许多人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投降以后不久，我想起1945年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我自己从西点军校毕业的三十周年，于是我计划为我们这些在欧洲工作的同学们举行一个简单的私人庆祝会。我认为，我们可以飞往美国，度过庆祝西点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再回到德国上班，而总共只离职三天。我以为，悄悄地去一下，在我们回到法兰克福以前，除了西点军校的人以外；美国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我兴致冲冲地希望实现这项计划，并向我在欧洲的二十位同班同学建议，希望他们每人给自己的妻子拍一个秘密电报，要她到西点军校来会

面，并在那里团聚一天。

当我正在计划实现这个想法的时候，我们得到华盛顿的指示说，因为情况不允许驻在欧洲的美军回国参加传统的胜利军队阅兵式，马歇尔将军希望我挑选有代表性的军官和士兵分批回国（每批约五十人）作短期的观光旅行。他觉得通过这些象征性的庆祝活动，美国将有机会向它在欧洲的战士表示敬意。

这道命令使我个人的计划完全落空了。我相信，所有挑选回国参加1945年6月份一系列庆祝活动的人们，对于他们所受到的热情欢迎都会感到惊讶。

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鼓舞和温暖。美国人民对待这几批人慷慨大方、热情诚挚和款待殷勤，这使他们不胜感动。至于我个人，本来满怀希望地计划6月份在西点军校作一天不算过分的团聚，现在也难以实现了。这是一个愉快的插曲；但是必须迅速回来料理繁琐的工作。在欧洲胜利日以后的几个月中，我在欧洲好几个首都参加过类似的庆祝活动，其中有伦敦、巴黎、布鲁塞尔、海牙和布拉格；另外还有一些邀请我认为是不可能接受的。后来我访问了莫斯科和华沙，但并没有参加“胜利庆祝活动”。

在1943年国务卿赫尔参加的那次莫斯科会议上，三个主要盟国已经同意立即在伦敦成立欧洲顾问委员会。这个机构将开始研究战后欧洲的政治问题，并对各国政府提出适当的建议。

早在1944年初，该委员会已在伦敦工作，并对未来德国投降条款的建议和对各国占领区问题表示一致同意，同时还赞成设立共同管制机构。美国派驻该委员会的军事顾问是科尼里厄斯·威克沙姆准将，他后来在组织管制委员会的美国小组时，成了我的代表。

根据欧洲顾问委员会所拟订的议定书，四个盟国中的每个国家将负责占领德国的部分地区，对德国的军事管制委托给由四位



陆军司令官组成的四方委员会,同时还有一个协调委员会协助他们。管制当局还设有由军官和文官组成的一些小组,这些小组的特殊使命是:解除德国武装部队的武装并使之复员,处理政治和经济事务,解决法律、财政和劳动问题,以及执行对战败国实施军事管制所必需的其他任务。

当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存在时,英国和美国是联合进行军事管制工作的。英国已在英格兰成立一个训练班,类似我们在弗吉尼亚州沙罗特斯维尔的训练班。后者已经为设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军事管制机构提供美国官员。

美国对德占领区的军事管制所需要的军官的最后培训,是在英格兰进行的。我们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内设立了一个负责协调整个军事管制工作的总的参谋部门。它由英国陆军的格拉塞特中将和美国陆军的朱利叶斯·霍姆斯准将领导。

在渡过来因河以前,我们在亚琛取得了在德国实行军事管制的初步经验。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后来在深入占领德国本土时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这是一种新的和困难的情况,而且由于我们在军事管制工作中执行不使用纳粹分子的政策,使得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尖锐。我们所必需的大部分公用事业,完全掌握在有足够专业知识的当地纳粹分子手中。当我们考虑是应该使用他们,还是使用那些对于特殊设备知道得不多或者一窍不通的非纳粹人员时,就立刻出现了问题。这是个困难问题,但是我们尽快地清除了这帮纳粹分子,训练了另一些人来掌管土木工程、公用事业、卫生设备、邮政、电报、电话等必要业务。

一个军事管制官员的生活从来是不枯燥的。由于行政或技术原因,他通常是从陆军中任命的。这种官员肩负着全镇或全城的工作,所以必然碰到各种可以想象到的人事关系问题。他在搜查盟

国需要审判的对象时，必须维持当地治安和秩序；他在按照华盛顿发给我们的那个内容广泛的盟国政策——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文件——来执行与自己职责有关的任务时，必须着手进行恢复工作或生产工作。起初，他常常不得不充当人事纠纷的仲裁人。当德国人知道我们的非纳粹化纲领后，个人之间的控诉皆以“他是纳粹分子”为理由。在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下，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与总政策的特点有关，也与当地官员具体执行政策的细节有关。但是大体来看，美国的军事管制组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反映了他们的诚实和才智，也反映他们受到了完美的专门训练。

卢修斯·克莱中将于1945年4月来到欧洲，在对德军事管制中担任我的代表。战争初期，在一个短时期里，他在欧洲战区我军的后勤系统完成了无法估价的工作。他一开始就同意我的意见，主张最后应由民政机构接替对德管制的工作，因此他的整个机构与军事组织截然分离。我们准备就用这种办法把军事管制工作移交国务院，而不必进行全盘改组。克莱将军后来继麦克纳尼将军担任驻德美军司令官，他在组织上始终保持这种区别。对于最初在德国建立美国军事管制工作来说，克莱和威克沙姆应比任何人享有更多的荣誉。从战后盟国在合作方面存在的各种挫折、阻力、形形色色的意见、不同的责任以及种种困难来看，军事管制工作应当说是完成得很出色。

根据政府一级的协商，盟军最高统帅部于7月14日撤销。我趁此机会发表了一封向整个指挥区表示感谢和告别的信。三年来，我这才开始不担任盟军统帅。此后，我的职务只限于美军方面。

在我个人的幕僚中现在又有詹姆斯·斯塔克中校参加进来。当我在刘伊斯堡的第三师时，斯塔克中校是该师的一名上士，后来被调到作战处，在那里晋升为行政官；在整个地中海区战役和欧洲

战役期间，斯塔克中校是我在陆军部的私人代表。

经过重重困难，才达成在柏林举行盟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初步协议。语言的不同、交通的不便、高级司令官之间缺乏个人接触和柏林城市因破坏而引起的住房严格限制，所有这些造成了种种复杂情况。直至6月5日，对所有这些问题经过曲折谈判之后，我们才就盟国司令官在柏林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取得较大的进展。

会议的目的只是签署我们的基本宣言，这份文件是宣告成立盟国委员会和共同承担管理德国的责任。我们以为，在我们到达柏林以前，对一些文件已经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当我们抵达那里以后，我们发现俄国人仍然认为有些问题没有解决。

会议安排在下午，在开会以前，我抓紧机会访问了朱可夫元帅的司令部，把美国政府授予的总司令级的“荣誉勋章”交给他。我认为朱可夫元帅是一个和蔼可亲而有军人气概的人。

当我回到我自己在柏林的临时住所时，发现朱可夫元帅主持召集的会议出现了意外的拖延。这件事令人恼火，因为我当晚必须返回法兰克福。我们在下午等了很久，但是朱可夫司令部派来的英语联络官没有向我们解释拖延的原因。最后，快到傍晚时，我决定把问题摊开来。因为我知道全部供讨论的文件事先都已由各有关政府研究和修改过，所以我认为，一开始就想拖延，这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因此，我请联络官通知朱可夫元帅，如果会议在三十分分钟内不开，那就非常抱歉，我必须返回法兰克福。但是，正当传令兵准备出发的时候，有人传话说，请我们去会议室，于是我们立刻前往那里。元帅对拖延作了解释，说他一直在等候莫斯科对一个重要问题作出最后指示。我们其余的人也都善意地接受这个说明，于是柏林盟国委员会在友好热诚的气氛中开始工作了。

这里的圆形会议桌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一个。每个国家的代

代表团各占圆桌九十度位置。司令官们的周围是一群军事助手和政治助手、摄影师、新闻记者以及其他一些看来只是列席的人。我的政治顾问是在北非时期相识的罗伯特·墨菲。维辛斯基先生是朱可夫元帅的第一政治顾问，他几年前就以俄国清洗审判的检察官而闻名。我们面前的每种文件都是一式四份，每份都必须由委员会的四位成员签字；在对极少的文字细节略加讨论以后，这项吃力的工作就完成了。

这时，朱可夫元帅已经为客人安排了一个经过精心准备的宴会，但是我不准备在柏林过夜。此外，我允许这么多人跟随我到柏林，以致分配给我们的狭小的寓所无法安排他们。因此我告诉朱可夫，当晚我必须返回法兰克福，希望天黑以前尽早着陆。他请求我耽延一下，到宴会厅干一杯，听红军合唱队唱两支歌。他答应迅速送我通过市区到达机场，并且说他将陪我一起去，以保证不耽误时间。

鉴于元帅对他的盟友的好客盛情，我对自己不能逗留感到遗憾。红军合唱队的歌唱得十分精彩，桌上摆满了俄国佳肴。在我离开以前，朱可夫元帅宣布，他刚才接到莫斯科一个电报，指示他说，斯大林大元帅已经批准授予蒙哥马利元帅和我以俄国“胜利勋章”，这种苏联勋章以前从未授予外国人。元帅问我愿意什么时候接受勋章，因此我邀请他访问我在法兰克福的司令部，在那里举行授勋仪式。他接受了这个邀请。我感到高兴的是，蒙哥马利机智地建议说，在整个欧战期间，他是在我的指挥下工作的，因此也愿意在我的司令部接受他的勋章。

我邀请朱可夫带若干参谋助手到法兰克福来举行仪式，随他停留多久都可以，并保证予以热烈欢迎。他回答说，他将于6月10日前来，随行参谋军官不超过十人，不过只能停留一天。因此，我计划为他和他的随员举行一个隆重的午宴。恰巧在他到达以前几小

时,我得到一个电报说,除十名参谋军官外,他还带来五名警卫官。警卫官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种官员,因此在午宴上怎样安排这五名官员使我感到有点为难。我指示管膳食的军官要灵活安排,并且说在元帅到达以后我会让他知道怎么处理。

我们在飞机场用一支仪仗队和美国陆军军乐队欢迎朱可夫,然后我们带了一名译员乘坐我的汽车回到司令部。我立即提出在午宴时警卫官的座位安排问题。我对他说,他可以让他们紧坐在他的身旁,或者站在他的身后,或者坐在桌子的另一端。把这些话翻译给他听后,他脱口而出说:“请告诉将军,他可以把他们随便安排在什么座位上。我是奉命带他们来的。”这样就非常满意地解决了警卫官的问题。

法兰克福的午宴非常成功。那是一个美丽的夏天,我首先把我们的客人带到一个广阔的露天看台上,那里摆好各种果酒和午宴前的茶点。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一次大规模的空军检阅。我们相信,朱可夫会把这次检阅当作是对他表示敬意的。我们从邻近的机场调来几百架战斗机,紧接着是轰炸机编队飞行,包括我们拥有的从轻型到重型装备的各种类型的轰炸机。在灿烂的阳光 下,这次检阅显得非常壮观,朱可夫看来深受感动。

据我们所知,依照俄国的习惯,午宴时要频频祝酒。元帅擅于辞令,至少我们认为是如此。他通过译员向盟军表示敬意,并祝愿我们在达到共同目标方面取得成功。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和法国人——人人轮流祝酒。我们至少得起立十来次。我看到大部分美国人马上学我的样子,杯内盛水,掺以红酒,使饮料的颜色足以充作真酒。

授予蒙哥马利和我的勋章我过去很少见过,我认为它与其说只具有感情上的和象征性的价值,倒不如说本身具有高贵的实价。

勋章呈星状,每个勋章镶嵌着约八、九十颗钻石,环绕在一簇人造宝石的周围。宝石中央是一个珐瑯质的、小小的克里姆林宫图案。

可以看出,朱可夫及其助手只有一个强烈愿望,这就是友好和合作。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似乎依然对与俄国人建立诚恳和亲密关系抱有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终于在猜疑和相互指责中破灭了,因而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就朱可夫元帅和我本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论,直到1945年11月我离开欧洲的时候,这种关系一直在发展。这种友谊是私人的事情,不幸的是它不代表总的态度。

从战时俄国与西方盟国接触的纪录来看,史密斯将军、克莱将军和我在1945年夏初就认为,对德联合管制的成就,无论从全局看,或是从局部看,几乎只能根据西方盟国克服俄国的怀疑和不信任的程度来衡量。政府制度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需要架桥;而且很明显,如果有关国家的政府最高一级之间不能取得相互信任和信赖,这个鸿沟就永远不能逾越。但是,如果有关政府首脑希望获得适当成就,则巨大的责任仍然要落到我们这些在柏林的人的身上。我们每日每时都要与必须达成一致协议的那些问题打交道,而且我们认识到,即使一项局部的成就,对于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在这个世界上能否找到一条共处道路这个总问题也会产生可喜的和一定的影响。因此,在私人关系和官方关系上,我们都不辞劳苦和不厌其烦地表现出守信、尊重和友好的愿望。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关于难民的这个困难问题,比起我和俄国人的私人关系来,更加迫切地引起了我的注意。所谓难民,就是由于战争而处于本国国土以外的平民,这种人中有一类渴望回家,但又无能为力,或者不予协助就找不到家,还有一类是必须遣送到敌人的或原属敌人的领土。

数十万人迅速被遣送了,这些人还不包括战俘,而只是在欧洲

某地有家，并渴望马上回家的平民。我们建立了一些临时照料他们的营房，而且在我们详细拟订运送计划的时候，还供给他们食物。

但是，我们很快就分别选定的属于难民的那些人，并不包括成千上万容易遣送的人。真正的不幸者是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落得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害怕遭受进一步迫害而不敢回国的“受害者”。后面这一类人的恐怖心情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宁死也不愿返回本国，以致发生许多起自杀事件。这些人中，有的可能已经成了叛徒，而叛徒当然害怕即将落到头上的惩罚，而其他许多人则属于受迫害的一类人，他们认为重新遭受迫害要比死亡可怕得多。

为了把即将遣送回国的难民和应该受到占领当局照顾的人区分开来，各盟国已经在政府一级制订出各种条例。这些政策和协议，最初我们试图毫无偏差地予以执行，但我们很快就看出，如果严格执行，往往会违反我们所维护的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此后，我们对于任何反对回国的人的行动，都是从好的方面为他们辩解。

在所有这些难民中，犹太人的情况最惨。好几年来，他们挨打、挨饿、受折磨。甚至给予他们食物、衣服和相当好的待遇，都不能使他们立即摆脱绝望和消极的心情。他们拥挤在一起——他们挤在一个房间里，似乎是在追求一种安全感——消极地等待命运的摆布。要使他们得到适当的容身之所、建立食物分配制和进行医疗——更不用说供给他们象样的卫生设备、取暖和灯光——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已不能再自行料理自己；什么事都需要别人替他们做。

不能回国的另一类人包括已经并入苏联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前的公民。我们在西德发现的成千上万的波罗的海人，都被归之为无国籍者；他们是因为反对

占领自己的国家而逃出来的，所以不能回国。他们相当健康、结实，十分愿意从事劳动，以改善他们的房屋和环境。属于这一类人的还有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等等。

西方盟国体谅难民的消息刚传遍东欧，立刻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涌入我们占领区。各种设施常不够使用，食物只能在维持生活的水平上实行配给，而且尽管我们作了力所能及的种种工作，改进仍然是缓慢的。

通常有些在遣返难民工作上没有担负责任的人，看到往往是力所不及的一些情况，就出于人道主义的激情，开始往美国传播一些流言蜚语，说什么部队对难民漠不关心、冷酷无情。一般来说，这些传闻是撒谎。被派去营救难民和为他们安排救济工作的好几千名士兵，都是美国人。他们得到了陆军所能提供的各种设备和援助，而且勤勤恳恳地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地球上这些不幸者办事。但是由于工作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某些所谓调查者便认为这是自己出风头的大好机会。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对于大量美国人的诋毁，正是这些美国人为了减轻许多普通难民所遭受的有时简直难以忍受的痛苦而在日夜操劳啊！

我常常带着一些司令官和我的参谋部成员去视察这些营房。我们总得在每一个营房停留好几个小时，以便直接发现缺少什么或最需要什么，并且一有可能就予以供应。

此后几个月里，逐渐有了巨大的改进；不过问题并没有解决。在参加欧战的美国老兵永远不会忘怀的所有痛苦回忆中，最为难受和更不能忍耐的莫过于关于难民的回忆和关于纳粹所建集中营的回忆。

柏林盟国委员会的第一次事务性会议于7月10日举行。委员会的主席由各方按月轮流担任，委员会中的良好气氛一开始就显



著地表现出来。意见分歧还是有的,但这些分歧绝大部分是关于议事程序或方法的细节,并且在合作气氛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任何分歧看来都不会引起巨大困难。

7月初,我们获悉不久将召开波茨坦会议。我们又必须为“最重要人物”(士兵语言)准备住所和提供警卫,但是这一次我的任务只限于接待和照顾美国代表团。我到安特卫普去迎接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来欧洲乘坐的巡洋舰。在那里,我有机会和他们讨论我认为重要的几个问题。

第一,我极力主张民政当局应尽可能早地接管我们对德占领区的军管工作。我向总统和国务卿指出,在秩序有保障以前美军显然必须留下来实行管制,但管理居民日常生活并不是军队的职责。我觉得不管陆军多么有效和勤恳地专心于这项工作,误会肯定会发生。从长远观点来看,国务院承担着在德国的全部责任,而在那里只利用美军作为民政当局和行政方面的助手和支持者,这会最符合美国的概念和传统。总统和国务卿原则上显然都同意我的意见,我深信在几个月内将发生这种变化,所以很受鼓舞。

当1945年底我回到美国担任陆军参谋长时,我继续向国务卿贝尔纳斯极力陈述采取这个步骤的明智性,不过我知道他已经改变了主意。虽然他在原则上始终赞成,但由于这样做会把后勤的和财政的重担转嫁给国务院,所以不同意实行这个建议。

我大胆地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第二个建议涉及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意图。我告诉他,各种报道都表明日本的崩溃近在眼前,所以我反对红军参加这场战争。我预见到苏联参战后要产生的某些困难,建议最低限度我们不要使自己处于要求或乞求苏联援助的地位。我个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红军参加那次战争,除非在他们参战以前胜利就已经来临。然而,我当时并没有预

见到将来在意识形态对抗方面的残酷斗争，也没有预见到由于这种斗争而引起国际合作的瘫痪。我只是担心会产生严重的行政纠纷，担心俄国可能会重新提出对远东的老一套要求和目的，从而使我国感到非常为难。

我向总统提出的第三点建议是，我们与法国和英国的租借协定的期限要保持某种伸缩性。我并不熟悉涉及这个问题的确切的法律条款，但是我知道，单因战争的停止，并不能立即和稍许减少法国和英国对于他们早已确信能从我国得到的大宗粮食和供应的需要。我认为，应该避免随意地和突然地结束协定，而应该提出一项方案，使两个国家有机会作出迅速调整。

我告诉总统说，我认为，只要德国人愿意劳动，就给他们提供谋生的机会，我们应当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德国经济问题、特别是赔偿问题。毫无疑问，他们是愿意劳动的。从我们进入德国的那一天起，就可以看出，普通市民为了贫苦的生活而愿意从早到晚进行劳动。甚至在我们渡过来因河以前，我已经看到德国妇女及其孩子们在断断续续的炮火下在田里锄地和播种，以便在当年能多少生产出一点粮食来。

克莱和我都确信，鲁尔的恢复对于我们是最为重要的。欧洲没有哪个地方的煤矿有这样好的质量和如此易于开采。而且事情已很明显，煤是对被占领的德国实行有效管理的关键。没有煤，就不能恢复运输，没有运输，整个国家就将继续瘫痪。我告诉总统，如果我们不着重恢复鲁尔，德国马上就会发生饥荒。当然，美国人决不会让自己以前的敌人挨饿，并且将自愿承担代价很高的任务来供给他们食物。不过我认为这种财政负担是可以防止的。在我看来，如果鲁尔煤的生产被推动起来，运输又得到恢复，德国就马上能够输出轻工业产品，而丝毫不会涉及被禁止的军火工业。这

些产品的货款将能使它从其他国家购买和输入足够的粮食，以应付不可避免的匮乏。

在波茨坦，我曾几次拜访美国代表团各方面的成员，但是因为欧战已经结束，我既没有作为正式证人，也没有作为顾问参加这次会议。

我和陆军部长史汀生作过长时间谈话，他告诉我，美国科学家终于制成了原子弹，短期内就要在新墨西哥州进行试验。试验成功的结果立即用海底电报通知了陆军部长。他获得了莫大的安慰，因为他显然密切注视着原子弹的制造，并对这项工作所花费的大量金钱和资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我希望我们必须永远不对任何敌人使用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不愿意看到美国把某种被描绘得象这一新式武器那样可怕和毁灭性的东西带头用于战争之中。此外，我错误地抱有一种模糊的希望，即如果我们在战争中永不使用这种武器，那么别的国家也许始终不知道核裂变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有大批科学家已在从事制造这种武器，这个重要问题的秘密早就不可能保持了。我的观点只是我个人的和直接的反应；这些观点不是以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分析为根据的。无论如何，如果日本不按照波茨坦会议通知日本政府的要求立即投降，则使用原子弹的计划就将付诸实施，这点是已确定了的。

当总统在德国的时候，他表示希望视察某些美国部队。我为他进入美国占领区作了安排，第八十四师幸运地被选定为他视察的部队之一。他的堂兄弟路易斯·杜鲁门上校是那个师的参谋长；因此，这样的集会对于总统来说，不但是一次愉快的正式视察，而且还进行了一次亲切的私人接触。

有一天，当总统同布莱德雷将军和我坐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他突然议论起我们某些军事将领的前途。我告诉他，我除掉退役回

到宁静的家庭以外,没有任何奢望,我可以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来帮助我国人民了解战争已经给世界带来的某些巨大变化,以及由于这些变化的结果而落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不可避免的责任。我永远忘不了总统的回答。在此以前,我只偶然见过他两、三次。我曾与他非正式地共进过早餐,我觉得他为人诚实、热情,而且性格非常愉快,使人乐于交往。现在,在汽车里他突然对我说:“将军,如果你有所求,我一定予以协助。明确而具体地说,包括1948年的总统竞选在内。”

总统的这个建议显然是真诚的,而且确实是令人震惊的,我不相信国内有哪个军人的心灵曾受到过一位总统如此突然的冲击。有时和朋友们交谈,他们早就开玩笑地向我建议,可以在政治上谋求发迹。我的反映总是当即予以拒绝,但遇到总统突然向我射来这发舷侧炮,我除了把它当作一个绝妙的玩笑——我希望是这样——外,真使我无法招架。我不胜感激地笑着说:“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将是您竞选总统的对手,但不会是我。”毫无疑问,我的态度是认真的。

波茨坦会议在与会国政府一级的合作气氛中结束,这种气氛在各级军政机关中得到了响应。在我们与柏林俄国当局的各种来往中,我们特别注意一丝不苟地履行每一项即使只是暗示过的或领会到的委托和诺言。8、9、10三个月,当地普遍出现了一种气氛,它鼓舞我们相信最后获得圆满成功是可能的。但这不是说就没有令人烦恼的事了。相反,为了达成某种进展所必须的一致协议,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在正常情况下,英国人和我们一般说来是意见一致的,虽然我们偶尔也有尖锐的分歧,这是不用说的。我们与法国人在对德实行集中管理这个基本问题上总是意见不合——我们赞成,法国人反对。而我们与苏联

当局的关系,除了一些同样偶然的基本分歧外,他们还经常要我们对他们的抱怨提出理由并进而要求作出解释,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简直层出不穷。

苏联当局经常写信向我们发牢骚的问题之一是,他们硬说美国飞机擅自在俄国对德占领区上空飞行。为了我方飞机出入柏林,俄国人给我们规定了一条狭窄的走廊,只许我们的所有飞机在这个被限制的范围内飞行。常常有些新飞行员,由于不熟悉这个地区,在飞行中就会稍微越出规定范围;而在阴云密布的天气里,甚至最有经验的飞行员也可能在技术上偶尔违反协定。俄国人定期向我们提出关于这些所谓违约事件的详细的记录,这些事件是如此之多,以致根本没法专门进行调查。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极力提醒我们的空军部队在这方面要小心谨慎,但是最后我还是去找朱可夫元帅,并对他说,我认为这些违约情况不是一贯的,也不是故意的,这些小事不值得使我们双方经常注意。我还指出,每一次事件发生,他都要给我写信,然后我又必须费劲地给他复信。他马上同意我的意见,认为那是些小事,用不着浪费我们的时间,但是他解释说,所有这些违约事件都是由俄国防空部队向莫斯科报告的。他说,这种部队是与其他地面部队分开的,而且不归他指挥。当这些报告送到莫斯科以后,又送回给他,然后责成他要求我作出答复。这看来是一种令人惊奇的制度,但我认为这种做法与俄国权力过度集中是相符合的。不管怎样说,我告诉朱可夫元帅,要是继续给我写信,我就按老一套答复。他说,那也很好。

我们当时鼓励进行社交性的访问,特别是在美国人和俄国人之间;对于这种来往,看来双方都颇为赞赏。俄国人喜欢应酬和非常爱好各种音乐;因此,宴会上的谈笑、叙情和演奏都使得所有这

些交往获得了成效。

据报道,在伦敦外长会议上,国务卿贝尔纳斯和莫洛托夫先生发生了尖锐的正式分歧。在这件事上,我们得到了另一个教训。柏林的俄国人突然表现出一种不自然的和生硬的态度。已经收到美国人的宴会请帖的红军军官,或是谢绝,或是不能守约。以前那种愉快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看来没有哪个俄国人再被准许向美国人微笑或者与他们进行愉快的谈话。这种气氛持续了好些日子,但是后来又莫名其妙地一扫而光。然而,这一事件对于朱可夫元帅和我并无影响。我们之间继续友好交往,并在这个基础上处理我们的公务。

在夏季和初秋的那几个月里,我与战时的许多英国同僚保持着接触和友谊。英国陆军部允许我把私人的英国军事助理詹姆斯·高尔特上校留用到8月底。他是一个热诚、忠实而又能干的军官,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每天肩负着大量繁琐的、有时是令人恼火的工作,如果没有他,这些工作早就落到我的身上了。

另一个我仍然偶尔与之商谈事务的不列颠人是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他在最困难的战争岁月里对我作了有力的支持。他是丘吉尔先生担任国防大臣时最接近的助手,是大不列颠杰出的军事人物之一。当时伊斯梅是战时内阁枢密大臣兼英国参谋部的领导人,其地位在美国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通过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提请首相及其主要助手注意。所以,他一心一意维护盟国团结的原则,而他个人也赢得了他的美国同事的信任和友谊,这都是很幸运的。他是那些因才华优异而注定要在整个战争时期身居参谋要职的人物之一。因此,他的名字可能被人忘记,但是他对战争的胜利所作出的贡献,可以与那些名声已家喻户晓的人物的功绩相媲美。

当丘吉尔先生的政党在1945年夏季的英国选举中失败，他本人不再担任首相以后，他决定进行短期休假。在整个战争年代里，丘吉尔已受够了所担负的重大责任的折磨，现在随着官方职责的结束，他希望而且需要进行短期休息。我感到高兴和荣幸的是，他要求我接待他；他的要求意味着他感觉到了我曾经对他稍微表露过的莫大的尊敬、爱戴和崇拜。我安排他在我们占领区中最舒适的一个地方休假。我经常感到幸福的是，我能够在几天的时间里作为他的私人东道主，稍微报答他对我的坚决支持和一贯谦恭的深情厚谊，至于他个人对我的殷勤款待则更不用说了。

我有时会见布鲁克陆军元帅、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泰德空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先生、蒙哥马利陆军元帅以及在战时和我共过事的其他英军领导人和高级司令官。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十分奇怪，虽然我们大家都是老于行伍的军人，但谈起话来很少追忆战争事件。甚至在那时我们似乎都已经感觉到，未来的和平问题甚至比我们在战时必须克服的各种巨大困难还要复杂得多。因此，我们的谈话几乎总是涉及到未来的各种可能性，而谈得特别多的，是关于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建立明确的和相互遵守的协定的前景。

在这些月份里，美国的访问者也经常不断涌入我们的司令部。这些访问者中有国会的一些委员会和各种官方的和半官方的团体，他们来搜集有关战争指挥方面的材料，或者听取有关当前行政工作的详细情况。我们总是愉快地接待这些访问者。我们给他们提供进行调查所必需的各种方便，向他们开放我们掌握的所有情报。他们也总是把国内消息带给我们，还经常十分妥善地给司令部的成员带来家信。这点特别表现出了他们对我们的深切关怀，因为通过他们带信，只要一、两天就可以到达，而通常的邮件，由于数量太多，有时需要两、三个星期。

## 第二十三章

### 作战探讨

1945年夏,我们的主要工作虽然是重新部署部队,建立占领区和执行与我们的使命直接有关的许多次要的任务,但与此同时,我们还从事了战争遗留给我们军人的一项业务,即探讨和评价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

我们遇到的材料极为丰富,内容也很珍贵。地中海战役和欧洲战役在战争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美国陆军在这两大战役中,参加了自1775年建军以来无与伦比的军事行动。

为了在非洲和欧洲作战,曾组织了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这支部队以四十七个步兵师及其炮兵为主体,另外还包括十六个装甲师、四个空降师、一个山地作战师和四个驾驶登陆艇的海上运输旅,另外还有两栖部队、战斗工程兵部队、独立高射炮营、野战炮兵和防坦克炮营。这两个战区的美国空军力量的增长也是惊人的;从我们参战到德国投降这一期间,我们的战斗机逐渐取得了对德国空军的优势,我们的轰炸机突破了德国人为了对付它们而设置的一切防御。

洲际通讯系统、运输系统及后勤系统都已建成,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几百万敌国国民的军事管制机构。为了作战,需要与外国的民政部门——这些民政部门与我国的迥然不同——进行协调工作,需要和各盟国部队进行联合参谋工作,需要在我们自己的军事



机构内部采取新的战略指挥方法，还需要从事很少委托给一支战斗部队去进行的外交谈判。战前对陆军规定的任务，都未能充分预见在抗击欧洲轴心国时所遇到的五花八门的工作。探讨这次大战中的成就和错误会使我们得到很多教益。

各次纯粹的军事行动构成了一个范围广阔的和持续多月的进攻。需要对这些军事行动的经验教训进行评定和估计。对盟军提出的任务是迄今一支军队在战场上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任务。从北非起，经过西西里和意大利，直到突击“欧洲堡垒”，我们的部队必须从滩头登陆，甚至要在没有一个堪足利用的港口的支援下奋战多日，还要面对敌人的优势地面部队来巩固自己的阵地，最后才发展为一支能够彻底消灭敌人的兵力。

在所有的战役中，尤其是在西欧战役中，我们的指导方针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线冻结，否则会使我们的部队陷入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阵地战的对峙局面而不能自拔。在这次欧洲大陆上进行的任何一场战役中，时常出现供应线紧张的情况，这严重地妨碍了我们继续不断地发动猛烈的和决定性的进攻；在这样的时期，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僵持状态。但是盟军并没有使这些僵持时期发展成为持久的和令人厌倦的消耗战，这种战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使欧洲耗尽元气。我们经常把火力、机动性和空军威力三者结合起来达到我们的目标；对这种做法必须详加审查，并把这种做法的有效使用总结为一些原则，纳入我们的军事理论。

我们的武装力量除了发动规模空前的两栖突击外，还克服了被公认为无法攻破的自然障碍和要塞。在非洲、西西里和意大利，我们遇到的自然地形，就其特点说，是适合于防御战的。在突尼斯丘陵地带、埃特纳火山肩状部和亚平宁山脉，有几十个险要地点，在那里，一个营就能阻止一个集团军前进。在西欧，整个来因河由

于其北部有容易泛滥的荷兰而得到加强，因而在二十个世纪，它一直是在对德国本土发动军事进攻时的最强固的障碍。但所有这些自然障碍都被克服了。

不仅如此，在西欧，盟军两次以猛烈的炮火突破了用最卓越的战术技能和工程技术设计的要塞。不论是突破“大西洋壁垒”，或是突破齐格菲防线，在军事史上都是出色的战绩；对参战的部队来说，在十个月内摧毁这两大防御阵线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就。

对固定防御工事和要塞的价值表示异议是容易的。中国长城、罗马城墙和马奇诺防线，最后都未能达到防御的目的。但是在前线的任何一个特定部分，任何一支采取守势的部队，只要有精心构筑的防御工事这个有利条件，它就好比没有掩护的对方享有巨大优势。

在进攻“大西洋壁垒”时，我们在选择的登陆区发起了突然袭击，并且为使开始突入获得成功，我们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集结了强大的兵力。敌占区的防御要塞往往缺乏纵深，这些要塞一旦被突破，我们的空军和海军就能保证我们利用滩头以集结实力。此外，大部分德军由于其交通线以及横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桥梁被摧毁而陷于孤立；当我们的增援部队蜂拥而至时，德军就难以支持。

齐格菲防线更为强固。其防御工事包括广大的布雷区、交错的障碍网、防坦克壕、隐蔽混凝土碉堡和设防严密的机枪阵地，这些工事受到大炮和辅助武器的支援，被最完善的交通系统联成一体，还受到一条可靠的供应线的支持，在这条供应线上，可以迅速地调动增援部队和运送弹药。在某些地区，有纵深达数哩的防御要塞。在另一些地区，还利用河流作为障碍。

突入和突破这样的要塞的任务，是进攻部队所遇到的最严重

的、几乎是可怕的问题。战争中没有轻而易举的事。作战中有了错误，总要付出伤亡的代价，并且部队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司令官的失策。1945年冬季，齐格菲防线的某些部分虽然是由仓促组成和未经充分训练的防御部队守卫的，但是在广大范围内突入这条防线，并在实际上消灭其守军，这一功劳不但要归功于盟国士兵和部队卓越的作战能力，而且还要归功于他们所属的师、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各级司令官的决心和专业才能。

1945年5月8日，到达易北河畔的盟军是历来集结的最强大的军队，其左翼伸展至波罗的海，右翼远及阿尔卑斯山脉。盟军的后面有大批飞机，其数量比几年前全世界的空军总和还要多。它的供应线和交通线遍及法国和联合王国，并且一直扩展至这两个国家的每一个城镇。它的兵力还受到另一支胜利大军的支援。南方的阿耳派恩山口是古代战争的传统道路，亚历山大指挥的在意大利战役中久经考验的百万大军，也在强大的空军、海军和远洋供应线的支援下，源源不断地从这个山口经过。随着德国的投降，这两支军队停止推进，他们这时的联合力量完全证明了民主国家的实力，这是战争的一个明显教训。

过去有人宣传过，而且在我们的时代还将有人宣传：民主国家萎靡不振，害怕打仗，生产力赶不上组织起来的经济，不愿为共同事业作出牺牲，但是，地中海区战役和欧洲战役的胜利，完全戳穿了这些谎言。

地中海区战役和欧洲战役中的一个首要的和最难忘的经验就是证明：几个国家结成联盟能够有效地进行战争。历史上的困难已被克服，在这方面，有些到1942年秋季还存在的严重怀疑，现在已经烟消云散。各国政府及其附属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机构已汇集成一股巨大力量，这里找不到由于各国利益的分歧而引起的重大

困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期间，盟国的效能证明，建立和使用一种能经得住战争最严峻考验的联合管理机构是可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各盟国的最高领导愿意排解影响联合战略物资之使用的各种民族主义性质的纠纷；第二，愿意在这个战区任命一位受到最大程度支持的统帅。这两点做到后，战争的胜利就有赖于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的远见卓识、领导才干、指挥技术和判断能力；如果上述两点做不到，结果就只能是失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两国通过其部队在许多次陆、海、空战斗中的并肩作战，都体会到了这些真理，并已将其付诸行动。战争后期，法国部队与许多其本土早已被敌人占领的国家的分遣部队一样，也参加了这个联合军事行动。

不幸的是，与苏联部队的合作并不那么紧密。但由于其部队在地理上与西方盟军远处两地，所以在全面的协同行动中，这个缺点并不妨碍我们向胜利进军。即使如此，如果那个国家能象别国一样紧密配合的话，也许会更早赢得胜利，和平会建立在更加可靠的基础上。

盟国的团结以及取得这种团结的方式和方法，虽然是这次战争的主要经验教训，但在陆军内部，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那些纯粹影响军事概念和军事原则的经验教训。如果在参战人员对战斗记忆犹新之时我们能对每次战斗作出探讨，并对战术上的成败予以直接审查，就能给战争科学增加大量的实际知识，这样就会以最少的牺牲迅速赢得军事胜利。

为了这个目的，在战争一结束，我们就立刻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是我们能物色到的一批最有经验、同时又最有进取心的军官。委员会开始由杰罗将军领导，后来巴顿将军

接替了他。

为了使陆军部能掌握我们所能提供的、可以永久使用的一切事实,并取得在战斗方面、在战场上的给养工作和后勤工作方面最有经验的人员的意见,我们给委员会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还给它提供了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全部时间。

军事经验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飞机在作战时所起的卓越的和日益增长的作用。在欧洲战役中,对空军的使用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和有价值的方法。它在削弱德军力量方面所显示的效果,在盟军和俄军的前线上都能明确地感觉到。此外,特别是当我们于1944年秋季在法国和1945年春季在德国迅速冲击和横越两国国土时,飞机尤其是一种宝贵的后勤工具;如果没有飞机,就决不能以那样的速度追击,也不可能追击中获得那样显著的战果。

当1944年12月德军反攻时,在12月23至27日这段最危急的时期内,如果不是飞机运送八十万磅物资给守卫巴斯托尼这个重要公路中心的第一〇一师,该地早已沦入敌手。1945年3月24日,当我们进行被称为“大学”的一次最大空降行动以支援蒙哥马利渡过来因河时,出动了一千六百二十五架次飞机和一千三百四十八架次滑翔机,把二万二千多名士兵和将近五百万磅装备投入了战斗。飞机也成了获得敌人情报的最宝贵工具,它不但从敌人的主要基地获得情报,而且也从实际战斗的前线获得情报。空中摄影甚至能查出防御部队和进攻部队的细小部分,同时我们的技术已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我们的部队在几小时内就能利用以这种方式获取的情报。

占绝对优势的空军和拥有车辆装备的陆军的巨大机动性,这两者的结合使用使我们能在绵延几百哩的前线打击任何一个选择点。当德军在阿登反攻时,我们的灵活性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巴

顿的集团军停止了向东面进攻的准备,变动了战线,并且将部队在同原先的进军方向形成直角的六、七十哩范围内进行调动。当巴顿的参谋部接到命令后不到七十二小时,其集团军的一个整军已经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

科学家和发明家以几十种方法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在滩头登陆时,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即有了新式的海军装备和坦克,这种坦克甚至在离滩头几百码之处被放下水,就能浮游登岸。在战争结束前,我们大量使用了重量很轻的无座力武器,它能发射威力强大的弹头。

我们一方面研究了新式车辆、新式武器以及新的运输和通讯系统对于作战行动的影响,同时还重新检定了取得军事胜利的一个基本因素——士兵个人——的作用。

受过训练的美国兵具有几乎是独特的品质。他们主动、机智,能适应变化,善于利用有利条件,因此,当他们精通所有正规作战的技术后,就会成为一个最难以对付的战士。即使如此,他们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所以保存士兵个人的战斗力和部队集体的战斗力,就成为领导的一项最重大责任。

久经战斗的部队一般要比初次参加战斗的部队的战斗力更强。然而,作战经验并不会产生对战场的爱好;老兵和新兵一样,也不愿进入子弹横飞的地区。老兵的确更善于利用由火力、调动和地形提供的有利条件。他们已锻炼得沉着冷静,不会因战斗的混乱和挫折而惊慌失措。但如果他们作战的时期过长,不但会使体力疲惫、精神不振,而且其中最勇敢善战的士兵——他们是天然的领袖——的伤亡率会开始异常迅速地上升。因此,必须定期把部队从前线调回休整,才能保存其战斗效率。

在意大利和欧洲西北部,我们常常做不到这一点,有时一些团

和营不得不超期留在前线。有的师承担的战斗远远超过了它们应该负担的部分；第三十四师、第四十五师、第三师和第一师的战斗天数遥遥领先，一般在四百三十八天和五百多天之间；这些师的伤亡率也相对的高。

旷日持久的战斗必定会产生有害的后果。如果一支部队在体质和精神过度疲劳、伤亡过分严重以前调出前线，经过新兵补充，就能随时重新参加战斗，而一支在前线作战过久的部队，比之前者，就不会那么快地重返前线。此外，让前线的士兵定期休整，对士气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在任何战争中，部队的士气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

早在北非战役时期，就能明显地看出，士兵个人的体力和精神对战斗的胜利犹如武器和训练一样重要。随着我们进攻的加剧，部队中患战斗神经官能症的人也惊人地增多起来。

在战争开始时，陆军中正规军和非战斗部队的普通军官过于相信一种单纯以娴熟掌握技术为基础的表面训练。当一些司令官奉命去处理触及人类灵魂的问题——诸如愿望、理想、内心信仰、爱好和憎恨——时，总是犹豫不前。不管司令官们多么认真地想去影响一个士兵的习惯、训练和行为，或去赞扬他英勇刚毅的品德，他们总是唯恐人们可能把这种行动诋毁为“说教”，因此在这方面都几乎畏缩不前。

对哲学的深刻的理解，倒不一定是一个有成就的军事将领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但是可以肯定，如果一个国家的军队对国家的幸福和个人与整体关系缺乏简明的和共同的理解，那么取得胜利的代价肯定要增加，胜利本身也将遭到严重危害。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需要由那些访问过某一集团军后方的医院和军官职位复审中心的人以及访问过前线的人来证明。在各

战斗区内，盟国士兵虽然忍受着艰难困苦，但他们仍是临危不惧、信心坚定，甚至怀有一种似乎永不丧失的自豪感，沉着有效地执行着他们的任务，一个访问者常常为此而感动。不管这个为国效忠的士兵是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法国人或是波兰人，谁见了也都会受到感动。

在后方，医院和营房设施必须把自伤的以及患歇斯底里症、精神病和性病的人另外集中，因为根据医生的说法，这些病症有时是故意染患的。他们的比例虽小，但总数很大。对一个司令官来说，到这些地点去访问，进行个别谈话，了解他们受恐慌、惧怕和失败主义折磨的原因，都是有好处的；这种人实质上是害怕生活，虽然有人认为他们是害怕死亡。他们之中有很大一批人听到一句鼓励的话，就会立刻产生良好的反应。不止一个人，当他一旦了解到别人的利害与自己有关时，就对我说：“将军，让我离开这里；我要归队。”粗暴生硬通常会加剧这类病症，而谅解关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治好这类病症，并且在我看来，如果及时采取关怀态度，还能大大防止这类病症。

在战争中，时间是首要的。大量的工作等着去做。完美的技术和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效率是如此容易被人看到，以致各级军官对个人不能够予以或者不予以足够的重视。但重视个人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尤其因为美国的人力不仅仅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在今后的任何全球战争中，它的人力总是不够用的。

我们的军事学校，在这个方面对教导军官规定有明确的任务。不管国家的教育制度取得多大的进步，陆军的本职总是赢得战争。因此，陆军不能泰然忽视经验已证明对胜利有重要意义的任何课题。

我们刚才正在探讨的作战方法、军事装备和破坏力方面的所



有这些发展,如与原子弹引起的革命影响相比,似乎都是次要的革新。在欧洲战区没有用过原子弹,也从未打算在那里使用。然而,即使我们没有实际使用的经验,当第一枚原子弹于8月6日在广岛爆炸的报告传来时,我们思想上都肯定战争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许多战争的陈旧概念眨眼间一扫而光。此后,一个侵略国的目的看来是储藏大量原子弹,以出其不意的方式用它们打击预定受害国的工业网和居民中心。进攻的方法着重于投掷的可靠性、威力和准确性,而防御的一方则努力防止这种投掷,并以它储藏的原子弹反击进攻者的国土。未来的战争对地球上的人类意味着什么,甚至德国的那些被炸毁的废墟,似乎突然也变成了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警告。

我的看法和希望是:这个最近的经验教训和连续六年战争带给世界的其他经验教训将使世界各地的每个人确信,在国际领域内放弃使用武力是必然的。当我看到地球上的人类发动的这场有史以来毁灭性最大的战争时,就产生一个日益强烈的希望,即但愿这种似乎是达到极限的破坏力的发展,将迫使人们为了保存自己而去寻求消灭战争的方法。也许认为恐惧,即认为全人类的恐惧可能会完成政治家和宗教的未竟之业的想法,只是个愿望而已。

## 第二十四章

### 俄 国

在战后，美国和俄国成了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这个事实影响了美国在被征服德国的每一项大大小小的官方活动，因为两个强国之间任何持久的斗争，都将使我们在德国遇到的问题无法挽救地日趋复杂，甚至可能使我们代价昂贵的胜利化为乌有。何况涉及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对德国实行的行政管理或者说政治管制的力量。

新赢得的和平可以维持多久，联合国能够取得怎样的一种体制，甚至文明的前途怎样发展，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都清楚地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东方和西方是否有能力在一个世界里共同工作和共同生存。

从美国和俄国的过去的关系来看，没有理由对未来表示悲观。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维持着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可以追溯到美国成为独立共和国的那一天。这两个国家，除了短时期外，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两国都不具有以武力缔造殖民帝国的污名。它们之间转让了富饶的阿拉斯加领土，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国际事例，当时不存在威吓，转让后互相间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指责。它们在战争中曾经两次结为同盟。自从1941年以来，它们相互依靠，取得了欧洲轴心国的最后胜利。

然而，从意识形态上说，这两个国家是完全对立的。美国致力

于一种以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制度；而致力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在西方看来，则属于少数人实行绝对统治的国家主义。同样，他们也可能认为，我们遵守的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容许剥削群众的、不成熟的政治。由于这两个大国的政治制度的不同，全世界可能发展为两个敌对的阵营，它们的矛盾最终将引起另一次战争灾难。但是，如果这个鸿沟能用有效的合作方法确实予以填平，世界的和平与和睦就有了保障。倘若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信赖能够得到发展，各国之间的其他分歧都不能成为对世界和睦与和平的威胁。

美、苏关系中的障碍、猜疑和对失败的担心，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果美、苏两国的关系不能改善，情况看来可怕得难以想象，因此我们每一个执行占领任务的人都在寻求一切可能使两国关系获得进展。

我们认为，柏林是发展国际和解的实验室。在这里，西方和东方已经联合起来，正在重新组织一种高度复杂的经济体系，正在重新教育大批的人遵守政治行为准则，以使德国在清除了它的侵略欲望和侵略能力后回到国际家庭中来。

如果这个努力能够产生出友好地解决我们在德国的分歧和问题的方式和方法，那就朝着友好地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在我们看来，我们为美、俄两国建立共事关系而作的贡献，使我们已取得的一切成就相形见绌。我始终坚持这方面的努力，并且确信联合国终将取得成功，我在这两点上的根据是我作为最高统帅的经验。

我在担任最高统帅时，曾看到很多国家共同实现了一种稳定的、有目标的团结，尽管作为单个的和独立的国家来说，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目的、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把指挥军队

作战的权限和将其投入战斗的权限——这是国家主权的最重要标志——都委托给一个唯一的权威。它们虽然保留了对自己军队的行政管理，有权任命司令官乃至确定军队口粮，但盟军最高统帅部按其战斗任务即赢得战争胜利方面来说乃是一个单一的机构。为了支持一个代表所有参战国的单一的统帅，那种在采取联合行动以前必须经委员会一致同意的指挥方式已被抛弃。

战争时期的经验表明，如果参战各国愿意把它们的一部分权力交给有权执行它们的决定的一个单一的统帅部，它们就能达到一致的目的和采取统一的步骤，而且不会危害各自国家的独立。在建立新的联合国和组织盟国管制德国的机构方面，这个经验还没有被采纳。如果这个经验被应用，那将意味着成立某种有限的、联合的世界政府，这样的政府，按照西方盟国的战场经验，虽然是取得胜利的唯一可靠途径，但在政治上有关的大国都难以接受。1945年6月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坚持保留了否决权，这一主张的基础就是这个传统的、然而陈腐的概念，即认为只有委员会一致通过，才能决定国际的行动目标。在柏林，甚至一些细小的问题也需要这样的一致同意。

因此，我们的主要希望是，在那些参加占领德国的人员中建立一种友好的态度，把对方看作是努力用和平方式取得共同的见解和共同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相互间的利益)的一些个人。一旦这种精神能够在柏林发扬，它就会越出德国的范围而传播到我们自己国家的首都。各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上表现的国际友好气氛，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学会象朋友那样在会议桌上处理我们的事情，我们便能最终象朋友那样共同生活，并且以世界协作的精神共同工作。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暂时妥协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总统及其一行于8月2日离德返美。几天之后，华盛顿通知

我说，斯大林大元帅邀请我访问俄国。这是第二次邀请，原先一次邀请是在6月初，当时陆军部命令我必须去美国，所以未便接受。对这次邀请我国政府已作了表示，希望我能接受。

大元帅建议，我的访问应包括8月12日这个特别的日子；他暗示这天在莫斯科将举行全国体育表演。我感到高兴的是能够趁此机会参观一个过去从未访问过的国家，但是我更高兴的是，这意味着苏联政府象我们一样，对于发展友好往来也很关心。我立即接受邀请，并被告知：朱可夫元帅将是我在俄国逗留期间的官方东道主，他将从柏林陪同我去莫斯科。

我将进行访问的消息在司令部传开时，差不多有数十人提出个人请求，要求和我一同去。鉴于莫斯科接纳的名额有限，这次访问我只带了克莱将军和我的老朋友戴维斯准将，另外，我还要我的儿子约翰中尉当我的侍从副官，他在欧洲战区服役已有好几个月。他的司令官批准了。战争期间一直为我服务的士官长德赖也是随行人员之一。

抵达莫斯科后，我们下榻于美国大使馆，和我的好朋友哈里曼住在一起，他当时是驻苏大使。女主人是他的可爱的女儿凯思林。在长时期的战争交往中，我已经对哈里曼先生的才能和为公众服务的态度有很好的印象；在我对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进行重要访问期间，有他作为我的顾问和向导，使我感到高兴。

我们首先和红军参谋长安东诺夫将军举行了会谈。他把我带进他的作战室，向我解释红军在远东的部署，告诉我具体的战役计划，这次战役仅在几天以前才开始。在满洲地区的所有地方，战事正在按照计划进行，安东诺夫相信，战争将会迅速而轻易地取得胜利。我们在极为友好和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讨论了军事问题，会谈一直继续到深夜。

第二天早晨预定举行盛大的体育表演。表演地点是红场，那是一个面积相当大而路面经过铺设的广场。到场的人只有政府特别邀请的客人和表演者。表演者据估计有两万到五万人。但据我估计，两万人的数字更接近于真实。

群众不许入场，整个地区由军人严加防卫。几百名观众被指定在象看台一样的地方，那里没有任何座位。每个人都必须站着。我们刚刚登上为美国大使及其一行准备的混凝土看台时，安东诺夫将军前来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斯大林大元帅愿邀请我和他一起登上列宁墓。因为我是和美国大使在一起，他作为总统的代表，其声望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考虑离开他去和斯大林在一起是否合适。由于谈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译员，我没有机会向安东诺夫将军私下问一问详细情况，因此迟疑了一会。但是他把大元帅的其余的话讲完之后，我们才摆脱了这个窘境。他接着说：“大元帅说，要是您愿意去，他也邀请您的两个同事，如果您乐意带他们去的话。”我马上转过来和大使商量。他说这一邀请开创了先例；就他所知，还没有其他外国人曾被邀请登上列宁墓。因此，当我感到这是特殊的礼遇后，就立即告诉安东诺夫将军，我非常高兴接受这个邀请，我要带去的两个同事是大使和美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少将。我的想法是，如果要在当地取得什么声望的话，那么最用得着这种声望的人就是大使和他的助手。

我们在列宁墓上观看表演，站了五个小时。过去我们谁都没有见过与此稍微类似的表演。成群成群的表演者穿着各加盟共和国的彩色服装，有时上千的人联合表演。各种民族舞、团体操、杂技、竞技都表演得十分准确，而且显然热情非常之高。乐队据说有上千件乐器，在整整五个小时的表演中乐队一直在演奏；我们猜想是分批轮流演奏的。

大元帅未露出倦容。相反地，看来他对每一分钟的表演都很欣赏。他请我站在他身边，通过译员，我们在整个表演中不时交谈。

他对美国在工业、科学、教育和社会方面的成就极感兴趣。他一再反复地说，俄国必须继续成为美国的朋友。他是通过译员和我交谈的，他的话的内容是：“我们在很多方面需要美国的帮助。我们的重大任务是提高俄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学习你们在农业方面的一切科学成就。同样，我们需要你们的技术人员帮助我们解决工程问题和建设问题，我们还想知道工厂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方法。我们知道，在这些方面我们是落后的，也知道你们能够帮助我们。”他在很多方面的谈话都贯穿着这个总的思想，可是我原先以为，他最多不过一般地表示一下合作的愿望而已。

那时候朱可夫元帅显然很受大元帅的宠爱。朱可夫参加了我和斯大林的每一次谈话，他们两人彼此也亲切诚挚地交谈。这使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相信朱可夫元帅的友谊和合作愿望。

大元帅把话题转到柏林委员会的工作上，并且说，这个委员会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有特殊的任务，而且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决定战争中获胜的大国能否继续在和平问题上进行有效合作的试验场。

这个想法和克莱以及我的意见虽然是完全一致的，但我们还认为，在柏林取得较大进展的一个障碍是，朱可夫显然必须向莫斯科汇报每一个新的问题，不管是多么的琐碎。在委员会成立的最初日子里，我注意到，尽管朱可夫经常对一些具有局部意义的合理建议看来是同意的，但他显然决不能按照自己意见直接作出回答。这样就使我去探索一个极小的可能性，即为改变这种情况做一点工作。

我们知道，我的同事和我的一切言行都立即被报告给莫斯科；还知道，民族自尊心驱使俄国人去维护他们的柏林代表的相当的声望和权威，因此我采取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希望会收到一些效果。这个方法仅仅是，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使朱可夫元帅确信，在处理一切不破坏既定政策的问题方面，我的华盛顿上级准许我有一定的独立性。每当我有事要和朱可夫元帅商量，我通常就在柏林委员会正式谈判前后，利用时机去见他。那时我先向他扼要地说明建议的内容——这种建议通常对俄国人和我们自己都是最有利的，然后作为明确的建议向他提出。接着我就比较随便地说：“如果这个建议您认为不错，您什么时候同意，我就什么时候准备付诸实行。如果您需要一些时间进行研究，或者愿意就这个问题和莫斯科商量，我乐于等待您的回答。但我随时可以立即行动。”

幸运的是，有一、两次我促使他问道：“关于这件事您的政府将说什么？”我回答说：“如果我把这些小事交给华盛顿来决定，我会被撤职，我的政府会另找一个能够自己处理这些事的人。”

这种个人之间的交锋是否起了某种作用，我不得而知，但随着时间的过去，朱可夫元帅比开始的时候在行动上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他放弃了让他的政治顾问继续留在他身边的做法，我们会面时，除了译员外没有其他人在场。而且，他对一个建议更倾向于说行或者不行，而不是只要求一段考虑的时间。

所以当大元帅在列宁墓上向我提起柏林委员会的时候，我决定继续采取我的柏林策略。我对大元帅说：“朱可夫元帅当然和我相处得很好。这是因为象贵国和我国这样辽阔而强大的国家能够给予它们战场上的统帅以足够的权力，使他们能在局部细节和行政问题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弱小的国家或许觉得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此就会产生困难。但因朱可夫元帅和我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去达成协议，所以我们两人经常克服了我们碰到的一些小困难。”

大元帅非常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如果派出去的代表只能充当一个使童，那就毫无意义了。他必须有权力来办事。”

在我们参观体育表演时，大元帅最后提出，集体运动和团体操的好处在于它们对群众有影响。他说：“这可以发扬战斗精神。您的国家应当多多这样做。”接着他又说：“我们决不让德国这样做。”那时我们还在和日本作战。

在莫斯科的短短几天中，我们观看了一场足球赛，到场的有八万名热情的捧场者。我们参观了俄国人感到非常骄傲的地下铁道，还观看了他们的美术馆。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访问了斯托莫维克飞机制造厂，又用一天时间访问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所到之处都看到人们真诚献身于俄国事业的精神；人们经常用下面的话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这是为了俄罗斯祖国，因此是不困难的。”斯托莫维克厂的一群工人告诉我，战争期间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是八十四小时，他们还骄傲地说，工厂的出勤率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四。这些工人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很难想象，他们的口粮定量这么少，交通工具如此缺乏，竟能保持这个纪录。农场的情况也是一样。

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社交活动是克里姆林宫宴会。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中，出席的有一批红军元帅以及莫洛托夫先生，许多外交部官员在宴会上充当译员。我的随行官员、还有大使和迪恩将军都参加了这次宴会。我们频频为战争期间逐步发展的协力合作精神干杯。宴会后，我们观看了一场电影。这是一部俄国人攻克柏林的影片，据译员告诉我，他们在这次战役中动用了二十二个师和集中了大量的火炮。我对这部影片颇感兴趣，大元帅立即说他将赠送我一套拷贝。我提出还希望有一张他的像片，他没有忘记这

件小事。几天之内，我在柏林收到一整套电影拷贝和一幅有着大元帅慨然亲笔签名的照片。

他要求我代他向马歇尔将军表示歉意，原因是他说在战争期间，他本人有过失礼行为。他说，有一次，他接到马歇尔将军有关敌人的情报，后来弄清楚是假的，这件事给红军造成了一些困难。他说，他在愤怒之下发给马歇尔将军一份措词尖锐的无线电报，但后来又对此感到后悔，因为他相信马歇尔是出于好意。他诚恳地托付我，要我向参谋长转达他的歉意。

在我们逗留期间，朱可夫元帅和其他俄国官员要我指定我愿意参观的地点。他们说没有我不能参观的地方，即使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也行。我的时间有限，但在离开之前，我要求参观克里姆林宫的博物馆。在表达了这个愿望后，他们立即安排了一次参观，还邀请我随意携带助手或副官。可能是我的主人只记得陪同我从柏林前来的只是一小批人，但当要参观时，我发现所有美国大使馆的职员都自愿在那天充当我的副官。他们从未获准参观克里姆林宫，所以我笑着同意把他们都算作我的临时助手。我们一行大约有五、六十人，用了一个下午观看了沙皇积蓄的珍宝。巨大的大厅中满是珠玉、镶饰华丽的服装、旗帜和各种装饰品，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展览。

经过克里姆林宫的庭园时，我们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最大口径的大炮；炮筒的内部直径大概在三十吋以上。它是十八世纪的遗物。当我们离开它时，我的儿子沉思着说：“我猜想那是二百年前使人们感到未来战争可怕到难以想象的武器。”

我们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美国大使为访问团举行招待会。出席者全是男人，俄国客人主要是外交部和军事部门的人。照例有祝酒，然后是晚餐。席间，大使接到紧急召请，要他立即到外交

部去。哈里曼先生怀疑他可能得到时刻盼望的日本投降的消息，所以要我尽量让所有客人留到他回来。这简直是件难事，因为大使留在外交部的时间比他预计的要长得多。多亏有许多美国朋友出来帮忙，他们想出了新的祝酒词，其中有些还配有乐曲，我们总算款待了来宾，并把他们大部分人一直留到哈里曼先生回来。

他走到宴会厅中央宣布日本投降，这个消息引起参加宴会的全体美国人的热烈欢呼。但我注意到站在我身边的老元帅布琼尼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我问他对战争结束是否不高兴，他回答说：“哦！高兴，但我们应当继续打下去，直到我们更多地宰掉那些骄傲蛮横的日本人。”元帅看来虽然是一个性格非常愉快的、厚道的和好客的人，但同时他似乎没有考虑到，战争哪怕是多继续一天，就意味着又要有成千上万的俄国公民伤亡。

战争期间，我曾听说很多有关1941年和1942年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英勇事迹。我表示希望对那座城市作短期访问；据俄国的记载，围城期间有三十五万市民死于饥饿。有更多的人在炮火下牺牲或受伤。与部队司令官们一起作我们的东道主的列宁格勒民政官员，经常向我们访问团列举这些数字。居民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和这个城市在战斗中经受灾难和匮乏的时间之久，使这次战役成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包围战之一；这个战役在现代史上肯定是没有先例可寻的。当谈到列宁格勒的损失时，每个市民的语言都表现出骄傲和满意，这使我们感到震惊。从这个重要地点有过击败敌人的英雄经历看，骄傲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找出满意的理由就比较困难了，尽管他们向我们解释说，这座城市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证明它“无愧于俄罗斯祖国”。

列宁格勒市长邀请我们赴午宴，当地的许多民政官员和军事将领都参加了这次宴会。在那里，我们欣赏了俄国艺术家的表演。

我们听了声乐和器乐表演，还有诗歌朗诵——对于朗诵我们当然不懂，另外还观看了优美的舞蹈。我对东道主说，使我感受很深的是，在俄国，艺术家们受到普遍的尊敬，所有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人，看来对各种艺术都有高度的鉴赏力。我的东道主回答说，任何一个俄国人只要能在星期天看一次美术展览、一场足球赛或一出芭蕾舞，哪怕挨饿一周都乐意。

在列宁格勒午宴的祝酒时刻，朱可夫元帅要求我的儿子祝酒——在此以前他一直逃脱了这个严酷的考验。后来约翰告诉我，在整个访问期间，他就是害怕这种挑战，所以尽量准备对付的办法。他站起来先表示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尉官，不习惯于和苏联的元帅、大城市的市长和五星上将们交往，然后他这样说：“我到俄国已经好几天了，听到过许多的祝酒词。我听到过为每一个盟国的领导人的德行干杯，为每一个卓越的元帅、将军、海军上将、空军司令的德行干杯。此外，我还需要听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俄国人干杯。先生们，请和我一起为伟大红军的普通战士干杯。”

他的祝酒词，比我在访问时多次听到的其他任何祝酒词所获得的赞扬和欢呼都要热烈。朱可夫元帅特别高兴，并且对我说，他和我一定会逐渐老的，那时我们必须由一个年轻的尉官来提醒我们“谁真正赢得了这场战争”。

从列宁格勒返回柏林之行是不愉快的，因为天气变坏了。在我们的飞机飞过俄国时，根据协商要求我们使用一个俄国领航员。他们的领航员，在按照当地地形特征确定方位方面，看来是非常熟练的，因为他们熟悉地理。但是，他们显然对于星象航行并不那么熟悉，因此，坚决不允许我们飞过他们可以看见陆地的高度。在这次特殊的旅行中，飞行的高度很低，以致最后我们所乘的那架四引擎飞机几乎是在树梢的高度飞行。这样的事我的驾驶员汉森少校可

干不了，一会儿，他假装不能听懂俄国领航员的蹩脚英语，迅速地把飞机升高到云端。从这时起，我们就正常而舒适地飞到柏林。

在飞行途中，朱可夫元帅和我经常谈到战争中的各次战役。由于多年来他在红军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加之他曾负责指挥过一些大规模的战斗，所以他的经验比起我们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人都更为丰富。不论是俄国战区的哪个地方，只要出现关键时刻，看来总是要把他派去。从他对红军编制的叙述看，从他对作战地形的叙述看，从他对作出战略决定的理由的叙述看，很清楚，他是一个造诣很深的军人。

我告诉元帅，我们的每一个师，加上它的加强营，兵力保持着一万七千人，他听后感到很惊讶。他说，他试图把他的师保持在八千人左右，但由于长期的战斗，有些师的兵力经常会被削弱到三、四千人。

朱可夫向我叙述了俄军突破布雷区的方法，使我大受启发。用防御火力掩护的德国布雷区，是使我们部队遭到很大伤亡和耽误前进的战斗障碍。尽管我们的技术人员发明了各种想象得到的安全摧毁地雷的机械，但要突破地雷区总是一件困难的事。朱可夫元帅平淡地说明了他的方法，大意是这样的：“有两种地雷，一种是杀伤士兵的地雷，另一种是炸毁战车的地雷。当我们到达布雷区时，我们的步兵就要象进入无雷区那样地发起进攻。我们认为，我们从杀伤士兵的地雷受到的损失，只相当于我们在攻克德军决心用重兵而不是用布雷防御的这种特定地区时，从机枪和火炮受到的损失。攻击的步兵不能使炸毁战车的地雷爆炸，这样，在他们突破到布雷区的那一边以后，就在那里建立桥头堡，在这之后，工程兵就赶来挖出地雷，为战车开辟能够前进的道路。”

我很清楚，如果美国的或英国的一个司令官采用这种战术，他

会遇到什么后果；我更清楚，如果我们打算把这种方法作为战术理论的一部分，我们任何一个师的士兵势必会对此发表一些什么议论。美国人以人的生命估计战争的代价，而俄国人则以国家的全部消耗来估计。俄国人清楚了解士气的价值，但为了发扬和维持士气，他们显然依靠全面的胜利和爱国主义，还可能依靠狂热的情绪。

就我所知，朱可夫对我们认为是维护美军士气的十分重要的方法不很关心，这些方法包括部队有次序的轮换、娱乐设备、短期休假，此外还有使士兵免遭不必要的战斗风险的技术训练；所有这些措施在我们的陆军中已普遍实施，但他的部队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是不知道的。

但是，他同意我的意见，即最高统帅部的目的始终必须是摧垮敌人的士气。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办法是赢得战略奇袭，所谓战略奇袭，就是突然使我军至少在一个重要地区内处于优势地位，以威胁敌人继续进行战斗的能力。当战略奇袭和战术奇袭配合运用，使敌前线部队产生唯恐将被歼灭的恐惧时，效果就更大。我们在地中海区战役和欧洲战役中，常常在战略方面或战术方面，有时在这两个方面，成功地完成了奇袭。在1944年12月的“凸出部之战”中，我们在德军进攻的兵力上和时间上都遭到了战术奇袭。然而，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虽然早已预见敌人发动奇袭的可能性和总的地点，因而事先拟订了反应计划并能有效地作出反应，但这一事件一开始对前线军队的士气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是不容忽视的。

美国人和俄国人在对待士兵方面的基本区别还表现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我和一位俄国将军谈话时，提起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我们不得不承担的一项困难工作，即需要照顾许多德国俘虏。我说，他们的口粮与我们士兵的口粮是一样的。他极为惊讶地问道：

“您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说：“是这样的，第一，我国根据日内瓦协约的条款，需要这样做。第二，德国人那边也有几千名美、英俘虏，我不愿让希特勒得到更残酷地对待我方俘虏的藉口和理由。”这位俄国人听了我的说法又大吃一惊，他说：“您们为什么还要关心被德军俘虏的士兵呢？他们已经投降，不能再打仗了。”虽然这样说，但这些意见不一定就是说俄国人残忍，或者说他们在内心深处就不关心人的生命。

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是严酷的。1941年俄国整个西部被纳粹占领。伏尔加河以西的地区几乎全被摧毁。1945年，我乘飞机进入俄国时，从俄国西部边境直到莫斯科附近没有一所矗立着的房屋。朱可夫元帅告诉我，在整个敌占区内，被杀害的妇孺和老人的数字是如此之大，以致俄国政府永远无法弄清其总数。有些大城市成为一片废墟；在1942年11月以前，如不是他们的工业得到恢复和西方盟国能以全力投入战争，他们即使拚命抵抗，看来也很少有希望能阻止敌人前进。

所有这些战争灾难，使任何民族都会感到痛苦；与远离实际战场的国家相比，如果俄国人不对德国人怀有更为痛切的复仇心理，不对战争现实抱有更为严厉的态度，那倒会令人大为吃惊的。

即使在他们顺利进攻时，也为胜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逐渐得势的优势兵力对灵活熟练的防御实施的战术进攻，是损失最大的一种战斗，而且在这种战斗中，进攻一方兵力的损耗很快就显示出来。敌人经常重新调整他们的部队，迫使对方对处于设防阵地的同一部队发动连续的、牺牲重大的进攻，当维持进攻的动力开始成为严重问题时，敌人就能在士气上和物质上由原来的相对劣势转变为相对优势。在这次战争中，当俄国开始发动反攻时，朱可夫被迫以这种牺牲重大的作战方法使用他的军队。从军事意义上说，苏

联一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才开始获得巨大报酬,抵偿了它在战争最初时期的严重牺牲。俄国人为他们的胜利感到骄傲,同时始终牢记着他们付出的惨痛的代价。

随着战争岁月的消逝,我感到自己愈来愈憎恨德国人,特别是憎恨希特勒匪帮。不论哪一方面,都可以看到希特勒的残暴野心所造成的破坏。每一次会战,每一次散兵战,都需要以多少人的残废为代价,都需要以年轻的盟军战士的生命为代价。

战争期间,许许多多的父亲、母亲和爱人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信给我,恳求得到关于他们的亲人还可能活着的一些希望,或者要求至少再告诉他们一些关于亲人死亡情况的细节。对这些信件,我都一一答复了。我除了负责力图向那些被侵略战争夺去亲人的家庭表示同情外,再也想不出更有效的方式以加深对那些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人们的无限痛恨。也许是这个原因,我对俄国人的态度,如果说在战争开始前可能有些体谅的话,那么现在我更加深了同情的谅解。

我认为,根据盟军在北非和欧洲的经验,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步兵和增加他们个人的战斗力,但朱可夫元帅对此不大感兴趣。地面部队的作战能力明显地取决于一个司令官能否成功地做到这点:使士兵不致于在长途劳累行军后的疲劳情况下,以及使士兵在免遭经常袭扰后方的间歇性射击的条件下,把他们投入战斗。我们的某些特种部队,习惯于乘坐轻型装甲车作战,把他们的伤亡与普通步兵师的战斗部队的伤亡相比较,使我清楚地认识到,需要想方设法使各种部队都能在同样有利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然而俄国人却认为,保护个人不受疲劳和伤害的措施可能会使费用过于高昂。他们似乎认为:伟大的胜利必然要有重大的伤亡。

为了答谢俄国政府对我的盛情接待,美国陆军部经杜鲁门总



统批准，迅速邀请朱可夫元帅访问美国。邀请立即被接受，我们认为元帅将很快启程去美国。他要求克莱将军和我陪同他前往，这样，就正象他陪同我在俄国旅行那样，能在我国有个朋友陪伴。我不得不通知他，由于当时有一些特殊情况和问题，不能作陪，但我安排克莱将军陪同。朱可夫元帅还要求我的儿子可否作为一个副官陪同他。我告诉他，约翰对此将感到荣幸。此外我还告诉他，我很乐于让他乘我常用的C-54型飞机“向日葵”号飞往美国。这使他很高兴。他在俄国时已乘过这架飞机，因此对它及其机务人员非常信任。他向译员说了一些话，译员接着把话转达给我，他说：“有了将军的飞机和将军公子的陪同，我认为我将绝对安全了。”

不幸的是，元帅不久患病了。当时有某种猜测，认为他也许患的是外交病，但我后来在柏林的一次管制委员会的会上见到他时，看样子他曾遭受过病魔的严重折磨。无论如何，这件事推迟了他的访问，一直到冬季来临时，他才表示希望在次年春季访问我国。而在访问以前，俄国人显然对派遣他们的一位元帅到美国去消磨一个星期或十天时间这件事，已无多大的兴趣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可夫元帅是在1945年11月7日。这天是苏联的节日，他在柏林举行一个大型招待会表示庆祝，并且邀请盟国所有高级司令官和参谋军官参加这个盛会。由于天气变坏，不可能飞行。其他两位总司令都取消了约定，但我当时已知道即将奉召回国，所以决定参加这个仪式，虽然这次赴约，我必须连夜乘火车出发，然后在白天还要经历长途的汽车旅程。

我到达时，朱可夫元帅和他妻子以及他的一批高级助手站在欢迎人群中，他向我问候，并且很快就走出了欢迎人群。他搀着他妻子，于是我们三人和译员就进入一间备有各种茶点的舒适的房间里休息。我们谈了两个小时。

朱可夫元帅谈话的要点是,他认为,美、苏两国的文化观念和  
政治观念不同,因此它们之间谋求谅解是个困难问题,但是我们在  
柏林已经做了一些有助于促进这一谅解的工作。他认为我们还能  
取得更多的成就。他很详细地谈到了新生的联合国的问题,并且  
指出:“美国和俄国只要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一起,联合国就一定  
能成功。只要我们成为伙伴,我们禁止战争,世界上就没有其他国  
家敢于发动战争。”

朱可夫元帅看来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说,在他  
看来,苏联的政治制度是基于理想主义的,而我们的政治制度则基  
于物质主义。他在发挥他对这个分歧的想法时指出(并且由于他的  
批评,他还表示了歉意),他认为我们的制度对一切有自私心的人  
有吸引力。他说,我们诱导个人去做事的方法就是告诉那个人,  
他能保持他赚得的一切,他可以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且在各方  
面都容许他在一个巨大民族集体中成为一个不受纪律约束和没有  
方向的个体。

他要求我去了解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企图使一个人热爱  
他所属的那个巨大民族集体而抛弃上述的个人动机。尽管我全面  
驳斥了这些论点,并且谴责了一切带有独裁性质的制度,但是毫无疑  
问,我仍认为,朱可夫元帅是真心实意的。

在这最后一次会晤中,出现了另一件小事,这件事再次说明,  
有些司空见惯的事,我们也许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和不值一提的,然  
而在一个从小就与我们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环境中的人看来,就成  
了重大事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元帅告诉我,有一个美国人写  
了一本关于俄国的书,其中说朱可夫元帅比他妻子要矮二至三吋,  
还说他有两个儿子。这个说法使他很恼火,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个  
人的侮辱和蔑视。他和他妻子站了一会儿,然后说:“现在您可以

看到您们有些作家所散布的有关我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谎言了。”他又补充说：“另外，我们没有儿子，我们有两个女儿。”

他又提起我们有一个杂志刊登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张图片的事。这并不是一张个人的照片，而是一张挂在柏林的一家夜总会的油画肖像。这个杂志登出的这张大元帅的肖像，看来是故意在最倒霉的和最不严肃的环境中拍摄的。元帅确实为此大为生气。他当面对我说：“要是您的照片象这样出现在俄国某个杂志上，我想这个杂志就该立刻停刊，加以取缔。您准备怎么办？”

这就要求我说明美国的新闻自由，但在我作了认真的、自认为是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之后，我发现他无动于衷。元帅只是重复说：“既然您是俄国的朋友，那么您就会对这件事有所行动。”

同样，我试图让他了解自由企业的优点。我坚信，如果没有自由的或竞争性的企业，个人的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持久；所以就向他指出，我个人认为，完全的国有制必将包含完全的独裁，而努力逃避一切独裁统治，就是美国建立和成长的原因。他听后只报以微笑。

甚至在我回美国后，一直到1946年4月，我和元帅还有书信来往，维持着我们一般的友好关系。这年春季，他被解除了他在柏林管辖区的职务，此后我再也没有直接收到他的信。据谣传，他失宠了——他被贬职的原因，多少出于战争最后几个月里他享受到俄国人民对他的崇高敬仰和爱戴。

他实际上已不出面了，对此有过种种猜测，猜测的理由之一是与我的众所周知的友谊。我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尽管我们有着那种友谊，但他看来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理论本质上是正确的。他知道我是与共产主义毫不妥协的敌人，因为我认为，它与独裁是同义语；当我说我痛恨带有国家统治主义色彩的一切事物，并且说我们

整个西方的传统就是献身于个人自由的思想时，他总是耐心地听着。但他自己坚信共产主义学说这一点看来是出于内心的信仰，而不是来自任何外来的压力。

俄国人很大方。他们喜欢赠送礼物和举行交际性的宴会，几乎所有与他们一起工作过的美国人都能证实这一点。普通的俄国人都是性格豁达开朗，喜欢放声大笑，热爱同事，对平凡生活的看法是健康的和坦率的。在我看来，他们在这些方面与我们所谓的“普通美国人”有相同之点。

我与朱可夫元帅个人之间虽有友谊和谅解，但这并没有消除始终使我的参谋部成员感到恼火和愤慨的那些事件和冲突，这些事件和冲突有时是严重的。我们派入柏林的每一列火车和每一辆汽车都须通过俄国占领区，它们屡次遭到一批批身穿俄军制服的散兵游勇的侮辱，甚至遭到掠夺。

由于语言的不同，谁也不能私下直接谈话，以缓和陆续发生的激烈争论。对波茨坦协定的履行产生了误解，这在赔款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克莱和我一方面始终致力于复兴鲁尔和发展西德经济的工作，以便足以维持居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也坚决认为，应当完全地和迅速地实现我们政府坚决承担的每一项义务。我们认为，在执行协定的任何细节上发生背信弃义，对我们来说，那是犯罪行为，因为这种行径将使我们在协助建立国际合作的广泛基础方面所抱有的全部希望归于失败。

我们坚持履行我国政府诺言的方针，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开始受到挑战。我的几个助手突然提议，如果俄国人要求美军从易北河一线撤往原定的美国占领区，我应予以拒绝。理由是，如果我们把军队继续留在易北河，俄国人将更可能同意我们的一些建议，特别是合理划分奥地利的建议。在我看来，这种论点似乎是站不

住脚的。我深信，我们开始在和俄国人直接打交道时，如果拒不履行牵涉到我国政府诚意的某项安排，这在一开始就会破坏整个合作的尝试。我的这个看法始终得到陆军部的支持。

我总认为，西方盟国也许本来可以达成一项协定，以取得比我们实际占领区还要多的德国领土。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政治领导人象我们盟军最高统帅部一样，坚信西方的胜利肯定会早日来到，那么他们在雅尔塔早就会坚持把易北河战线作为划分东方和西方占领区的自然地理界线。1945年1月末，我们虽然仍处于莱茵河以西，而且当时确实还没有摧毁齐格菲防线，但我的参谋部和我本人已告知我们的上级，我们预期将迅速赢得一系列重大的胜利。当时除了担心我们不能更往东面推进外，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同意只划到埃森纳赫为止的一条占领线。不过这纯粹是一种推测。我从来没有和直接负责作此项决定的任何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不管怎样，1945年夏末和秋初的几个内在柏林作出的工作成绩，体现着战后我们与苏联官员能够达到的诚挚和合作的最高峰。但是与此同时，在更广泛的领域中，在最高领导人一级，误会在不断发展，这些误会不可避免地也反应在这个局部的德国舞台上。而在德国发生的误会同样也可能反过来起作用。

在当时，美国人——或者至少在柏林的我们这些人——认为只要一方尊重对方的权利、领土和信仰，只要一个制度避免用明的或暗的行动去破坏其他制度的完整，那么就没有理由不能使俄国政府的制度和西方盟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在世界上一起生活。由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含意就是尊重别人的各种权利，所以在我们看来，“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这类协定理应能够实现并被忠实地遵守。这也许是我们一直怀有的最强烈的真正愿望。但是现在连一个争取在世界上共同生活的真正有用的原则都没有达成。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个变化，我们之中任何人也许永远不会清楚知道。这个变化不一定起因于最终目的方面，而肯定是起因于明显地想用实用主义方法达到合作的这个方面。但是最近两年半日益紧张的形势，粉碎了我们迅速促进世界和平和消除军备的美梦。我们严肃地、清醒地认识到了我们自己的力量和弱点，并且确信我们自己在道义上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全神贯注地去对付扰乱世界的新的紧张局势。

不能消灭侵略和不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就意味着完全会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产生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裕仁的独裁专横行动。东欧的几乎每一个小国的国名都在提醒我们注意：大西洋宪章所大胆宣布的许多目标，甚至早在珍珠港事件以前就已经丧失了。在那些虔诚地祈求最终以战争结束战争、并且参加过和赢得了这次战争的人们中，现在有一部分人产生了恐惧、怀疑和混乱。

论述世界合作之崩溃和阐明随着这个悲剧而产生的一些事件的真正意义的著作，现在已有许多问世，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著作。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著作的言论将会阐明一个简单的真理：今后我们能否免除恐惧，不受歧视和压迫，完全取决于珍惜自由的人们能否决心维护他们已获得的自由，即能否决心使自由不遭受来自内部或外部的一切攻击。

我们当前迫切的需要就是保持真正的、相当大的实力，舍此别无其他选择——不但在我们的道义方面和经济力量方面要求如此，而且在充分的军事准备方面也要求如此。要是在明确的合作精神全面恢复以前忽视这个问题，这不但是愚蠢的，而且是愚蠢到犯罪的程度。此外，当前的弱点一定会使我们的朋友惊慌，使我们受到其他人的蔑视，而且实际上还会消除我们和平解决各项国际问题的任何影响。只要全世界还没有懂得用竞争的武力来最后裁

决人类的各种问题是毫无用处的,那么 1914年和 1939年的两次教训依然有效。

单靠军事的准备还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鼓动和促使它的好战的宣传者去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这个思想体系不能投合诸如意大利人、法国人或南美洲人的心意,却能感动那些拚命想满足人类共同需要的人。在这部分人中,这种思想体系具有高度的扩张力。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那里的人民的不满起因于集体压迫或大众贫困或儿童饥饿,共产主义就能在那里发动武力无法对抗的攻势。不满能被煽动成革命,革命能被煽动成社会骚乱。结果是独裁统治。要对付这种策略,单靠军事威力是徒劳的。

除非民主制度的拥护者能清楚地和一致地认识到人类的自由正处于危急关头,从而奋起对抗共产主义的狂热;除非他们以具有共同目标的自愿团结对抗共产主义者的有组织的团结,虽然这可能意味着民族权利会遭到某种程度的损失;尤其重要的是,除非他们不屈不挠地实行实际的措施,以消灭造成人们互相对立的一些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邪恶现象,以抵消共产主义对挨饿、贫困和受压迫人们的吸引力,否则自由盛行的地区将会不断地缩小。

作为一种世界力量的民主制度,它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而这些国家都是些过多地和过于经常地采取单独行动和各行其是的国家。任何地方都没有十全十美的民主制度,许多地区的民主制度脆弱得可怜,其原因是:国家主权的分离,毫无益处地阻碍着资源的合理的集中使用。如果资源能得到合理的集中使用,国内就会出现更大的物质繁荣,并可成倍地增强防御力量。国家主权的分离可能意味着思想意识上的失败。

民主国家必须懂得,对于在各国用自给自足和依靠自己的途

径获得幸福和安全的那个时代产生的那个僵硬的国家主权观念来说,这个世界现在是太小了。今天,象这样的国家,没有一个能单独存在。我们不是要求从根本上放弃国家主权,而只是要求有一项稳固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时,一个总的联合机构,在对事实进行调查后,通过多数票表决作出公正裁决,然后利用权力并采取措施将其付诸实施。这种办法对于民族主义确实有轻微的限制,并且要付出很小的代价;然而如果拥护人类自由的各民族要想更好地解决它们内部的分歧或者对付外来的攻击,就得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

这就是使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能够繁荣昌盛的真正的、长远的保证。物质的手段和巧妙的组织能帮助民主制度安然度过危机,但今天的民主制度,只有当它基本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道德和物质方面的需要时,才能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认为,以人类尊严为根源的个人自由是人的最巨大财富。我们认为,如果让人们自由表达他们的意志,他们宁愿舍独裁和集体主义而取自由和自主。从事实看,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似乎也相信这一点,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攻击和试图破坏这些概念的实践呢?如果他们完全相信他们自己的学说是公正的和能吸引人的,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采用侵略政策了。如果对人类来说,共产主义是比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更富有吸引力的精神力量和道德鼓励,那么时间就会是他们所需要的唯一的盟友了。我们这些亲眼看到欧洲解放的人都知道,共产主义者担心人们会依恋自由是很有根据的。共产党人所以表现出侵略意图,想推翻所有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政治结构,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如果美国男女象他们的士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待战斗恐怖那样,能果断、勇敢地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就不会担心出现这个



结果。如果他们坚定地团结起来,就象他们在与欧洲盟国一起随时提供最强大的战斗部队时那样,那么就没有世俗权力敢向他们挑战。如果他们能保持完备的道德和透彻的理解力,并能保持彻底打垮轴心国的那种牺牲决心,那么自由世界就能生存和繁荣,而且所有国家的人民终将在精神文化、物质需要和国家安全方面达到空前的水平。

## 致 谢

这部书所详述的军事成就，归功于千百万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写了这段历史，因而也可以说他们是本书的不可胜数的合著者。但是从我个人方面讲，我要深切感谢我的许多亲密朋友，由于他们的帮助，使我得以很快把战争时期的笔记、备忘录和回忆录集中起来，编进一部纯粹叙述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个人经历的著作。在这些朋友中有：前驻苏大使约瑟夫·埃尔默·戴维斯；战争期间我的参谋长，现驻苏大使沃尔特·史密斯；以前在最高统帅部工作的我的一位得力助手埃德温·克拉克准将，他们的主要功劳是劝我应该完全担负起这项工作。如果没有他们的督促和鼓励，我肯定不能收集起动笔所需要的笔记和备忘录。阿瑟·内文斯准将和在战争时期由一个兵士晋升为中校的凯文·麦卡恩，当写作决定一经作出，便成了编写此书过程中始终不可缺少的助手。如果这部书对人们有所裨益，我特别衷心感谢这些人，同时也衷心感谢在战时和战后的各个时期所有当过我幕僚的人；如有错误，我对他们表示歉意。

# 附 录

## 一、盟军最后攻势战斗序列

### 第六集团军群（德弗斯）

法国第二装甲师（勒克莱尔）  
法国第二十七高山作战师  
（莫尔）

法国第一步兵师（加尔贝）

### 法国第一集团军（德塔西尼）

法国第九殖民地步兵师（瓦  
吕伊）

法国第一军（贝图阿尔）

法国第一装甲师（絮德尔）  
法国第四山地作战师（德斯  
丹）

法国第十四步兵师（萨朗）

法国第二军（德蒙萨贝尔）

法国第五装甲师（德韦内儒  
尔）

摩洛哥第二师（卡庞蒂埃）

阿尔及利亚第三师（吉劳姆）

### 美国第七集团军（帕奇）

美国第一〇三步兵师（麦考  
利夫）

美国第三十六步兵师（达尔  
奎斯特）

美国第四十四步兵师（迪安）

美国第六军（布鲁克斯）

美国第一〇〇步兵师（伯雷  
斯）

美国第十装甲师（莫里斯）

美国第六十三步兵师（希布  
斯）

美国第十五军（海斯利普）

美国第三步兵师（奥丹尼尔）

美国第四十五步兵师（弗雷  
德里克）

美国第十四装甲师（史密斯）

美国第二十一军（米尔本）

美国第四十二步兵师（柯林  
斯）

美国第四步兵师（布莱克利）

美国第十二装甲师（艾伦）

### 第十二集团军群（布莱德雷）

#### 美国第三集团军（巴顿）

美国第七十步兵师（巴尼特）

美国第八军（米德尔顿）

美国第八十九步兵师（芬利）

美国第八十七步兵师（丘林）

美国第六十五步兵师（莱因  
哈特）

美国第十二军（埃迪）

美国第七十一步兵师（怀曼）

美国第二十六步兵师（保罗）

美国第十一装甲师（达格尔）

美国第九十步兵师（欧内斯

特)  
美国第二十军 (沃克)  
美国第八十步兵师 (麦克布赖德)  
美国第六装甲师 (格罗)  
美国第七十六步兵师 (施米特)  
美国第四装甲师 (霍格)  
**美国第一集团军 (霍奇斯)**  
美国第二十装甲师 (沃德)  
美国第三军 (范佛里特)  
美国第九十九步兵师 (劳尔)  
美国第七装甲师 (哈斯布鲁克)  
美国第九步兵师 (克雷格)  
美国第二十八步兵师 (科塔)  
美国第五步兵师 (欧文)  
美国第五军 (许布纳)  
美国第九装甲师 (伦纳德)  
美国第二步兵师 (罗伯逊)  
美国第六十九步兵师 (莱因哈特)  
美国第七军 (柯林斯)  
美国第一步兵师 (安德勒斯)  
美国第三装甲师 (希基)  
美国第一〇四步兵师 (艾伦)  
美国第十八空降军 (李奇微)  
美国第八步兵师 (穆尔)  
美国第七十八步兵师 (帕克)  
美国第九十七步兵师 (哈尔西)  
美国第八十六步兵师 (麦劳斯基)

美国第十三装甲师 (沃根)  
**美国第十五集团军 (杰罗)**  
美国第六十六步兵师 (克雷默)  
美国第一〇六步兵师 (施特罗)  
美国第十六装甲师 (皮尔斯)  
美国第二十二军 (哈蒙)  
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 (加文)  
美国第一〇一空降师 (泰勒)  
美国第九十四步兵师 (马洛尼)  
美国第二十三军 (巴尔默)  
**美国第九集团军 (辛普森)**  
美国第二十九步兵师 (格哈特)  
美国第十三军 (吉勒姆)  
美国第五装甲师 (奥利弗)  
美国第八十四步兵师 (博林)  
美国第一〇二步兵师 (基廷)  
美国第十六军 (安德森)  
美国第七十九步兵师 (威奇)  
美国第八装甲师 (迪瓦因)  
美国第九十五步兵师 (特沃德尔)  
美国第七十五步兵师 (安德森)  
美国第三十五步兵师 (巴德)  
美国第十七空降师 (米利)  
美国第十九军 (麦克莱恩)  
美国第八十三步兵师 (梅肯)  
美国第二装甲师 (怀特)  
美国第三十步兵师 (霍布斯)

**英国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蒙哥马利)**

英国第七十九装甲师(霍巴特)

**英国第二集团军(登普西)**

英国第一军(克罗克)

英国第八军(巴克)

英国第十五步兵师(巴伯)

英国第十一装甲师(罗伯茨)

英国第六空降师(博尔斯)

英国第十二军(里奇)

英国第七装甲师(莱因)

英国第五十三步兵师(罗斯)

英国第五十二步兵师(黑克威尔-史密斯)

英国第三十军(霍罗克斯)

英国第三步兵师(惠斯勒)

英国第四十三步兵师(托马斯)

英国第五十一步兵师(麦克米伦)

装甲警卫师(阿戴尔)

**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克里勒)**

加拿大第一军(福克斯)

英国第四十九步兵师(罗林斯)

加拿大第五装甲师(霍夫迈斯特)

加拿大第二军(西蒙兹)

波兰装甲师(马兹克)

加拿大第二步兵师(马修斯)

加拿大第三步兵师(基弗勒)

加拿大第四装甲师(沃克斯)

**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布里尔顿)**

美国第十三空降师(查普曼)

第九部队空运总队(威廉斯)

第五十二部队空运联队(克拉克)

第五十三部队空运联队(比奇)

第五十部队空运联队(夏佩尔)

**第一战术航空队(韦伯斯特)**

第十二战术航空总队(巴克斯)

法国第一航空军(热拉德)

**美国第九航空队(范登堡)**

第九战术航空总队(奎萨达)

第十九战术航空总队(韦兰)

第二十九战术航空总队(纽金特)

第九轰炸机师(安德森)

**英国第二战术航空队(科宁哈姆)**

第八十三空军大队(布罗德赫斯特)

第八十四空军大队(赫德尔斯顿)

第八十五空军大队(斯蒂尔)

第二空军大队(恩布里)

第三十八空军大队(斯卡利特-斯特里特菲尔德)

第四十六空军大队(达维尔)

### 三、德国的地面部队

德国的战斗师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步兵师，在进攻欧陆开始日后，每个步兵师有三个步兵团组成，每团包括两个营，规定的兵力大致为官兵一万二千名。

装甲掷弹兵师，由两个摩托化步兵团（每团包括两个营）、一个摩托火炮团以及六个支援部队营组成，规定的兵力大致为官兵一万四千名。

装甲师，相当于我军的装甲师，包括两个装甲掷弹兵团、一个坦克团、一个装甲火炮团、五个支援部队营，另外还有后勤部队，官兵总数达一万四千名。

在德国部队中，国防军和党卫军有显著区别，前者为一般的陆军部队，后者的字首为SS。党卫军原先只吸收经过专门选拔的纳粹党徒，从而形成了政治和军事的核心，所以它享有国防军所得不到的特殊恩宠和特权。党卫军在补充方面和火力方面都比同级陆军部队强得多。到战争末期，由于战斗的损失和滥征新兵补充缺额，其政治的和种族的“纯洁性”有所降低。但在战争结束前，这种部队仍不失为德国最狂热的好战者。

在顽抗时，与党卫军同样狂热的部队是1944年9月编成的人民掷弹兵师（人民步兵师）。这种师的人员可与党卫军的师的人员互相调用。给部队加上“人民”和“掷弹兵”的名称——这是希特勒在1942年赐给步兵的荣誉称号——表明，这些部队是由一批精干战士组成的，他们是被选来在最危急关头保卫德国的。人民步兵师的官兵一般虽不到一万名，但拥有非常强大的自动武器，特别是手提机枪，因此他们能有效地进行殊死抵抗。组成这种部队的人员与战争后期被编成的人民突击队的人员截然不同。

在各种步兵师中，最强的是伞兵师，它们属于地面战斗部队，但归德国空军指挥。这些步兵师是经过认真挑选的，它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而被训练成伞兵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由于伞兵师每师的兵力规定为官兵一万六千名，而且能较普通步兵师分配到更多的机枪，所以伞兵部队最适宜于在漫

长的、无掩护的战线上进行顽抗。

突击部队在战斗中如有突出表现,就被授予“突击队”的荣誉称号。只有少数几个师得到过这个荣誉。但到战争快要结束前的几个月内,那些通称为人民突击队的老人和少年被粗暴地编成许多小组,并且为了鼓舞斗志,也授予它们“突击队”这个荣誉称号。

有的部队被专门选来执行某项特殊的突击任务或某项非常危险的任务。它们被组成战斗队后,通常以其指挥官的姓名命名,如施特克尔战斗队。战斗队的兵力不等,有的不足一个连,有的达到一个师;它们单独存在的时间很少超过一个月,但由于其成功的战绩,即使这些战斗组被并入大部队后,它们往往仍能将其名称作为一种光荣的奖赏而保留下来。到战争即将结束时,这种战斗组已丧失了执行特殊任务的特点,并且通常是由一些遭受过严重打击的团的残余力量所组成。

## 军事代号说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军事计划或军事行动规定代号是一项安全措施。这项措施的目的主要是防范敌人的情报机构,引用方便实际上只是一个重要的附带成果。为了上述目的,早在战争初期,就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导下搜集了大约一万个难以识别军事行动和地点的普通名词和形容词。这些字经过选择后,就按字母顺序收集排列,编成一个分类一览表发布了,并且有若干组字被分配给各战区,也分配给美国国内区。各战区的司令部后来还对最初的一览表增加了一些代号,这些代号有的不属于普通名词和形容词,有的是说明某一特定军事行动的。不要把代号与用各单字字首组成的简称(如COSSAC<sup>①</sup>;SHAEF<sup>②</sup>;PLUTO<sup>③</sup>)相混淆。

以下是经过选择的代号(包括某些战区加进原来一览表的代号)及其说明;凡是已经实施过的军事行动都标有该次行动开始的日期。

代 号	说 明	开始日期
铁 砧	1944年盟军从地中海区进攻法国南部的军事行动(后改称“龙骑兵”)。	1944年 8 月 15日
使 徒 一	在德国投降并在欧洲停止一切有组织的抵抗后,盟军返回挪威的军事行动。	1945年 5 月 10日
使 徒 二	在挪威的德军全部投降后,以及当德军在别处继续顽抗而在该国停止武装抵抗后,盟军返回挪威的军事行动。	
世外桃源	罗斯福、丘吉尔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	

① 是 Chief of Staff to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长)的简称。——译者注

② 是 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简称。——译者注

③ 是 Pipe Line under the Ocean (海底输油管)的简称。——译者注



代 号	说 明	开始日期
寻找金羊毛的勇士	1945年1至2月罗斯福、丘吉尔举行的马耳他会议和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举行的雅尔塔会议。	
深水炸弹	专门为政治地位相当于冯·巴本的被俘文官设立的拘留中心。	
雪 崩	对那不勒斯的两栖突击——美国第五集团军在萨勒诺的几次登陆。	1943年9月9日
贝 镇	英国第八集团军向墨西拿对面的意大利本土实施进攻。	1943年9月3日
保 鏢	盟军全面战略迷惑计划。	
波利乐舞	从美国转运美军至联合王国的军事行动。	
碗 黄	攻占撒丁的军事行动。	
项 练 一	在德国萨尔布吕肯附近攻击齐格菲防线的空降行动。	
项 练 二	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渡过来因河的空降行动。	
竖 笛	盟国空军为使德国运输体系陷于瘫痪而实施的军事行动。	1945年2月22日
塞 钻	进攻意大利班泰雷利亚的军事行动。	1943年6月中旬
冠 冕	计划进攻日本本州的军事行动。	
十 字 弓	对飞弹发射场和火箭发射场的空袭。	
龙 骑 兵	盟军从地中海区进攻法国南部的军事行动(原称“铁砧”行动)。	1944年8月15日
日 蚀	在“霸王”行动开始后,万一德军崩溃时欧洲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和准备。	
效 果	盟国第一空降集团军计划夺取德国比辛根区机场的空降行动。	
发 现	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2日举行的德黑兰会议。	
细 钋 花	即菲律宾群岛,	
进 行 曲	地中海战区的全部军事行动。	

代 号	说 明	开始日期
狂 乱 花 园	英国与俄国之间的空中穿梭轰炸。 与“市场”行动相联系的地面军事行动。	1944年9月 17日
黄 金	在“霸王”行动中盟军实施突击登陆的地点阿斯奈尔滩头。	
金 片	把一个加拿大军从地中海战区调至欧洲战区的行动。	1944年2月 初
鹅 莓	“霸王”行动中在法国沿海设置的一个人工港(共有五个,后来形成了两个称为“桑葚”的大港)。	
手 榴 弹	美国第九集团军以其右翼部署在于利赫—诺伊斯总战线上,并朝东北向来因河实施的军事行动。	1945年2月 23日
体 育 家	最初计划进攻非洲西北部的军事行动;原计划只由美军在地中海区外部实施突击,后来这一军事行动扩大到包括英军在地中海区内部的突击。	
举 手	为在基勃隆湾建立一港口而计划实施的海、空军事行动。	
妖 魔 恐 怖 的 赫 斯 基	即地中海班泰雷利亚岛。 即西西里。 进攻西西里。	1943年7月 10日
独 立 迷 惑	打开波尔多港的军事行动,后改为“可尊敬的”。 攻占伐耳赫伦岛和打通从些耳德河通往安特卫普之航道的军事行动。	1944年11月 1日
喜 悦 的	在进行“日蚀”行动时,盟国第一空降集团军为保卫和供应盟军被俘人员的战俘营而规划的空降行动。	
佳 节	盟军联合进攻法国第厄普。	1942年8月 18日

代 号	说 明	开始日期
丘 诺	在“霸王”行动中盟军实施突击登陆的地点库尔塞耳滩头。	
伐 木 工	在德国科隆和科布伦次之间的摩泽尔河以北的军事行动。	1945年 2 月 23日
磁 性 庄 严 的 市 场	驻北爱尔兰的美军。 计划进攻日本九州的军事行动。 夺取位于格腊夫、奈梅根和阿纳姆的桥梁的空降行动。	1944年 9 月 17日
桑 葚	为“霸王”行动设置的巨大人工港(请参阅“鹅莓”)。	
海 神	指“霸王”行动中的实际军事行动。这个代号只有在通讯和文件中直接地或含蓄地透露以下三种情况时才能代替“霸王”这个代号:(1)突击目标区,(2)突击的确切日期,(3)突击的总规模。	
留 窝 蛋	在海峡群岛上的德国守军投降后或从那里撤退后盟军占领该群岛的军事行动。	1945年 5 月 9 日
八 角 形 奥 马 哈	罗斯福、丘吉尔在1944年9月举行的魁北克会议。 在“霸王”行动中盟军实施突击登陆的地点圣洛朗滩头。	
霸 王	1944年春进攻法国的计划和军事行动。	1944年 6 月 6 日
老 丑 角	即意大利的那不勒斯。	
长 生 鸟 强 盗	“霸王”行动中的人工港使用的混凝土驳船。 渡过鲁尔以北来因河的整个军事行动。	1945年 3 月 23日
象 限 兰 金 一	罗斯福、丘吉尔在1943年8月举行的魁北克会议。 在“霸王”行动目标日期以前,万一发生德军兵力削弱和士气下降的情况时,盟军返回欧洲大陆的计划。	
兰 金 二	如果德军自法国和(或)挪威撤退时,盟军返回欧洲大陆的计划。	

代 号	说 明	开始日期
兰 金 三	万一德国无条件投降时,盟军返回欧洲大陆的计划。	
红 球	在“霸王”行动中,为机动车建立的、往返于滩头阵地和部队之间的单程快速公路。	
围 捕	计划进攻法国沿岸的军事行动(后改称“霸王”行动)。	
六 分 仪	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1943年11至12月举行的开罗会议。	
大 铁 锤	万一德军士气下降,或者在必须使敌军从东线转移过来时,为了取得一个限定的桥头堡而计划在欧洲大陆进行的一次登陆。	
肥 皂 水	对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的轰炸。	
宝 剑	在“霸王”行动中盟军实施突击登陆的地点杜佛尔滩头。	1943年 8 月 1 日
终 点	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在1945年 7 月17日至 8 月 2 日举行的波茨坦会议。	
火 炬	盟军在西非沿岸和西北非沿岸登陆。	1942年11月 8 日
三 叉 戟	罗斯福、丘吉尔在1943年5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	
低 调	位于摩泽尔南部的第六集团军群向科布伦次以南的来因河靠拢的军事行动。	1945年 3 月 15日
犹 他	在“霸王”行动中盟军实施突击登陆的地点瓦雷维尔滩头。	
大 学	盟国第一空降集团军在威塞尔北部和西北部的军事行动。	1945年 3 月 23日
可尊敬的	大西洋法国陆军分遣队打开波尔多港的军事行动。	1945年 4 月 14日
真 实 的	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在来因河和默兹河之间,朝东南推向克山滕—格尔登总战线的军事行动。	1945年 2 月 8 日
野 花	即大不列颠。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远征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作者 = [ 美 ]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页数 = 5 3 5

SS号 = 4 1 0 1 1 5 1 8 7

出版日期 = 1 9 7 5 年 1 2 月 第 1 版